

目錄

作者前言（第 7 頁）

第一章 北京戒嚴和戒嚴部隊若干問題

- 第一節 北京戒嚴的緣起和決策過程（第 10 頁）
- 第二節 關於北京戒嚴的軍事部署（第 17 頁）
- 第三節 戒嚴部隊的數量和番號（第 23 頁）
- 第四節 防止黨內“政變”和軍隊“兵變”（第 27 頁）
- 第五節 進京的戒嚴部隊和進京路線（第 30 頁）
- 第六節 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下達（第 32 頁）
- 第七節 戒嚴部隊的挺進目標和路線（第 36 頁）
- 第八節 開槍命令的下達情況（第 40 頁）
- 第九節 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第 50 頁）
- 第十節 一場沒有武裝對手的戰爭（第 53 頁）
- 第十一節 軍人和武警的死亡情況（第 58 頁）
- 第十二節 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原因（第 64 頁）
- 第十三節 戒嚴部隊軍人事後的瘋狂報復（第 68 頁）
- 第十四節 一份論功行賞的升官晉爵名單（第 72 頁）

第二章 陸軍第 38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38 集團軍概況（83 頁）
- 第二節 六四鎮壓行動中的第一主力軍（86 頁）
- 第三節 軍長徐勤先中將抗命事件（89 頁）
- 第四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95 頁）
- 第五節 戒嚴中第一次軍民流血衝突事件（102 頁）
- 第六節 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105 頁）
- 第七節 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116 頁）
- 第八節 天安門廣場清場前的談判（125 頁）
- 第九節 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128 頁）
- 第十節 天安門廣場清場後的動向（130 頁）
- 第十一節 第 38 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134 頁）

第三章 空降兵第 15 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空降兵第 15 軍概況（147 頁）
- 第二節 緊急空運進京執行戒嚴任務（151 頁）
- 第三節 奉命向天安門廣場挺進（155 頁）
- 第四節 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160 頁）
- 第五節 空降兵第 15 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163 頁）

第四章 陸軍第 27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27 集團軍概況（167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170 頁）
- 第三節 積極準備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176 頁）
- 第四節 提前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178 頁）
- 第五節 出擊特遣分隊佔領紀念碑（181 頁）
- 第六節 天安門廣場清場以後的動向（185 頁）
- 第七節 有關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誤傳（188 頁）
- 第八節 第 27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191 頁）

第五章 陸軍第 63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63 集團軍概況（198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201 頁）
- 第三節 第 188 師成為第 38 軍督戰隊（205 頁）
- 第四節 第 187 師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208 頁）
- 第五節 守護人民大會堂（211 頁）
- 第六節 天安門廣場清場後的動向（214 頁）
- 第七節 第 63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216 頁）

第六章 陸軍第 40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40 集團軍概況（223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226 頁）
- 第三節 向北京城交通要道開進（229 頁）
- 第四節 組織防暴隊鳴槍接應受阻部隊（233 頁）
- 第五節 佔領東直門立交橋（238 頁）
- 第六節 第 40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240 頁）

第七章 陸軍第 54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54 集團軍概況（244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246 頁）
- 第三節 挺進天安門廣場（252 頁）
- 第四節 傷亡最重的一支部隊（259 頁）
- 第五節 張堃少將“失蹤”驚動高層（262 頁）
- 第六節 第 54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264 頁）

第八章 陸軍第 39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39 集團軍概況（271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274 頁）
- 第三節 軍指揮部與部隊失去通訊聯絡（277 頁）
- 第四節 第 115 師佔領建國門立交橋（280 頁）
- 第五節 第 116 師挺進天安門廣場（283 頁）
- 第六節 第 116 師師長許峰抗命事件（287 頁）
- 第七節 第 39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290 頁）

第九章 陸軍第 65 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65 集團軍概況（296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298 頁）
- 第三節 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行動失敗（301 頁）
- 第四節 經戰備通道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304 頁）
- 第五節 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308 頁）
- 第六節 清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312 頁）
- 第七節 第 65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315 頁）

第十章 陸軍第 24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24 集團軍概況（321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324 頁）
- 第三節 提前進駐中國公安部大院（327 頁）
- 第四節 突入天安門廣場參加清場行動，（332 頁）
- 第五節 驅趕救死扶傷的志願醫務人員（335 頁）

- 第六節 天安門廣場清場後的動向（339 頁）
- 第七節 第 24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342 頁）

第十一章 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概況（347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351 頁）
- 第三節 坦克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353 頁）
- 第四節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360 頁）
- 第五節 六部口慘案的詳細經過和後果（363 頁）
- 第六節 坦克第 1 師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368 頁）

第十二章 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概況（374 頁）
- 第二節 乘專列進京執行戒嚴任務（376 頁）
- 第三節 受困北京火車站（379 頁）
- 第四節 挺進天安門廣場（382 頁）
- 第五節 天安門廣場清場後的動向（385 頁）
- 第六節 炮兵第 14 師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387 頁）

第十三章 陸軍第 28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28 集團軍概況（396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399 頁）
- 第三節 奉命挺進天安門廣場受阻（401 頁）
- 第四節 軍長何燕然軍政委張明春帶頭消極抗命（405 頁）
- 第五節 第 28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408 頁）

第十四章 北京衛戍區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北京衛戍區概況（第 420 頁）
- 第二節 警衛中南海等重要目標（422 頁）
- 第三節 神秘幹部隊執行神秘任務（425 頁）
- 第四節 警衛第 13 團五進五出北京城（431 頁）
- 第五節 高炮團進駐新聞傳播機構（433 頁）
- 第六節 六部口搶奪彈藥車（438 頁）

- 第七節 爲戒嚴部隊開闢通訊線路（442 頁）
- 第八節 武裝部系統協助解放軍戒嚴部隊（446 頁）
- 第九節 北京衛戍區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448 頁）

第十五章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概況（459 頁）
- 第二節 奉命執行北京戒嚴任務（461 頁）
- 第三節 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464 頁）
- 第四節 爲第 38 軍挺進天安門廣場開道（467 頁）
- 第五節 配合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470 頁）
- 第六節 武警北京市總隊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473 頁）

第十六章 陸軍第 12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12 集團軍概況（477 頁）
- 第二節 六月四日緊急空運進京（480 頁）
- 第三節 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督戰隊（483 頁）
- 第四節 第 12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485 頁）

第十七章 陸軍第 20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20 集團軍概況（489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492 頁）
- 第三節 向天安門廣場艱難挺進（494 頁）
- 第四節 步兵第 173 團鳴槍示警突圍（497 頁）
- 第五節 配合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500 頁）
- 第六節 出天安門廣場收攏失散部隊（502 頁）
- 第七節 第 20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505 頁）

第十八章 陸軍第 26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26 集團軍概況（512 頁）
- 第二節 空運進京執行戒嚴任務（515 頁）
- 第三節 控制永定門等交通要道失敗（518 頁）
- 第四節 第 26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521 頁）

第十九章 陸軍第 64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64 集團軍概況（525 頁）
- 第二節 乘火車專列進京執行戒嚴任務（527 頁）
- 第三節 佔領德勝門等交通要道（530 頁）
- 第四節 第 64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534 頁）

第二十章 陸軍第 67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 第一節 陸軍第 67 集團軍概況（537 頁）
- 第二節 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539 頁）
- 第三節 向天安門廣場挺進（541 頁）
- 第四節 第 67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544 頁）

附錄照片（548 頁）

作者前言

本人多年來一直認為，1989 年天安門事件（六四事件）最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所謂的真相，最重要的也就是屠殺的真相。因此，本人作為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又是在北京大學接受過 7 年專業訓練的中國古典文獻學者，一直極力搜集有關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資料，探求屠殺的真相。繼 2007 年 5 月出版《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後，如今終於完成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的定稿工作，並將出版發行。

寫作本書的念頭產生於 1990 年 3 月初，當時本人通過跳海游泳和乘坐漁船的方式剛剛抵達香港，為了寫作《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又名《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讀了一些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資料，於是發願：一定要寫一部關於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書，將手上沾有平民百姓鮮血的決策者、執行者記錄在案，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在中國執政當局始終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視為禁區的情況下，本書的寫作一直面臨極大的困難，首先是由於資料不足，搜集資料非常不易，其次是由於涉及到軍隊，又是特別敏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寫作的難度遠勝於寫作《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中國執政當局歷來將有關軍隊的資訊列為國家機密，每一支部隊除了番號，例如“陸軍第 38 集團軍”，團級以上單位還有代號，例如“8341”（中央警衛團），規定部隊對外只能使用代號，連番號都屬於機密，不許使用。當今世界，只有中國將軍隊的番號列為國家機密。

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資料，包括中國官方公開宣傳“平息反革命暴亂”勝利成果，表彰“共和國衛士”的資料，其中不僅見不到部隊的番號，就連部隊的代號都見不到，通常很難斷定到底是哪支部隊。

值得慶倖的是，本人曾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受過七年專業的訓練，先後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深得中國傳統考據學的精髓；在入讀北京大學之前，又是公安邊防部隊的軍人，具有一定的軍事知識。經過曠日持久的努力，基本上破解

了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資料，一一確定了部隊番號，從而爲寫作本書奠定了基礎。在破解、確定部隊番號的基礎上，相關的資料才“活”了起來，有了引用的價值，而且可以用來相互驗證，破解其它資料，一些通常被人們視爲毫無價值的中國官方的宣傳資料，陡然間也顯現出驚人的價值。諸如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和前進指揮部的位置所在，就是在無意有意之間發現的。

本書的寫作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過程，但由於破解了一份又一份資料，找到了一個又一個答案，又無疑是一個不斷產生驚喜的過程。本人不止一次對友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表示，萬萬沒有想到，在流亡海外，遠離古典文獻專業多年之後，竟然又能用上考據學的老本行，難道冥冥之中真的有天意的存在？

在多年搜集資料，並對資料進行破解、研讀的基礎上，本書確定 1989 年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部隊，包括北京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24 集團軍、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28 集團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瀋陽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40 集團軍、陸軍第 64 集團軍，濟南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20 集團軍、陸軍第 26 集團軍、陸軍第 54 集團軍、陸軍第 67 集團軍，南京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12 集團軍，直屬中央軍委指揮的空降兵第 15 軍，以及北京軍區屬下的炮兵第 14 師、北京衛戍區屬下的警衛第 1 師和警衛第 3 師、天津警備區屬下的坦克第 1 師、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總人數逾 20 萬。

本書將上述所有的部隊，均以專章列出，從奉命進京，到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其間所發生的情況均一一予以敘述，包括進京路線、方式、情形，執行任務的表現，等等。

此外，本書專門列有一章，探討包括開槍命令在內，人們感興趣和關注的問題。這一章分爲十四節，內容包括：北京戒嚴的緣起和決策過程，關於北京戒嚴的軍事部署，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數量和番號，防止黨內“政變”和軍隊“兵變”，進京部隊和進京路線，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下達，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挺進目標和路線，開槍命令的下達情況，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一場沒有武裝對手的戰爭，一份論功行賞的升官晉爵名單，軍人和武警的死亡情況，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的原因，

戒嚴部隊軍人事後的瘋狂報復。

本書提供了一份迄今爲止最完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各級指揮官升官進爵的名單，並第一次公佈了一份參與北京戒嚴行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名錄，包括這些官兵所在的部隊番號、職務、軍銜，人數已逾兩千。這些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即使不是六四血腥事件的責任者，也是六四血腥事件的見證人，他們有責任、有義務說清楚他們當年做了什麼，見到了什麼。

在中國目前的政治局勢下，要完全揭開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真相，尚有待於知情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毫無疑問，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當屬重要的知情者，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只有兩位有良知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公開站出來說明當年的親身經歷，一位是陸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高射炮兵團雷達站站長李曉明中尉，現在居住在澳大利亞，2002 年 5 月 30 日在美國紐約召開記者會，他講述了親身經歷；一位是陸軍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士兵張世軍，現在居住在中國山東省滕州市，他在今年 3 月 6 日發表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後，被關押了十多天。

本人真誠地期待讀者提供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資料和線索，以便對本書進行補充和修訂。

吳仁華
2009 年 5 月

第一章、北京戒嚴和戒嚴部隊的若干問題

第一节、北京戒嚴的緣起和決策過程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北京各高校學生發起悼念活動，從校園到天安門廣場，很快轉化爲一場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學生運動。由於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將學生運動定性爲“動亂”，並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發表題爲“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1989年5月13日，數百名北京各高校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一、兩天之內，絕食請願學生的人數劇增到數千人，持續不斷地有學生送醫急救，引發北京各界逾百萬人士上街遊行聲援，聲援活動又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引起中共當局恐慌，決定調動大批解放軍部隊進京，對北京市部分地區（整個北京市區）實施戒嚴。

名義上，調兵進京、實施戒嚴的決定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做出，然後交由中國國務院出面頒佈戒嚴令，並由中央軍委具體部署實施。實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純屬木偶，被幾個躲在幕後的中共元老所操縱，拍板定局者是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從以下幾次相關的中共高層會議和中共元老的密會，可見其端倪。

1989年5月16日晚上，也就是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第3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以及有權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中共元老楊尚昆（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薄一波（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這次緊急會議做出了兩項決定：第一、鑒於目前局勢非常緊急，於5月17日向小平同志進行全面的情況彙報，聽取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見；第二、同意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絕食請願的學生發表書面講話，書面發言稿會後馬上播發。

1989年5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趙紫

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齊聚鄧小平家中，名義上是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實際上是向當代的慈禧太后鄧小平彙報請示，聽候鄧小平的指令。在場的還有中共元老楊尚昆和薄一波。

會議一開始，趙紫陽首先簡單介紹了學生運動的情況。但鄧小平很快就給會議定了調子：“今天只談論究竟應該（對學生運動）退讓不退讓？”薄一波迫不及待地發言說：“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我們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地步。”楊尚昆隨即也明確地表了態：“這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不能退，一退就垮了。”鄧小平等人如此一定調，趙紫陽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便或不敢表達了。就連反對調兵戒嚴、最終被撤銷職務的胡啓立，當時也不得不違心地表示“退是不能再退了”。

緊接著，鄧小平就提出了調動軍隊進京，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意見，他說：“考慮來考慮去，要請解放軍出來，要在北京戒嚴，具體一點就是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戒嚴的目的就是爲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這是黨和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今天鄭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來，希望你們考慮。”

鄧小平說是提出個人意見，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予以考慮，但他作爲中共的“慈禧太后”，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他的意見誰也不敢也無法反對。於是，會議隨即作出四項決定：第一、當天晚上繼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具體部署如何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 5 月 18 日早晨去醫院看望住院治療的絕食請願學生；第三、李鵬於 5 月 18 日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要求絕食請願的學生全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第四、5 月 18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報告部署北京市區戒嚴的情況。

會議結束後，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中共元老陳雲、李先念、彭真，並指示秘書打電話給中共元老鄧穎超、王震和中央軍委的 3 名委員洪學智（時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時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秦基偉（時任中央軍委委員、國防部部長），通知他們於第 2 天上午開會，通報實際上由鄧小平拍板決定，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義所做出的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部署情況。

1989年5月17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與會者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和中共元老楊尚昆、薄一波。5名常委對戒嚴問題意見分歧，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薄一波提議進行正式表決。表決的結果是：李鵬、姚依林支持戒嚴；趙紫陽、胡啓立反對戒嚴；喬石棄權。表決一結束，趙紫陽立即提出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理由是個人對北京戒嚴持有不同看法，無法繼續履行總書記的職責。楊尚昆覺得趙紫陽在這個時候辭職對局勢震動太大，極力勸說趙紫陽不要、也不能辭職。趙紫陽最終收回辭職的請求，改為請病假3天。

這次會議做出兩項決定：第一、5月18日清晨5點鐘，中共中央政治局的5名常委分頭去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住院治療的絕食請願學生。第二、北京戒嚴問題的部署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嚴重分歧而陷於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常委於第2天（5月18日）上午再去鄧小平家，將問題上交給鄧小平，由鄧小平與中共元老、中央軍委有關負責人一起部署，並由中共元老們最後拍板決定。

此後，第13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再也沒有參與任何決策過程。

1989年5月18日上午，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中央軍委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等人聚集在鄧小平家中開會，決定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

這次會議做出了五項決定：第一、於1989年5月21日零點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第二、於1989年5月19日晚上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第三、由楊尚昆負責，立即部署軍隊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行動計畫，成立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第四、向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解放軍老元帥通報北京當前的形勢，並通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即將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決定。第五、鑒於目前北京乃至全國的緊張局勢，立即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發出通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常委會要在中央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後對戒嚴決定明確表態。

上述幾次會議表明，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是由中共元老們拍板決定的，起決策作用的是鄧小平，具體執行者是楊尚昆。鄧小平和楊尚昆無疑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主要責任者。

楊尚昆與鄧小平的關係非同尋常，不僅是四川同鄉，而且早在 1930 年代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央蘇維埃政權時期，關係就非常密切。1949 年中共建政後，楊尚昆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在 1956 年召開的中共第 8 屆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楊尚昆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兩人的關係越加密切。1978 年，“四人幫”垮臺後 2 年，鄧小平複出政壇重掌大權。離開中國政治舞臺達 12 年之久的楊尚昆也複出，並得到鄧小平的充分信任，先於 1980 年 9 月從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1981 年 7 月出任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1982 年 9 月升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協助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 1982 年召開的中共第 12 屆代表大會和 1987 年召開的中共第 13 屆代表大會上，楊尚昆連續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繼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在 1988 年 4 月召開的第 7 屆全國人大第 1 次會議上，由於鄧小平的提議和竭力堅持，80 高齡的楊尚昆取代李先念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可以說，鄧小平與楊尚昆的關係屬於密友，而與同輩人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人的關係則是同志。王震雖然死心塌地地追隨鄧小平，但與鄧小平的關係也遠不如楊尚昆。至於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雖然在 1980 年代作為鄧小平的三大愛將，但他們與鄧小平的關係，更象徒弟與師傅的關係，難以達到鄧小平與楊尚昆那種親密無間的程度。正因為是密友，楊尚昆可以隨意出入鄧家，在鄧小平名義上退出中共權力核心圈後，更成為在鄧小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間傳遞資訊、溝通意見的信使。每當中共中央政治局有重大事情需要向鄧小平請教，都是通過楊尚昆傳達的。

楊尚昆與趙紫陽私人關係也相當不錯，在當時 5 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親近的就是趙紫陽。這不僅因為他倆都曾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更因為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相同，

思想觀點比較接近的緣故。所以，在如何處理 1989 年學生運動這一敏感問題上，楊尚昆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雖然他在內心深處可能贊同趙紫陽處理學生運動的主張，即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但是，鄧小平一旦做了武力鎮壓的決定，他就轉而全力予以執行。

在鎮壓 1989 年學生運動的問題上，中共元老除了鄧小平和楊尚昆，陳雲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共內部資料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陳雲同志在事關黨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不退縮，在黨和國家危難關頭更是挺身而出，無所畏懼。1989 年春夏之交，他正在外地養病，當首都發生政治風波，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開會，率先提出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並指出：“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2 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陳雲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中共黨內具有崇高威望，他的表態對於平息政治風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陳雲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 5 年任期內，只是在學生運動期間的 1989 年 5 月 26 日，出席並主持過一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這是陳雲唯一一次出席並主持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會議，按照中共當局的說法，對穩定當時的局勢起了很好的作用。

其實，早在 1989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北京戒嚴之前，鄧小平就曾經與楊尚昆私下討論過解放軍部隊的情況，早有調動軍隊進京鎮壓學生運動的打算。1989 年 5 月 11 日下午，楊尚昆單獨前往鄧家彙報情況。他倆主要談論了以下問題：第一、這次學潮為什麼結束不了；第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支持學生；第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態度；第四、解放軍部隊的情況；第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態度；第六、下一步怎麼辦？

交談中，鄧小平表示：“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現在這些別有用心者提出反腐敗，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只是他們的陪襯，他們的核心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接著又說：“我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觀點最鮮明，態度最堅決，並且一以貫之。在重大

政治問題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斷，要敢於堅持原則。當然，我們要儘量採取和平的手段解決這次學潮。”從鄧小平“我們要儘量採取和平的手段解決這次學潮”這一句話，可見他已有調兵進京鎮壓學生運動的預案。

鄧小平詢問楊尙昆：“你怎麼看京津滬三地對這次學潮的處理？”楊尙昆回答說：“處理這次學潮，態度最堅決的是北京，李錫銘、陳希同幾乎每天把兩眼都盯在學潮上，生怕北京出現大的亂子，擔當不起。”

李錫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結夥緊跟李鵬、姚依林，力主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在趙紫陽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學潮）”的主張後，他們一方面極力刺激學生，激化矛盾，不讓局勢穩定下來，一方面一再向鄧小平謊報軍情，促使鄧小平下定決心武力鎮壓。這是導致發生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一個關鍵。

鄧小平接著又詢問：“部隊思想狀況怎麼樣？”楊尙昆回答說：“學潮發生以來，解放軍總政治部已經連續發出 4 個通知，要求各大軍區認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決不介入地方政府處理學潮的事務。對於涉及嚴重影響地方社會安定的打砸搶事件，地方政府需要軍隊出面維持秩序的，必須報經中央軍委批准。現在，軍隊的政治學習抓得很緊。一些軍區還開展了官兵對話活動，針對性很強，有效果。7 大軍區和 3 總部（解放軍總參謀部、解放軍總政治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領導班子成員精神面貌很好，沒有不團結現象。”

1989 年 5 月 13 日上午，楊尙昆和趙紫陽一起來到鄧小平家，彙報近期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工作部署。聽完彙報，鄧小平表態說：“這次學潮已經拖得太久了，將近一個月了。老同志們心都焦急著呢。陳雲、彭真、先念、王震還有鄧大姐（鄧穎超），包括我，心裏都焦急著呢。要有決斷力。”楊尙昆明白鄧小平的心思，特別就解放軍部隊的情況予以說明：“部隊官兵的思想是統一的，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這次學潮對部隊官兵的思想不會有大的影響。”最後，鄧小平特別叮嚀：“在重大政治問題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斷，要堅持原則。當然，對這次學潮，我們要盡力採取和平的手段解決。”

在上述鄧小平的談話中，在在都透露出他一直有著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想法，決定調兵進京、對北京實施戒嚴，決不是他一時心血來潮。鄧小平本來是希望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相關的決議，可以“名正言順”地調動軍隊進京，以避免“垂簾聽政”之嫌疑，沒想到遭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堅決抵制，打亂了他的如意算盤。這也正是鄧小平痛恨趙紫陽，導致趙紫陽被軟禁到死的主要原因。

《鋼鐵的部隊：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史》透露，1989 年 4 月 22 日，也就是胡耀邦去世後僅一周，陸軍第 38 集團軍便奉命進京“維護首都安定”了。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1 師也已經奉命進入北京市區執行命令。由此可見，中共執政者對於其專制統治的安危是極為敏感的，從一開始就考慮到了動用軍隊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北京的市民和學生就顯得太天真爛漫了。

第二節、關於北京戒嚴的軍事部署

1989年5月18日下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會議，針對北京戒嚴進行兵力部署。中央軍委的組成人員除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之外，洪學智上將、劉華清上將、秦基偉上將、楊白冰上將（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遲浩田上將（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趙南起上將（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全部出席了會議，並紛紛表示堅決擁護並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共中央、鄧小平對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決定。

會議決定：第一、對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主要任務由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其他軍區予以配合；第二、成立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由劉華清、遲浩田和周衣冰中將（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為首組成，劉華清任總指揮，遲浩田、周衣冰任副總指揮；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

中共當局歷來提倡“黨指揮槍”，通常所說的“中央軍委”，指的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僅僅是對外懸掛的一塊牌子而已。中共中央軍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其組成人員完全相同，當時的主席都是鄧小平，第一副主席都是趙紫陽，常務副主席和秘書長都是楊尚昆，副秘書長都是洪學智和劉華清，委員都是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

中央軍委會議一結束，楊尚昆即帶領劉華清、遲浩田趕赴鄧小平家，詳細彙報中央軍委會議有關北京戒嚴的軍隊部署情況。聽完彙報，鄧小平詢問：“戒嚴以後北京市區有多少解放軍呀？”楊尚昆回答說：“解放軍和武裝警察的全部兵力為18萬人。”

鄧小平過目審議了中央軍委關於解放軍戒嚴部隊兵力部署的報告，楊尚昆遞上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名義所擬定的中央軍委調兵命令，讓鄧小平簽署。這份調兵命令的內容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1日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為配合完

成這次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任務，茲命令北京軍區的北京衛戍區、第 24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第 28 集團軍、第 38 集團軍、第 63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瀋陽軍區的第 39 集團軍、第 40 集團軍，濟南軍區的第 54 集團軍、第 67 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分別於 5 月 19 日、20 日自駐地進駐北京地區的有關目的地。”

調兵命令中所稱的“北京市部分地區”，包括了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朝陽區、豐台區、石景山區、海澱區，幾乎涵蓋了整個北京市區，只有門頭溝區不在戒嚴範圍內。當時北京市行政區劃還包括 9 個郊區縣，即房山縣（現為房山區）、通縣（現為通州區）、順義縣（現為順義區）、昌平縣（現為昌平區）、大興縣（現為大興區）、懷柔縣（現為懷柔區）、平谷縣（現為平谷區）、密雲縣、延慶縣。

離開鄧家，楊尚昆馬不停蹄趕回中央軍委辦公廳落實調兵命令。他指示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立即與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的司令員磋商，“確定每一個陸軍集團軍的有關師、團進京名單，進軍時間，到達目的地時間，戒嚴主要事項等實施細則”；命令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立即以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名義向各大軍區發佈政治動員令，要求“在黨和國家面臨嚴峻形勢的情況下，各大軍區必須紀律嚴明，隨時做好準備，絕對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行動和指揮”；命令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調集好戒嚴必須的一切軍用戰備物資糧食，並與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磋商，盡可能地解決好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食宿給養問題”。

中央軍委辦公廳作為中央軍委的辦事機構，馬上緊張運作起來。當時的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是劉凱中將，副主任是王瑞林中將（同時兼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李際均中將和程建甯少將。秘書有王福中少將、陳蔭華少將、趙家順少將和王士斌少將，助理員有王海珍少將，研究員有俞源少將。

當晚，解放軍總參謀部就將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緊急下達到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也就是說，在北京戒嚴令頒佈之前，解放軍部隊已經動起來。調兵事宜由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具體規劃，當時的作戰部部長是隗福臨少將。

1989 年 5 月 19 日上午，解放軍總政治部向解放軍各大軍區、解放軍各大軍兵種總部和解放軍駐京各高級機關單位下發

了緊急通知，通報了即將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消息，要求全軍各部隊務必正視這次學潮對部隊官兵的某些思想影響，以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證部隊的高度穩定和思想統一。

緊急通知指出，在這次學潮中全軍各部隊始終和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一致，表現出很高的政治素質。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視的思想傾向，概括起來有 4 種情緒：一是麻痺情緒，看不到學潮對安定團結大局的嚴重影響；二是消極情緒，有的官兵對腐敗現象、物價上漲不滿，認為學生鬧一鬧也許有好處；三是憂慮情緒，有的官兵擔心部隊要是站出來，理直氣壯地反對動亂，會重犯“文化大革命”中“三支兩軍”【注釋 1】的錯誤；四是無關情緒，有的官兵認為制止社會動亂自有大人物去著急，去收拾場面，咱們這些當兵的操什麼心？因而對黨和國家的命運不大關心。

緊急通知要求當前要從 3 個方面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第一、要教育部隊官兵正確認識當前的國內政治局勢。要很好地學習軍委鄧小平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系列指示，注意從“民心”的角度，向部隊官兵講清楚在我們國家的局勢中，穩定的因素是占主導地位的。一是講清楚人心思定，絕大多數人都不贊成也不容許一些人在折騰，重新把我們的國家拉回動亂的深淵；二是講清楚人心向改革，絕大多數人不願再回到十年前去，中國改革的潮流不可逆轉；三是講清楚人心向黨，絕大多數人能從歷史規律中懂得，離開了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的前途和希望。讓部隊官兵認清這三個“人心所向”，是決定和制約形勢發展的最基本的東西，從而堅定信心，去掉懷疑、動搖和擔心情緒。

第二、要引導部隊官兵對學潮中某些有代表性的口號進行具體剖析，分清哪些純屬反動言論，哪些是不滿情緒，哪些是過激言詞，哪些是可以理解的合理要求，幫助大家分清是非，端正思想。總之，要通過具體剖析一些口號和思潮，消除部分部隊官兵的思想陰影，從而明辨是非，提高覺悟，保證部隊在思想一致的情況下的高度穩定。

第三、要教育各級領導幹部帶頭保持政治堅定性。當前部隊各級領導幹部務必從以下三方面嚴格要求自己：一是清醒地認識不安定因素，做好為維護國家安定而長期鬥爭的思想準

備。部隊各級領導幹部應當看到，穩定之中包含著許多不穩定的因素，因此，防止動亂，制止動亂，維護部隊穩定和國家安定團結，將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政治任務。對於可能出現的新的社會局部動亂，部隊各級領導至少要有三種思想準備，第一，自己不大驚小怪，驚惶失措；第二，能穩定自己帶領的部隊；第三，能理直氣壯地引導部隊反對動亂。二是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陣地，既要注意對駐地社會情況、社會動向的調查，更要對部隊自身的穩定實行嚴格的責任制，一級抓好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同時要加強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同志的教育，以保證我們的機關和所屬部隊不出問題。三是從黨和國家前途的高度自覺保持廉潔。這次學生鬧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對貪污腐敗現象不滿。在部隊，決不允許因為我們的領導和機關不廉潔，而引起士兵不滿，甚至發生其他問題。

1989年5月19日晚上10點鐘，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中央軍委在解放軍總後勤部機關禮堂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通報對北京實施戒嚴的情況，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軍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國政協和北京市的副部長級以上幹部，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的司局長參加了大會。由於北京戒嚴的消息在開會前已經外泄，爲了預防不測，臨時決定將北京開始實施戒嚴的時間提前，由1989年5月21日凌晨零點提前到1989年5月20日上午10點鐘。楊尚昆曾經解釋說，將北京戒嚴時間提前的原因是由於事態緊迫。

1989年5月19日晚上，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央軍委和鄧小平、楊尚昆提交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到：“接到赴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後，北京軍區、瀋陽軍區和濟南軍區的有關集團軍迅速收攏部隊，進行政治思想動員。在向北京開進中，各部隊採取伴動迂回、隱蔽前進、多路進發、高速開進等多種辦法向北京集結。到今晚10點，先遣部隊第27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39集團軍、第63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已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準時開到北京城區，基本到達預定目的地，爲進行戒嚴做好準備。其中一些部隊遭遇不明真相的學生和群眾圍堵，被圍於街頭、郊外。戒嚴部隊指揮部將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按由遠而近、由外向裏、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則，將被

圍部隊逐步調整到有利位置。”

1989年5月20日凌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其內容如下：

“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爲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根據李鵬所簽署的戒嚴令，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簽署、公佈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號、第2號、第3號），宣佈：

“一、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澱區、豐台區、朝陽區實行戒嚴；二、在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其他聚眾妨礙正常秩序的活動；三、嚴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製造和散佈謠言，進行串連、演講，散發傳單，煽動社會動亂；四、嚴禁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嚴禁衝擊廣播、電視、通訊等重要單位，嚴禁破壞重要公共設施，嚴禁打、砸、搶、燒等一切破壞活動；五、嚴禁騷擾各國駐華使館和聯合國駐京機構；六、在戒嚴期間，發生上述應予禁止的活動，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在戒嚴期間，外國人不得介入中國公民違反戒嚴令的活動。”

1989年5月20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與會的有中央軍委成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以及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成員，聽取關於北京戒嚴實施情況的彙報。

當天晚上，楊尚昆通過電話向鄧小平彙報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情況。鄧小平交代了以下幾點：“目前的情勢大家都很焦急，我想明天老同志開個會，陳雲、先念（李先念）、彭真、鄧大姐（鄧穎超）、一波（薄一波）、王鬍子（王震）和你參加，談論局勢，兩位老師（徐向前、聶榮臻）身體不好就算了；陳雲同志建議，你、一波和李鵬、姚依林、喬石要立即安排分頭

找各省市區主要負責人進京談話，統一認識；儘快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把大軍區的司令、政委統統叫來，通報情況，認清當前形勢，維護全國穩定。”

1989年5月24日上午，中央軍委再次召開擴大會議，中央軍委成員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出席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負責人，以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國防大學的政委、司令員、政治部主任。會議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洪學智主持，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個會議完全是根據鄧小平的授意召開的，主要目的就是通報有關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問題，統一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認識，以防解放軍高層產生思想分歧。

【注釋 1】三支兩軍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支左（支持當時所謂的左派群眾）、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制）、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

第三節、戒嚴部隊的數量和番號

爲了鎮壓 1989 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到底調動了多少軍隊？一直屬於高度機密，至今見不到任何中國官方有關的資料。研究者只能抓住一些“蛛絲馬跡”進行研究分析。

1989 年 5 月 18 日，針對鄧小平“戒嚴以後北京市區有多少解放軍？”的詢問，楊尚昆回答說：“解放軍和武裝警察的全部兵力爲 18 萬人。”

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中提到，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部隊有北京軍區的北京衛戍區、陸軍第 24 集團軍、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28 集團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陸軍第 65 集團軍，瀋陽軍區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40 集團軍，濟南軍區的陸軍第 54 集團軍、陸軍第 67 集團軍。

楊尚昆所說的“18 萬”，以及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中所提到的部隊，實際上都只是初步計畫的兵力，後來實際動用的兵力超過了這個數字。

中國官方媒體曾經報導，1989 年 6 月 9 日下午 3 點鐘，鄧小平接見了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有幸蒙受鄧小平接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有“百餘人”。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以上幹部”竟然有“百餘人”，可見動用軍隊的規模之大，數量之多。

六四事件後，中共當局曾一度掀起宣傳高潮，大力表彰“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英雄模範單位和個人，官方的媒體、出版社紛紛出版相關的宣傳資料。雖然是宣傳資料，又經過有關部門的嚴格審查，但不經意間還是透露了一些零散而有價值的資訊，對於有心的研究者而言，不是沒有利用價值。

不能不提到《戒嚴一日》這本書，該書透露的資訊最多，也最有價值。該書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徵文辦公室編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於 1989 年 10 月出版發行。該書分爲上下兩冊，總共收集了 180 篇署名文章，作者除了幾位諸如北京市公安局的幹警之外，幾乎都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上至集團軍軍長，下至普通士兵。由於該書透露了太多不該透露的資訊，

出版後不久就被禁止發行，後來重新發行的所謂“精選本”，只保留了 80 篇署名文章，字數減少一半以上。

各國都有嚴格保守軍事機密的慣例，中共當局在這方面更是做的“天衣無縫”，令人匪夷所思。加上六四事件引起海內外強力抗議，極其敏感，在中國官方的宣傳資料、軍史資料，以及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的回顧文章中，全都隱去了部隊的番號（諸如第 38 集團軍），就連部隊的代號（諸如“8341”）也一併隱去。這給研究者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爲了破解和還原解放軍部隊的番號和代號，以確定到底有哪些部隊參與北京戒嚴行動，花費了筆者無數的時間。好在筆者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經受過 7 年嚴格的訓練，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技能可以派上用場。此外，笔者有過從軍經歷，具有基本的軍事常識。

經過多年的資料搜集和研讀，時至今日，關於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番號，筆者終於有了可靠、可信的答案。

參與北京戒嚴行動的解放軍部隊包括：北京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24 集團軍、陸軍第 27 集團軍、陸軍第 28 集團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陸軍第 63 集團軍和陸軍第 65 集團軍，瀋陽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40 集團軍、陸軍第 64 集團軍，濟南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20 集團軍、陸軍第 26 集團軍、陸軍第 54 集團軍、陸軍第 67 集團軍，南京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12 集團軍，直屬中央軍委指揮的空降兵第 15 軍，以及北京軍區屬下的炮兵第 14 師、北京衛戍區屬下的警衛第 1 師和警衛第 3 師、天津警備區屬下的坦克第 1 師、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

有人提到，參與北京戒嚴行動的部隊還有瀋陽軍區屬下的陸軍第 23 集團軍。筆者多方收集資料，反復查證，至今無法確定這個說法。

在 1989 年，解放軍總共擁有 24 個陸軍集團軍。除了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 14 個陸軍集團軍之外，另外 9 個沒有進京的陸軍集團軍是陸軍第 1 集團軍、陸軍第 13 集團軍、陸軍第 14 集團軍、陸軍第 16 集團軍、陸軍第 21 集團軍、陸軍第 31 集團軍、陸軍第 41 集團軍、陸軍第 42 集團軍、陸軍第 47 集團軍。在和平時期，爲了鎮壓一場和平請願的學生運動，24 個陸軍集團軍竟然動用了 14 個，可見調兵的規模確實大得驚人。

解放軍在 1985 年實施陸軍整編改制，陸軍野戰軍部隊全都改編為多兵種的集團軍建制，兵力大大地加強了。每個陸軍集團軍通常下轄三個步兵師，一個坦克師（或坦克旅），一個炮兵旅，一個高射炮兵旅，一個工兵團，一個通信團，還有偵察營等各類保障部隊。象陸軍第 24 集團軍、陸軍第 26 集團軍這樣的乙類簡編集團軍，官兵人數就在 3 萬人以上，至於象陸軍第 38 集團軍、陸軍第 39 集團軍、陸軍第 54 集團軍這些甲類整編集團軍，官兵的人數就更多了，可以達到 7、8 萬人。

在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北京衛戍區由於本身的職責和屬性，幾乎所有的部隊和部門，包括衛戍區醫院、通訊處、人民武裝部系統，都奉命全力投入，詳細情況會在下面的專門章節中予以敘述。

北京衛戍區隸屬於北京軍區，是軍級建制單位，其主力部隊有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3 師。每個警衛師下轄六個團。警衛第 1 師屬於內衛部隊，而警衛第 3 師則屬於野戰部隊。一般人只知道陸軍第 38 集團軍在 1989 年學生運動期間曾多次奉命進京執行任務，其實還有一支部隊曾多次奉命進京執行任務，那就是北京衛戍區的警衛第 3 師。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有 5 個師、團級的部隊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一等功，其中就有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的警衛第 13 團。

天津警備區隸屬於北京軍區，是軍級建制單位，其主力部隊有步兵第 196 師和坦克第 1 師。坦克第 1 師曾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該師是解放軍最早建立的裝甲兵部隊，裝備精良，戰鬥力強，下轄三個坦克團，一個裝甲步兵團，以及通信營、偵察營等各種保障部隊。

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隸屬於武裝警察部隊總部，是一個副軍級建制單位（1989 年後升格為軍級建制單位），下轄 9 個支隊（團級建制），另外還有一些特種部隊。在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也是全力投入的一支部隊，詳細情況會在下面的專門章節中予以敘述。

照理說，一旦確定了所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番號，只要按照這些部隊的人數編制，就可以計算出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總人數。但問題在於，這些部隊大都只是一部分官兵進京執行戒嚴任務，例如陸軍第 12 集團軍僅有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34 師的

一個團和部分保障分隊被緊急空運進京，共有 1 萬多名官兵；陸軍第 67 集團軍僅出動了步兵第 199 師。空降兵第 15 軍出動了三個空降兵旅中的兩個旅。因此，即使確定了所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番號，還是難以統計出一個確切的數字。

迄今為止，民間關於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總人數存在不同的說法，有說 18 萬的，有說 25 萬的。報數最多的是 1989 年 7 月號香港《明報》月刊所刊載的、題為《黨指揮槍？槍指揮黨？——謎一樣的人民子弟兵》的文章：“這次奉戒嚴令進京的，有來自全國七大軍區的軍隊，達 35 萬之眾。他們大多出自作為軍隊‘精銳’的野戰部隊；軍兵種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空軍部隊、導彈部隊。其中 27 軍、38 軍、39 軍、24 軍均為經過合成改造的現代化集團軍。參加人數最多的 27 軍和 38 軍為中央軍委戰略預備隊。”

上述這篇文章存在一些問題，其一，“有來自全國七大軍區的軍隊”的說法顯然不符合事實，蘭州軍區、武漢軍區和廣州軍區並沒有派兵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其二，說導彈部隊也參與了，缺乏證據，據筆者瞭解，至少導彈部隊沒有進京。

在 18 萬、25 萬、35 萬三個數字中，35 萬的說法有所誇大，欠缺事實依據；18 萬的說法雖然有所依據，楊尚昆在 1989 年 5 月 18 日曾提到“18 萬”這個數字，但楊尚昆所說的只是中央軍委初期計畫部署的軍隊數字，並不包括後來緊急調集進京的部隊，例如於 1989 年 6 月 4 日從江蘇省徐州市緊急空運進京的陸軍第 12 集團軍。而且不包括北京衛戍區、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的部隊。

筆者在基本確定了每一支部隊進京的師、團級單位之後，得出這麼一個結論：鄧小平、楊尚昆調動了 18 萬到 25 萬的解放軍部隊和武裝警察部隊參與北京戒嚴行動是可信的。

第四節、防止黨內“政變”和軍隊“兵變”

鄧小平、楊尚昆動用如此龐大的兵力，進行如此周密的部署，顯然不僅僅是爲了對付和平請願的學生和聲援學生的北京民眾，同時也是爲了防止中共黨內的“政變”和軍隊的“兵變”。如果僅僅是爲了對付學生和北京民眾，動用北京衛戍區的兩個警衛師和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就足矣，根本不需要調動這麼龐大的野戰軍部隊進京。鄧小平、楊尚昆當時的最大憂慮就是中共黨內的“政變”和軍隊的“兵變”。

在鄧小平、楊尚昆看來，有可能發動中共黨內“政變”的頭號危險人物當然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六四血腥事件後被撤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啓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等人，被當然地視爲趙紫陽的同夥。

相比之下，兵變比政變更爲可怕，也更難預料和控制。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不久，楊尚昆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6月4日這天早晨，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一個班出問題，都不得了。但是我們的軍隊堅決捍衛黨，這個班是沒有的。”【注釋1】

前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現任解放軍空軍副政委的劉亞洲中將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當年擔任武漢軍區空軍政委時，曾在一次題爲《道德與信念》的內部報告中以總結經驗教訓的口吻說，北京軍區的部隊不可靠，因爲長期駐防京畿地帶，消息靈通，瞭解北京的學生運動情況，普遍同情學生，執行戒嚴令當然不力。幸虧鄧小平英明，除了調動北京軍區的部隊，還調動了大量其他軍區的部隊進京，要不非出大問題不可。

大量資料證明，鄧小平、楊尚昆確實對解放軍戒嚴部隊做了精心的調度安排，從中可以發現劉亞洲所說的鄧小平的“英明”之處，即調動多個軍區的部隊進京，相互監督制衡，彼此難以串聯，避免發生兵變事件。

中共歷來將“黨指揮槍”作爲最重要的建軍原則，解放軍長期處在中共的絕對領導之下，是名副其實的“黨軍”。儘管如此，在1989年的學生運動普遍受到社會各界支援的情況下，鄧小平、楊尚昆對這支“黨的軍隊”仍不放心，因此對有關解

放軍戒嚴部隊調度的每一個環節都經過了精心的考慮，做了一種“雙備份”、“雙保險”的周密安排。例如：1989年6月3日，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時，安排了解放軍中四個最尖銳的、不屬於同一個軍區的主力軍----陸軍第38集團軍、陸軍第39集團軍、陸軍第54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擔任主攻任務。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兩條主要路線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部隊，也都是各為兩個以上的集團軍。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時，也是同時使用了陸軍第38集團軍、陸軍第54集團軍、空降兵第15軍等多支部隊，此外，安排陸軍第24集團軍、陸軍第27集團軍、陸軍第39集團軍、陸軍第63集團軍、陸軍第65集團軍、炮兵第14師等部隊擔任警戒任務，並由陸軍第27集團軍的一個“特緝分隊”負責搗毀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任務。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陸軍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雖然扮演主要角色，但也不被充分信任，在他們抵達天安門廣場之前，事先安排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的多個集團軍，早已對天安門廣場形成了嚴密的包圍圈。在這個包圍圈的周邊，還部署了空軍部隊和炮兵部隊。空軍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北京戒嚴行動，但也奉命進入戰備狀態，北京區域內的南苑軍用機場、西郊軍用機場、沙河軍用機場、三間房軍用機場，全都成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營。北京軍區的炮兵部隊作為預備隊，也早已進入戰備狀態，其中炮兵第14師臨時奉命緊急進入北京城，炮兵第16師、高射炮兵第61師、高射炮兵第67師、高射炮兵第68師都在駐地隨時待命。

提前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待命的部隊，也是多個集團軍，包括陸軍第27集團軍和陸軍第65集團軍，外加陸軍第63集團軍的一個師。提前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的部隊，包括陸軍第24集團軍在內。

作為第一主力部隊的陸軍第38集團軍，在沿著主要路線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進軍時，如同被“請君入甕”，不僅前面已預設了一個包圍圈，連後路都被封死，陸軍第63集團軍的一個師緊隨其後，實際上起著“督戰隊”的作用。

這種精心而周密的部署，使得整個圍繞天安門廣場所進行的進軍過程以及隨後的清場行動，看上去更像是鄧小平、楊尚昆一場小心謹慎的對各解放軍部隊忠誠度的測試。如果當時第 38 集團軍部隊接受一些學生和民眾的呼籲，陣前倒戈，與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勝利會師”的話，將立即在鄧小平、楊尚昆預設的包圍圈內遭到其他部隊的圍剿。

同樣的，任何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如果輕舉妄動，發動“兵變”，也將遭到其他部隊的圍剿。除非有足夠的部隊事先達成共識，同時行動，但這對於遭到嚴密控制的“黨軍”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當時集聚北京的數十萬部隊來自於不同的軍區。因此，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也好，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也罷，這些良知未泯的軍人，只能盡自己的努力，以各種消極的方式進行抵制，很難有進一步的積極行動。

【注釋 1】見於《深刻理解我軍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又快又好地發展》一文，作者：國防大學軍隊建設研究所所長劉明福，刊載於宜春國防教育網。

第五節、進京的戒嚴部隊和進京路線

奉命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採用空運、軍用火車專列輸送和摩托化開進三種方式，向北京開進。

進京部隊的番號和開進的路線如下：

軍部駐地在江蘇省徐州市的第 12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34 師的步兵第 110 團、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高射炮兵旅，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江蘇省的徐州市、南京市空運進京。

軍部駐地在河南省開封市的第 20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28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南省的許昌市、登封市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河北省承德市的第 24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72 師、守備第 7 旅，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北省的灤平縣、灤縣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山東省萊陽市的第 26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38 師(師部駐地在濰坊市)，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山東省的膠縣空運進京。

軍部駐地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的第 27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80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北省的邢臺市、獲鹿縣、邯鄲市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山西省大同市的第 28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83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山西省的洪洞縣、內蒙古自治區的集甯市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河北省保定市的第 38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3 師、坦克第 6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北省的保定市、新城縣、滿城縣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遼寧省營口市的第 39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116 師、集團軍直屬通信團，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以軍用火車專列輸送和摩托化開進兩種方式，分別從遼寧省的蓋縣、新城縣向北京開進。

軍部駐地在遼寧省錦州市的第 40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

步兵第 118 師、集團軍直屬炮兵旅，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遼寧省的義縣、錦州市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河南省新鄉市的第 54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162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南省的洛陽市、安陽市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山西省太原市的第 63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188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分別從山西省的榆次市、忻州市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遼寧省大連市的第 64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0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遼寧省的大連市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的第 65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194 師、守備第 3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河北省的宣化市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山東省淄博市的第 67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9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從山東省的鄒平縣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軍部駐地在湖北省孝感市的空降兵第 15 軍，該軍屬下的空降兵第 43 旅、空降兵第 44 旅，以及部分軍保障分隊，分別從河南省的開封市、廣水縣空運北京。

師部駐地在天津市薊縣、隸屬於天津警備區的坦克第 1 師，該師屬下的三個坦克團、一個裝甲步兵團，以及部分師保障分隊，從天津市的薊縣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師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的炮兵第 14 師，該師屬下的五個炮兵團，從河北省懷來縣的沙城火車站乘坐軍用火車專列向北京開進。

有關各解放軍戒嚴部隊進京時的具體情況，會在下面的專門章節中詳細敘述。

第六節、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下達

1989年6月2日，中共最高決策者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做出了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武力清場的最後決定。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當天就將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下達到了各解放軍戒嚴部隊。也就是說，從1989年6月2日開始，解放軍戒嚴部隊正式啟動了天安門廣場清場的軍事行動。

1989年6月1日，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提供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全體官兵已做好從精神到物質的全面準備，只待中央軍委一聲令下，即可開赴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這份報告是促使鄧小平、楊尚昆等人最後下達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一個重要因素。

1989年6月2日上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與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留任的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一起開會，共同就“迅速制止動亂，恢復首都秩序”，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做出最後決定。

在目前所見的有關資料中，都沒有提到已經內定的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澤民當時已於1989年5月29日乘坐專機抵達北京，應該是參與此次中共高層會議和決策的。一般認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是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主要責任者，而江澤民是主要得利者。實際上，江澤民不僅是得利者，同時也是一個責任者。這也正是江澤民掌權之後，極力反對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這次會議上，楊尚昆首先介紹情況說：“人民大會堂、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公安部機關大院等地方，都已有戒嚴部隊進駐，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戒嚴部隊全體官兵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經過近半個月的思想政治工作，全體官兵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場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認識到戒嚴的必要和合法。執行戒嚴任務的各個部隊都表示，要堅決排除干擾，無條件地執行並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以實際行動證明解放軍戒嚴部隊是堅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到目前為止，各個部隊都已經制定了警戒、防衛方案，確保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迅速執行命令。來到北京後，各個部隊堅決實

行‘全時、全員、全方位’的封閉式管理，管好人，管好槍，管好車，保證了戒嚴部隊自身的團結和安全。所以，我對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充滿信心。”

緊接著，與會者紛紛發言表態，一致要求儘快讓解放軍戒嚴部隊採取武力行動，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

最後，鄧小平下了結論：“我同意大家的意見。建議戒嚴部隊指揮部今天晚上開始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兩天完成。清場了，要向廣大市民和學生講清楚，責成其離開，做到仁至義盡。實在賴著不走的，後果自負。尚昆同志，建議你找中央軍委的同志開個會，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和我們大家的建議。建議李鵬同志將這個會議的情況向陳雲同志等人通個氣。”

1989年6月2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組成人員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委和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決定，命令一部分尚在北京郊區集結待命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於1989年6月3日零點（即6月2日午夜）進入北京市區，繼續向戒嚴警戒目標開進。

第39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少將在題為《走進血與火》的署名文章中透露，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命令是於1989年6月2日下達到軍一級的，該命令的保密等級定為“絕密”，屬於最高等級，規定只能傳達到師一級。中國官方的保密制度將保密等級分為3級：秘密、機密、絕密。【注釋1】

1989年6月3日下午4點鐘，楊尚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召集秦基偉、李錫銘、洪學智、劉華清、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以及國務院秘書長羅幹、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和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等人開會，就突然出現的嚴峻局勢和即將實施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緊急磋商。

這一次會議做出了五項決定：第一、從6月3日晚上9點鐘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北京市公安幹警予以配合；第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6月4日凌晨1點鐘抵達天安門廣場，清晨6點鐘完成全部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第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第四、戒嚴部隊

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第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特別是北京電視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要向全北京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毫無疑問，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定性為“平息首都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顯然是為戒嚴部隊開槍鎮壓製造合理的依據。據一位《人民日報》記者透露，《解放軍報》事先就寫好了慶祝平息反革命暴亂取得勝利的社論。部分北京民眾的抗暴行動，包括焚燒軍用車輛，是在戒嚴部隊採取武力行動以後，特別是開槍殺人行為激怒了北京民眾。在戒嚴部隊尚未開動、出現北京民眾抗暴行動之前，就已經有了“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實在夠耐人尋味的。

1989年6月3日晚上，也就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的當晚，楊尚昆、李鵬、劉華清、李錫銘、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羅幹等人分別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坐鎮指揮。此時的中南海重兵雲集，除了原有的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警衛第1師的部隊，還增加了警衛第3師和第65集團軍的部分部隊，中南海內佈滿了全副武裝的部隊官兵。後來，還讓第27集團軍的部隊前往增援。

1989年6月3日晚上8點30分左右，根據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命令，軍用直升機開始在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上空進行空中偵察，為解放軍戒嚴部隊武力挺進天安門廣場做好最後準備。

為了直接指揮和完全掌控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特意成立了清場指揮部，設置在緊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由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等人坐鎮指揮。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最後階段，也就是驅趕堅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時，指定空降兵第15軍第44旅旅長武運平大校擔任現場指揮官，手握報話機，代號為二號，與代號為一號的清場指揮部指揮官保持直接聯絡，隨時接受命令。1989年6月4日凌晨4時40分左右，開槍擊毀綁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學生廣播站的幾組喇叭，就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

直接下達的命令。

在清場指揮部坐鎮指揮者，除了軍方將領，還有政府部門的負責人。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後勤保障的北京軍區聯勤部助理員傅水生中校，在題為《難忘的八天八夜》的署名回憶文章中寫道：“（1989年6月4日）零點左右，部隊有關首長相繼來到大會堂。隨後政府有關領導也來了。一塊決策清場計畫。爲了減少衝突和避免流血，將軍們、領導們徹夜未眠。”【注釋2】

傅水生中校在文章中沒有提到地方部門負責人的名字，但有知情者透露，這些政府部門負責人包括李錫銘、陳希同。

【注釋1】參見《戒嚴一日》上集第155頁至第160頁。

【注釋2】見於《戒嚴一日》下集第240頁。

第七節、戒嚴部隊的挺進目標和路線

1989 年 6 月 3 日，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向天安門廣場及其他戒嚴執勤目標挺進，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

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挺進目標和路線如下：

空降兵第 15 軍：由北向南。該軍屬下的空降兵第 43 旅（旅長李家洪、旅政委趙金奎、旅參謀長樊光銀、旅政治部主任趙宗慶）、空降兵第 44 旅（旅長武運平、旅政治部主任樊友義），在副軍長左印生大校、軍副政委田瑞昌大校的指揮率領下，於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 5 點鐘從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出發，沿著北京市豐台區的南苑路，經過北京市豐台區的木樨園、北京市崇文區的永定門、珠市口、北京市宣武區的前門等地，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陸軍第 26 集團軍：由南向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38 師，在軍長佟寶存少將、軍政委劉書田少將的指揮率領下，於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 5 點鐘從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出發，沿著南苑路，經過木樨園、永定門、珠市口、前門等地，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陸軍第 38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大校、師參謀長馮兆舉）、步兵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大校、師政委陳錦彪大校），在代軍長（副軍長）張美遠少將、軍政委王福義少將的指揮率領下，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8 點鐘分別從北京市石景山區的萬壽路一帶各軍隊機關大院和北京市豐台區的西倉庫（解放軍總後勤部 101 綜合倉庫）出發，經過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上的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墳，以及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復興門立交橋、西單路口、六部口，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加上該集團軍的坦克第六師、直屬炮兵旅、直屬工兵團、直屬通信團，總共有 15099 名官兵。

陸軍第 39 集團軍：由東向西。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116 師，在軍長傅秉耀少將、軍政委馬盛林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從北京市通縣的三間房軍用機場出發，兵分兩路，步兵第 115 師（師長張作禮大校）於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8 點鐘沿著北京市朝陽區的八王墳、北京市東城區的建國門，向東

長安街上的建國門立交橋，以及朝陽門、二環以東、三環以西路段開進。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大校）于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8 點鐘沿著北京市朝陽區的雙井、八王墳、東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陸軍第 40 集團軍：由東北向西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18 師（師長郝柏棟大校、師政委郭景全大校）、直屬高射炮兵旅，在軍長吳家民少將、軍副政委高雲江少將、軍參謀長楊福臣大校的指揮率領下，於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 3 點 35 分從北京東郊的首都機場（位於北京市東北郊順義縣境內，距離北京市中心距離 25 公里）出發，沿著京順路（北京市---順義縣）、機場路、太陽宮（北京市朝陽區太陽宮鄉）、北京市朝陽區的三元橋，向北京市東城區的東直門立交橋開進。

陸軍第 64 集團軍：由北向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0 師，在副軍長劉書明大校、軍副政委張傳苗大校的指揮率領下，從位於北京市昌平縣沙河鎮的沙河軍用機場出發，沿著北京市海澱區的馬甸橋、清河鎮、學院路、北京市朝陽區的和平街北口，向德勝門、馬甸立交橋、雙北立交橋、安貞立交橋、和平街北口開進。

陸軍第 54 集團軍：由西南向東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27 師，在軍長朱超少將、軍副政委張堃少將、師長鐘聲琴大校的指揮率領下，於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9 點 50 分從北京市豐台區出發，沿著北京市豐台區的六里橋、北京市宣武區的廣安門、菜市口、虎坊橋、南新華街、和平門，向天安門廣場南端的正陽門開進。步兵第 162 師在師長黃棟甲大校、師政委胡永柱大校的指揮率領下，沿著木樨園、北京市豐台區的馬家堡、北京市宣武區的太平街、天橋，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陸軍第 28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83 師，在軍長何燕然少將、軍政委張明春少將的指揮率領下，於 1989 年 6 月 3 日從北京市延慶縣出發，於 6 月 4 日清晨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被北京市民堵截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

陸軍第 63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88 師（師長黃伯誠大校、師政委邵松高少將、師參謀長李海清、

師政治部主任趙喜海)在軍長刁從洲少將、軍政委曲繼甯少將、軍參謀長劉陰超少將的指揮率領下，於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 30 分，沿著陸軍第 38 集團軍所開闢的路線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87 師，在師長高宗武大校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於 1989 年 6 月 3 日提前進駐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

陸軍第 20 集團軍：由南向北。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28 師在軍長梁光烈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從北京市大興縣出發，向北京市豐台區的大紅門、木樨園、北京市崇文區的永定門開進。

陸軍第 24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72 師和守備第 7 旅(旅長李守成、旅政委安明)，在軍長周玉書少將、軍政委尹文聲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於 1989 年 6 月 2 日提前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

陸軍第 12 集團軍於 1989 年 6 月 4 日才緊急空運進京，沒有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作為預備隊，在南苑機場集結待命。

陸軍第 27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大校、師政委刁九建大校)、步兵第 80 師(師長林壽山大校)、集團軍直屬高射炮兵旅(旅長車成德)、工兵團(團長高永德)、通信團(團長程德舟)，在軍長錢國梁少將、副軍長黃信生少將、軍副政委陳學政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於 1989 年 6 月 2 日提前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

陸軍第 65 集團軍：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3 師(師長王勤大校、師政委張常青大校)、守備第 3 師，在軍長臧文清少將、軍政委曹和慶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已經於 1989 年 6 月 2 日通過地下通道提前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

陸軍第 67 集團軍：由東向西。該集團軍屬下的步兵第 199 師(師長李鳳龍少將、師政委楊玉文大校)，在軍長吳玉謙少將、軍政委杜鐵環少將的指揮率領下，從北京市通縣出發，沿著通縣的定福莊、北京市朝陽區的大北窯、呼家樓、日壇路、北京市東城區的建國門立交橋、東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細心的讀者，或是熟悉北京交通道路情況的讀者，可能會

對上述所列的一些進軍路線提出疑問，有的進軍路線不但不是直線指向進軍目標，甚至還存在後退的現象，那是因為當時的北京處於全民“截”兵的狀態，許多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開進途中不斷遇到民眾強力的攔截，不得不放棄原先的進軍路線，改道迂回開進。

上述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開進目標和路線、開進方式。以及各部隊軍事指揮官的姓名，經過筆者多年來對相關資料的搜集和研讀，幾乎都可以得到驗證。

第八節、開槍命令的下達情況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開槍命令是否存在？是如何下達的？是什麼時間下達的？是哪個層級，具體是誰下達的？這是厘清六四血腥鎮壓事件責任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關鍵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中共當局對此諱莫如深，遂成為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一個最大的秘密。

時至今日，中共當局仍然不敢面對這個問題，更沒有人出面承擔下達開槍命令的責任。包括被視為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三個最主要的當事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也不敢承擔下令開槍的責任，多年來，其子女頻頻借機為父輩開脫責任。

難道解放軍戒嚴部隊是擅自開槍嗎？不，絕對不是。筆者在研讀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可以明確地如此予以回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受中共最高當局委託，1989年6月30日在第7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其中提到：“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陳希同的一番話雖然經過精心考慮，但還是透露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是“奉命”開槍，也就是說，開槍命令是存在的。

另有許多資料也證明確實存在開槍命令，各解放軍戒嚴部隊都是在接到開槍命令後才奉命開槍的。在接到開槍命令前，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向目標挺進的過程中雖然遇到了民眾的強力阻攔，但都沒有開槍。一些部隊出發之際，指揮官還再三向官兵們強調不許開槍。

既然中共當局對下令開槍一事諱莫如深，自然不會公佈相關的資料。目前能夠搜尋到的資料，主要是一些參與六四血腥鎮壓行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署名文章。這些署名文章雖然經過編輯者和審查者的精心審核，但或多或少遺留了一些有關開槍命令的蛛絲馬跡，從而證明了的確是有過開槍命令。

署名文章之一：北京軍區聯勤部助理員傅水生中校在題為《難忘的8天8夜》的文章中寫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1時許，旅兩名軍官渾身是血、

滿臉是傷，跑到指揮部向首長報告部隊到達指定位置。首長詢問部隊情況，他們說徒步上來，受傷嚴重，所帶乾糧被燒被搶。‘為什麼不鳴槍？’ ‘只接到不准開槍的命令。’ ”

傅水生文章中所提到的“指揮部”，是指設立在大會堂內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所提到的“首長”，不是指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就是指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

從傅水生文章中“首長”的問話，可以得知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確曾下達開槍命令；而從“旅兩名軍官”的回答，可以得知開槍命令是在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向目標挺進的過程中下達的，因為“旅兩名軍官”所在的這支解放軍戒嚴部隊從駐地出發時，“只接到不准開槍的命令”。

傅水生中校當時作為北京軍區後勤指揮部的成員，奉命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負責給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提供後勤保障，一直與北京軍區的指揮官們待在一起，他所記錄的親身經歷應該是可靠的。【注釋 1】

署名文章之二：陸軍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將在題為《再度京華》的文章中寫道：

“（1989 年）6 月 3 日 23 時 10 分，有個穿便衣的人說什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戒嚴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

吳家民文章中所提到的“軍區前指”，指的是解放軍瀋陽軍區前進指揮部，陸軍第 40 集團軍隸屬於瀋陽軍區；在萬壽路開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指的是陸軍第 38 集團軍。

吳家民在該篇文章中還寫道，在接到開槍命令後，他和陸軍第 40 集團軍的指揮官們表示“堅決執行上級首長命令”，隨即向屬下部隊作了轉達，並命令炮兵旅組成防暴隊（又稱“接應分隊”），“鳴槍示警”接應各受阻部隊。【注釋 2】

署名文章之三：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大校在題為《戒嚴日記六則》的文章中提到“對空鳴槍”，顯示該部隊開過槍，顯然也曾接到過開槍的命令，相關的文字記載如下：

“（1989 年 6 月 3 日）17 時整，我奉命帶領部隊從南往北

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由於歹徒混雜在不明真相的市民、學生當中，把對黨、對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全部地傾瀉到戒嚴部隊官兵的身上，他們用種種不堪入耳的污言穢語謾罵我們，用磚塊、瓦片、木棒和燃燒瓶毆打我們，致使部分官兵受傷，我也受了傷。部隊嚴重受阻。

面對這種狀況，我立即提出要求：各級指揮員都要站在最主要的指揮位置，隨時讓部隊看到自己的身影，聽到自己的聲音。對群眾的過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讓，採取‘打大雷不下雨點’的辦法（即端槍上刺刀，對空鳴槍，產生威懾力量）。我讓鳴槍示警的戰士全部站在佇列正中央，以免誤傷群眾，部隊呼喊著口號，奮勇向前開進，效果非常好，群眾逐漸散開了。”【注釋3】

署名文章之四：陸軍第24集團軍副軍長劉書明大校、軍副政委張傳苗大校在題為《走向德勝門》的文章中寫道：

“上級指示：可以對空鳴槍。我們立即下令：對空鳴槍，驅散人群，分別突進。（1989年6月4日）9時24分，兩個團終於到達德勝門。兩對網著血絲的眼睛對視著，同時長長地籲出口氣。”【注釋4】

署名文章之五：陸軍第40集團軍幹事胡衛平上尉在題為《京順路一夜》的文章中寫道：

“說實在話，（1989年）6月3日那天夜裏我主動請求任務時，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來。因為北京的動亂已經變成反革命暴亂，當時情形相當嚴重。

‘我們有兩個團被圍在京順路東壩河一帶。你們抄小路趕到炮兵旅，組織防暴隊，帶上廣播車，必要時可採取對空鳴槍警告的辦法，接應部隊突圍。保證按時到位。’去炮兵旅的路上，我耳邊響著軍長的話。

我看看表，已是（6月）4日零點50分。”

胡衛平在文章中說，第40集團軍參謀長楊福臣大校在接獲開槍命令後立即“向炮兵旅下達了組織防暴隊的命令。部隊開始緊張地準備廣播車、武器和器械。”【注釋5】

署名文章之六：陸軍第20集團軍步兵第58師步兵第173團上士朱雙喜在題為《兩退兩進都是情》的文章中寫道：

“（1989年）6月3日下午5點20分，我團880名官兵從

臨時營地京郊南苑機場出發，急行軍 25 公里，一路上 16 次遭群眾圍攻攔阻，511 人受傷，于 4 日凌晨 2 點，行進到天壇公園東門外，團隊被分割成三截。我作為一名報導員，也和 3 百名戰友一起被 6 萬多不明真相的群眾擠壓在公路旁的鐵欄杆和公園圍牆上，動彈不得。……

這時，團長蹲到政委李成星身旁，耳語了一陣，然後挨近我們，示意我和十幾名戰士圍成一圈，並派出 6 名戰士在週邊警戒，不讓市民靠近。我正納悶，一只用被子裹著的木箱輕輕放到了我們面前。沉重的箱子迅速啓開了，露出一粒粒晶亮的子彈！團長把子彈分發給十七名射擊過硬的幹部，輕聲作了交代。……

（6 月 4 日凌晨）4 點 5 分，6 萬多圍堵的市民果然散去了將近一半。只見團長猛地掐滅煙頭，站起身來，喊道：‘部隊集合！立正---！---向右看---齊！’

一聲令下，官兵們頓時忘記了疲勞、饑餓和傷痛，一躍而起，面向天安門方向巍然挺立。市民群中也‘噲’地躁動起來，齊聲喊道：‘把頭掉過去！’‘把頭掉過去！’‘不准鎮壓學生！’

團長沒有答理，只向十七位子彈上膛的幹部作了一個暗示。很快，他們便按預定方案，迅速分為四組，分別站到隊伍的前後左右。……

然而，部隊後撤大約 30 米，團長突然下令立定、向後轉。人群中複又一陣騷動，接著一擁而上，圍住了部隊。團長沉思片刻，只得重令部隊後撤。

10 米，20 米，30 米，正行進間，只聽一聲‘立定’、‘向後轉’，隊伍又一次剎住腳步，猛地轉過身來。隊伍兩側幾個‘陪行’的年輕人仿佛明白了什麼，喊道：‘攔住他們……’然而就在這時，‘噠噠噠噠……’第一組四名軍官一齊對空射擊，清脆的槍聲劃破了黎明前的夜空。

‘嘩！’人群趴下一大片。不少人拔腿就跑，逃離了大街。幾名穿白色上衣的女學生嚇得哭了。”

朱雙喜文章中所提到的下令開槍的團長，指的是陸軍第 20 集團軍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3 團團長陳榮富。【注釋 6】

署名文章之七：陸軍第 40 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訓練處處長劉

新力上校在題爲《八闖三元橋》的文章中寫道：

“（1989年6月4日）半夜零點，我們趕到海運倉時，又接到軍長的指示，命令部隊一定要在拂曉前按時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對空鳴槍示警。同時獲悉軍楊參謀長正在組織防暴隊準備配合行動。我接到命令，馬上借了自行車，與徐參謀一起先趕到東直門。……我秘密找到A團作訓股長，傳達了上級指示，告訴他們秘密發子彈，聽到槍聲，馬上組織突圍，佔領立交橋。

接著我又騎自行車經三元橋趕回東壩河，這時已是4日凌晨1時左右，我和徐參謀分頭把C團團長、政委、參謀長、作訓股長、A團1營和炮營營長、2營教導員等人悄悄找來，著便衣躲進兩條公路中間的樹林裏秘密開會，傳達軍長的指示，具體明確了兩個團鳴槍突圍的協同動作。……”

劉新力文章中所提到的“軍長”指的是陸軍第40集團軍的軍長吳家民少將，“楊參謀長”指的是陸軍第40集團軍的參謀長楊福臣大校。【注釋7】

署名文章之八：陸軍第40集團軍參謀長楊福臣大校在題爲《奇速用兵太陽宮》的文章中寫道：

“當時的時間是（1989年）6月3日晚20時左右。我按軍分層次交替指揮的方案，前出到太陽宮實施指揮。部隊受阻與群眾攪在一起，通信工具也被砸壞了，無法進行聯絡。……於是我就指揮部隊採取反復宣傳、勸說、繞行突圍，但由於人太多，都沒有效果，部隊仍不能前進一步。……

正在百思不得其策的情況下，恰好這時上級下達了可以對空鳴槍示警的指示。軍裏研究決定組織接應部隊，幫助受阻部隊解圍。……

接應部隊開上去了，還不錯，9台進口賓士車，一齊呼叫，32支衝鋒槍，一起對空點射，圍堵的人一下子就嚇得散開了，部隊突圍成功了。聽到消息，我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這時的時間是4日的3時10分。”

楊福臣文章中所提到的“旅參謀長王建平”，指的是陸軍第40集團軍炮兵旅的參謀長王建平。【注釋8】

署名文章之九：解放軍畫報社攝影記者李靖在題爲《鏡頭下的長安街》的文章中寫道：

“（1989年6月3日）晚上9點多鐘，我騎著自行車離開西單，向西返回。行至木樨地，只見人群攢動。突然，前方傳來一聲巨響，一團火光從軍事博物館方向沖天而起。我預感到事情的嚴重性，頓時忘記了一天的疲勞、饑餓與乾渴，把自行車往橋頭一扔，撒腿便向軍博（軍事博物館）方向跑去。

在木樨地，我不顧一切地沖進人群，搶拍暴徒向部隊砸磚頭的鏡頭，閃光燈一亮，一群人馬上沖上來將我團團圍住，質問我是幹什麼的，拍他們砸磚頭是什麼意思？有的還大喊大叫要砸碎我的相機。……

爲了留下暴徒的更多罪證，我仍沒有離開逐漸向東後退的人群，邊退邊拍。直到10點多鐘，自我感覺拍得差不多了，才開始考慮如何進入部隊，隨部隊前進。

戰士們見我身穿便衣徑直朝他們跑去，老遠便喝令我站住，邊喊邊向我沖過來。我大喊一聲：‘別動，我是軍人！’並迅速掏出記者證。戰士們檢查過證件，大聲說：‘你不要命了，誰讓你到這兒來的，快到後邊去。’

先頭部隊之後是三路軍車。我在車隊裏穿來穿去，想找到一位部隊的攝影員，這樣便能保證安全，更好開展工作。可是，轉悠了半天，毫無結果。由於身穿便衣，在隊伍中十分顯眼，一再遇到盤查。

從軍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隊走了兩個多鐘頭。受傷戰士不斷增加，部隊又這樣遲遲不能按計劃開進。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戰士們被迫朝天鳴槍示警。然而，少數暴徒仍十分猖獗，他們將幾輛電車和軍車推到木樨地橋頭，放火點燃。面對這些肆虐的暴徒，破壞國家財產的現行罪犯，如果再手軟，便是對人民犯罪。戰士開槍擊斃了少數暴徒。……”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署名文章裏，很少提到開槍，凡是提到開槍，總是千篇一律地宣稱“對空鳴槍”，只有李靖在文章中提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開槍擊斃了少數暴徒”。【注釋9】

署名文章之十：中校幹事趙曉強在題爲《我所經歷的開進和清場》的文章中寫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我作爲上級機關派往某戒嚴部隊工作組成員，跟隨該部指揮所帶第2梯隊乘車沿南苑路向

天安門開進，途中受阻於凉水河橋南側，不得已改為徒步行進。同時在此受阻的還有某師 3 個團的部分官兵，他們與上級中斷了通信聯絡，正一籌莫展。我和戒嚴部隊的左印生副軍長商量後，由我出面召集 3 個團領導和該部旅以上幹部到附近居民柴草垛旁，開了個協調會。我說明我的身份後，傳達了可以鳴槍示警開路的精神。”

趙曉強文章中所提到的“左印生副軍長”，是空降兵第 15 軍的副軍長。趙曉強是上級機關派往空降兵第 15 軍的隨軍工作組成員，實際上是扮演“監軍”的角色。【注釋 10】

上述署名文章的作者，除了解放軍畫報社攝影記者李靖，都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是血腥鎮壓行動的參與者和當事人，他們的署名文章顯示，奉命向天安門廣場等目標挺進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除了第 54 集團軍沒有接到開槍的命令，其他的部隊，包括空降兵第 15 軍、第 20 集團軍、第 38 集團軍、第 39 集團軍、第 40 集團軍，都接到了開槍命令。

這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在署名文章中，凡是談到開槍命令或奉命開槍的時候，都說是對空鳴槍警告。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數以百計的北京市民和學生怎麼會中彈死亡？難道那些中彈死亡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當時都在空中飛翔不成？

筆者搜集、閱讀了大量六四血腥鎮壓事件親歷者的資料，可以斷定，解放軍戒嚴部隊最早開槍的時間是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也就是說，開槍命令是在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之前下達的。

開槍命令是如何下達的？在正常的情況下，軍隊的命令通過軍用電臺下達，但是，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向目標進軍時，北京城全民“截”兵，情況非常混亂，很多部隊不得不改乘車開進為徒步開進，電臺通信車沒有跟上。功率不大的攜帶式軍用通訊電臺在建築物林立的北京城內不起作用，或是身背電臺的通訊兵與指揮官失散。參與圍堵的民眾中有不少是解放軍退伍軍人或轉業軍人，他們知道通訊聯絡在部隊開進中的重要作用，帶頭或指導民眾重點圍堵通訊電臺車和通信兵。因此，許多部隊與上級失去通訊聯絡。

陸軍第 40 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與開進途中的部隊失去聯絡，該集團軍前進指揮部當時設立在建國門附

近的一棟房子裏，由於四周高樓林立，軍用電臺不起作用，軍長吳家民急得到處亂竄，最後只好派遣集團軍司令部炮兵參謀安衛平騎自行車外出聯絡。

許多部隊不是通過軍用電臺收到開槍命令的，而是由上級機關派遣專人傳達。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就提到，是一位身穿便衣的“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前來傳達開槍命令。此外，瀋陽軍區前進指揮部司機、專業軍士王洪祥透露：1989 年 6 月 3 日 22 時 30 分，上級下了一道命令（極可能是開槍命令），指揮部要求下達到各部隊。於是，王洪祥開車送作戰處唐處長和一名參謀到各部隊傳達命令。【注釋 11】

開槍命令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等目標進軍的途中下達的，各部隊接到開槍命令的時間有先有後，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第 38 集團軍最先接到開槍命令，時間是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前。第 38 集團軍政委王福義在題為《鐵流東進天安門》的署名文章中有這麼一段文字：“部隊提前半小時，於 9 時半出發，浩浩蕩蕩往東挺進。走出不遠，車隊又停住。這時，政治部一位幹事急急從前邊跑來報告說，張副軍長（張美遠少將）到軍博（軍事博物館）開會，軍區陳副政委（陳培民中將）讓我到前邊去。”

張美遠在率領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緊要關頭，卻被臨時召集到軍事博物館開會，顯然是去接受緊急而重要的命令。這個時候，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和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率領前進指揮部剛剛抵達軍事博物館。

張美遠返回部隊後不久，第 38 集團軍官兵緊接著就在萬壽路、五棵松路一帶開槍，時間是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左右。宋曉明是已知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最早遇難者，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左右在五棵松路口一帶中彈身亡。這個情況與許多目擊證人所提供的親身經歷相吻合。目擊證人王曉明在題為《目擊實錄》的文章中就明確提出：“6 月 3 日晚 9 時，我看到位於西長安街與北三環路交叉的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起火。隔了十幾分鐘，又起了一堆火。6 月 3 日晚 10 點整，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響起爆炸聲。聲音間斷，比機槍聲響亮。緊接著我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

煙霧（後來知道是軍人在放催淚彈）。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吶喊聲（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約 10 點過 5 分，從木樨地和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作者注）方向傳來了眾人唱《國際歌》的聲音。10 點 10 分以後，槍聲越來越密，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注釋 12】

事實正是如此，第 38 集團軍部隊在距離軍事博物館不到一公里路程的木樨地一帶開始開槍，民眾死傷慘重。

凡是接到了開槍命令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無一例外地都開了槍，包括第 20 集團軍、第 38 集團軍、第 39 集團軍、第 40 集團軍、空降兵第 15 軍。當然，開槍的情況有所不同，一些部隊的確只是對空鳴槍。有關各部隊開槍的具體情況會在下面的專門篇章中詳細敘述。

在第一批向天安門廣場等目標挺進的部隊中，唯一沒有接到開槍命令的是第 54 集團軍。該集團軍雖然在向天安門廣場挺進時也攜帶了子彈，但都統一裝在子彈箱中，交由專人保管，始終沒有將子彈分發到官兵手中。

開槍命令雖然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過程中才下達的，原因是遭遇到群眾的強力阻攔，但下達開槍命令並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事先有所準備，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在下達進軍命令時，就明確要求各部隊必須“全副武裝，在遇到阻攔時採取一切強行措施”，因此，各部隊奉命出發時均攜帶了子彈，只是多數部隊在接到開槍命令前，統一將子彈裝在箱子中，交由專人保管，沒有分發到官兵手中，在接到開槍命令後，才將子彈分發下去。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特定的軍官，其餘軍人的槍膛中均無子彈。

開槍命令是從那個層級下達的？從現有資料來看，開槍命令是通過各大軍區指揮部下達到軍一級指揮部，然後逐級下達。各大軍區“不約而同”在同一時間下達了開槍命令，說明開槍命令來自於他們的同一個上級機關——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而解放軍戒嚴指揮部直接受中央軍委指揮，總指揮劉華清本身就是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根據實際情況判斷，開槍命令是中央軍委下達的，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楊尚昆不可能不知情。楊尚昆是一個謹小慎微之人，不會擅自做出開槍的決定，開槍命令一定是經過“集體”討論的，並得到鄧小平的許可。

何況楊尙昆一開始傾向于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不贊同採用強力鎮壓的方式。

【注釋 1】刊載於《戒嚴一日》下集第 237 頁至第 248 頁。

【注釋 2】刊載於《戒嚴一日》下集第 91 頁至第 95 頁。

【注釋 3】刊載於《戒嚴一日》上集第 185 頁至第 189 頁。

【注釋 4】刊載於《戒嚴一日》下集第 154 頁至第 158 頁。

【注釋 5】刊載於《戒嚴一日》下集第 101 頁至第 106 頁。

【注釋 6】刊載於《戒嚴一日》上集第 209 頁至第 212 頁。

【注釋 7】刊載於《戒嚴一日》上集第 224 頁至第 232 頁。

【注釋 8】刊載於《戒嚴一日》上集第 251 頁至第 254 頁。

【注釋 9】刊載於《戒嚴一日》上集第 175 頁至第 181 頁。

【注釋 10】刊載於《戒嚴一日》下集第 208 頁至第 215 頁。

【注釋 11】參見《大鬍子兵自傳》一文，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上集第 305 頁至第 307 頁。

【注釋 12】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 38 期，1994 年 6 月 4 日出刊。

第九節、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引起世界震驚，中共當局爲了逃脫譴責，一直採用模糊焦點的方式，再三強調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沒有死人，也就是說在天安門廣場的範圍內沒有死人，刻意將地點限定在天安門廣場，將時間限定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至 5 點 30 分。中共當局的這種欺騙手法，取得了不少人的相信。

事實上，經過包括六四遇難者家屬丁子霖女士在內的有心人的多年努力，已經尋找到多名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學生，包括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雙學士程仁興、北京農業大學的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天津師範大學的學生李建成等人。

其實，全副武裝的野戰軍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或在天安門廣場以外屠殺和平請願的平民百姓，並沒有性質上的差別，本來不值得辯駁，但由於牽涉到事實真相，因此，有必有就天安門廣場清場問題作一分析說明。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整，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全部熄滅。中國官方事後解釋說，這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準備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信號。凌晨 4 點 30 分，天安門廣場重新亮燈。中國官方事後解釋說，這是解放軍戒嚴部隊開始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信號。

天安門廣場亮燈之際，從人民大會堂處的中國官方廣播中傳出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一則通告。該通告全文如下：“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

這則通告如此之簡短，與此前中國官方的幾則緊急通告相比，就可發現這則簡短得不能再簡短的通告是有人臨時特地授意起草並播放的。這則簡短通告的播放，純屬中共當局欺世盜名，以此掩蓋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進行血腥清場的真相。根據這則簡短通告的內容，似乎中共當局對堅守不撤的數千名學生網開一面，讓他們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做到了仁至義盡，從而根本不存在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的問題。

中共當局後來就將這則簡短通告的播放時間作爲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開始的時間。而事實上，在這則簡短通告播放之前，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早已開始，難道驅逐射殺天安門廣場邊沿地區的學生和市民（包括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總部所在的天安門廣場西北角、“民主女神”塑像所在的天安門廣場北端中央），就不算是清場行動嗎？難道坦克快速推進到紀念碑底座前，一路上撞倒“民主女神”塑像、鐵旗杆、碾壓一大批帳篷以及帳篷內酣睡的學生，也不算是清場行動嗎？

事實上，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歷時四個小時左右，開始於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30 分左右，即第 38 集團軍和空降兵第 15 軍的部隊分別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北兩側的時候，結束於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 5 點 30 分左右，即集結在紀念碑底座周圍的學生隊伍被迫從東南角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時候。

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時間是自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30 分左右至 6 月 4 日凌晨 2 點鐘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任務是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封鎖包圍，在天安門廣場四周設置警戒線，阻止成千上萬趕來聲援的學生和市民進入天安門廣場，使得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底座一帶和平請願的數千名學生孤立無援。

在這個階段，殺死殺傷民眾最多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是負責天安門廣場北面行動的第 38 集團軍，其次是負責天安門廣場南面行動的空降兵第 15 軍。在天安門廣場南面擔任警戒任務的第 54 集團軍，在天安門廣場北面擔任警戒任務的第 63 集團軍，在天安門廣場西面擔任警戒任務的第 27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以及在天安門廣場東面擔任警戒任務的第 39 集團軍、第 24 集團軍、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基本上沒有殺人。

第二階段：時間是自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2 點鐘左右至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任務是清除並佔領除了紀念碑底座以外的天安門廣場區域，為驅逐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最後完全佔領天安門廣場做好一切準備。

在這個階段，在天安門廣場北部執行任務的主要是第 38 集團軍，殺死殺傷民眾最多。在天安門廣場南部執行任務的主要是空降兵第 15 軍，殺死殺傷民眾其次。在天安門廣場南面擔任警戒任務的第 54 集團軍，在天安門廣場北面擔任警戒任務的第 63 集團軍，在天安門廣場西面擔任警戒任務的第 27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以及在天安門廣場東面擔任警戒任務的第 39 集團

軍、第 24 集團軍、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仍然基本上沒有殺人。

第三階段：時間是自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至 6 月 4 日清晨 5 點 30 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任務是驅逐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完全佔領天安門廣場。

在這個階段，執行任務的主力部隊是第 38 集團軍、空降兵第 15 軍和第 65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派遣一支由 3 個偵察連和 1 個步兵連所組成的特緝分隊，執行搗毀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任務。第 54 集團軍仍然在天安門廣場南面擔任警戒任務，第 63 集團軍仍然在天安門廣場北面擔任警戒任務，第 27 集團軍仍然在天安門廣場西面擔任警戒任務，第 39 集團軍、第 24 集團軍、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仍然在天安門廣場東面擔任警戒任務。這個階段的情勢比較混亂，無法辨別哪一支部隊殺死殺傷民眾比較多或比較少。

第十節、一場沒有武裝對手的戰爭

中共當局爲了鎮壓 1989 年學生運動，軍隊調動和投入的規模，遠遠超過 1962 年的中印邊境戰爭，也超過 1979 年的中越邊境戰爭，堪與 1950 年代的抗美援朝戰爭（西方稱“韓戰”）媲美。就軍隊調動和投入的規模而言，這幾乎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只是這場戰爭沒有武裝的對手，所謂的對手只是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的所謂“武器”，也僅僅只是石頭、磚塊、棍棒而已，根本無法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所擁有的步槍、衝鋒槍、機槍相抗衡，更不要說裝甲車、坦克了。

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確實也是完全按照戰爭時期的方式來行事的，從軍隊的調動到進軍路線的安排，從通訊聯絡方式，到啓用部隊臨時代號，等等。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之初，人們只注意到第 38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等部隊參與了血腥鎮壓行動，後來又發現空降兵第 15 軍等部隊也參與了。直到發現參與的部隊竟然包括了 14 個陸軍集團軍、1 個空降兵軍，以及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1 師和警衛第 3 師、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不能不驚歎這場鎮壓行動的規模。

時至今日，人們所看到的還不是全貌，由鄧小平拍板決定、楊尚昆具體執行、中央軍委主導的六四血腥鎮壓行動，軍隊調動和投入的內幕尚未完全揭示，筆者雖然多年來一直在搜集資料，但手頭的資料仍然極其有限，目前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做一些研究分析。

在中央軍委的主導下，解放軍的三大總部全力投入，基本的分工是，總參謀部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事行動，總政治部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政治動員和宣傳，總後勤部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後勤保障。

在當時解放軍的七個大軍區中，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和南京軍區奉命調動野戰軍主力部隊進京，北京軍區幾乎是傾巢而出，屬下的六個陸軍集團軍全部出動。其他三個大軍區（蘭州軍區、武漢軍區、廣州軍區）的部隊雖然沒有進京，但也奉命進入了戰備狀態，隨時準備投入。

當時北京軍區的司令員是周衣冰中將，政委是劉振華上將，副司令員是閻同茂中將、李來柱中將、齊連運少將和劉玉堤空軍中將，副政委是陳培民中將，參謀長是鄒玉琪少將，副參謀長是黃雲橋少將和沈貽焱少將，政治部主任是張工少將，政治部副主任是劉存康少將和徐壽增少將，軍事檢察院檢察長是李輝少將，後勤部部長是徐效武少將，後勤部政委是江修惠少將，後勤部副部長是李文健少將和李中仁少將，後勤部副政委是黃繼述少將，後勤第 6 分部政委是閻福祥少將。

當時瀋陽軍區的司令員是劉精松中將，政委是宋克達中將，副司令員是朱敦法中將、石寶源少將和曹雙明空軍中將，副政委是李文卿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是高克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王清濤少將（兼）和趙萬福少將，參謀長是李海波中將，副參謀長是楊國屏少將和楊永春少將，政治部主任是戴學江少將，政治部副主任是白文仲少將和蔡公傑少將，後勤部部長是王古人少將，後勤部副部長是蘆光祖少將和唐作厚少將，後勤部參謀長是時根興少將，後勤第 4 分部政委是修希德少將。

當時濟南軍區的司令員是李九龍中將，政委是宋清渭中將，副司令員是固輝中將、張志堅少將、馬偉志中將、馬辛春海軍中將和林基貴空軍中將，副政委是曹芃生少將，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是徐春陽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孫凱少將，辦公室主任是郭文珩少將，參謀長是馬偉志中將（兼），副參謀長是楊希振少將和郝保慶少將，政治部主任是姜福堂少將，政治部副主任是蔡仁山少將和袁守芳少將，後勤部部長是張宗林少將，後勤部政委是劉國福少將，後勤部副部長是王傳武少將、何其祥少將和王寶書少將，後勤部副政委是王成山少將，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張明山少將，後勤第 9 分部政委是趙孝起少將。

當時南京軍區的司令員是向守志上將，政委是傅奎清中將，副司令員是郭濤中將、王成斌中將、聶奎聚海軍中將和姜玉田空軍中將，副政委是史玉孝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是張明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王永明少將（兼），參謀長是劉倫賢少將，副參謀長是鄭炳清少將，政治部主任是于永波中將，政治部副主任是王永明少將和洪家德少將，後勤部部長

是王太嵐少將，後勤部政委是韋宇少將，後勤部副部長是趙振緒少將和劉禮貴少將。

爲了統一指揮奉命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在中央軍委的主導下設立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擔任總指揮，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擔任副總指揮。

奉中央軍委之命，北京軍區、濟南軍區、瀋陽軍區和南京軍區各自專門成立了以一位軍區副司令員和一位軍區副政委爲首組成的戒嚴指揮部（組），隨同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部隊進京，實施戰爭時期的所謂“靠前指揮”。目前搜集到的資料顯示，北京軍區戒嚴指揮部（組）由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軍區副政委陳培民中將、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少將、軍區訓練部王部長等人率領，濟南軍區戒嚴指揮部（組）由軍區副司令員固輝中將等人率領，瀋陽軍區戒嚴指揮部（組）由軍區副司令員朱敦法中將、軍區後勤部副部長蘆光祖少將等人率領，南京軍區戒嚴指揮部（組）由軍區副司令員郭濤中將、軍區副政委史玉孝中將等人率領。

進京部隊的軍、師一級，也都按照戰爭時期的規定和慣例，設立了前進指揮部、基本指揮部和後方指揮部。

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事行動的解放軍總參謀部，其屬下的各兵種、各部門全力動員。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會同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的通信部門，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通信聯絡工作。李雲生少將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部長。

解放軍總參謀部陸軍航空兵部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運輸交通，在北京市區地面交通受到學生和市民阻斷的情況下，動用軍用直升機爲解放軍戒嚴部隊運送軍用裝備物資，解決緊急交通問題，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高級軍官到上級機關接受任務，來回都是乘坐軍用直升機。

解放軍總參謀部測繪總局緊急爲解放軍戒嚴部隊提供北京市區軍事地圖。1989 年 6 月 1 日，測繪總局地圖供應辦公室正在值班的參謀梁策少校接到一個緊急電話：“我是戒嚴部隊前指(前進指揮部)，我們奉命即將開進天安門廣場，一天后急需大比例尺北京市區及近郊圖。”梁策立即將電話內容轉告了測繪總局局長崔世芳少將。按常規作業，這樣一張圖需要 2 個月時

間，而眼下一天之內就要限期交付。崔世芳表示：目前，我們的黨和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各個工序的測繪官兵都要聽從指揮，鼎力相助，盡力盡責，一拼到底！副局長孫秀文少將表示：解放軍戒嚴部隊從北京城的各個路口推進的目標是天安門廣場，我們就是不吃飯、不睡覺也要保質保量按時繪製出以天安門廣場為座標中心的北京市區地圖及近郊地圖。副局長張振乾大校作了具體分工。

在測繪總局緊急工作會議上，測量制印處處長俞兆祥、辦公室主任穆朝義、地圖供應處處長何水強、參謀鄭玉賢、董文俊、王小同、梁策等人紛紛提出見解，一種快速制印的決策終於形成：第一，分割法。把原來的一大幅北京市區圖中的 4 個平幅圖分割成 18 塊，可由 18 人同時分頭繪製。第二，取捨法。把地圖內諸如山區、丘陵等地貌舍去，突出諸如居民地、道路、橋樑等地物，以便於解放軍戒嚴部隊一目了然地從圖上找到快速挺進的路線。第三，減色法。將原有 6 種顏色的地圖內容合併為 4 種顏色，可由 4 色印刷機一次印成，減少一次套印，提高速度一倍。就這樣，6 月 2 日清晨，地圖付印完畢，由第 3 圖庫助理員韓百民押運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注釋 1】

解放軍總後勤部爲了提高後勤保障的效率，打破慣例，超過大軍區一級，直接將軍用物資發放到各進京部隊。

爲了加強保密，解放軍戒嚴部隊一律按照戰爭時期的規定，捨棄原來的部隊代號，臨時啓用新的部隊代號。臨時部隊代號的啓用，導致許多在開進中失散的官兵無法找到自己的部隊，因爲就連負責通訊聯絡的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台、北京衛戍區通信台的接線員，一時之間都無法弄清楚臨時部隊代號與原來部隊代號的對應關係。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展開之前，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特意成立了前進指揮部和清場指揮部。前進指揮部設立在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清場指揮部設立緊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由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等人坐鎮指揮。

在北京戒嚴這場超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解放軍海陸空三軍唯一沒有參與的就是海軍。海軍並不是無兵可調，除了水面艦艇部隊和航空兵，當時擁有兩個海軍陸戰旅。海軍陸戰旅與

空軍的空降兵第 15 軍一樣，屬於解放軍最精銳的特種部隊，平常輕易不會動用。問題是，既然連空降兵第 15 軍都已被調動，為什麼仍然不動用海軍陸戰旅？

有人說，海軍不被信任，所以沒有調動海軍部隊進京。曉沖在題為《“五·一九”戒嚴的幾件事》、刊登在香港《解放》月刊 1989 年 10 月號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解放軍高級軍官對他親口所講的一段話：“當時海軍上層軍官一致反對戒嚴。而且海軍官兵文化層次高，見多識廣，不會盲從。當時楊尚昆他們認為海軍非常不穩，海軍總部被派去的陸軍看守，故有陸軍接管了海軍之說。”

曉沖的這個說法需要旁證，目前見不到有關海軍將領因為反對北京戒嚴而遭處理的資料。

當時海軍的司令員是張連忠海軍中將，政委是李耀文海軍上將，副司令員是李景海軍中將、張序三海軍中將、陳明山海軍中將和邢永甯海軍中將，副政委是魏金山海軍中將，司令部參謀長是張序三海軍中將（兼），副參謀長是石天定海軍少將、王祖堯海軍少將和張予三海軍少將，政治部主任是佟國榮海軍中將，政治部副主任是杜果海軍少將、周坤仁海軍少將和郝萬明海軍少將。

當時的空軍司令員是王海空軍上將，政委是朱光空軍中將。

【注釋 1】參見《座標中心，在天安門廣場》一文，作者：少校參謀梁策，見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 17 頁。

第十一節、軍人和武警的死亡情況

通常所說的傷亡人數，包括死亡和受傷的人數。一場戰爭或戰鬥結束，照例會統計或公佈傷亡人數。戰爭或戰鬥的傷亡人數比較容易統計，死亡自不必說，受傷的標準也很明確。但是，統計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軍警的傷亡人數，頗為困難。首先是由於中共當局至今不允許任何團體或個人進行客觀公正的調查。其次是由於中共當局刻意擴大軍警的傷亡人數，縮小民眾的傷亡人數，以彰顯所謂的反革命暴亂。

此外，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不是一場戰爭或戰鬥，一方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全副武裝，配備自動步槍、衝鋒槍、機槍、裝甲車、坦克，另一方的北京市民和學生赤手空拳，少數人手中的抗暴“武器”，也僅僅是棍棒、石頭、磚塊而已。因此，雙方受傷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語，標準大不一樣，受傷的民眾幾乎都是因為中彈，而絕大多數所謂受傷的軍警只是皮肉傷，在戰爭或戰鬥中根本夠不上受傷標準。

在 1989 年 6 月 30 日召開的第 7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8 次會議上，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受中共中央委託做了一個專題報告，題目是“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其中談到了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傷亡人數，這應該是中共官方所公佈的最“權威”的統計數字，也是最“權威”的說法。陳希同說：“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等車輛達 1280 多輛，其中軍用汽車 1 千多輛，裝甲車 60 多輛，警車 30 多輛，公共電汽車 120 多輛，其他機動車 70 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 6 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於圍觀的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誤傷，有的被持槍歹徒擊傷擊斃。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 3 千多名非軍人受傷，200 餘人死亡，包括 36 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

等。對於被誤傷的群眾和執行任務中受傷害的人員，政府要認真地做好善後工作。”

陳希同提到軍警“死亡數十人”，說法很模糊，從 21 人到 99 人，都可以說是“數十人”。其實，中共當局很清楚軍警的具體死亡人數，故意採用這種模糊的說法，誤導人們以為軍警死亡了很多。

在 1989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情況的報告”，其中也談到北京市民、學生，以及軍警的傷亡情況。他說：“經北京市與戒嚴部隊指揮部、公安部、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醫院等方面再三核實，有 241 人死亡。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 23 人，地方 218 人。戒嚴部隊 23 人中，解放軍 10 人，武警 13 人；地方（含市民、學生、外地人員和暴徒）218 人中，北京高校學生 36 人，外地人員 15 人。約 7 千多人受傷，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 5 千餘人，重傷的 136 名；市民約 2 千人。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死亡的 36 名大學生，分別屬於北京 20 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國人民大學死亡 6 名，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各死亡 3 名，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 7 所高校各死亡 2 名，其餘 10 所高校各死亡 1 名。”

李錫銘的說法與陳希同不一樣，提出了明確的軍警死亡數字：“解放軍 10 人，武警 13 人。”其實，李錫銘所說的數字也是不真實的。陳希同報告的時間晚于李錫銘的報告時間，反而沒有軍警的具體死亡人數，這也是令人奇怪的現象。

在李錫銘、陳希同作報告之前的 1989 年 6 月 6 日下午，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曾經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主題是“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陪同出席的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發言人張工、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峻。袁木在記者會上說：“解放軍官兵受傷 5000 多人；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眾）共傷 2000 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 300 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眾。”【注釋 1】

袁木不愧為中共當局的“名嘴”，他的說法更為技巧，將軍警和民眾的死亡數字混在一起。

筆者經過多年努力，確認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死亡的軍警總共 15 人，都被授予了“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這 15 名死亡的軍警是：

- 1) 劉國庚，第 63 集團軍通信團第 4 連第 1 排少尉排長；
- 2) 王其富，第 38 集團軍炮兵旅第 5 營營部無線電通信班班長；
- 3) 李強，第 38 集團軍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1 班士兵；4) 杜懷慶，第 38 集團軍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3 班士兵；5) 李棟國，第 38 集團軍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4 班副班長；6) 王小兵，第 38 集團軍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4 班士兵；7) 徐如軍，第 38 集團軍炮兵旅第 5 營第 3 連有線通信班班長；8) 崔國政，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彈炮 2 連士兵；9) 馬國選，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某部第 6 連代理排長；10) 王錦偉，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某團後勤處戰勤中尉參謀；11) 李國瑞，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2 支隊第 1 大隊通信班士兵；12) 劉豔坡，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1 支隊第 1 大隊第 1 中隊士兵；13) 于榮祿，第 39 集團軍政治部宣傳幹事，少校軍銜；14) 臧立傑，第 39 集團軍某部第 7 連士兵；15) 王景生，第 24 集團軍某部第 1 營第 1 連第 3 排排長。

上述 15 名軍警的死亡情況各不相同，並非全部死於所謂的“暴徒”之手。

情況之一：1989 年年 7 月 4 日，王景生在巡邏執勤中突然病發死亡，屍體解剖資料上明確寫著：“因勞累過度，生活無規律，嚴重營養不良，引發急性非出血性壞死性胰腺炎，併發性心內膜炎、心包炎。心包積液達 100 毫升。”

情況之二：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乘坐同一輛軍用卡車，緊急往天安門廣場送防暴器材，由於車速過快，在北京市海澱區翠微路路口拐彎時造成翻車，油箱爆炸起火，由於滿載防暴器材，導致王其富等六人被困在車廂中無法脫身而被燒死。

情況之三：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于榮祿隨軍向天安門廣場挺進，途中部隊受阻，作為宣傳幹事的他立功心切，急於要拍攝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行動的照片，不顧勸阻，獨自身穿便

裝前往天安門廣場，途中中彈受傷，被民眾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于榮祿的死亡情況，屬於陳希同專題報告中所說的“誤傷”，死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槍下。

情況之四：1989年6月7日上午10點鐘左右，爲了護衛第39集團軍政治部有關人員拍攝“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影片資料，臧立傑隨同部隊官兵乘坐軍車出發，途徑東長安街上的建國門時，有民眾躲藏在外交公寓裏開槍狙擊，被精確的遠距離射擊擊中面部身亡。

上述死亡的15名軍警，其中8名軍警的死亡與六四事件無關，也與民眾的抗暴行爲、與所謂的“暴徒”無關。

從軍警死亡情況可以發現兩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當時的北京並不存在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在軍隊開槍殺人之後，民眾雖然非常憤怒，但絕大多數只是以呼喊抗議口號、痛罵來表達，少部分以石頭、磚塊、木棍發洩憤怒，也是有限度的，否則，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況下，死亡的軍警絕對不止7人。當時，眾多的軍警因爲受阻或失散，陷入圍堵的人海之中，但並沒有因此喪生。

例如，1989年6月4日凌晨2點鐘，步兵第58師步兵第173團的880名官兵在北京市崇文區天壇公園東門外，被民眾分割成三截，其中300名官兵被6萬多名群眾擠壓在道路旁的鐵欄杆和天壇公園圍牆上，動彈不得。官兵們饑餓，乾渴，疲憊不堪。團長陳榮富手拿半導體喇叭，呼籲民眾予以幫助。他的話音剛落，便有人送來了汽水、點心，一家姓劉的個體戶父子倆送來了一筐蘋果和香蕉。一位中年婦女爲腿部負傷的團參謀長張秋林清理創口，殺菌消毒。民眾並將該團11名在開進途中受傷的官兵送往醫院治療。

當時北京的普遍情況就是這樣，只要部隊停止前進，不去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民眾就以友善的態度和行動待之，不僅不予以爲難，而且予以優待。

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于1989年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軍隊方面到目前爲止還有400名官兵失蹤，生死不明，等將來局勢穩定下來，有些可能生還，有些可能犧牲了。”【注釋2】這些所謂“失蹤”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實際上只是遭到民眾的圍困，有的被市民帶回家中，事後

都平安地回到了各自所屬的部隊。

中共當局製造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的謊言，完全是爲了給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提供合理的理由，以便軍人放手鎮壓。1989年6月4日凌晨零時前後，第40集團軍步兵第118師師長郝柏棟大校從半導體收音機中收聽到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通告，立刻振奮地拳頭一揮：“好！”一聲大喊脫口而出。郝柏棟之所以如此興奮，就是覺得有了“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即使放手鎮壓，也不會再有個人的責任了。

第二個問題：這15名軍警都死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點鐘以後，也就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之後。這證明了一個事實：就時間順序而言，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在先，民眾抗暴在後；就因果關係而言，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是因，民眾抗暴是果。

第63集團軍排長劉國庚死於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鐘左右，地點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東約150米處。

第38集團軍的6名士兵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死於1989年6月4日凌晨1點10分左右，地點在西長安街上往西延長線上的翠微路路口。

第39集團軍士兵崔國政死於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40分左右，地點在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崇文門過街天橋（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附近。

第54集團軍代理排長馬國選於1989年6月4日凌晨1點鐘左右在北京市宣武區的菜市口附近身負重傷，被送往武裝警察部隊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第54集團軍中尉參謀王錦偉死於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30分，地點在北京市宣武區的南新華街。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士兵李國瑞於1989年6月4日凌晨5點鐘許在北京市西城區的阜成門立交橋身負重傷，被送往北京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士兵劉豔坡於1989年6月4日凌晨1點鐘許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身負重傷，被送往北京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第39集團軍少校幹事于榮祿死於1989年6月4日2點鐘

左右，死亡地點不詳。

第 39 集團軍士兵臧立傑於 1989 年 6 月 7 日與同伴乘坐軍車路過北京市東城區的建國門時，被從外交公寓裏射出的子彈擊中面部，當場身亡。

第 24 集團軍排長王景生於 1989 年年 7 月 4 日在巡邏執勤中突然病發死亡。

【注釋 1】見於《京都血火》一書第 154 至第 155 頁，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198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注釋 2】出處同上。

第十二節、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原因

關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兇狠殺人的原因，北京學生和市民流傳著兩種主要說法，一是說中共當局事先讓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服用了興奮劑，二是說許多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經歷了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輪戰，早在對越作戰中殺紅了眼。

第一種說法有很濃的傳說性質，筆者早在 1990 年 5 月撰寫《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的初稿時，就明確表示懷疑。這個說法一方面缺乏證據，另一方面與筆者的親身經歷不符。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至 5 點 20 分，筆者坐在紀念碑最高層的最高一級臺階上，近距離目睹了沖上紀念碑底座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神態，他們顯示出來的不是興奮，而是憤怒，一種對“反革命暴徒”的強烈而不可壓抑的憤怒。這應該與中共當局的欺騙宣傳和政治動員有關，不是因為服用了興奮劑。

第二種說法有所依據。包括沖上紀念碑底座的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在內，不少戒嚴部隊軍人的確參加過老山戰區的輪戰。而這些參戰軍人很粗野，也很兇狠，平時就讓部隊難以管理，不僅經常在雲南省中越邊境地區打架鬥毆，而且還時常在雲南省省會昆明市公然鬧事，連警察都不敢干涉。第 67 集團軍在老山戰區參戰期間，甚至發生過一名士兵端槍掃射集團軍指揮機關的惡性事件，軍長張志堅少將中彈受傷，軍參謀長栗戎生少將及時躲入桌子底下，才逃過一劫。

從 1984 年至 1989 年，解放軍七大軍區奉中央軍委之命派遣部隊參加老山戰區輪戰，包括蘭州軍區的第 47 集團軍，瀋陽軍區第 16 集團軍、第 23 集團軍，北京軍區的第 27 集團軍，南京軍區的第 12 集團軍、第 1 集團軍，廣州軍區的第 41 集團軍、第 42 集團軍，濟南軍區的第 67 集團軍、第 26 集團軍、第 20 集團軍，成都軍區的第 13 集團軍。此外，各大軍區先後組成十三個偵察大隊赴老山戰區參加偵察作戰。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中，第 12 集團軍、第 20 集團軍、第 26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第 67 集團軍都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其他集團軍和空降兵第 15 軍的偵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經以偵察大隊的番

號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

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可以說是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兇狠殺人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畢竟在老山戰區所面對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裝的敵國軍人，而在北京城內所面對的則是本國的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

筆者在研讀了包括中國軍方在內的許多資料後發現，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被激發了仇恨，另一個是立功心切。

先說激發仇恨這個原因。一方面，由於學生運動深得人心，北京民眾普遍反對戒嚴措施，幾乎所有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都遭遇到民眾的強力阻攔，軍民之間或多或少發生過言語和肢體衝突，以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為例，1989 年 5 月 20 日，就在北京市豐台區六里橋與民眾發生流血衝突，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況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不少軍人覺得受了委屈，心裏憋著一股氣。

另一方面，中共當局不許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接觸民眾，避免在瞭解學生運動的真相以後產生同情，對所有進京部隊實行封閉式的管理，嚴格規定不能私自出駐地大門。在此期間，一邊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所謂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復灌輸“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的說辭，一邊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欺騙宣傳，極力宣揚所謂的“暴徒”毒打戒嚴部隊軍人的惡行，激發軍人的仇恨心理。爲了突顯所謂的“動亂”、“暴亂”，中共當局極力製造軍民衝突，例如本來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戰備通道將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部隊安全地運送到人民大會堂等地，第 65 集團軍等部隊就是利用地下戰備通道進入了人民大會堂，但故意讓部分官兵棄地下戰備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會堂等地徒步開進，引誘民眾予以阻攔，造成軍民衝突，達到激發軍人對民眾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認，中共當局的這一招數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確實有不少戒嚴部隊軍人將民眾當作誓不兩立的敵人對待，下手毫不留情。

例如在西長安街上，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官二話不說，近距離，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槍對準清華大學學生段昌隆的胸膛開槍，將他打死。當時段昌隆手無寸鐵，沒有任何暴力行

爲，只是上前希望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

例如在西長安街上，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不放過連中三槍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吳國鋒，一名士兵將刺刀捅進他的肚腹，使勁往下拉，造成長大 7、8 公分長的傷口，一位軍官又往他的後腦勺補了一槍。

例如在天安門城樓西側的南長街南口附近，解放軍戒嚴部隊不准民眾救助中槍倒地的、年僅 19 歲的北京月壇中學高中學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戒嚴部隊軍人端槍威嚇；救護車被強行趕走，最終導致王楠不治死亡。

再說立功心切這個原因。事實上這才是戒嚴部隊軍人兇狠殺人的最主要原因。在開槍命令下達之前，中共當局已將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和平請願定性爲“反革命暴亂”，將六四血腥鎮壓行動說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亂”，爲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製造了合理的依據，同時也爲戒嚴部隊軍人提供了立功受獎的機會。中共當局明文規定：“平息反革命暴亂”屬於戰爭性質，參與平息反革命暴亂行動等同參戰，凡立功受獎、受傷致殘者，均享有參戰軍人的優厚待遇。根據中共官方有關參戰軍人的文件規定，凡立功受獎者，國家負責優先安排工作，農村戶口可以轉爲城鎮戶口。這項規定對於來自農村的士兵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數士兵又恰恰都來自於農村。以第 38 集團軍爲例，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 1 萬多名官兵中，就有 8 名官兵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有 4 名官兵被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有 27 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 131 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 1311 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可見中共當局爲了達到鎮壓目的，是如何大方地獎賞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

由於上述這兩個主要原因，幾乎是所有的戒嚴部隊軍人在接到開進命令後，都迫不及待地殺出封閉已久的臨時駐地。當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下達之時，幾乎在每一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臨時駐地都是歡聲雷動，磨刀霍霍，官兵們的普遍心理是：終於等到了報仇和立功的機會。據現場目睹者說，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第 38 集團軍和第 63 集團軍等部隊在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的機關大院舉行出發前的誓師大會，全體官兵殺聲震天，令人不寒而慄。對絕大多數來自於農村的戒嚴部隊士兵而

言，既能報仇雪恨，快意殺人，又能立功受獎，復員後留在城裏工作，這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炮兵團第 9 連士兵劉加林，就是因為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破例提拔為少尉排長，後來轉業到公安部門工作。

第十三節、戒嚴部隊軍人事後的瘋狂報復

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開槍殺人，動用坦克、裝甲車碾軋的暴行，大都已經為外界所知，但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以後的暴行，還不太為外界所知，也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這一問題。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分頭進駐北京市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導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工作。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成了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一項主要任務。

中共當局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不信任北京市的公安警察，他們瞭解情況，普遍同情學生運動，完全依靠他們，不可能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戒嚴部隊官兵洩憤報復的心理需求，並為他們提供立功受獎的機會。

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在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過程中，普遍存在濫用暴力的情況，對被捕者不分青紅皂白用槍托、木棒予以毒打，導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傷殘。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剛剛結束時，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已經開始對被捕的民眾施行暴行，大量在清場前後被捕的民眾在天安門廣場、勞動人民文化宮遭到毒打，許多人受傷致殘，山西大學電腦系學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6月4日清晨5點30分過後，高旭本來已經隨著學生隊伍一起撤離了天安門廣場，但由於有一個同學遺留了照相機，他於是自告奮勇返回去取，結果遭到拘捕。高旭連同其他被拘捕的8個人，全都被緊緊地捆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的柱子上。戒嚴部隊的軍人用槍托沒頭沒腦地砸他們，用點燃的煙頭燙他們，把他們當成了洩憤的靶子。之後，他們被轉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關押，進去時每個人又遭受了一頓“殺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過去，用冷水澆醒後繼續再打。殘酷的摧殘，使得高旭遺留了嚴重的腦振盪後遺症，一隻眼睛幾乎失明，腦部時時出現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藥度日。【注釋1】

1989年9、10月間，筆者在北京暗地調查被捕者情況，瞭解到不少被捕者遭到戒嚴部隊軍人毒打的案例。進駐北京市海澱區公安分局的第24集團軍軍人，將18名被捕的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學生視為“暴徒”，吊起來毒打，打得他們傷痕累累。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身強力壯，許多人在學生運動期間擔任特別糾纏任務，或作為學生領袖的“貼身保鏢”。

在中國官方的宣傳資料中，可以見到大量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赫赫成果”，隨手就可以舉出許多例子。

第40集團軍步兵第118師“為了除惡務盡，確保首都的長治久安，他們又投入了一場新的戰鬥——配合公安機關抓暴徒。抓獲動暴亂分子和進行打、砸、搶、燒、殺及流氓犯罪活動的暴徒531名。”

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第347團特務連，在短短數天內抓獲“暴徒”73人。

第65集團軍步兵第193師於1989年6月中旬撤離天安門廣場，進駐北京市海澱區，除了執行戒嚴執勤任務之外，全師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澱區公安部門追捕“暴徒”和“非法組織”成員，共同抓獲了131名“暴徒”。

第24集團軍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8團於1989年6月中旬調防到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配合公安機關抓獲“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256名，繳獲一批槍支彈藥。守備第7旅從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軍區炮兵第14師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員設卡盤查，9次派出應急分隊端“黑窩”，共抓獲、收審非法組織骨幹、打砸搶分子62人；查獲攜帶反動宣傳品、軍用物資、兇器、子彈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繳反革命傳單、錄影帶等25000餘份，軍用品、兇器、槍彈358件。

第65集團軍步兵第193師步兵第579團組成搜捕隊，由第2營營長劉閣雲少校擔任搜捕隊隊長，十二次出動擒拿“暴徒”。劉閣雲獲“共和國”榮譽稱號。

第26集團軍步兵第138師步兵第412團於1989年6月

日組成防暴突擊隊，由第 2 營第 5 連連長袁華榮上尉擔任隊長，袁寶華在傳達團指揮官的指示精神時說：“同志們，上級賦予我連擔任團的防暴突擊隊，配合永外派出所開展抓暴徒、端黑窩的鬥爭。這是團黨委對我連的高度信任。同志們，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雖然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賊心不死，我們要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精神，斬草除根，堅決把他們消滅乾淨，為保衛共和國再立新功！”全連官兵聽說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決心大幹一場。在以後的 10 多天，袁寶華帶領 20 名防暴隊員，夜行晝宿，配合永外派出所抓獲暴徒 82 名。【注釋 3】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80 團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奉命進駐天壇公園部署，配合公安部門廣泛開展“抓暴徒、端黑窩”行動，狠狠打擊隱蔽起來的“暴徒”和“反動組織成員”，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

從上述資料可見，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分頭進駐北京市各地，名義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門工作，實際上是監督北京市公安部門，主導主導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工作。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以後展開的大搜捕行動，有大批的民眾被捕，由於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主導抓捕工作，濫捕、毒打事件層出不窮，由解放軍戒嚴部隊移交給公安部門處理的被捕者，許多人傷痕累累，有的傷勢很重。這種情況，連北京市公安部門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級反映情況，甚至表示，情況如果沒有改善，不再接收解放軍戒嚴部隊移交的被捕者。

中共當局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曾設立檢舉電話、信箱，鼓勵人們檢舉“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許多不滿血腥鎮壓行動的北京民眾，借機將支持血腥鎮壓行動的人作為“暴徒”、“動亂分子”予以檢舉。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紅皂白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手中，照樣先遭受一頓毒打，等到有機會張口分辨，早已是傷痕累累。

【注釋 1】參見尹進題為《六四凡人小事——記山西八九民運小人物》的文章，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文庫。

【注釋 2】參見《“虎師”重返京華路——記榮立集體二等功的

某師》，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

【注釋 3】參見《子夜雄歌——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連長袁寶華》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

第十四節、一份論功行賞的升官晉爵名單

積極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各級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官，在事後“論功行賞”時都得到了犒賞，用民眾的鮮血染紅了頭上的官帽子。特將多年收集到的相關資料做成一份論功行賞、升官晉級的名單予以公佈，留作歷史的記錄。當然，每個指揮官的情況不盡相同，在本書下面的章節中會有所描述。

濟南軍區副司令員固輝中將（遼寧省蓋縣人），升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中共第 13 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 9 屆全國政協常委，頒授上將軍銜。

南京軍區副政委史玉孝中將（陝西省寶雞市人），升任南京軍區政委、廣州軍區政委、中共第 13 屆和第 14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 9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第 10 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張工少將（山西省原平市人），解放軍戒嚴部隊發言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政委、成都軍區政委、中國軍事科學院政委，中共第 14 屆中央委員會和第 15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安徽省太和縣人），後來歷任赤峰守備區司令員、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第 9 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少將（山西省五台縣人），先後升任解放軍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解放軍國防大學副政委，頒授中將軍銜。

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朱敦法中將（江蘇省沛縣人），先後升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國防大學校長、中共第 14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瀋陽軍區後勤部副部長蘆光祖少將（河南省商丘市人），先後升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基地指揮部司令員、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政委、第二軍醫大學校長。2001 年 3 月 5 日因病逝世，終年 66 歲。

第 12 集團軍軍長郭錫章少將（湖北省武穴市花橋鎮劉常村西湖口垸人），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第 9 屆全國政協委員，

頒授中將軍銜。

第 12 集團軍政委溫宗仁少將（安徽省巢湖市人），先後升任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蘭州軍區政委、中國軍事科學院政委，中共第 15 屆和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第 12 集團軍副軍長徐文義少將（山東省曆城縣人，曆城縣現為濟南市曆城區），升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

第 12 集團軍專職紀律檢察委員會書記史水洲少將（江蘇省溧陽縣上興鎮劉莊人，溧陽縣現為溧陽市），先後升任第 12 集團軍副政委、南京軍區後勤部政委。

第 12 集團軍副政委胡道仁大校（安徽省霍邱縣人），升任安徽省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第 12 集團軍參謀長季崇武大校（江蘇省響水縣人），升任江西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12 集團軍步兵第 36 師師長徐承雲大校（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人），先後升任第 12 集團軍副軍長、軍長、南京軍區裝備部部長、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12 集團軍坦克第 2 師政委陸鳳彬少將（江蘇省南通市通州東社鄉人），先後升任第 12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江蘇省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福建省軍區政委，頒授中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大校（河北省蒿城人），先後升任武裝警察部隊副司令員、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副政委田瑞昌大校，先後升任成都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副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第 43 旅旅長李家洪大校（湖北省漢川市人），先後升任空降兵第 15 軍參謀長、副軍長、廣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第 43 旅政委趙金奎大校（河南省鎮平縣人），先後升任空降兵第 15 軍政治部主任、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第 44 旅旅長武運平大校，先後升任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南京軍區空軍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空降兵第 15 軍第 44 旅政治部主任樊友義上校（湖南人），先後升任空降兵第 45 旅政委、空降兵第 15 軍副政委、成都軍

區空軍後勤部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第 20 集團軍軍長梁光烈少將（四川省三台縣人），先後升任第 54 集團軍軍長（該集團軍是中央軍委戰略總預備隊，實力僅次於第 38 集團軍）、中共第 14 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共第 15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瀋陽軍區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第 20 集團軍政委楊興隆少將（河北省遷安市人），升任濟南軍區紀律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因健康原因沒有給予實職），1991 年 7 月離休，2002 年 10 月 13 日在北京病逝，終年 71 歲。

第 20 集團軍參謀長張祥林大校（山東省高密市人），先後升任第 20 集團軍副軍長、第 54 集團軍軍長、濟南軍區副參謀長、中共第 15 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 10 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24 集團軍軍長周玉書少將（湖南省攸縣人），先後升任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頒授武警中將軍銜、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共第 13 屆和第 14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24 集團軍政委尹文聲少將（河北省蔚縣人），升任北京軍區後勤部政委。

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2 師政委任之通大校（江蘇省灌雲縣人），先後升任第 2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第 63 集團軍政委、天津警備區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政委常躍上校（重慶市人），先後升任第 65 集團軍裝甲師政委、內蒙古軍區政治部主任、第 38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

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政委吳忠明大校，先後升任第 24 集團軍副政委、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團長羅剛上校（北京市人），先後升任坦克第 1 師副師長、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26 集團軍政委劉書田少將（山東省滕州市人），先後升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兼廣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廣州軍區政委、成都軍區政委、中共第 15 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共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第 27 集團軍軍長錢國梁少將（江蘇省吳江縣人），先後升任濟南軍區參謀長、司令員、中共第 14 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中共第 15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瀋陽軍區司令員，頒授上將軍銜。

第 27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少將（江蘇省無錫市人），先後升任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解放軍總裝備部副政委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第 15 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27 集團軍副軍長黃信生少將（河北省新城縣人），先後升任第 27 集團軍軍長、第 38 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參謀長、南京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27 集團軍副政委陳學政大校（江蘇省揚州市人），升任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

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大校（江蘇省鹽城市人），升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聯勤部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27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旅長車成德大校，先後升任第 63 集團軍副軍長、河北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27 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參謀趙勇明少校（江蘇省南通市觀音山鎮人），升任北京軍區偵察大隊副大隊長，頒授中校軍銜。

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80 師政治部副主任周衍智上校（安徽省舒城縣張母橋鎮人），先後升任第 3 軍醫大學西南醫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解放軍總後勤部後勤工程學院副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80 師團長彭新國上校（湖南省攸縣人），先後升任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80 師副師長、師長、南疆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副軍長、代軍長張美遠少將（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下八廟鎮人），升任第 38 集團軍軍長、中共第 14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1992 年預定提升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但由於被視為楊家將主要成員，隨著楊尙昆、楊白冰兄弟被鄧小平清洗出軍隊，卻被貶任青海省軍區司令員，繼而任蘭州軍區副參謀長，後來轉任蘭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直至退休。

第 38 集團軍政委王福義少將（遼寧省丹東市人），升任北京軍區副政委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 14 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第 9 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參謀長劉丕訓大校，先後升任第 38 集團軍副軍長、第 24 集團軍軍長、第 38 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副參謀長、北京軍區裝備部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大校，先後升任第 38 集團軍參謀長、副軍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吉林省吉林市人），先後升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參謀長馮兆舉大校（山東省莒縣人），先後升任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師長、第 38 集團軍參謀長、第 65 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裝備部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團長李少軍上校（江蘇省睢寧縣人），先後升任步兵第 112 師參謀長、第 38 集團軍副參謀長、參謀長、副軍長、軍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大校（江蘇省濱海縣人），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政委陳錦彪大校（江蘇省通州市金餘鄉人），先後升任第 63 集團軍政委、天津警備區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副參謀長王喜斌上校（黑龍江省甯安市人），先後升任第 38 集團軍參謀長、第 27 集團軍軍長、北京軍區參謀長、國防大學校長，頒授中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政治部副主任鄧萬增上校（遼寧省瓦房店市人），先後升任第 38 集團軍副政委、第 63 集團軍政委、山西省軍區政委、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團長岳中強中校，先後升任第 38 集團軍炮兵旅旅長、第 38 集團軍裝備部部長，頒授大校軍銜。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政委馬炳泰中校（河北省盧龍縣人），先後升任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4 師政委、河南省

軍區開封軍分區政委、武裝警察部隊河南省總隊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第 39 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少將（黑龍江省巴彥縣人），先後升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第一副司令員、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新疆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第 10 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39 集團軍政委馬盛林少將，升任遼寧省軍區政委，頒授中將軍銜。

第 39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李棟桓少將（河南省南陽市人），先後升任第 39 集團軍政委、武裝警察部隊政治部主任，頒授中將軍銜。

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5 師師長張作禮大校，先後升任第 39 集團軍副軍長、瀋陽軍區聯勤部副部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團長艾虎生上校（河南省禹縣人），先後升任步兵第 116 師師長、第 39 集團軍參謀長、軍長、成都軍區參謀長，頒授中將軍銜。

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政委劉建星上校，先後升任第 40 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少將（遼寧省人），升任瀋陽軍區參謀長、第 9 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54 集團軍軍長朱超少將，升任河南省軍區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54 集團軍副參謀長黃漢標大校（廣東省揭東縣玉湖鎮人），先後升任第 54 集團軍後勤部部長、副軍長、軍長、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黃漢標是前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張萬年上將的女婿。

第 54 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岳宣義大校（四川省南江縣人），先後升任第 5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河南省軍區政委，濟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頒授少將軍銜。現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駐中國司法部紀律檢查組組長、中國司法部中共黨組成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師長鐘聲琴大校（四川省蓬安縣

人)，先後升任第 26 集團軍軍長、濟南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政委王玉發大校（河南省南召縣人），先後升任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副政委、政委、成都軍區空軍政委，頒授中將軍銜。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師長黃棟甲大校，升任河南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政委胡永柱大校（四川省渠縣人），先後升任第 54 集團軍副政委、西藏軍區政委、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第 15 屆和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團長徐乃飛上校（河南省鄆城人），先後升任第 12 集團軍步兵第 36 師副師長、師長、第 31 集團軍副參謀長、第 1 集團軍參謀長、第 31 集團軍副軍長、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政委張文品上校，升任河南省軍區鶴壁軍分區司令員，頒授大校軍銜。

第 63 集團軍軍長刁從洲少將（河北省深澤縣人），升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3 集團軍政委曲繼甯少將（山東省龍口市人），升任濟南軍區副政委、第 9 屆全國政協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3 集團軍參謀長劉蔭超大校（河北省玉田縣人），先後升任第 63 集團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副書記、山西省軍區參謀長、第 65 集團軍副軍長、軍長、山西省軍區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2003 年 11 月 2 日病逝，終年 62 歲。

第 63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張秋祥少將（河北省邢臺市人），先後升任第 63 集團軍政委、第 65 集團軍政委、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共第 14 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3 集團軍參謀長劉逢君少將（遼寧省遼陽市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師長黃伯誠大校，升任北京衛戍

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政委邵松高少將（江蘇省興化市人），先後升任第 27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第 38 集團軍政委。1996 年 1 月，邵松高因為貪污受賄被免職，並判處 12 年有期徒刑。

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參謀長李海清大校（河南省正陽縣人），先後升任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7 師師長、武裝警察部隊寧夏自治區總隊總隊長，頒授武警少將軍銜。

第 63 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訓練處處長李世明上校（四川省三台縣人），先後升任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參謀長、步兵第 189 師師長、第 24 集團軍參謀長、軍長、北京軍區副參謀長、瀋陽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4 集團軍副軍長劉書明大校（吉林省洮南市人），先後升任第 39 集團軍副軍長、遼寧省軍區司令員、瀋陽軍區聯勤部部長，頒授中將軍銜。

第 64 集團軍副政委張傳苗大校（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張家坡鄉西五莊村人），先後升任第 39 集團軍副政委、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第 2 炮兵部隊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4 集團軍參謀長葛振峰大校（河北省清苑縣人），先後升任第 39 集團軍參謀長、第 64 集團軍軍長、瀋陽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國防大學副校長、中國軍事科學院院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第 16 屆和第 17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第 6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于景常大校（山東省黃縣人），先後升任黑龍江省軍區副政委、政委，頒授少將軍銜。

第 64 集團軍步兵第 190 師參謀長王國生上校（吉林省大安市人），先後升任步兵第 190 師師長、第 64 集團軍參謀長、第 40 集團軍參謀長、副軍長、軍長、蘭州軍區參謀長、司令員、中共第 17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5 集團軍軍長臧文清少將（河北省承德市人），先後升任北京軍區副參謀長、副司令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5 集團軍政委曹和慶少將（河北省甯晉縣人），先後升

任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 2 炮兵部隊副政委兼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第 15 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1999 年 7 月 8 日，在北京病逝，終年 61 歲。

第 65 集團軍守備第 3 師政委李文華大校（內蒙古自治區武川縣人），先後升任第 65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政委、北京衛戍區政治部主任、政委、北京軍區副政委、中共第 16 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5 集團軍司令部炮兵指揮部主任方文平上校（北京市人），先後升任第 27 集團軍副參謀長、步兵第 80 師師長、第 27 集團軍後勤部部長、河北省軍區參謀長、山西省軍區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

第 65 集團軍守備第 3 師第 9 團團長張鴻兵上校，先後升任守備第 3 旅旅長、第 65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旅長、山西省軍區臨汾軍分區司令員，頒授大校軍銜。

第 65 集團軍守備第 3 師第 9 團政委金秉章，先後升任第 65 集團軍步兵第 207 師政委、石家莊陸軍學院副院長，頒授頒授少將軍銜。

第 67 集團軍軍長吳玉謙少將（山東省甯陽縣人），先後升任瀋陽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中共第 14 屆、第 15 屆和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頒授中將軍銜。

第 67 集團軍政委杜鐵環少將（遼寧省鞍山市人），先後升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助理、副主任、濟南軍區政委、北京軍區政委、第 10 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第 15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頒授上將軍銜。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師長秦濤大校（湖北省黃安縣七裏區秦羅莊，黃安縣現為紅安縣），升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頒授少將軍銜。秦濤是原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秦基偉上將之子，1994 年因為“田明建事件”被免職，隨即退役。【注釋 1】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1 師參謀長李勝堂上校，升任第 24 集團軍副參謀長，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1 師陸海空三軍儀仗大隊副大隊長程志強中校（山西省永濟縣方池村人），先後升任陸海空三軍儀仗大

隊大隊長、北京衛戍區副參謀長，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高射炮兵團團長李旦生上校，先後升任警衛第 3 師副師長、師長、內蒙古軍區阿拉善軍分區司令員，頒授大校軍銜。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第 13 團副團長鄧健康上校（安徽省宿縣人），先後升任第 13 團團長、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9 師參謀長、北京軍區聯勤部司令部後勤工作研究室副師職研究員、山西省軍區臨汾軍分區司令員，頒授大校軍銜。

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1 總隊第 1 支隊支隊長楊德安上校（河南省臨潁縣人），先後升任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1 總隊副總隊長、武警部隊司令部直屬政治部主任、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副總隊長、總隊長，武警部隊司令部副參謀長兼北京市總隊總隊長，頒授少將警銜。

此外，還有一份被中央軍委記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師（旅）、團級建制單位名單，也一併列出，留作歷史的記錄：

集體一等功：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師參謀長馮兆舉）

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團長賈炳正、團政委常躍）

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第 13 團（團長辛中原、團政委萬金華）

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團長艾虎生、團政委劉建星）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團長徐乃飛、團政委張文品）

集體二等功：

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師政委陳錦彪）

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師長黃伯誠、師政委邵松高）

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師長陳明義、師政委徐福安）

第 40 集團軍步兵第 118 師（師長郝柏棟、師政委郭景全）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27 師（師長鐘聲琴、師政委王玉發）

空降兵第 15 軍第 43 旅（旅長李家洪、旅政委趙金奎）

集體三等功：

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師政委刁九健）

第 65 集團軍步兵第 193 師（師長王勤、師政委張常青）

第 24 集團軍守備第 7 旅（旅長李守成、旅政委安明）

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師長黃棟甲、師政委胡永柱）

因為各種條件所限，上述解放軍戒嚴部隊各級指揮官升官晉級的名單顯然很不完整，立功的部隊僅限於被中央軍委記功的師(旅)、團級建制單位，不包括師(旅)、團級建制單位以下的建制單位，也不包括被各大軍區記功的部隊。但是，從中仍可大概看出哪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比較賣力，手上所沾的民眾鮮血比較多。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至 6 月 4 日凌晨，在向天安門廣場等目標進軍時，第 38 集團軍、空降兵第 15 軍、第 39 集團軍、第 54 集團軍是四大主力部隊；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加入了第 27 集團軍、第 24 集團軍、第 63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等部隊。在整個鎮壓行動中，第 38 集團軍最賣力，殺人最多，其次是空降兵第 15 軍。

【注釋 1】1994 年 9 月 20 日，駐紮在北京市通縣的北京衛戍區警衛 3 師第 12 團副連長田明建，乘部隊出操之機打死包括團政委在內的多名軍官後，攔截車輛闖進北京市區，在建國門立交橋附近與圍堵的軍警發生激烈槍戰，多名軍警喪生，路過的伊朗駐中國大使館政務秘書尤素福·穆汗默德·皮什科納裏及其兒子也遇難。田明建後來被部隊狙擊手擊斃。因為田明建事件，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何道泉、北京衛戍區政委張寶康、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秦濤、佟喜剛等被免職。

第二章、陸軍第 38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38 集團軍概括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38 集團軍隸屬於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河北省保定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1034”。徐勤先少將任軍長，王福義少將任軍政委，張美遠少將任副軍長，吳潤忠少將任軍副政委，劉丕訓少將任軍參謀長，李之雲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郇永固大校任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副書記。

第 38 集團軍在解放軍中屬於第一王牌軍，也是第一個機械化裝備的集團軍。該集團軍具有如此地位，除了歷史原因，也有特殊政治背景。1967 年 2 月，正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時，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旨意，將第 38 軍自吉林省通化市調防到河北省保定市，承擔拱衛首都北京、威懾政敵（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任務，從此成為御林軍。

該集團軍步兵第 112 師的前身，是彭德懷率領湘軍獨立第 5 師第 1 團於 1928 年發動平江起義所創建的中國工農紅軍第 5 軍，後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 3 軍團，成為江西蘇維埃中央蘇區的紅軍兩大主力部隊之一。抗戰時期改編為八路軍第 115 師第 343 旅第 686 團，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鬥。1939 年，奉中共中央命令，在八路軍第 115 師副師長羅榮桓率領下進軍山東，創建敵後根據地，後來成為八路軍濱海軍區部隊。

該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的前身，是徐海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 25 軍，抗戰時期改編為八路軍第 115 師第 344 旅，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其中一部於 1939 年奉中共中央命令，在八路軍第 115 師副師長羅榮桓率領下進軍山東，創建敵後根據地，後來成為八路軍濱海軍區部隊。

該集團軍步兵第 114 師的前身，是張學良麾下的東北軍第 53 軍第 111 師，抗戰時期由中共地下黨員萬毅將軍率領在山東投歸八路軍，改編為八路軍山東軍區濱海支隊。

1945 年 8 月，八路軍濱海軍區部隊整編為山東軍區第 1 師、第 2 師，1945 年 11 月奉中共中央命令出山海關，進入東北搶佔地盤。1946 年 8 月，與東滿軍區第 7 縱隊（原屬八路

軍山東軍區濱海支隊）合編組成東北民主聯軍第 1 縱隊，李天佑任縱隊司令員，下轄第 1 師、第 2 師和第 3 師。

1947 年，東北民主聯軍改稱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又稱第 4 野戰軍）。東北國共內戰期間，第 1 縱隊以“三下江南”、“四戰四平”而成名，是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的三支猛虎部隊之一，屬於頭等主力部隊，以善打大仗、硬仗而著名。

1948 年 11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部隊編制和部隊番號的決定，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第 1 縱隊改編為第 38 軍，萬毅任軍長，梁必業任軍政委，第 1 師、第 2 師和第 3 師分別改稱第 112 師、第 113 師和第 114 師。同時將遼北獨立第 10 師劃歸第 38 軍建制，改稱第 151 師。全軍有近 5 萬名官兵，並組建了炮兵、工兵和汽車部隊。隨後，迅速進關投入平津戰役，擔任攻打天津的主攻部隊，率先突破天津城防。

平津戰役結束後，第 38 軍揮兵南下，先後參加了宜沙、衡寶、廣西、滇南等戰役。在國共內戰時期，第 38 軍從東北松花江畔打到雲南中緬邊境，縱橫 5 千公里，轉戰 11 個省市，攻佔大小城市 100 餘座，打遍了半個中國。

1950 年 10 月，第 38 軍作為第一批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時任軍長為梁興初，軍政委為劉西元。第 113 師在第 2 次戰役的阻擊戰中打得頑強出色，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在嘉獎電中親筆寫下“第 38 軍萬歲！”，第 38 軍遂有“萬歲軍”稱號。作家魏巍以第 112 師第 335 團第 3 連在松骨峰戰鬥中的事蹟為主，寫成題為《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戰地通訊，曾為志願軍贏得了“最可愛的人”的讚譽。如今這篇戰地通訊仍被列入中國的中學教科書，影響甚廣。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第 38 軍有三個連隊被志願軍總部授予“二級戰鬥英雄連”稱號，湧現出“一級戰鬥英雄”2 人，“二級戰鬥英雄”14 人，1 萬多名官兵榮立戰功。

1953 年 7 月，第 38 軍撤離朝鮮回國，駐防吉林省通化市。

1982 年 9 月，第 38 軍在解放軍中率先進行編組合成集團軍試點工作。1983 年 12 月，第 112 師改編成第一個解放軍機械化步兵師。1984 年 4 月 1 日，第 38 軍正式改編為第 38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112 師（當時部隊代號“51033”）、步兵第 113 師

(當時部隊代號“51036”)、步兵第 114 師(當時部隊代號“51039”)，並編入坦克第 6 師(當時部隊代號“52884”)、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2962”)、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2966”)、通信團、工兵團、偵察營等部隊。

1986 年 9 月至 1987 年 2 月，第 38 集團軍所組成的第 12 偵察大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麻栗坡八布地區執行偵察作戰任務。第 12 偵察大隊共有 838 名官兵，其中，第 1 連有 141 名官兵(集團軍偵察連)，第 2 連有 141 名官兵(步兵第 112 師偵察連)，第 3 連有 141 名官兵(步兵第 113 師偵察連)，第 4 連有 114 名官兵(步兵第 114 師偵察連)，火力連有 135 名官兵(步兵第 337 團炮兵連)。第 12 偵察大隊實施偵察行動 335 次，斃傷敵 112 名，俘敵 7 名，自身傷 11 人，亡 3 人。

1988 年 1 月，第 38 集團軍組建了解放軍陸軍集團軍中的第一個直升機大隊。1996 年，步兵第 114 師改編為武裝警察部隊機動師。1998 年後，坦克第 6 師、高射炮兵旅分別改編為裝甲師、防空旅，直升機大隊擴編為航空團。

第二節、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的第一主力軍

1989 年北京實施戒嚴，第 38 集團軍是首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第一主力部隊。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該集團軍擔負著挺進天安門廣場最主要路線——西長安街的突擊任務，最先對民眾開槍，殺人最多，西長安街形同殺戮戰場，變成了一條通往天安門廣場的血路。

第 38 集團軍身為御林軍，與其他解放軍戒嚴部隊有所不同，在北京實施戒嚴之前就已經兩次奉命進京執行警戒任務。

第一次進京情況：

1989 年 4 月 22 日，中共當局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追悼會，並宣佈當日封閉天安門廣場。北京市各高校逾 10 萬名學生為了突破禁令，提前於 1989 年 4 月 21 日晚上進入天安門廣場，通宵等候胡耀邦追悼會的召開。

4 月 22 日，第 38 集團軍奉命出動步兵第 112 師（欠步兵第 336 團）、坦克第 6 師（欠炮兵團）、集團軍工兵團、通信團，總共 8986 名官兵，乘坐 409 輛軍車緊急赴京，協助北京衛戍區、北京市公安局、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完成胡耀邦追悼會的警戒任務。

第二次進京情況：

1989 年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一場動亂，引起北京學生強烈不滿。1989 年 4 月 27 日上午，逾十萬名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沿途得到逾百萬北京各界民眾的熱烈支持。

第 38 集團軍奉命出動坦克第 6 師、集團軍工兵團、通信團一部，總共 5100 名官兵，乘坐 234 輛軍車赴京，4 月 27 日至 5 月 5 日擔負“警衛人民大會堂和制止動亂預備隊”任務。

上述第 38 集團軍兩次進京執行任務期間，由於北京學生和市民堅持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軍民沒有發生任何衝突。4 月 27 日，上街遊行的 10 多萬學生得到逾百萬北京各界民眾的強烈支持，聲勢極為浩大，但學生遊行隊伍放棄了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的原定計劃，過天安門廣場而不入，以避開在天安門廣場集結待命的第 38 集團軍部隊。

1989年5月19日晚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市部分地區自5月20日零點開始實施戒嚴。第38集團軍第三次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進京部隊包括步兵第112師、步兵第113師、坦克第6師、集團軍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一部，總共動用了15099名官兵、851台汽車、213輛裝甲車、33輛坦克及坦克搶救牽引車。

第38集團軍在軍長徐勤先因抗命而被撤職逮捕後，終於沒有辜負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的期望，動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坦克血腥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維護了中共專制政權。在《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第七章“赴北京維護首都秩序、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在黨和國家處於危難之際，全體指戰員發揚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經受住了‘政治關’、‘生死關’、‘苦樂觀’的嚴峻考驗，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各項使命，向黨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的答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總參謀長遲浩田和北京軍區首長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極大的鼓勵。”

第38集團軍執行鎮壓任務十分賣力，立下了頭功，大批部隊和官兵因此立功受獎，就數量而言，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中名列前茅。其中，有8名官兵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包括因軍車翻覆起火而死亡的集團軍炮兵旅士兵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和徐如軍，步兵第112師技術部修理科助理員、助理工程師李勃上尉，步兵第113師炮兵團政治處保衛幹事王強少尉。有4名官兵被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包括步兵第112師偵察營營長李連春、步兵第113師偵察營偵察連班長李雙印、坦克第6師坦克第22團汽車連士兵吳玉山、集團軍炮兵旅衛生隊軍醫王競少校。

1990年2月11日，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發中央軍委命令，決定授予步兵第112師偵察營以“衛國英雄營”榮譽稱號；授予步兵第113師高射炮兵團第57營第3連以“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給步兵第112師記集體一等功；給步兵第113師記集體二等功。

1990年2月15日，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政委劉振華簽發北京軍區命令，決定給第38集團軍的27個單位和個人授予榮譽稱號和記功，授予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6團第5連、步兵第113師偵察連以“衛國先鋒連”榮譽稱號；給坦克第6師坦克第21團特務連、集團軍炮兵旅特務連各記集體一等功；給集團軍政治部宣傳處處長任宗清、步兵第113師政治部副主任鄒萬增、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4團政治處主任王建偉、步兵第113師步兵第337團第3營營長王斌各記一等功；給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4團、步兵第113師步兵第337團、集團軍工兵團各記集體二等功；給步兵第112師副師長馮兆舉、步兵第113師參謀長谷密山、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4團副團長黃光雄、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5團團長屈明安、步兵第113師步兵第337團政委張明光、集團軍炮兵旅副旅長李燕生、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訓練處處長崔立學、集團軍後勤部軍需處副處長楊晉基各記二等功；給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5團、步兵第113師步兵第338團各記集體三等功；給集團軍副參謀長唐明洪、集團軍炮兵旅旅長張龍各記三等功。【注釋1】

此外，還有3個團被授予集體二等功，有兩個團被授予集體三等功，有一個團受嘉獎；有13個營被授予集體三等功；有兩個連被授予集體一等功，有17個連被授予集體二等功，有64個連被授予集體三等功；有38個排被授予集體二等功，有147個排被授予集體三等功；有47個班被授予集體二等功，有472個班被授予集體三等功。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

【注釋1】參見《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一書，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出版。

第三節、軍長徐勤先少將抗命事件

1989年5月20日，在北京實施戒嚴的當天，就有一起頗具震撼力的事件在北京民間廣為流傳，那就是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少將拒絕率兵進京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這個傳言後來被證明是真實的，只是將徐勤先誤傳為是解放軍十大將之一徐海東的兒子。明鏡出版社於2001年4月出版的《中國六四真相》一書，仍將徐勤先誤認為是徐海東的兒子。

徐勤先身為解放軍第一王牌軍的軍長，仕途理應不錯，但他出於良知，拒絕率兵進京鎮壓學生運動，以致於被撤職、判刑5年。他的抗命舉動，不僅為個人歷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也成了六四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起重大事件。

徐勤先抗命事件顯然非常敏感，中國官方的公開文字中沒有提及，在內部發行的《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中，也只有簡短的十餘字記錄：“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

其實，徐勤先抗命事件曾對中央軍委和第38集團軍造成巨大震動，從《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中以下的一大段記載就可以看出：

“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情況錯綜複雜，尖銳激烈。在國家重要的輿論工具發生了錯誤導向，我集團軍出現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的嚴重情況下，我集團軍黨委和部隊之所以能夠排除干擾，在行動上堅決服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調動和指揮，這是由於部隊從上到下有著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堅定的政治基礎。這種覺悟和基礎的確立，既靠平時的教育，又靠結合任務進行及時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開始時，針對一些同志用善良願望看待動亂、以擔心情緒對待戒嚴的問題，堅持用中央的精神和軍委的號令統一部隊的思想，緊緊圍繞‘是動亂，要戒嚴；是暴亂，要平息’展開教育。組織部隊認真學習《人民日報》4月26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和楊尚昆主席、李鵬總理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及時傳達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和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精神、反復學習鄧小平同志接見戒嚴部隊

軍以上幹部時的重要講話。

.....

針對徐勤先的嚴重錯誤，集團軍黨委嚴肅認真地進行了統一認識和清理思想工作。徐勤先的問題發生後，集團軍黨委召開緊急會議，每個同志都以強烈的義憤，堅定的態度，狠批了徐勤先的錯誤，一致表示，要堅決排除干擾，無條件地擁護中央軍委關於戒嚴的決策，以實際行動證明我集團軍是堅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是完全可以信賴的。師、旅、團黨委在這個問題上也表現了很強的政治堅定性和原則性，都以正面形式表明了態度，決心堅決抵制徐勤先的錯誤，用堅強的黨性接受這次考驗。

在學習 13 屆 4 中全會精神時，向全體幹部傳達了徐勤先的錯誤事實，分析了嚴重危害，提出了應抱的態度。集團軍和師、旅黨委在思想清理中，聯繫徐勤先的錯誤，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由於狠抓了堅定政治信念的教育，幹部戰士在紛繁複雜的政治風浪面前，做到了臨亂不惑，治亂不軟，團結一致，鋼板一塊。”

民間始終對徐勤先抗命事件津津樂道，眾說紛紜，其中有三個比較具體而可靠的版本。

版本之一：前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現任解放軍空軍副政委的劉亞洲中將在擔任成都軍區空軍政委期間，曾在雲南省某空軍基地對營級以上軍官做了一次題為“信念與道德”的內部報告，透露了以下的情況：

得知徐勤先抗命消息，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親赴第 38 集團軍軍部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當面向徐勤先傳達中央軍委命令，督促他率領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徐勤先問：“調兵命令有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簽字嗎？”周衣冰回答說：“有”。徐勤先又問：“有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簽字嗎？”周衣冰回答說：“有”。徐勤先接著問道：“有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嗎？”（顯然是明知故問，當時連北京學生和市民都已知趙紫陽失勢，徐勤先不可能不知道）周衣冰回答說：“沒有。”徐勤先隨即表示說：“這個命令我無法執行，它不符合中央軍委調兵的規定。”

依照中央軍委有關規定，凡調動一個班以上攜帶武器裝備的部隊進入北京，必須有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而且調兵命令上必須同時具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缺一不可。

周衣冰知道茲事體大，如果不能說服徐勤先，將造成巨大影響，於是再三解釋勸說，希望徐勤先回心轉意，無奈徐勤先仍然拒絕執行命令。周衣冰最終勃然大怒，指著徐勤先的鼻子說：“我知道你的老婆是法官（言外之意是死摳法律條文），你的兩個兒子都在天安門廣場！”

劉亞洲雖然是以總結歷史教訓，也就是以批判的角度提到徐勤先抗命一事，但也有人認為他其實是借機透露內幕。劉亞洲在報告中稱讚徐勤先是解放軍中少有的懂得現代化軍事理論和善於使用現代化武器的少壯派將領。

徐勤先抗命事件本來就具有震撼性，又從報告文學作家劉亞洲的口中出來，增添一些文學色彩和故事情節也在所難免。

版本之二：《中國“六四”真相》一書中有兩處提到了徐勤先抗命一事。

第一處記載：“（1989年5月）20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以及戒嚴部隊指揮部成員參加，聽取關於戒嚴情況的彙報。

會上，周衣冰首先報告了對徐勤先事件的處理經過。周衣冰說：‘原38軍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的嚴重事件發生後，根據楊主席（楊尚昆——作者注）的命令，我們進行了及時處理。現在，徐勤先的軍長職務已經被解除，徐勤先住院養病去了。38軍軍黨委成員一致表示堅決地、不折不扣地執行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堅決擁護對徐勤先的處理決定，在行動上堅決服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調動和指揮。軍黨委提出從今天起，軍、師、旅各級黨委要認真清理各種思想認識，聯繫徐勤先的錯誤，總結經驗教訓，在幹部戰士中狠抓堅定政治信念的教育。’

劉華清問：‘38軍的開進情況怎樣？’周衣冰彙報說：‘昨天晚上，38軍指揮部、112師、炮兵旅、高炮團（應該是工兵團——作者注）和通信團等將近7千人已進入復興路至公主墳一

帶。餘下的 113 師和坦克 6 師等部隊將於今天下午進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裏橋一帶。雖然他們也像別的部隊一樣遇到了不明真相群眾的圍困阻截，但執行命令的情況是好的。’

楊尚昆說：‘徐勤先的事件一定要引以為戒，保證不再發生。軍人一定要以服從軍令為天職，決不能違抗。’ ”

第二處記載：“進京命令發佈的當天晚上（應該是 1989 年 5 月 18 日——作者注），發生了一件讓楊尚昆等軍委領導人極其震驚的事情。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說：‘楊主席，剛剛得到 38 軍的報告，該軍軍長徐勤先不能執行進京戒嚴的命令。’ 楊尚昆：‘這件事可開不得玩笑！這是軍令！不執行軍令是要依軍法論處的。38 軍別人（指軍黨委成員）的態度呢？’ 周衣冰回答：‘大多數人表示堅決執行軍委命令。’ ‘不行。這件事大意不得。你得馬上親自去一趟。一定要做徐勤先的工作。告訴他，想得通想不通是一回事，執行命令又是一回事。’ 是夜，周衣冰等開車前往 38 軍的駐地保定。”【注釋 1】

版本之三：這是一位知情者所提供的版本，與《中國“六四”真相》一書的記載大同小異，相較之下，應該比劉亞洲的版本更接近事實。

1989 年 3 月的某一天，徐勤先軍長和新兵們一起進行投擲手榴彈的軍事訓練，不慎將大腿摔成骨折，住進了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北京軍區總醫院。

在 4 月初至 5 月中旬的 40 多天住院治療期間，徐勤先有幸耳聞目睹了北京學生運動。每當他從報紙上、電視中看到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便熱淚盈眶，被學生的愛國獻身精神深深打動。徐勤先總是喜歡從醫務人員和病友那裏打聽有關學生運動的各種消息，傾聽他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據當時在北京接近徐勤先的人說：“徐軍長那些天變得沉默寡言了。”

5 月中旬的某一天，徐勤先突然被召到北京軍區司令部，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和政委劉振華傳達了中央軍委命令，命令第 38 集團軍火速開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制止動亂。

徐勤先當場並沒有任何抗令的表示，架著拐杖趕回河北省保定市，召集會議，宣佈中央軍委命令，進行戰前緊急動員，並親自做好了各項兵力部署，安排了部隊進京日程和路線。一切就緒，他才給北京軍區司令部打電話，說自己因傷不能帶兵

進京。周衣冰說他這是故意違抗中央軍委命令。徐勤先回答說，不管上面給他定什麼罪名，他都絕不親自掛帥出征。

掛完電話，徐勤先便以請病假爲由（他的腿傷確實尚未痊癒，俗話說“傷筋動骨 100 天”），逕自離開部隊，又回到了北京軍區總醫院。

北京軍區速將徐勤先抗命之事上報中央軍委，楊尚昆得知消息後驚恐不安，大發脾氣，連續幾夜睡不好覺。爲了殺雞儆猴，避免徐勤先抗命之舉在軍中引發連鎖反應，楊尚昆親自簽發了一道中央軍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軍長職務，並將他押送軍事法庭審判。

北京軍區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帶著一隊北京軍區政治部的保安人員，來到北京軍區總醫院，先出示楊尚昆簽發的中央軍委命令，然後詢問徐勤先：“你還有什麼意見嗎？”徐勤先平靜地回答：“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準備。我是軍人，沒有服從命令，理該如此處理。你們執行命令吧。至於學生運動，我有我的看法，現在還不能下定論。”

在軍事法庭審訊期間，徐勤先用平和婉轉的語氣告訴審訊人員：“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沾汙這個歷史。”【注釋 2】

徐勤先最終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 5 年，他拒不認罪，也沒有推卸責任，鐵錚錚地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據說，這一句話在解放軍中反響很大，對六四血腥鎮壓行動的決策者鄧小平、楊尚昆也產生了極大的震動。既然沒有人願意充當“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功臣，這實際上已把開槍的責任者擺在了歷史罪人的位置上。

徐勤先將軍判刑後的情況一直不爲外界所知，多年來，很多人持續關心著他。曾經有消息說他已經不幸病亡。筆者多方打聽和查尋徐勤先將軍的情況，最近終於有了結果，一個身份確定的原北京軍區的校級軍官透露，徐勤先將軍仍然健在，服完刑期後，與家人定居北京。另有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說，徐勤先將軍服滿刑期後在河北省軍區幹休所居住，地址：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安南大街南。

【注釋 1】刊載於《中國六四真相》一書上冊第 496 頁。

【注釋 2】參見易京兵題爲《38 軍徐軍長走上軍事法庭》的文章，刊載于美國中文雜誌《中國之春》1990 年 5 月號。

第四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38 集團軍作為第一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在北京戒嚴令頒佈之前就接獲了部隊進京命令。1989 年 5 月 18 日，軍長徐勤先緊急奉召趕赴北京軍區司令部接受任務，並連夜趕回河北省保定市軍部，召開集團軍黨委緊急會議，傳達命令，緊急收攏部隊，進行政治思想動員。

由於北京戒嚴的消息提前外泄，加上身為御林軍的第 38 集團軍名聲在外，動向格外引人注目，向北京摩托化開進的過程極不順利，一再受到強力阻攔。在所有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當中，第 38 集團軍的受阻情況最為嚴重。迫不得已，只好改變原定開進計畫，採取佯動迂回、隱蔽前進、多路進發、高速開進等多種辦法逐步向北京集結，但多數部隊仍然未能按計畫進入北京市區執勤戒嚴地點。

步兵第 112 師的進京情況：

第 112 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高碑店市，下轄步兵第 334 團（當時部隊代號“51026”）、步兵第 335 團（當時部隊代號“51029”）、步兵第 336 團（當時部隊代號“51048”）、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1038”）、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41”）、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27”）、通信營、汽車營、偵察連、警衛連、炮兵指揮連等部隊。該師是第 38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在所謂的解放軍十大王牌師中名列前茅，出身於該師的解放軍將領多達 170 多人。

1989 年 5 月 19 日凌晨，步兵第 112 師接到緊急進京命令。師長劉興貴大校、師參謀長馮兆舉上校隨即召集全師團以上軍官緊急開會，佈置任務。13 個小時後，該師部隊即準備完畢，全體進京官兵乘坐車輛，按預定時間分成三個梯隊出發，沿著京石（北京市——石家莊市）公路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該師第一梯隊於當晚 8 點 30 分抵達北京西郊指定位置，師指揮所率領一個團首先進入北京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其餘部隊開進到北京市海澱區公主墳以西地段。該師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分別於 5 月 19 日晚上 10 點 40 分和 5 月 20 日上午 10 點鐘到達北京市豐台區的東高地和長辛店，遭到數以萬

計的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強力阻攔，無法繼續向北京市區開進。被圍堵在東高地的第二梯隊，包括該師的裝甲車隊。

該師包括偵察營在內的直屬分隊乘車到達北京市海澱區萬壽路，幾十輛軍車被人群和路障擋住。學生和群眾越聚越多，一些老先生、老太太躺在軍車前，明確表示：“要想走，就從我們身上壓過去。”軍車動彈不得。5月20日上午，上級指示該師直屬分隊後撤到北京市豐台區待命，當撤到位於豐台區的北京市第二清潔車輛隊附近時，再次遭到大批民眾的強力阻攔，與該師某團的部分車輛在此處被圍困了3天4夜。

在部隊受阻期間，該師指揮官和師司令部的幾位科長分別在東高地與學生代表進行了8次對話，企圖為部隊解圍。該師政治部主任帶著幾名幹事前往長辛店裝甲車隊被堵地域，做學生思想工作，並及時向上級反映了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對進京部隊採取“堵、拉、拖”的情況。

步兵第113師的進京情況：

第113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保定市，下轄步兵第337團（當時部隊代號“51035”）、步兵第338團（當時部隊代號“51030”）、步兵第339團（當時部隊代號“51047”）、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1032”）、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43”）、高射炮兵團、通信營、汽車營、偵察連、警衛連、炮兵指揮連等部隊。該師也是第38集團軍的主力部隊，在所謂的解放軍十大王牌師中名列前茅，出身于該師的解放軍將領多達140多人。

1989年5月19日凌晨，步兵第113師接到緊急進京命令。凌晨2點鐘，該師黨委緊急會議在師司令部會議室召開，師長于承海大校、師政委陳錦彪大校、師參謀長谷密山大校、師副參謀長王喜斌上校，以及全師團以上軍官全數到齊。陳錦彪傳達緊急命令內容，于承海作政治動員。于承海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黨和國家存亡危急，我們的決心是：堅決執行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完成任務……”黨委緊急會議進行了1小時零5分鐘，部署各種行動準備，設想部隊開進途中可能遇到的情況，研究相應的對策。

凌晨3點鐘左右，該師緊急出動的準備工作在方圓百里地

域內展開，200 多個分散點上的官兵火速集結。10 個小時後，各項準備全部就序。5 月 19 日下午 4 點鐘，該師全體進京部隊官兵乘坐車輛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5 月 19 日下午 4 點 30 分，該師師部機關和師直屬分隊的車隊一進入京保（北京市——保定市）公路，便受到大批保定市學生和市民的強力攔阻。10 分鐘之後，所屬各團也紛紛向師指揮部來電告急，4 個團分別被阻於保定市的 4 個路口。

該師指揮部針對部隊受阻情況快速做出決策：“立即採用第二方案，全師由集結後一路縱隊機動，改為多路機動，採取靈活多變、迂回穿插的方式堅決突圍。”即不再集結全師部隊沿著同一條路線向北京開進，而是各自擇路向北京開進。

與此同時，應第 38 集團軍要求，保定市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與會者有中共保定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負責人、保定市各高等院校的系以上負責人。會議的主題是：軍民合力打通被阻的五條路口，保證第 38 集團軍部隊北進。

5 月 19 日晚上 9 點 05 分，在中共保定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大力協助下，步兵第 113 師部隊在從駐地出發近 5 個小時後，才陸續脫困，離開保定市繼續向北京開進。

5 月 19 日晚上 8 點鐘，該師先頭團——步兵第 339 團的車隊抵達北京市豐台區盧溝橋鎮的盧溝橋附近，公路上等候已久的大批北京學生和市民，打著旗幟和橫幅，叫喊“反對軍隊進京鎮壓學生”等口號，擋住車隊。官兵們下車強行徒步開進，逼退一部分民眾，但大部分民眾堅持不讓道，軍民僵持不下。

這時候，華北電力管理局的中共黨員、共青團員按照上級要求趕到現場協助部隊，與官兵們手挽手組成人牆，護衛車隊一步一步向前突進。步兵第 339 團終於率先抵達北京市海澱區的預定集結地點。

在北京戒嚴期間，只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牢牢掌控的電力系統，以及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掌控的北京市，才能勉強動員一些力量支持解放軍戒嚴部隊。

5 月 20 日零點 35 分，在北京市海澱區公主墳，該師師部機關的 26 名校尉軍官所乘坐的一輛大轎車遭到民眾圍困。這些校尉軍官後來以“找飯吃”為由騙取了改道行進的機會，大轎車

後撤 5 百米後停在路旁緊急停車帶，一邊躲過後邊跟蹤的人群，一邊以修車的假像引開前面圍堵人群的注意。一個小時後，悄悄摘掉軍用車牌，全部人員脫掉軍衣，將包裹報話機的紅綢布撕成細條系於頭上，手中拿著撿來的報紙傳單，仿照聲援學生的車輛全面化妝，一連通過 6 道關口，在預定地點與師指揮部會合。

集團軍炮兵旅的進京情況：

炮兵旅旅部駐地在北京市平谷縣（現為北京市平谷區）東高村，下轄 7 個炮兵營，以及通信連、炮兵指揮連、偵察連、警衛連等部隊。

1989 年 5 月 19 日凌晨，炮兵旅接到緊急進京命令，10 來個小時內即完成了部隊開進的準備工作，5 月 19 日下午從駐地出發，向北京摩托化開進。當晚，該旅車隊抵達北京市海澱區公主墳，遭到大批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強力阻擋，被圍困了一天一夜，後來奉命轉移，撤到了附近的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機關大院，駐紮在禮堂。

時至 5 月 19 日深夜，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3 師的步兵第 339 團和高射炮兵團、集團軍炮兵旅大部、通信團一部，共有 6700 多名官兵終於開進到北京市西郊的五棵松至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地域，但由於再次受到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的強力圍堵，無法按計劃繼續向北京市中心開進，佔領天安門廣場等預定的戒嚴執勤地域，只好分頭撤往附近的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總部的機關大院。

5 月 20 日下午，坦克第 6 師開進到北京市石景山區的八角村、焦家口，炮兵團開進到北京市豐台區的六里橋，分別遭到大批學生和市民的強力圍堵，無法繼續開進。

5 月 20 日凌晨 2 點鐘，步兵第 113 師指揮機關迂回穿插到北京市海澱區的指定位置，先頭的兩個團——步兵第 339 團和高射炮兵團也陸續突破圍堵沖入北京市內。另外的四個團——步兵第 337 團、步兵第 338 團、坦克團和炮兵團開進到北京市豐台區大井立交橋附近，再次受阻。其中一個團被分割圍困于北京市海澱區沙窩村。

5 月 20 日凌晨 3 點鐘，步兵第 113 師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

面對北京全民“截”兵的局勢，研究行動方案，採取果斷措施，粉碎民眾“圍、追、堵、截”的企圖。

5月20日凌晨5點鐘，步兵第113師師長于承海、師政委陳錦彪、師政治部主任趙鴻亮趕赴沙窩村，協助受阻部隊團長董鴻釗、團政委薛曉明，利用黎明前夕的黑暗，組織官兵衝破圍堵，將部分車輛和人員接到附近一所中學（應該是位於北京市海澱區太平路8號的太平路中學）。

爲了按時執行於5月20日10點鐘生效的北京戒嚴令，步兵第113師指揮部命令炮兵團作爲先鋒，堅決突進。5月20日上午8點鐘，該師參謀長谷密山在大井立交橋實施部隊突圍開進的計畫，決定由炮兵團團長岳中強中校、政委馬炳泰中校各率領兩個營從左右翼往前插，爲全師受阻部隊開道。上午8點15分，第一次發動突圍行動，前車發動後搶先向前開路，後面各車緊緊跟進，官兵們唱著軍歌隨車跑步前進。學生和市民們拼死堵截，部隊車隊只向前沖出200米。上午11點鐘，豔陽高照，趁圍堵民眾躲蔭之機，官兵們又一次發動突圍行動，但也僅僅向前推進了50米而已。

步兵第113師炮兵團在大井立交橋附近被圍困長達3天4夜，期間曾發動六次大的突圍行動，終因圍堵的民眾實在太多，突圍行動終未奏效。不管白天黑夜，圍堵的民眾都數以萬計，高潮時逾十萬人。可見當時在北京各處有多少民眾參與了阻攔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城的行動，真可謂是全民“截”兵。

5月21日夜晚，面對民眾不分晝夜的強力阻攔，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不得不命令各受阻部隊就地調整轉移，暫停向北京城內開進。5月22日，步兵第113師指揮部傳令受阻部隊，務必於當晚開進到距離大井立交橋兩公里處的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101綜合倉庫）休整。

在大井立交橋以東的一堵牆下，步兵第113師政委陳錦彪等5名軍官與13名學生代表進行“談判”，議題是讓受阻部隊轉移到西倉庫休整。學生代表們表示，此事需請示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陳錦彪以“鄭重聲明”的方式威脅說：“如果仍然頑固阻攔，妨礙實施戒嚴，將採取強硬的手段實施轉移，其後果將由你們全部承擔。”學生代表們

不予理睬。

步兵第 113 師政治部副主任鄒萬增亮出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人群中發表演講，該師 4 個團的 21 名團級軍官一直與圍堵的人群唇槍舌劍，以政工幹部和理論骨幹組成的多個宣傳小組也主動突擊，與圍堵民眾“談心”，按照中國官方的口徑，宣傳北京戒嚴的意義和正確性。參與圍堵的市民和學生根本不吃這一套。

步兵第 113 師的兩位團政委張明光、蔣校成便裝進入天安門廣場，與北高聯常委鄭旭光、學生糾察隊負責人張健對話，要求讓受阻部隊轉移，最終拿到了鄭旭光、張健同意讓部隊轉移的字據，憑著這份字據，與 13 名學生代表達成了一份讓受阻部隊轉移到西倉庫休整的“協議書”。“協議書”最終沒能兌現，部隊車隊前進不到數百米，學生代表們就變了卦，因為有人向他們反映說“西倉庫有通達天安門廣場的戰備地道”。於是乎，道路又被學生和市民阻塞。

5 月 22 日清晨 7 點鐘，步兵第 113 師受阻部隊接到後撤命令。上午 10 點 20 分，又接到師指揮部來電，上級指示受阻部隊進駐位於前方不遠處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地址是北京市豐台區六里橋北里 1 號）。

然而，與學生代表的談判再次陷入僵局。學生代表明確表示：受阻部隊要轉移可以，但只能往後撤到西倉庫，不能往前進駐八一電影製片廠，前進一米也決不同意。學生方面的現場負責人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中央團校）法律系姓宋的青年教師，他對受阻部隊團政委楊清福說：“不要說八一電影製片廠在橋北 4、5 百米處，就是你們越過六里橋 1 米，等於拿我的頭放到北高聯的審判臺上。作為朋友，我佩服你們的頑強精神，作為對手，我決不能讓步。”針對部隊代表的威脅，姓宋的青年教師表示：“你們部隊有武器，一定要開進，我們赤手空拳是無法阻擋的。可我們有的是學生，現在已準備好了三批，你們可以從我們一批批的屍體上踩過去。”

此後，部隊方面陸續派人與學生代表談判，包括步兵第 113 師副師長、第 38 集團軍炮兵指揮部主任，都沒有談成。5 月 22 日下午，第 38 集團代軍長張美遠來到八一電影製片廠坐陣指

揮，與學生代表談判。姓宋的青年教師作了讓步，同意讓受阻隊伍進入八一電影製片廠，但軍車和武器裝備留在原地不許動。代軍長張美遠聽到這個條件勃然大怒：部隊官兵放下武器裝備，豈不成了投降！於是，談判再次破裂。至此，受阻部隊進駐八一電影製片廠的計畫擱淺。

八一電影製片廠隸屬於解放軍總政治部，該廠事先已做好接待受阻部隊進駐的準備。廠長蕭穆少將於 1989 年 5 月 19 日深夜參加了中央機關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親耳聆聽李鵬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副廠長王曉棠大校領人提前打掃了該廠禮堂，準備讓解放軍戒嚴部隊住宿。【注釋 1】

【注釋 1】參見題為《難忘的三晝夜》的文章，作者：八一電影製片廠編輯金棟賢，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第五節、戒嚴中第一次軍民流血衝突事件

1989年5月22日，第38集團軍指揮部決定讓受阻於六里橋的步兵第113師的四個團採取強行措施，突破民眾的圍困，進入西倉庫休整待命。事實上，這個強行突圍的方案，早在與學生代表進行所謂的“談判”時就已經擬定。

按照強行突圍方案，兩個團分別擔任左右路突圍先鋒，其餘兩個團一個居中，一個斷後，每輛軍車上只留兩、三個人守護武器裝備，其餘官兵全部在車隊兩側徒步護衛車輛前進。

5月22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中剛剛敲過8點鐘的最後一響，擔任開路先鋒的數百名官兵就象聽到了衝鋒號令一樣，手挽手，肩並肩，高歌軍歌，強力向前突擊。

官兵們的強力突擊行動刺激了數萬學生和市民的情緒，男女老少齊聲高喊著“不能讓他們進入天安門廣場”、“不能讓他們去鎮壓學生”等口號，組成一道道人牆。驟然間，雙方的隊伍糾結成一團，經過一番激烈的肢體衝突，民眾漸漸抵擋不住，畢竟在體力上和組織性上都遠遠不如。一批批民眾湧上去圍堵，又一批批被官兵衝撞下來。眼看阻攔就要失敗，開始有民眾從房子裏、楊樹下、牆根邊向突擊的官兵投擲石塊，官兵也隨即以石塊還擊。軍民雙方以互擲石塊取代了肢體衝突，現場頓時石塊紛飛，軍民雙方都有人受傷。

一些學生挺身而出，大聲呼籲停止投擲石塊，但鮮血刺激了軍民雙方的情緒，理性呼籲淹沒在激情的喊叫聲中，並有呼籲停戰的學生受傷了。突擊隊伍中也有10多名官兵流血了，但官兵一如既往，繼續強力向前衝擊。

官兵的強力突擊行動終於有了成效，車隊陸續進入西倉庫，但民眾並沒有放棄阻擋的努力，激烈的衝突持續不斷。晚上9點30分左右，當五分之二的軍車進入西倉庫後，車隊又被洶湧的人群攔腰截斷。石塊更加密集，人群更加洶湧。

步兵第113師炮兵團的官兵被攔截在距離西倉庫不到500米的坡道口。只見一個婦女攔住軍車，說她的女兒被官兵用石塊砸傷了。同時又有一個中年漢子背來13歲的兒子攔車告狀，要部隊給他的兒子治傷。炮兵團政治處保衛幹事王強少尉只好

帶著他們去醫院包紮傷口。【注釋 1】

5 月 23 日零點，步兵第 113 師先頭進入西倉庫的官兵，在該師指揮官的指揮下，以消防車作為先導，闖出西倉庫接應後續部隊。直至凌晨 1 點 30 分，歷經 12 個半小時的激戰，步兵第 113 師四個團受阻的百餘台車輛、千余名官兵才全部進入西倉庫，終於完成了突圍進點任務。

這是北京戒嚴後所發生的第一次軍民流血衝突，衝突的激烈程度令人震驚。消息很快傳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許多學生和市民聞訊紛紛趕往流血衝突現場——六里橋，或聲援，或抗議。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再次呼籲民眾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杜絕暴力行爲。

關於六里橋軍民流血衝突事件，作為中國官方喉舌的新華社於 1989 年 5 月 23 日發出一篇通稿，轉述了北京市政府發言人的發言：

“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製造謠言，進行煽動，混在學生和圍觀者中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用事先準備好的磚頭瓦塊襲擊解放軍戰士。在這個過程中，大學生請求那些人不要再打了，但大學生也遭到襲擊。解放軍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一邊撤離，一邊保護學生。在這一過程中，116 名幹部戰士受傷，其中 48 名住院治療，29 名受重傷，有的頭部縫合 9 針，有的手指骨折。同時也有 11 名大學生受輕傷，另外有 12 人受輕傷、1 人受重傷。在這一過程中有 10 人被解放軍戰士扭送到公安機關，這些人已被拘留審查。其中有 5 名是外地人，有 5 名是北京市人，他們都不是大學生。（5 月）23 日上午 11 時，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百發、市政府秘書長鐵英到醫院看望了被打傷的解放軍戰士。”

新華社的這一篇通稿預設立場，偏向性明顯，完全是站在中國官方的立場進行片面報導。北京市政府發言人所陳述的流血衝突經過及雙方受傷人數，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在提高部隊官兵受傷人數和受傷程度的同時，壓低了學生的受傷人數和受傷程度，對民眾的受傷情況則避而不談。此外，聲稱受傷的學生都是被“不明身份的人”所傷，與部隊官兵無關，這也違背事實。至於說部隊官兵在數以萬計民眾的強力圍堵下，還能“一邊撤離，一邊保護學生”，那真的是有著濃厚的北京天橋說書人的風格了。

當年，在六里橋軍民流血衝突事件發生後，身為大學教師的筆者十分關切，曾帶領一些學生到醫院探視受傷住院的學生和部隊官兵，親眼見到雙方都有許多受傷者，這些需要住院治療的學生和部隊官兵自然都不能算是輕傷患，有的學生和部隊官兵的傷勢確實比較嚴重，並不象北京市政府發言人所陳述的那樣，“也有 11 名大學生受輕傷”。【注釋 2】

經過六里橋軍民流血衝突事件，第 38 集團軍進京部隊完成了突圍進點的任務，開始進入所謂的休整時期，名義上是休整，實際上是為下一步的軍事行動做好準備。據第 38 集團軍有關資料記載，從 1989 年 5 月 21 日開始，該集團軍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部隊轉入休整”的命令，本著由遠而近、由外向裏、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則，將被圍於北京街頭、郊外的屬下部隊逐步調整到有利位置。在休整期間，一邊對部隊官兵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一邊積極進行指揮方法研究和適應性訓練，成立了由 1 千多名官兵所組成的 24 個防暴隊，籌集了各類裝備和物資，為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做好了準備。

【注釋 1】參見《太陽系裏一顆星----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幹事王強》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

【注釋 2】參見題為《戒嚴中的第一次流血衝突》的文章，作者：中尉幹事任斌，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第六節、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

1989年6月3日下午5點鐘，第38集團軍政委王福義少將等人在集團軍指揮部的作戰室裏(位於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的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機關大院)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著代軍長張美遠少將的歸來。一個小時前，張美遠趕赴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受領挺進天安門廣場的任務。

就在王福義等人焦急不安之際，電話鈴聲急促響起。原來是代軍長張美遠爲了爭取時間，受領任務後，當即在北京軍區用電話向王福義等人作了轉達。北京軍區的命令內容是：以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兩個集團軍的建制，由第38集團軍爲先導，沿著西長安街由西往東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如遇障礙則強行排除，務必按時到達天安門廣場。

按照北京軍區命令，第38集團軍必須于當晚10時前在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地址是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9號）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然後全副武裝乘車沿西長安街東進，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代軍長張美遠在電話中提議：將第38集團軍部隊密集收縮在一公里範圍之內，人車集中，首尾相顧，形成鐵拳。

放下電話，王福義馬上向集團軍指揮部成員轉達命令內容和張美遠的提議。經過簡短研究，集團軍參謀長劉丕訓和作訓參謀們提出一個進軍方案：以步兵第112師、步兵第113師兩個師一家兩路，齊頭並進，坦克第6師、集團軍炮兵旅、工兵團隨後跟進。車隊先頭設置六百人左右的防暴隊、排障隊，負責開路，兩側由各部隊的防暴隊護衛車輛，人車相互掩護前進。整個戰術以集團密集隊形對付人海戰術，以原始防衛手段對付磚石、木棍等的攻擊，以強大的威勢對付“反革命氣焰”。

王福義很讚賞這個進軍方案，當即表示同意。他說：“這個方案很切實，並且有利於揚我集團軍之優長。我們這個部隊有自己的傳統作風，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榮譽感很強，內部比勁也足。解放戰爭時期我們軍主攻天津，就是以這兩個師並肩突擊，很快打進城去。這次又這麼做，兩個師勢必爭先恐後地往前沖，迅速完成強行進入的任務。”代軍長張美遠返回集團

軍指揮部後，也對這個進軍方案表示贊成。

根據這個進軍方案，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作了分工：代軍長張美遠、軍政治部主任李之雲率領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在部隊前面組織防暴排障，軍政委王福義、軍參謀長劉丕訓在先頭師居中位置實施統一指揮和對上聯絡，軍後勤部楊部長帶領集團軍後方指揮部接應部隊，組織供應，救治傷患。集團軍後方指揮部設立在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機關大院，集團軍炮兵旅一部分官兵留守，擔任預備隊。

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通過電臺迅速向屬下部隊挺進天安門廣場的命令。儘管進軍方案已確定，命令也已下達，但面臨北京全民“截”兵的局面，集團軍指揮官們的心並不踏實。王福義事後承認：“坦白地說，我的心也提到嗓子眼。”想來想去，他忍不住又分別打電話給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和步兵第 113 師政委陳錦彪，強調這次任務艱巨，意義重大，要求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即使付出代價也要在所不惜。

爲了鼓舞士氣，集團軍指揮部要求各級軍官在部隊開進時務必靠前指揮，身先士卒，同時重申全體軍官務必按照軍銜佩戴肩章，亮明身份帶領部隊完成挺進任務。各部隊出發前均舉行了誓師儀式。據在場人士透露，誓師儀式上，官兵們目露凶光，殺聲震天，令人不寒而慄。

6 月 3 日晚上 8 點鐘左右，集團軍指揮部車隊率先從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機關大院出發，10 多輛軍用吉普車一出機關大院，就見街道兩旁早已圍滿了成千上萬的民眾。車隊到達公主墳轉盤東口，數以萬計的人群湧上街道和兩邊的林蔭道，向車隊圍上來，有的揮動拳頭高呼：“當兵的，滾回軍營去！”

“不許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有的敲擊車窗要與軍人對話。10 多輛軍用吉普車陷入人潮，在街道中間動彈不得。

民眾不分男女老少，眾口一詞地勸說軍人撤回去，不要去天安門廣場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不少民眾激動得聲淚俱下。僵持許久，軍車堅不撤離，有的民眾憤怒之下，開始用石塊、磚頭砸軍車。據王福義事後自述，他乘坐的 212 吉普車 8 塊玻璃一下子碎了 6 塊，玻璃渣子濺得滿車都是。司機和同車的兩個軍官被砸傷。一塊石頭從車後窗飛進來，砸在他的腿上。

事實上，在軍人開槍殺人之前，民眾相當克制，只是攔阻

軍隊前進而已，許多人主動拉起糾察線保護軍車。如果不是這樣，數以萬計的民眾早已將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車隊的 10 多輛軍用吉普車給掀翻了。

就在此時，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的車隊從左後側開了上來。王福義立刻命令炮兵團組織官兵反擊，用石塊回敬民眾，將民眾打跑逼退。指揮部車隊乘機前進，到達預定的部隊集結地點---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以東地段，與先期抵達的步兵第 112 師車隊會合。

步兵第 112 師奉命掩護第 38 集團軍部隊在軍事博物館一帶集結，並在挺進天安門廣場時負責開路。該師前進指揮部率領三個團和師偵察營、工兵營，由偵察營開路，按時抵達軍事博物館以東的丁字路口，佔領了軍事博物館以東地域。該師其餘的三個團和師直屬分隊則分別按規定時間到達了該師預定的集結地域---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機關大院。

步兵第 112 師前進指揮部設立在解放軍 301 醫院（解放軍陸軍總醫院），部隊分別駐紮在北京市海澱區的五棵松、翠微路、萬壽路一帶的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的機關大院，距離軍事博物館不遠，因而先期到達軍事博物館以東地域。

此前，爲了確保整個集團軍部隊能在軍事博物館一帶集結，步兵第 112 師的步兵第 334 團按照師指揮部的命令，在團長李少軍上校的率領下，提前進駐軍事博物館。該團原先駐紮在距離軍事博物館 9 公里處的北京市市政公司第二攪拌站，5 月 27 日，全團官兵以化整爲零、身穿便裝的方式，陸續進入軍事博物館，於當日下午 5 點 30 分集結完畢，比師指揮部命令“務必於 5 月 28 日 12 時前到達”的要求提前了許多。【注釋 1】

集團軍炮兵旅、工兵團排除種種困難，也先後按時抵達預定出發位置---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機關大院。工兵團從位於北京市房山縣（現爲北京市房山區）良鄉的駐地乘車出發，車隊快速疾進，27 分鐘行駛 24 公里，提前抵達預定集結出發位置，然後排除干擾，全力保障，跟隨集團軍軍部機關到達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

相比之下，步兵第 113 師部隊的開進過程很不順利。晚上 6 點 45 分，該師指揮部和駐紮在北京市內的兩個團由軍事博物館以西的翠微路地段出發。

該師駐紮在豐台西倉庫的四個團在兩名師部指揮官的率領下乘車出發，按計劃開進到北京市石景山區의翠微路地段與該師先頭部隊會合，集結編隊後一起趕往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

西倉庫與軍事博物館相距 30 華里，其間要經過許多交通要道。五棵松，是部隊開進途中需要突破的第一道關口。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事先已有預感，遠在西倉庫的步兵第 113 師四個團經過五棵松時必有一場惡戰。

爲了突破第一道關口五棵松，步兵第 113 師指揮部做出決策：命令兩個步兵團分別擔負開路和斷後的任務，保證整個部隊首尾相顧；四個團組成 200 人的防暴開路隊，帶足開路器械，架設了 12 只高音喇叭的六輛宣傳車反復廣播預先擬定的宣傳文稿，文武俱備，快速開進。“文武俱備”四個字可圈可點，戳破了中國官方“先暴後鎮”的謊言，說明解放軍戒嚴部隊一開始就有使用武力的準備。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進軍命令，也明確要求各部隊在開進時必須“全副武裝”。

步兵第 113 師在部隊開進前，以連爲單位進行官兵集體宣誓。該師政委陳錦彪代表師黨委所起草的動員令中有這麼一句話：“即使付出再大的犧牲，也要到達天安門廣場。”

晚上 7 點 25 分，步兵第 113 師由豐台西倉庫出發的四個團部隊的車隊開進到五棵松路口，剛剛通過 13 台車輛，就被蜂擁而來的人群攔腰截斷。隨後跟進的第 63 集團軍的 100 餘輛軍車也同時受阻。

擔任先頭團的是步兵第 337 團，該團政委張明光上校命令作訓參謀通知官兵們下車，強行徒步開進。圍堵的民眾雖然無以計數，但男女老少的，又缺乏有效組織，無法抵擋身官兵們的強力突擊，多數被迫退到馬路兩側，憤怒而激情地呼喊“不許鎮壓學生”、“這裏是首都，不是老山前線”等口號。

張明光毫不猶豫地下達了命令：“鎮壓暴亂，奪路開進！”一聲令下，先頭團的 800 名官兵和另外三個團的部分官兵即刻向人群猛烈插過去。就在此時，師指揮部派出接應這四個團部隊的師偵察連，在師司令部偵察科科長耿援朝的率領下火速趕到，從人群背後插進去。這些偵察兵不久前經歷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對越偵察作戰，如狼似虎，身強力壯。

官兵們兩面夾擊圍堵的民眾，勢如破竹，口子終於被打開。只花了 40 分鐘，四個團部隊的 100 餘輛軍車，連同第 63 集團軍的 100 餘輛軍車，全都通過了五棵松路口。

在翠微路，步兵第 113 師部隊曾經開槍驅散民眾。中國軍方的資料中有這麼一段記載：“炮兵團拐進了翠微路。團部指揮車後面，砰然一聲槍響。岳中強團長對著步話機驚問出了什麼情況。一位營長的聲音傳來：有個暴徒要燒指揮車，不得已鳴槍警告，把他嚇跑了。”【注釋 2】

中國軍方的資料凡是涉及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情節，一律都是“鳴槍示警”，似乎從未對準民眾開槍。其實不是。中國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廠的技術工人宋曉明是目前所知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第一位遇難者，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左右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中彈遇難，年僅 32 歲。在五棵松開槍的部隊就是第 38 集團軍。

晚上 10 點 12 分，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強行開進，步兵第 113 師四個團部隊連克北京市海澱區的五棵松、沙溝、萬壽路、翠微路、公主墳五道關口，終於抵達軍事博物館前，與集團軍指揮部及先期抵達的部隊會合。

這四個團部隊的抵達，讓集團軍指揮部松了一口氣，代軍長張美遠、軍政委王福義一直耽心他們能否及時趕到。王福義曾用報話機催問軍參謀長劉丕訓：“第 113 師上來沒有？”這四個團於 5 月 19 日進京時曾在六里橋附近被圍堵 3 天 4 夜，5 月 22 日晚上強行進入西倉庫時，又與民眾發生過流血衝突。

在這四個團到來之前，雖然步兵第 112 師的另外兩個團已經在軍事博物館以東地段集結，但由於兵力不足，側翼暴露，人群不斷從四方圍上來。由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組成的防暴隊猛力反擊，將人群驅趕到部隊車隊 100 米之外，不許靠近，極力鞏固住已佔領的路段。這些偵察兵經歷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對越偵察作戰，兇猛如虎。

晚上 9 點鐘剛過，北京軍區指揮組趕到軍事博物館前第 38 集團軍前進指揮部所在位置。於是，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再次用電臺與軍政委王福義聯繫，催問步兵第 113 師的部隊趕到了沒有。聽說北京軍區指揮組催著出發，王福義也非常著急，部隊再不出發，很難在預定時間內趕到天安門廣場，但步兵第 113

師的部隊不到，突擊力量總是顯得單薄。

北京軍區派往第38集團軍擔任監軍任務的指揮組成員有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軍區副政委陳培民中將、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少將、軍區訓練部王部長等人。多名北京軍區負責人帶領指揮組靠前直接指揮部隊，這與其他各路挺進天安門廣場部隊的情況不同，一方面反映中共高層對第38集團軍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共高層在出現軍長徐勤先抗命事件之後對第38集團軍不放心。

時針指向晚上9點20分，王福義所掌握的報話機中突然傳來了集團軍炮兵旅、步兵第113師已經到達預定出發地點的消息。王福義興奮地對指揮車上的人們說：“這下就好辦了。”於是，第38集團軍部隊比預定的出發時間提前半小時，於晚上9點30分出發，由西往東浩浩蕩蕩地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車隊走出不遠，突然又停止不前。王福義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只見集團軍政治部一位幹事急匆匆地跑來報告說，在前邊率領部隊開進的代軍長張美遠臨時奉召到軍事博物館開會，北京軍區副政委陳培民讓他到前邊去。

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設在軍事博物館，由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政委劉振華坐鎮指揮。

王福義快步奔走中，看見遠處西長安街上一片火海，濃煙隨風一陣陣飄過來。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副政委陳培民、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和集團軍司令部機關人員都焦慮萬分。

陳培民一看見王福義便急促地說：“老王，快組織部隊想一切辦法排除路障，保障主力和車輛順利通過。”王福義回答道：“我到前邊去觀察，去組織。”王福義馬上趕到車隊最前邊，與正在積極組織指揮部隊開進的幾個師級指揮官快速地交換意見，完善開進措施，堅定行動決心。

很快地，第38集團軍部隊繼續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步兵第112師、步兵第113師和集團軍炮兵旅並肩前進，龐大的車隊成三路縱隊行駛。工兵團、通信團等部隊緊隨其後。由500余名官兵所組成的防暴隊在車隊前列開路。步兵第112師由營長李連春率領偵察營擔任開路先鋒。

代軍長張美遠從軍事博物館返回後，與軍政治部主任李之雲一起在前面指揮部隊排障開路。北京軍區指揮組成員一直與

王福義等人在一起，一邊觀察情況，一邊組織指揮。北京軍區訓練部王部長拿著話筒大喊：“快！快！”指揮官兵們排除路障。王福義拍馬屁說：“軍區首長在我們跟前，給了廣大官兵以極大的鼓舞和教育，增強了完成任務的信心。”

在軍事博物館與木樨地之間路段，集聚著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試圖阻擋軍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在部隊逼近之際，民眾迅速放火點燃橫置於道路上的幾輛公共汽車，形成一道火牆，部隊官兵被迫停止前進。步兵第 112 師師長于承海等人指揮防暴隊官兵直沖“火牆”，排除燃燒的車輛。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和市民沖上前去試圖阻止，但遭到部隊官兵的猛烈反擊，數十次的衝擊都沒有成功。

在木樨地路口，民眾用公共汽車、卡車、電車交叉排成三道車障，一見部隊官兵過來，迅速澆上汽油，將車點燃。霎那間濃煙翻滾，火焰躡起來幾丈高，車體被燒得畢剝作響，油箱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防暴隊官兵沖過火障，反擊民眾，將人群強行驅散，掩護排障隊推開攔路的車輛。步兵第 112 師參謀長馮兆舉砸開一輛公共汽車的窗玻璃，爬進車去，摘開車檔，把著方向盤，官兵們喊著號子，拼命把車子推到路邊。

最難對付的要數電車，車身長，又分成前後兩截，中間連接處是軟的，在兩邊怎麼推也推不動。後來有一個軍官提出在中間橫推，將前後兩截車廂折到一起，終於可以推動了，給部隊車隊閃開了一條道。

在木樨地，部隊遇到了挺進過程中最高強度的阻攔，一批又一批民眾不顧生死地往前沖，阻擋部隊前進。也就是在木樨地，官兵們開始大規模地開槍，哪里有民眾呼喊口號，子彈就掃向哪里；哪里有民眾投擲磚頭石塊，子彈就掃向哪里。民眾傷亡慘重。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木樨地是民眾死傷最為慘重的地點之一。迄今為止，“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尋找到的 186 位死難者，其中就有 35 位遇難於木樨地。

官兵們開槍掃射，強行通過了木樨地。不過，仍有眾多的學生和市民奮不顧身地試圖阻攔，其中有不少婦女和老人。官兵開槍殺人雖然起到了震懾作用，但同時也激起民眾的悲憤。西長安街兩邊的高層建築物上，被官兵開槍殺人所激怒的民眾

不時地扔下物品，包括當時屬於貴重物品的自行車。官兵毫不猶豫地向高層建築物開槍掃射，就連居住著中共高級幹部的第 22 號樓（俗稱“部長樓”）也遭到掃射，死亡多人，包括到廚房倒水喝的原中國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複的女婿尹進。

多輛部隊宣傳車反復廣播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措辭嚴厲的“緊急通告”，地面上、車輛上的官兵一邊齊聲高呼：“嚴懲暴徒！”“如遇阻攔，堅決反擊”等口號，一邊開槍射擊，震懾著民眾們不敢上前，只能躲閃在道路兩邊的花壇後、黑暗處，發出一陣又一陣的抗議呼喊，或是投擲石頭和磚塊。石頭和磚塊根本阻擋不了全副武裝的軍隊，對頭戴鋼盔的官兵也造成不了大的傷害。

晚上 11 點 40 分，第 38 集團軍先頭部隊到達西長安街上的復興門立交橋。民眾們把公共汽車、卡車、拖車分成三層橫置在復興門立交橋上，眼看官兵殺氣騰騰地逼近，迅速往汽車上澆灑汽油，放火焚燒。頓時，濃煙滾滾，烈焰騰騰，烤炙得人們不能靠近。步兵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師政治部副主任鄭萬增指揮官兵沖上去，撲向燃燒的汽車。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官兵先將拼命阻攔的民眾強行趕走，抗拒者格殺勿論。然後，偵察營營長李連春一聲令下：“沖上去，推開它！”官兵們有的用手推，有的用肩頂，有的用棍撬，把一輛輛燃燒的汽車推到路邊，為後續部隊打開了通道。

抵達復興門立交橋時，官兵們已十分疲乏，強撐著排除路障。就在此時，從立交橋南側傳來轟隆隆的馬達聲。不一會，步兵第 112 師裝甲車隊的 18 輛裝甲車一輛接一輛地沖上立交橋。這些裝甲車由北京軍區裝甲兵部和步兵第 112 師的各一位參謀、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副團長黃光雄率領，從北京南郊的東高地趕來，正好與集團軍主力部隊在此處會合。一見到裝甲車出現，官兵們都高興地跳起來，熱烈鼓掌歡呼，有的官兵甚至激動地振臂高呼：“紅軍團萬歲！”顯然，這些裝甲車屬於“紅軍團”——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副政委陳培民看見裝甲車上來，也十分高興，親自對步兵第 112 師裝甲車隊的帶車參謀交待任務：“你們在前頭為步兵開路，速度不要太快，不要把步兵丟了，繼續向前開吧！”

此後，裝甲車隊成了開路先鋒。在鋼鐵龐然大物面前，手無寸鐵的民眾確實無計可施。一輛輛裝甲車滾滾向前，撞開路障，壓倒欄杆，排障隊的官兵緊跟著清理路面，人車互相掩護，前進速度大大加快。

裝甲車隊中有一輛編號 229、臨時代號為“西安 5 號”的裝甲車，這是一輛營級裝甲指揮車，車上有 10 名乘員，指揮官是步兵第 334 團某營軍醫穆瑞祥上尉。該營營長在出發前緊急調往 003 號裝甲指揮車，陪同步兵第 112 師副師長佟喜剛和北京軍區裝甲兵部副部長解雙喜。6 月 3 日晚上 7 點鐘，該營營長臨時對軍醫穆瑞祥交待任務說：“團部決定，營部 229 號裝甲車交由你指揮，帶領全營向天安門廣場指定位置開進。”他沉思了片刻又說：“我知道你很擔心，自己是醫生，不懂指揮，但情況緊急，已經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了。趕快準備一下吧。”就這樣，軍醫穆瑞祥默默地領受了帶車指揮任務。

此時，軍醫穆瑞祥所乘坐的裝甲車和副團長黃光雄所乘坐的裝甲車共同處在裝甲車隊的前端，分別在西長安街的左右兩翼為部隊開路，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不到幾分鐘時間，裝甲車隊就以勢不可擋的力量衝開了十幾道路障。其間，有三輛正在熊熊燃燒的公共汽車橫放於西長安街上，把整個道路全堵死了。“撞開它！”步兵第 112 師參謀長馮兆舉一聲令下，穆瑞祥和黃光雄分別乘坐的兩輛裝甲車同時開足馬力向路障衝擊，很快便將攔路的公共汽車撞到路邊。

部隊開進到了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那裏橫放著十幾輛燃燒著的汽車，濃煙烈火封鎖了整個路口，令人難以靠近。官兵再次被迫停下來。代軍長張美遠命令裝甲車上去撞開火障。先上去一輛裝甲車沒能撞動，又調上去一輛裝甲車。兩輛裝甲車同時開足馬力，把左側的公共汽車撞到路口東北角上，打開了通道。部隊迅猛通過，很快推進到新華門前。

新華門是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的所在地中南海的南門，一群學生和市民正集聚在新華門前呼喊抗議屠殺的口號，有的還憤怒地用石塊、瓶子襲擊警衛部隊。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官兵兇猛地撲上前去，以嫺熟的擒拿格鬥技術迅速制服了民眾。一隊警衛部隊官兵跑出新華門，高舉槍支歡呼跳躍，有的還對空鳴槍，歡迎第 38 集團軍部隊的到來。第 38 集團軍的官兵也

都群情激奮，高呼口號，濃烈的會師之情洋溢在新華門前。

6月4日凌晨零點50分鐘，第38集團軍先頭部隊抵達六部口，這裏是通往天安門廣場的最後一道障礙。官兵們開槍驅散了數千名不肯離去的民眾，拆除了由五輛燃燒著的公共汽車和鐵柵欄所組成的路障，導引後續部隊陸續通過。

6月4日凌晨1點30分，第38集團軍先頭部隊抵達天安門城樓前。緊接著，10800名官兵、45輛裝甲車和數百輛軍車陸續抵達，集結在天安門城樓的金水橋前。作為成建制的部隊，第38集團軍第一個開進天安門廣場，為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立下了首功。在步兵第113師某團第3營官兵的簇擁下，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通過軍用電臺，情緒激動地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報告了部隊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喜訊”。

6月4日凌晨1點45分，坦克第6師前進指揮部率領坦克第21團和高射炮兵團到達天安門廣場。該師基本指揮部、直屬分隊、坦克第24團也分別於6月4日凌晨4點30分、清晨7點20分抵達天安門廣場。該師其餘部隊則開進到軍事博物館一帶集結待命。

坦克第6師師部在北京市昌平縣（現為北京市昌平區）南口鎮，下轄坦克第21團（當時部隊代號“52876”）、坦克第22團（當時部隊代號“52886”）、坦克第24團（當時部隊代號“52880”）、裝甲步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341”）、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344”）、高射炮兵團。該師部隊駐地分散，距離天安門廣場較遠。

步兵第113師的有關記載聲稱：“軍事博物館至天安門廣場不足10里地，足足用了4個小時。官兵勇猛前進，與兄弟部隊一起連續衝破8個主要路口人群的瘋狂圍攻，排除了3百多道暴徒用水泥隔離墩、交通鐵欄杆、各種車輛設置的路障、火障，1200多人負傷，其中90多人住院。”

王福義說：從公主墳到天安門廣場，實際距離只有7公里左右，第38集團軍卻走了整整4個小時，這是怎樣的4小時啊！沿途冒著“石雨”，排除燃燒的汽車有數十輛之多，清理各種路障數百處，後來統計，一路有5千多名官兵被打，千余官兵受傷，很多車輛都程度不同地受到破壞。但我們畢竟沖了過來，

頑強地沖了過來。

【注釋 1】參見題為《零號行動》的文章，作者：上校團長李少軍，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注釋 2】見於《太陽系裏一顆星----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幹事王強》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

第七節、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在北京軍區的軍事行動計畫和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的具體部署中，步兵第 112 師裝甲車隊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挺進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承擔破障開路的任務，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顯示威懾作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負責巡邏任務。其任務完成得如何，關係到整個第 38 集團軍部隊行動的成敗。

裝甲車隊官兵來自于“紅軍團”——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集結地在北京豐台區東高地（北京軍區裝甲兵營地，位於南苑機場附近），最高指揮官（裝甲車隊隊長）是步兵第 112 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北京軍區裝甲兵部副部長解雙喜大校作為北京軍區派遣的“監軍”，與佟喜剛共同乘坐 003 號裝甲指揮車。裝甲車隊的每一個分隊也都有北京軍區裝甲兵部人員隨隊監督，並由北京軍區通信團負責裝甲車隊的通訊聯絡，以便控制。

按照戰時慣例，裝甲車隊的每一輛裝甲車都取了臨時代號。003 號裝甲指揮車的代號是“長江”，步兵第 112 師技術部部長趙滿圈乘坐的裝甲車代號是“黃河”，其他裝甲車的代號依次編為“西安 1 號”、“西安 2 號”、“西安 3 號”……。

步兵第 112 師指揮部為裝甲車隊制定了四套開進方案，並確定了一條應變原則：一旦受阻，各分隊各裝甲車自行選擇開進路線，一定要按時到達天安門廣場。因此，後來當裝甲車隊在開進途中遇阻時，副師長佟喜剛和李勃上尉分別指揮單車奪路開進，先於大部隊近兩個小時進入天安門廣場。

003 號裝甲指揮車上總共有 8 名乘員：佟喜剛、解雙喜、步兵第 112 師通信參謀邱成上尉、步兵第 112 師一個上尉營長、北京軍區裝甲兵部一個中尉參謀、駕駛員趙斌、北京軍區通信團報務員葛明軍。北京軍區通信團派往裝甲車隊負責通信聯絡的還有技術尖子曹文良、劉建紅，他們均攜帶了精心準備的通信器材和密語文件。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7 點 30 分，裝甲車隊召開各裝甲車帶車指揮官會議，隨後又召開全體官兵誓師動員大會。在誓師動員大會上，佟喜剛情緒激昂地發佈動員令：“同志們！我們是

紅軍團的後代，八年抗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唐山抗震救災……在歷次的重大任務中，我們都能圓滿出色地完成任務。現在我們的黨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把這樣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我們，是對我們全體官兵的高度信任，我們決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堅決完成任務。祝大家出師順利，馬到成功！”

晚上 10 點 30 分，佟喜剛下達了開進命令。20 分鐘後，裝甲車隊的第一輛裝甲車——322 號裝甲車啓動出發。裝甲車隊剛出駐地就遭遇到民眾的阻攔，但人數不是很多，攔截失敗。

裝甲車隊開進的路線，事先已經勘察了又勘察，開進的方案，事先已經選擇了又選擇。不過，情況瞬息萬變，出發不久，原定開進路線上的一個路口被人群堵死了，以變應變，指揮官佟喜剛臨時決定從一條小路迂回穿過。

裝甲車隊駛抵北京市豐台區的蒲黃榆大橋，算是進入了北京市區，此處圍堵的民眾不計其數，男女老少，蜂擁而來。003 號裝甲指揮車駕駛員趙斌一看眼前這種陣勢，真有點害怕了。路中間人潮洶湧，組成一道道厚厚的人牆，有的扔石頭，有的掄棍棒，有的高喊口號，還有一些民眾在蒲黃榆大橋上往裝甲車扔水泥墩子，這真是上有埋伏下有阻擊。裝甲車隊越來越逼近人牆，民眾絲毫沒有退卻的跡象。佟喜剛命令繼續前進，趙斌加大油門，轟鳴聲震耳欲聾，裝甲車朝著人牆沖去，一直到接觸到人牆都沒有停下來，民眾被迫散開了，003 號裝甲指揮車沖過了蒲黃榆大橋。

爲了便於機動，佟喜剛下達命令：按照預定方案，通知 011 號裝甲車，分頭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該命令通過電臺迅速傳達下去。從蒲黃榆大橋上下來，裝甲車隊分爲左右兩路，003 號裝甲指揮車率領右路車隊，抄近路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左路車隊則由 011 號裝甲車領隊。

003 號裝甲指揮車行駛到北京市崇文門區的崇文門。這裏是鬧市區，民居密集，距離天安門廣場又近，參與圍堵的民眾更多，來回湧動的人群，發出一陣陣排山倒海似的叫喊聲，令人難以聽得清楚。003 號裝甲指揮車毫不猶豫，逼開一群群試圖阻攔的民眾，越過一個個路障，繼續快速地行駛。

前方又是一處大障礙，路中央有3輛無軌電車排列成“品”字形攔腰擋住去路，車上坐滿了激情叫喊的民眾，車障兩邊擠滿了手拉手的民眾。駕駛員趙斌不知如何是好。衝撞吧，裝甲車的前沿太低，很難把高出它好幾米的無軌電車撞倒。再說，即使撞倒了，裝甲車也爬不過去。不衝撞吧，死路一條。最後，他決定只能衝撞，即使撞不倒無軌電車，也會把車子上下的民眾嚇跑。於是掛倒擋，先是後退，然後加大油門猛烈前沖，“當！”的一聲巨響，無軌電車晃了晃，原地未動。裝甲車再次倒車，加大油門又是一次猛烈的衝撞，無軌電車仍然只是晃了晃而已，可就是這一晃起了作用，車上車下的民眾一見瘋狂的裝甲車來真格的，終於害怕了，趕緊紛紛奪路而逃。

003 號裝甲指揮車終於闖過了崇文門，但跟隨其後的 6 輛裝甲車卻受到阻隔，沒有跟上來。佟喜剛與解雙喜簡短商議後下令：後續的裝甲車迅速排障跟進。

此後，003 號裝甲指揮車孤車突進，從前門行駛到東單，拐過東單，轉眼就來到了東長安街上。東長安街上，路障有增無減，一個挨一個，幾乎是每隔 10 多米就有一處路障。人群也更為密集，一批又一批地湧動著。003 號裝甲指揮車一路快速行駛，強行衝撞，向前開進。

6 月 3 日深夜 11 點 40 分，003 號裝甲指揮車終於抵達開進目的地——天安門廣場，圍繞天安門廣場轉了好多圈，等待後面的裝甲車隊。

6 月 4 日凌晨零點 20 分，003 號裝甲指揮車停留在天安門城樓前金水橋東側的預定位置。直到此時，後面的裝甲車隊仍然不見蹤影，沒有一輛裝甲車跟上來。

裝甲指揮車剛一停下，佟喜剛就對通信參謀邱成下達命令：“與後面車隊聯繫，告訴他們我們已經到達預定位置。”邱成通過電臺開始呼叫：“黃河，黃河，我是長江，我是長江，我已到達金水橋指定位置，命令你加速前進……”任憑他喊破了嗓子，根本就聽不到回應。邱成憑經驗判斷：電臺機身不見故障，肯定是露在裝甲車外的天線被民眾拆除了。

轉眼之間，湧來了無數民眾，一下子就把 003 號裝甲指揮車圍了個水泄不通。人們狂怒地吼叫著，拼命往前擁擠，有人開始用磚頭、石塊、鐵棍、木棒攻擊裝甲車。

佟喜剛心中一驚，知道情況不妙，孤車繼續呆下去肯定會出事，於是命令駕駛員趙斌繼續前進，從天安門城樓的第三個城門洞闖過去。裝甲車剛一發動，就聽到“啪嚓”一聲響，趙斌的潛望鏡被打碎了。趙斌焦急詢問：“看不見怎麼辦？”佟喜剛回答說：“慢速行駛，聽我的，我看得見。”

趙斌急速動作，加油，掛擋。發動機突突猛響，裝甲車卻一動也不動。佟喜剛著急地詢問：“怎麼了？！”趙斌慌了，握住操縱杆的兩手只是機械地重複著加油、掛擋的動作，一連四次，裝甲車還是一動不動，發動機熄火了。原來是裝甲車撞到路障上，民眾趁機將 20 多根鐵棍、鋼筋插進了裝甲車的負重輪和誘導輪，把輪齒卡死了。趙斌驚呆了，頭上、身上的汗水象水洗一樣。車上所有的人也都驚呆了，一雙雙瞪大的眼睛像是在互相詢問，盼望著誰能有個好主意。這時，有人爬上了裝甲車，把車身敲得叮噠響，有人捂潛望鏡，有人堵排氣孔，試圖逼迫裝甲車中的軍人們出來。

“車裏進煙了！”聽到裝甲車內的這一聲喊聲，佟喜剛猛然抬頭，正好看見一個身穿藍色上衣的年輕人手提土制燃燒瓶往裝甲車上爬，身後還有一群助威的民眾。瞅著這陣勢，佟喜剛儘量使自己冷靜下來，快速思索著對策。看來，與其在車上坐等燒死，倒不如爭取主動下車，與民眾對話，或許能夠緩和一下局勢。佟喜剛扭頭與解雙喜商量，說：“你在車上組織滅火，及時下車脫身，我下去解釋幾句，看能否保住我們這台車。”

佟喜剛從裝甲車後門下去，沖著人群叫喊：“同學們，市民們，我們是來執行戒嚴任務的，不是來鎮壓……”話沒說完，迎頭就挨了一棒，敲得他眼冒金花。緊接著，有磚頭、瓦塊、瓶子往他的頭上、身上砸落，根本就沒有再張嘴的機會。陸續下車的軍人也遭到毆打，一些民眾已經被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的行為所激怒。幸虧有一些學生奮不顧身地站出來保護軍人，護送他們離開現場，將佟喜剛等受傷軍人送往醫院。爲了保護這些軍人，有學生被憤怒的群眾所誤傷，頭破血流。

003 號裝甲指揮車最終在金水橋東側被燒毀。【注釋 1】

最先到達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並不是 003 號裝甲指揮車，而是 322 號裝甲車。作爲裝甲車隊的首車，322 號裝甲車擔負著開路任務，該車指揮官是步兵第 112 師技術部修理科的助理員、

助理工程師李勃上尉。裝甲車隊首車的指揮官竟然不是軍事主管，而是一名技術人員，看起來令人不可思議，其實是精心安排的結果，李勃根紅苗正，15 歲參軍，其父曾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部負責人。加上他生長於北京，熟悉北京路況，既可以勝任帶路的任務，一旦受阻又可以利用一口京腔拉近與北京市民的距離。後來也正是憑藉李勃的上述優勢，322 號裝甲車才能率先抵達天安門廣場，而且沒有象 003 號裝甲車那樣被民眾焚毀。

出發前幾個小時，李勃曾奉指揮官佟喜剛之命，化裝進入北京市區勘察開進路線。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使李勃認識到，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必有一場惡戰，裝甲車隊首車的任務更是艱巨。

連同指揮官李勃在內，322 號裝甲車上共有 9 名官兵。6 月 3 日晚上 10 點 50 分，322 號裝甲車率先出發。出發不久，車上的 714 型電臺報務員就向李勃報告，電臺發生故障，無法對外聯繫。

李勃指揮 322 號裝甲車左轉右拐，專撿民眾不多的小路行駛，從金鐘寺上了南三環路，西行到北京市豐台區劉家窯立交橋。就在此時，排在行進序列第三位的裝甲車走錯了路，從劉家窯西面進入南三環路，引導後面的裝甲車向南三環路的木樨園方向駛去。根據部隊偵察員白天偵察結果，木樨園立交橋已有大批民眾把守，路障重重，很難通過。於是，李勃指揮 322 號裝甲車折返北上，沿著北京市豐台區蒲黃榆路開進，當他將身體探出車外，看到後面只跟隨著一輛裝甲車時，下意識地連聲喊道：“糟了！糟了！”

電臺發生故障，無法與裝甲車隊聯繫；擇路返回追趕裝甲車隊，後面的道路又已被人群封鎖。李勃決定繼續北上。322 號裝甲車經過蒲黃榆橋，行走北京市崇文區天壇東路，環繞天壇公園，西駛到北京市宣武區天橋，爭取在天橋與有可能從北京市崇文區永定門大街北上的裝甲車隊匯合。

332 號裝甲車往北行駛，圍堵的人群越來越多，設置的路障也越來越密，開始有民眾向裝甲車投擲石塊、汽水瓶。332 號裝甲車穿過了蒲黃榆過街天橋，民眾用隔離墩、鐵欄柵、垃圾桶組成“S”形路障，擋住去路。李勃命令駕駛員彭加剛開足馬力，衝破路障前進。這時，原先跟隨在後面的唯一一輛裝甲車

也不見蹤影了。

到達北京市宣武區的天橋十字路口，李勃命令駕駛員彭加剛停車，但他望眼欲穿，也沒有看見南面的永定門內大街上有裝甲車的影子。停車等了不到一分鐘，李勃感覺上仿佛過了一個小時。這時，人群從前門大街方向叫喊著向天橋這邊湧過來，李勃只好命令彭加剛開車繼續前進。

322 號裝甲車經過北京市宣武區虎坊橋十字路口，右拐彎向南新華街方向行駛。在瓷器口南端，一個身穿白襯衣的青年突然向探身車外指路的李勃投來一個瓶子，李勃一躲閃，瓶子砸在高射機槍上，冒出一股白煙，有幾滴水一樣的東西濺到他的胳膊上，感到燒灼的疼痛。李勃覺得可能是鏟水。

在北京市宣武區和平門十字路南口，有十多輛大型公共汽車夾雜著其他車輛，組成若干個“品”字形路障，將十字路口四個方向的通道都堵得嚴嚴實實的。駕駛員彭加剛有些慌張了，連忙詢問：“怎麼辦？”李勃命令他加足油門，強行衝撞過去。裝甲車一次又一次地撞擊，一次又一次地熄火。在猛烈的撞擊中，姓郭的副駕駛員頭部撞傷，血流滿面。

李勃觀察到，全聚德烤鴨店門口的路面上，只有一輛公共汽車被當作路障，於是指揮彭加剛向右打方向盤，猛踩油門，裝甲車爬上人行道，沖散了圍堵的人群，而後左打一把方向盤，猛衝過去，攔路的公共汽車側翻過去，讓出一條夾道，322 號裝甲車呼嘯著奪路而去。

就這樣，322 號裝甲車闖過重重阻攔，單車經過蒲黃榆、天橋、虎坊橋、瓷器口、和平門等地，歷經一個小時，於 6 月 3 日晚上 11 點 32 分從正陽門東側駛入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上突然出現鋼鐵龐然大物，人群一下子炸了窩，面對高速行駛的 322 號裝甲車，不少人慌亂地向天安門廣場的中心地帶跑，有幾個女學生甚至驚嚇得哭叫起來。學生們料想不到裝甲車會來到天安門廣場，出現在自己的身邊。

過了不久，有幾個膽大的年輕人從遠處的人群中沖了出來，尾隨著 322 號裝甲車叫罵，越來越多的人跟隨上來。322 號裝甲車沒有減速，一邊逼開圍堵的人群，一邊尋找部隊。圍著天安門廣場轉了兩圈，也沒有發現部隊的影子。李勃估計部隊肯定在開進途中受阻了，就讓彭加剛開車去崇文門、宣武門

一帶迎接部隊，爲部隊開闢通路。可是，到了崇文門和宣武門也沒有找到部隊，李勃索性又讓彭加剛將裝甲車駛回天安門廣場。

322 號裝甲車再次進入天安門廣場，人群憤怒地對著它叫喊：“法西斯，滾回去！”“劊子手，滾回去！”有一個手拿半導體喇叭的年輕人高聲警告道：“快滾回去！不然就燒了你的車！”李勃只好命令彭加剛開車離開天安門廣場，行駛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停下。裝甲車剛一熄火，四周就有黑壓壓的人群圍上來，有的叫罵，有的投擲各種硬物，有的爬上車頂拆卸高射機槍。

李勃拿起話筒，從裝甲車的射擊孔向外喊話：“大家不要砸車，讓我出來說幾句話好不好？”車外有個男子叫喊回應：“別聽他的，出來就砸死他！”

突然，“嘩啦”一聲響，裝甲車右邊的履帶板被人卸了下來，落到了地上。李勃心想：他們要毀車。李勃對準潛望鏡，想看看外面的情形究竟如何，可是，裝甲車頂端的 11 塊防彈玻璃已經全部被搗碎，視線無法望出去。

裝甲車外又有人呼喊：“快拿汽油來！”“找火點呀！”不久，汽油從裝甲車的加油口咕嘟咕嘟地流進車內，澆在步兵艙內的幾個士兵身上，車內的背包和衣服都被汽油濕透了，如果外面的人一點火，裝甲車裏的人就全完了。

李勃讓姓胡的技術員用滅火器對準裝甲車的加油口，隨時準備滅火。考慮再三，李勃覺得還是應該出去與群眾對話，緩和一下矛盾，這才是上策。李勃剛從裝甲車的指揮視窗伸出頭來，一些民眾就用磚頭、石塊砸他。李勃事後聲稱，他當時看到裝甲車邊一個身穿黑衣黑褲的大個子，手握一根兩米多長的棒子，看到自己戴著鋼盔，氣勢洶洶地說：“嘿，還有不怕死的，讓你嘗老子的金箍棒！”說時遲那時快，大棒掄下，李勃的腦袋嗡地一聲，一陣暈旋，癱倒在裝甲車裏。清醒過來後，他又向外喊話：“同學們，市民們，我也是北京人，看在老鄉的面上，讓我出來與大家講幾句話行嗎？”這時，一個高個子青年和一個身穿短袖衫的中年人已經爬到車頂，站到李勃身邊，並向周圍的民眾說：“大家靜一靜，讓他說話。”

現場氣氛逐漸緩和下來，李勃想到裝甲車上還有一位頭部

受傷的副駕駛員小郭，急需送醫急救，就向周圍的民眾說明情況，請求協助將副駕駛員小郭送往醫院。

一個胸前佩戴校徽的大學生對李勃說：“我可以幫你，把傷患送往急救中心。”又有兩名學生和一個市民湊上前來，也表示願意幫助，於是，郭姓副駕駛員很快就被送到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設置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臨時救護站。

受傷的副駕駛員送走後，李勃感到輕鬆了許多，下一步就剩下保護裝甲車的問題了，於是對民眾們說：“我是北京人，咱們北京人都是精明的，大家想想，燒了裝甲車，對大家有什麼好？”李勃想說服周圍的民眾。

“不好，也得燒。”這時人群中有人說。

“不能燒！這是國家的財產，我們人在車在，請大家理解我的話！”李勃說。

站在李勃身邊的那個高個子年青人，低聲地對他說：“你還是去找北高聯吧，他們的話管用。”李勃覺得此話有理，就讓連長王旭忠和兩名士兵留下來護車，自己帶著其餘的四位軍人前往天安門廣場找北高聯。

在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一座帳篷裏，一個穿著天藍色襯衣、學生們稱之為“008 號”的學生負責人接待了李勃。經過協商，“008 號”同意派人保護 322 號裝甲車和乘員。於是，5 名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跟隨李勃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說服一些民眾保護裝甲車。就這樣，322 號裝甲車終於沒有被焚毀，車上的槍支彈藥無一遺失，全車乘員除了副郭姓駕駛員受傷被送走外，其餘 8 個人都在原地堅持了下來。

6 月 4 日凌晨 1 點多鐘，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兩位負責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 322 號裝甲車的全體乘員，其中一位負責人緊緊握住李勃的手，高興地說：“你們任務完成得很好，是開進天安門廣場的第一輛裝甲車，顯示了很大的威力，給了一小撮歹徒很大的震懾，我們馬上通報戒嚴部隊。”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30 分，裝甲車隊右路分隊的 18 輛裝甲車從西長安街隆隆地開到了天安門城樓前。322 號裝甲車回歸裝甲車隊序列，參加了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事後，李勃被中共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注釋 2】

裝甲車隊的其他裝甲車，在與 003 號裝甲指揮車脫離後，

按照原定方案，各自擇路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右路分隊在復興門立交橋與集團軍主力部隊會合，承擔起破障開路的任務。左路分隊在師技術部部長趙滿圈的率領下經過位於豐台區の木樨園立交橋時，遭遇到民眾的強力圍堵。中國軍方的資料聲稱，水泥墩子、石頭、磚塊冰雹似地從橋上砸下來。由於夜間視線不良，裝甲車都是開窗駕駛，駕駛員的頭部伸在車外，當即就被砸傷了好幾個。

左路分隊被迫停止前進。人群呼啦一下蜂擁而上，把裝甲車隊分割包圍起來，有的爬上裝甲車邊砸邊叫，有的卸下掛在裝甲車外的鋼絲繩纏在裝甲車的主動輪上。民眾攔住五輛路過的大卡車，開到裝甲車隊前並排停下，增加路障強度。

趙滿圈急忙與裝甲車隊隊長佟喜剛聯繫，盼望能得到指示或援助。然而，任憑他喊破嗓子，報話機裏也聽不到一點回音。趙滿圈著急壞了，被圍堵在途中，又與上級失去聯繫，耽誤了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怎麼辦？

後來，步兵第 112 師司令部科長彭應求主動出面，威脅圍堵的民眾說：“如果誰不聽我的勸告，影響我們執行任務，那我們就不客氣了。”說著說著，他拿過身旁一位士兵的衝鋒槍，對人群舉了舉，又繼續威脅道：“我們子彈已經上膛，一旦槍響，10 米內我們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隨後帶兵作勢要登記過路五輛大卡車司機的姓名資料。這一招還果真有效，五輛大卡車司機開車離開了，不少民眾也被嚇退。趙滿圈乘機命令裝甲車隊繼續前進，最終按時抵達天安門廣場。

【注釋 1】參見《浴血金水橋》一文，作者：大校副師長佟喜剛等人，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注釋 2】參見《第一輛裝甲車開進廣場》，作者：上尉助理工程師李勃，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第八節、天安門廣場清場前的“談判”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曾出現過富有戲劇性的一幕，那就是臺灣著名作詞作曲家、歌星侯德健和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畫部部長、社會學博士周舵作為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四君子”的代表(另外兩人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文學博士劉曉波，北京師範大學原《北師大週報》主編高新)，出面與解放軍戒嚴部隊談判，希望讓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數千名學生和平撤離。

侯德健等人本來希望學生領袖們支持並參與“談判”，但未能說服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和副總指揮封從德、李錄等人。因此，“談判”只能算是“四君子”的行爲，而不能代表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數千名學生。

6月4日凌晨2點30分，一輛乳白色救護車從天安門廣場南面向北駛來，靠近正在天安門廣場北側集結待命的第38集團軍部隊。一些士兵呼喊道：“面包車，快瞧！過來一輛面包車。”在此處待命的部隊是步兵第112師步兵第336團。這時，該團團長赫飛上校也發現了迎面駛來的面包車，連忙對身邊的幾個士兵說：“快！截住它。”

幾個士兵端槍指著迎面駛來的面包車，大聲叫道：“別過來，趕快回去！”救護車“吱”地一聲，急剎車停住了，而後又掉頭順原道往回開。大概是車上的人發現軍人並沒有開槍和追趕，車子很快停了下來，距離官兵集結地點50多米。從車上下來四個人，高舉著雙手向官兵這邊走來，其中一個邊走邊喊：“別開槍！你們別開槍！！我是侯德健！！！”

赫飛和團政治處主任王劍帶著幾名警衛員走過去。一個警衛員拿手電筒照了一下其中一個戴眼鏡的人，旁邊的一個醫務人員連忙指著被照的人介紹說：“他是侯德健！”

此時，該團政委季新國上校也走上前來，看著侯德健。侯德健將右手按在胸前，慢條斯理地說：“我是侯德健。”聽說來人是侯德健，不少士兵紛紛好奇地圍上來，都想看看這個以一曲《龍的傳人》而轟動藝壇的臺灣歌星。

侯德健身穿茄克衫、牛仔褲，戴著眼鏡，留著長髮，手裏

還提著一個大塑膠兜。與侯德健同行的三個人，一個是周舵，另外兩人是醫務人員，他們都身穿白大褂，胸前印有“協和醫院”的紅色字樣。

一個士兵擠到侯德健面前，有些不明白地問道：“侯德健怎麼跑這兒來了？”另一個士兵又用手電筒在侯德健的臉上晃了一下。可見士兵們並不知道侯德健等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侯德健用手推了推眼鏡，沒有回答士兵好奇的詢問。赫飛對好奇圍觀的士兵們說：“你們都回去，別在這兒瞎嚷嚷。”

雙方經過一番交談，赫飛等人才知道侯德健是來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絕食四君子”之一。他看天安門廣場周圍佈滿了解放軍戒嚴部隊，不希望再發生流血事件，爲了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數千名學生的安危，便被“絕食四君子”推舉爲談判代表，希望解放軍戒嚴部隊給學生留出一條撤退通道。

赫飛馬上前往金水橋前的步兵第 112 師指揮部報告情況。這時，侯德健趕緊對季新國等人解釋：“你們可別誤會，我們是想帶領學生隊伍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的。”王劍接話說：“你們早就該撤離了。”“是的，是的，我們正準備撤。”侯德健連忙說。

王劍看了季新國一眼，將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故意一字一頓地說：“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們再不撤，我們就不客氣了！”侯德健知道“不客氣”的含義，說：“撤，我們這就撤！”

一個士兵插話說：“說走，你現在就走啊。”侯德健說：“我一拍屁股就走，可天安門廣場上還有幾千名學生，不大合適。”他又對季新國說：“天安門廣場上好多學生現在都想撤，可都有顧慮，想讓你們給指一條撤退的路。”侯德健說“好多學生現在都想撤”，不符合實情，當時還不走的數千名學生是決心堅守到底的。

正說著，赫飛帶著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一位姓顧的副處長一同來了。劉興貴和姓顧的副處長聽了情況彙報後，建議步兵第 336 團派一名負責人到金水橋上直接向北京軍區負責人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請示彙報。季新國等人正在商量誰去的時候，劉興貴插話點了名：“老季去！”

季新國立即跟隨劉興貴、顧副處長到了金水橋上，向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副政委陳培民做了全面彙報，並說明侯德健表示願意做學生的撤離工作。北京軍區領導人指示：“他們自動撤，我們歡迎！”第38集團軍一位領導人補充說：“讓他們向東南方向走。”季新國和顧副處長迅速回到步兵第336團部隊集結地點，研究決定由季新國出面與侯德健談話。

在原地等待回話的侯德健，一見季新國等人回來，連忙迎上來，一邊用手帕擦著滿臉的汗水，一邊急切地問道：“讓我們從哪兒撤？”季新國回答說：“剛才，我請示了戒嚴部隊指揮部，歡迎你們自動離開天安門廣場，你們可以從東南角走，請你回去，馬上告訴他們。”侯德健連忙說：“可以，可以。”但隨即又問：“你敢保證不向學生開槍？”季新國回答說：“戒嚴部隊來首都都是為了維持秩序的，決不會向學生開槍。”侯德健從茄克衫裏掏出紙和筆，將季新國告訴他的話記了下來。

季新國在與侯德健、周舵等人接觸時曾明確地說過：“上級命令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在天亮前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天一亮，市民出來，事情就不好辦了。這一點，你們應該能夠理解。”

侯德健等人回到紀念碑底座，不一會兒，季新國就聽到從學生組織廣播站的喇叭裏傳來侯德健的講話。斷斷續續地聽到他說什麼“精英”、“勝利”之類的話。這時，從紀念碑底座傳來一個男學生聲嘶力竭的聲音：“……我們不能撤……誰撤……誰是叛徒！”

侯德健等人帶領數千名學生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的美好願望最終並沒有實現，就在他和劉曉波等人通過學生組織廣播站動員說服學生們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時，由陸軍第27集團軍的特遣分隊已經奉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之命，持槍沖上紀念碑底座，開槍擊毀了學生組織廣播站喇叭，搗毀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開始武力驅逐學生隊伍。

第九節、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在第 38 集團軍部隊抵達金水橋時，那一帶槍彈橫飛，人群四散。不久後，成千上萬的民眾又開始集結，紛紛向臨近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南池子路口（位於東長安街）和臨近天安門廣場西北角的南長街路口（位於西長安街）集結，試圖沖入天安門廣場，聲援堅守在紀念碑一帶的數千名學生。

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按照北京軍區的統一部署，派遣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3 師部隊分別在南池子路口和南長街路口附近設置了警戒線，堵住從東、西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路口，並牢牢地控制住警戒線。同時，派遣坦克第 6 師部隊的兩個團對金水橋至故宮午門地段進行了清理，驅逐民眾，堵住東、西故宮關門，設置了警戒線，阻止民眾從故宮方向由北往南進入天安門廣場。從而完全切斷了天安門廣場北部的內外聯繫，使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的數千名學生陷於孤立的境地，確保了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順利進行。

步兵第 112 師屬下的四個團和 18 輛裝甲車迅速在天安門城樓前面成東西一線展開，另外的兩個團和師直屬隊在南池子路口南北一線展開形成對南、對東兩個正面防禦，防止東長安街上的大批群眾沖入天安門廣場，造成即將清場的態勢。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整，天安門廣場熄燈。中國官方事後說，這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實施天安門廣場行動的預先號令。凌晨 4 點 30 分，天安門廣場重新亮燈。中國官方事後說，這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動手實施天安門廣場行動的號令。就在重新亮燈之際，在北京軍區的統一號令下，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工兵團和步兵第 112 師，組織 42 輛裝甲車，共計兩千余名官兵，與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部隊一起，由北向南隆隆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推進。

6 月 4 日清晨 5 點 30 分，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各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會合，其中包括空降兵第 15 軍、第 38 集團軍、第 63 集團軍等部隊。

緊接著，第 38 集團軍的裝甲車在步兵的引導下，驅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一直推進到天安門廣場南面的正陽門以

南，並迅速在正陽門一線建立了警戒線，完成了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前後，一直有大批的學生和民眾不顧自身安危，在南池子路口和南長街路口附近衝擊第 38 集團軍部隊所設置的警戒線，試圖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

到了 6 月 4 日凌晨 5 點 30 分以後，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已經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武力驅逐下，被迫從天安門廣場的東南角撤走。但是，被擋在南池子路口以東的民眾並不知道這個情況，仍然堅持不走，與警戒線上的第 38 軍部隊官兵對峙。

從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30 分到清晨 7 點鐘左右，被擋在南池子路口以東的民眾多次逼近第 38 集團軍部隊設置的警戒線，試圖進入天安門廣場，全副武裝的部隊官兵時不時開槍射擊逼近警戒線的民眾，每一次開槍射擊過後，東長安街上總會躺下一些中彈傷亡的民眾。一些志願醫務人員堅守在南池子路口附近，及時搶救受傷民眾，並用救護車將受傷民眾送往協和醫院和北京醫院救治。

據多位現場目擊者證實，第 38 集團軍部隊在南池子路口開槍不斷，殺死殺傷不少民眾。殺紅了眼的軍人甚至一度端槍沖入南池子路追殺民眾。

南池子路口一帶的殺戮情況十分慘烈，第 38 集團軍部隊官兵至少四次大規模地開槍掃射民眾，民眾死傷慘重，死亡的人數僅次於西長安街。在筆者的另一本書《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中有詳實的記錄，收錄了多名現場目擊者的文章。

第十節、天安門廣場清場後的動向

1989年6月4日清晨6點鐘過後，解放軍戒嚴部隊雖然完成了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佔領了天安門廣場，但並沒有控制住北京市區，掌控的區域僅限於天安門廣場，以及天安門廣場西至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地段，東至東長安街上的南池子路口，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活動受到很大限制。

6月4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以外的北京市各處，成千上萬的民眾並沒有停止抗議活動。在西單路口以西的西長安街上，到處都是人群，到處都是燃燒著的軍用和民用車輛，升騰的濃煙籠罩著北京市區上空，垃圾桶、交通隔離墩、鐵欄杆和燒毀的車輛殘骸，密佈在街面上。

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命令第38集團軍出動部隊前往西長安街，排除路障，疏通交通。北京軍區也要求第38集團軍進行反封鎖、反包圍的部署。

根據上級命令，步兵第112師調動步兵第335團的10輛裝甲車和400余名官兵，組成裝甲巡邏隊，在坦克第6師坦克第24團10輛坦克的配合下，在天安門廣場至復興門立交橋近10公里路段的西長安街上晝夜武裝巡邏，並清除了西單路口、復興門立交橋、木樨地、公主墳等處數十輛被民眾當作路障的車輛，以及其他一百多處的大小障礙物，打通了西長安街通道，保障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車輛通行。

與此同時，第38集團軍組成守點部隊，在復興門路口風餐露宿，堅守了54個小時。

6月5日，步兵第112師指揮部調動步兵第334團的500多名官兵和10輛裝甲車，在坦克第6師坦克第24團的12輛坦克配合下，組成裝甲巡邏隊，在該師參謀長馮兆舉率領下，冒著大雨和民眾的不斷襲擊，闖過了兩道燃燒的公共汽車火障，孤軍前出，到達復興門立交橋，從民族文化宮地下室搶救出被民眾圍困了3晝夜的82名武裝警察部隊官兵，護送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記者到西單東側拍攝第63集團軍直屬通信團第4連第1排排長劉國庚遇害情況的錄影，又帶領師醫療隊收回了劉國庚遺體。在2天3夜的守點過程中，在斷糧1天的情況下，

粉碎了民眾的四次襲擊和阻攔，保障了西長安街和復興門立交橋的交通暢通，也保衛了附近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安全。

時至 6 月 6 日，西長安街上剩餘的路障尚未清除乾淨，因為還有民眾仍然持續不斷地設置新的路障。當天，步兵第 113 師接到新的命令，承擔天安門城樓前邊、金水橋、西長安街、人民大會堂以及中南海週邊的警戒執勤等任務。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逾 10 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駐紮在天安門廣場，以及四周的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第 38 集團軍部隊駐紮在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這麼多的部隊官兵集中在狹小的區域內，加上北京各界民眾不予支援，北京市區的糧店、菜市場和銀行藉故拒絕提供糧食、蔬菜和現金，集聚在天安門廣場一帶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出現了斷糧斷油危機。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說法是：“戒嚴大軍生命受到威脅，坦克、裝甲巡邏車缺油影響正常執行任務。鞏固清場成果，奪取平暴鬥爭決定性勝利受到挑戰！”

6 月 6 日下午 4 點鐘，北京軍區向第 38 集團軍傳達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命令：立即派出一支精悍的隊伍趕赴北京通縣軍用機場武裝押運給養。第 38 集團軍指揮部確定由步兵第 113 師參謀長谷密山、師政治部主任趙鴻亮負責指揮第一次武裝押運任務。接著又出動了第 2 次、第 3 次，連續進行了 3 次武裝押運。

步兵第 113 師司令部的大事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6 月 6 日至 6 月 8 日，全師全力完成戒嚴指揮部賦予的武裝押運任務，共出動 1968 人次，動用車輛 157 台（含坦克第 6 師 8 輛坦克），單車累計行程 240 公里、車隊累計行程 37680 公里，突擊運輸食品 2 百噸、油料 150 噸，解決了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的‘燃眉之急’。此次武裝押運，清除火障、車障、石障 26 道，衝開人障 4 次，實施反暴徒伏擊 3 次，人員、車輛、物資無一受損。”這一段記載顯示，直至 6 月 6 日，一些北京市民還在拼死反抗解放軍戒嚴部隊。

6 月 6 日晚上 11 點鐘，步兵第 113 師參謀長谷密山和師政治部主任趙鴻亮率領由 5 輛裝甲車、5 輛坦克、49 輛解放車和

600 名官兵所組成的車隊，實施第一次武裝押運任務。此時的東長安街上依然障礙重重，交通隔離墩橫七豎八，沒有燃燒完的車子一輛挨一輛地擠靠在街道中心，整個場面像是暫時平靜的戰場，那滾動的濃煙像是危險的信號。

武裝押運車隊沿著東長安街行駛到建國門外外交公寓附近，立時空氣緊張起來。這裏既是特殊的涉外敏感區，又是民眾襲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危險地帶。這時，只見北面高樓裏一陣衝鋒槍掃射，有兩個點射打在距離車隊幾米遠的地方，夜暗裏劃出一道刺眼的弧線，觸地後冒出幾道光。

“準備戰鬥！”師參謀長谷密山聲到人到，指揮官兵迅速下車，命令坦克和裝甲車呈月牙狀警戒。掩護組、防暴隊和清障組按照事先的分工形成戰鬥隊形，實施掩蔽喊話，開槍襲擊的民眾在強大的武力威懾下向北逃離。清障隊迅速清除路障，保證車隊繼續開進。

6 月 7 日凌晨 1 點 20 分，滿載糧油的武裝押運車隊來到北京市朝陽區大北窯，民眾用公共汽車、大卡車設置的殘存路障擋住了道路，幾名民眾手握土制燃燒瓶試圖靠前阻攔車隊通過。就在這時，幾名防暴隊員沖了過去，端起衝鋒槍威嚇道：“誰要扔汽油瓶子燒車，立即就地處置。”民眾一見防暴隊員殺氣騰騰的樣子，趕緊逃離現場。此時已是 6 月 7 日凌晨 1 點 52 分，這次武裝押運車隊闖關只用了 32 分鐘。

6 月 7 日凌晨 6 點 50 分，武裝押運車隊回到天安門廣場。饑腸轆轆的官兵見狀興奮不已，發出一陣陣歡呼聲。中國官方資料聲稱：“歷史攝下了這個難忘的鏡頭。這時的天安門廣場沸騰了，由於饑餓而顯得有些疲憊的官兵奔向運糧隊，滿含熱淚地迎了過來。這時，人民大會堂也沸騰了，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親自迎接凱旋歸來的官兵，稱讚他們又立了一次大功。”

6 月 4 日清晨以後，坦克第 6 師組織四個團 700 多名官兵，連續奮戰三天，在北京市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清除了大北窯至蘋果園一線 30 多公里路段上的大型路障。此外，第 38 集團軍工兵團武裝護送滯留在天安門區域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傷患 10 次、140 多人，並到北京市通縣黑石口，為駐紮在天安門廣場區域的部隊運送防暴器材 110 噸。

到了 6 月 7 日，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控制區域逐漸擴大。步兵第 112 師指揮部接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命令，擔負天安門廣場中軸線至南池子南口一帶長安街南北兩側的警戒執勤任務，以及保護勞動人民文化宮。接著，又增加了東華門（紫禁城的東門）、西華門（紫禁城的西門）的警戒執勤任務。

從 6 月 7 日起，除了第 38 集團軍，其他部隊陸續撤出天安門廣場區域。到了 6 月 18 日，其他部隊全部撤離，天安門廣場區域的警戒執勤任務全部落到了步兵第 113 師和坦克第 6 師的坦克第 22 團、裝甲步兵團、炮兵團頭上。

根據天安門廣場區域警戒值勤任務，第 38 集團軍分兵把守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東長安街上的南池子和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東西路口等 10 個交通要口，控制天安門城樓、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正陽門等 8 個制高點。在金水橋前、天安門廣場四周設置了 4 條警戒線，配置了 4 千余名官兵的預備隊，組成了一個封閉的、完善的戒嚴體系。

6 月 18 日，中央軍委調整解放軍戒嚴部隊部署，第 38 集團軍除了集團軍前進指揮部、步兵第 113 師（欠坦克團、炮兵團、高射炮兵團）和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繼續留在北京執行戒嚴執勤任務外，其餘部隊全部撤離北京，返回河北省駐地。

1989 年 10 月 31 日，是步兵第 113 師在天安門廣場戒嚴執勤的最後一天。11 月 1 日零點，解放軍戒嚴部隊與武裝警察部隊舉行了交接崗位儀式，天安門廣場的戒嚴執勤任務開始由武裝警察部隊承擔。

1990 年 10 月 26 日，第 38 集團軍留在北京戒嚴執勤的部隊在完成防衛亞運會場館的任務後撤離北京，返回河北省駐地。

第十一節、第 38 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234 名官兵，不包括北京軍區通信團 12 名官兵。）

軍政委王福義少將

副軍長（代軍長）張美遠少將

軍參謀長劉丕訓大校

軍副參謀長唐明洪

軍政治部主任李之雲大校

軍後勤部楊部長

軍政治部宣傳處處長任宗清

軍司令部作戰訓練處處長崔立學

軍後勤部軍需處副處長楊晉基

步兵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大校

步兵第 112 師副師長佟喜剛大校

步兵第 112 師參謀長馮兆舉

步兵第 112 師政治部王主任

步兵第 112 師技術部部長趙滿圈上校

步兵第 112 師司令部偵察科科长辛健中校

步兵第 112 師司令部秘書科科长毛欽方

步兵第 112 師司令部科長彭應求（湖南人）

步兵第 112 師技術部修理科助理工程師李勃上尉（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營長李連春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教導員高中福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裝甲偵察連連長王平忠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坦克偵察連連長馮有才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坦克偵察連代理排長牛進軍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代理排長邊平軍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專業軍士、炊事班班長李慶海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衛生員鍾大勇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士兵韓長義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士兵苗叢軍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士兵李東風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團長李少軍上校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副團長黃光雄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政治處主任王建偉（山東省東營市東營區史口鄉南一村人）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第 2 營教導員馮書靜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副營長郭玉山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軍醫穆瑞祥上尉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指導員潘喜秋上尉
步兵第 112 師第 334 團連長韓開印中尉（339 號裝甲車指揮員）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連長王旭忠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裝甲車駕駛員馬志強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裝甲車副駕駛員錢建新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專業軍士駕駛員趙斌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 322 號裝甲車駕駛員彭加剛
步兵第 112 師第 334 團志願兵（專業軍士）趙留根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士兵常青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團長赫飛上校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政委季新國上校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政治處主任王劍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連長張東旭中尉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班長夏衛國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士兵楊殿洪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士兵張洪義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士兵霍文平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士兵張吉年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士兵劉慶方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士兵趙建軍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6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士兵王家明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團長屈明安
步兵第 112 師某團政治處主任劉智軍
步兵第 112 師某團政治處劉主任
步兵第 112 師某團第 3 連連長許學勤
步兵第 112 師中校軍醫張延芳
步兵第 112 師少尉幹事王永軍（與劉智軍同一個團）

步兵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大校
步兵第 113 師政委陳錦彪大校
步兵第 113 師參謀長谷密山大校
步兵第 113 師政治部主任趙鴻亮
步兵第 113 師技術部部長蘇明興
步兵第 113 師政治部副主任鄒萬增
步兵第 113 師副參謀長王喜斌
步兵第 113 師司令部作戰訓練科科长王群樂
步兵第 113 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长張少華
步兵第 113 師司令部偵察科科长耿援朝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團長岳中強中校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政委馬炳泰中校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參謀長賴國慶中校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連長彭虎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副連長馬居發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指導員王建莊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排長唐燕勇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駕駛員鄒信峰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駕駛員李志華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駕駛員劉國彬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第 6 班士兵吳英強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士兵王金印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士兵張東彬
步兵第 113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第 3 連士兵周勇豐

步兵第 113 師團政委楊清福
步兵第 113 師團參謀長李國友
步兵第 113 師副團長張洪臻（山東人）
（以上 3 個人同一個團）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7 團政委張明光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7 團第 3 營營長王斌
步兵第 113 師包團長、劉政委、苗主任
（以上 3 個人同 1 個團）
步兵第 113 師團長董鴻釗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9 團政委薛曉明
步兵第 113 師團政委蔣校成
步兵第 113 師團政委劉照華
步兵第 113 師團政治部主任萬保雲
步兵第 113 師團政委李樹斌
步兵第 113 師團政治處組織股股長賀勇
步兵第 113 師團政委方祥禮
步兵第 113 師團參謀長張曉明
（以上 2 個人同一個團，團長姓王）
步兵第 113 師某團第 3 營營長王斌
步兵第 113 師某團炮兵營教導員高振羽
步兵第 113 師指導員陳旺
步兵第 113 師指導員李賀英
步兵第 113 師某部第 3 連副連長李全印
步兵第 113 師某部第 3 連連長謝翠金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保衛處幹事王強少尉（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事後提升為中尉）
步兵第 113 師指導員李新義上尉
步兵第 113 師第 3 排代理排長刁希濤
步兵第 113 師第 5 班士兵蘇炳林
（以上三個人屬於同一個部隊）
步兵第 113 師偵察連班長李雙印（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13 師某團第 9 連班長陳茂松

步兵第 113 師士兵張向寶
步兵第 113 師士兵陳克鋒
步兵第 113 師中士文書段緒
步兵第 113 師士兵王濤
步兵第 113 師士兵蘇豔星
步兵第 113 師士兵于志勇

炮兵旅旅長張龍
炮兵旅副旅長李燕生
炮兵旅政委李仁
炮兵旅副政委趙炳璞
炮兵旅衛生隊少校軍醫王競（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
炮兵旅衛生隊救護車司機劉寶亮
炮兵旅衛生隊軍醫董建華
炮兵旅衛生隊軍醫張建勳
炮兵旅第 5 營營長艾希君
炮兵旅第 5 營教導員張貴成少校
炮兵旅第 5 營第 3 連連長崔樹來
炮兵旅第 5 營第 3 連指導員陳傑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連長靳煥來上尉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副連長張金湘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排長張建茂
炮兵旅第 5 營營部無線班班長王其富（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1 班士兵李強（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士兵杜懷慶（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副班長李棟國（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第 4 班士兵王小兵（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炮兵旅第 5 營第 3 連有線班班長徐如軍（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炮兵旅第 5 營營部偵察班班長王山（山西省太谷縣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士兵陳祥（陝西省西安市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士兵鄭志明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士兵任放

炮兵旅第 5 營營部無線班士兵劉顏軍

炮兵旅第 5 營營部無線班士兵李小華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士兵焦岩（陝西省西安市人）

炮兵旅第 5 營士兵馬孝剛（安徽省嘉山縣人，一作李孝剛）

炮兵旅第 5 營士兵李瑞成（安徽省嘉山縣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3 連有線班士兵李江彬

集團軍通信團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王順長

集團軍通信團工兵連上等兵(裝載機副司機)呂志軍

集團軍通信團工兵連裝載機操作手李振

坦克第 6 師營長劉同祥少校

坦克第 6 師駕駛員秦軍謙

坦克第 6 師坦克第 22 團汽車連士兵吳玉山

軍醫王慶保

某炮兵營營長鄭家森

某團第 7 連指導員劉富龍

某坦克團第 5 連副連長王志成

某團第 3 連連長徐官根

某坦克連駕駛員齊新建

北京軍區政治部孫忠泰副處長

中尉幹事任斌

司機張克昌

步兵第 112 師政治部新聞幹事劉新穎

步兵第 112 師副科長黃忠新（四川省三台縣人，轉業後曾任四川省綿陽市環境保護局科長、辦公室主任、黨總支書記）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政委黃稼祥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後勤處軍需股股長洪正貴（歷任步兵第 334 團後勤處處長、南京軍區後勤部軍需生產部副團職助理員、生產管理部企業管理處處長、金陵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2004 年任南京醫藥產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第 3 營第 7 連班長任鍵軍（湖北省隨州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4 團士兵楊智文（湖南省常德市人）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李雲鵬（歷任步兵第 335 團司令部股長、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技術處處長、高射炮兵團副團長，2001 年 9 月任河北省武安市環境保護局副局長。）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副營長路全眾（北京市昌平人。歷任步兵第 335 團營長、步兵第 113 師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偵察科科長、內蒙古軍區涼城縣武裝部部長、內蒙古軍區二連浩特市武裝部部長。）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第 1 營第 1 連排長張洪飛

步兵第 335 團第 1 營第 1 連指導員張東江（1993 年）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班長、代理排長祝鑫（湖北省隨州市人。歷任湖北省隨州市公安局合同制民警、廣東省中山市雅居樂花園物業管理公司安全管理部主任、廣州市華金盾大酒店保安部經理、廣東培正學院保衛處處長。）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特務連士兵裴登科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趙永久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楊學志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許建軍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陸明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毅義寧

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335 團陸繼儉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政治處新聞攝影報導員高志勇(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人。歷任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政治處攝影幹事、運城日報社攝影記者、採訪部副主任、攝影部主任、山西省運城市攝影家協會副主席。)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司令部作戰訓練股參謀張有才(歷任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1 營營長、團副參謀長，副團長，2001 年任河北省邯鄲縣武裝部副部長，2004 年 11 月起任河北省邯鄲市糧食局副調研員。)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司令部張永雨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營長王安龍(運城市聞喜縣人)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 2 分隊士兵吳雷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士兵吉會全(山西人)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士兵郭金嶺(河北省邢臺市人)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士兵王田喜(河北省邢臺市人)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士兵席勇(河北省張家口市人)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士兵黃玉貴(河北省張家口市人)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駕駛員劉德金(天津市人)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郭建利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韓子明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趙勝傑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廖紅飛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孫德輝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劉立志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甯英俊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楊秋

步兵第 112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孟祥民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營長王躍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教導員張先進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裝甲偵察連連長邊平均

步兵第 112 師偵察營軍官吳明松

步兵第 112 師坦克團高射炮兵連士兵周海東

步兵第 112 師坦克團政治處主任郭來莊（歷任步兵第 112 師坦克團政委、山西省運城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山西省長治軍分區政委、河北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

步兵第 112 師坦克團第 1 營士兵李佐全（山西晉城人）

步兵第 112 師高射炮兵團班長石德軍（1986 年兵）

步兵第 113 師政治部副營職幹事王有彬（河北省故城縣人。歷任衡水軍分區保衛科科長、深州市武裝部政委、衡水市桃城區武裝部政委，2006 年 11 月以後任衡水市衛生局副局長。）

步兵第 113 師後勤部運輸科科長王其東（山東省臨沂市羅莊人。2008 年 1 月以後擔任山東省臨沂市人大常委會秘書長、黨組成員、機關黨組書記。）

步兵第 113 師政治部幹事李巍山（河北省保定市人。1996 年 8 月轉業到河北省保定市國稅局工作。）

步兵第 113 師炮兵指揮連連長張保志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7 團炮兵營營長孫巨山（轉業後任蓬萊煙草公司經理）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7 團連長譚剛倫（湖北省隨州市曾都區洪山鎮人。歷任步兵第 337 團營長、副團長、湖北省隨州市曾都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紀律檢查組組長。）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7 團指導員籍海春（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人。歷任團政治處副主任、團副政委、處長等職，2004 年 8 月隨軍需大學集體轉業到吉林大學。）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7 團班長楊明（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區人）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7 團高射炮兵連士兵趙新春（安徽省阜陽市人。復員後被分配到安徽省阜陽市技工學校保衛科。）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7 團高射炮兵連士兵王權（河北省承德市人）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團長趙安君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營長張敬遠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連長杜二國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指導員王啓屯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班長楊廣旭（四川省鹽亭縣黃甸鎮人，2007 年 10 月以後任中共鹽亭縣永泰鄉黨委副書記、鄉人民政府鄉長。）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班長鄭洪霖（天津市人，曾任天津開發區歐瑞克集團公司銷售部副總、龍工品牌總經理。）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第 2 營第 6 連第 9 班班長雷清鋒
步兵第 113 師步兵第 338 團班長楊坤（湖北省房縣人）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團長張淑敏（山東省新泰市人）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後勤處處長李傳軍（轉業後在泰安市建委工作）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司令部通信股股長何仕聰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3 營第 7 連連長趙剛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3 營第 7 連副連長張震孩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3 營第 7 連第 2 排排長蔣桂榮（四川省安嶽縣人）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3 連排長陳永剛（四川省人，現在四川省閬中市檢察院工作）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指揮連連長陳友忠（2008 年在炮兵團團長的位置上轉業到中共北京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指揮連測地排排長方奎（任連長後轉業到河北省保定市工作）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9 連排長孫世榮（現在河北省保定市藥監局工作）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王克忠（天津市人）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3 營第 7 連第 2 班士兵梁旭昶（曾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縣農機公司工作）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3 營指揮連偵察班士兵周炳容（江蘇省人）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3 營第 7 連班長張萬明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第 3 營第 7 連班長徐國德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顧國華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董爲民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馬飛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王建軍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王廣周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喬全喜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徐金亭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徐欽利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王迎春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杜強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卞玉和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張顏春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邵尊義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士兵伍勳
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指揮連測地排班長趙南宏（1990 年復員，
現在江蘇省鹽城某制藥企業任董事長）

步兵第 113 師通信營士兵馮作輝
步兵第 113 師士兵孫利春（河北省張北縣人）
步兵第 113 師偵察連“楊子榮排”代理排長邢育強
步兵第 113 師班長吳建斌（現任河北省承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雙橋分局南營子工商所所長）

坦克第 6 師坦克第 22 團司令部作戰訓練股參謀趙啓龍（山西省
黎城縣人）

坦克第 6 師坦克第 21 團連長李元君
坦克第 6 師坦克第 21 團炊事員李建中（江蘇省興化市北賈同村
人）

坦克第 6 師士兵劉玉東（重慶市人）
坦克第 6 師偵察營士兵陳宇（江蘇省睢寧縣人，先後在江蘇省
睢寧縣人民政府和江蘇省睢寧縣貨運公司任司機。）

坦克第 6 師士兵劉越（江蘇省徐州市新沂市人，先後擔任江蘇
省徐州市新沂市阿湖鎮武裝部幹事、玉環佳達眼鏡配件廠廠長

助理。)

坦克第 6 師維修營辦公室助理周增敏(河北省石家莊市人)

坦克第 6 師士兵劉越(江蘇省新沂市人)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楊坤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安俊慧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胡穎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李德升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羅一民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朱俊武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姚建都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郭華

坦克第 6 師衛生員宮青梅

坦克第 6 師坦克第 21 團通信連士兵谷立周

炮兵旅司令部作訓科參謀魏志方(河南省林州市人，2005 年 2 月以來擔任內蒙古自治區新巴爾虎右旗武裝部政委)

炮兵旅司令部偵察科參謀張豔彬(河北省保定市人)

炮兵旅某營教導員毛春秋

炮兵旅指導員楊衛平(北京市人，2005 年 3 月以來擔任北京市東城區民政局紀檢組長)

炮兵旅第 6 營第 1 連連長王金成

炮兵旅指揮 2 連連長張學軍(北京市人)

炮兵旅連長鐘春靈

炮兵旅第 1 營第 2 連連長李德鐘

炮兵旅第 3 營第 7 連連長王金誠

炮兵旅直屬第 1 連第 2 排排長付海峰

炮兵旅排長戴風新

炮兵旅指揮 2 連排長王宗昌(安徽人)

炮兵旅第 4 營第 3 連排長張連民(河北省滄州市人)

炮兵旅第 4 營第 1 連士兵孫海軍(陝西省西安市人)

炮兵旅宣傳科放映隊士兵李科(重慶市人)

炮兵旅宣傳科放映隊士兵李青松(河南人)

炮兵旅宣傳科放映隊士兵丁立勇(河南人)

炮兵旅宣傳科放映隊士兵蘇金忠(河南人)
炮兵旅宣傳科放映隊士兵孫緒綠(山東人)
炮兵旅第 6 營第 1 連士兵董延森(山東省青島市人)
炮兵旅第 6 營第 1 連士兵陳志新(北京市人)
炮兵旅第 6 營第 1 連士兵王志強(北京市人)
炮兵旅第 6 營第 1 連士兵石磊(北京市人)
炮兵旅指揮 2 連班長曾怡輝(湖南人)
集團軍炮兵旅指揮 2 連士兵馬輝
炮兵旅指揮 2 連士兵張建軍(陝西省西安市人)
炮兵旅指揮 2 連士兵梁衛東(河北省保定市人)
炮兵旅第 2 營第 3 連士兵趙東海
炮兵旅第 2 營第 3 連士兵賈永利
炮兵旅第 2 營第 3 連士兵耿立文
炮兵旅第 2 營第 3 連士兵李紅傑(北京市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3 連士兵韓濱(陝西省西安市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3 連士兵朱立培(安徽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1 連士兵王勝岩(陝西省西安市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1 連士兵張文慶(北京市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1 連士兵滑麗兵(山西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1 連士兵孫方左(山東人)
炮兵旅第 5 營第 1 連士兵王海軍(華北油田)
炮兵旅第 1 營第 1 連士兵何新
炮兵旅第 3 營士兵李治學(河北省邢臺市人)
炮兵旅第 4 營第 3 連士兵侯國強
炮兵旅第 4 營第 2 連文書楊樹(安徽人)
炮兵旅第 2 營第 4 連連長周頌
炮兵旅特務連士兵龔建科(河北省定州市人)
炮兵旅第 1 營第 3 連士兵劉江
炮兵旅第 1 營第 3 連士兵趙景城(河北省景縣人)
炮兵旅第 6 營士兵李豔國
炮兵旅第 2 營第 3 連士兵崔永生
炮兵旅第 5 營第 2 連士兵王衛平
炮兵旅特務連公務班士兵韓兆波
炮兵旅第 3 營第 1 連士兵李建軍

炮兵旅第 7 營第 1 連士兵蘇文祥(河北省邢臺市人)
炮兵旅第 7 營第 1 連士兵趙玉斌(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庫倫旗人)
炮兵旅汽車營司機班李先成

集團軍偵察營士兵王俊峰(廣東省高平市人)
集團軍偵察營士兵楊志明(廣東省高平市人)

附錄北京軍區直屬通信團官兵名錄：

通信團團長劉繼榮

通信團政委張海濱

通信團營長金光

團司令部通信參謀邱成上尉

通信團第 2 營第 6 連連長江安志

通信團第 2 營第 6 連指導員劉鐵成

通信團第 2 營第 6 連報務班班長葛明軍（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河北省黃驊縣羊二莊回族鄉後街村人）

通信團第 2 營第 6 連第 5 班班長張貴發（山東人）

通信團第 2 營第 6 連士兵錢清華

通信團第 2 營第 6 連士兵李旭東

通信團第 2 營第 6 連士兵劉建紅

通信團第 2 營第 6 連士兵曹文良

第三章、空降兵第 15 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空降兵第 15 軍概況

空降兵第 15 軍是首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的主力部隊之一，所起的作用和所槍殺的民眾數量，都僅次於第 38 集團軍。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中，空降兵第 15 軍執行鎮壓命令堅決，政治態度明確。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空降兵第 15 軍軍部駐地在湖北省孝感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39155”，直屬中央軍委指揮。景學勤少將任軍長，張漢平少將任軍政委，韓占鈞少將和左印生大校任副軍長，田瑞昌大校任軍副政委，王守志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

空降兵第 15 軍由陸軍第 15 軍改編組建，1961 年 7 月 1 日宣告組建成功。空降兵第 15 軍連同第 38 集團軍、第 39 集團軍、第 54 集團軍，屬於解放軍中的王牌部隊。

陸軍第 15 軍的前身，是 1947 年 8 月 15 日在河南省博愛縣組建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 9 縱隊，由八路軍太行軍區部分地方武裝發展而來，秦基偉任司令員，黃鎮任政委，黃新友任副司令員，何正文任參謀長，谷景生任政治部主任。

1948 年 5 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第 9 縱隊改稱解放軍中原野戰軍第 9 縱隊。10 月，參加鄭州戰役。11 月，參加淮海戰役，參與攻克宿縣、任橋阻擊和圍殲國民黨軍隊黃維兵團等戰鬥。

1949 年 2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部隊編制和部隊番號的決定，中原野戰軍第 9 縱隊在河南周口地區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15 軍，隸屬於解放軍第 2 野戰軍第 4 兵團建制，秦基偉任軍長，谷景生任軍政委，余洪遠任軍政治部主任。下轄第 43 師、第 44 師、第 45 師。

1949 年 3 月初，第 15 軍從河南省周口地區出發，投入國共內戰，先後轉戰豫、皖、鄂、閩、贛、粵、桂、雲、貴、川、康等 11 個省。

1951 年 3 月，第 15 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其時秦基偉任軍長，谷景生任軍政委，周發田任副軍長，張蘊鈺任軍參謀長，車敏瞻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15 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參加了第 5 次戰役和平（康）、金（化）、淮（陽）地區防禦作戰，在著名的上甘嶺戰役中一戰成名，湧現出一批英雄模範單位和個人，包括特等功臣、特級戰鬥英雄黃繼光，特等功臣、1 級戰鬥英雄孫占元、邱少雲。

1954 年 5 月，第 15 軍撤離朝鮮回國，駐紮在湖北省孝感地區，隸屬於武漢軍區。

1960 年代初，台海形勢日趨緊張，中印邊境衝突愈演愈烈，西北邊境地區也極不穩定。爲了增強戰略機動力量，中央軍委於 1961 年 6 月決定擴編空降兵部隊，組建空降軍。中央軍委遴選出 3 支著名部隊：第 1 野戰軍的第 1 軍、第 2 野戰軍的第 15 軍、第 4 野戰軍的第 38 軍，交由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從中挑選出一支部隊，改編爲第一支解放軍空降兵軍。劉亞樓最終選擇了第 15 軍，理由是該軍在上甘嶺戰役中打出了名聲。

1961 年 7 月 1 日，在陸軍第 15 軍軍部駐地湖北省孝感市舉行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40 周年暨空降兵成立大會，標誌著陸軍第 15 軍改建爲空降兵第 15 軍的任務完成。空降兵第 15 軍下轄第 43 師、44 師、45 師三個空降兵師，以及直屬通信營、工兵營、氣球隊等部隊，共有 18810 名官兵。由原陸軍第 15 軍軍長趙蘭田任軍長，原陸軍第 15 軍政委廖冠賢任軍政委，原陸軍第 15 軍副軍長兼參謀長齊丁根、張顯揚、原空軍副軍長兼參謀長方銘等 3 人任副軍長，原陸軍第 15 軍副政委王新任軍副政委，孫濟雲任軍參謀長，衛景廉任軍政治部主任，蔣英任軍後勤部部長，梁仁魁任軍副參謀長，孫冠生任軍政治部副主任。

空降兵第 15 軍歸中央軍委空軍總部和武漢軍區空軍領導。在步兵第 29 師調歸武漢軍區建制的同時，編入空軍陸戰第 1 師（當時唯一的空降兵師），借用原第 43 師番號，改稱空降兵第 43 師。

從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空降兵第 15 軍曾是解放軍歷史上編制人數最多的主力軍，全軍官兵逾 6 萬人，與現在的解放軍陸軍集團軍的編制人數相差不多。

1985 年，解放軍部隊實行整編，空降兵第 15 軍也由師、團建制改爲旅、營建制，三個空降兵師分別縮編爲空降兵旅，並按照空降兵部隊的任務、訓練要求以及作戰特點劃分爲教導

旅、機動旅、快速反應旅，第 43 旅屬於應急機動作戰旅，第 44 旅屬於快速反應旅，第 45 旅屬於教導旅。全軍共有 3 萬多名官兵。技術傘兵由原來的 17% 升至 43%；普通傘兵由原來的 53% 下降到 23%，已發展成為擁有引導、偵察、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防化兵、汽車兵等 8 個兵種，以及 36 個專業的特種兵部隊。

空降兵的任務特殊，需要強健的體魄和超人的反應力，官兵每天除了 8 小時軍事訓練，早晨要進行 5 公里武裝越野；上午軍訓前展伸雙臂手握兩磚繞營區跑兩周；中午練習拳術半小時；下午軍訓前俯臥撐 150 次，負重下蹲 100 下，蛙跳 300 米；睡覺前，頭部、肘、拳、腿各擊沙袋 50 次，馬步推磚 100 次；仰臥起坐 50 次。

1985 年 5 月至 1986 年 6 月，由空降兵第 15 軍所組成的第 7 偵察大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含八里河東山）參加偵察作戰。全大隊共有 669 名官兵，由第 43 旅偵察連的 161 名官兵組成第 1 中隊，第 44 旅偵察連的 167 名官兵組成第 2 中隊，第 45 旅偵察連的 167 名官兵組成第 3 中隊。

1990 年代以後，由於台海形勢變化和任務的需要，空降兵第 15 軍進行擴編，三個空降兵旅擴編為滿員空降兵師。在多次台海局勢緊張之時，該軍都曾經調往東南沿海地區威懾臺灣。

目前，解放軍快速反應部隊基本上由 4 個部分兵力組成：空降兵第 15 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等快速反應部隊；各大軍區直屬的特戰兵營；海軍陸戰隊。這些快速反應部隊的機動力、戰鬥力均比一般解放軍部隊強大許多。空降兵第 15 軍作為解放軍唯一的空降兵軍，是機動性最強的部隊，直屬中央軍委節制，承擔戰略機動和戰略突擊的任務，根本職能是保證在最短時間內到達任何區域投入戰鬥。

第二節、緊急空運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1989年5月20日上午7點30分，空降兵第15軍接到中央軍委緊急命令：部隊火速赴京執行戒嚴任務。該軍黨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傳達中央軍委緊急命令，研究部隊進京事宜，決定由副軍長左印生大校、軍副政委田瑞昌大校為首組成指揮部，率領空降兵第43旅、空降兵第44旅，以及軍直屬通信營等部分保障部隊，趕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43旅、第44旅是空降兵第15軍的主力部隊。第43旅屬於一級應急機動作戰旅，旅部駐地在河南省開封市，下轄三個營，分別為第127營（步兵營）、第128營（摩托化步兵營）、第129營（炮兵營）；第44旅屬於特級快速反應旅，旅部駐地在湖北省廣水市（原駐地為湖北省應山縣），下轄兩個營，分別為第130營（步兵營）和第131營（炮兵營）。

空降兵第15軍不愧為快速反應部隊，行動非常迅速。以第43旅為例，1989年5月20日上午7點39分接到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預先號令，旅黨委立即召開了緊急常委會。上午八點鐘，召集營以上幹部開會，傳達命令，佈置任務。在20分鐘內，旅司令部確定了部隊緊急出動方案，旅政治部起草了部隊緊急出動的政治工作指示，旅後勤部制定了後勤保障的每一步計畫。該旅從接到預先號令到部隊出動，僅用了一個半小時，大大少於戰備出動的規定時限。在通常情況下，空降兵第15軍外出執行任務，一般需要12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因此，解放軍總參謀部負責人稱讚空降兵第15軍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行動迅速、乾淨俐落。

1989年5月20日上午，空降兵第43旅進京部隊官兵在河南省開封機場，空降兵第44旅進京部隊官兵以及空降兵第15軍部分保障部隊官兵在湖北省廣水機場陸續登上飛機，向位於北京市南郊的南苑機場飛去。

廣水機場修建於1966年，是空降兵第15軍的專用機場。

航空兵第13運輸師（駐地在開封機場）和航空兵第34運輸師負責將空降兵第15軍進京部隊空運進京，第13運輸師是空降兵第15軍專屬的保障部隊，平時就專門負責空降兵第15

軍的空運任務。航空兵第 34 運輸師基本上也屬於空降兵第 15 軍的保障部隊，在空降兵第 15 軍長駐調度協調指揮處。

任務急，時間緊，爲了按照中央軍委命令的要求將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空運進京，上述兩個航空兵運輸師緊急調動了所有的運輸機和大型客機，連軍隊首長乘坐的專機都調用了。士兵們坐上平時無法涉足的軍隊首長專機，既驚奇又興奮，不由得這裏看看，那裏摸摸的。

起飛時間提前再提前，一架接一架飛機騰空而起。在北京戒嚴令頒佈的第 2 天，也就是 1989 年 5 月 20 日，空降兵第 43 旅先頭部隊便抵達並接管了北京的南苑機場。

緊急空運行動持續進行了三天，三天之內，空降兵第 15 軍進京部隊全體官兵以及武器裝備全部抵達北京的南苑機場。

此後，一直到 6 月 3 日奉命向天安門廣場武力挺進，空降兵第 15 軍進京部隊都駐紮在南苑機場。

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在題爲《戒嚴日記 6 則》的署名文章中簡單談到一點當時的情況，他說：“當看到航空兵 XX 師、XX 師的主要運輸機和大型客機緊急調運兵力，起飛時間提前再提前時，我立即意識到北京的形勢嚴峻，情況緊急，意識到任務特殊和艱巨。我在心裏告誡自己：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在嚴峻的形勢和艱巨複雜的任務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一定要明辨是非，一定要堅定政治立場，以實際行動保衛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保衛偉大的首都北京。”【注釋 1】

基於部隊番號保密的規定，左印生在署名文章中使用“航空兵 XX 師、XX 師”來代替航空兵第 13 運輸師和航空兵第 34 運輸師。爲了破解有關資料中類似的以“XX”代替的部隊番號、駐地，耗費了筆者太多的時間。

左印生作爲空降兵第 15 軍進京部隊的最高軍事指揮官，率領該軍指揮部成員于 5 月 20 日下午 5 點 30 分飛抵南苑機場，當晚，奉命趕赴北京軍區司令部報到並領受任務。南苑機場距離北京軍區司令部所在地西山不算太遠，但由於逾百萬北京學生和市民在各交通路口堵截軍車，從陸地上走簡直是不可能的，左印生只好乘坐軍用直升機趕路。

左印生從北京軍區司令部返回南苑機場臨時營地時，已是深夜，但他久久不能入睡，一想到北京軍區負責人下達任務時

的嚴肅表情，想到北京全民“截”兵的現狀，想到北京的實際情況比出發前所想像的不知要嚴重多少倍，想到部隊緊急出動前沒有很好地進行政治動員，官兵們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思想準備不是那麼充分時，心裏就覺得沉甸甸的。

5月21日上午，空降兵第15軍指揮部召集團級以上軍官開會，左印生詳細傳達了上級指示精神，並明確了任務。左印生事後表示：“領導層思想很統一，態度很明朗很堅決。這使我增強了完成任務的信心，一直緊繃的神經稍稍鬆弛了一些。”

空降兵第15軍進京部隊空運抵達南苑機場之初，就遭到大批學生和群眾的強力圍堵，無法邁出南苑機場大門半步。官兵們更沒有想到：司務長上街買菜，到菜市場上一問，不是漫天要高價，就是“給多少錢也不賣”。後來在北京市領導人的干預下，北京市大興縣南苑鎮的領導才出面解決空降兵第15軍進京部隊的供給問題。

左印生在《戒嚴日記6則》中感慨說：“這是我一生中從未遇到過的特殊計畫。與我以往參加過的老山作戰、空降演習、搶險救災的計畫完全不同。因為，在眼前這場鬥爭中，政治立場問題和思想認識問題交織在一起，懷有罪惡目的的壞人和受蒙蔽有過激言行的群眾攪混在一起，給我們實施制止動亂的措施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爲了緩和軍民關係，空降兵第15軍進京部隊特意開展了“爲民服務”的活動，有的連隊主動與大興縣金星鄉聯繫，幫助壽寶莊打掃衛生，修路三百多米。民眾雖然對此有好感，但還是堅決反對解放軍戒嚴部隊進京鎮壓學生運動。

軍民關係從來沒有如此緊張過，甚至可以說是處於敵對狀態，許多空降兵第15軍進京部隊官兵因此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產生疑問。針對這種情況，空降兵第15軍從上到下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引導官兵們深刻認識“動亂”實質，做到“四保衛”

（保衛黨中央、保衛國務院、保衛中央軍委、保衛改革開放的旗手鄧小平同志），並在中共黨員中開展了爭當“五個模範”的活動。爲了對學生和市民發動政治攻勢，突擊培訓了400名政治宣傳骨幹。空降兵第43旅黨委召開了擴大會議，提出了“堅決執行命令，高度集中統一，保持穩定安全，用實際行動贏得

群眾理解支持，爲解放軍爭光”的工作指導思想和口號。

在抓緊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時，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在軍事方面積極地爲挺進天安門廣場做好各項準備工作。5 月 31 日，副軍長左印生會同空降兵第 43 旅、空降兵第 44 旅的主要指揮官以及軍司令部成員，進一步修改完善了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與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的預定方案。

【注釋 1】《戒嚴日記 6 則》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第三節、奉命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1989年6月3日下午，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空降兵第15軍指揮部下達了命令：部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當天下午3點鐘，該命令迅速下達到旅一級，要求迅速做好出發的所有準備。下午5點鐘整，副軍長左印生帶領全副武裝的部隊乘車從南苑機場出發，分成兩個梯隊從南往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第1梯隊是空降兵第43旅，第2梯隊是空降兵第44旅。

按照軍指揮部制定的開進方案，作為第1梯隊的空降兵第43旅部隊組成一路縱隊，分成三個梯隊逐次開進。旅長李加洪、旅政治部主任趙宗慶帶領旅前進指揮部跟隨第1梯隊開進。第2梯隊、第3梯隊分別由旅政委趙金奎、旅參謀長樊光銀率領。該旅第2營在營長周家柱率領下，擔任開路先鋒。

空降兵第15軍作為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主力部隊之一，上級領導機關對它非常重視，特地派出工作組，由中校幹事趙曉強擔任組長，跟隨該軍指揮部一起行動，與副軍長左印生共同率領該軍的第2梯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工作組顯然扮演著“督軍”角色，空降兵第15軍指揮官們心知肚明，對工作組不敢忽視，左印生特意指派身材高大的空降兵第44旅引導隊分隊長王移一路貼身保護趙曉強，不許有任何閃失。

空降兵第15軍部隊車隊出了南苑機場，沿著南苑路，經過南苑鎮開進。下午5點50分，擔任空降兵第43旅開路先鋒的第2營在北京市豐台區大紅門受阻。圍堵的民眾數以萬計，組成厚厚的人牆擋住道路，將一輛輛軍車團團圍住。晚上7點35分，在被圍堵近兩個小時後，第2營假稱後撤，改道迂回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晚上7點50分，迂回開進到北京市豐台區洋橋，再次遭到民眾強力攔阻，只有帶頭的指揮車闖了過去，後續車隊全都被攔住了。

晚上8點10分，空降兵第15軍指揮部向受阻部隊下達命令：棄車，徒步強行開進。

晚上8點50分，再次迂回開進的空降兵第43旅第2營抵達北京市豐台區南三環中路的馬家堡十字路口。有上萬名學生和市民組成人牆，並設置了路障，部隊車隊被迫停止前進，一

下子被圍得水泄不通。就在這時，接到了上級下達的命令：“不惜一切代價，爬也要在清場之前爬到天安門廣場。”

空降兵第 43 旅第 1 梯隊的主力部隊，在旅長李加洪和旅政治部主任趙宗慶的率領下，乘車抵達北京市豐台區木樨園，遭到了成千上萬名民眾的攔截，一輛輛軍車被分割包圍，口號聲、怒斥聲不絕於耳。李加洪、趙宗慶一邊組織官兵向群眾做政治宣傳工作，一邊組織官兵下車，排列在車輛兩側，以人護車，車隨人行，首尾相顧，高唱軍歌，高呼口號，整體開進。

就這樣，強行開進了三公里，來到了北京市崇文區永定門。只見一群民眾開過來一輛平板貨車，裝載著足足有兩千塊磚頭，一路將磚頭卸到道路兩邊。隨即，一些民眾用磚頭投擲強行開進的軍車，前邊的五輛軍車全被砸毀，有的官兵被砸傷。

空降兵第 43 旅的第 2 梯隊、第 3 梯隊分別在旅政委趙金奎、旅參謀長樊光銀的率領下乘車開進，與第 1 梯隊一樣，開進途中受到民眾的大規模圍堵，在北京市豐台區大紅門路的涼水河橋南側，部隊三次突圍都沒有成功。

空降兵第 44 旅作為空降兵第 15 軍的第 2 梯隊，在副軍長左印生的率領下，乘車開進途中也一再遭到大批民眾的強力堵截，最後也受阻於涼水河橋南側。同時在此地受阻的還有第 26 集團軍步兵第 138 師的三個團，他們與上級中斷了通信聯絡，正處於一籌莫展的境地。

如此一來，空降兵第 15 軍第 1 梯隊和第 2 梯隊的部隊，都先後在涼水河橋南側受阻，長長的部隊車隊遭到群眾的分割包圍，動彈不得。

上級工作組組長趙曉強在與左印生商量後，出面召集第 26 集團軍步兵第 138 所屬三個團的指揮官和空降兵第 15 軍旅級以上軍官在附近居民的柴草垛旁召開臨時協調會。趙曉強首先介紹了自己的身份，傳達了上級可以鳴槍示警開路的指示精神，隨後讓與會者自報職務、軍銜。左印生的職務是副軍長，軍銜是大校，無論是軍銜還是職務，在與會者中都是最高的，大家一致同意由左印生統一指揮，一同突圍。臨時協調會決定，部隊由乘車開進改為徒步行進，由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在前開路，第 26 集團軍步兵第 138 師的三個團梯次跟進，並確定了部隊突圍的時間和行進路線。

當時，涼水河橋被大卡車和不計其數的民眾堵得死死的，部隊就是徒步開進也很難通過。根據軍直屬偵察連代理排長邵玉和的偵察報告，部隊即使通過這座橋，也無法繼續開進，前方的木樨園、永定門路口已有幾支其他部隊遭到數萬名群眾的圍堵，進退不得。於是，左印生等人決定，改道迂回開進，選擇路障少、圍堵群眾不多的路線，沿著涼水河向西走北京市豐台區馬家堡東路，突圍時間選在 6 月 4 日凌晨 1 點以後。

空降兵第 15 軍指揮部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一、將部隊調整成長形方隊，處在隊伍前排和兩側的官兵全都打開刺刀，不裝子彈，形成威懾力量。二、鳴槍示警，鳴槍示警的任務交由軍官和部分班長實施，把他們編排在隊伍中間，這樣就只能對空鳴槍而不能向前平射和左右斜射。三、官兵們在行進中跟緊靠嚴，一頂頂鋼盔連在一起如同一層鋼板覆蓋在頭頂，民眾投擲的石頭、磚塊、玻璃瓶子不至於直接打在身上，有效地減少部隊的損傷。

與此同時，空降兵第 15 軍指揮部提出了“四保護”的要求，即開進中注意保護通信器材，保證通訊聯絡暢通無阻；保護武器裝備和車輛，保證國家財產不受損失；保護執行主要任務的分隊，保證按時到達預定位置；保護指揮員，保證指揮不中斷。這個“四保護”的要求，使得這個梯隊在開進途中始終保持了與上級的通信聯絡，武器裝備無一丟失損壞，22 輛軍車無一被砸被燒。

從 6 月 4 日凌晨 1 點以後，這個梯隊在開進過程中始終形成一個整體，總的由副軍長左印生、第 43 旅政委趙金奎指揮，前衛分隊由原副團長林樹奎指揮，梯隊中間的大部分人員屬於通信分隊，由第 43 旅通信科科長武勇指揮，後衛分隊由曾在中越邊境自衛反擊作戰中立過二等功的第 43 旅衛生科科長劉建鬥指揮。

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記載：劉建鬥是個胖子，跟著部隊急行軍十幾公里，幾次拐彎，總有不少人追打官兵，還有人叫喊：“打那個胖子，他是大官！”有一次，劉建鬥見一個民眾拿著一塊石頭向部隊跑來，舉起石頭就要向一個沒戴鋼盔的士兵頭上砸，劉建鬥用手槍對著那個民眾高喊：“住手！如果你砸，我就用槍打死你！”嚇得那個民眾扔下石頭舉起了手。還有一

個胖胖的年輕人帶領一些人，一直緊跟在部隊後面，當他發現官兵只是對空鳴槍，就邊投石頭邊喊：“部隊不敢對我們開槍，往前沖啊，打呀！”不知是哪個軍官對準他的腳下打了一槍，後邊的民眾再也不敢追打部隊了。

開槍命令下達後，部隊的開進速度明顯加快了，官兵們一邊鳴槍，一邊開進，先後衝破了民眾所設置的 11 道障礙，包括水泥隔離墩、垃圾桶，燃燒著的汽車，以及用成桶汽油潑在馬路上燒起的火牆，很快就進入了北京市崇文區前門大街，抬頭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南端的正陽門箭樓了。

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記載：由於前門大街屬於傳統的鬧市區，人多路窄胡同多，道路兩旁又有高層的居民樓，很多石頭、磚塊、玻璃瓶子，還有菜刀、斧子、垃圾撮子、笞帚頭、西瓜皮、爛番茄紛紛向官兵們飛來，弄不清楚是從樓上扔下來的，還是從胡同裏擲出來的，特別是從珠市口到前門的這段路上，前有攔截後有追打，民眾在街道兩旁的樓上和胡同裏一齊向官兵襲擊，只聽見鋼盔崩崩作響，形成了一個立體交叉的石雨區。民眾叫喊：“叫他們站著進來，躺著出去！”官兵們聽了這些話，氣不打一處來，可此處是樓高人密的繁華商業區，又不好鳴槍反擊，有的氣得幾次打開槍保險，請求多放幾個連發，就是不往身上打，也要嚇一嚇民眾，被指揮官勸止了。很多官兵都是在這個地段負傷的，第 44 旅旅長武運平大校身上五處負傷。

面對這種狀況，副軍長左印生立即提出要求：各級指揮員都要站在最主要的指揮位置，隨時讓官兵看到自己的身影，聽到自己的聲音。對群眾的過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讓，採取“打大雷不下雨點”的辦法，即端槍上刺刀，對空鳴槍，產生威懾力量。部隊一邊鳴槍示警，一邊呼喊著口號，強行向前開進，效果非常好，群眾逐漸散開了。

根據上述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記載，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在經過珠市口到前門的這段路上只是對空鳴槍。這純屬謊言。如今已找到許多身份確定的六四死難者，就是在這個地段、這個時間中彈身亡的，就是死于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的槍口之下。這些六四死難者的具體情況記載于丁子霖所著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一書。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25 分，空降兵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先期

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側。空降兵第 15 軍第 1 梯隊的其他部隊也陸續抵達。第 2 營一路率先衝破民眾的圍堵，自稱是全營官兵人人受傷，但無一掉隊，未丟失一槍一彈。

緊接著，空降兵第 15 軍第 2 梯隊和第 3 梯隊也陸續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側。左印生一邊派人去人民大會堂向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報告情況，一邊命令立即收攏部隊，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前做短暫的休整，準備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在空降兵第 43 旅第 2 營官兵抵達緊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南側時，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會的一名常委曾要求營長周家柱帶領官兵離開，遭到拒絕。後來又有兩名學生組織負責人前來與周家柱交涉，要求官兵不要開槍。周家柱強硬地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想避免流血事件，你們應該理智一點，撤出的應該是你們。”他並提出：“你們後退 50 米，不准向官兵扔石頭、磚塊，不許對官兵進行反動宣傳，否則，一切後果自負。”爲了避免流血衝突，學生和群眾主動後退了 5 米左右。

周家柱事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一路升遷，官至空降兵師師長。

第四節、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1989年6月4日凌晨，空降兵第15軍副軍長左印生和工作組組長趙曉強一起趕赴人民大會堂，向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報到，當面受領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

趙曉強回憶說：“我們剛到廣場時，學生和群眾還很多，只看到人民大會堂南門、東門和天安門城樓前有些部隊，我真擔心這點部隊能否完成清場任務。當我們走進人民大會堂時，才知一樓大廳裏住滿了部隊。這是化裝進城先期到達的某軍，心裏也才有了點底。”【注釋1】

在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引導下，左印生和趙曉強來到人民大會堂二樓會議廳，進入一間套房。該套房的東邊窗戶朝向天安門廣場，可以清楚地看到廣場上的情況。這間套房就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的所在地。當時，清場指揮部的幾位負責人正圍坐在一個大茶几四周觀看軍用地圖，看見左印生和趙曉強進來，馬上都站起來與他倆一一握手。靠東邊窗戶的牆壁上懸掛了一張很大的北京市區地圖，上邊畫了很多標示著各解放軍戒嚴部隊進軍天安門廣場路線的紅藍符號。

根據清場指揮部擬定的計畫，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空降兵第15軍部隊部署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負責這一帶的清場和警戒任務。從正陽門到毛主席紀念堂一線以東的區域，都由空降兵第15軍部隊負責警戒，只許人出不許人進。天安門廣場東南角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最後就是從這裏撤離天安門廣場的。

左印生受領清場任務後馬上返回部隊臨時集結地，指定空降兵第44旅旅長武運平擔任解放軍戒嚴部隊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現場指揮員，直接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聯繫，清場指揮部代號為“1號”，武運平手握一具報話機，代號為“2號”。此時，武運平的樣子有點狼狽，身穿士兵服裝，根本不象個指揮官。當天下午5點整，空降兵第15軍部隊從南苑機場出發時，便裝外出偵察的武運平在返回駐地的途中遇到開進部隊，臨時換穿警衛員趙迎春佩戴上士軍銜的軍衣，頭戴步兵排長苗萬忠的鋼盔。

6月4日凌晨4點30分，最後階段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開始了，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自南往北向紀念碑一帶開進，全體官兵荷槍實彈，一路上呼喊著“鎮壓暴亂，自衛反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口號，殺氣騰騰，迅速推進到預定地點——紀念碑底座的東南角，設置了警戒線。

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警戒的地段，正是數千名學生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唯一出口和通道，遭暴力驅逐的學生隊伍就在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的眼前通過。在這裏，有許多學生或被官兵用棍棒、槍托擊傷，或因為過度擁擠而被擠傷、踩傷。工作組組長趙曉強一直在此處觀察學生的撤離情況，他站在一輛武裝警察部隊的大卡車上，自稱視線很好，看得很清楚。

趙曉強在題為《我所經歷的開進和清場》的署名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敘述：爲了驅趕一些堅守不撤的學生和群眾，防暴警察施放了催淚彈，紀念碑四周的學生加快了撤離速度，有的慌不擇路，從西南角往天安門廣場外面猛跑。學生和群眾隊伍形成一股龐雜的人流，向前門東大街、前門大街湧去。當人流越來越細時，學生撤離隊伍右側出現了一隊穿白大褂的醫療衛生隊伍，抬著 8 副擔架，擔架上躺著 8 個人，有的用白布蓋著全身，有的用大衣蒙著頭。當時很好奇擔架上這些人的身份，上前欲揭開白布察看，但遭到官兵勸阻，怕出意外。

據著名作詞作曲家侯德健事後向海外記者透露，他當時就是被擔架抬出去的。這 8 副擔架上或許就有侯德健。

6 月 4 日凌晨 5 點 30 分左右，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在紀念碑底座一帶，與由北往南推進的第 38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部隊會師。這時，第 38 集團軍的裝甲車隊成四路縱隊推進，緊跟著撤離的學生和群眾隊伍，轟轟隆隆地開到了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面前，官兵們鼓掌歡迎，裝甲車裏的官兵也打開上蓋，探出身子招手致意。兩軍會師，表明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趙曉強看了一下手錶，正好是 6 月 4 日凌晨 5 點 27 分。中國官方事後對外宣稱，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結束時間是 6 月 4 日凌晨 5 點 30 分，僅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解放軍戒嚴部隊就完成了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

稍後，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在正陽門至毛主席紀念堂一線以東區域部署了警戒線，不許任何人進入天安門廣場。許多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民眾不願離去，聚集在前門商業大廈

（北京市東城區前門東大街 20 號）門前，而且不斷地有學生和市民趕來聲援，人群越聚越多，又開始向天安門廣場倒流。數萬名學生和群眾形成厚厚的人牆，象洪水一樣向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所設置的警戒線湧來。

武運平緊急向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彙報請示，清場指揮部下令強行予以驅散。武運平連忙組織官兵荷槍實彈，連同手持棍棒的第 24 集團軍部隊官兵，一起迎向倒流的學生和群眾隊伍，進行正面的武力阻攔。一時之間，現場槍聲不斷，棍棒飛舞。學生和民眾一次次被逼退，又一次次湧上前來。經過幾個反復，官兵們才把學生和群眾驅趕到正陽門與箭樓之間的大街以南，設置了警戒線，不准任何人進入大街，越過警戒線就鳴槍警告。

即使這樣，還是有不少學生和群眾不願離去，緊貼著警戒線繼續呼喊抗議口號，痛罵血腥鎮壓行動的主要當事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等人和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

6 月 4 日一整天，警戒線外始終聚集著成千上萬的學生和民眾，其中有不少婦女和老人，他們被血腥鎮壓行動所激怒，對警戒線的衝擊不斷，官兵們則鳴槍不止。趙曉強就此感歎：6 月 4 日整個白天使空降兵第 15 軍的官兵始終處於緊張狀態，疲勞不堪。

【注釋 1】參見《我所經歷的開進和清場》一文，作者：中校幹事趙曉強，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第五節、空降兵第 15 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08 名官兵）

副軍長左印生大校

軍副政委田瑞昌大校

第 43 旅旅長李加洪

第 43 旅政委趙金奎

第 43 旅參謀長樊光銀

第 43 旅政治部主任趙宗慶

第 43 旅後勤部軍械科科长張文先

第 43 旅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武勇

第 43 旅後勤部衛生科科长劉建門

第 43 旅司令部軍務參謀胡根生

第 43 旅原副團長林樹奎

第 43 旅引導隊分隊長王移

第 43 旅炮兵營教導員魏誠實

第 43 旅第 2 營營長周家柱（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第 43 旅導彈營教導員劉永春

第 43 旅偵察連指導員柴根柱

第 43 旅導彈營第 3 連連長喬繼周

第 43 旅第 2 營第 6 連連長鄢利雲

第 43 旅第 2 營第 2 機炮連指導員朱文河

第 43 旅第 2 營副連長梅德州

第 43 旅第 2 營第 6 連副連長梅道洲

第 43 旅第 2 營營部助理員黃德忠

第 43 旅第 2 營營部司務長許志門

第 43 旅偵察連第 2 排排長牛傳民

第 43 旅偵察連代理排長邵玉和

第 43 旅醫院護士史湘紅（旅後勤部軍械科科长張文先妻子）

第 43 旅第 2 營第 2 機炮連代理排長郭慶武

第 43 旅炮兵營第 2 連班長陳傳春

第 43 旅高射炮兵營士兵萬建軍

第 43 旅第 2 營士兵鄭開文
第 43 旅第 2 營第 2 機炮連士兵聶慶忠
第 43 旅高射炮兵營通信兵于春江
第 43 旅士兵羅永
第 43 旅第 1 班士兵閻中躍
第 43 旅第 3 營營部衛生員竇建利
第 43 旅高射炮兵營士兵強兵彥
第 43 旅通信連連長曹秦川上尉
第 43 旅通信連分隊長李增利中尉
第 43 旅通信連班長周景陽下士
第 43 旅通信連班長段曉雄下士
第 43 旅通信連無線通信兵李信
第 43 旅通信連無線通信兵上等兵郭金生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指導員袁保國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排長朱志軍少尉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士兵雷宗江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吳渤海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士兵王景強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第 6 班班長侯昌華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第 12 班班長趙萬至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第 1 班士兵易生峰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副班長姚遠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劉風有
第 43 旅第 2 營第 5 連士兵江濤
第 43 旅第 2 營士兵羅永

第 44 旅旅長武運平大校
第 44 旅政治部主任樊友義上校
第 44 旅第 2 營第 5 連指導員袁保國上尉
第 44 旅第 2 營第 4 連連長趙斌上尉
第 44 旅幹事劉建奇上尉、賈月軍、郭虎成
第 44 旅第 2 營第 4 連指導員潘榮清中尉
第 44 旅第 2 營第 4 連第 3 排排長游德高（獲“共和國衛士”榮

譽稱號，四川省內江縣人)

第44旅第2營第4連炊事班班長郭長新

第44旅第2營第4連第3排第4班士兵江小平

第44旅第2營第4連士兵馮萬軍

第44旅第2營第4連士兵孔峰

第44旅旅長武運平警衛員趙迎春

第44旅排長苗萬忠

第44旅第2營第4連第3排第7班班長孫文亮

第44旅第2營第4連第3排第9班班長李洪立

第44旅第2營第4連第3排士兵陳連喜

第44旅第2營第4連第3排士兵賈慶龍

第44旅第2營第4連第3排士兵歐運平

第44旅第2營第4連第3排士兵殷良

第44旅第2營第4連第3排士兵崔亮

第44旅第2營營長王志勇

第44旅第2營教導員王好新少校(獲“衛國勇士”榮譽稱號，
山東省濟南市人)

第44旅第2營連長趙進軍

第44旅第2營第4連連長趙冰

第44旅第2營第5連指導員袁保國

第44旅第2營第6連排長郭虎成

第44旅第2營第5連排長張貴強

第44旅第2營代理排長賈振方

第44旅第2營班長趙萬智

第44旅第2營士兵江濤

第44旅第2營營部通信兵羅宋軍

第44旅第2營第6連士兵王貴軍

第44旅第2營第5連士兵周樹星

第44旅第2營第4連士兵楊峰

第44旅第2營班長魏凱

第44旅第2營班長孔凡全

第44旅第2營班長劉向全

第44旅第2營班長張曉東

第 43 旅後勤部軍需科科長、紀檢委員初福欣（山東省萊陽市人。歷任空軍後勤部軍需培訓中心主任、給養處副團職助理員、軍需處副處長、處長，2003 年 12 月 22 日以後擔任北京市東城區體育局助理調研員。）

第 43 旅政治部幹部科科長劉永春（吉林省德惠市人。歷任空降兵第 15 軍通信團政委、空降兵第 43 師第 127 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2007 年 8 月以後擔任河南省品質技術監督局副局長。）

第 43 旅後勤部黃軍強

第 43 旅炮兵營教導員魏成實（山東省沂南縣人。濟南東方盛豐科貿有限公司總經理。1995 年轉業從事市場經營經理。）

第 43 旅通信營無線連供電班士兵王振（安徽省阜陽市人。歷任空降兵第 43 師炮兵團司務長、服務中心主任、後勤處管理股股長、後勤處處長、空降兵第 15 軍幹休所副所長。）

第 43 旅偵察連士兵賀道洪

第 43 旅第 128 營導彈 3 連士兵王彥民

第 44 旅參謀長袁儀榮（山東省德州市人。歷任空降兵第 44 旅旅長、空降兵第 44 師師長、空降兵第 15 軍後勤部部長、副軍長，頒授少將軍銜。）

第 44 旅步兵第 2 營第 6 連士兵黃勝群

第 44 旅汽車營第 2 連班長祝鐵

第 44 旅汽車營第 2 連士兵祝劍（江蘇人）

第 44 旅汽車營第 2 連士兵單紅峰（江蘇人）

第 44 旅汽車營第 2 連士兵曾凡勝（江蘇人）

第 44 旅第 81 分隊士兵周奎軍（東北人）

第 44 旅士兵馬士勇

第 44 旅班長劉作健（四川省達縣黃庭鄉人。歷任空降兵第 44 旅排長、四川省達縣萬家鎮武裝部部長，2006 年 10 月以來擔任四川省達縣大樹鎮副鎮長兼武裝部部長。

軍司令部機要處副團職參謀姚世華（籍貫四川，現任湖北省孝感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中共孝感市國土資源局黨組成員。）

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秘書杜恒岩（北京軍區司令部秘書）

第四章、陸軍第 27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27 集團軍概況

第 27 集團軍是第一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主力部隊之一。第 27 集團軍深受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和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兄弟的信任，楊白冰曾任第 27 軍政委。因此，人們廣泛傳說第 27 集團軍是“楊家軍”，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對民眾大開殺戒。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27 集團軍隸屬於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1002”。錢國梁少將任軍長，徐永清少將任軍政委，黃信生少將和楊學林少將任副軍長，陳學政少將和陳春耕大校任軍副政委，王良均少將任軍參謀長，朱增泉少將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27 集團軍是解放軍的主力部隊之一，長期擔負著防守首都北京北大門的任務。

第 27 集團軍的前身是八路軍膠東軍區的部隊。抗戰勝利後，膠東軍區的主力部隊于 1945 年 10 月奉中共中央之命進軍東北，搶佔地盤。餘下的部隊於 1947 年 1 月整編為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又稱第 3 野戰軍）第 9 縱隊，共有 31000 多名官兵，許世友任司令員，林浩任政委，聶風智任參謀長，劉天浩任政治部主任。

國共內戰時期，華東野戰軍第 9 縱隊轉戰于山東戰場及整個華東戰場，成為華東野戰軍的主力部隊之一。先後參與萊蕪戰役、泰（安）蒙（陽）戰役、孟良崮戰役、南麻臨沭戰役、膠東保衛戰、膠（縣）高（密）追擊戰和萊陽保衛戰。在濟南戰役中一戰成名，該縱隊第 25 師第 73 團首先攻入濟南城，中央軍委授予“濟南第 1 團”榮譽稱號。

1949 年 2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全軍統一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華東野戰軍第 9 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27 軍，隸屬於華東野戰軍第 9 兵團，聶鳳智任軍長，劉浩天任軍政委，賀敏學任副軍長兼參謀長，仲曦動任軍政治部主任。屬

下的第 25 師改稱第 79 師，第 26 師改稱第 80 師，第 27 師改稱第 81 師。全軍共有 35000 多名官兵。

第 27 軍隨後參加了渡江戰役和上海戰役，在上海戰役中率先攻入上海市區。該軍偵察大隊在渡江戰役中創造了“木盆渡江”的範例，獲得“渡江第 1 船”榮譽稱號。

1950 年 10 月，第 27 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隸屬於第 9 兵團，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其時彭德清任軍長，劉天浩任軍政委，詹大南任副軍長，曾如清任軍副政委，李元任軍參謀長，張文碧任軍政治部主任，下轄第 79 師、第 80 師、第 81 師、第 94 師。入朝後投入第 2 次戰役，創造了志願軍全部殲滅美軍一個整團（美軍步兵第 7 師第 31 團）的戰例。

1952 年 10 月，第 27 軍撤離朝鮮歸國，駐防江蘇省無錫市，隸屬於華東軍區建制。

1969 年 3 月，中蘇兩國爆發珍寶島軍事衝突事件，中央軍委爲了加強首都北京的防務力量，於 1969 年 8 月 20 日電令第 27 軍北調到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化市一帶駐防。

1985 年，第 27 軍改編爲陸軍第 27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79 師（當時部隊代號“51011”）、步兵第 80 師（當時部隊代號“51014”）、步兵第 81 師（當時部隊代號“51414”），共計 3 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旅（當時部隊代號“51409”）、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410”）、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411”），以及通信團、工兵團、偵察營等部隊。

1986 年 12 月，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79 師（欠坦克團）、步兵第 80 師（欠坦克團）、步兵第 81 師的步兵第 241 團、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的 4 個營、高射炮兵旅的 2 個營、工兵團（欠舟橋營）、通信團等部隊，以及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的第 10 炮兵團（欠一個 152 加榴炮營）、第 37 炮兵團（欠一個 130 加農炮營）、工兵第 5 團（欠偽裝營營部和兩個連），還有一個汽車團、兩個偵察大隊、三個野戰醫療所、一個軍械修理所、一個汽車修理所、一個野戰防疫隊，總共 34800 多名官兵，在第 27 集團軍軍長錢國梁、軍政委徐永清率領下，開赴雲南省中越邊境的文山、硯山兩縣駐訓。1987 年 4 月，接替第 47 集團軍老山戰區防務。1988 年 3 月至 6 月 3 日，第 27 集團軍部隊陸續撤離老山戰區歸

建。

1996 年，步兵第 81 師改編為武警部隊機動師。第 27 集團軍改制為旅團化，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80 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旅，步兵第 235 團擴編為摩托化步兵第 235 旅，坦克旅改編為裝甲旅。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1989年5月18日下午，第27集團軍軍長錢國梁少將緊急奉召，乘坐軍用直升機趕赴北京軍區司令部受領任務，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政委劉振華轉達了中央軍委的緊急命令：第27集團軍立即開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27集團軍進京部隊包括步兵第79師、步兵第80師、集團軍高射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偵察營。

步兵第79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邢臺市，下轄步兵第235團（當時部隊代號“51022”）、步兵第236團（當時部隊代號“51016”）、步兵第237團（當時部隊代號“51003”）、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1019”）、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13”）、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23”），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80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獲鹿縣，下轄步兵第238團（當時部隊代號“51001”）、步兵第239團（當時部隊代號“51006”）、步兵第240團（當時部隊代號“51025”）、坦克團、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21”）、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15”），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高炮旅旅部駐地在河北省石家莊市，下轄兩個57式高炮營、三個37式高炮營和各類保障分隊。

5月18日下午6點前後，第27集團軍指揮部向步兵第79師、步兵第80師、集團軍高炮旅、工兵團、通信團、偵察營發出部隊開進的預先號令，要求各部緊急收攏部隊，進行政治思想動員，做好部隊開進的準備工作。

當晚9點鐘，第27集團軍黨委召開緊急常委擴大會，軍長錢國梁、副軍長黃信生、楊學林、軍副政委陳學政、陳春耕、軍參謀長王良均、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軍後勤部部長湯昌和、步兵第79師師長黃高成、步兵第80師師長林壽山，以及高炮旅旅長車成德、工兵團團長高水德、通信團團長程德舟等人參加了會議。

在緊急黨委擴大會上，軍長錢國梁傳達了中央軍委的緊急

命令和北京軍區負責人的指示，與會者研究、部署了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行動方案。會議決定成立以軍長錢國梁、副軍長黃信生、軍副政委陳學政、軍參謀長王良均、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軍後勤部部長湯昌和為成員的第 27 集團軍赴京執行戒嚴任務指揮組，由副軍長楊學林、軍副政委陳春耕等人組成第 27 集團軍留守領導小組。軍長錢國梁指示，赴京部隊官兵必須“思想穩定，精神振作，作風過硬，紀律嚴明，軍容嚴整，組織嚴密，指揮正確，確保安全”，並要求將這個指示迅速傳達到進京部隊的每一個官兵。

5 月 19 日清晨，部隊進京命令已經傳達到連一級，有的連隊在上午 7 點 30 分即召開緊急軍人大會，佈置進京任務。

第 27 集團軍由於參加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輪戰，為了保障部隊的戰鬥力，好幾年沒有進行老兵復員工作，直到 1988 年 3 月至 6 月 3 日部隊陸續撤離老山戰區歸建，才進行老兵復員工作，將幾年的老兵集中在 1988 年年底一起復員了。接到進京命令時，部隊中大部分是入伍不久的新兵。為了盡快完成部隊開進的準備工作，第 27 集團軍對進京部隊進行臨時編組，打亂原有建制，很多軍官都不熟悉自己的士兵。

此外，急電召回 280 名正在休假的士兵，立即送走正在部隊探親的 279 名官兵的家屬，365 名官兵推遲了婚期，已準備回家休假的官兵臨時放棄，住院治療的官兵也主動回到部隊。由於時間緊迫、任務緊急，就是家屬在部隊駐地所在城市工作的軍官都沒有回家打一聲招呼。

自受領任務起僅 8 個小時，第 27 集團軍進京部隊完成了統一思想、明確任務、調整兵員，以及車輛、裝備和物資的準備工作。

5 月 19 日晚上 7 點 30 分，第 27 集團軍先頭部隊出發，後續部隊持續跟進。在集團軍基本指揮所的指揮下，進京部隊兵分三路，沿著京石（北京市——石家莊市）公路向北京摩托化梯次開進。集團軍基本指揮所由軍參謀長王良均、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負責主持。軍長錢國梁、副軍長黃信生、軍副政委陳學政率領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先於部隊出發，提前到達北京的預定集結地建立集團軍指揮機構。

步兵第 79 師進京部隊臨時編為 2 個合成團，下轄 6 個合成

營、28 個連，共有 3916 名官兵、229 輛軍車。按照預定的開進方案，沿著河北省的元氏縣、趙縣、安國市、保定市、北京市房山縣（現為北京市房山區）良鄉鎮路線，向北京預定集結地域開進（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

步兵第 80 師進京部隊臨時編為 2 個合成團，下轄 6 個合成營、31 個連，共有 3581 名官兵、251 輛軍車。按照預定的開進方案，沿著河北省的靈壽縣、曲陽縣、徐水縣、朗縣路線，向預定集結地域北京市大興縣開進。行軍序列是步兵第 239 團居前，師指揮部居中，步兵第 240 團居後。

集團軍高炮旅進京部隊官兵乘坐 50 來輛軍車從石家莊市出發，經過兩、三個小時，於 5 月 19 日下午 4 點 30 分抵達保定市，大街上擠滿了學生和市民，攔住了道路。有的學生到軍車跟前演講，有的學生呼喊“打倒官倒、反對腐敗”等口號。士兵們第一次親眼看到學生運動，都感到新鮮。高炮旅第 4 營第 12 連第 3 班班長李建東表示：“由於沒有接到命令，我們不瞭解真相，這次又是一場政治運動，怕說錯話，引來亂子，所有官兵就用沉默來回答學生們的宣傳。”【注釋 1】

高炮旅車隊後面還跟著第 38 集團軍的車隊，大批軍車被阻在保定市的大街上，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受阻七個小時後，高炮旅車隊才離開保定市。李建東敘述說：“在我們離開保定市時，我們被老百姓圍住，是一部分學生和交警給我們築起了人牆，人群往我們軍車上吐痰，扔磚頭，我的臉上也被吐了一口，我心中一股無名之火直往腦門上撞。”【注釋 2】

5 月 19 日午後，步兵第 79 師先頭部隊車隊也在保定市受阻，在勸說疏導民眾無效情況下，師指揮部命令先頭部隊“迂回前進”。先頭部隊改變行軍路線，繞道河北省的安新縣、容城縣、涿州市，於 5 月 20 日早晨抵達北京市房山縣良鄉鎮，再次受阻。後續部隊車隊受阻於保定市，前進後退均受阻。於是組成以師參謀長王小京上校為組長的輕便指揮組，返回保定市控制和指揮受阻的後續部隊，設法排除阻力，改變行軍路線，迂回進京。

同時在保定市受阻的進京部隊，還有集團軍基本指揮所、高炮旅、工兵團、通信團，步兵第 80 師一部。高炮旅進京部隊

共有 1100 名官兵，與工兵團、通信團一樣，都是於 5 月 19 日中午 12 點從河北省石家莊市的駐地出發。上述部隊在保定市受阻 7 個小時，後來通過談判和宣傳，才終於通過了保定市區，抵達北京市郊區。

良鄉鎮——進入北京的一個關口。民眾將一輛輛大卡車橫臥路中，死鎖死住了通道。步兵第 79 師先頭部隊車隊只得靠邊停下，等候已久的人群一下子包圍上來，對官兵進行宣傳。內容是學生怎麼怎麼好，官倒怎麼怎麼凶，腐敗怎麼怎麼可惡，北京市民聲援是怎麼怎麼廣泛，等等。又說，1949 年解放北京，我們都沒看見一兵一卒、一槍一彈，現在北京解放都 40 年了，派這麼多軍隊來，想幹什麼？你們快回去吧，別上當受騙了。這一切，給官兵們造成了很大的輿論壓力。

5 月 20 日上午，步兵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從北京市豐台區趕到良鄉鎮視察受阻部隊，並為受阻部隊部署了翌日凌晨進城方案。黃高成又火速趕到北京市大興縣（現為北京市大興區）視察受阻部隊，先在附近的一家飯館，後又轉移在一輛車上開會，作了突圍部署。當時，該師只有幾百名官兵到達了預定的集結地域，其餘官兵分別被堵在北京市豐台區盧溝橋鄉、大興縣等 6 個地方。

步兵第 79 師政委刁九建趕到盧溝橋，先是集合受阻部隊官兵進行政治思想動員，為官兵們鼓勁，然後召集排級以上軍官開會，部署了突圍方案。

5 月 20 日下午，與步兵第 79 師在同一地點受阻的第 38 集團軍部隊組織了一次強行開進，由於人群堅持不散，部隊突圍失敗。晚上，圍堵的人群依然不散。一直等候到 5 月 21 日凌晨 3 點，圍堵的民眾毫無倦意，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勁頭反而越來越足。這一夜，步兵第 79 師部隊的突圍計畫落了空，師長黃高成在豐台白等了一晚上。

5 月 21 日上午 8 點 30 分，精神振奮了一晚上的民眾疲倦已極，終於漸漸散去了，交通也疏通了。步兵第 79 師指揮官一看突圍時機已經成熟，馬上下達命令：上午 9 點前做好突圍準備。上午 9 點整，師指揮官乘坐指揮車一馬當先，從車隊末尾向前行駛，逐車通知“跟上”。一輛輛軍車似脫韁的野馬，吼叫著

跟了上來，車距很小。指揮車開足馬力，車速達 90 邁，後面的車隊緊跟不舍，一下子行駛到北京市南三環路附近，擺脫了圍堵。下午 6 點鐘，部隊終於到達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

從步兵第 79 師部隊駐地到北京，只有 4 百多公里的路程，摩托化行軍竟然走了 84 小時，這在軍隊的行軍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當時，北京全民“截”兵，對於進京部隊而言，形勢非常嚴峻。5 月 21 日下午，步兵第 79 師指揮官向剛剛抵達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的軍官們介紹了形勢和任務。當天晚上 10 點，該師作戰值班室接到解放軍總後勤部直屬分部王參謀長的電話，說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在北京市豐台區大井附近遭到民眾圍攻，已有 30 多名官兵被打傷，情況緊急，請求接應。步兵第 79 師指派一位師指揮部成員率領師直屬隊和“濟南第 1 團”第 8 連的 200 多名官兵前往接應。

此後，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便成為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重要屯兵地點，也就成為北京學生組織嚴密監視的一個重點營區，晝夜有人在周圍盯著。

5 月 20 日上午 9 點鐘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第 27 集團軍下達了命令：部隊立即向北京城內開進，目的地是天安門廣場。上午 10 點鐘，步兵第 80 師部隊乘車沿著北京市大興縣蘆城、豐台區蘆溝橋路線向北京城內開進，於上午 11 點 30 分到達北京市石景山區八寶山街道衙門口，遇到大批民眾強力阻攔，無法繼續前進。

集團軍指揮部奉上級命令，率領軍部機關和軍部直屬分隊乘車緊急前往北京市石景山區玉泉路，途經衙門口以西及以南地區時也遭到民眾圍堵，被分割成數段。

第 27 集團軍指揮部命令各受阻部隊變更開進方式，改摩托化開進為徒步強行突擊。各受阻部隊遵命行事，終因圍堵的民眾實在太多，徒步開進也無法奏效，甚至連上下級之間都失去了通訊聯絡。部隊分別受阻於北京市房山縣良鄉鎮、豐臺區豐臺路口、大興縣、豐台區蘆溝橋鄉、長辛店鎮等地。第 27 集團軍指揮部只好指示受阻部隊指揮員相機處置，採取分段躍進、繞道前靠、逐次收攏的辦法，沖破民眾的阻截。

據第 27 集團軍軍史記載，步兵第 80 師的 43 輛生活保障車被圍困在裝甲兵技術學院（應該是裝甲兵工程學院，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蘆溝橋畔。裝甲兵技術學院位於吉林省長春市），步兵第 240 團團部機關以及第 1 營被阻截在蘆溝橋以南地區。

步兵第 79 師進京部隊的 1700 多名官兵、149 輛軍車在良鄉鎮等地嚴重受阻。師指揮官率領師部機關人員往來於各部隊受阻地點指揮，先後派出 13 個小組、500 多次外出接應受阻部隊，指揮受阻部隊選準時機，採取化大為小、逐點跳越、外引內接等辦法迅速收攏，在較短時間進駐預定的集結地域。

集團軍高炮旅、工兵團受阻於北京市豐臺區等地，其中工兵團的第 1 營、第 2 營和團部機關在豐臺路口被圍堵 11 個小時，第 3 營和部分團部機關人員被圍堵 4 天 4 夜。北京市民出於對戒嚴的擔心，在勸阻官兵勸阻的同時，也有一些人對官兵進行責罵、圍攻，致使官兵連日吃不上飯，喝不上水，睡不好覺，處境十分艱難。好在軍民雙方始終沒有發生武力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軍區不得不下達新的命令：第 27 集團軍部隊暫緩進入北京市區，撤回原集結地域待命。於是，各受阻部隊停止向天安門廣場的進軍行動，轉往預定的集結地域休整待命。集團軍機關、工兵團、通信團進入北京軍區後勤部第 6 分部，步兵第 79 師和高炮旅進入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步兵第 80 師到達北京市大興縣小營地區（北京衛戍區教導隊駐地）。截至 5 月 23 日早晨，該集團軍各受阻部隊全部撤回原集結地域。

【注釋 1】參見《戒嚴日記》，作者李建東。

【注釋 2】同上

第三節、積極準備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從 1989 年 5 月 23 日起，第 27 集團軍部隊轉入休整期，開始進行戒嚴執勤訓練、政治思想教育和宣傳群眾等工作。所謂的“休整期”其實不是休整，而是積極準備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其他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情況也是這樣。當時的北京學生和市民不明就裏，以為堵截成功，沉浸在喜悅之中，失去應有的警惕性。

在休整待命期間，第 27 集團軍對全體進京官兵進行封閉式管理，普遍開展了“兩堅信”（堅信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堅信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和“三熱愛”（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教育。同時，要求官兵們積極為駐地附近的人民群眾做好事，努力加強軍民聯繫，增進軍民友誼，企圖以此消解民眾的對立情緒。

官兵們主要學習中央中央的有關文件和中央中央領導人的講話，解放軍總政治部、北京軍區政治部向第 27 集團軍各師、團都派遣了工作組，幫助官兵認識北京“動亂”的性質。

第 27 集團軍把“準備好”放在第一位，積極勘察北京市有關地形，瞭解交通道路情況，擬制向北京城內開進的方案。在讓官兵休息好、生活好的同時，抓緊做好再次進入北京城的一切準備工作。同時，軍、師、團各級理順隸屬關係和指揮關係，實行領導分工負責制。各師建立了基本指揮所、前進指揮所和流動指揮所。團級以上單位建立了精幹的指揮機構。

第 27 集團軍指揮所先後數次組織師、旅、團指揮官和司令部機關人員到天安門廣場及其附近地域勘察地形道路，研究部隊開進時可能遇到的各種突發情況，並制定了戒嚴執勤、制止暴亂和指揮所緊急行動的三項預案。

各部隊以預定方案為指導，讓官兵們紮紮實實地進行了應急訓練。步兵第 79 師在訓練中重視預測情況，研究制定了戒嚴執勤中處置情況的 50 個辦法。步兵第 80 師、集團軍高炮旅還為部隊配發了北京市區交通路線圖，使官兵們做到任務熟、地形熟、情況熟。

集團軍偵察分隊有針對性地進行了應付多種突發事件的專

業基礎訓練，突出散打和捕俘技術，以及樓房攀登、單兵技術、化裝偵察、調查詢問和城市識圖用圖訓練，使偵察兵的技術水準和快速反應能力均達到了規定要求，為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奠定了基礎。

根據上級指示，5月27日至5月31日，第27集團軍派出得力幹部協助地方清除路障。各師、旅、團分別組織司令部機關人員和營、連級指揮員分期分批到天安門廣場勘察地形，研究天安門廣場清場方案。6月1日，軍長錢國梁率領各師、旅軍事主官和集團軍司令部機關部分人員到天安門廣場勘察現場，做好了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前的各種準備。

上級領導機關非常重視第27集團軍部隊。5月22日，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在第27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陪同下，看望了步兵第235團全體官兵。同日，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來到第27集團軍視察工作，聽取情況匯報，提出要求。5月23日，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北京軍區後勤部部長徐效武在第27集團軍副軍長黃信生陪同下，來到步兵第79師駐地看望部隊官兵。6月2日上午，中央軍委兩位副祕書長劉華清、洪學智在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陪同下，來到第27集團軍視察工作，並看望了該集團軍部分官兵。

上級領導機關還讓第27集團軍部隊在外國記者面前亮相，接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明鏡》週刊常駐北京記者羅安的採訪。這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首次批准外國記者對解放軍戒嚴部隊進行採訪。

5月27日下午3點鐘左右，羅安在北京市有關人員陪同下來到步兵第79師合成第1團的駐地（西倉庫），首先參觀了官兵的隊列訓練和內務設施，然後就國內外輿論普遍關注的問題採訪了朱增泉和部分官兵。朱增泉針對羅安所提出的“北京戒嚴是否合法”、“軍隊是否要鎮壓學生”等問題，按照中國官方的標準答案作了回答。同時在場接受採訪的還有合成第1團團長韋立國（步兵第237團團長）、政委武耀庭（步兵第235團政委）和6名士兵。

第四節、提前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

1989年6月2日早上，第27集團軍軍長錢國梁奉命到北京軍區司令部受領任務，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命令第27集團軍部隊提前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準備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當天上午，第27集團軍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各師長、旅長、集團軍直屬團團長參加了會議。錢國梁在會議上傳達了部隊開進命令，與會者詳細研究、部署了行動方案。

6月2日上午，步兵第79師師長黃高成、步兵第80師師長林壽山、集團軍高炮旅旅長車成德趕赴人民大會堂，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受領任務。

6月2日下午，第27集團軍各師、旅、團分別召開黨委緊急會議，下達開進命令，佈置任務，分析情況，研究制定進駐人民大會堂方案。

與此同時，軍參謀長王良均率領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先期到達人民大會堂，在三樓的河南廳建立了集團軍指揮部。步兵第79師、步兵第80師的前進指揮部成員也先後搭乘北京市政府提供的大型交通車，繞道到達人民大會堂，建立了各自的指揮部。步兵第79師指揮部開設在三樓的內蒙古廳。

從6月2日晚上9點起，步兵第79師、步兵第80師、集團軍高炮旅、通信團、工兵團先後由駐地出發，分別沿著北京市豐台區的豐臺路、蓮花池、北京市宣武區的廣安門外大街、宣武門、和平門、虎坊橋、珠市口、北京市崇文區的前門大街等路線，向人民大會堂前進。爲了避免與民眾發生沖突，保證順利進點，官兵們奉命改穿便裝，採用多批次、小批量、大間隔方式徒步行進。武器、裝備、糧秣由北京軍區另外派交通車運送。北京市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奉命派出多輛交通車協助第27集團軍運送人員、物資。

步兵第79師在開進前對人員進行了調配編組，沿著豐台路、蓮花池、前門大街路線向人民大會堂開進。5百多個行進波次中每一個行進波次都配備了一名軍官或中共黨員，並採取定點指揮與跟進指揮相結合，先期入城的該師參謀長王小京率領師部機關人員和偵察兵在交通要道設立了8個調整點，接應引

導官兵開進。王小京身為北京人，十分熟悉北京市區的交通道路情況。師、團各級負責人和機關人員大部分下到基層部隊實施跟進指揮，保證部隊在復雜環境下不潰散。儘管如此，在開進過程中，全師仍有近 2000 名官兵被民眾沖散在近百個點上。

步兵第 79 師的武器彈藥由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的四輛大型交通車負責運送。6 月 3 日凌晨，該師步兵第 235 團第 8 連官兵押運的一輛大型交通車，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被民眾發現攔截，車上載有 100 余支沖鋒槍、5 挺輕機槍、2 部軍用電臺和上萬發子彈。經過該師偵察分隊、西單公安分局、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的共同努力，以及學生和市民的配合，當天深夜 12 點，這輛車上的武器彈藥完好無損的轉移到了海軍總醫院。

步兵第 80 師部隊從 6 月 2 日晚上 9 點起，按照步兵第 238 團、步兵第 239 團、炮兵團、步兵第 240 團、坦克團、高炮團序列，全體官兵化整為零，身穿便裝，沿著虎坊橋、珠市口等路線徒步向人民大會堂開進。6 月 3 日凌晨零點前後，該師近 2000 名官兵在北京市宣武區的虎坊橋、珠市口、陶然亭等地遭到民眾圍堵，有數十名官兵在衝突中受傷送醫，大部分官兵被沖散。不少官兵繞道 20、30 公里才進入人民大會堂。

6 月 3 日上午，副軍長黃信生、步兵第 80 師政委許德亮來到北京市宣武區，親臨部隊受阻現場組織指揮，及時處理各種復雜情況，將受阻官兵臨時編組排、連、營建制，指定負責人，收攏失散人員，先後 7 次接回受阻官兵 1300 多人。

到了 6 月 3 日下午，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80 師除了少數官兵繼續被圍困於虎坊橋、陶然亭一帶外，大多數官兵已進入人民大會堂。當晚 9 點左右，步兵第 79 師官兵基本上抵達了人民大會堂。人民大會堂的院子中、臺階上全都擠滿了軍人。

6 月 3 日下午 5 點鐘左右，在北京市豐臺區集結待命的集團軍高炮旅，全體官兵奉命進駐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當天傍晚，該旅 800 多名官兵乘坐火車抵達北京火車站，然後向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徒步行進。當晚 8 點鐘，800 多名官兵在北京市東城區東單一帶受阻。6 月 4 日凌晨，該旅接獲上級新的命令，暫時撤到東單體育學校臨時集結待命，準備配合友鄰部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

時至 6 月 4 日凌晨，第 27 集團軍到達人民大會堂的官兵人數已近 7 千，其中集團軍工兵團、通信團的官兵全部到位。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80 師和高炮旅仍有 700 餘名官兵分別受阻於北京市第 182 中學（北京市宣武區壽長街 1 號）、友誼醫院（北京市宣武區永安路 95 號）、天橋辦事處（北京市宣武區虎坊路 14 號樓）、宣武區園林局（北京市宣武區白紙坊東街甲 29 號）、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7 支隊（北京市宣武區）、東單體育學校（北京市東單區大華路）等地，數日後才陸續歸隊。

據第 27 集團軍軍史記載：在整個開進過程中，全集團軍有 40 餘名官兵負傷，但無人走失或死亡。

第 27 集團軍部隊官兵在抵達人民大會堂時，必須正確地說出密語暗號，才會被允許進入人民大會堂。

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的部隊，除了第 27 集團軍，還有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第 65 集團軍步兵第 193 師、集團軍炮兵旅和守備第 3 師。人民大會堂人滿為患，居住條件很不好。以步兵第 79 師為例，臨時編組的 2 個合成團的數千名官兵擁擠在內蒙古廳外面的中央大廳，場地非常緊張。三塊 50 釐米見方的水磨石要睡上兩個人。結果，窗臺上、暖氣護板上、過道上、廁所門口，全都躺滿了人。被臨時編入合成第 2 團的坦克團、高炮團這兩個單位的背包一個也沒有拉進來，官兵們只能合衣躺在水磨石上休息。

第五節、出擊特遣分隊佔領紀念碑

1989年6月4日凌晨1點30分，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向第27集團軍下達了一道命令：派遣精幹部隊佔領並搗毀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第27集團軍指揮部立即召開了有集團軍指揮部成員和師長、旅長、直屬團團長參加的緊急作戰會議，成立了集團軍前進指揮所和出擊特遣分隊，為出擊特遣分隊制定了3套行動方案和20餘種處置緊急情況的措施。

出擊特遣分隊的任務就是佔領並搗毀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出擊特遣分隊由四個連隊、200多名官兵組成，集團軍偵察營的偵察第1連、步兵第79師偵察連、步兵第80師偵察連、以步兵第235團第3營為主組成的新編第4連。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參謀趙勇明少校擔任出擊特遣分隊指揮官。

在討論由誰擔任出擊特遣分隊指揮官的時候，幾位集團軍指揮官都認為趙勇明是最合適的人選，只有他才能完成這項光榮、艱巨、責任重大的任務。趙勇明在接受任務時毫不猶豫地表示：“請首長放心，堅決完成任務！”趙勇明事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趙勇明是江蘇省南通市人，當過大隊團支部書記，1975年12月在農村入黨，1976年12月入伍，曾兩次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並立下戰功。

緊急作戰會議結束後，各師、旅、團分別對連級以上軍官進行了緊急動員，將部隊進行了戰鬥編組，分派了任務。步兵第79師政委刁九健率領一個小組經由地下通道，前往中南海懷仁堂附近勘察地形，做好保衛重點目標的準備。

6月4日凌晨2點，出擊特遣分隊整裝待發，官兵們個個頭戴鋼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衝鋒槍或機槍。第27集團軍官兵在人民大會堂憋了很長時間，看到這個情況，知道出擊行動馬上就要開始，精神為之一振，紛紛起立歡呼，為出擊特遣分隊助威鼓勁。軍長錢國梁、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親自給出擊特遣分隊做政治思想動員工作並提出要求，進京的五名集團軍黨委常委也全部到齊，集體為出擊特遣分隊官兵送行。

6月4日凌晨4點30分，中國官方架設在人民大會堂樓頂的高音喇叭宣佈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簡短通告：“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

與此同時，等候多時的出擊特遣分隊奉命出發，從面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前，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方向穿插前進。集團軍偵察營偵察第1連和步兵第79師偵察連擔任主要突擊任務，官兵們選擇火勢較弱的地點越過火障，沖到紀念碑底座附近。步兵第80師偵察連擔任右翼突擊任務，迅速推進到紀念碑底座西南側，然後成一線展開。偵察兵史新、徐紹武和肖緒明組成三角形戰鬥隊形，在隊伍前面開路，一接近紀念碑底座，又與後面的小組配合，以跑姿前進、跪姿前進、匍匐前進、交替前進等戰術動作向紀念碑底座接近。

此時，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回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呼籲，繼續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有秩序地端坐在紀念碑底座各級臺階上，或高唱《國際歌》，或呼喊口號，安然地迎接最後結局的到來，沒有對逼近的出擊特遣分隊官兵採取任何阻擋措施。這正是出擊特遣分隊官兵能夠快速而順利地接近紀念碑底座的原因。

一接近紀念碑底座，出擊特遣分隊官兵很快兵分兩路，齊聲喊起了口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鎮壓暴徒，保衛首都”“暴亂不平，決不收兵”。數千名學生依然端坐不動，只是悲壯的《國際歌》歌聲更加響亮了，回蕩在遼闊的天安門廣場上空。

中國軍方的記載聲稱：“一個學生投擲了一個汽水瓶，啪地一聲正好砸在一名戰士的鋼盔上。一名戰士朝天鳴了槍。”

【注釋1】這個記載戳穿了中共當局一再重複的謊言：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解放軍戒嚴部隊沒有開槍。

出擊特遣分隊官兵接近目標時，紀念碑底座及其四周擠滿了數千名學生。趙勇明指揮官兵們迅速從正面和兩翼向紀念碑底座突擊。偵察第1連抵近紀念碑底座北側，連長劉建軍、指導員李相武分別率領尖刀班直插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帳篷。這時，偵察兵肖緒明繞到了紀念碑底座東北角，那裏有漢白玉欄杆阻攔著，稍加思考，把機槍往欄杆上一掛，縱身一躍，翻過欄杆上了紀念碑底座。

偵察兵徐紹武、曹瑾和蔣中從紀念碑底座北側臺階沖上紀念碑底座。中國軍方的記載聲稱：當時，有一個學生呼籲大家血戰到底，說“不能讓同學的血白流。”一邊叫喊，一邊從上層碑座上撲了下來，隔著欄杆，來搶蔣中手裏的衝鋒槍。徐紹武、楊萬泉看得真切，分別躍了上去。那個人一看不好，縮回去了。【注釋 2】

偵察第 1 連尖刀班迅速搭人梯翻過紀念碑底座欄杆，沖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佔領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隨之開槍把綁在紀念碑北側碑體上的一組高音喇叭打啞，接著又沖進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廣播室，關掉發電機，收繳了全部廣播器材和大批宣傳印刷品。與此同時，步兵第 79 師偵察連和步兵第 80 師偵察連也分別開槍打掉了紀念碑碑體南側和西南側的兩組高音喇叭。開槍擊毀學生廣播站喇叭的命令，來自於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

6 月 4 日凌晨 5 點，出擊特遣分隊從紀念碑底座由上到下驅趕學生，強行清場。到了凌晨 5 點 25 分左右，出擊特遣分隊完成了佔領和搗毀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任務，收繳 861 電臺 1 部、發電機 3 臺、答錄機 1 台、擴音機 8 台、高音喇叭 5 個，還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記錄簿 3 本，以及大量的錄音帶、傳單、標語等物品。

出擊特遣分隊本來負有抓捕學生領袖的任務，由於數千名學生走得很緊密，很難下手抓捕學生領袖，爲了避免節外生枝就沒有動手。這說明出擊特遣分隊擁有學生領袖的照片資料。當時在場的學生領袖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碩士研究生）、副總指揮李錄（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封從德（北京大學遙感研究所碩士研究生），以及包括邵江（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梁擊噉（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學生）、周鋒鎖（清華大學學生）、馬少方（北京電影學院夜間班學生）在內的多名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常委。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當解放軍戒嚴部隊對天安門廣場展開最後清場行動時，第 27 集團軍除了奉命派遣一部分部隊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前擔任警戒任務，配合友鄰部隊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外，主力部隊則奉命擔任預備隊，在人民大會堂集結待命，隨時準備完成上級賦予的各項任務。

【注釋 1】參見《從老山主峰到天安門廣場----記榮立集體三等功的某師》一文，作者宋復興，見於《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539 頁至 548 頁。

【注釋 2】出處同上。

第六節、天安門廣場清場以後的動向

1989年6月4日清晨5點30分左右，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基本結束，但解放軍戒嚴部隊尚未控制北京局勢，數萬名官兵擁擠在天安門廣場區域，物資供應十分緊張。第27集團軍奉命維護秩序，搶運各種物資。步兵第80師先後派出6個小組，從30多個副食店和飯店購買速食麵4300斤、罐頭120箱、饅頭4500余斤，解決了部隊的燃眉之急。

6月5日，步兵第79師炮兵團部分官兵在天安門廣場冒雨連續工作近10個小時，為60餘架次軍用直升機卸下各類物資120餘噸。步兵第240團第1營擔任紀念碑及天安門廣場西側部分地段的警戒執勤任務，集團軍高炮旅出動510餘人次，擔負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西側的警戒執勤任務。

6月7日，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統一部署，第27集團軍部隊奉命撤離人民大會堂。於是，第27集團軍撤銷進京時臨時編組的2個合成團建制，恢復原來的部隊建制，分頭進駐新的戒嚴執勤點。

集團軍指揮部進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機關大院（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2號），步兵第79師指揮所率領步兵第235團進駐北京市鐵路公安局，步兵第236團、步兵第237團分別進駐北京飯店（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33號）和中共北京市委汽車隊，步兵第79師的炮兵團、高炮團、坦克團分別進駐中國紡織工業部機關大院（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12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北京市東城區東單北大街）和亨通旅館（北京市崇文區天壇東路66號），步兵第80師指揮所率領步兵第238團、炮兵團進駐建國門地鐵站（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南大街和建國門北大街交匯處）地下大廳，步兵第239團進駐古觀象臺（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立交橋西南側），步兵第240團和高炮團進駐北京郵政公寓（北京市豐台區蓮花池東路124號），坦克團進駐北京市檔案局（北京市東城區貢院西街8號）和經濟幹部管理學院（北京市朝陽區花家地街19號），集團軍工兵團、高炮旅進駐東單體育場（北京市東城區東單體育場路）。

第27集團軍各部進駐新的駐紮點後，以主要力量控制北京飯店以東至建國門立交橋一線各交通要點，派遣官兵定時巡

邏，定點值勤。從 6 月 7 日下午 6 點起，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80 師和集團軍高炮旅派出 1500 余名官兵，冒雨連夜清除路障。截至 6 月 8 日清晨，將北京飯店至東單路口，以及建國門立交橋西側的路障全部清理完畢，恢復了北京飯店至建國門內大街 3 點 5 公里路段的交通。

6 月 14 日，根據上級統一部署，第 27 集團軍將駐守北京市區的部分部隊撤到北京郊區。其中，集團軍工兵團於當天下午全部撤至豐臺區，步兵第 80 師部分直屬部隊、坦克團的 3 個連、高炮團的 2 個連、炮兵團的 2 個連，於 6 月 16 日拂曉前撤至北京市大興縣，集團軍高炮旅的 2 個營於 6 月 16 日撤至位於豐臺區的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

集團軍指揮所、集團軍直屬分隊、集團軍高炮旅、通信團等部隊，於 6 月 19 日從北京市東城區撤至位於豐臺區的北京軍區後勤部第 6 分部，步兵第 80 師（欠坦克團）撤至位於北京市大興縣的北京衛戍區教導大隊駐地營房、北京衛戍區招待所、團河農場等地待命，並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

此外，遵照北京軍區命令，步兵第 79 師和步兵第 80 師的坦克團將赴內蒙古駐紮訓練，於 6 月 19 日晚上分別撤至豐臺區、北京市大興縣，作短暫休整，於 6 月 20 日返回河北省邢臺市和河北省獲鹿縣營房。

與此同時，第 27 集團軍指揮部對繼續留在北京市區執勤的步兵第 79 師部隊的兵力部署進行了調整。該師主要擔負北京市東城區的戒嚴執勤任務，同時還擔負正義路至建國門立交橋路段的巡邏任務，分散在 29 個駐紮點上。其中，步兵第 235 團駐紮在北京市汽車服務部旅館和東單體育場，炮兵團駐紮在中國紡織工業部機關大院，步兵第 236 團駐紮在北京飯店、解放軍總參謀部管理局第 4 招待所（北京市東城區校尉胡同 1 號）和《經濟日報》報社（北京市宣武區白紙坊東街 2 號），步兵第 237 團駐紮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市朝陽區北四環中路 33 號），高炮團駐紮在國家旅遊局（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甲 9 號），師指揮部和師直屬隊分別駐紮在北京市地鐵公安分局、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北京市東城區台基廠大街 1 號），師後勤部駐紮在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南大街 6 號）和四川省駐京辦事處（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內貢院西街頭條 5 號）。

8月8日，根據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命令，第27集團軍指揮部再次進行兵力部署調整，繼續留在北京市區戒嚴執勤的部隊有步兵第79師的步兵第235團、步兵第236團、步兵第237團，以及集團軍偵察營、步兵第80師偵察連。

8月11日，步兵第79師接替了第39集團軍、第40集團軍、第64集團軍在北京市朝陽區的7個戒嚴值勤點和11個戒嚴駐勤點。

8月16日，第27集團軍指揮所奉命率領步兵第80師部隊離開北京，返回河北省石家莊市駐地。留京部隊由副軍長黃信生、軍副政委陳學政指揮率領，集團軍指揮所遷移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5號）。

1989年10月，中央軍委根據北京形勢作出了調整解放軍戒嚴部隊兵力部署的決策。北京軍區因此制定了第3次戒嚴部隊兵力部署調整方案，認為第27集團軍已圓滿地完成了北京戒嚴執勤任務，應於10月下旬撤離北京，返回河北省駐地。第27集團軍指揮部向師、團負責人作了傳達，並進行具體工作部署，提出有關交接班和回撤工作的標準要求。此後，各團分別召開連級以上軍官會議，統一思想，明確任務，提出要求，並用1天時間對官兵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10月22日零點，第27集團軍留京部隊撤出建國門立交橋、東直門立交橋、馬甸立交橋等戒嚴執勤點，並與第24集團軍部隊完成防務交接。

10月25日零點，第27集團軍指揮部率領步兵第79師部隊組成一個行軍縱隊，按照步兵第237團、師直屬部隊、步兵第235團、步兵第236團、集團軍指揮部序列，沿著木樨園、豐臺路口、京石（北京市——石家莊市）公路向河北省石家莊市摩托化開進，當天晚上10點前全部抵達駐地歸建。

第七節、有關陸軍第 27 集團軍的誤傳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開槍殺人最多的是第 38 集團軍，時間是在 1989 年 6 月 3 日夜晚至 6 月 4 日凌晨，地點是在西長安街。其次是空降兵第 15 軍，時間是在 1989 年 6 月 3 日夜晚至 6 月 4 日凌晨，地點是在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第 27 集團軍於 6 月 2 日進駐人民大會堂，與發生在上述時間和地點的開槍殺人事件無關，事後卻背了黑鍋，無論是在海外媒體，還是在中國民間，都被說成是殺人最狠、最多的部隊。

關於第 27 集團軍的誤傳主要有三則，首先在北京民間流傳，隨後又在海內外廣泛地傳播。

誤傳之一：指稱第 27 集團軍於 6 月 3 日夜晚至 6 月 4 日凌晨沿著西長安街挺進天安門廣場，肆意開槍屠殺民眾，然後又血洗了天安門廣場。而事實上，第 27 集團軍奉命於 6 月 2 日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並沒有參與西長安街等地的屠殺行動。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也只是派遣了一個由 205 名官兵組成的出擊特遣分隊，負責佔領和搗毀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

誤傳之二：指稱支持開槍鎮壓的第 27 集團軍與反對開槍鎮壓的第 38 集團軍於 6 月 4 日清晨在北京南苑機場交火開戰，並發生了激烈的炮戰。而事實上，當時這兩個集團軍都部署在天安門廣場，根本不可能在南郊的南苑機場交火開戰。

誤傳之三：指稱第 27 集團軍的主要領導人是楊尙昆、楊白冰兄弟的親屬，號稱“楊家軍”，因此執行血腥鎮壓任務格外賣力。而事實上，時任第 27 集團軍軍長的錢國梁是江蘇省吳江縣人，時任軍政治部主任的朱增泉是江蘇省無錫市人，兩人出身農民家庭，與祖籍四川的楊家兄弟沒有親戚關係。（軍政委徐永清少將當時正在國防大學進修，他是浙江省建德縣人，也與楊家兄弟沒有親戚關係。）

為什麼會出現上述的誤傳呢？主要可能因為第 27 集團軍不久前參加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對越作戰，參戰時間是從 1986 年 12 月到 1988 年 6 月 3 日。當時有不少人認為解放軍戒嚴部隊之所以在北京殺人如此兇狠，視人命為草芥，是因為在

對越作戰中早已殺紅了眼。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中，第 27 集團軍作為唯一一個成建制參加過老山戰區對越作戰的集團軍，正好符合這個條件。而第 38 集團軍除了由 838 名偵察兵所組成的偵察大隊（戰地番號是第 12 偵察大隊）外，沒有參加過老山戰區的對越作戰。

另一個原因是，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的抗命事件廣泛流傳，深受北京各界的讚賞和敬佩，愛屋及烏，人們普遍對第 38 集團軍抱有好感。

此外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北京大學學生那些年都在第 38 集團軍接受軍訓，相互間存在著友誼，學生們不相信自己所熟悉的官兵會對自己大開殺戒。從 5 月 20 日北京戒嚴以來，北京大學學生一旦發現被阻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屬於第 38 集團軍，總是上前傾訴軍訓期間的友誼，並齊唱第 38 集團軍軍歌。

由於上述三個誤傳，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幾天時間內，河北省石家莊市民眾圍攻第 27 集團軍軍部，憤怒呼喊：“27 軍是劊子手！”“27 軍鎮壓人民！”“27 軍殺死老人、孩子和學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第 27 集團軍在當地工作的家屬普遍受到同事們的責罵和冷遇，在地方學校上學的子也普遍遭到同學們的責罵，菜店拒絕賣菜給他們，糧店拒絕賣糧給他們。這種壓力使得第 27 集團軍的官兵們無法忍受，強烈要求集團軍領導出面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

在軍內外強大的壓力下，第 27 集團軍不得不破例以集團軍黨委的名義給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轉告河北省的父老鄉親們：第 27 集團軍奉命赴京執行戒嚴任務，沒有向首都人民和學生開一槍。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將此信轉發到各級政府，分頭去做群眾工作，才使得第 27 集團軍的處境有所改變。這件事充分說明，開槍鎮壓民眾不僅在北京不得人心，在中國其他地區也同樣不得人心。

第 27 集團軍的上述做法，狠狠將了同樣駐守在河北省的第 38 集團軍一軍，第 38 集團軍若不公開表態澄清，等於承認自己確實向首都人民和學生開了槍。惱怒之下，第 38 集團軍一狀告到中央軍委，指責第 27 集團軍既然是奉命赴京平息反革命暴亂，為什麼視開槍為大逆不道，而要公開澄清什麼事實真相。這種不請示中央軍委而擅自給地方黨政機關寫信的做法，不但

違背軍紀，而且與中央在“六四”問題上不保持一致。

第 38 集團軍告這一狀，實際上是借機要求和迫使中央軍委對開槍的問題明確表態，予以肯定，從而爲自己開槍鎮壓北京民衆的行爲推卸責任。沒想到中央軍委的表態十分模糊：“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有人說這是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的原話）這個答覆，顯然表明中央軍委也不願承擔開槍的責任。

第八節、第 27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25 名官兵）

軍長錢國梁少將

副軍長黃信生少將

軍副政委陳學政少將

軍參謀長王良均少將

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少將

軍後勤部部長湯昌和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旅長車成德大校

集團軍工兵團團長高水德

集團軍通信團團長程德舟

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參謀趙勇明少校（江蘇省南通市人，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參謀翁乃奎

步兵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大校

步兵第 79 師師政委刁九健大校

步兵第 79 師參謀長王小京上校（北京人）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7 團團長韋立國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5 團政委武耀庭

步兵第 79 師政治部幹事馮朗峰

步兵第 79 師政治部幹事畢永軍

步兵第 79 師偵察第 2 連連長王清志

步兵第 79 師偵察第 4 連連長韓全蘭

步兵第 79 師偵察第 4 連士兵王開政

步兵第 79 師偵察第 4 連士兵董文德

步兵第 79 師偵察第 4 連士兵陳瑞明

步兵第 79 師偵察連班長史新

步兵第 79 師偵察連士兵徐紹武

步兵第 79 師偵察連士兵肖緒明

步兵第 79 師偵察連士兵曹瑾

步兵第 79 師偵察連士兵蔣中

步兵第 79 師偵察連士兵楊萬泉
步兵第 79 師炮兵團政治處主任范金梁少校
步兵第 79 師炮兵團第 3 營代理營長郭建學
步兵第 79 師炮兵團第 3 營士兵黃守海
步兵第 79 師炮兵團第 3 營士兵陳平
步兵第 79 師炮兵團第 3 營士兵徐宏亮

步兵第 80 師師長林壽山大校
步兵第 80 師政委許德亮大校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政治處主任任文鎖少校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排長劉漢臣少尉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士兵陳海兵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士兵王四成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士兵孔德祥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士兵傅國明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班長蔣志剛

步兵第 80 師偵察連排長李光群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代理連長劉建軍上尉（偵察營副營長兼）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副連長趙軍國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指導員李相武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第 5 班班長朱躍（朱躍青）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第 6 班班長曾小華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第 6 班副班長曲繼光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第 1 班班長許團輝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第 3 班班長孫濤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第 4 班班長朱永軍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第 3 班士兵陳志軍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士兵韓誼東
集團軍偵察營第 1 連士兵高洪波

步兵第 79 師代理副師長朱梅生（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少將軍銜。）

步兵第 79 師政治部主任傅劍仁（湖南省攸縣人。轉業後任河北省政法委員會副秘書長。1993 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黎明啓程》，報告文學集《可以公開的叢林秘密戰》等。）

步兵第 79 師炮兵指揮部主任戴荷福上校（浙江省路橋人。1989 年 10 月起歷任浙江省臨海市武裝部政委、中共浙江省臨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中共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區委委員、組織部長。2000 年 8 月以來任浙江省台州市交通局副局长。）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5 團“濟南英雄連”指導員杜光宇（出生于新疆。歷任營教導員、步兵第 235 團副政委。1998 年轉業至江蘇省常州市交通局任宣教處副處長，2000 年 6 月調至常州交通技工學校擔任黨委書記、校長。）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5 團副連長費國華（江蘇省武進市人，現任江蘇省常州市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動植物檢驗檢疫科科員。）

步兵第 235 團指導員徐士剛（歷任副營職幹事、副教導員、教導員、團政治處副主任等職。1999 年 10 月起歷任中共睢甯縣王林鄉、邱集鎮組織委員、中共睢甯縣魏集鎮黨委副書記。2006 年 3 月以來任睢甯縣魏集鎮人大主任。）

步兵第 79 師士兵潘彬（四川省達縣石梯鎮人。1991 年退伍後歷任達縣福壽鄉文化站職員、副鄉長、鄉長、鄉黨委書記、中共達縣銀鐵鄉黨委書記、九嶺鄉黨委書記。2007 年 7 月以來任中共達縣五四鄉黨委書記。）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5 團 1 炮連士兵姜東彬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5 團第 1 連士兵姜鋒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5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陳瑞明（該連被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先鋒連”榮譽稱號）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6 團教導員劉青（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歷任步兵第 79 師直工科科長、坦克團政治處主任、政委、師政治部主任、第 27 集團軍第 235 旅政委、第 27 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2005 年 7 月轉業，任中共河南省委統戰部任副部長。）

步兵第 236 團第 5 連連長徐鳳華（後升任副營職參謀。1992 年轉業，任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西街道辦事處武裝部長。）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6 團保密員王懷金（湖北省黃梅縣蔡山鎮人。1991 年 7 月轉業分配到湖北省黃梅縣檢察院，歷任書記員、助理檢察員、檢察員、稅務檢察室副主任、反貪局副局長兼偵查二科科長、檢察委員會委員。一級檢察官。）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6 團士兵李良峰（四川達縣龍會鄉人。1992 年 8 月至 1994 年 7 月在石家莊陸軍學院讀書。1994 年 8 月至 1999 年 8 月在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7 團服役 1999 年 9 月轉業後任四川省達縣陳家鄉中共黨委委員、武裝部長、副鄉長。）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6 團班長方強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6 團通信連士兵董興全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7 團第 1 營炮兵連指導員葉俊智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7 團榴炮連副指導員、代理指導員馬海龍（江蘇省如皋市人。歷任步兵第 237 團政治處組織股股長、江蘇省如皋市武裝部政工科副營職幹事、正營職幹事、科長、江蘇省南通市港閘區武裝部副部長兼軍事科科長。2008 年 1 月以來任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建設局、環保局副局長、區征地拆遷安置辦公室副主任。）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7 團士兵宇飛（四川省南部縣人。歷任步兵第 237 團排長、團政治處幹部股任幹部幹事、代理指導員。1999 年 8 月轉業到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磨家鎮人民政府工作，2007 年 5 月以來任中共涪城區玉皇鎮黨委副書記。）

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237 團班長曹式琦（天津市武清區王慶坨鎮人。1995 年 8 月轉業，歷任中共天津市武清區王慶坨鎮黨委辦公室主任、中共天津市武清區徐宮屯街道工委紀檢委員。2005 年 10 月以來任中共天津市武清區陳咀鎮黨委紀檢委員。）

步兵第 79 師炮兵團偵察連士兵李小兵

步兵第 79 師炮兵團士兵華維（遼寧省大連市莊河縣勝利街道北頭委六組人）

步兵第 79 師高射炮兵團第 1 連士兵周建成

步兵第 79 師坦克團士兵黃小軍（湖北人）
步兵第 79 師坦克團第 1 連士兵張濤
步兵第 79 師坦克團第 1 連連長周秉足（2004 年在營長任上轉業）
步兵第 79 師坦克團衛生隊張偉
步兵第 79 師坦克團衛生隊劉永生

步兵第 79 師特務連班長陸文旭（陝西省西安市人，2000 年 8 月至
今任香港奧美公司西北分公司經理）
步兵第 79 師司令部總機班靳敏

步兵第 80 師參謀長蔣依康（1985 年）
步兵第 80 師副參謀長張文彥（1985 年）
步兵第 80 師政治部主任周衍智（在六四鎮壓事件中立三等功）
步兵第 80 師某團團長彭新國（湖南省攸縣人）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8 團軍務參謀夏元吉（1987 年轉業至江
西省科學院，歷任辦事員、科員、科長、副主任。）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8 團連長何成保（江蘇省丹陽市雲陽鎮
人。歷任步兵第 238 團政治處組織股股長、營教導員。1999 年
8 月轉業，歷任中共丹陽市紀委黨風廉政室、紀檢監察室科員、
紀檢監察室副主任、紀檢監察二室主任、紀檢監察一室主任。
2006 年 6 月以來任中共丹陽市紀委常委、紀檢監察一室主任。）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8 團班長康書琦。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團長楊正武（江蘇省建湖縣人。歷任
步兵第 81 師參謀長、師長、武警 81 師師長。1999 年 7 月以來
任武警山東省總隊總隊長，頒授少將警銜。）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政治處幹事王錄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39 團士兵何興林（四川省江油市白龍鎮人）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40 團第 1 營 3 連班長陳運祥（四川省漢川
市人）
步兵第 80 師步兵第 240 團第 1 營第 3 連士兵劉鵬（陝西省西安
市人）
步兵第 80 師炮兵團汽車連班長杜建國（山西省人）
步兵第 80 師炮兵團汽車連士兵秦峰（安徽省利辛縣人）

步兵第 80 師炮兵團汽車連士兵孔慶偉

步兵第 80 師炮兵團汽車連士兵喬保蘭

步兵第 80 師炮兵團汽車連班長牛英（湖北省武漢市人）

步兵第80師坦克團政治處主任楊玉峰（四川省南部縣人。歷任

步兵第80師步兵第239團政治委員、第27集團軍高炮旅政委、步

兵第80旅政委、河北省軍區承德軍分區政委、河北省軍區邯鄲

軍分區政委。2004年1月以來任中共河北省邯鄲市委常委、邯鄲

軍分區政委。）

步兵第 80 師高射炮兵團士兵王建召，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連長甄景瑞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副連長范新林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指導員姚鳳舞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第 2 班班長李建東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第 1 班班長于堅強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第 3 班班長劉小路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第 4 班班長任剛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第 5 班班長常德群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第 4 營第 12 連班長李建東

第 27 集團軍士兵趙海光（河北省昌黎縣人，後來轉業到河北省
石家莊市國稅局工作。）

第 27 集團軍士兵李剛

第 27 集團軍士兵王丙軍

第 27 集團軍士兵劉輝

第 27 集團軍士兵呂志剛

第 27 集團軍士兵吳明友

集團軍機關副營職管理員成典前（1998 年轉業到連雲港煙草公
司工作，後來在雲南玉溪註冊了百匯城經貿有限公司，從事商
品貿易，又在雲南省昆明市關雨路成立雲南興成投資有限公
司。）

集團軍通信團副團長王雲（河北省易縣人。1992 年 3 月至 1997
年 8 月任集團軍直屬通信團團長。1997 年 8 月至 2002 年 1 月任

河北省民政廳救災救濟處處長。2002 年 1 月至 2006 年 9 月任河北省民政廳助理巡視員。2006 年 9 月以後任河北省民政廳副巡視員。）

集團軍司令部通信科科長張世生（河南省信陽縣勞店鄉三台張村人。1990 年 4 月轉業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歷任人事處副處長、辦公室主任、所長助理，近代歷史研究所黨委副書記、副所長。2004 年 6 月以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

集團軍政治部幹部處正營級幹事高山（河北省易縣人。歷任集團軍政治部幹部處副處長、處長、山西省軍區大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山西省軍區忻州軍分區政委。2006 年 4 月以來任中共忻州市委常委、忻州軍分區政委。）

集團軍炮兵旅偵察連第 1 班士兵李書政（河南省魯山縣人）

第五章、陸軍第63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63 集團軍概況

第 63 集團軍是第一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的主力部隊之一，但是，包括不少研究者在內，一直都沒有對該集團軍予以足夠的重視。事實上，該集團軍長期為掌握中國軍權的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所信任、倚重。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該集團軍的軍、師一級指揮官幾乎都得到了提拔，大批官兵立功受獎，步兵第 188 師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二等功。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63 集團軍隸屬於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山西省省會太原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2935”。刁從洲少將任軍長，曲繼甯少將任軍政委，劉蔭超少將任副軍長，任鳳傑少將任軍副政委，劉逢君少將任軍參謀長，張秋祥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牛建福大校任後勤部部長，方榮華大校任技術部部長，汪潮海少將任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副書記。

第 63 集團軍的前身是抗戰時期冀中平原的八路軍部隊。1945 年 9 月，冀中軍區第 7 軍分區、第 8 軍分區、第 9 軍分區各調出三個團，第 6 軍分區和第 10 軍分區各調出一個團，組成晉察冀野戰軍冀中縱隊，下轄第 1 支隊、第 2 支隊和第 3 支隊（後改稱第 11 旅、第 12 旅和第 13 旅），楊成武任司令員，林鐵任政委，李志民任副政委。

1945 年 9 月 17 日，冀中縱隊從冀中河間、天津以西、保定以南地區出發，10 月初到達張家口附近集結。隨後，第 11 旅和第 13 旅參加綏遠戰役，佔領了綏東地區，第 12 旅佔領了察南的蔚縣、廣靈和暖泉鎮。

1946 年 6 月，冀中縱隊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野戰軍第 3 縱隊，楊成武任司令員，李志民任政委，下轄第 7 旅（原第 12 旅）、第 8 旅（原第 13 旅），成為解放軍華北野戰軍的主力部隊之一。1947 年 1 月，察哈爾軍區獨立第 11 旅編入晉察冀野戰軍第 3 縱隊序列，改稱第 9 旅。同年春天，晉察冀野戰軍第 3 縱隊由鄭維山接任司令員，胡耀邦接任政委。1947 年 6 月

中旬至 1948 年 10 月底，參加了青滄戰役、第 1 次和第 2 次保北戰役、清風店戰役、石家莊戰役、察南戰役、冀東阻擊戰、平綏東段破襲戰。

1949 年 1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晉察冀野戰軍第 3 縱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63 軍，隸屬於第 19 兵團建制，鄭維山任軍長，王宗槐任軍政委，易耀彩任副軍長兼軍參謀長，龍道權任軍政治部主任。第 7 旅改稱第 187 師，第 8 旅改稱第 188 師，第 9 旅改稱第 189 師。

1949 年 12 月初，第 63 軍參加平津戰役，配合第 64 軍、第 65 軍將國民黨軍隊傅作義部的第 35 軍包圍於新保安，並擊潰了向新保安增援的傅作義部第 16 軍和第 104 軍。1949 年 3 月，進軍山西。4 月 24 日，配合友鄰部隊攻佔了太原市。

1949 年 6 月初，第 63 軍隨同第 19 兵團劃歸解放軍第 1 野戰軍建制，先後參加了扶眉戰役、隴東追擊作戰、蘭州戰役和攻佔寧夏的作戰行動，協同第 1 野戰軍主力部隊攻佔了西北陝甘寧地區。

1951 年 2 月 15 日，第 63 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隸屬於第 19 兵團，由軍長傅崇碧、軍政委龍道權率領，於 2 月 17 日入朝參戰。在第 5 次戰役的阻擊戰中表現出色，尚未休整便擔負起堅守鐵原地區，掩護各部隊撤退的重任，傷亡慘重，頑強死守 12 天。戰後，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親赴第 63 軍致敬。

1953 年 9 月，第 63 軍撤離朝鮮回國，駐防河北省石家莊市。1968 年，該軍步兵第 189 師改編為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4 師。

1969 年，第 63 軍移防山西省太原市。

1985 年，第 63 軍改編為陸軍第 63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187 師（當時部隊代號“52940”）、步兵第 188 師（當時部隊代號“52941”）、步兵第 189 師（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4 師恢復步兵第 189 師番號歸建，當時部隊代號“51384”），共計 3 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旅（當時部隊代號“51378”）、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379”）、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380”）、通信團、工兵團、偵察營等部隊。

1996 年，步兵第 187 師改編為武警部隊機動師。1998 年後，步兵第 189 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旅，坦克旅改編為裝甲旅。第

28 集團軍撤銷番號後，摩托化步兵第 82 旅改歸第 63 集團軍建制。

2003 年，第 63 集團軍撤銷番號。摩托化步兵第 82 旅劃歸第 27 集團軍建制，步兵第 189 師轉為預備役建制，步兵第 188 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第 188 旅，劃歸第 27 集團軍建制。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63 集團軍進京的部隊包括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188 師，以及集團軍坦克旅、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由軍長刁從洲少將、軍政委曲繼甯少將爲首組成集團軍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部隊。

步兵第 187 師屬於乙種步兵師編制，全師官兵 6032 人，師部駐地在山西省榆次市，下轄步兵第 559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33”）、步兵第 560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39”）、步兵第 561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27”）、炮兵團，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 188 師屬於甲種摩托化步兵師編制，全師官兵 12394 人，師部駐地在山西省忻州市，下轄步兵第 562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34”）、步兵第 563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38”）、步兵第 564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28”）、坦克團、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2930”）、高射炮兵團，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 188 師是第 63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組建於抗日戰爭時期，人們習慣稱之爲“野 8 旅”，國共內戰時期在華北解放軍中屬於頭號主力師。1987 年，該師曾代表北京軍區部隊接受解放軍總參謀部考核團的全面會考，獲得總評第一。1989 年初春，解放軍總參謀部一位副總參謀長在該師主持現場會，授予該師“裝備管理達標第 1 師”錦旗。

集團軍坦克旅駐地在山西省運城市。集團軍炮兵旅駐地在山西省孝義市。集團軍通信團駐地在山西省省會太原市。

作爲第一批奉命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第 63 集團軍於 5 月 18 日就接到了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緊急命令。5 月 18 日，軍長刁從洲少將緊急奉召，乘坐軍用直升機趕赴北京軍區司令部受領任務，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轉達了中央軍委調動第 63 集團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

任務急，時間緊。軍長刁從洲當天乘坐軍用直升機返回軍部駐地山西省太原市，來不及召開作戰會議，便使用軍用保密電話向屬下各部隊傳達部隊進京命令。

5月18日下午3點29分，步兵第188師師長黃伯誠大校接到軍長刁從洲親自打來的電話：根據北京軍區命令，你師立即趕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要緊急收攏部隊，啓封車輛，計畫於5月20日零點前趕到北京。

命令來得突然，時間非常緊迫，除去開進途中所需的時間外，緊急收攏部隊和各種出發準備工作的時間，僅有16個半小時。該師部隊散佈在方圓百里的區域，5月中旬又正是部隊開訓、生產、施工的黃金季節，一些團的官兵正在遠離駐地營房70多公里處的部隊農場插秧勞動。

步兵第188師黨委緊急召開常委碰頭會，從動員到統一思想，從部署到分工，僅僅花了20分鐘。按照分工，副師長張連印負責下達收攏部隊的指令；師參謀長李海清負責組織人員繪製行軍路線，擬定部隊開進文書；師政治部主任趙喜海負責部署部隊開進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編寫部隊緊急出動的宣傳提綱；師後勤部部長馬貞國負責籌措糧秣錢財，啓封車輛，加油加水，發放物資。師部三大機關（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的各科室都緊急運轉起來，全師上下，忙得不可開交。

步兵第188師組成先遣組，由師保衛科科长張育林擔任先遣組負責人，負責勘察部隊的開進路線、宿營地、集結地和受領作戰任務等。

一個小時後，步兵第188師黨委全部成員分頭驅車趕到了屬下各團，“督陣”指揮緊急收攏部隊，進行各項出發前的準備工作。

5月19日早晨6點鐘，各團相繼報告：部隊緊急收攏完畢，一切準備完畢。比原定的16個半小時的準備時間，提前了2個小時。

5月19日中午12點鐘整，師長黃伯誠乘坐指揮車帶頭駛出駐地營房，由數百輛各類軍車組成的龐大車隊緊隨其後，滿載著5千多名官兵，進入京原（北京市---太原市）公路，向北京摩托化開進。這是該師創建以來歷史上時間最緊、規模最大、人員車輛出動最多、攜帶量最大、距離最長、最爲壯觀的一次實兵實裝摩托化開進。

步兵第188師自從1953年撤離朝鮮歸國後，20多年來一直

駐紮在山西境內太行山的群山懷抱中，環境十分封閉。當車隊在太行山山脈中穿行時，該師官兵從收音機中聽到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關於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消息。在車隊短暫休息、組織討論的時候，基層官兵才知道北京“動亂升級”，此行是去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基層官兵得知此行目的地竟然是首都北京，情緒激昂，興奮不已，一路談論著北京的名勝古跡，一路想像著北京民眾熱烈迎接的方式。（其他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在進京前也都有類似的期望，他們根本不瞭解北京學生運動的真相和北京民眾普遍反對戒嚴的態度。）然而，事情絕不象官兵們想像的那樣，車隊越接近北京，迎接他們的越是一件件無論是記憶裏還是想像中都未曾有過的事情——

石塊、水泥墩、掀翻的卡車，在進京的公路上築成一道道路障；成千上萬激動而憤怒的民眾呼喊著口號，揮舞著胳膊，擋住進京部隊車隊去路；“當兵的滾回去！”“不能讓他們進城鎮壓大學生！”

按照上級領導機關的情況通報和指示，步兵第 188 師指揮部不斷調整、改變著行軍路線，儘管如此，還是在北京市房山縣受到了阻攔，數百輛軍車被堵在了公路上，長蛇似地逶迤十幾里長。蜂擁而上的人群把一份份反對北京戒嚴、反對鎮壓學生運動的傳單扔進軍車車廂，塞進駕駛室。

發生在眼前的一幕幕情景，讓原先以為會受到北京民眾熱烈歡迎的官兵們驚愕了：北京這是怎麼啦？！北京民眾是怎麼啦？！更令人驚愕的事情還在後頭——

許多士兵帶著訓練場上的汗水，帶著插秧田裏來不及抹去的泥水，跋涉了兩天兩夜，沒喝上一口水，沒吃上一頓熱飯，望著路邊個體戶的包子攤饑餓難忍。給養員跳下軍車，掏出現金和糧票，好說歹說希望買走一籠包子，個體戶紋絲不動，繼而掀翻了包子攤，毅然決然地說：“寧可喂狗，也不賣給你們當兵的！”

幾位渴極了的士兵跳下軍車，在路邊澆灌農地的機井旁蹲下，用手捧起了水。突然，有農民過來關上了電閘，又朝淺水坑裏一把把地撒沙子……

爲了清除路障，繼續開進，步兵第 188 師指揮部組織了由 9

百名官兵所組成的 3 支突擊隊。突擊隊員們身繫腰帶，徒步沖到了車隊的最前面，一面清除路障，一面解釋勸說，驅散不願離開的群眾。爲了不使人群再次沖到公路上，士兵們手拉手組成人牆，連在一起，在公路兩側站成兩排。這時候，一些憤怒的民眾開始向突擊隊員們投擲磚頭、石塊。在突擊隊員們的努力下，車隊艱難地推進了 10 公里。但是，群眾並沒有放棄阻攔的努力，而且聞訊趕來聲援的民眾越來越多。車隊再次停住了，部隊奉命原地休息，尋求時機掩蔽前進。

步兵第 188 師車隊受阻的地點，在靠近北京市昌平火車站的北京機車車輛廠附近。當天晚上，該師黨委在公路旁的田野裏召開了緊急黨委擴大會議，與會的師、團主官們席地而坐，研究探尋著新的行軍路線、新的轉進方案。師黨委要求官兵們在新形勢、新情況下必須做到 4 條：第一，堅決聽從中央軍委指示，不信、不聽、不傳謠言。第二，部隊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是正義的，合法的。第三，提高警惕，嚴密防止壞人搶奪武器裝備。第四，展開宣傳攻勢，揭穿謠言。

步兵第 188 師進京部隊車隊被圍堵了 2 天 3 夜。5 月 23 日清晨 6 點 30 分，該師按照上級指示，放棄了原先進駐北京市區的計畫，轉而進駐北京市房山縣良鄉鎮、豐台區盧溝橋鄉。

第 63 集團軍其他進京部隊也都在北京郊區受阻，未能按照原定計畫進入北京市區。步兵第 187 師轉而進駐北京市房山縣良鄉鎮。

第三節、第 188 師成爲第 38 軍督戰隊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7 點鐘整，步兵第 188 師指揮部接到上級命令：全師官兵全副武裝，於當天晚上 9 點 30 分乘車向天安門廣場強行開進！

此時，按照部隊開進的預先號令要求，該師全體官兵已在解放軍總參謀部工程兵部機關大院（位於北京市石景山區）集結待命。在北京西郊的各軍隊機關大院中，工程兵部機關大院的規模比較小，在這個只有“彈丸之地”的機關大院，6 月 3 日晚上創造了它有史以來的最高記錄——一夜之間，住進了逾萬名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

接到向天安門廣場進軍的命令，官兵們都興奮得不得了，頓時，整個工程兵部機關大院象熱水開了鍋，官兵們的普遍心理是：這個時刻終於來到了！該師官兵與其他部隊的官兵一樣，自從進京以後就一直處於封閉式管理狀況，猶如籠中的老虎急於脫困而出。

針對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步兵第 188 師主要指揮官和師司令部的有關人員早已多次化裝進入北京市區勘察進軍路線，並深入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實地偵察。其中，師參謀長李海清帶領師司令部參謀人員反復勘察部隊的開進路線，設想多種部隊開進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情況，制定出相應的行動方案，組織師司令部有關人員反復予以熟悉。

6 月 3 日晚上 9 點 30 分，步兵第 188 師全體官兵全副武裝登車完畢，一百多輛軍車整裝待發。晚上 10 點鐘整，師長黃伯誠一聲令下，該師先頭團率先出發，後續部隊緊緊跟上，尾隨第 38 集團軍部隊，沿著長安街由西向東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跟隨著步兵第 188 師部隊，乘車沿著同一條路線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還有第 63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通信團。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第 1 排排長、後來被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劉國庚，與 26 名官兵所乘坐的軍車，是從復興路、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最後一輛車。

第 63 集團軍一直深受楊尙昆、楊白冰兄弟信任，在發生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抗命事件之後，楊家兄弟對第 38 集團軍很

不放心，特意安排步兵第 188 師尾隨開進，起著督戰隊的作用。

步兵第 188 師的先頭部隊是步兵第 564 團，由團長譚永生上校乘坐指揮車率先開路，團政委李文瑞上校居中負責聯絡協調。師參謀長李海清上校靠前指揮，率領師前進指揮所隨同先頭團開進，以便隨時發揮指揮作用，確保部隊順利開進。

龐大車隊剛一駛出工程兵部機關大院，就遭遇到大批民眾的阻攔，人群蜂擁而上，車隊受阻。團長譚永生走下指揮車，組織先頭團官兵進行抵抗和反擊。車隊被阻 20 多分鐘，他就在車下指揮了 20 多分鐘，使車隊前後聯絡一直暢通，全團沒有一個人失散，沒有一台車被毀。

在五棵松路，民眾將公共汽車、卡車、掛車等車輛分三層橫置在路上，眼見部隊車隊迎面開來，便放火焚燒車輛。頓時，濃煙滾滾，火光沖天。騰騰烈焰，炙烤得人們不能靠近，加之大批群眾奮力堵截，部隊車隊被迫停駛。先頭團官兵再次跳下車，強行驅散民眾，排除路障。

此時的西長安街上，數以萬計的民眾擁滿街頭，一個個主要路口和一條條主要路段，全都佈滿了用水泥隔離墩和各種車輛所設置的路障。高低障礙搭配，火障、路障交錯。這一切，給部隊車隊的開進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根據中國軍方的資料記載，步兵第 188 師指揮官們執行鎮壓命令的態度堅決而明確，向天安門廣場挺進途中，他們在形勢非常艱難危險的情況下恪盡職守，指揮靠前。師長黃伯誠率領師指揮部，在身體兩處被砸傷後，始終掌握住兩部電臺，對部隊實施不間斷的指揮。師政委邵松高少將被群眾圍堵在西單路口長達十幾個小時，面對責問、怒罵、甚至毆打，他與同車的師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趙敏一道，積極宣傳教育群眾，保護機密檔和武器彈藥，直到暈倒在指揮車上。師後勤部部長馬貞國帶領所屬分隊的車隊在北京市石景山區玉泉路受阻，他跳下車來，迅速收攏車輛，繞小路迂回前進。

各團領導在關鍵時刻也都挺身而出，衝鋒陷陣。步兵第 562 團政委李德順本來於六月三日凌晨率先秘密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可當他得知後續部隊被圍堵時，又冒險繞街穿巷，連夜返回了集結地。6 月 4 日凌晨，十里長安街，火海石雨，當他帶領部隊行至西單路口時，民眾的火槍彈擊中了他的右臂，頓時鮮

血直流，染紅了衣袖。他只是簡單包紮後就下車指揮部隊。從永定路到新華門的路上，他下車指揮十多次，保證車輛和人員迅速抵達天安門廣場。

其實，步兵第 188 師在開進途中並沒有遇到什麼大的阻礙，因為有第 38 集團軍在前開路。第 38 集團軍配有裝甲車，又肆無忌憚地開槍殺人，早已開出一條通往天安門廣場的血路。

6 月 4 日凌晨 2 點多鐘，步兵第 188 師部隊車隊到達臨近天安門廣場的指定集結位置，停靠在從新華門到人民大會堂一帶。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左右，步兵第 562 團作為步兵第 188 師的後衛部隊，也到達預定地點新華門。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左右，步兵第 188 師指揮部接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所下達的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師長黃伯誠迅速下達指示，組織協同，不到 10 分鐘，就把該師 5 千多名官兵整隊帶到金水橋南面，在東華表以西地段展開，跟隨著第 38 集團軍部隊和裝甲車隊，由北向南一步一步地向紀念碑底座推進。6 月 4 日凌晨 5 點 30 分左右，與空降兵第 15 軍等部隊在紀念碑底座實現會師。

第四節、第 187 師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

1989 年 6 月 2 日，步兵第 187 師指揮部接到上級命令，部隊於當天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集結待命，準備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同時奉命進駐人民大會堂的還有步兵第 188 師的 2 個團，由步兵第 188 師政治部主任趙喜海上校指揮率領。

步兵第 187 師部隊進京時曾在北京市房山縣受阻，臨時奉命駐紮在房山縣良鄉。經過短暫的休整期，部隊悄悄向北京城內移動，進駐位於石景山區的解放軍總參謀部工程兵部機關大院。

接到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的命令後，步兵第 187 師指揮部召開了緊急作戰會議，對部隊開進作了精心的計畫。緊急作戰會議決定，部隊主要通過北京地鐵系統輸送，從石景山地鐵站出發，分別抵達北京火車站、崇文門、前門等地鐵站，然後從地面分批、徒步向人民大會堂開進。官兵們一律身穿便裝，徒手分批開進。武器裝備則利用不掛軍用車牌的車輛，從地面分批運入人民大會堂。

從 6 月 2 日下午開始，從崇文門地鐵站和前門地鐵站不斷湧出一波波年輕人，終於引起民眾的注意，驚呼解放軍戒嚴部隊通過地鐵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堵死了崇文門地鐵站和前門地鐵站的出口，並在附近大街上開始攔截盤查，一些官兵四處躲閃，崇文門、前門以及天安門廣場一帶到處可見散兵游勇。

1989 年 6 月 3 日凌晨 1 點鐘，步兵第 187 師師長高宗武大校身穿便裝，乘坐一輛銀灰色的 213 吉普車，從師指揮部出發，前往人民大會堂。車子途徑北京市西城區阜城門外大街，有民眾認出這是一輛軍用吉普車，連忙高呼：“截住它，截住它，這是當兵的車，是大官的車！”一些民眾快速用自行車、交通隔離墩、垃圾桶等物品設置路障，軍用吉普車不得不減速行駛，有的民眾趁機圍上前來，拍打著軍用吉普車的擋風玻璃叫喊不停。師長高宗武一看苗頭不對，命令駕駛員加速前進，硬是逼退了圍上來的民眾。

高宗武抵達人民大會堂之時，步兵第 187 師已有三分之二官兵以各種方式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其中包括該師的司令

部、政治部、後勤部三大機關和師屬醫院。

6月3日凌晨3點鐘，師長高宗武會同其他師部指揮官，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開設了師指揮部，該師的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三大機關，以及師醫院的臨時醫務所也設立在臺灣廳。

6月3日凌晨3點10分，步兵第187師指揮部在臺灣廳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各級指揮官均參加了會議。師長高宗武在會議上宣佈了“約法四章”：第一、要認真學習和遵守人民大會堂的各项規章制度；第二、要象愛護眼睛一樣愛護人民大會堂的一草一木；第三、要和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搞好團結；第四、要軍容嚴整，塑造文明之師、威武之師的光輝形象。

會議結束後，燈光暗淡下來了，大家進行小憩，輕微的鼾聲使勞累了一天一夜的部隊官兵很快就進入了夢鄉。然而，師長高宗武卻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因為該師還有三分之一的官兵沒有抵達人民大會堂。當時，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地鐵站出口均已被學生和民眾堵死，大街上又有大批學生和民眾搜尋、截查，剩餘的三分之一官兵能否按計劃進入人民大會堂，沒有把握。

此後，陸續有零散的該師官兵突破民眾的攔截，進入人民大會堂，也帶來了官兵受阻的消息。

6月3日上午8點鐘，步兵第187師指揮部裏響起“叮呤呤”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頓時把大家都驚醒了。“喂，師指揮所嗎？我是XXX團保衛幹事郭蘭玉。現在我們團團長、政委和司政後（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機關總共47人被圍困在西單路口，形勢十分危急！”

這47名步兵第187師某團指揮部及機關人員，攜帶著該團的部分槍支彈藥，乘坐掛地方牌照的大轎車，全體人員均身穿便裝，但還是在西單路口被警惕性頗高的民眾識破真相，遭到攔截。

步兵第187師參謀長郭明高抓過電話筒，立即下達了指示：“要向圍堵的群眾做好宣傳解釋工作，要忍讓、克制，不要使矛盾激化，一定要保護好槍支彈藥！”

過了一會，電話中又傳來新的消息：某部一位少將軍政委遭到一夥“暴徒”的圍攻侮辱。他們扒掉將軍的衣服，弄到車頂上讓外國人肆意拍照錄影……聽到這些，步兵第187師指揮部裏的人們當即睡意全消，情緒一下子緊張起來。

上述這一段來自中國軍方的資料有一個錯誤，在西單路口附近被攔截的這一輛車子上確實有一位少將，但不是軍政委，而是師政委，他就是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8 師政委邵松高。

陸續進入人民大會堂的步兵第 187 師官兵駐紮在臺灣廳以及廳外的走廊過道，整裝待命。地小人多，十分擁擠。各級軍事主官在緊張地準備行動計畫，各級政工幹部在對官兵們進行政治思想動員。

第五節、守護人民大會堂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步兵第 187 師被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當作預備隊，配合其他解放軍戒嚴部隊實施清場行動，同時，承擔著保衛人民大會堂的任務。除了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由步兵第 188 師的 2 個團守衛之外，其他的 7 個大門均由步兵第 187 師部隊守衛。

人民大會堂本來就是中國重要的政治性場所，加上當時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又設在其中，就顯得更為重要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的一些負責人在人民大會堂內同步觀察、監督解放軍戒嚴部隊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

6 月 3 日上午 11 點鐘，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民大會堂的東門、西門、北門、南門、西南門、西北門……所有的 8 個門均遭到數萬名學生和市民的圍困。學生和市民發現人民大會堂集聚了大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擔憂會威脅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和平請願學生。叫喊聲一陣陣傳入臺灣廳來：“當兵的，法西斯！”“不許鎮壓學生！”

6 月 3 日中午 12 點鐘，在緊張的氣氛中，步兵第 187 師指揮部還是按時開飯了，每人一包速食麵、一塊麵包、一袋榨菜。就這麼些食物，官兵們也不敢放開食用，隨意填飽肚皮，因為每個人只隨身攜帶了三天的乾糧，看外頭民眾圍堵的驚人陣勢，誰知道在人民大會堂要呆多久，不勒緊褲帶，往後的日子可不好過。

6 月 3 日下午 5 點 20 分，人民大會堂外面圍堵的民眾越來越多，估計不會少於 10 萬人，第 187 師官兵們覺得局勢越來越嚴峻。

過了半個小時，部分民眾砸開人民大會堂西北門上的鐵鎖，沖進人民大會堂院內約 50 米遠。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聲稱，在怒罵聲中，民眾砸碎了人民大會堂西北門門口哨所的門窗玻璃、電話、椅子。人民大會堂西北門周圍的子母燈被砸碎了 7、8 個。“咣啷”一聲，人民大會堂 2 樓西側一塊 4 平方米的玻璃被砸了一個碗口大的洞。事後有人數了一遍，共有 4 塊玻璃被砸。

6月3日下午6點40分，步兵第187師一個中等個、頭戴鋼盔、滿臉稚氣的士兵，一躍沖出人民大會堂，面對沖進西北門院內的民眾，撿起民眾扔過來的磚頭、啤酒瓶子、水泥疙瘩，勇猛地進行反擊，逼迫民眾連連後退。這個士兵的舉動得到了步兵第187師政治部幹事倪福田上尉的高度稱讚。

其實，民眾只是圍困人民大會堂而已，並沒有衝擊人民大會堂，如果數萬名民眾衝擊人民大會堂，軍民雙方發生衝突，一定會有大量的人流血受傷。無論是中國官方和民間，都沒有這方面的報導。學生組織倒是一直在人民大會堂周圍佈置糾察線，防止發生衝擊人民大會堂事件，避免流血衝突。

6月3日晚上7點鐘，步兵第187師指揮部召開了緊急會議。與會者有的站著，有的蹲著，有的坐著，圍攏一圈。師長高宗武做動員講話：“暴徒正在衝擊人民大會堂，形勢十分危急，現在我們要守住人民大會堂，要與人民大會堂共命運，決不能讓壞人肆意污辱，決不能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共和國美好的今天，落入反革命分子手中。我們要果敢地、勇猛地、不惜一切代價地保衛人民大會堂，保衛共和國。按照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命令，後面部隊將在晚上9點開始強行開進。我們搞好緊急動員，要做好充分準備，配合大部隊行動。”

“堅決捍衛共和國，徹底制止動亂！”不知是誰帶頭喊了一句口號，與會者緊接著喊了起來。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官兵們紛紛請戰，請求組織把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他們，有的士兵向組織遞上了墨蹟未乾的決心書。

6月3日晚上8點鐘，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給步兵第187師指揮部下達了命令：集中兵力保衛人民大會堂。師長高宗武、師參謀長郭明高、師後勤部部長劉樹志和臨時負責師政治部工作的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陳勇，以及師部部分機關人員，立即進入緊急狀態。他們把人民大會堂的各大門、各通路以及各大門被圍堵的情況偵察清楚，及時制訂了行動方案，僅用了半個小時就完成了兵力部署。

6月3日晚上9點鐘，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陳勇和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陳汝勝組織有關人員制訂了第一線思想政治工作的綱要，緊接著部署政工幹部分頭到各單位進行政治思想動員。當時，師政治部主任王謙上校在駐地負責留守工作，師政委常

久大校負責帶領該師另外 2 個團尚未抵達人民大會堂。

步兵第 187 師師屬醫院也在緊張地忙碌著，院長艾倉柱及時組織大家成立了戰時救護隊，擺了幾張長條桌子，搭了一個簡易手術臺，備好藥品，隨時都可以搶救受傷的官兵。

到了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 30 分，步兵第 187 師部隊根據上級佈置的任務，一切準備就緒，嚴陣以待。

在人民大會堂的西門、西北門，一群民眾還在激情叫喊著不走。其他各個大門仍然有數千名民眾在圍堵。

步兵第 187 師指揮官們和師部機關幹部分頭到各個大門靠前指揮。陳勇帶著電動小喇叭，指揮政治工作組穿梭於人民大會堂各個大門之間。

就在此時，師長高宗武下達了部隊出擊命令，只聽他高聲叫道：“部隊進行出擊，把侵犯人民大會堂的暴徒趕出去！”緊接著，一隊隊官兵一邊高喊：“暴徒留下，群眾閃開！”“制止暴亂，保衛大會堂！”一邊沖出人民大會堂大門。轉眼之間，在人民大會堂周圍軍民發生了激烈的肢體衝突。民眾人數雖然不少，但畢竟缺乏訓練，又沒有組織，漸漸地低檔不住官兵的強大衝擊，一步步往後退，最終全部退到了遠離人民大會堂的範圍。

此後，步兵第 187 師部隊接管了人民大會堂各個大門的警戒任務，一直到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

第六節、天安門廣場清場後的動向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第 63 集團軍部隊，包括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188 師、集團軍炮兵旅、通信團，臨時駐紮在人民大會堂。三天之後，才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新的軍事部署計畫，陸續撤離人民大會堂，轉到新的駐地，執行戒嚴執勤任務。

其中，步兵第 188 師轉到第二炮兵部隊司令部機關大院（位於南禮士路）駐紮了 9 天，後又轉到兒童醫院（北京市西城區南禮士路 56 號，西二環復興門立交橋向北 200 米路西側）駐紮了 15 天。

1989 年 6 月 7 日以後，第 63 集團軍部隊進駐包括解放軍報社在內的機關單位，在北京市西城區擔負戒嚴執勤任務，在各交通要道設立崗哨，並定時派出武裝巡邏隊。

同時，進駐北京市西城區各公安派出所，名義上是配合公安人員，實際上是主導抓捕“動亂分子”、“暴亂分子”和“非法組織的骨幹分子”。與其他解放軍戒嚴部隊一樣，第 63 集團軍部隊官兵對被捕者毫不手軟，不分青紅皂白，照例先是一頓毒打，不少被捕者受傷致殘。

1989 年 7 月，中共 13 屆中央委員會第 4 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西賓館（屬於軍方賓館）召開，步兵第 188 師部隊負責週邊警衛工作。該師政治部保衛科科长張育林隨同師領導人一起負責察看地形，佈置兵力，組織實施。中共 13 屆 4 中全會結束後，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視察的第一支解放軍戒嚴部隊就是步兵第 188 師，可見該師深受中共領導人的信任。

1989 年 8 月，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兵力調整方案，步兵第 187 師奉命撤離北京，返回原部隊駐地。該師以摩托化開進方式，於 8 月 18 日返回原部隊駐地——山西省榆次市、壽陽縣。據中國官方資料聲稱，榆次市、壽陽縣政府動員數萬名群眾上街歡迎步兵第 187 師部隊在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後“凱旋歸來”。

198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 40 周年，第 63

集團軍再次受到中共領導人的青睞，步兵第 188 師承擔了國慶慶典活動的警衛任務。步兵第 188 師作為野戰部隊，第一次參與社會治安的警衛工作，從部隊的思想觀念到戰術技術要求和行為方式都不太適應，為了在執行警衛任務時不出紕漏，該師政治部保衛科科长張育林建議從抓部隊官兵的培訓教育入手，然後進行反復的演練，讓部隊官兵很快進入了角色，熟悉了警衛工作的基本要領。到達警衛現場後，張育林又親自給每個崗位定崗定位，明確任務，確保了國慶慶典活動整個警衛工作的圓滿完成。

1990 年 10 月，第 11 屆亞洲運動會在北京舉行，步兵第 188 師又一次承擔安全警衛工作，負責亞運會 10 個訓練場館的執勤任務。張育林隨同師領導人一起逐個場館勘察地形，確定哨位，佈置兵力，組織演練，最後的執勤任務由張育林組織落實具體實施。

步兵第 188 師政治部保衛科科长張育林在部隊幾次奉命執行安全警衛工作中，勞心勞力，確保了安全警衛工作不出紕漏，因此立功受獎，並一路升官，歷任第 63 集團軍政治部保衛處副處長、處長、軍事博物館管理處處長、政治部副主任、紀委副書記，頒授大校軍銜。

在完成第 11 屆亞洲運動會的執勤任務後，步兵第 188 師才奉命撤離北京，結束在北京的戒嚴執勤行動，以摩托化開進的方式，返回原部隊駐地---山西省忻州市。

步兵第 188 師是最晚撤離北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之一，這也顯示第 63 集團軍深受中國當局和掌管軍權的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的信任。

第七節、第 63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37 名官兵）

軍長刁從洲少將

軍政委曲繼甯少將

副軍長劉蔭超少將

軍副政委任鳳傑少將

軍政治部主任張秋祥少將

軍參謀長劉逢君大校

軍後勤部部長牛建福大校

軍技術部部長方榮華大校

步兵第 187 師師長高宗武大校

步兵第 187 師師政委常久大校

步兵第 187 師參謀長郭明高

步兵第 187 師政治部主任王謙

步兵第 187 師後勤部部長劉樹志

步兵第 187 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陳勇

步兵第 187 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陳汝勝

步兵第 187 師某團保衛幹事郭蘭玉

步兵第 187 師上尉幹事倪福田

步兵第 187 師醫院院長艾倉柱

步兵第 187 師醫院副院長張海昌

步兵第 187 師醫院醫生周振山

步兵第 187 師醫院醫生安金鎖

步兵第 187 師醫院醫生田鳳太

步兵第 187 醫務所所長薛景海

步兵第 187 師醫院調劑員王根社

步兵第 187 師醫院衛生員柴憲國

步兵第 187 師團長耿鐵連

步兵第 187 師女軍醫高豔萍

步兵第 188 師師長黃伯誠大校

步兵第 188 師師政委邵松高少將
步兵第 188 師參謀長李海清
步兵第 188 師政治部主任趙喜海
步兵第 188 師後勤部部長馬貞國
步兵第 188 師後勤部運輸科科長李厚華
步兵第 188 師某團參謀長劉春生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團長丁克忠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政委李德順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大功團”）團長馬新芝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政委張志傑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團長譚永生（河北省深澤縣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政委李文瑞
步兵第 188 師坦克團團長劉世清
步兵第 188 師坦克團政委錢秋根
步兵第 188 師炮兵團團長張雲山
步兵第 188 師炮兵團政委宋曉茹
步兵第 188 師高射炮兵團團長呂湘泉
步兵第 188 師高射炮兵團政委李宗獻（或閻增雨）

步兵第 188 師炮兵團第 4 營營長王彥春
步兵第 188 師某團第 3 營營長劉訓海
步兵第 188 師政治部宣傳科幹事張明
步兵第 188 師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趙敏
步兵第 188 師某團第 6 連指導員王勝進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特務連指導員廖開喜（山東省滕州市前洪緒鄉顏樓村人，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88 師某團第 3 營衛生所所長鄧仁興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炮兵營第 1 連代理汽車排長張震（河南省鹿邑縣新集鄉人，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軍務股股長陶祥禮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炮兵營第 1 連士兵徐淮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炮兵營第 1 連士兵孫利華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特務連連長黃靜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特務連排長李文海（河北省撫寧縣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炮兵營 3 炮連連長韓守君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炮兵營第 1 連駕駛員丁于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指導員張景安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第 1 排排長劉國庚（死亡，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第 1 排司機班長樊立華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通信員張正洪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炊事班士兵牛宗福（山東人）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軍械員兼文書郭志才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第 1 排第 3 班士兵王占峰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第 1 排士兵劉洪濱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營第 4 連第 1 排士兵王小兵

（以下具體部隊番號不明）

某師第 3 連指導員王素凱
石景連
某團司令部參謀方劍鋒
士兵王宏軍
某集團軍盧安軍

北京軍區政治部幹事邱繼臣中校

步兵第 187 師炮兵團班長閻浩湧（1991 年以來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工作）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59 團士兵張兵（河南省方城縣人）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59 團士兵姚太忠（河南省方城縣人）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59 團第 9 連士兵周建斌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0 團班長王文獻（2007 年 3 月以來任河南省永城市城廂鄉專職副主席。）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0 團第 14 連士兵韓明辰（河北省趙縣各子莊鄉大馬村人）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0 團第 14 連士兵杜軍利（河北省正定縣人，提幹後轉業）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0 團士兵周曉戈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0 團士兵王彪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0 團士兵徐繼濤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1 團二機炮連士兵彭盛千（湖北省大悟縣人）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1 團班長谷建平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1 團班長李智慧（河南省南陽市人）

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561 團第 4 營第 15 連第 6 班士兵胡春良

步兵第 187 師炮兵團班長閻浩湧（1991 年以來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工作）

步兵第 188 師政治部保衛科科長張育林（湖北省大冶市還地橋鎮張冲灣村人。歷任第 63 集團軍政治部保衛處副處長、處長、軍事博物館管理處處長、政治部副主任、紀委副書記，頒授大校軍銜。）

步兵第 188 師政治部政工科正連級幹事傅銳（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區人。歷任師修理營教導員、師後勤部管理科科長、步兵第 563 團副政委、炮兵團政委、步兵第 188 旅副政委。2006 年 10 月轉業，任山西省紀檢委正處級幹部。）

步兵第 188 師警調連士兵崔党詢（陝西省西安市人）

步兵第 188 師士兵王之國（2003 年 12 月轉業，任忻州師範學院藝術系團委書記。）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特務連士兵劉勝（河北省石家莊市深澤縣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特務連士兵蔡傳貴（安徽省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班長段志飛（北京市昌平區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班長徐海鵬（北京市昌平區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2 團衛生隊楊昌新（山東省濱州市人。2007 年至 2008 年任北京麥肯廣告公司施工經理）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榴炮 3 連指揮排排長張宏（河南省

洛陽市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團長鐘志銘 (後來升至中將)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 2 中隊 24 分隊士兵孔繁斌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 2 中隊 24 分隊士兵王致敬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 2 中隊 24 分隊士兵趙志林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 2 中隊 24 分隊士兵魏廣紅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 2 中隊 24 分隊士兵陳曉偉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趙義存 (歷任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3 團連長、河北省石家莊地區供銷社茶葉公司幹事、石家莊地區供銷社老幹部處科員、石家莊市供銷合作總社辦公室主任。2007 年以來任石家莊市物資回收總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後勤處財務股股長朱喜順 (歷任師司令部政治協理員、代理科長、管理科長。1997 年 9 月轉業到河北省井陘縣國土資源局任副局長。)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第 2 營第 4 連班長王聯群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第 1 營第 2 連班長肖希鎮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班長仇建文 (河北省平山縣人。2006 年 4 月以來任河北省平山縣東回舍鎮武裝部部長。)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二機連班長朱寅險 (北京市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二機連班長蓋彥平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榴炮 3 連士兵付慶國 (河北省新樂市人)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第 2 營第 4 連連長高力根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第 2 營第 4 連排長溫朝中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王聯群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王春明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第 2 營第 4 連谷建友

步兵第 188 師步兵第 564 團第 3 營第 9 連班長王曉龍

步兵第 188 師坦克團第 3 營營長田俊山 (後來任師司令部裝甲科科長。1998 年 8 月轉業，任天津市武清區審計局副局級調研員。)

步兵第 188 師坦克團第 9 連士兵王占永

步兵第 188 師坦克團第 9 連士兵唐亞峰

第 63 集團軍士兵李京華（河南省人。2005 年以來擔任河南天坤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主任。）

第 63 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訓練處處長李世明（四川省三台縣人。歷任步兵第 188 師參謀長、步兵第 189 師師長、第 24 集團軍參謀長、軍長、北京軍區副參謀長、瀋陽軍區參謀長、副司令員、成都軍區副司令員。2007 年 9 月以來任成都軍區司令員。2005 年 7 月晉升為中將軍銜。）

第 63 集團軍炮兵旅參謀長翟永平（歷任第 63 集團軍炮兵旅副旅長、旅長。2006 年 3 月以來任天津市勞動教養管理局副巡視員。）

集團軍炮兵旅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劉英男（遼寧省瀋陽市人。歷任第 63 集團軍紀委副團職幹事、高炮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 63 集團軍教導大隊政委、北京市通縣武裝部政委、北京市朝陽區武裝部政委。）

第 63 集團軍炮兵旅第 5 營副營長周寶山（歷任第 63 集團軍炮兵旅第 5 營教導員、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預備役炮兵第 72 師第 215 團政委、河北省唐山市老幹部局副局長。2005 年 6 月以來任唐山市房管局副局長。）

第 63 集團軍炮兵旅特務連指導員李志發（天津市人。歷任第 63 集團軍炮兵旅教導隊副營職區隊長兼教員、副營職管理員、天津市塘沽區人才交流服務中心副主任、天津市塘沽區人事局服務中心主任科員、機關幹部科副科長、國家公務員管理科副科長、退休幹部管理科科長。2005 年 12 月以來任天津市塘沽區大沽街工委武裝部部長。）

第 63 集團軍炮兵旅政治部副主任賴太茂（1993 年轉業到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檢察院任黨委副書記、副檢察長。）

第 63 集團軍黨委秘書陳煥文（山西省左權縣人。歷任第 63 集團軍政治部組織處處長、師政治部主任、旅政委。2003 年 12 月以來任呼和浩特警備區政委。）

集團軍炮兵旅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孫越（北京市石景山區人）

集團軍炮兵旅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孫顯朋（山東省單縣人）

第 63 集團軍高炮旅政治部副主任楊俊生（山西省祁縣人。歷任第 63 集團軍高炮旅政治部主任、山西省太原市稅務局南城區局

掛職副局長、太原市國家稅務局紀檢組長、黨組成員。2001 年 1 月以來任太原市國家稅務局副局長。）

第 63 集團軍坦克旅司令部正連職參謀李高儒（河北省陽原縣人。歷任第 63 集團軍司令部副營職、正營職、副團職參謀、軍務處副處長。2005 年 2 月以來任內蒙古軍區達拉特旗武裝部政委。）

第 63 集團軍坦克旅特務連士兵靳學武（山西省運城市人。歷任第 63 集團軍坦克旅裝步營第 2 連排長、警衛偵察連副連長、山西省軍區運城軍分區司令部副連職參謀、正連職參謀、副營職參謀、動員科副科長、山西省聞喜縣武裝部副部長兼軍事科科長、山西省軍區運城軍分區司令部副團職參謀。2008 年 2 月以來任山西省新絳縣武裝部部长。）

集團軍坦克旅 2 中隊 21 分隊士兵耿雪省（1994 年提幹，後來轉業到山西省太原市技術監督部門工作。）

第六章、陸軍第 40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40 集團軍概況

第 40 集團軍是首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在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雖然不如第 38 集團軍、空降兵第 15 軍、第 27 集團軍等部隊那麼顯眼和重要，但也算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部隊。步兵第 118 師事後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二等功。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40 集團軍隸屬於瀋陽軍區，軍部駐地在遼寧省錦州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81054”。吳家民少將任軍長，鄭順舟少將任軍政委，劉占英少將任副軍長，高雲江少將任軍副政委，楊福臣大校任軍參謀長，楊維起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40 集團軍的前身是八路軍冀察熱遼根據地的李運昌部，抗戰勝利後，奉中共中央命令進軍東北，搶佔地盤。

1946 年 1 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山東軍區第 3 師、山東軍區警備第 3 旅、冀熱遼軍區第 16 軍分區的第 21 旅、第 23 旅等部隊，在遼寧本溪合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第 3 縱隊，程世才任司令員，羅舜初任政委，曾克林任副司令員，唐凱任副政委。下轄三個旅，第 7 旅以山東軍區第 3 師為主改編，第 8 旅以冀熱遼軍區第 16 軍分區第 21 旅改編，第 9 旅以山東軍區警備第 3 旅和冀熱遼軍區第 16 軍分區第 23 旅改編，全縱隊共有 26000 多名官兵。

1948 年 1 月，東北民主聯軍第 3 縱隊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第 3 縱隊，隸屬於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又稱第 4 野戰軍）。先後參加了遼陽、本溪地區作戰、四平保衛戰、四保臨江戰鬥。1948 年 9 月至 11 月，第 3 縱隊參加遼沈戰役，與其他部隊一起攻克義縣，主攻錦州，會戰遼西，圍殲國民黨軍隊的第 9 兵團，俘獲第 9 兵團司令官廖耀湘中將。

1948 年 11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第 3 縱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40 軍，韓先楚任軍長，羅舜初任軍政委，沙克任副軍長，劉西元任軍副政委，卓雄任軍政治部主任，周輝任軍後勤部部長。第 7 師改稱第 118

師，第 8 師改稱第 119 師，第 9 師改稱第 120 師。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第 1 師調歸第 40 軍建制，改稱第 153 師。全軍共有 59000 多名官兵。

1948 年 12 月至 1949 年 1 月，第 40 軍進山海關投入平津戰役。先是攻佔北平市南苑機場，後又與其他部隊共同完成了包圍、分割國民黨軍隊傅作義部的任務。

1949 年 1 月的最後一天，北平舉行解放軍入城式，參加入城式的除了坦克部隊，還有一個步兵師——第 40 軍第 118 師。該師官兵途經前門大街，進入天安門廣場，然後經由朝陽門，邁出東直門，一路彩帶一路歌，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

1949 年 2 月，第 40 軍向華中、華南進軍。5 月，與第 43 軍一起參加漢澗渡江作戰。7 月，參加湘贛戰役。9 月至 10 月，參加衡寶戰役。11 月至 12 月，參加廣西戰役。1950 年 3 月至 5 月初，參加海南島登陸戰役。6 月至 7 月，進軍至遼寧的安東（丹東）地區，調歸東北軍區建制。

1950 年 10 月 19 日，第 40 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首批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先後參加了第 1 次、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和第 5 次戰役，以及陣地反擊作戰、西海岸反登陸作戰準備。在第 1 次戰役中，第 40 軍第 118 師於 1950 年 10 月 25 日伏擊敵軍獲勝，中朝兩國將這一天作為志願軍出國作戰紀念日。在第 2 次戰役中，第 40 軍和朝鮮人民軍第 1 軍團一道收復朝鮮首都平壤市。

1953 年 7 月，第 40 軍撤離朝鮮回國。

1985 年，第 40 軍改編為陸軍第 40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118 師（當時部隊代號“81200”）、步兵第 119 師（當時部隊代號“81211”）、步兵第 120 師（當時部隊代號“81222”），共計 3 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第 5 師（當時部隊代號“81400”）、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81323”）、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81058”）、工兵團、通信團、偵察營等部隊。

1987 年 12 月至 1989 年 1 月，由第 40 集團軍所組成的第 14 偵察大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執行偵察作戰任務。第 14 偵察大隊共有 839 名官兵，其中第 1 連有 132 名官兵（步兵第 118 師偵察連）；第 2 連有 132 名官兵（步兵第 119 師偵察連）；

第3連有132名官兵（步兵第120師偵察連）；第4連有132名官兵（第40集團軍偵察連）；炮兵連有139名官兵（步兵第352團炮兵第2連）。

1996年，步兵第120師改編為武警部隊機動師。1998年後，第40集團軍由師、團建制改為旅、團建制，步兵第118師、步兵第119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旅，坦克第5師改編為裝甲旅。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40 集團軍進京部隊包括集團軍炮兵旅、步兵第 118 師，在軍長吳家民少將、軍副政委高雲江少將指揮率領下，分別從遼寧省錦州市、義縣向北京開進。

步兵第 118 師師部駐地在遼寧省義縣，下轄步兵第 352 團（當時部隊代號“81202”）、步兵第 353 團（當時部隊代號“81204”）、步兵第 354 團（當時部隊代號“81206”）、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81402”）、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1208”）、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1364”），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 118 師是第 40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也是解放軍的王牌師之一。在國共內戰時期，該師屬於解放軍第 4 野戰軍三隻“虎”之一的部隊，素有“虎師”之稱。在第 40 集團軍這個簡編乙類集團軍中，只有該師保留了甲類整編師編制。第 40 集團軍的四大主力團（步兵第 352 團、步兵第 353 團、步兵第 355 團和步兵第 356 團），該師就占了兩個。

集團軍炮兵旅旅部駐地在遼寧省錦州市，下轄 7 個炮兵營，以及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1989 年 5 月 18 日深夜，第 40 集團軍接到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集團軍黨委當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落實部隊進京事宜。

1989 年 5 月 19 日上午，步兵第 118 師師長郝柏棟大校、師政委郭景全大校奉命到集團軍司令部參加緊急作戰會議。當天午飯後，郝柏棟和郭景全趕回部隊，馬上通知召開團級以上軍官緊急作戰會議。半個小時後，該師六個團的團長、團政委和師部機關的 20 多位科長全都坐在了師司令部的作戰室裏。

在緊急作戰會議上，師長郝柏棟向與會者明確了任務：“北京事態越來越嚴重，上級指示我們師迅速做好執行緊急任務的準備。一切工作必須在明天下午 6 點鐘以前完成！”接著，他又根據任務對部隊做了具體的部署。其後，師政委郭景全做了政治思想動員。

緊急作戰會議結束後，步兵第 118 師各單位緊急收攏部隊，

做好出發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平靜的軍營一下子沸騰起來。

5月20日上午8點鐘，情況突然又有變化，上級領導機關臨時將步兵第118師部隊的出發時間從5月20日下午6點鐘提前到5月20日上午9點鐘。事出突然，好在該師根據上級的指示，早從4月下旬就開始嚴格控制人員，收攏部隊，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統一官兵們的思想。

5月20日上午8點20分，步兵第118師指揮部裝車編隊完畢。半小時內，駐紮在遼寧省錦州市的四個團，也已經做好了所有的出發準備。上午9點鐘整，駐地距離較遠的一個團也已經向師部駐地錦州市機動靠近了。在師指揮部電臺旁等候消息的師長郝柏棟、師政委郭景全得知這些情況，才放下心來。

5月20日上午11點30分，傳來第40集團軍指揮部的開進命令。步兵第118師指揮部立即下令部隊登車出發，於是，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沿著40年前該部隊前輩們曾經走過的路途，揚起了滾滾的風煙，向北京摩托化開進，預定的目的地是位於北京市昌平縣沙河鎮的沙河機場。

步兵第118師副師長趙國海上校乘坐指揮車，率領師前進指揮部隨同先頭部隊一起開進。當指揮車駛出駐地之際，他回首看了看風馳電掣般的車隊，似乎有了一點時間簡單地回憶一下自己的行動節奏。在昨天的緊急作戰會議上，師黨委本來確定他負責留守營房任務。就在進京部隊出發前半小時，由於師前進指揮部缺少帶隊指揮官，他的名字被臨時加進了進京部隊的名單，轉眼之間，他由留守司令變成了帶隊的尖兵。

爲了實現“開進從速，到位從早”的預定設想，師長郝柏棟在途中指揮部隊把行軍序列進一步做了合理調整，採取大編隊與營、連小編隊，以及掉隊車輛不同建制混合編隊相結合的方法，以爭取時間。在重要的路口、集鎮、盤山道，他都親自組織調整車輛，使全師整個車隊的平均時速達到了36公里。

部隊車隊從遼寧省錦州市向北京開進的途中還算順利，一上一下18盤的黃牛嶺被順利地通過了，萬里長城的要塞險關喜峰口又被順利地通過了。該師畢竟素有“虎師”之稱，行動速度很快，開進路線也有些出人意料，放著京沈線（北京市——瀋陽市）的寬暢公路不走，專門選擇了一條崎嶇的山間道路。

當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發現該師進京部隊車隊的行蹤，還未來得及加固北京北面的“防線”，就眼睜睜地看著該師數百輛軍車潮水般地湧到了北京郊區。

不過，一進入北京郊區，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開始出現事先不曾想到的路障，該師指揮部不斷接到報告：“某團在北京市密雲縣遭到圍堵。”“某團已到達北京市順義縣附近，也遭堵截。”“某團1營在北京市密雲縣沖出圍阻後，在朝宗橋（位於北京市昌平縣沙河鎮）再次受到人群的阻攔。”“某團高炮連現在百善鄉（隸屬於北京市昌平縣）附近，遭圍阻。”

一束束急促的電波，報來一支支部隊受阻的情況。步兵第118師指揮所迅速向各受阻部隊下達命令：“能勸則勸，能沖則沖，能迂回則迂回，儘快開到沙河機場”。接著，該師前進指揮部負責人趙國海連續三次乘車折返，親自去查明各部隊受阻情況，指揮受阻部隊脫困。

5月21日下午2點30分，副師長趙國海乘坐指揮車率先抵達預定的目的地——沙河機場。師政委郭景全在沙河機場的指揮樓門前已足足等候了10多個小時，快步迎上去與趙國海熱烈擁抱，好象是久別重逢，其實他們分手才不過20多個小時。

5月20日上午10點30分，郭景全奉命帶領3名師部機關人員乘車脫離龐大車隊，直奔沙河機場領受任務。途中曾在北京市通縣東部被圍阻了幾個小時，幾經輾轉，突出重圍，於5月21日凌晨3點鐘到達沙河機場。郭景全已與有關方面聯繫，完成了預辦事項，規劃了步兵第118師進京部隊的駐紮位置，當天早上8點鐘還接應了一個友鄰部隊進京的火車專列。

步兵第118師車隊在北京郊區各地受阻多時，後來陸續擺脫圍困，抵達沙河機場。第40集團軍炮兵旅進京部隊抵達後，同樣駐紮在沙河機場。

5月23日，沙河機場的俱樂部裏燈火輝煌，擠滿了部隊官兵。這是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向步兵第118師進京部隊官兵發表講話，熱情地讚揚該師部隊按時抵達北京。後來，瀋陽軍區在一次工作總結中也稱讚步兵第118師進京部隊“行動迅速，日行程創抗美援朝以來最高紀錄。”

第三節、奉命向北京城交通要道開進

1989年6月3日下午3點35分，瀋陽軍區前進指揮部通過軍用保密電話向第40集團軍指揮部下達了一項緊急命令：按照既定方案立即行動，你部立即全副武裝向北京城內開進，控制住東直門立交橋、東四十條立交橋、酒仙橋等交通要道，配合其他戒嚴部隊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接聽這通保密電話的是第40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訓練處處長劉新力上校，他一放下電話，就馬上將緊急命令轉告給正在主持緊急作戰會議的軍長吳家民，吳家民下令部隊立刻做好出發準備。稍前，第40集團軍指揮部已接到部隊向北京城內開進的預先號令，因此，特地召開了緊急作戰會議，步兵第118師的師長、政委、作戰訓練科科長和集團軍炮兵旅的旅長、政委、作戰訓練科科長都集聚在集團軍指揮部。

第40集團軍指揮部早已就部隊開進做了精心準備，預想到部隊一旦開入北京市區，必定會遭遇到民眾的強力圍堵，很難抵達預定的戒嚴執勤目標，因此，對開進路線做了詳細勘察，選擇好了3條機動幹線、2條機動支線、10條迂回道路、20個重點目標、6個重點地區和9個依託點。包括軍長吳家民、作訓處處長劉新力在內，各級指揮官都曾多次便裝潛入北京城，對北京市區的熱點地區和道路交通情況做過偵察。僅軍長吳家民就曾4次潛入北京市區，勘察部隊進軍路線。

第40集團軍指揮部將部隊分成3路開進，軍、師級指揮官分頭下部隊靠前指揮。軍長吳家民拍板決定，由步兵第118師步兵第352團作為集團軍的先頭部隊，擔任開路先鋒。步兵118師副師長趙國海靠前指揮，率領師前進指揮部隨同先頭團行動。另外，為了在開進過程中保持對部隊實施不間斷的指揮，保證上下級之間的通訊聯絡，軍長吳家民指令劉新力率領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徐義華、通信參謀翟衛東，攜帶一部10瓦軍用電臺，組成集團軍先遣指揮組，跟隨先頭部隊步兵第352團一起向東直門開進，爭取先期在北京市東城區東直門的海運倉開設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先遣指揮組的臨時代號是“01”，集團軍指揮部的臨時代號是“02”。

當晚 6 點 50 分，步兵第 352 團官兵率先乘車出發。按照集團軍指揮部的部署，準備好一個團開進一個團，80 分鐘內所有的部隊都開動了，包括步兵第 118 師的 5 個團和集團軍炮兵旅，數百輛軍車陸續從沙河機場出發。

作為先頭部隊的步兵第 352 團，在戰爭年代能攻善守，戰功顯赫，被譽為“鐵拳團”，1988 年參加瀋陽軍區戰備檢查緊急出動演練奪冠。這一次該團的動作也相當快，接到緊急開進命令僅 20 分鐘，全團官兵就乘坐軍車出了臨時駐地。當劉新力率領集團軍先遣指揮組趕到該團臨時駐地時，連該團車隊的尾車都早已失去了蹤影。

第 40 集團軍部隊車隊按照預定的開進路線前進，一路上避開主要公路，選擇村鎮道路行進，並採取多路掩蔽開進的方式，確實做到了出其不意，爭取了主動。但是，剛一進入北京市區主要幹線，沿途過往車輛上的人、周圍住宅區和大企業的人，一下子就聚起了幾萬人，轉眼之間就將部隊車隊圍得水泄不通。分 3 路開進的部隊車隊全部受阻。除了先頭部隊步兵第 352 團有一個營的車隊搶先行駛到距離開進目的地東直門立交橋 60 米處以外，其餘部隊全部未能到位。

第 40 集團軍自以為行蹤隱密，其實，車隊剛從沙河機場出發，就已被民眾發現。一輛早就守候在沙河機場附近的紅色轎車先於部隊車隊而行，一個年輕男子手握精巧的無線對講機，腦袋伸出車窗，拼命地呼喊著，顯然是在報告部隊車隊的行動。自 5 月 19 日以來，沙河機場陸續進駐了包括第 40 集團軍在內的數支解放軍戒嚴部隊，成了一座臨時大軍營，自然引起了北京學生組織的高度重視。

先頭部隊步兵第 352 團車隊在北京市朝陽區東壩河東側的京順（北京市---順義縣）路上受阻，距離出發地沙河機場 10 多公里，距離目的地---東直門立交橋還有 4 公里多的路程。

步兵第 352 團車隊行駛到京順路時，有兩輛大客車突然插過來，將部隊車隊攔腰截斷。緊接著，過往的民用車輛紛紛不約而同地停下來，車上的人、周圍住宅裏的人、週末下班的人“呼啦”一下子圍攏過來，不到 10 分鐘，就聚集起上萬人。除了先頭的一個營，其餘的幾個營都被民眾阻擋住了。

這時候，幾個頭纏布條的學生高舉校旗迎了過來，高喊著：

“我們是北高聯！”民眾立刻嘩嘩鼓掌歡迎。學生們接著呼喊：“他們是來鎮壓群眾的！”有的學生舉起胳膊說：“大家看，這就是在天安門廣場受的傷！”民眾一下子被激怒起來了，口號聲驚天動地。

與此同時，在相隔幾公里之外的北京市朝陽區酒仙橋，軍民也正在進行著激烈的舌戰。酒仙橋是步兵第 118 師某團預定的戒嚴執勤地域，官兵乘車剛剛抵達此處，未及下車，大批民眾就用一堆 6 米長的木頭設置了路障。

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聲稱：當時，一些民眾爬上了軍車，有的把司機從駕駛室拉出來，有的向軍車內扔磚頭、石塊，官兵們的鋼盔被打得叮噹響。團政委張發上校手持電動喇叭，帶頭站在軍車車頭上向民眾宣傳。經過 7 個多小時的勸說，爭取了大多數群眾。有的送來了汽水、麵包，有的自動拉起手護住軍車。一夥暴徒氣急敗壞，企圖點火燒軍車。張發大聲宣佈：“誰敢砸燒軍車，搶奪武器裝備，我們將堅決予以嚴厲制裁，決不手軟！”暴徒們受到震懾，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全團 30 台車、627 名官兵得到了保護。

在北京農業展覽館（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北路 16 號），有民眾機智地挪動了路標，將不熟悉北京交通的步兵第 118 師某團大部隊引錯方向。團長和團參謀長不得不乘車返回尋找走錯了路的大部隊，結果在途中被圍，失去了聯繫。團政委牛其林上校、團政治處主任丁亞隆組成臨時指揮所，北京市區樓群影響無線電通話，牛其林帶著報話機爬到高樓上不斷呼叫，終於聯絡到失散的官兵，把他們帶到了預定的戒嚴執勤位置。

在北京市朝陽區西八間房、401 路公共汽車站附近、三元立交橋，都有步兵第 118 師部隊官兵受到圍困，無法向預定的戒嚴執勤位置開進。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在團長張振生上校率領下，於 6 月 3 日下午 4 點 58 分乘坐 41 輛軍車從沙河機場出發，行駛到京順路與西八間房的交叉路口時，遭到民眾的強力圍堵。張振生決定改道而行，指揮車隊闖紅燈，越警戒線，改走禁止卡車通行的國際機場路，行駛到距離三元立交橋約 8 百米處，一輛公共汽車突然橫停在路中間，攔住去路。官兵尚未作出反應，

原先在京順路上圍堵先頭部隊步兵第 352 團的約 3、4 千名民眾，狂呼著湧過來，立刻將部隊車隊圍了個水泄不通。4 名打著“北京化工學院”大旗的學生坐在該團一輛軍用卡車的保險杠上，阻止軍車開進。

步兵第 118 師師長郝柏棟和師政委郭景全並沒有跟隨部隊車隊開進，而是率領師指揮部成員分乘兩輛吉普車，於 6 月 3 日下午 5 點鐘從沙河機場出發，悄悄地向北京城內行駛。一個半小時之後，於 6 月 3 日下午 6 點 30 分進入了北京市朝陽區武裝部靶場的高牆大院，隨即開通了電臺，設置了警戒哨，建立了由兩輛吉普車外加一個帳篷搭起來的師指揮所。

第四節、組織防暴隊鳴槍接應受阻部隊

從 6 月 3 日下午 3 點 35 分部隊出發，一直到晚上 7 點 30 分，將近 4 個小時，第 40 集團軍指揮部與開進途中的所有部隊失去了聯繫。軍長吳家民坐立不安，樓上樓下、屋裏屋外亂跑，當時天氣悶熱，干擾又大，通訊電臺架設在院子中。

等到晚上 7 點 30 分，終於有電話來了，電話中集團軍先遣指揮組負責人劉新力的聲音很微弱，他向吳家民報告說，先頭部隊步兵第 352 團被民眾從中間隔斷，一個營被圍堵在距離東直門立交橋 60 米處，基本到達預定的戒嚴執勤位置。其餘部隊被圍堵在東壩河東側的京順路和機場路上，形勢非常嚴峻。

吳家民聽完報告，首先想到的是，在部隊開進受阻的情況下，必須穩定官兵的軍心，堅定官兵的信心，於是做出三點指示：第一、受阻部隊官兵要理直氣壯地向群眾宣傳戒嚴的正確性，不要與群眾發生衝突；第二、受阻部隊官兵不要下車，要人不離車，避免被分割，遭受損失；第三、受阻部隊官兵要採取積極措施，尋機繼續前進。劉新力放下電話，立刻化裝掩蔽接近各受阻部隊，迅速傳達了軍長吳家民的三點指示。

6 月 3 日晚上 8 點鐘左右，第 40 集團軍參謀長楊福臣大校按照集團軍指揮部分層次交替指揮的方案，前往北京市朝陽區太陽宮鄉對部隊實施指揮。當時，部隊紛紛受阻，官兵們與圍堵的民眾攪在了一起，部隊的通信工具也被民眾破壞了，無法對外聯絡。爲了摸清情況，楊福臣讓兩名參謀人員化裝前往部隊受阻現場偵察。兩名參謀人員回來報告說：“部隊全在大路上被堵住了，人山人海，根本沒法前進。”

楊福臣指令受阻部隊採取反復宣傳、勸說、繞行突圍等措施，但由於圍堵民眾實在太多了，這些措施均無效果，部隊仍然不能前進一步。這時候，已有許多軍車的輪胎被紮破或被放了氣。楊福臣心想：這可不糟了嗎？這樣僵持下去，部隊怎麼能夠到位？到不了位，又怎麼能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呢？

6 月 3 日晚上 11 點 10 分，有個身穿便衣的人來到第 40 集團軍指揮部，說什麼也要面見軍長吳家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吳家民見了來人，來人掏出工作證表明身份。吳家民在題爲《再度京華》的署名文章中說來人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

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所謂的“果斷處置”顯然就是開槍命令，因為軍長吳家民緊接著就根據上級首長指示，向部隊下達了鳴槍示警的命令。

“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剛剛傳達完上級首長指示，瀋陽軍區前進指揮部也向吳家民下達了指示，還通報了第 38 集團軍部隊在萬壽路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

這一切，使吳家民意識到事態已經相當嚴重，顯然不鳴槍部隊很難突圍開進，於是做出決定：第一，堅決執行上級命令，採取對空鳴槍驅散圍堵人群的果斷措施，組織受阻部隊突圍，保證在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前部隊全部到達指定位置；第二，使用已經到達指定位置的部隊，負責接應受阻部隊；第三，由軍參謀長楊福臣、軍政治部副主任籍顯文具體負責組織受阻部隊實施突圍行動；第四，對空鳴槍前要首先使用宣傳車進行宣傳，由軍政治部起草宣傳稿，向群眾講明利害關係，爭取將不明真相的群眾與一小撮壞人分開。

同時，吳家民專門指示先頭部隊步兵第 352 團，無論遇到多大困難，都不能撤退，撤退就是犯政治性錯誤。鳴槍示警後，要迅速組織部隊前進，天亮之前一定要到達東直門立交橋和東四十條立交橋；鳴槍示警時要注意一定不能誤傷自己和群眾。

對於軍參謀長楊福臣而言，開槍命令似乎來得正是時候，他正在為受阻部隊如何突圍而百思不得其策。集團軍指揮部研究決定組建防暴隊（也稱“接應分隊”），開槍接應受阻部隊突圍。楊福臣考慮到集團軍炮兵旅距離受阻部隊的位置很近，於是提議讓炮兵旅組成防暴隊，接應受阻部隊突圍。吳家民表示同意，楊福臣立刻動身趕赴炮兵旅臨時集結地。

當時，炮兵旅正在太陽宮鄉集結待命。該旅部隊在旅長周廷林大校率領下，於 6 月 3 日下午 4 點鐘乘坐 55 輛軍車從沙河機場出發，在預先選擇好的掩蔽道路上急駛，僅用了 50 分鐘就走完了 35 公里的路程，到達指定集結待命地域太陽宮鄉。周廷林考慮到自己的部隊在此次行動中是作為瀋陽軍區的預備隊，不能過早暴露行蹤，必須選擇一個安全隱蔽、進出方便、比較集中的集結地點。炮兵旅車隊暫停在太陽宮鄉北村的公路和鐵路交叉口北側，等待集團軍先遣指揮組的設營安排。由於已接

近下班時間，部隊車隊兩側迅速聚集了許多群眾，有的說風涼話，有的圍著帶車的軍官進行宣傳。周廷林的身邊圍著幾十個民眾，問這問那的。有的民眾乾脆說：“天安門廣場都血流成河了，你們還想去鎮壓學生嗎？”“你們進不去了，所有的道口都堵上了，還是向後撤吧！”。

在楊福臣的直接參與下，炮兵旅挑選出 180 名官兵組成了防暴隊，由炮兵旅參謀長王建平上校擔任指揮官。180 名官兵分乘 9 輛從西德進口的賓士牌大型牽引車，帶上信號槍、衝鋒槍和煙霧罐等裝備，前往接應受阻部隊。

楊福臣心想：上級鳴槍示警的命令是下達了，但這是一次特殊的任務，不同于以往自己曾參加過的 1960 年代的抗美援朝戰鬥，那時候沒有這麼多說道，敵人來了就打，使勁往死裏打，那是對付敵人。可這次情況就複雜了，一旦開槍誤傷了群眾怎麼辦？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可不是兒戲。要是鳴槍示警後群眾依然不散，結果部隊還是到不了位，又怎麼辦？必須想出一個既不會誤傷群眾，又能夠使部隊按時到位的良策才行。為此，他進一步分析了圍堵人群的情況，認為不明真相的群眾是多數，暴徒是少數。只有大力宣傳，採取猛烈突然的行動，造成巨大的威懾力，才能夠避免或減少傷亡。

防暴隊出發之前，楊福臣特意交代帶隊的指揮官王建平：“一定要先廣播，大造聲勢，不行就集中火力對空鳴槍，要突然猛烈，造成一股銳不可當的威懾力。”聽了楊福臣這一番交代，也許是不願意獨自承擔開槍的責任，王建平問：“鳴槍後群眾不散怎麼辦？”這真的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楊福臣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但他心想，今晚部隊必須到位，這是上級的命令。楊福臣咬咬牙回答說：“那就朝地下打。”隨即又補充說：“但無論如何不能對人群開槍。”王建平腳跟一磕，大聲回應說：“是，堅決執行命令。”

命令是下了，楊福臣還是坐立不安。就在這時，劉新力來了，他是聽說楊福臣前出到了太陽宮鄉而主動趕來聯繫的。楊福臣對劉新力說：“我已組織了防暴隊出動接應受阻部隊，上級命令可以鳴槍示警，你趕快回去告訴受阻部隊，做好準備，搞好協同，一聽到槍聲，就馬上突圍，一定要按時到達指定的戒嚴執勤位置。鳴槍示警時一定要注意別誤傷群眾。”劉新力

聽完指示，轉身跨上自行車就去各受阻部隊傳達楊福臣的指示。

6月4日凌晨3點鐘，防暴隊在“保衛首都，平息暴亂”的口號聲中乘車出發了。防暴隊車隊行駛到三元立交橋附近，遇到了民眾用木頭、交通隔離墩和大石塊所設置的路障，上萬名民眾蜂擁到道路中央，把防暴隊車隊團團圍住。隨著人群中“紮輪胎”的叫喊聲，石頭、瓦塊雨點般地向防暴隊車隊襲來，砸得汽車“嘭嘭”作響。

就在此時，防暴隊宣傳車上的4只高音喇叭突然響起來，發出振耳欲聾的喊聲：“北京市民們，現在首都北京已經發生了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革命暴亂，一夥暴徒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奉上級的命令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請不明真相的群眾和青年學生迅速離開現場，不要阻礙我們的正義行動，否則，後果由你們自己負責！”

9輛大型牽引車上的官兵們也齊聲呼叫，32支衝鋒槍一起對空點射，槍聲震耳欲聾，圍堵群眾一下子就驚嚇得散開了，受阻部隊隨即突圍成功了。這時是6月4日凌晨3點10分。

事後，炮兵旅參謀長王建平等入立功受獎，第1連被瀋陽軍區授予“衛國平暴英雄連”榮譽稱號。

軍長吳家民也趕到了太陽宮鄉，楊福臣報告說，在防暴隊的接應下，受阻部隊已經突圍成功，全部到達了指定位置。吳家民很高興，連忙說：“走！咱們馬上到海運倉的指揮部去。”楊福臣建議說：“等防暴隊回來護送一下吧，這樣安全些。”吳家民說：“來不及了，咱們得趕快到位。”

吳家民、楊福臣帶領警衛人員分乘兩輛吉普車，由集團軍後勤部副部長方延安乘坐救護車開路。一路上選擇掩蔽的路線，一口氣趕到了北京市朝陽區和平街北口。不料，其他部隊有一個連在這裏被堵住了。一輛大客車橫在路上，整個路口全是圍堵的民眾。方延安帶領開路的救護車突然警笛聲大作，人群驚嚇而散，救護車闖過去了，後面的兩輛吉普車卻暴露了。有人叫喊：“是軍車，還是大官。”另有人叫喊：“推翻它！”人群蜂擁而上，楊福臣覺得“山貓”牌吉普車突然象海面上的小船一樣左右搖晃，一下比一下搖晃得厲害，眼看就要翻了。前面吳家民的座車也被掀得直晃悠。楊福臣急忙命令警衛員：“對空鳴槍！”警衛員迅速搖下車窗，伸出衝鋒槍向空中打了

一個點射。槍聲一響，掀車子的民眾一下子全被嚇跑了。遠處的民眾紛紛將磚頭、汽水瓶投擲過來，“咚咚”地砸在車廂上，兩輛吉普車的擋風玻璃都被砸碎了。

到了位於海運倉的集團軍前進指揮所，吳家民向上級報告了部隊到位情況。隨後，吳家民決定去視察部隊情況，軍車是出不去了，出去肯定還得受阻，只好身穿便裝騎自行車到各部隊瞭解情況，指揮和掌握部隊。

這一夜，集團軍先遣指揮組負責人劉新力最爲忙碌，也最爲賣力，先後 8 次來回通過三元立交橋，徒步和騎自行車往返行程共計 40 多公里，完成了軍長吳家民交付的先遣指揮任務。

軍長吳家民事後在題爲《再度京華》的署名文章中感慨地說：“說起來，我這是 40 年後的再度京華。40 年前，也就是 1949 年初，我 17 歲，從東北到北平郊區參加解放北平的戰鬥，走的也是我們這次開進的路線。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有一個步兵師參加，恰好就是我當時所在的師，從前門進城，從東直門出城，一路上都是花束彩帶，歡聲笑臉，那時我只知道很光榮，很幸福。40 年後，我作爲一名軍長，率戒嚴部隊進東直門，沒有歡聲笑臉，卻有圍追堵截。這說明，道路是曲折的，鬥爭是長期的。一路上我們挨了不少磚頭、汽水瓶，見了不少冷眼，聽了不少辱罵。”

吳家民上述文字可圈可點，去掉那些關於“反革命暴亂”的上下文，不難體會到他內心深處對民心逆變的淒涼感受。

第五節、佔領東直門立交橋

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至 6 月 4 日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第 40 集團軍部隊所承擔的任務是，控制住東直門立交橋、東四十條立交橋、酒仙橋等交通要道，配合其他戒嚴部隊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其中，東直門立交橋的地理位置最為重要，是從東面進入北京城的交通要道，遂成為第 40 集團軍部隊主要的佔領目標。

東直門位於現在的北京東二環東直門立交橋的西側，原為元大都東垣崇仁門，明朝洪武元年(1368 年)、洪武四年(1371 年)均修補沿用，永樂十七年(1419 年)修葺，改稱東直門。1950 年，在東直門城門北側開豁口，以利交通，1965 年，拆除東直門城樓。1979 年，在城門原址東側建立交橋，為重要交通路口，附近有東直門地鐵站和東直門長途汽車站。

6 月 3 日晚上，負責佔領東直門立交橋的第 40 集團軍先頭部隊步兵第 352 團車隊，在北京市朝陽區東壩河東側的京順路上受阻，只有先頭的一個營突破圍堵，抵達距離東直門立交橋 60 米處，基本到達預定的戒嚴執勤位置，但也陷入人海之中，動彈不得，無法完成佔領東直門立交橋的任務。其餘的幾個營都被民眾阻擋在京順路上。

在炮兵旅防暴隊的來回開槍接應下，步兵第 352 團受阻的幾個營部隊陸續突圍成功，團指揮所率領部分部隊首先抵達東直門。該團炮兵營車隊在營長傅勇的率領下，利用防暴隊的開槍接應，突出重圍。通過三元橋之後，加速前行，借著路燈光，傅勇看了一下表，已是（6 月 4 日）凌晨 2 點 50 分了。這時，傅勇看到了一個藍底白字的交通標誌——“東直門 1.5KM”，心頭為之一喜：“目標點，終於到了。”車隊繼續往前開進，很快就與先期到達的團指揮所及先頭部隊匯合了。

當時，東直門一帶聚集了上萬名圍堵的群眾，人山人海，人群圍困著軍車，嘶喊聲不絕於耳。傅勇擠過人群向團長黃豫生上校報到，彙報了一下部隊情況。黃豫生拍拍傅勇的肩膀說：“幹得好！”

團長黃豫生在東直門外大街選了個地方，召集各營營長開

會，研究和部署佔領東直門立交橋的方案。黃豫生命令傅勇帶領炮兵營作爲突擊隊，首先從東直門立交橋北側沖上橋頭，驅散橋上的人群。

傅勇接受任務後，馬上集結炮兵營部隊，大喊一聲：“幹部、黨員到前面來！”便立即舉槍帶頭迅速奔向東直門立交橋橋頭。炮兵營官兵們在傅勇的率領下，猛虎般沖上東直門立交橋，後續部隊蜂擁而上，驅散橋上的人群，佔領了東直門立交橋。這時是 6 月 4 日凌晨 3 點 20 分，比上級佔領東直門立交橋的命令要求提前了 40 分鐘。

緊接著，步兵第 352 團部隊官兵們清理了東直門立交橋橋面，死死守住周圍六個交通要道，阻止了人群和車輛湧向天安門廣場，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實施的清場行動。

不過，一直到 6 月 4 日上午，東直門立交橋周圍仍舊人山人海，數萬名抗議的群眾久久不願離去，而且不斷有抗議的群眾趕來。步兵第 352 團官兵持槍牢牢地控制住東直門立交橋，不讓人群上來，也不許任何車輛通過，時不時鳴槍示警，驅散人群。

第六節、第 40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85 名官兵）

軍長吳家民少將

軍副政委高雲江少將

軍參謀長楊福臣大校

軍政治部副主任籍顯文

軍後勤部副部長方延安

軍司令部作戰訓練處處長劉新力上校

軍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徐義華

軍司令部通信參謀翟衛東

軍政治部幹事胡衛平上尉

軍司令部炮兵參謀安衛平（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18 師師長郝柏棟大校

步兵第 118 師政委郭景全大校

步兵第 118 師副師長趙國海上校

步兵第 118 師副參謀長黃繼征上校

步兵第 118 師政治部副主任鍾士發上校

步兵第 118 師團政委張發上校

步兵第 118 師團長張振生上校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團長黃豫生上校

步兵第 118 師炮兵團團長崔龍珠中校（吉林省延吉朝鮮族人）

步兵第 118 師團政委劉開升

步兵第 118 師團政委牛其林

步兵第 118 師團政治處主任丁亞隆

步兵第 118 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王存剛

步兵第 118 師團政委高培正

步兵第 118 師團政治處主任張錄

步兵第 118 師某團股長展輝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炮兵營營長傅勇（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18 師某團第 1 營汽車助理員席力國

步兵第 118 師某團第 5 連排長康衛華
步兵第 118 師某團第 3 連第 2 班班長張明勇
步兵第 118 師前進指揮部小車司機張生喜
步兵第 118 師某團第 7 連文書王小鐵
步兵第 118 師士兵吳小波
步兵第 118 師某團第 10 連士兵崔宏圖
步兵第 118 師某團第 10 連士兵許桂勝
步兵第 118 師上士王小鐵
步兵第 118 師電臺兵王成巨（張振生團）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第 2 營第 5 連連長陸軍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第 2 營第 5 連指導員謝國利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李鋒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閻立新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第 2 營第 5 連第 3 排排長康衛華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第 2 營第 5 連代理排長徐雲東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劉寶忠

炮兵旅旅長周廷林大校
炮兵旅參謀長王建平上校
炮兵旅電影放映隊隊長宋金財
炮兵旅電影放映隊下士放映員朱士芳
炮兵旅政治部打字員龍愛軍下士
炮兵旅政治部幹事鞠傑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軍務參謀丁鵬昌（黑龍江省望奎縣人。歷任步兵第 352 團軍務股股長、第 3 營營長、第 2 營營長、步兵第 118 師司令部偵察科科長、黑龍江省呼蘭縣武裝部副部長。2005 年 1 月以來任黑龍江省巴彥縣武裝部部長。）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炮兵營 2 炮連連長賈壘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炮兵營連長陶偉（北京市人）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炮兵營榴炮 3 連連長陳福義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炮兵營 2 炮連士兵劉洪偉（黑龍江省肇東市人）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炮兵營 2 炮連班長劉燦偉（黑龍江省鶴崗市人）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第 4 連士兵王軍（黑龍江省綏化縣人）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2 團 2 炮連炊事班士兵魏軍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3 團指導員張祥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團長周永革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政治處副主任孫守榮（遼寧省莊河市人。歷任步兵第 354 團政治處主任、政委、第 40 集團軍司令部直工處處長、步兵第 118 旅政委、黑龍江省軍區綏化軍分區政委。2007 年 5 月以來任黑龍江省軍區齊齊哈爾軍分區政委。）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政治處宣傳股股長趙軍上尉（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轉業後歷任中共哈爾濱市委辦公廳行政處秘書科幹事、副科長、汽車隊隊長、哈爾濱遠大實業總公司總經理、中共哈爾濱市委辦公廳離退休幹部工作處處長、市委機關服務中心主任。現任哈爾濱市政協辦公廳副主任。）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第 1 營營長帥長城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第 1 營第 3 連連長郎小明

步兵第 118 師營職政工軍官呂民（1997 年轉業至南京市兒童醫院任職，2000 年以來在南京市急救中心任職，有高級政工師的技術職稱。）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連長閻自彬（湖北人）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 105 炮兵連連長馮海倫（黑龍江省伊春市人）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 105 炮兵連指導員高國強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 105 炮兵連第 1 排柳少野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排長胡林海（遼寧省北鎮縣人。歷任步兵第 354 團指導員、戰勤參謀。1999 年 9 月退役。現為遼寧古塔律師事務所律師。）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營長范奉義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教導員崔熙民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 105 炮兵連排長于波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榴炮連士兵李向軍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偵察班士兵鄭沈吉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偵察班士兵馮義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偵察班士兵張建平
步兵第 118 師步兵第 354 團士兵馬越（遼寧省錦州市人）
步兵第 118 師坦克團班長邱會甯（出生于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吉林省攝影家協會會員。）
步兵第 118 師架線連士兵張文華（河南省鎮平縣人）

炮兵旅周衛兵（又名周國梁、周斌，河南省新鄉市人）

第 40 集團軍警衛調整連士兵劉文紅（後來任炊事班班長，1991 年退伍後留在遼寧省錦州市。）

第 40 集團軍士兵李成濱（山東省泰安市人。2006 年 9 月以來任中共黑龍江省伊春市嘉蔭縣向陽鄉黨委委員、良種場副場長。）

第 40 集團軍警衛調整連士兵馬玉明（河北省保定市人）

第 40 集團軍炮兵指揮連電臺台長王洪偉上士（吉林省長春市人。1990 年 3 月退伍。）

第 40 集團軍炮兵指揮連連長孟憲生

第 40 集團軍炮兵指揮連指導員王東

第七章、陸軍第 54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54 集團軍概況

第 54 集團軍是首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解放軍戒嚴部隊中的主力部隊之一。該集團軍是解放軍的王牌主力部隊，武器裝備水準僅次於第 38 集團軍，也是擔任中央戰略預備隊的三個重點集團軍之一（其他兩個集團軍是第 38 集團軍、第 39 集團軍）。只是因為第 54 集團軍駐地遠離北京，知名度遠不如第 38 集團軍。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54 集團軍隸屬於濟南軍區，軍部駐地在河南省新鄉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4774”，朱超少將任軍長，張文台少將任軍政委，張堃少將和劉瑞林少將任軍副政委，何善福少將任軍參謀長，楊德清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李珍少將任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副書記。

第 54 集團軍的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第 9 軍團，抗戰時期改編為八路軍第 120 師第 359 旅第 718 團，後來改編為警備第 1 旅，駐守陝甘寧邊區的關中分區。抗戰勝利後，警備第 1 旅奉中共中央命令進軍東北，搶佔地盤，改編為熱遼縱隊，後又改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第 8 縱隊，黃永勝任司令員，邱會作任政委。

1952 年 10 月，在廣東惠陽，以第 45 軍軍部及步兵第 134 師（欠第 400 團）、步兵第 135 師和原第 44 軍步兵第 130 師，整編為第 54 軍，丁盛任軍長，謝明任軍政委，吳瑞山任副軍長。下轄第 130 師、第 134 師、第 135 師。

第 54 軍組建後即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53 年 2 月上旬，步兵第 130 師進駐朝鮮鐵山半島，擔負防禦敵軍登陸作戰任務。5 月 2 日，第 54 軍軍部率領步兵第 134 師、步兵第 135 師入朝，各部先後開進到朝鮮首都平壤市附近，接替第 39 軍防務，擔負西海岸防禦敵軍登陸及平壤地區反空降作戰任務。

朝鮮停戰後，第 54 軍佈防在西起橋田裏，東至北漢江地段，擔負三八線前哨陣地的守衛任務。1954 年 4 月中旬，移防到元

山北面的玉坪裏、文川、龍潭裏、高原、永興地區，擔負守衛東海岸的任務。1955 年 3 月，調防到上端洞、宣川、古邑、定州、下端地區，擔負守衛西海岸的任務。

1958 年 5 月和 7 月，第 54 軍部隊隨著志願軍最後一批部隊撤離朝鮮回國，開赴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參加所謂的“平息叛亂”作戰，包括 1959 年西藏“平息叛亂”作戰。

1962 年，步兵第 130 師在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取得了“瓦弄大捷”，給印度主力部隊第 4 軍以毀滅性打擊。

1979 年，步兵第 127 師在師長張萬年（後來官至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率領下參加了對越自衛反擊戰，攻克越南重鎮諒山市，五戰五捷，擊潰了越軍主力部隊。

1984 年 12 月至 1985 年 5 月下旬，由第 54 軍所組成的第 3 偵察大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參加偵察作戰。第 3 偵察大隊共有 778 名官兵，其中第 1 連有 114 名官兵（軍偵察連）；第 2 連有 142 名官兵（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第 3 連有 138 名官兵（步兵第 160 師偵察連）；第 4 連有 152 名官兵（步兵第 161 師偵察連）；第 5 連有 134 名官兵（步兵第 162 師各團偵察排）。

1985 年，第 54 軍改編為陸軍第 54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127 師（原屬第 43 軍，當時部隊代號“54784”）、步兵第 160 師（當時部隊代號“54800”）、步兵第 162 師（當時部隊代號“54854”），共計 3 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師（當時部隊代號“54771”）、炮兵旅、高射炮兵旅、通信團、工兵團、偵察營等部隊。

1998 年後，步兵第 127 師改裝為輕型機械化步兵師，步兵第 160 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旅，坦克師改編為裝甲旅，與第 20 集團軍裝甲第 11 師對調，高射炮兵旅改編為防空旅。2003 年，摩托化步兵第 160 旅撤銷番號。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1989年5月18日晚上，第54集團軍接到中央軍委命令，部隊火速進京執行戒嚴任務。5月20日，第54集團軍參謀長何善福少將、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岳宣義大校率領集團軍前進指揮部成員，乘坐軍用專機進京受領任務。

第54集團軍進京部隊包括步兵第162師、步兵第127師等部隊，由軍長朱超少將、軍政委張文台少將、軍副政委張堃少將率領指揮，分成兩個梯隊，向北京摩托化開進。步兵第162師作為第一梯隊，先期出發，步兵第127師作為第二梯隊，隨後跟進。與北京軍區所屬的進京部隊相比，第54集團軍進京的時間稍晚，開進的過程較順利，沒有遭遇到民眾的強力圍堵。

步兵第162師師部駐地在河南省安陽市，下轄步兵第484團（當時部隊代號“54851”）、步兵第485團（當時部隊代號“54852”）、步兵第486團（當時部隊代號“54853”）、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4857”）、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856”）、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858”），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162師屬於解放軍陸軍的十大王牌師之一，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第9軍團。在解放戰爭、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和對越自衛反擊戰中，該師屢建戰功。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該師是打的最好的解放軍部隊之一。自1961年以來，該師一直是解放軍戰備值班部隊。1990年代初，該師被中央軍委確定為應急機動作戰師（即“快速反應部隊”）。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中央軍委給步兵第162師記集體三等功，授予該師某團後勤處戰勤參謀王錦偉中尉（死亡）、炮兵團第1營教導員沈運田少校“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授予該師直屬偵察連“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

1989年5月20日凌晨，步兵第162師接到了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當天早飯時刻，部隊開進命令已經下達到營一級。該師召開緊急黨委會落實進京任務，僅用了9個小時就完成了收攏部隊和所有準備工作。當天下午6點30分，該師進京部隊的第一輛軍車駛出了豫北軍營，數百輛軍車組成的龐大

車隊在京廣（北京市——廣州市）公路上隆隆向北駛去。

5月21日下午，步兵第162師進京部隊以摩托師開進史上的奇跡，僅用了19個小時，行程6百餘公里，比上級機關規定的時間提前28小時趕到北京市大興縣皮各莊地區集結待命。

步兵第127師師部駐地在河南省洛陽市，下轄步兵第379團（當時部隊代號“54781”）、步兵第380團（當時部隊代號“54782”）、步兵第381團（當時部隊代號“54783”）、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4786”）、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785”）、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787”），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127師是解放軍中建軍歷史最悠久的部隊，在解放軍陸軍的十大王牌師中名列前茅。該師前身是1920年代孫中山的“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在北伐戰爭中是戰功顯赫、有“鐵軍”美譽的“葉挺獨立團”。1927年，參加中共策動的“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由朱德、陳毅帶領殘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先後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團的一部分。在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時期，該部都是王牌主力部隊。180余名解放軍將領與步兵第127師有著歷史淵源，包括元帥朱德、林彪、陳毅、羅榮桓、聶榮臻，大將粟裕、譚政、羅瑞卿，上將肖克、楊成武、耿飭、楊得志、黃永勝，中將彭明治、吳法憲、梁興初、李作鵬等。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中央軍委給步兵第127師記集體二等功，給該師前衛團記集體一等功；濟南軍區授予該師一個營“衛國英雄營”榮譽稱號，一個連“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中央軍委授予該師某部第6連代理排長馬國選、步兵第379團第3營炮兵連班長余愛軍“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濟南軍區授予該師炮兵團衛生隊隊長趙國光上尉、高炮團士兵祁長如（進京執行戒嚴任務期間因肝癌死亡）“首都衛士”榮譽稱號。

1989年5月20日上午，步兵第127師接到赴京執行戒嚴任務的緊急命令：“全師摩托化開進，5月21日晚上10點鐘出發，於5月24日晚上8點鐘到達北京沙河機場集結。”該師當即召開黨委緊急會議，傳達、研究、落實進京命令，全師團級

以上軍官聚結在師司令部作戰會議室。師政委王玉發大校首先鄭重地傳達了緊急進京命令，與會者都掂量出了此次任務的份量。經過討論，由王玉發下了結論：“大家都發表了很好的意見。保衛黨中央，保衛國家的安全，軍隊責無旁貸！現在是任務急，時間緊，各項準備工作都要往前趕，都要體現一個快字。”

步兵第 127 師訓練有素，反應迅速。師司令部 30 分鐘拿出了部隊緊急出動計畫，18 小時完成了全師兵員調配和千里摩托化開進的 5 套應急方案。師政治部 40 分鐘後下發了動員令和政治工作指示，18 個小時完成了 101 個建制連黨支部的調整配備。師後勤部一小時擬制了全師的給養、油料、汽車配件的需額等一攬子計畫，24 小時向三個步兵團調整各種車輛 62 台，調配駕駛員 124 人，搶修車輛 280 台，加工製件 178 件，補充和攜運油料 110 噸，籌集、調運主食 20 日份，發放被裝物資 1000 人次，配發給養器材 1200 餘件，準備常用藥品一個月量。

從接到緊急命令到部隊出發前的 30 多個小時內，師政委王玉發幾乎沒有合過眼。在師部機關全體幹部動員大會上，他大聲疾呼：“這次我們師到北京去，直接保衛黨中央，這是建國後師史上第一次。一定要牢牢記住，黨指揮槍，槍保衛黨。努力發揚和光大我們的‘鐵軍’精神！”

經過強力的政治思想動員，該師官兵寫了千餘份“保衛共和國、保衛黨中央”的血書，分別送到了各級中共黨支部、黨委；340 名回家探親、住院治療、因公出差的官兵及時返回了部隊，使不少緊急發出的“催促速回”的電報成了“馬後炮”。

當時，該師師長鍾聲琴大校正在四川老家探親，遂由集團軍副參謀長黃漢標代理師長職務，率領該師部隊進京。鍾聲琴的老家在山區，消息閉塞，通訊落後，5 月 21 日，他在鄉長家作客，從電視新聞中得知北京戒嚴的消息。翌日，鍾聲琴啓程趕回部隊駐地，發現部隊已經出發，立刻趕往北京與部隊會合。

步兵第 127 師部隊出發前夕，中共河南省洛陽市委緊急通報：“某學院 1 千多名師生正向你師駐地進發，準備攔截部隊的進京行動。”這個突然出現的意外情況，迫使該師指揮官們緊急磋商，不得不重新考慮部隊出發時間，根據路程計算出某學院師生隊伍到達的時間，當機立斷，決定部隊提前出發。

情況接踵而來。某學院的師生隊伍尚未到達，部隊駐地對面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卻先來了。一時間，師部大門口人頭躡動，進出部隊營房的三個路口全被人群堵得死死的。師部指揮車和師直屬分隊的軍車剛剛勉強擠出幾台，後續的車隊便被人群攔腰截斷。圍堵的群眾越來越多，與先來的師範專科學校和後到的某學院的師生聚在一起，口號聲四起，喇叭聲不斷……有人往軍車上張貼標語，有人爬上車廂向官兵們展開“攻心戰”。官兵們坐在車廂裏，一個個繃著臉，沒有任何回應，似乎對民眾的“攻心戰”無動於衷。

步兵第 127 師副師長鄧志開、師副政委譚海轟結伴悄悄到師部後院勘察地形，尋找出路。他倆回到師臨時指揮所後，迅速找來了負責部隊留守工作的師副參謀長王忠、師政治部副主任焦隨東，一起商討對策。譚海轟強調以靜制動、聲東擊西、沖出包圍。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轉眼就是晚上 8 點多了。夜色中，退入師部大院的一輛輛軍車悄悄掉頭，行駛到辦公大樓後面掩蔽起來。接著關閉了全部燈光，整個師部大院一片漆黑。

這時，一個緊急會議正在進行，與會者包括洛陽軍分區和洛陽市公安局的負責人。經過討論研究，一套聲東擊西的行動方案很快形成了：洛陽市公安局在師部軍營左側的大橋方向上設卡，三步一哨，五步一崗，造成進京部隊車隊要從那兒通過的假像，將圍堵人群吸引過來。果然不出所料，聲東擊西的行動方案實施後，圍堵師部營房的人群不知是計，蜂擁到大橋的北側堵截。

突圍的機會終於來了，步兵第 127 師後勤部部長陳卓熙命令所有的軍車一起發動，由他親自帶路，一輛緊接一輛，首尾緊銜，駛出營門後突然向與大橋相反的方向掉頭，抄小路，風馳電掣般地沖出了重圍。

此前，下午 4 點鐘，該師前衛團——葉挺獨立團車隊一出營門，就受到學生和群眾的圍截。官兵們奉命下車，手牽手拉起一道人牆，護著一輛輛軍車，一次次強行衝擊阻截的人群。就這樣，車隊勉強駛出駐地營區 2 公里，再一次受阻。據該師資料聲稱，石塊、磚頭紛紛飛來，數十名官兵受傷，3 台軍車的擋風玻璃被砸碎，十幾台軍車的車燈被砸毀。指揮官命令官兵

們不惜代價，繼續前進，“緊緊跟上，不許掉隊”的命令不時地傳向每一輛軍車。

前衛團車隊被圍困多時，一直到5月22日下午4點鐘才沖出包圍，北進追趕師主力部隊，前衛團變成了後衛團，在某市機場與師主力部隊會合。至此，步兵第127師進京部隊才算沖過了趕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第一關”。

某市機場草坪上，步兵第127師幾位指揮官餐後席地而坐，開起了碰頭會。忽然有兩名公安人員跑來報告，說情況緊急，“有7、8百名學生要來圍堵機場”。師指揮官們商議決定，應該儘量避免與學生糾纏，部隊馬上出發，讓師副政委朱晉泉帶領師前進指揮部先走。這支始終保持令行禁止、快速機動作風的部隊，聽到號令，立即行動，僅用了20分鐘，機場上已經看不到一兵一卒，平均每5分鐘就開走一個團。

5月24日上午10點鐘左右，步兵第127師進京部隊車隊行駛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縣城區。縣城路面狹窄，軍車時開時停，艱難地向前移動。忽然，前方人聲鼎沸，車隊完全停了下來。帶隊的師參謀長楊武、師政治部主任曹東新下車一看，車隊正從某學院門前經過，一些學生和群眾用籃球架、水泥管等物品堵塞了道路。怎麼辦？楊武、曹東新用無線電報話機向師指揮所作了報告。兩分鐘後，師政委王玉發傳來指示：第一、加強宣傳鼓動工作，儘快擺脫群眾糾纏。第二、做好牽制工作，掩護後續部隊繞道前進。

這時，代理師長黃汗標、師政委王玉發已帶領停留在固安城外的4個團部隊的車隊繞開了固安縣城，並派人通知楊武、曹東新儘快組織受阻部隊突圍。楊武拿起電動喇叭命令每台軍車留下十幾名官兵留守，其餘官兵全部下車，護衛軍車，為軍車開道。官兵們匯成一股人流，不斷衝擊攔截的人群，一步步向前運動，一輛輛軍車隨之緩緩而行。

離開固安縣城，步兵第127師進京部隊車隊繼續沿著京廣公路向北京摩托化開進。此後，一路上還算順利，沒有再遭遇到大的阻力。5月24日下午4點鐘，該師進京部隊比上級領導機關命令所規定的時間提前4小時，到達北京市大興縣東南地區，在那裏集結待命。

休整待命期間，第 54 集團軍一方面對官兵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讓官兵認清“動亂”的實質和真相，消除官兵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疑惑；另一方面則積極地為下一步的軍事行動，即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做好準備。當時，不少士兵思想上產生疑慮，提出不少問題：“既然是動亂，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聲援支持？”“為什麼遊行隊伍裏還喊出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

步兵第 162 師指揮部多次派出便衣人員進入北京市區偵察，勘察部隊開進路線。按照該部隊的說法是：“基本上摸清了地形、道路，晝夜人員、車輛流量和高自聯、工自聯的活動情況，並據此制定了進入北京城的 3 套預案。”

6 月 3 日下午，該師師長黃棟甲、副師長劉順開和師司令部作戰訓練科科長奉軍長朱超之命，又一次化裝前往北京市宣武區，再次勘察了重要地段和可供利用的迂回路線，然後來到中共北京市宣武區區委、宣武區武裝部，與這兩個單位的幾位負責人接上了頭，並在這些負責人的陪同下，對可能進駐的宣武區飯店、實驗小學、解放軍 3401 工廠進行了實地勘察，完成了當天的預定偵察任務。

步兵第 127 師指揮部也為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作了很多準備工作。在軍事行動方面，師司令部拿出了 13 套行動方案；在政治工作方面，師政治部制定了戒嚴執勤中 22 種情況的處置方法。各級指揮員對將要執行戒嚴執勤任務地區的道路、地形和重要目標事先都做了偵察，可以說是已經全盤掌握。儘管如此，師長鍾聲琴仍不放心，6 月 3 日上午，也就是部隊奉命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當天，他又親自率領各團團長和參謀長進入北京城區，沿著預定的部隊開進路線作實地勘察。

第三節、挺進天安門廣場

1989年6月3日下午，上級機關向第54集團軍下達了全副武裝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的命令。當天下午4點鐘，第54集團軍指揮部已將這個命令傳達到各師、團，並要求各部隊立即準備出發。

正當部隊出發之際，步兵第162師師長黃棟甲、副師長劉順開等人剛好完成實地勘察任務，匆匆趕回部隊駐地，在北京市大興縣北臧村鎮皮各莊村口碰見正在編隊出發的車隊。軍長朱超一見到他們，命令他們馬上掉轉車頭率領先頭團開進。

步兵第162師部隊乘車從北京市大興縣北臧村鎮皮各莊出發，沿著京石（北京市——石家莊市）公路向北京城內開進，由具有該師第1連之稱的師直屬偵察連擔任開路先鋒，副師長劉順開乘坐吉普車督陣指揮，並親自向偵察連連長王宏偉上尉交代命令，叮囑一定要完成任務。王宏偉明確地回答說：“副師長，您放心好了，我一定給您幹個漂亮的，決不給咱們師抹黑，決不給偵察連丟臉，保證完成任務！”

部隊車隊一進入北京市區，就遭遇到大批學生和市民的強力阻攔。行駛到豐台區木樨園，路障重重，人山人海，預定的開進路線全部被封閉，情況十分危急。師長黃棟甲立即命令改走行人稀少的豐台區馬家堡、宣武區太平街。就這樣，該師車隊迂回前進，穿街過巷，一直行駛到太平街口。

在太平街口，部隊車隊又一次嚴重受阻，有的軍車被憤怒的群眾砸毀，有的士兵負了傷，通信車上的電臺也遭到嚴重破壞，通訊聯絡中斷。後來，部隊官兵奉命下車徒步開進，一下車，就淹沒在人海之中，不但無法前進，隊伍也被沖散了，官兵們被數以萬計的民眾分割在各處。師長黃棟甲也只好棄車，改穿便衣，徒步指揮部隊。

爲了減小目標，黃棟甲讓警衛員在光明日報社（北京市宣武區永安路106號）附近等待，獨自繞道趕到宣武區虎坊橋，指揮被圍堵在那兒的官兵棄車徒步強行開進。隨後又徒步趕到宣武門，那裏有幾輛軍車遭到民眾的圍堵。黃棟甲疲於奔命，徒步往返於各受阻部隊之間，指揮官兵們徒步強行開進。

同時，黃棟甲多次派出聯絡參謀，身穿便衣到各受阻部隊傳達命令，並利用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汽車、自行車和徒步的方法，將各受阻部隊接應出來。但是，還有部分後續部隊被圍堵在南三環路。

徒步往返，疲於奔命，黃棟甲急待找到一個隱蔽地點建立指揮所，使用電臺指揮部隊脫困開進。正在這時，一位 50 多歲的中年男人輕步走到他身邊，試探性地問道：“如果你是部隊領導，就跟我走。”說完逕自朝北京市第 62 中學（北京市宣武區太平街西巷 4 號）校門走去。黃棟甲開始還有懷疑，怕是一個陷阱，沒有跟過去。不一會兒，中年男人再次走過來邀請，黃棟甲當時也沒有別的選擇，就帶著警衛排排長和警衛員一起跟著進了校門，又進了教學樓。經過介紹，得知中年男人是北京市宣武區天橋街道辦事處主任王洪惠，遵照北京市負責人的指示，特意前來接應進城的解放軍戒嚴部隊。

黃棟甲如同遇見了救星，來不及說一聲謝謝，就對圍過來的幾位天橋街道辦事處人員說：“請馬上給我找一個設立指揮部的地方，還有，請你們趕快與 3401 廠（北京市宣武區太平街 8 號）聯繫，我們還有 11 台通信車和 2 台機要車，上面有機要密碼和密碼機，必須馬上轉移到 3401 廠保護起來。”解放軍 3401 廠如今改制為北京燕京汽車廠。

如此一來，步兵第 162 師指揮部很快就在北京第 62 中學的教學樓樓頂設立起來。不到半小時，該師受阻部隊就接到了黃棟甲的命令：“部隊徒步開進，不怕流血犧牲，不惜一切代價，迅速向天安門廣場南側的箭樓集結。”

該師後續部隊車隊在太平橋丁字路口受阻，時間是下午 6 點 50 分。街道上的人群熙熙攘攘，還有兩輛被當作路障的公共汽車橫置在那兒，擋住了整個路口，民眾的議論聲、抗議聲蓋過了一切音響，部隊車隊要想順利通過，談何容易！部隊車隊立足未穩，就被蜂擁而上的人群團團圍住，質問聲、責罵聲潮水般湧過來，“不許鎮壓學生！”“北京不歡迎你們！”“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你們不要做歷史的罪人！”

該師先頭部隊車隊在虎坊路受阻，前面不遠處就是虎坊橋，橋頭上擠滿人群，路面上佈滿障礙物，部隊車隊不得不停下來。副師長劉順開乘坐的吉普車尚未停穩，就與其他軍車一

樣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圍住了。僵持許久，部隊車隊仍然無法前進。劉順開心想：“這樣僵持下去情況十分危險，大部隊全在後面，先頭部隊沖不過去，將影響大部隊的開進，貽誤戰機，危及全局。”他不顧警衛員勸阻，站上車頭，用電動喇叭作宣傳，勸說群眾讓路。師偵察連官兵紛紛跳下車，手挽手構成兩道人牆，阻擋著沖過來的民眾，保護著劉順開和吉普指揮車。

軍民雙方攪在一起，成千上萬的人擁來擠去的，發生肢體衝突在所難免。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聲稱，師偵察連已有大半士兵不同程度受傷。劉順開擔憂如果僵持下去，官兵傷亡將更加慘重。他抬頭望瞭望天邊慘紅的夕陽，猛地扔掉電動喇叭，奪過一個士兵手中的衝鋒槍，舉向血色晚霞的天空……沸騰的人群一下寂靜下來，紛紛後退著，恐懼地望著劉順開舉向天空的衝鋒槍。槍沒有響，子彈根本沒有上膛。

劉順開扯開嘶啞的嗓門命令官兵們集合，大聲動員：“同志們！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全師都看著我們！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證部隊按時到達集結地。馬上集合，徒步向前開進！”偵察連官兵聽到號令，迅速組成 4 路縱隊，高呼口號：“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使出偵察兵的渾身招數，猛擠猛衝，打開一條口子，後續部隊跟著猛衝過去。

步兵第 162 師部隊官兵徒步開進，突出重圍，衝破 15 道路障，終於按時到達了天安門廣場。

步兵第 127 師部隊挺進天安門廣場的過程同樣艱難。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該師指揮部接到上級指示：全師官兵立即開赴北京市豐台區六里橋一帶集結待命，然後再向天安門廣場挺進。該師部隊僅用了半個小時就集結完畢，下午 3 點 10 分，全體官兵乘車從北京市大興縣臨時駐地出發，晚上 7 點 48 分到達豐台區六里橋一帶。

晚上 9 點 50 分，瀋陽軍區前進指揮部向步兵第 127 師師長鍾聲琴下達了緊急命令：“立即組織部隊徒步開進，排除一切干擾，迅速推進至前門西大街，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鍾聲琴與師政委王玉發耳語了幾句，便向一名參謀口授指令：“命令某團在廣安門附近集結，其餘各團迅速向六里橋靠近，然後由師部統一組織，徒步輕裝向目標地域開進。”

钟聲琴給師指揮部成員分派了任務：師參謀長楊武率領葉挺獨立團（步兵第 379 團）擔任前衛；師政治部主任曹東新率領步兵第 380 團擔任第 2 梯隊；師副政委朱晉泉和師後勤部部長陳卓熙在後方留守。钟聲琴和王玉發率領師前進指揮部尾隨葉挺獨立團行動。部隊將沿著六里橋、北京市宣武區的廣安門、菜市口、虎坊橋、南新華街，徒步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這時，钟聲琴抬腕看了看手錶，說：“現在是晚上 10 點 20 分。”所有的指揮官隨之對表。依照軍隊慣例，指揮官在開始軍事行動前都要對表。钟聲琴下達了命令：“開始行動！”

先頭部隊葉挺獨立團率先出發，靠前指揮的師參謀長楊武、軍副政委張堃少將跟隨葉挺獨立團行動。步兵第 127 師的另一個“紅軍團”——步兵第 380 團，作為第 2 梯隊，緊隨著葉挺獨立團開進。

該師部隊組成 6 路縱隊徒步開進，迎接他們的不是鮮花、掌聲，而是抗議、責罵和磚塊、石頭。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聲稱，當時，師長钟聲琴、師政委王玉發多處受傷。王玉發走在隊伍前列，舉著拳頭，帶頭高呼“發揚鐵軍精神，鐵心跟黨走！”“心中裝有天安門，與黨與國共存亡！”等口號，鼓舞士氣，實施政治指揮。

葉挺獨立團艱難地開進到北京市宣武區廣安門外的紅蓮居民社區，只見一片拔地而起的新樓群，樓前樓後全是攢動的人頭，震天響的叫喊聲。官兵們立足未穩，便被群眾分割包圍，幾乎全被單個隔開，團團包圍。幾經努力，部隊都無法突圍前進，最終只得改道而行。

晚上 10 點 30 分，跑步前進的葉挺獨立團經過廣安門外大街，往東開進到廣安門鐵路與公路交叉口。突然，一列長長的貨車不早不晚從北往南緩緩駛來，嘎然煞車，停在道口，將道路攔腰截斷，封得死死的，部隊前進受阻。一時間，貨車上、道路旁，群眾一邊呼喊，一邊用磚頭、石塊砸向官兵。包括軍副政委張堃在內的官兵們，只好一一從火車貨車下爬過去。

眼見火車貨車沒能攔住部隊，聚集在交叉道口的群眾便上下壓動設在道口的安全欄杆，向通過道口的官兵們猛砸。師參謀長楊武見狀，大喊一聲：“推斷欄杆，沖過去！”葉挺獨立

團第 1 連連長王春富帶領幾名士兵猛撲上去，合力將欄杆折斷。隨著“沖啊！沖啊！”的呼喊聲，官兵們潮水般地湧過去。

突破鐵路與公路交叉口這第一道障礙，葉挺獨立團迅速推進到廣安門橋頭。廣安門橋橫跨北京西護城河，是部隊從南往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必經之路。這裏道路狹窄，聚集了上萬名群眾，又遇上廣安門護城河橋頭的街道兩側正在拆遷房屋，堆積了大量的磚頭、石塊。大批民眾在這裏設立了第 2 道防線。部隊開進到這裏，磚頭、石塊象冰雹似地砸過來。

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聲稱，第一批沖向廣安門橋頭的官兵全部被磚頭、石塊打倒在地。沖在前面的葉挺獨立團被砸倒 50 多名官兵，這時，一位滿臉是血的士兵跪著撲向團長徐乃飛和政委張文品，聲淚俱下地說：“首長，這夥暴徒太狠了，快下令開槍吧！”“開槍吧！開槍吧！”幾乎是同時，士兵們“撲通”“撲通”地跪倒一大片，抱住徐乃飛、張文品的腳，仰起血淚交流的臉，齊聲哀求：“首長，開槍吧！我們不能這樣被活活打死啊！”

徐乃飛、張文品爲難了。士兵們被打得頭破血流，他們怎能不氣憤，怎能不想嚴懲暴徒！可是，橋頭兩側還有黑壓壓的圍觀群眾，一旦開槍，就要誤傷群眾。他倆彎下腰，扶起戰友，大聲喊道：“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現在壞人混雜在群眾當中，一時難以分清，開槍難免誤傷群眾。”

部隊通過廣安門，進入了廣安門內大街。沿街路障重疊，逼得官兵們只好從路障兩邊的小口子通過。每經過一個胡同口，都是一陣石雨的襲擊，都是一陣憤怒的責罵聲，“這裏不是老山前線！”“你們槍口對準誰？”“你們不是人養的！”“保皇狗！”“法西斯！”

部隊行進到距離菜市口過街天橋 50 多米處，過街天橋上傳來陣陣嘶吼，只見橋上密密麻麻站滿了人，有的舉著石頭，有的拿著磚頭，有的握著玻璃瓶，隨時準備往下砸。部隊指揮官下令驅散民眾，一群官兵沖上過街天橋，強行趕走了群眾。

征服菜市口過街天橋，部隊開進到北京市宣武區驛馬市大街。民眾掩蔽在門洞、牆角、樹蔭中，不斷將磚頭、瓦片、玻璃瓶向官兵們投擲過來，官兵們不予理睬，只顧向前，向前。

晚上 11 點 30 分，部隊前進到虎坊橋路口。這一帶是居民

聚集區，虎坊橋路口人山人海。開路的先頭營（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距離路口還有幾十米遠，營長馬永亭就開始帶頭高喊口號：“向首都人民學習！”同時帶領官兵向前強行突擊。葉挺獨立團政治處主任萬功民帶頭向圍堵群眾喊話：“居民們，希望大家配合我們的行動，閃到路旁！”各營教導員也一起喊話：“軍令如山，不得遲誤，如不閃開，我們也要強行通過。”群眾開始向道路兩邊躲閃，唯獨有一位身穿睡衣的孕婦堅持不退，挺著大肚子站在路中間，對軍人的喊話置若罔聞。幾個士兵十分氣憤，準備上去強行推開她。“不要動她！”團長徐乃飛大手一揮，命令官兵從孕婦的左側繞行。

行至南新華街，葉挺獨立團排成 6 路縱隊開進，將窄窄的街道填滿，由南向北湧進。在這裏，官兵們遇到了更為猛烈的攔截。也許這裏接近天安門廣場了，民眾準備作最後的阻攔。一些學生揮舞著“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旗幟，指揮上萬名群眾，用幾十輛汽車、隔離欄柵設置了密集的路障。街道兩旁的樓上，民眾不時扔下花盆、自行車、鐵鍋、石塊等。

部隊好不容易通過了南新華街，繼續前進，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已經清晰可見，這是葉挺獨立團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最後衝刺。最後的衝刺是艱難的，大批民眾在這幾百米距離的馬路上設下了幾十道障礙。

6 月 4 日零點 13 分，葉挺獨立團官兵終於沖到正陽門西側，比上級規定的時間提前 47 分鐘抵達。在場的群眾發出驚歎的呼叫，怎麼也想不到整個北京城都已經被路障、人流所封鎖，這些軍人居然能沖進天安門廣場來。

葉挺獨立團團長徐乃飛等指揮官在正陽門西側的花壇簡短碰頭，商議並明確了幾項應急工作：第一、抓緊收攏人員，清點武器裝備；第二、穩住陣腳，鞏固陣地；第三、儘快同上級取得聯繫，報告部隊到達情況。

6 月 4 日零點 19 分，步兵第 127 師主力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師指揮所也到達了正陽門，徐乃飛迎上前去，向師長鍾聲琴、師政委王玉發報告情況。

無數的民眾湧向步兵第 127 師部隊，將官兵們擠壓在一個

很小很窄的區域內，處境十分不利。钟聲琴見狀大聲疾呼：“同志們，向外擴張一下！”王玉發指揮官兵們配合防暴隊人員，上前頂住人潮，驅散人群，穩定了部隊，守住了陣地。

師司令部偵察科科长梁士發奉師長钟聲琴之命，前往聯絡上級領導機關，幾經周折，與設在人民大會堂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取得了聯繫。清場指揮部正焦急等待著部隊的到來，得知步兵第 127 師已到達天安門廣場，驚喜萬分。

6 月 4 日凌晨 2 點 30 分，钟聲琴、王玉發率領師司令部作訓科科长等人奔赴人民大會堂，向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報告情況，受領任務。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的幾位指揮官緊緊握住钟聲琴、王玉發的手，連聲稱讚：“好！好！總算把你們盼來了，你們開進得這樣快，真不愧是‘鐵軍’啊！”

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一位負責人一邊在軍用地圖上指點位置，一邊向钟聲琴、王玉發下達命令：“你們的任務就是堅決堵住從人民大會堂東南角至正陽門之間的口子，保證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順利進行。”“保證完成任務！”钟聲琴、王玉發“啪”地一個標準的軍禮。清場指揮部負責人滿意地點了點頭。

6 月 4 日凌晨 3 點 50 分左右，在人民大會堂南門走廊，钟聲琴、王玉發緊急召集各團指揮官開會，傳達上級指示，明確任務。10 分鐘之後，各團部隊全部到達指定位置。在規定的地段上，全師部隊成 5 路縱隊一線展開，組成對天安門廣場內外兩面警戒的陣勢。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天安門廣場最後階段的清場行動開始了。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80 團第 2 營沖在最前面，官兵們在營教導員李建民的帶領下，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我們在清場，請你們馬上離開！”“平暴合法！自衛合法！”

第四節、傷亡最重的一支部隊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中國官方在對外宣傳中，一方面極力壓低民眾的傷亡數字，一方面刻意提高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的傷亡數字，兩方面的數字都是虛假不可信的。

軍民雙方受傷的程度也完全不同，軍人絕大多數是皮肉傷，遭到磚頭、石塊、玻璃瓶子的襲擊，骨折已經屬於較為嚴重的傷害；而民眾幾乎都是槍傷，許多人留下終身殘疾。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中，受傷人數最多的部隊是第 54 集團軍。該集團軍編寫的資料聲稱：在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過程中，整個集團軍付出了死亡 1 人（馬國選）、重傷 246 人、輕傷 1500 人、失蹤 150 人（後來全部平安歸隊）的沉重代價。

以步兵第 162 師炮兵團第 1 營為例，全營幹部和中共黨員受傷者達 71%，戰士受傷者過半數。在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時，隊形被沖散了十多次，散了又聚，聚了又散，遲至 6 月 4 日晚上 8 點 50 分才到達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前門西側戒嚴執勤點，完成了開進任務。該營教導員沈運田事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作為開路先鋒的葉挺獨立團，官兵受傷的人數也不少，達到 60% 以上。據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聲稱，在南新華街，該團全體官兵挨打最慘，幾乎無一倖免。

該集團軍各級指揮官受傷的人數也不少。步兵第 127 師師長鍾聲琴在南新華街翻越隔離欄柵時，左腳關節嚴重受傷，骨頭外露。步兵第 127 師政委王玉發身上多處受傷，不過都屬於輕傷。

第 54 集團軍副政委張堃也受了傷，而且是重傷，多處骨折，昏迷不醒。在部隊通過廣安門鐵路與公路交叉口和廣安門橋時，張堃的鞋子已被擠掉，雙臂和背部已被砸傷。開進到南新華街時，一路上伴隨張堃的警衛人員和工作人員，有的被沖散，有的被打傷，身邊只剩下了兩名偵察兵。

張堃最後受傷的地點是在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附近，一塊石頭砸在他的左小腿上，腓骨粉碎性骨折，劇痛使他放慢了速度，掉在隊伍的後面。跨越隔離欄柵時，由於左腿已受傷，撲

倒在地，疼得動彈不得。這時，一群民眾蜂擁而上，沖散了他身邊僅有的兩名警衛人員，四、五個被軍人開槍殺人所激怒的民眾圍著他又踢又踉，張堃昏迷過去。幸虧北京金龍服裝廠女職工馬戰勤奮力救助，將他背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救了他一命。

第 54 集團軍傷亡嚴重的主要原因在於沒有接獲開槍命令，在解放軍戒嚴部隊中，該集團軍是唯一一支沒有接到開槍命令的部隊。該集團軍徒步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沒有通訊電臺車跟隨，僅靠身背簡易通訊器材的通信兵保持聯絡。加上又有許多退伍轉業軍人指導民眾重點攔截通信兵，切斷了該集團軍部隊的上下聯繫。

第 54 集團軍編寫的資料聲稱：在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以及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整個集團軍沒有開過一槍。

第 54 集團軍傷亡嚴重的另一個原因是，徒步開進，沒有裝甲車、坦克開路，開進路線又經過北京歷史悠久的街區，居民密集，街道狹窄。該集團軍官兵受傷的地點大都在菜市口、南新華街、和平門、前門一帶。

不能不承認，包括張堃在內的第 54 集團軍的眾多各級指揮官良知未泯，雖然他們執行命令堅決，但始終不願對民眾開槍。張堃在題為《血染的征程》的署名文章中曾寫下這麼一段文字：

“我從軍 40 年，也從未經歷過這樣悲壯的行軍，從未碰到過這麼複雜、這麼嚴峻的事態。我隨指揮所行進至此，鞋子已被擠掉，雙臂和背部已被砸傷，我知道，只要我‘反擊’的一聲令下，是沒有什麼能阻擋我們前進的！可是，不能啊！眼前這麼多的群眾，那白髮蒼蒼的老人，還有懷抱幼兒的婦女，……”

【注釋 1】於是，張堃帶領官兵高呼“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首都學生”的口號，許多士兵臉上、嘴裏流著血也跟著高呼。他看到人群稍微向後退了一些，一些群眾還鼓起了掌。砸來的石頭、磚塊也少了些，官兵們乘機從狹窄的通道中擠了過去，沖過了廣安門大橋。

第 54 集團軍挺進天安門廣場時，攜帶著槍支彈藥，只是將子彈放在子彈箱中，由專人保管，沒有發放給官兵。在大量官兵受傷的情況下，也沒有發放子彈。張堃事後回憶說：“在整個開進過程中，我們部隊一槍未發。出發前，上級有明確的命令：不准開槍。所以，部隊的子彈都是統一保管的。當然，後

來要把子彈箱打開，把子彈發下去也很容易，但是由於通信聯絡斷了，沒有接到上級新的命令。誰也沒去動子彈箱。”【注釋 2】

【注釋 1】《血染的征程》一文，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注釋 2】見於《將軍脫險記》一文，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下冊。

第五節、張堃少將“失蹤”驚動高層

第 54 集團軍副政委張堃受傷後被送入北京市急救中心，與部隊失去了聯絡。他的“失蹤”情況逐級上報後，引起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解放軍總參謀部、中央軍委的高度關切。這些機關繁忙的電話機，一次又一次地為張堃而撥動。在中國軍方負責人們再三催問下，焦頭爛額的參謀、助理人員大海撈針似地四處打聽、尋找張堃的下落。

海外媒體也得知了張堃“失蹤”的情況，在第一時間做了報導。

張堃剛被送入北京市急救中心時，並不引人注目，被臨時安置在走廊，當時人滿為患，醫務人員急於救人。後來，張堃被送到二樓受傷軍人安置區，立刻被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連長王宏偉認出，馬上騰出唯一的單人房間，將張堃保護起來，嚴格規定誰也不許透露他的身份。北京市急救中心當時總共收留了 108 名受傷軍人，大都是第 54 集團軍的官兵。

北京市急救中心大門口聚集了數千名被屠殺激怒的群眾，一些人在人群中狂叫：“炸平急救中心，打死當兵的！”一樓大廳裏，一群人硬要往上沖，被醫務人員死死攔住，尖嘯聲、狂叫聲、哭喊聲、咒罵聲一浪高過一浪。

張堃剛轉到二樓不一會兒，一個學生模樣的人沖了進來，沖著張堃身旁躺的一個受傷軍人，邊用腳踢邊叫道：“你們躺在這裏怪舒服，根本不該給當兵的治！”醫務人員趕來，把這個學生模樣的人攆走了。

樓下傳來陣陣參差不齊的喊聲：“給他們打一針，讓那些當兵的死了算了！”、“大兵們，你們解甲歸田吧！”受傷軍人們沒有經歷過這種陣勢，不知怎麼辦好，有的年輕士兵委屈地哭了。住在張堃對面的一個士兵經受不住刺激，精神有些失常，時哭時笑時而大聲叫嚷。

在北京市急救中心，醫務人員雖然本著職業道德，對受傷的軍人也予以救治，並將受傷軍人隔離安置，免遭被屠殺所激怒的民眾報復，但是，醫務人員對軍人屠殺平民的行為非常憤怒，對受傷軍人的態度自然不友善。張堃特意讓人打開子彈箱給醫務人員看，說我們寧可挨打受傷，也沒有分發子彈開槍。

這一幕，讓在場的醫務人員深受感動，陪著受傷軍人掉眼淚。

6月4日凌晨，一位提著答錄機的年輕人沖上樓徑直朝受傷軍人走來，答錄機裏傳來一陣劈劈啪啪的槍聲。顯然，這位年輕人是想將發生在西長安街等地的屠殺真相告訴受傷軍人。樓下仍聚集著數千人，一群人狂叫：“把當兵的交出來，要不就放火燒急救中心。”

張堃覺得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必須儘快與上級取得聯繫，把北京市急救中心的108名受傷軍人儘快轉移到軍隊醫院。便派偵察排長小劉去打電話，與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宣武區政府聯繫，但均未聯繫上。

正在著急之時，一位女護士來到張堃身旁，作了自我介紹，說是軍人，是解放軍總後勤部醫院派到這裏實習的護士，名叫馬燕濱，並給張堃看了工作證，問他需不需要幫助，要不要往外打電話。張堃雖然出於安全考慮，一直十分警覺，但從10多個小時的接觸中已感覺到，她和其他十幾名護士（都是解放軍總後勤部醫院派到北京市急救中心實習的護士）對受傷軍人特別關心，相信了她。

張堃問：“電話能打出去嗎？”

馬燕濱答：“能。電話打給誰？”

張堃說：“你既然是總後的，就打給總後衛生部吧，告訴他們，這裏有100多名傷患，讓他們想辦法接應一下。”

馬燕濱說：“總後你還認識誰？最好找個具體人。”

張堃想起了他的老首長、總後政委劉安元中將。問馬燕濱：“認識劉安元政委嗎？”

馬燕濱說：“我愛人（丈夫）就是負責劉政委勤務工作的。”真是太巧了！

中午時分，馬燕濱告訴張堃，電話打通了，劉安元政委讓她轉告，不要暴露身份，組織好傷患，準備轉移。

6月4日凌晨，第54集團軍軍長朱啓親自帶領全副武裝的一個團部隊，包圍了北京市急救中心，將張堃接走，送入解放軍305醫院救治。

第六節、第 54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56 名官兵）

軍長朱超少將

軍政委張文台少將

軍副政委張堃少將

軍參謀長何善福少將

軍副參謀長黃漢標大校

軍政治部副主任岳宣義大校

步兵第 162 師師長黃棟甲大校

步兵第 162 師政委胡永柱大校

步兵第 162 師副師長劉順開上校

步兵第 162 師政治部主任林長凱上校

步兵第 162 師後勤部部長秦應和

步兵第 162 師副參謀長鄔發琪

步兵第 162 師司令部機要科科长宋海潮

步兵第 162 師司令部機要參謀常建偉

步兵第 162 師司令部機要參謀段合林

步兵第 162 師司令部機要參謀張世芳

步兵第 162 師司令部機要參謀胡斌

步兵第 162 師團長周長軍

步兵第 162 師某團後勤處運輸股股長潘福安

步兵第 162 師炮兵團第 1 營教導員沈運田（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62 師某團後勤處運輸股助理員陳建鵬

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連長王宏偉上尉

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副連長管宏福

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第 1 排排長劉加宏

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第 4 班班長劉大宏

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士兵韓青

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第 2 排代理排長南仲國

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士兵趙波
步兵第 162 師偵察連士兵裴建華
步兵第 162 師副師長劉順開小車司機郭國恩
步兵第 162 師炮兵團第 1 營營長吳鐵成
步兵第 162 師炮兵團第 1 營士兵高龍
步兵第 162 師炮兵團楊政委

步兵第 127 師師長钟聲琴大校
步兵第 127 師政委王玉發大校
步兵第 127 師副師長鄧志開
步兵第 127 師副政委譚海聶
步兵第 127 師副政委朱晉泉（？）
步兵第 127 師參謀長楊武
步兵第 127 師政治部主任曹東新上校
步兵第 127 師後勤部部長陳卓熙
步兵第 127 師司令部偵察科科长梁土發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80 團團長黃漢吉上校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80 團政委陳党林上校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團長徐乃飛上校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政委張文品上校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政治處主任萬功民
步兵第 127 師炮兵團團長彭宗奎上校
步兵第 127 師炮兵團政治處主任林留松
步兵第 127 師某炮兵營車輛管理助理員程銀生少校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某營教導員李金劍
步兵第 127 師紅軍團第 2 營教導員李建民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第 3 連（“屢建奇功連”）
連長秦文富
步兵第 127 師某團第 8 連指導員彭同軍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第 1 連連長王春富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第 2 連連長宋章林
步兵第 127 師偵察連連長張合獻

步兵第 127 師炮兵團第 1 營第 1 連指導員李鐵栓
步兵第 127 師炮兵團榴炮 3 連指導員史昌才
步兵第 127 師炮兵團導彈 3 連指導員翁雲光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第 2 連第 1 排排長申玉勝
步兵第 127 師高射炮兵團士兵祁長如（因肝癌死亡，濟南軍區
授予“首都衛士”稱號）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第 3 連士兵王懷強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第 3 連士兵時應龍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士兵孟壘
步兵第 127 師偵察連士兵趙學榮
步兵第 127 師偵察連士兵丁寶軍
步兵第 127 師偵察連士兵溫勇
步兵第 127 師偵察連士兵婁傑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2 營營長陳順國
步兵第 127 師 2 炮連指導員王志剛
步兵第 127 師某部代理排長馬國選（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
號，死亡）
步兵第 127 師士兵李保國
步兵第 127 師士兵杜銀生
步兵第 127 師某團後勤處戰勤參謀王錦偉中尉（獲“共和國衛
士”榮譽稱號，死亡）
步兵第 127 師某團後勤處協理員郜成勳
步兵第 127 師汽車排士兵張建國
步兵第 127 師士兵王學宏
步兵第 127 師下士劉剛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參謀長于愛龍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副參謀長馬雙海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後勤處軍械股股長李書景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先頭營）營長馬水亭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炮兵營營長胡茂發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2 連連長宋章林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5 連連長高書波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炮兵營高炮連指導員呂典兵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2 連指導員戴躍先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9 連指導員韓蘇洲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軍醫陸海義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3 連第 1 排代理排長鄭和平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3 連第 4 班班長鄭宏生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3 營炮兵連第 1 班班長余愛軍(獲
“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湖北省襄陽縣人)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營部通信兵丁繼科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連通信員呂英蓮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連文書汪勇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9 連士兵溫家文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2 連士兵王善豹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2 連士兵馬洪浩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2 連士兵畢多良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2 連士兵鮑軍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士兵吳欽新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1 營士兵繆遠強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士兵閻文明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士兵陶右軍(陶應軍)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士兵李安明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士兵王世海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士兵王成東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士兵王書堂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9 連士兵宋保乾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3 營炮兵連第 1 班士兵王橋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3 營炮兵連第 1 班士兵馮進堂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第 3 營炮兵連第 1 班士兵高小軍

傅洪增少校
某團政治處幹部股股長胡海利上尉
士兵吳金虎
少校股長桂遠程

士兵周廣播

步兵第 127 師政治部幹部科幹事袁多斌上尉（四川省萬源市人。後任步兵第 127 師政治部幹部科副營職幹事，少校軍銜。1993 年 10 月轉業，歷任四川省達州市就業服務管理局副主任科員、達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人事秘書科幹部、達州市就業服務管理局副局長兼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黨委辦公室主任。2005 年 10 月以來任達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兼就業服務管理局局長。）

步兵第 127 師高炮團政委侯珠江（湖北省武漢市人。歷任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81 團政委、步兵第 379 團政委、第 54 集團軍高炮旅政委、湖北省軍區荊州軍分區副政委。2003 年 3 月以來任湖北省軍區咸甯軍分區政委。）

步兵第 127 師坦克團團長魏國庭（河南省新密市人。歷任第 54 集團軍坦克旅副旅長兼參謀長、第 54 集團軍裝備技術部副部長、第 54 集團軍坦克旅旅長、第 20 集團軍裝甲旅旅長、第 54 集團軍副參謀長。2006 年 5 月以來任河南省商務廳副廳長。）

步兵第 127 師坦克團班長胡開俊（河南省霍邱縣人）

步兵第 127 師坦克團班長湯懷春（河南省霍邱縣人）

步兵第 127 師炮兵團後勤處處長周元方（河南省濮陽縣人。歷任步兵第 127 師息縣農場場長、河南省南樂縣武裝部政委、河南省清豐縣武裝部政委。2002 年 8 月轉業到河南省濮陽市林業局任紀檢組長、黨組成員。2003 年 3 月以來任濮陽市房地產管理局紀委書記。）

步兵第 127 師第 66 分隊士兵李明傑

步兵第 127 師第 66 分隊士兵宗濤

步兵第 127 師第 66 分隊士兵溫永

步兵第 127 師步兵第 379 團特務連偵察排排長周保平（湖北省浠水縣人。筆名洛軍，網名“關心宜都”。2000 年 9 月轉業安置在湖北省宜都市房地產管理局工作，2007 年 6 月以來在中共湖北省宜都市委組織部工作。）

步兵第 127 師步兵 380 團“紅三連”士兵夏先寶（安徽省壽縣

人)步兵第 127 師步兵 380 團“紅三連”士兵夏德軍(安徽省壽縣人)步兵第 127 師步兵 380 團“紅三連”士兵宋玉東(安徽省壽縣人。1993 年任連長。)

步兵第 127 師步兵 380 團“紅三連”士兵徐平(安徽省壽縣人。)

步兵第 162 師連長鄭春喜(歷任副營職助理員、正營職助理員。1998 年 9 月轉業到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司法局,歷任司宣股股長、辦公室主任、副局長。)

步兵第 162 師士兵何瑛(河南省夏邑縣人。1994 年退伍後先後在安陽廣播電臺新聞部實習和《中原經濟報》豫北記者站供職。同年任《市場經濟時報》河南記者站站長。1999 年供職於《中國經濟時報》河南記者站。2004 年組建“安陽市欽獲殷商文化發展公司”,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步兵第 162 師班長郎小平(安徽省涇縣人)

步兵第 162 師士兵張輝

步兵第 162 師士兵于國佳(安徽人)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4 團政治處組織股副股長陳守榮(河南省息縣人。歷任步兵第 162 師政治部組織科正營職幹事、科長、秘書科科長、河南省南陽市新野縣武裝部政委、南陽市南召縣武裝部政委、河南省鶴壁市鶴山區武裝部政委。2002 年 9 月以來任河南省安陽市統計局紀檢組長、黨組成員。)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4 團第 3 營第 7 連士兵胡旭東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5 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鄧學洪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5 團二機連士兵張輝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5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班長方德力(河南省平頂山市人)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5 團特務連連長賈慶所(河北省永年縣小龍馬鄉人。歷任步兵第 485 團司令部副營職作訓參謀、第 1 營營長、第 2 營營長、團裝備處處長、步兵第 484 團參謀長、副團長、步兵第 485 團副團長兼參謀長、河南省安陽市龍安區武裝部部長。2004 年 9 月以來任龍安區副區長。)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6 團第 3 營營長劉敬喜(湖北省孝感市人。歷任步兵第 486 團參謀長、步兵第 162 師作訓科科長、步

兵第 484 團團長。2002 年 1 月轉業，歷任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副區長、中共湖北省應城市委常委兼市總工會主席。2006 年 11 月以來任中共應城市委常委、副市長。）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6 團連長王智好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6 團班長張世忠(1990 年 12 月退伍。2006 年 6 月以來在河南省鄭州市緊急醫療救援中心工作，具有政工師職稱。)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6 團班長劉峰

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486 團政委李光金（湖北省鄂州市人。歷任步兵第 162 師副政委、步兵第 160 師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步兵第 127 師政委、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江西省軍區政委。2005 年 8 月以來任福建省軍區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步兵第 162 師高射炮兵團 83 分隊士兵李關文

步兵第 162 師通信營第 1 連連長高林橋

步兵第 162 師通信營第 1 連指導員賈三法

步兵第 162 師通信營第 1 連副連長彭小平（四川省南充市人）

步兵第 162 師通信營第 1 連士兵梁清華（湖北人）

第 54 集團軍後勤部戰勤處副團職參謀張玉新（歷任步兵第 127 師後勤部部長、第 54 集團軍後勤部生產辦公室主任、副部長、濟南軍區後勤部新鄉企業管理局局長。1995 年 12 月轉業，歷任河南省醫藥管理局副局長、助理巡視員。2004 年 6 月以來任河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

第八章、陸軍第 39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39 集團軍概況

在中央軍委的調兵計畫中，第 39 集團軍是屬於首批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但實際上，該集團軍進京的時間，比隸屬於北京軍區的第 24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第 38 集團軍、第 63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等部隊要晚。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39 集團軍隸屬於瀋陽軍區，軍部駐地在遼寧省營口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81043”。傅秉耀少將任軍長，馬盛林少將任軍政委，羅有禮少將任副軍長，高殿成少將任軍副政委，王榮贊少將任軍參謀長，李棟恒少將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39 集團軍的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第 15 軍團，由最先長征到達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第 25 軍和在陝北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工農紅軍第 26 軍所組成。1937 年 8 月 25 日，在陝北三原縣橋底鎮改編為八路軍第 115 師第 344 旅，徐海東任旅長，黃克誠任副旅長。1940 年 2 月，改編為八路軍第 2 縱隊，左權任司令員，黃克誠任政委。6 月底，八路軍第 2 縱隊一部與新四軍第 6 支隊在淮北會師，整編為八路軍第 4 縱隊，彭雪楓任司令員，黃克誠任政委。7 月，八路軍第 2 縱隊一部又與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等地方部隊合編為八路軍第 5 縱隊。

1941 年 1 月發生“皖南事變”後，八路軍第 2 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 3 師，下轄第 7 旅、第 8 旅、第 9 旅，共有 2 萬多名官兵，成為新四軍主力部隊。黃克誠任師長兼政委，彭雄任師參謀長，吳法憲任師政治部主任。

1945 年 10 月，奉中共中央之命，新四軍第 3 師主力部隊的四個旅和三個獨立團，共 37000 多名官兵，在師長兼政委黃克誠和副師長劉震、洪學智率領下挺進東北，搶佔地盤。該師挺進東北的人數占當時東北解放軍人數的三分之一，遂成為後來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又稱第 4 野戰軍）的頭號主力部隊。

1946 年 1 月，該部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第 3 師，下轄第 7 旅、

第 8 旅、第 10 旅、獨立旅以及師直屬的三個特務團，共有 37000 多名官兵，黃克誠任師長兼政委。國共內戰爆發後，該部參加遼西阻擊戰，開闢西滿根據地，控制長春至白城、通遼經鄭家屯至齊齊哈爾鐵路線及西滿廣大地區。隨後，又在四平地區進行了為時兩個月的阻擊戰。

1946 年 9 月，東北民主聯軍第 3 師主力部隊改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第 2 縱隊，劉震任司令員，吳法憲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吳信泉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 8 旅改編為第 4 師，第 10 旅改編為第 5 師，獨立旅改編為第 6 師，共有 30000 多名官兵。第 7 旅改編為第 16 師，編入東北民主聯軍第 6 縱隊。1947 年春，參加三下江南戰役，向長春、德惠、農安之間的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從 5 月開始，接連發起夏季、秋季、冬季三大攻勢，把戰火引向國民黨統治區。

1948 年 1 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第 2 縱隊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第 2 縱隊。在同年 9 月的遼沈戰役中，先是參加了錦州作戰，後又回師北上，與友鄰部隊一起在遼西圍殲國民黨軍隊廖耀湘兵團，並乘勝直搗瀋陽。

1948 年 11 月 1 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統一全軍統一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東北人民解放軍第 2 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39 軍，劉震任軍長，吳法憲任軍政委，吳信泉任副軍長，王良太任軍參謀長，李雪三任軍政治部主任，伍瑞卿任軍後勤部部長。第 4 師改稱第 115 師，第 5 師改稱第 116 師，第 6 師改稱第 117 師。東北人民解放軍獨立第 7 師調歸第 39 軍建制，改稱第 152 師。

1948 年 12 月 1 日，第 39 軍隨東北解放軍揮師入關，參加平津戰役，在攻打天津的戰役中擔任和平門方向的主攻任務。

1949 年 4 月底，第 39 軍由河北武清地區出發，向華中、華南進軍。7 月初，進軍至湖北宜昌、沙市、江陵地區。隨後進軍湘西，參加了衡寶戰役，然後直下廣西柳州，攻佔了南寧。12 月 11 日，攻佔了鎮南關（今稱友誼關）。

1950 年 10 月，第 39 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10 月 21 日入朝參戰，是首批參戰的志願軍部隊之一。11 月 1 日，第 39 軍部隊在開進途中與聯合國軍遭遇于雲山地區，打響出國後第

一仗。此後，先後參加了志願軍所發動的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和第 5 次戰役。

1952 年 12 月 18 日，第 39 軍移防朝鮮西海岸，參加西海岸防禦敵軍登陸備戰。1953 年 5 月撤離朝鮮回國。

1982 年 9 月，第 39 軍與第 38 軍率先開始進行改編、組建合成集團軍的試點工作。1984 年，第 39 軍改編為陸軍第 39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115 師（當時部隊代號“81167”）、步兵第 116 師（當時部隊代號“81178”）、步兵第 117 師（當時部隊代號“81189”），共計 3 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第 3 師（當時部隊代號“81378”）、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81301”）、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81367”）、工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1814”）、通信團、偵察營等部隊。

1988 年 3 月，第 39 集團軍組建直升機大隊，成為繼第 38 集團軍之後第 2 個擁有直升機大隊的陸軍集團軍。1996 年，步兵第 117 師改編為武警部隊機動師。1998 年後，坦克第 3 師與高射炮兵旅分別改編為裝甲師和防空旅，直升機大隊擴編為航空團。第 64 集團軍撤銷建制後，步兵第 190 師改歸第 39 集團軍建制。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1989年5月20日，第39集團軍接到中央軍委緊急命令，部隊立即趕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一開始，爲了保密，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只傳達到師一級指揮官，師級以下的官兵並不知道是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只是聽說要前往沈陽市執行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

根據上級要求，第39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少將率領集團軍先遣人員先期到達北京預定集結地，建立集團軍指揮部。

第39集團軍進京部隊包括步兵第115師、步兵第116師等部隊，由軍長傅秉耀、軍政委馬盛林指揮率領，分別從遼寧省蓋縣、新城縣向北京開進。一部分部隊（應當是步兵第115師）經由火車軍用專列輸送，一部分部隊（步兵第116師）以摩托化方式開進。

第115師師部的駐地在遼寧省蓋州市，下轄步兵第343團（當時部隊代號“81169”）、步兵第344團（當時部隊代號“81171”）、步兵第345團（當時部隊代號“81173”）、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1175”）、高射炮兵團、坦克團，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第116師師部駐地在遼寧省大石橋市，下轄步兵第346團（當時部隊代號“81180”）、步兵第347團（當時部隊代號“81182”）、步兵第348團（當時部隊代號“81184”）、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1186”）、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1187”）、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81384”），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116師是第39集團軍的主力師，在解放軍的所謂“四大王牌師”中名列第二。該師在國共內戰時期戰績顯赫，是首批進入朝鮮參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先後於1950年12月4日和1951年1月5日攻佔北韓的首都平壤、南韓的首都漢城。1982年9月，步兵第116師率先改編爲機械化步兵師。

1989年5月20日下午2點鐘左右，步兵第116師部隊乘坐軍車向遼寧省省會沈陽市摩托化進發。部隊車隊快要抵達沈陽

市時，上級突然命令改去北戴河，轉而向北戴河開進。到了山海關附近，上級又命令改去北京。

在向北京摩托化開進途中，官兵們很少有片刻休息。官兵們不瞭解北京所發生的學生運動情況，十分好奇，不斷地通過隨身攜帶的收音機瞭解北京的最新情況，得知先行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北京郊區或市區受到學生和民眾的攔阻，無法抵達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

部隊車隊行至河北省秦皇島市，第一次受到阻攔。當地包括燕山大學在內的大專院校學生約 1 千餘人，組成人牆，擋住去路，部隊車隊停滯不前。學生們圍著軍車靜坐，有十幾名學生拿著半導體擴音器向官兵們講述北京學生運動的真相，希望部隊不要前往北京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

一名學生對著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彈炮 2 連士兵崔國政（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乘坐的軍車，聲淚俱下地訴說：“我連考 3 年才考上大學，不容易呀！以後學校很可能會因為我參加這次學潮而開除我。我爲了什麼？你們應該理解我們大學生的心情。你們不能去北京啊！如果真的去了，上級下命令開槍時，你們千萬要手下留情啊！”

步兵第 116 師部隊車隊在秦皇島市受困多時，後來在當地政府和公安部門的協助下才脫困。

5 月 22 日早晨 6 點鐘，經過 2 天 1 夜的摩托化開進，步兵第 116 師進京部隊車隊抵達北京市通縣（現為北京市通州區），駐紮在三間房軍用機場。

步兵第 116 師部隊進駐三間房軍用機場後，按照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要求，對官兵們實行封閉式管理，與外界隔絕，駐地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崗把守，不許官兵們隨意進出。官兵們當時獲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徑，就是閱讀中國軍方的《解放軍報》。當時，部隊政工幹部教育官兵們說，將要到北京城內的外國使館區維持治安，要注意形象。同時強調不能向人民開槍，誰開第一槍就要向歷史負責，等等。

第 39 集團軍與第 38 集團軍、第 54 集團軍，同屬中央軍委戰略機動部隊的重點集團軍。中央軍委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非常重視該集團軍在北京戒嚴行動中的作用和表現。在該集團軍部隊進駐位於北京市通縣的三間房軍用機場後，解放軍總

參謀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解放軍總後勤部三大機關的負責人，紛紛前往該集團軍的駐地視察慰問。

第三節、軍指揮部與部隊失去通訊聯絡

1989年6月3日，第39集團軍指揮部接到了上級命令：部隊立即向北京城內強行開進，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這個命令快速地被傳達到師（旅）、團一級。

按照上級命令要求，第39集團軍進京部隊兵分兩路，一路是步兵第116師，任務是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直接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另一路是步兵第115師，任務是控制住北京城內的朝陽門、建國門立交橋和二環以東、三環以西路段，配合其他部隊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6月2日，第39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就已接到部隊向北京城內開進的預先命令，當天晚上，他幾乎一夜未睡，在昏暗低矮的帳篷內面對著兩張圖：兵力部署圖和北京市區圖，一根接一根地吸煙，思考部隊開進的有關問題。直到6月3日凌晨3點鐘，他最後一次審視了部隊開進方案和兵力部署圖，才接過警衛員遞上的安眠藥片，服用後勉強小憩了片刻。

6月3日早上，傅秉耀來到步兵第116師駐地。中央軍委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要求對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嚴格保密，只允許傳達到師一級指揮官。怎樣才能做到既不洩密，又能讓部隊時刻保持準備？傅秉耀便以檢查衛生為名，讓各團將軍用卡車一一排列好。又讓集團軍司令部參謀故意放出風聲，說軍長當晚要搞緊急集合。這樣，各團指揮官為了應付緊急集合，紛紛要求官兵們事先將背包槍支擺放整齊。

6月3日下午5點50分，第39集團軍部隊兵分四路，陸續從三間房軍用機場出發，向北京城區開進。軍長傅秉耀乘坐213吉普車，帶領集團軍精幹指揮所率先出發，到北京城內建立前進指揮部。當大部分部隊開出駐地後，突然接到瀋陽軍區前進指揮部命令，讓步兵第116師變更預定的集結地點。這時，步兵第116師部隊車隊已經開出去很遠。傅秉耀一面通過軍用電臺緊急通知，一面讓駕駛員高速追上步兵第116師參謀長和先頭團政委，在兩車並行中下達了命令。

當時，天還沒有黑，北京城的每一個路口都擠滿了圍堵軍

車的人群。傅秉耀帶著集團軍司令部作訓處處長和炮兵參謀安衛平，乘車進入北京城，於晚上 7 點 10 分到達位於建國門外的預定指揮位置，建立了集團軍前進指揮部。

集團軍前進指揮部處在一棟高層建築的一套公寓裏。傅秉耀打開指揮機，試圖聯絡開進途中的部隊，由於四周高樓林立，電波被阻隔，聯絡不上部隊，只知道步兵第 116 師部隊在北京市朝陽區八王墳一帶受阻，步兵第 115 師的一個團在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立交橋上遭到數萬名民眾圍堵、分割。

晚上 8 點 07 分，傅秉耀對炮兵參謀安衛平說：“安參謀，現在交給你一項緊急任務，一要迅速查明部隊開進情況，二要傳達我的命令，確保部隊按時到位。”安衛平身穿便裝，騎自行車來到建國門立交橋，向受阻部隊傳達軍長的命令。安衛平返回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已是晚上 11 點鐘過後，但由於步兵第 116 師情況不明，他又奉命騎自行車去瞭解情況。

安衛平先後 6 進 6 出天安門廣場，不僅聯絡第 39 集團軍所屬部隊，而且幫助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部隊聯絡上了上級領導機關，因此成為所謂的“孤膽英雄”，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一路升官，歷任步兵第 344 團團長、步兵第 115 師師長。

6 月 4 日清晨 5 點多鐘，隨同步兵第 116 師部隊行動的第 39 集團軍參謀長王榮贊少將，在部隊受阻時孤車突圍，抵達集團軍前進指揮所，與軍長傅秉耀會合。傅秉耀告訴王榮贊，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步兵第 116 師部隊已經到位。王榮贊不禁一陣欣喜，但隨後得知，步兵第 116 師到達天安門廣場的部隊只有幾個團而已，還有一些部隊，包括該師師長許峰所率領的師指揮所並未到達。集團軍通信團部隊帶著幾台通信車，雖然也開進了天安門廣場，此刻卻聯絡不上。

王榮贊對傅秉耀表示：“天安門廣場的部隊沒有人指揮不行，我帶集團軍機關幾個人去。”傅秉耀搶著要去，王榮贊不贊同，說：“你要指揮整個集團軍的行動，還是讓我去吧！”

王榮贊匆匆吃了幾口飯，身穿便裝，帶著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單處長，向天安門方向步行而去。王榮贊平時對官兵們要求相當嚴格，軍容風紀嚴格按照規定執行。可是當時如果身穿軍裝並乘車前往天安門廣場，那是不可能的。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畫面：一位體態稍胖、身穿短袖襯衣和短褲、五、六十歲上下的男人，手搖紙扇，與一個中年男人一起，向中國歷史博物館東北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哨兵走去。哨兵立刻端槍發出警告，王榮贊和單處長只好轉身離去，尋找別的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路徑。

在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南池子街南口附近，王榮贊和單處長夾雜在人群中，看到此處有成千上萬的民眾不斷衝擊解放軍戒嚴部隊警戒線，怒罵聲和抗議聲不絕於耳。官兵們不斷鳴槍。王榮贊看著一百多米之外，大批官兵和裝甲車組成一道道堅固的防衛，氣氛十分緊張，看來從這裏進入天安門廣場不行，甚至還有被執勤官兵誤傷的可能。單處長考慮到王榮贊的安全，說：“咱們先回撤，改個時間再來吧！”王榮贊不同意。經過一番觀察，王榮贊和單處長想方設法繞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東南側人較少的地方，進入了天安門廣場。

一進入天安門廣場，王榮贊很快找到了步兵第 116 師部隊，馬上召集已經到位的幾個團級指揮官，根據當時的情況佈置了任務，同時迅速聯繫解決部隊的醫療、供應保障，與上級指揮機關溝通通信聯絡。

忙完這一切，王榮贊帶上兩名參謀前往人民大會堂，向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彙報第 39 集團軍部隊到位情況。在人民大會堂裏，王榮贊站在其他衣冠整齊的將官中間，一起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負責人的接見，並合影留念。

王榮贊事後回想起自己身為一名將官，當時卻以一個賦閑“老頭”的模樣出現，不由得一番感慨。

第四節、第 115 師佔領建國門立交橋

步兵第 115 師當天的任務是控制住朝陽門、建國門立交橋和二環路以東、三環路以西路段，配合其他部隊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此前幾天，步兵第 115 師已經對全師所有的車輛檢查保養了一遍，培訓駕駛員在向北京城內開進時對幾種情況的緊急處置能力。師長張作禮帶著師、團指揮官和司令部機關參謀們三次深入北京城區勘察開進路線，要求指揮官人人都要成為北京城的活地圖。此外，師指揮部精心制定了幾套開進方案。

6 月 3 日下午 5 點鐘，步兵第 115 師指揮部接到部隊向北京城內開進的命令，決定由紀律嚴明、作風硬朗的“紅軍團”——步兵第 343 團作為先鋒團。當時，步兵第 343 團政治處主任呂連生正在組織全團政治宣傳骨幹舉行政治搶答賽。開進命令下達得很急，半小時之後，呂連生就帶著先頭營出發了。

6 月 3 日晚上 6 點鐘，該師兵分兩路向北京市區預定目標開進。師長張作禮將通常首腦機關在中路跟進的做法改為前衛跟進，他與師政委孫大發同乘一輛軍用吉普車，跟隨先頭部隊開進，以便於先期到達目的地，對部隊實施有效的組織指揮。一旦部隊開進途中受阻，也便於臨機處置。在後續的團隊裏，師指揮部安排了一名實地勘察過開進路線的師司令部機關軍官，保證部隊一旦被分割，也能有效地進行指揮和組織。

該師車隊從駐地出發不久，就遇到大批民眾強力攔阻。呂連生心想“車子不能減速，必須儘快到位”，所以不管後面車隊怎樣呼叫減速，他都置之不理，帶領先頭營加快車速沖了過去，火速趕到了預定的戒嚴執勤位置——建國門立交橋。

先頭營雖然沖過去了，後續部隊卻受阻。師長張作禮與師政委孫大發碰了碰頭，5 分鐘內下定了決心：返回去尋找受阻部隊，選擇迂回路線，組織部隊繼續開進。當即組成了四個偵察組，張作禮親自率領一個偵察組繞小路出去，先後 7 次進出受阻路段，發現在朝陽區雙井、勁松地區，民眾破壞了步兵第 115 師 2 個團的 30 多輛汽車，並將一輛指揮車掀翻作為路障。

張作禮迅速向受阻部隊作了幾點指示，並指派兩名軍官組織受阻部隊強行開進，不許丟掉一兵一卒。

這時，在建國門立交橋上，率先抵達的步兵第 343 團先頭營正遭受到 6、7 萬名群眾的圍堵。人流一股股湧向部隊車隊，將軍車一輛輛分割包圍。呂連生深深體會到：部隊到位難，站住腳更難。建國門立交橋上下人山人海的圍堵情景，比山呼海嘯更讓官兵們震驚和憂慮。呂連生手拿電動喇叭，站到軍用吉普車的頂蓋上宣講：“今天，我們奉中央軍委的命令，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維護首都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保衛首都和首都人民的安全，相信我們的行動同樣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不歡迎！不歡迎！”許多民眾立刻大聲回應。另有民眾呼叫：“你趕快下令，退回去！北京秩序很好，用不著你們。”

其間，有 8 輛汽車抵達建國門立交橋，裝載著北京工人糾察隊，他們奉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之令，前來協助受阻部隊。人群呼地湧上去，將 8 輛汽車圍得水泄不通，有民眾憤怒地質問：“你們幫助戒嚴部隊鎮壓學生，還算是北京人嗎？”同時，磚頭、玻璃瓶隨著湧動的人群翻飛起來，工人糾察隊員們丟掉手裏的棍棒，很快狼狽地退下去了。其實，絕大多數工人糾察隊員與北京各界民眾一樣，支持和平請願的學生，反對北京戒嚴，一遇到民眾圍堵，就乘機溜之大吉。

6 月 4 日凌晨零點，有一輛裝甲車閃電般地經過建國門立交橋，人群潮水一般退下去。待裝甲車開過去，人群又潮水一般湧回來，並且把呂連生乘坐的指揮車和幾輛軍車統統推到路中央組成了路障。

6 月 4 日凌晨 1 點鐘左右，又有一輛裝甲車經過建國門立交橋，爲了免遭人群阻攔，車速非常之快，將被群眾推到路中央當作路障的一輛軍用卡車刮翻，官兵們拋出車外，多人受傷。一些民眾借機鼓動說：“你們被 27 軍包圍了，趕快起義吧！”一時間，隊伍象脫了韁的馬，有的士兵甚至哭喊起來。一名基層軍官揮舞著手槍，帶領一群士兵追趕肇事的裝甲車。

師長張作禮意識到，如不迅速控制局勢，穩定官兵情緒，部隊就很難堅守住建國門立交橋，一旦這裏失守，等於打開了通往天安門廣場的東大門，必將直接危及到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他當即與師政委、師政治部主任緊急碰頭，調整了行動方

案，並分頭做官兵們的思想政治工作。

當時，建國門立交橋上到處是混亂的人群、散開的部隊官兵，到處是叫喊聲。師長張作禮向各團指揮官下達命令：“不要糾纏我們自己部隊的得與失，我們是軍人！是軍人就得爲全局著想！全局！懂嗎？這是大於一切、重於一切、高於一切的！”這才好不容易平息了一場危在眉睫的部隊嘩變。

6月4日凌晨4點鐘整，解放軍戒嚴部隊對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開始。隨著天安門廣場燈光的熄滅，東長安街上的路燈也一齊熄滅，瞬間陷入一片黑暗。正當圍觀的人群發愣之際，步兵第115師乘機按照計畫行動，僅用了5分鐘時間，部隊調整完畢。

凌晨5點鐘，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坦克車隊途經建國門立交橋，在坦克車隊的掩護下，呂連生帶領先頭營官兵乘勢佔領了建國門立交橋，快速設置了警戒線，把立交橋上的人群驅逐到警戒線以外，全面控制了建國門立交橋。當時，至少有數萬名民眾被攔阻在建國門立交橋以東，無法經由東長安街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

第五節、第 116 師挺進天安門廣場

1989 年 6 月 3 日，步兵第 116 師部隊的任務是，全副武裝向天安門廣場摩托化開進，直接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按照第 39 集團軍指揮部分工，集團軍參謀長王榮瓚靠前指揮，跟隨步兵第 116 師一起行動，協助該師指揮官指揮部隊開進。

6 月 3 日晚上 6 點鐘，步兵第 116 師車隊從駐地出發不久，就在北京市朝陽區八王墳地區嚴重受阻，無法按照預定的路線前進，只好採取第 2 套方案：迂回開進。

6 月 4 日凌晨 2 點鐘左右，步兵第 116 師前衛團（步兵第 347 團）車隊在開進途中多次受阻，被迫放棄原定的開進路線，繞道迂回開進到東三環路與朝陽區廣渠路交叉路口附近，再次受阻，部隊車隊被民眾分割成數塊。在部隊車隊前方，有幾輛大客車停在路口當作路障，數千名群眾攔住了去路。前衛團只好等待與後面的主力部隊會合後再繞道尋機開進。

前衛團開進過程歷盡艱難，人群，路障，隨時會把車隊攔回，從 6 月 3 日晚上 6 點鐘到 6 月 4 日凌晨 2 點鐘左右，8 小時行程不到 10 公里。

步兵第 116 師主力部隊車隊艱難地抵達朝陽區雙井地區，軍參謀長王榮贊乘坐首車沖在車隊最前面。不久，部隊車隊便被橫置在路上的四輛公共汽車和無以計數的人群擋住去路。有軍官建議強行撞翻攔路的車輛，開出一條通道。王榮贊沒有採納這個建議，認為容易發生流血事件。他召集參謀們商量，想找出一個更好的辦法。

正在此時，第 38 集團軍開往天安門廣場的幾輛坦克、裝甲車路過此處，一邊鳴槍，一邊開足馬力衝開了路障。王榮贊當機立斷，命令部隊車隊緊緊跟上，但只有部分車輛跟隨他的吉普車闖過了路障，大多數車輛並沒有借機前進。

在步兵第 116 師部隊中，首先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是步兵第 347 團，該團團長是艾虎生上校，政委是劉建星上校。

6 月 3 日晚上 8 點 05 分，步兵第 347 團官兵乘坐軍車從駐地出發，向北京城內摩托化開進，目的地是天安門廣場。車隊行至朝陽區八王墳地區，遇到數以千計民眾的阻截，道路完全

被堵死了。“停車----” “滾回去----” 人群推來擁去，激情萬分。

在步兵第 347 團的前衛車上，是該團軍事素質最好的特務連官兵，他們迅速下車，在車子兩側排開。團長艾虎生時年 38 歲，他乘坐的吉普車排列在車隊的第 3 輛位置，一看到受阻，馬上從車上下來，上前觀察情況。面對黑壓壓的圍堵人群，他決定採取事先擬好的第 2 套方案：迂回開進。於是故意對著人群大喊：“不讓前進，那我們後撤！” 部隊出發前，該團黨委曾召開連級以上軍官會議，分析了開進途中可能出現的情況，明確了應急方案：第一、儘量對群眾做說服工作，爭取通過；第二、採取迂回策略，改道開進。

艾虎生和參謀人員很快尋找出可以抵達天安門廣場的三條主要路線，不過，研究後的結論是：到處都聚集著圍堵人群，部隊乘車開進，太難了！艾虎生構想了三個方案：第一、繼續乘車開進，改走小路，穿越胡同，繞行進入天安門廣場。第二、選擇一條民眾相對少的路線，一邊做群眾工作一邊前進，隨時準備棄車徒步開進。第三、棄車徒步開進，避開人群行進。

20 分鐘後，艾虎生組織連級以上軍官在北京某公司一間辦公室召開分析會。與會者都同意艾虎生棄車徒步開進方案，決定空車隊由團司令部軍械股股長負責率領，跟隨其他部隊的車隊走，團主力迂回到鐵路與公路交叉道口，沿著鐵路開進到北京火車站，然後再前往天安門廣場。

很快，這一方案得到了步兵第 116 師指揮部的批准。

6 月 3 日晚上 9 點 20 分，步兵第 347 團官兵順利撤到了位於朝陽區高碑店的公路與鐵路交叉口。晚上 10 點 20 分，該團大部分官兵已經集中在鐵路橋一百米處。

6 月 4 日凌晨，艾虎生在徒步行進中打開半導體收音機，收聽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關於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廣播，猛然一震：鬥爭的性質已經變了，形勢十分嚴峻。他覺得有必要對官兵們進行一次簡短的思想政治動員。於是，命令部隊停止前進，先簡要地向全體軍官傳達了最新廣播消息，然後對全體官兵發表講話：“現在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我們自己也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威脅，我們必須緊密團結，克服一切困難，儘早到達北京火車站！”

艾虎生重新調整了隊形，決定由鋼鐵 7 連、特務連分別擔任前衛和斷後的任務。特務連官兵人人掌握捕俘拳、應用拳、軍體拳等偵察兵技術，而且精通少林連環拳、大洪掌、五形八法、螳螂拳等數十種武術拳法，武藝最高的能打 50 多套，最差的也能打 12 套。鋼鐵 7 連的官兵個個身體強壯，武藝高超，5 百米國際障礙賽人人達到運動員標準，連隊連續 11 年軍事訓練考核全優。

步兵第 347 團主力部隊的近 6 百名官兵從高碑店的公路與鐵路交叉口出發，在徒步開進途中，官兵們四次臂挽臂沖過堵截的人牆。

6 月 4 日凌晨 2 點 20 分，艾虎生率領官兵們進入了北京火車站 2 號月臺，得到北京火車站公安分局姜副局長和幾十名公安幹警的接應。他們告訴艾虎生：“已經有兩支部隊從車站內出去，第一支部隊由於準備不足，出站後被人群圍打、分割，許多人被抓掉了衣服，第二支部隊是以密集列隊硬沖出去的！”

艾虎生用力一跺腳，決定官兵們用 10 路縱隊組成一個大方隊，臂挽臂向天安門廣場強行開進。鋼鐵 7 連在前頭開路，特務連在後面斷後。特務連連長馬國滿向官兵們提出了口號：“還我廣場，衛我京都，制止動亂，要立頭功！”

出發前，艾虎生手提棍子走到每一個連隊檢查準備情況，發現有的士兵緊張得手腳發抖，於是，他每一個人給了一棍子，當然不是真打。然而不知怎麼回事，艾虎生自己的小腿卻突然抽筋了，最後一棍，他打在了自己的腿上。

據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記載，部隊臨出發時，艾虎生向官兵們重申了開進原則：不許輕易鳴槍，寧願增加自己的危險，也要盡最大的可能避免誤傷群眾。

該團近 600 名官兵排成 10 路縱隊的方隊，臂挽臂，跨正步，從北京火車站出發了。一路上，官兵們高唱《團結就是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學習雷鋒好榜樣》等歌曲，高呼“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的口號，歌聲、口號聲在夜空中回蕩。

上述記載顯示，艾虎生的部隊並不是靠唱歌、踢正步抵達

天安門廣場的，而是開了槍的，只是美其名曰“不許輕易鳴槍”而已。另有資料透露，在部隊出發前，艾虎生命令所有官兵打開刺刀。

就這樣，步兵第 347 團主力部隊終於按時抵達目的地，成為步兵第 116 師最先一支成建制抵達天安門廣場的部隊。艾虎生從此官運亨通，歷任師長、軍長等職務，現任成都軍區副參謀長，頒授中將軍銜。艾虎生根紅苗正，其父艾福林曾任瀋陽軍區炮兵副司令員。

步兵第 347 團另有 120 多名官兵在團政委劉建星率領下，乘坐 11 輛軍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這些軍車大多是後勤生活保障車、油料車和炮兵分隊的牽引車，開進途中遭到民眾圍堵，與團主力失去聯繫。劉建星召集副營級以上軍官開會，做出決定：抱緊一團，開闢通路，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車隊在體育館路受阻，有 2 輛軍車的機器蓋被民眾打開，輪胎被紮破，並有一些民眾搶奪軍用物資。官兵們鳴槍示警，驅散人群，硬是把 2 輛軍車修好開了回來。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40 分，車隊避入北京體育館（北京市崇文區體育館路 4 號）。民眾緊接著蜂擁而來，層層圍堵。劉建星決定離開北京體育館，繼續向前開進。

在北京市崇文區光明路鐵路交叉口，車隊又一次遭到民眾圍堵，劉建星命令車隊強行開到了不遠處的國家體委機關大院，不久又轉移到北京軍區空軍部隊某機關大院。劉建星改穿便裝獨自奔向天安門廣場，與團主力部隊取得了聯繫。劉建星帶領這些官兵於 6 月 5 日下午抵達天安門廣場。此外，該團炮兵營教導員朴士忠帶領 6 名官兵趕到北京市崇文區公安分局，接回被沖散的 61 名官兵。

第六節、第 116 師師長許峰抗命事件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除了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公然抗命之外，還有許多良知未泯的軍人以各種方式消極抗命，在這些消極抗命的軍人中，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無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步兵第 116 師接到立即全副武裝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命令。該命令明確要求，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於 6 月 4 日凌晨 1 點到達天安門廣場，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

這時候，上級沒有再說什麼“我們是人民子弟兵，決不能向人民開槍”之類的話。步兵第 116 師部隊官兵因此都感覺到氣氛緊張，事態嚴重。

步兵第 116 師部隊以摩托化方式向北京城內進軍，途中遇到了一批又一批群眾的頑強堵截，部隊車隊的行進速度非常緩慢，後來不得不按照預定方案改走另一條路線。

6 月 3 日晚上，師長許峰親自帶領師司令部幾名參謀，身穿便裝進入北京市區和天安門廣場附近察看情況。就在這時，開始有消息在該師部隊官兵中悄然傳開，說是有的部隊在開進途中已經開槍殺人。從北京市區察看情況回來的許峰，他所聽到、看到的情況肯定更多，返回部隊後神態凝重，對部下說：現在通訊聯絡中斷，收不到上級指示，你們也不用找我了。說完就一頭鑽進了師部通訊車，再也不露面。

此後，許峰帶著該師部隊車隊在北京城外轉悠，說是一直收不到上級的指示。實際上，如果他願意，與上級是可以聯繫得上的，就連該師高射炮兵團第 1 營營部的電臺都一再收到了中央軍委的直接呼叫：“116 師，你們在哪里，請回答！”

許峰始終不回應上級的焦急呼叫。不明底細、頭腦簡單的高炮團第 1 營營長還私下對人嘀咕：“奇怪，這明明不是可以收得到上級的電臺呼叫嗎？師長為什麼說聯繫不上呢？”聽的人忍不住暗自發笑，但不願點破其中的奧秘。

步兵第 116 師高炮團第 1 營第 2 連雷達站站長李曉明中尉於 2001 年回憶了當年親身經歷的情形：

“這時候，大概是北京市民也知道有的部隊開槍殺人的事

情，都躲了起來，沒有人敢在街上攔阻軍隊和堵路，我們部隊完全可以順利進城，但車隊就是不直接進城，而是一直在城外繞行。中間每人都發了子彈，甚至看到一些坦克殺氣騰騰地向城裏開進。

6月3日午夜，我正睡著，忽然聽到馬達響，睜眼看見一輛裝甲車向天上放著槍，將擋路的公共汽車推開，全速向城裏開去。這時，我們部隊也完全可以跟隨裝甲車進城，但卻仍然未進城，仍在郊區繞圈子。

6月4日傍晚，我們車隊還是停在郊區的一片稻田邊休息。大家各自想著心事，久久不能入睡，也無人有心情閒談。遠處鋼廠的火光將天邊染得通紅，使我突然想到第2次大戰時法西斯的焚屍爐，更不敢想像幾十年來一直都在號稱人民子弟兵的友軍竟然已經開始屠城。同時，我也為我們部隊有一位善良的師長，迂回、婉拒上級指示而暗暗慶倖。

6月5日清晨6點許，第38集團軍作戰處處長前來我團，他站在一輛軍車上，2名士兵將機關槍架在駕駛室上。由他在前面開路，我們車隊仿佛被押解進城。一路上，我們看見許多燒毀的軍車、民用車、公車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幾乎不見，但不時從街旁樓內傳出喊聲：‘法西斯、劊子手！’我們的戰士有的便向樓內開槍掃射。

到天安門廣場後，我們部隊被安排到軍事博物館的前廳住下。我同6連一名排長一起去天安門廣場想看個究竟。只見紀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紀念碑北側的大理石臺階和柱子已被坦克車撞壞，履帶印在天安門廣場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見。我們在垃圾堆裏隨意翻了一下，發現一條褲子和一件棉襖上面，都有彈洞和斑斑血跡。也不知這些衣服的主人是傷是死。我們的戰士去打掃天安門廣場，回來後也告訴我說，他們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灘血。”

李曉明中尉在回憶當年親身經歷的情景時，也談到了當年進京部隊官兵對開槍鎮壓的看法，他說：

“當時，部隊官兵中有很多人是非常同情學生的。對政府開槍殺人、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也是持否定態度的。我們團6連一名排長，他和我一樣也是軍校裏來的‘學生官’，大家都喊他‘崔博士’。當時，他就公開在部隊中講了一些批評政府的

話，並在六月中旬開小差回了海城，後被處理回家。

我們師長許峰也是因對政府的做法有不同意見，才婉拒戒嚴令而被迫轉業。我們軍長傅秉耀因執行戒嚴令不得力而被貶新疆軍區，名為平調，實為暗降。據說，38 軍軍長因拒不執行戒嚴令而被軍事法庭判刑。”

時至今日，只有兩位勇敢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公開站出來說明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歷，揭露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真相。第一位站出來的就是李曉明，另一位是第 54 集團軍步兵第 162 師士兵張世軍。

在師長許峰帶頭消極抗命的情況下，步兵第 116 師有許多部隊沒有按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

第七節、第 39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22 名官兵）

軍長傅秉耀少將

軍政委馬盛林少將

軍參謀長王榮贊少將

軍政治部主任李棟恒少將

集團軍司令部炮兵參謀安衛平（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集團軍政治部新聞幹事于榮祿少校（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步兵第 116 師師長許峰大校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團長艾虎生上校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政委劉建星上校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副參謀長申強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政治處副主任賈江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後勤處副處長王實印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後勤處運輸股股長馬國棟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後勤處軍需股股長黃道興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後勤處軍務股股長李貴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教導員朴士忠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坦克營教導員劉士軍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特務連連長馬國滿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鋼鐵 7 連連長尙福堂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鋼鐵 7 連指導員吳建飛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連長王峰（遼寧省海城市人）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指導員初慧民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中尉幹事張喜波（遼寧省海城市人）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鋼鐵 7 連班長邢德龍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鋼鐵 7 連班長隋勁松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特務連偵察排班長胡國學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第 6 班班長孫朝恒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鋼鐵 7 連士兵劉傑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司機李景民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第 6 班士兵崔國政
（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士兵魯和平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第 2 排排長曹偉龍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第 6 班士兵姜銀山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士兵王軍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文書郭俊傑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給養員吳景山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通信員魏向武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炊事班張振宇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炊事班孫朝恒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炊事班王新明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士兵孫福權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士兵袁長忠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士兵尹明光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營長許文峰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第 4 連（“神槍手 4 連”）指導員
許廣福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第 4 連副連長龐志明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第 4 連第 4 班班長曹凱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第 4 連司機于財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第 4 連中士李虎祥

步兵第 115 師師長張作禮大校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3 團政治處主任呂連生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3 團政治處宣傳股股長劉占和上尉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3 團政治處幹事董春生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3 團政治處公務員段存楨
步兵第 115 師“紅 7 連”第 1 排第 2 班士兵臧立傑（獲“共和

國衛士”榮譽稱號，死亡）

步兵第 115 師“紅 7 連”連長蘇學軍

步兵第 115 師“紅 7 連”指導員張玉峰

步兵第 115 師“紅 7 連”士兵宋保革

指導員李英山

連長楊會成

司務長柴國良

第 1 排排長吳明

士兵郭衛東

士兵張希宏

中士王慶滿

士兵邵玉新

士兵盧海軍

步兵第 115 師政委孫大發（安徽省金寨縣古碑鎮人。歷任第 16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政委、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1990 年晉升少將軍銜，2000 年晉升中將軍銜。2007 年晉升上將軍銜。）

步兵第 115 師政治部組織科幹事張文亨（山東省沾化縣人。歷任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政治處宣傳股副連職幹事、正連職幹事、代股長、股長、步兵第 595 團炮兵營教導員、第 3 營教導員、步兵第 595 團政治處主任、步兵第 199 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山東省墾利縣武裝部副部長、山東省東營市東營區武裝部副部長。2005 年 1 月以來任山東省利津縣武裝部政委。）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3 團司令部作訓股股長丁永林（黑龍江省肇東市人。歷任步兵第 115 師司令部作訓處副營職參謀、哈爾濱市太平區武裝部軍事科副營職參謀、黑龍江省軍區司令部作訓處營職參謀、中共哈爾濱市南崗區委組織部黨建一科科長、副部長、中共哈爾濱市委組織部黨建一處副處長、處長、幹部一處處長、幹部調配處處長、助理巡視員，現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組織部副巡視員。）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4 團 95 分隊班長關立國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4 團 95 分隊士兵臧建偉（吉林省遼源市人）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5 團三機連連長于連方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5 團三機連班長肖占明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5 團炮兵營士兵高斌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5 團士兵朱大偉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5 團炮兵營 2 炮連士兵孫天信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5 團炮兵營 2 炮連士兵唐小建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5 團炮兵營軍官李躍（後來官至師長）

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345 團 89 分隊士兵丁建恩

步兵第 116 師後勤部油料科保管員龐雲雷（1990 年 12 月退伍，歷任黑龍江省賓縣農機局監理員、人事股長、組織委員、工會主席。）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6 團修理連副連長余江雲（歷任步兵第 346 團修理連連長、技裝處助理。1996 年轉業，歷任河南省固始縣馬垵鄉政府統計科員、中共固始縣趙崗鄉黨委委員、鄉武裝部部長、固始縣趙崗鄉常務副鄉長、固始縣信訪局紀檢組長。2008 年 8 月以來任固始縣信訪局副局長。）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6 團第 3 營副教導員賈永慶（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歷任步兵第 346 團宣傳股長、第 2 營教導員、營長、黑龍江省軍區司令部作訓處正營職參謀、中共哈爾濱市委統戰部幹部處幹事、黨派處副處長、聯絡處處長，現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統戰部黨派處處長。）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6 團 88 分隊士兵許輝（吉林省郭縣人）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6 團 88 分隊士兵徐文利（吉林省郭縣人）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6 團 88 分隊士兵劉鐵（黑龍江省依蘭縣人）

步兵第 116 師步兵 347 團政治處宣傳股股長李勝傑（吉林德惠市人。歷任解放軍獸醫大學宣傳處幹事、解放軍農牧大學學員隊教導員、輪訓隊政委、解放軍軍需大學宣傳處處長、工程系政委，大校軍銜。現任吉林大學農學部軍需科技學院黨委書記。）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第 2 營副營長李貴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第 5 連連長于洋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第 5 連指導員劉海城（後來任步兵第 347 團政治處宣傳股股長。已經死亡。）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士兵李峰（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人）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衛生隊衛生員姚燕濤

步兵第 116 師第 347 團第 7 連士兵曹殿明（吉林省梅河口市人）

步兵第 116 師第 347 團第 7 連士兵曹寶忠（黑龍江省德都縣人）

步兵第 116 師第 347 團第 7 連士兵張金龍（黑龍江省德都縣人）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營部士兵李振東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第 2 營第 6 連士兵李月明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第 5 連士兵王明強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第 5 連排長林國會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第 5 連排長黃明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第 5 連班長杜江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修理連士兵孫連國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修理連士兵曹旭寶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炮兵營 3 炮連士兵陳軍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士兵盧樹輝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7 團士兵遲學義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神槍手 4 連”士兵趙萬輝（現改名叫 趙祥程，在河北省三河市一家公司任部門主管。）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士兵李祖聖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衛生隊隊長陶守惠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衛生隊衛生員朱純勇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衛生隊軍醫趙玉龍（現在遼寧省鐵嶺市當法醫。）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第 3 營第 8 連班長王義革

步兵第 116 師步兵第 348 團衛生隊衛生員高豔華

步兵第 116 師坦克團 91 分隊班長劉文剛

步兵第 116 師坦克團工兵連士兵楊亨榮

步兵第 116 師坦克團工兵連士兵鐘義明（四川省成都市郫縣人）

步兵第 116 師坦克團士兵王長安（1995 年至 2002 年在《瀋陽日報》駐黑龍江記者站任特約記者。）

步兵第 116 師高射炮兵團士兵李曄（原名李建堂）

第 39 集團軍司令部機要處參謀趙振昌（遼寧省盤錦市人。歷任第 39 集團軍炮兵旅機要科參謀、第 39 集團軍裝甲 3 師司令部機要科科长。2006 年 2 月以來任中共黑龍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區委常委、武裝部政委。）

第 39 集團軍連長林川（1990 年轉業。現任遼寧省瀋陽市沈河區人大常委會督察室主任。）

第 39 集團軍通信分隊士兵黃海明

第 39 集團軍士兵聶鋼（黑龍江省伊春市人）

第九章、陸軍第 65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陸軍第 65 集團軍概況

第 65 集團軍是第一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主力之一，深受中國當局和掌握軍權的楊尚昆、楊白冰兄弟信任。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65 集團軍隸屬於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1056”。臧文清少將任軍長，曹和慶少將任軍政委，李繼旺大校任副軍長，靳甲夫大校任軍副政委，田書根少將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65 集團軍的前身是在國共內戰後期組建的解放軍華北軍區第 8 縱隊，由解放軍冀察軍區的郭天民縱隊和劉道生縱隊各一部分發展而來。

1946 年 7 月，郭天民縱隊與劉道生縱隊一部改編為晉察冀野戰軍第 2 縱隊，郭天民任司令員兼政委，下轄第 4 旅、第 5 旅。1947 年 2 月，冀中軍區獨立第 8 旅改稱晉察冀野戰軍第 2 縱隊第 6 旅。1948 年 5 月，晉察冀野戰軍第 2 縱隊改稱華北軍區第 2 縱隊。7 月，華北軍區將野戰軍編為 3 個兵團，將第 4 旅調離第 2 縱隊。9 月，第 2 縱隊第 4 旅及華北野戰軍獨立第 1 旅、第 2 旅在河北省易縣組成第 8 縱隊，邱蔚任司令員，王道邦任政委，原第 2 縱隊第 4 旅改稱第 22 旅，原獨立第 1 旅改稱第 23 旅，原獨立第 2 旅改稱第 24 旅。第 8 縱隊隸屬於華北軍區第 2 兵團，從 11 月至次年 1 月，在平津戰役期間參加了新保安作戰和北平和平解放。

1949 年 2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序列和部隊番號的命令，第 8 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65 軍，隸屬於第 19 兵團建制。邱蔚任軍長，王道邦任軍政委，王克斌任副軍長，蕭應棠任副軍長兼參謀長，蔡順禮任軍副政委兼軍政治部主任，潘桂林任軍後勤部部長。第 22 旅改稱第 193 師，第 23 旅改稱第 194 師，第 24 旅改稱第 195 師。

1949 年 3 月至 4 月，第 65 軍參加太原戰役。太原戰役結束後，隨同第 19 兵團調歸第 1 野戰軍建制，執行解放大西北的作

戰任務。7月至9月，參加扶眉、陝中、蘭州、寧夏等戰役。

1951年2月，第65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開赴朝鮮參與第5次戰役。時任軍長肖應棠，軍政委王道邦，軍參謀長阮平，軍政治部主任陳宜貴。在第5次戰役中，第65軍擔任右翼突擊集團實施戰役迂回，陣地戰階段擔任守衛開城的任務。著名作家巴金曾在該軍第194師體驗生活，創作了小說《團圓》，後被改編為家喻戶曉的電影《英雄兒女》。

1953年10月，第65軍撤離朝鮮回國，駐防河北省張家口市。

1958年，第65軍第195師調歸中央軍委工程兵建制，改編為特種工程指揮部建築第53師，進駐核子試驗基地羅布泊。

1985年，第65軍改編為陸軍第65集團軍，下轄步兵第193師（當時部隊代號“51052”）、步兵第194師（當時部隊代號“51055”）、步兵第207師（當時部隊代號“51396”），共計三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旅（當時部隊代號“51391”）、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392”）、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2968”）、通信團、工兵團、偵察營，代管守備第3師（當時部隊代號“51059”）、守備第4師（當時部隊代號“51179”）。

1990年，為加強首都北京的安全保衛力量，以守備第4師和守備第3師的一個團，組建武警部隊北京市第2總隊。1992年，守備第3師撤銷番號。1998年後，步兵第207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旅。第28集團軍撤銷番號後，坦克第7師改編為裝甲第7旅，改歸第65集團軍建制。2003年，第24集團軍撤銷番號，裝甲第1師、摩托化步兵第196旅轉歸第65集團軍建制，摩托化步兵第70師縮編為摩托化步兵第70旅，原第65集團軍第194摩托化步兵旅、第207摩托化步兵旅、裝甲旅撤銷番號。

第二节、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65 集團軍的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194 師、守備第 3 師、高射炮兵旅、坦克旅、通信團等部隊，共有 1 萬多名官兵，在軍長臧文清少將、軍政委曹和慶少將的率領指揮下進京。事後，步兵第 193 師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三等功。

步兵第 193 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宣化市，下轄步兵第 577 團（當時部隊代號“51051”）、步兵第 578 團（當時部隊代號“51069”）、步兵第 579 團（當時部隊代號“51057”）、坦克團、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66”）、高射炮兵團，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 193 師是第 65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曾連續 8 年被評為“全軍軍事訓練一級單位”，超越了同屬於北京軍區的第 38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所屬各步兵師。步兵第 193 師具有悠久傳統，其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第 1 方面軍第 1 軍團第 1 師，素有“紅 1 師”之稱。解放軍的大將譚政、陳庚、上將楊得志、楊成武、楊勇等高級將領，都出身于該師。

步兵第 194 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宣化市，下轄步兵第 580 團、步兵第 581 團（當時部隊代號“51067”）、步兵第 582 團（當時部隊代號“51060”）、坦克團、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062”）、高射炮兵團，以及師直屬的偵察連、工兵連、通信連、警衛連等部隊。

守備第 3 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縣洗馬林鎮，下轄守備第 9 團、守備第 10 團、守備第 11 團、守備第 12 團、炮兵團。

集團軍高炮旅旅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縣，下轄第 633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82”）、第 634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83”）、635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79”）、636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80”）。

集團軍坦克旅旅部駐地和集團軍通信團團部駐地，都在河北省張家口市。

1989 年 5 月 18 日，第 65 集團軍軍長臧文清緊急奉召趕赴北京軍區司令部，受領進京執行戒嚴的任務。時間緊迫，臧文

清馬不停蹄地返回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的軍部，召開集團軍黨委會緊急會議，傳達緊急進京命令，研究落實任務。緊急進京命令和集團軍黨委會緊急會議的相關決定迅速下達到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194 師、守備第 3 師、集團軍高炮旅、坦克旅、通信團等部隊，要求各部隊連夜部署開進準備。

5 月 18 日晚上 11 點 40 分，步兵第 193 師接到緊急進京命令，馬上在師黨委會議室召開黨委會緊急會議，做出了幾條決議：第一、堅決擁護、執行上級命令，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第二、立刻按照上級命令要求，連夜通知組織部隊，保證按照上級規定的時間，並爭取提前到達指定位置；第三、由師長王勤、師政委張常青、師參謀長劉國義、師後勤部部長劉文儉率領部隊進京，由副師長鄭學斌、師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委員熊楚貴、師政治部主任楊恩章負責留守工作。

一小時後，步兵第 193 師所屬 6 個團的黨委會也分別召開緊急會議，制定部隊開進方案，安排各項工作。

步兵第 193 師緊急收攏部隊的行動隨後展開，該師當時有 36 個連隊正在部隊生產點插秧，另外還有許多連隊正在施工現場和基建工地。

5 月 19 日，第 65 集團軍進京各部隊先後向北京摩托化開進。集團軍指揮部率領通信團等部隊從河北省張家口市出發，步兵第 193 師在師長王勤、師政委張常青、師參謀長劉國義的率領下從河北省宣化市出發，守備第 3 師在師長李鳳合、師政委李文華的率領下從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縣出發，高炮旅在旅長任留計、薛政委、政治部王主任的率領下從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縣出發，坦克旅從河北省張家口市出發。

第 65 集團軍名氣遠不如第 38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動向不太引人注目，部隊進京過程還算平順，一路上沒有遇到民眾強烈阻攔。該集團軍部隊車隊經八達嶺，抵達北京郊區西山一帶集結待命。

守備第 3 師在 5 月 18 日深夜接到緊急進京命令，師指揮部下令所屬各部緊急收攏部隊，趕赴師部所在地河北省萬全縣集結。守備第 9 團大部分建制連隊正在張家口市宣化區洋河執行

生產任務，接到緊急集合命令後連夜趕到河北省宣化市火車站乘坐火車抵達萬全縣郭路莊。5月19日拂曉，國道110線已佈滿行進的軍車，氣氛緊張，包括營級軍官在內的官兵雖然不知道緊急命令內容，但都清楚一定發生了重大事情，感覺到這次任務的重要性、緊迫性。

守備第3師部隊集結後從河北省萬全縣出發，向北京摩托化開進。部隊開進路線沿途已實施戒嚴，各路口全部由軍隊接管，設置了警戒哨兵，地方車輛必須給軍車讓道。部隊車隊越接近北京，氣氛就越緊張，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車輛塞滿了進京道路。

守備第3師部隊車隊經過河北省懷來縣沙城，5月19日後半夜從八達嶺進入了北京地界，從八達嶺居庸關下來的時候，山路上全是一道道閃動的燈光，照亮了整個山谷。從山頭到山腳，擠滿了一輛輛進京的軍車。

5月20日拂曉，守備第3師部隊車隊到達位於北京西山八大處的北京軍區電子對抗團駐地，休整待命。歷經2夜1天的急行軍，官兵們疲憊不堪。

第三節、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行動失敗

1989 年 5 月 20 日是北京實施戒嚴的第一天，當天上午 7 時 50 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第 65 集團軍下達了命令：部隊立即向北京城內開進，目的地是天安門廣場。

當天上午 8 點 30 分，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9 團第 2 營作爲集團軍“先鋒營”，在營長劉閣雲少校的率領下乘車出發，行至石景山發電廠附近，遭到大批群眾和學生的堵截。樓上放鞭炮，樓下呼口號，人山人海，把馬路堵個嚴實。劉閣雲跳出駕駛室，站在汽車踏板上，指揮司機掛低檔、大油門往前推進。闖過兩邊人牆阻攔線，行至首都鋼鐵公司北門外路口，又被幾十個躺在馬路中間的民眾攔阻，劉閣雲命令將躺在馬路上的民眾抬走，汽車加速沖過了人群攔阻。

行至古城路口，用隔離墩、垃圾箱設置的路障又攔住去路。劉閣雲跳下車指揮拆除路障。部隊車隊艱難地行至燕京飯店附近，又遇上由三輛公共汽車和兩輛大卡車所組成的路障，車上車下及四周全是圍堵的人群。後續部隊因一輛軍車出故障被攔阻未能跟上，“先鋒營”與大部隊拉開一點五公里的距離。劉閣雲命令每台車留下五名士兵保護車輛，其餘全部下車徒步衝擊。官兵肩並肩，手挽手，排成方塊隊形，衝鋒槍橫掛，奮力向前推進。劉閣雲站在最前排，一邊指揮部隊，一邊帶頭衝擊。圍堵學生和看到部隊強行往前開進，馬上反衝擊，形成一個多小時的拉鋸戰。

“先鋒營”官兵發動六次衝擊，衝破四道攔阻線，頑強推進 2000 米，其中徒步推進 100 多米，成爲第 65 集團軍開進中遇阻最大，受傷人員最多，深入市區最遠的單位。但全營被更加密集的人群包圍，在此地被圍三天三夜。

當天上午 9 點 10 分，在軍長臧文清、軍政委曹和慶率領第 65 集團軍主力部隊的龐大車隊從北京西山的臨時駐地陸續出發。

守備第 3 師部隊官兵在緊急集合哨中快速集合，登車出發。士兵帶槍但沒有配備子彈。一路上，有不少民眾駐足觀看，有吹口哨的，有鼓掌的。官兵們的心情都很緊張，腦袋亂烘烘的，

不知道北京城內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

部隊車隊快要行至西長安街時，迎面過來一隊扛著北京各個大學旗幟的學生，跟隨著大批市民，攔住了去路。守備第 3 師第 9 團參謀長楊平社連忙下車向官兵們喊話：“聽從命令，不要下車，不要和市民接觸。”轉眼之間，部隊車隊陷入人海之中。有人站到軍車車頭上喊話，呼籲官兵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不要鎮壓學生，人民的軍隊不要將槍口對準人民。軍民一直僵持到下午。上級領導機關命令守備第 3 師部隊就近撤到北京市海澱區圖強小學待命。

步兵第 193 師部隊車隊在北京市石景山區古城路到八角街地帶受阻。這裏也正是該師預定的集結地點，當時是上午 9 點 30 分，比上級命令所規定的時間提前了四個小時抵達。上午 10 點鐘，上級命令該師部隊繼續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此時，步兵第 193 師車隊被數以萬計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層層圍堵，根本無法開進。民眾高呼“別作千古罪人！”“鎮壓學生，不得人心！”等口號，不分男女老少，躺在路上，甚至躺在軍車車輪前。一些民眾把三輛 10 噸大卡車和六輛公共汽車的輪胎放了氣，橫跨街道，組成三道屏障。

其間，有民眾登上軍車演講，被官兵們強行推下車；有民眾要往軍車車廂上張貼標語，被官兵們轟走；有民眾把一張張傳單散發到軍車上，官兵們憤怒地一把撕碎。

軍長臧文清、軍政委曹和慶經過簡短協商，決定留下部分人員看護武器和車輛，其餘官兵下車徒步向前突擊。徒步突擊命令一下，官兵們立即開始行動，兩個多小時後，到了中午 11 點 50 分，才勉強突進了兩公里，前面又面臨一道用數十輛公共汽車、運輸卡車所組成的路障，另有數萬名學生、市民手挽手組成近百米寬的人牆。部隊官兵徒步突擊行動受阻。

無奈之余，軍長臧文清、軍政委曹和慶只好向上級領導機關彙報請示，得到的答復是：部隊暫停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原地待命。

當晚 9 點 30 分左右，臧文清、曹和慶來到步兵第 193 師部隊滯留的八角街地段，多次組織師、團級指揮官研究向天安門廣場強行突進的方案。此後，官兵們採取多種隊形，連續 7 次向前強行突擊，每一次都未能成功。突擊行動一直持續到 5

月 21 日早晨 7 點鐘，但沒有任何進展。

至此，向天安門廣場開進行動以失敗告終。步兵第 193 師撤回北京西山的臨時駐地。守備第 3 師臨時撤到北京市海澱區圖強小學，仍處在民眾的嚴密包圍之中，滯留了一個星期，經與學生代表達成協議，才返回了北京軍區電子對抗團駐地。

休整待命期間，第 65 集團軍部隊每天除了額外增加的軍事訓練之外，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官兵們絕對服從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解放軍總參謀部、解放軍總政治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負責人紛紛來到該集團軍部隊駐地視察、鼓氣。北京軍區文工團特意前來進行一場慰問演出，官兵們見到了知名的歌唱演員馬玉濤、馬國光、耿蓮風等人。

第 65 集團軍部隊的臨時駐地在北京西郊的西山一帶，臨近中央軍委西山指揮部和北京軍區司令部機關大院，這裏雖然遠離天安門廣場，但官兵們仍然時時感覺到緊張的氣氛，臨時駐地上空不斷地有軍用直升機飛來飛去的，次數越來越多，越來越密集。臨時駐地大門外的氣氛也很緊張，每天 24 小時都有學生和民眾監視著部隊的動靜。

第 65 集團軍根據上級領導機關的要求，積極地為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做好準備。作戰部門秘密地偵察了將要開進的路線和執行戒嚴執勤任務的區域，包括天安門廣場周邊地區，彈藥也配發給官兵們。

第四節、經戰備通道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

1989年6月1日晚上，第65集團軍接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所下達的命令：部隊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待命，準備參與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

奉命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的還有第27集團軍、第63集團軍步兵第187師和步兵第188師的兩個團。情況不同的是，第27集團軍、第63集團軍部隊是從地面進入人民大會堂，而第65集團軍部隊則是通過地下通道進入人民大會堂。中國軍方資料聲稱，這些部隊成功地提前進駐人民大會堂，為勝利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邁出了重要一步。

6月1日子夜，北京市石景山區一座院落，步兵第193師指揮部正在進行著執行一項特殊任務的運籌，該師剛接到第65集團軍指揮部下達的命令：“6月2日晚上12點前，以秘密行進、分散潛入的方式，進駐人民大會堂待命。”

令步兵第193師指揮官傷腦筋的是，從接獲命令到完成任務，滿打滿算，只有一天時間，該師進京的四千多名官兵絕大多數不熟悉北京的道路情況，還有武器裝備、糧秣給養如何運進人民大會堂？這些問題必須仔細研究、籌畫，予以解決。

該師指揮部成員通宵未眠，拿出了一個行動方案，基本要點如下：一、人員分組：不能太集中，要三五成群，將全師四千多名官兵分成650個行進小組。每個小組必須由對北京熟悉的人帶路，要有中共黨員，要有骨幹，要有會講標準普通話的，等等。二、行進路線：必須多路多方位，有的乘坐火車，繞道永定門火車站，迂回而進，有的乘坐公共汽車，有的乘坐地鐵。三、師領導的分工：師長王勤先頭進入人民大會堂，負責接應；師政委張常青居中負責，巡迴檢查；師參謀長劉國義斷後收容。四、各種標記的設置：聯絡地設置的方位，聯絡員身上用什麼標記，各團人員用什麼方法區別，等等。

6月2日上午，師長王勤穿便裝驅車上街，親自勘察部隊行進路線和預定集結地點，並對行動範圍內的社情進行調查。

6月2日午飯前，該師指揮部幾名成員又聚到一起，對整個行動方案再次進行認真細緻的推敲，確認萬無一失後，才端起

飯碗。

6月2日中午時分，該師指揮部下達了出發命令，一個小組接一個小組地出了臨時駐地，向預定的集結地點中南海前進。從臨時駐地到中南海，距離80里，其中有一千多名官兵全程步行，近三百人腳上打了血泡，兩百多名官兵途中受到民眾盤查，八十多名官兵遭到民眾圍堵；三十多名官兵迷了路。但由於事先周密的策劃、安排，都被官兵們應付過去或及時得到接應，全部按時到達了預定的集結地點中南海。

有一個小組行進中辨不清方向了，於是，其中一人把手摸向耳朵——出發前各種聯絡暗號規定中表示迷路的一種。立刻，前面一個手腕上劃著個“？”號的人，把胳膊向右伸了伸——右拐。這個小組的幾名士兵心領神會，又疾步前進了。

當天晚上10點鐘，該師四千多名官兵全部到達人民大會堂，武器彈藥和各種裝備物資，也用掛著地方車牌的各種車輛運送到人民大會堂。

步兵第194師、守備第3師、高炮旅、坦克旅的部隊也在當天，以類似方式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守備第3師部隊的行動路線是，先從海澱區臨時駐地乘坐公車到達蘋果園，換乘地鐵到達西臨中南海、南臨天安門廣場的中山公園，從中山公園經中南海東南門進入中南海，再利用地下通道進入人民大會堂。地下通道平常專供中共領導人使用，有雙向車道。

到了6月2日深夜，第65集團軍進京部隊的一萬多名官兵全都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在二樓集結待命，二樓的宴會廳、會議廳，包括走廊在內的所有地方都擠滿了官兵。人滿為患，空氣越來越污濁，溫度也越來越高，官兵們的情緒也變得不穩定，第65集團軍高炮旅還發生了槍走火傷人的事件。

第65集團軍部隊所處的位置面對天安門廣場，能夠直接觀察天安門廣場上動靜，也可以聽到學生廣播的內容，包括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臺灣著名歌星侯德健的演講。在這期間，所謂的“壞消息”也不斷地傳進人民大會堂，在官兵之間流傳，諸如“軍人被暴徒打死”的謠言、運送武器裝備的車輛被扣押和哄搶、人民大會堂混入不法人員。守備第3師第9團士兵陳曉利當時只有16歲，他回憶說：“由於不斷的有命令要

執行，基本上我就沒有睡覺，使我的精神幾近崩潰，終於我在一次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衝鋒槍不見了。後來，上報以後，經過有關部門查找終於找到。由於是在那種混亂的狀態下，所以我也就沒有挨什麼處分，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注釋 1】

6 月 3 日中午，第 27 集團軍的一輛武器彈藥車在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被圍截。上級命令步兵第 193 師、高炮旅從人民大會堂西門出去，火速趕往六部口解救武器彈藥車。

下午 2 點鐘，劉閣雲再次作為集團軍“先鋒營”營長沖在前頭，帶領“先鋒營”從人民大會堂西門沖出，至一百米處，被聚集在大會堂西北側的人群發現，喊著口號象潮水一般包圍過來。當時，後面大部隊還壓在大會堂內，“先鋒營”必須奮力向前，打開通路。他果斷命令強行向前突擊，快進入西長安街東口時，又從六部口湧來很多民眾，全力阻攔。劉閣雲帶領官兵發起一次又一次衝擊，向前推進了三百多米，直到西長安街口。爾後，他又根據當時的情況，指揮全營迅速向兩側展開，擴大區域，保證了隨後跟進的軍、師指揮官和指揮所的安全及正常指揮，吸引了六部口圍困彈藥車的許多民眾。

由於遭到民眾的強力阻攔，包括步兵第 193 師四千多名官兵在內，第 65 集團軍所有的部隊均未能抵達西長安街。其實，解放軍戒嚴指揮部只是借用第 65 集團軍造成佯攻之勢，將六部口圍堵武器彈藥車的人群吸引過來。這個意圖倒是實現了。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武警北京市總隊和北京市公安從中南海乘勢出擊，最終將武器彈藥車解救出來。

直到當天晚上 8 點鐘，步兵第 193 師和高炮旅的官兵才順利撤回人民大會堂。步兵第 193 師自稱有四百多名官兵受傷。高炮旅“尖刀營”營長張同鎖少校說：“部隊的情緒壞透了，一撤進人民大會堂，戰士們就‘炸’了營，用各種方式發洩著滿腹怒氣和一身的屈辱。看見這麼多戰士擠在廁所的水龍頭邊，伸著脖子大口大口地喝著涼水，我心裏甯提多難受了！這夥該死的暴徒，遲早得跟你們算賬！”

“尖刀營”教導員劉寶昌少校率領政工幹部急忙出面做思想政治工作，剛剛穩定了部隊情緒，摘下燙手的鋼盔正在擦汗，營部司務長萬顯林扯扯他的衣袖，悄悄告訴他說：“喇叭裏廣

播了，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明兒可能要清場，要求市民們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劉寶昌其實也憋著一肚子氣，聽了這個消息非常興奮，心想：這一天終於到了！聖潔的天安門廣場被這些人肆意踐踏，莊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被“高自聯”當成了指揮部，不消除這個“毒瘤”，我們就算不上共和國的衛士。他看看手錶，時針指向晚上 8 點 30 分，心頭沖蕩著一股難以名狀的激流，額頭上的青筋暴跳不停。他掏出一盒清涼油，用手狠狠地搥了一大塊，糊在太陽穴上。

軍民衝突激發了軍人的仇恨，這正是軍人開槍殺人的原因之一。

【注釋 1】陳曉利《一個老兵的回憶——真實的 8 9 年北京動亂》。

第五節、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第 65 集團軍是直接參與的部隊之一，該集團軍部隊分成兩個梯隊參與，第 1 梯隊是步兵第 193 師，第 2 梯隊是步兵第 194 師、守備第 3 師、高炮旅、坦克旅、通信團等部隊。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下達了清場命令，要求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做好準備，6 月 4 日凌晨開始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6 月 4 日零點，中國官方架設在人民大會堂房頂的高音喇叭開始一遍又一遍的喊話，要求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撤離。守備第 3 師的武器裝備大部分沒有按計劃運送進來，上級下命令把人民大會堂各樓層臺階上用以卡地毯的銅條拆卸下來，讓沒有槍支的官兵作為武器。各級軍官不停地來回走動，做士兵們的政治思想工作，激勵士兵們的戰鬥意志。

6 月 4 日凌晨時分，第 65 集團軍指揮部召開緊急作戰會議，與會的有集團軍指揮部成員、各師師長、政委、參謀長，各旅旅長、政委、參謀長，各直屬團團長、政委、參謀長，以及集團軍司令部的各教科長。此時，該集團軍的一萬余名官兵已在人民大會堂二樓宴會廳集合，全副武裝，整裝待發。

接近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從天安門城樓一帶傳來了裝甲車隆隆的馬達聲和坦克車的轟鳴聲，這是週邊的第 38 集團軍部隊準備進入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了。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整，天安門廣場所有燈光突然熄滅。就在這時，一聲令下，步兵第 193 師部隊率先出擊，從人民大會堂東大門沖出去。該師作為第 65 集團軍第 1 梯隊，擔負著佔領和清理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的任務，四千多名官兵齊聲呼喊著“好人閃開，懲治壞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口號，從天安門廣場北側和西側，排成 10 列橫隊向天安門廣場中心地帶——紀念碑底座一步步推進。

緊接著，步兵第 194 師、守備第 3 師、高炮旅、坦克旅、通信團等部隊，作為該集團軍第 2 梯隊，也從人民大會堂東大門沖出去，一部分跟隨步兵第 193 師部隊向紀念碑底座一帶推

進，一部分在天安門廣場西側擔任警戒任務，配合清場行動。

守備第3師第9團士兵陳曉利在回憶文章中說：“這時，我們看到從週邊進來的坦克部隊已經從廣場的東北角進入，廣場已經形成一個合圍態勢，只是在東南角留下了一個缺口讓僅剩下的幾百人出入。很快我們走下了（人民大會堂）臺階，和其他部隊會合成一個整體，這時坦克已經將放在廣場上的自由女神像推倒。廣場上的燈也同時亮了起來。我們看到堅持在廣場上的那幾百人開始撤離。天也微微亮了起來。我們看到，不知是那個部隊的奉命站在毛主席紀念堂北門臺階上對空鳴槍，子彈的彈道在天空上形成一道道紅色的亮光。”【注釋1】

陳曉利身為解放軍將領子弟，對所謂“平息反革命暴亂”也持肯定態度，他所提到的開槍情景應該是真實的。從文章中“廣場上的燈也同時亮了起來”這句話，可以斷定開槍的時間是在6月4日凌晨4點30分過後不久，因為天安門廣場重新亮燈的時間是6月4日凌晨4點30分。筆者當時身處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經歷了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的確聽到過一陣陣槍聲。中國官員和官方的公開資料中，始終否認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曾開過槍。

擔任步兵第193師先頭部隊，向紀念碑底座一帶推進的是步兵第579團。該團推進到紀念碑底座東南角時，正遇上從此處撤離的學生人群，於是連同其他兩個團的官兵一起強行向前推進，驅離學生隊伍。然後，砍斷紀念碑底座周圍縱橫交錯的繩索障礙，一路挺進到紀念碑底座前，收繳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廣播器材和大批宣傳品，迅速佔領紀念碑底座周圍地區，設置了警戒線，加強對外控制，不許學生和民眾倒流回來。

6月4日清晨5點20分左右，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迫撤離了天安門廣場，但仍有兩百多名學生滯留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不願離去，站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南端小胡同出口處的一棟四層樓房下，呼叫著“鎮壓學生可恥！”“人民將審判你們！歷史將審判你們！”“法西斯！走狗！當兵的滾回去！……”等口號，步兵第193師官兵持槍上前，強行予以驅趕。

正在這時，砰！砰！砰！從附近一棟樓房突然傳出槍聲，

子彈掠過官兵們的頭頂，顯然是有民眾在打冷槍。只見那棟樓房中間一個視窗噴著一團火，其他幾個視窗噴著白煙。有軍人高聲叫喊：“快趴下，有人放槍！”不少官兵立即就地蹲下，有的官兵躲到裝甲車後，有的官兵緊靠在胡同口北側的房屋下，一下子有點不知所措，慌亂地尋找槍聲從何而來。開始有官兵胡亂開槍，槍聲很快就停止了。緊接著，隨著一聲號令，一個團的兵力迅速包圍了傳出槍聲的那棟樓房，實行了有效控制，幾十名身穿迷彩服的軍人貓腰沖上樓，清查了整棟樓房，然後向指揮官報告說：樓上的暴徒全跑光了。

步兵第 193 師部隊清點人員，發現只有士兵郝連鎖一個人右手背中彈，受了輕傷，當場由田姓軍醫進行包紮。郝連鎖的右手背有兩個彈著點，斷定是中了火槍鐵砂。

這時，天安門廣場東南角幾棟樓房屋頂上出現不少民眾，觀看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官兵們走過去警告說：現在情況很複雜，快躲進屋內去，不要到外面來。其實，他們是不想讓民眾看到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民眾不聽勸告，不肯離去，官兵們當即鳴槍警告，大概僵持了 10 分鐘，民眾才陸續離開了樓頂。

步兵第 193 師士兵郝連鎖在題為《廣場東南角的槍聲》的署名文章中說：“就這樣，清場任務全部結束了。這時候，我看了看表，時針指到了 6 點 1 刻。”【注釋 2】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基本結束後，負責對天安門廣場四周隱蔽部位進行搜索任務的，是步兵第 193 師另外一個“大功團”。該團官兵經過細心搜索，收繳了 2 支衝鋒槍，驅散了零散的堅持不走的“頑固分子”。收繳的 2 支衝鋒槍已被毀壞，表明了學生和民眾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決心。

步兵第 193 師部隊迅速全面展開，把守住天安門廣場的西北、東北、東南三個關口。守備第 3 師部隊負責把守天安門廣場的西南角。

官兵們馬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理，清除垃圾三百多噸，收攏自行車 1500 餘輛，歸整行軍床、板材、帳篷架、食品箱等大宗物品上萬件。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步兵第 193 師部隊擔負起天安門廣場部分區域的戒嚴執勤任務。6 月中旬從天安門廣場撤

離，駐紮在北京市海澱區，除了執行戒嚴執勤任務之外，全師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澱區公安部門追捕“暴徒”和“非法組織”成員，共同抓獲了 131 名“暴徒”。

【注釋 1】陳曉利文章

【注釋 2】見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 230 頁至第 231 頁。

第六節、清理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以後，第 65 集團軍高炮旅承擔清理紀念碑底座的任務。紀念碑底座是數千名學生最後堅守的地點，也是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所在地。高炮旅指定“尖刀營”執行清理任務，該營營長是張同鎖少校，教導員是劉寶昌少校。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張同鎖、劉寶昌一起來到了第 65 集團軍前進指揮部接受任務，然後返回人民大會堂二樓宴會廳，集合全營官兵下達行動命令，進行政治思想動員。部隊集合完畢，劉寶昌大步踏在兩隻擡起的彈藥箱上，右臂向空中一劈，激情地大聲說道：“同志們，黨和人民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上級命令我們尖刀營，擔負清場警戒和清理‘高自聯’指揮部的光榮任務，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不能畏懼，不能退縮，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共和國，誓死保衛人民利益。同志們，能不能完成任務？”“能！”一陣排山倒海似的回應。“有沒有決心？”“有！！！”

劉寶昌的動員令頗具煽動性，“尖刀營”第 3 連中士文書王文傑中士表示：“聽著教導員那聲如洪鐘的動員令，我激動得渾身顫抖，握槍的雙手汗漬漬的。”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尖刀營”官兵從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出去，凌晨 4 點 40 分，抵達紀念碑底座北側，設置了警戒線。張同鎖、劉寶昌挨個檢查警戒哨，只見高炮旅參謀長迎面走來，左手拿著一部對講機，右手緊握一根錚亮的銅條。張同鎖、劉寶昌立即迎上前去，旅參謀長向他們下達了命令：馬上執行清理“高自聯”指揮部的任務。就在此時，高炮旅旅長任留計、高炮旅司令部作訓科科長等人也來了。

張同鎖隨同旅長任留計等人繞著紀念碑底座勘察現場，上上下下轉了兩圈。張同鎖一邊仔細察看，一邊在心裏計畫著清理方案。他粗略估算，現場的“垃圾”至少有 10 來噸，紀念碑底座四周橫躺豎臥著數不清的自行車，特別是紀念碑底座和漢白玉欄杆上糊滿了標語。

勘察現場回來，張同鎖向該營的三位連長下達了行動命令：“第 1 連清理南邊，第 2 連從東北方向，第 3 連從西北方

向同時清理！……”第1連連長遼銀乙中尉、第2連連長欒新華上尉、第3連連長吳明禮中尉馬上分頭帶領隊伍執行清理任務。

清理工作在緊張地進行之中。

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西北交叉角地帶的一堆物品中，第1連文書曹甫建中士發現了兩支56式衝鋒槍，木制槍托都已經被摔碎，有一支槍被分解了，零件丟了一地，只剩下完整的槍管和槍架，另一支槍的彈夾被砸扁了。曹甫建大聲喊叫：“連長，這裏有槍！”連長遼銀乙一個箭步躍過去，望著殘缺不全的槍支琢磨：把這些東西留下來，將來搞個展覽，多好呀。可轉念一想，放在哪兒好呢？難道值勤站崗還得背著一包破爛嗎？想到這裏，不由得“嘿嘿”笑出聲來，一回頭，看見幾個士兵望著他樂，便繃起臉說道：“還愣著幹什麼？統統給我推下去！”

這個事實說明，堅守在紀念碑底座的數千名學生一直到最後一刻，仍然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主動將民眾交來的兩支槍予以毀壞。北京師範大學青年教師、文學博士劉曉波是毀壞這兩支衝鋒槍的當事人之一，當時他正與臺灣著名歌星侯德健等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6月4日凌晨3點鐘左右，劉曉波將槍支在紀念碑底座的欄杆上砸毀了，幾名中外記者見證了砸槍的過程，一名外國記者用攝像機記錄了整個砸槍過程。筆者當時也全程在場。

教導員劉寶昌上了紀念碑底座最高層，一轉身，碰到一塊牌子，上面寫有黑色大字：“機密重地，出入示證。”他招呼幾個士兵過來，把搭建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欄杆夾角處的帳篷用勁掀了下去，帳篷布所帶起的白紙象雪片一樣飄揚。帳篷內是一摞摞的新聞紙、筆記本，還有打字機和油印機；行軍床上放著擴音設備，幾支麥克風扔在地上；一台發電機的排氣口還散發著熱氣，上面插著一塊寫著“民主之聲廣播站”字樣的牌子，已被發電機的廢氣熏成焦黃色。劉寶昌自稱心頭沖起一股無名火，大喝一聲：“砸了它！”幾個士兵聞聲撲上前去，“乒乒乓乓”一陣亂響，“民主之聲廣播站”頃刻間就被徹底搗毀了。

紀念碑底座第2層東北側是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後勤部所在地，緊靠紀念碑底座護欄的地方堆放了大量食物，象

一個超級食品公司，其中有十幾尼龍袋白糖、奶粉，每個袋子足有百八十斤。有的士兵把衝鋒槍一背，挽起袖子就要動手清理，連長欒新華連忙喝止：“別用手抓，小心病毒，給我用棍子撥拉！”稀裏嘩啦一陣亂響，全部食物都被當成垃圾清理了。

在一張印著“香港支援”字樣的苫布下，第3連排長文永豪中尉發現了很多成包的避孕套，士兵們覺得稀奇，發出陣陣驚訝的“嘖嘖”聲。文永豪悄悄將避孕套指給連長吳明禮看，告訴他說：“前幾天學生們弄來了許多風箏和避孕套，說是吹起來可以對付軍用直升機空降，簡直是國際奇聞。”官兵們一把火將避孕套點著，濃密的黑煙裹著嗆人的氣味躡上天空。

學生們試圖將避孕套當作氣球使用，以防止軍用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降落。這的確反映了學生的天真和幼稚，同時也反映了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學生在面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時的無奈。中國官方事後卻利用這些避孕套，在公開抹黑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從事淫亂活動。

第1連文書曹甫建中士負責清理紀念碑底座欄杆上的傳單和標語，所以特別注意那些有字的地方，在紀念碑底座西南角扔著一管大提筆，蹣了一腳，擠出漆黑的一團墨汁。他注意到，紀念碑底座轉角處寫著一溜腦袋大小的楷體字，後面跟著三個驚嘆號，墨水直往下淌，他用腳使勁蹣了蹣，居然墨蹟未乾。

曹甫建沒有提到學生們具體寫了些什麼，中國官方的宣傳資料對此也避而不談。學生們寫下的都是類似於“絕筆”的大幅標語：“6月4日凌晨3時，軍人向老百姓開槍！”“6月4日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國人民為民主與自由而流血犧牲！”等等。學生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間是在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鐘左右。筆者當時親眼目睹一群學生拿著墨水瓶和大型毛筆，神情凝重悲憤。

第七節、第 65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22 名官兵）

軍長臧文清少將

軍政委曹和慶少將

軍政治部主任田書根少將

軍政治部組織處處長劉福連

軍黨委秘書秦生祥

軍政治部幹事崔維上尉

步兵第 193 師師長王勤大校

步兵第 193 師政委張常青大校

步兵第 193 師參謀長劉國義上校

步兵第 193 師後勤部部長劉文儉

步兵第 193 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董銀明中校

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9 團（大功團）團長曹栓澤上校

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9 團政委王永存上校

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9 團第 2 營營長劉閣雲少校（河北省豐南縣宣莊鄉王家盤村人，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9 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陳正友

步兵第 193 師團政委張新傳

步兵第 193 師某團司令部軍務股股長喬治國

步兵第 193 師某團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張學東

步兵第 193 師志願兵（專業軍士）汪延彪

步兵第 193 師士兵陳剛

步兵第 193 師士兵王建

步兵第 193 師士兵郝連鎖

步兵第 193 師田軍醫

高炮旅旅長任留計上校

高炮旅薛政委

高炮旅政治部王主任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營長張同鎖少校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教導員劉寶昌少校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排長劉向倫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營部司務長萬顯林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第 3 連中士文書王文傑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第 3 連連長吳明禮中尉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第 2 連連長欒新華上尉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第 3 連排長文永豪中尉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第 1 連中士文書曹甫建
高射炮兵旅尖刀營第 1 連連長遼銀乙中尉

集團軍通信團專業軍士新聞報導員余波

排長郭國文
郭德華(軍銜不明)
何文亭(軍銜不明)
傅俊(軍銜不明)

守備第 3 師師長李鳳合大校
守備第 3 師政委李文華大校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團長張鴻兵上校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政委金秉章上校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參謀長楊平社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第 4 連連長田秉政(轉業到河北省張家口市工商局)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第 4 連班長曹發年(湖北省鄂州市人, 退伍後在湖北省鄂州市武裝部工作)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第 4 連士兵陳曉利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9 團第 4 連士兵蓋立民(山東省青州市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連長王會義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指導員田森(事後升任代理教導員)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排長趙軍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班長範文建（事後立功受獎，直接提升為軍官）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士兵趙勝利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排長張佩海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士兵王小民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班長魯懷勳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士兵郭振祥（山東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士兵邵小山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文書王小明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第 8 連通信員侯吉才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劉團長

守備第 3 師管理科協理員周永英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0 團 2 炮連指導員秦泗佳（山東人）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0 團 2 炮連班長柳立清（河北省晉縣人，立二等功）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0 團 2 炮連士兵陳劍

守備第 3 師士兵王曉剛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0 團 2 炮連指導員秦泗佳（山東人）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0 團 2 炮連班長柳立清（河北省晉縣人。立二等功。）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0 團 2 炮連士兵陳劍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0 團炮兵營第 3 連第 1 排排長王振強（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人。歷任守備第 10 團政治處組織股副連職幹事、炮兵營第 3 連指導員、北京軍區守備第 4 旅政治部宣傳科正連職幹事、步兵第 193 師坦克團政治處組織股正連職幹事、第 65 集團軍教導大隊政治處正連職幹事、副營職幹事、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武裝部政工科副營職幹事、張家口軍分區政治部副營職幹事、正營職幹事、張家口市橋東區武裝部副部長、張家口軍分區政治部宣傳保衛科科長、張家口市沽源縣武裝部政委。2007 年 12 月以來任張家口市衛生局副局長。）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1 團團長朱光法

守備第 3 師守備第 11 團政委王海珍

步兵第 193 師司令部參謀劉文亮（山西省應縣人）

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7 團副參謀長和運兵（歷任步兵第 577 團參謀長、副團長、步兵第 578 團團長、步兵第 193 師副參謀長。2006 年 10 月以來任河北省張家口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正處級偵察員。）

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578 團團長鄒俊喜上校（天津市人。1993 年 11 月轉業，歷任天津市大港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招待所所長、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政府辦公室主任。2002 年 12 月以來任中共天津市大港區委員會常委、副區長。）

步兵第 193 師炮兵團政治處組織股股長高振山（歷任步兵第 193 師炮兵團 152 加榴炮營教導員、第 65 集團軍政治部幹部處正營職幹事、副處長、處長、河北省張家口市民政局副局長。）

步兵第 193 師炮兵團 122 榴炮營二連指導員朱志國（山西省大同市人。歷任步兵第 193 師炮兵團司令部協理員、步兵第 193 師司令部協理員、第 65 集團軍司令部副團職管理員、山西省軍區人武學院副院長、山西省繁峙縣武裝部政委、懷安縣武裝部政委。）

步兵第 193 師炮兵團第 4 營第 1 連第 1 班班長段光華（內蒙人）

步兵第 194 師政治部秘書科科長郝月生（山西省繁峙縣人。後來任第 38 集團軍後勤部生產處正團職助理員。1994 年 3 月轉業，歷任中共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區委副書記、書記、區長。2004 年 4 月以來任大同市副市長。）

步兵第 194 師警衛連士兵史清俊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正連職參謀石占軍（歷任步兵第 580 團副營職股長、步兵第 581 團營長、副參謀長、步兵第 194 師裝備部戰技科科長。1999 年 9 月轉業，歷任河北省張家口市紀委監察局檢查員、監察一室副主任、監察二室副主任。2007 年 7 月以來任張家口市水務局紀檢組長。）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炮兵營榴炮 3 連士兵羅建波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0 團第 3 營副教導員申永亨（歷任步兵第 194 師後勤部軍需科正營職生產助理員、師農場生產處處長、步兵 580 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河北省高邑縣武裝部政委、

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武裝部政委。2001 年 8 月以來任河北省邯鄲市糧食局副局長、黨委委員。)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政治部主任肖林（廣東省湛江市生人。1995 年轉業，歷任河北財達證券公司辦公室主任、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監事會主席。2005 年 12 月以來任河北財達證券經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股長陳建華（山西省臨猗縣人。歷任步兵第 194 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步兵第 582 團政委、步兵第 194 旅政治部主任。2002 年 3 月以來任中共山西省孟縣縣委常委、武裝部政委。)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第 2 營二機炮連連長李建勳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士兵張九軍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連長邵西安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指導員鄭力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副連長劉茂彬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士兵張希周（1991 年退伍，歷任河南省義馬市計生委幹部、法規科科長。2008 年 5 月以來任中共義馬市計生站支部書記。)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第 2 營第 6 連士兵許愛華（現在河北省石家莊市。)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第 1 營 1 機炮連連長武雲靈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第 1 營 1 機炮連指導員殷志軍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第 1 營第 3 連文書馬金標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第 1 營教導 4 連排長孫啓波（歷任步兵第 581 團第 1 連指導員、團後勤處協理員、第 2 營教導員、步兵第 194 旅第 1 營教導員。2000 年轉業，現任職內蒙古自治區紮賚特旗檢察院。)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第 1 連連長郭建輝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1 團第 1 連副連長鄭秀明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衛生隊衛生員宋躍傑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衛生隊衛生員趙景聯（河北省唐山市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衛生隊衛生員孔憲安（山東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衛生隊衛生員張學山（湖北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衛生隊衛生員何惠霞（河北省張家口市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衛生隊衛生員姚文紅（山西省臨汾市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衛生隊衛生員焦麗君（山西省大同市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衛生隊衛生員尤東（河南省鄭州市人）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特務連連長劉昧成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第 2 營第 5 連指導員鄧樂成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 2 機炮連連長晉樹林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 2 機炮連指導員童西友

步兵第 194 師步兵第 582 團第 2 營營長李先華

步兵第 194 師炮兵團第 3 連連長康成明

步兵第 194 師炮兵團反坦克連士兵樊玉兵（山東省鄆城縣人）

步兵第 194 師炮兵團排長鄒強（歷任步兵第 194 師炮兵團後勤處軍需助理、戰勤參謀。1996 年 9 月以後歷任四川省樂山市五通橋區楊柳鎮國土員、農業辦公室副主任、鎮黨委副書記、武裝部部長。2005 年 9 月以來任五通橋區糧食局副局長。）

步兵第 194 師炮兵團指揮連測地排士兵倪錫元（江蘇省寶應縣人）

集團軍司令部炮兵指揮部主任方文平

第 65 集團軍炮兵旅排長胡同光（河南省濮陽市人。現在是著名的維權退轉軍人。）

集團軍修理營士兵冀光明

第 65 集團軍 75 分隊防化洗消連士兵陳明升

第 65 集團軍後勤部機要科副營職助理員宇清光（歷任第 65 集團軍後勤部財務處正營職助理員、副團職助理員、審計處處長、財務處處長。2001 年 9 月以來任河北省張家口市審計局副局長。）

第十章、陸軍第 24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24 集團軍概況

第 24 集團軍是第一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也是深受掌握軍權的楊尚昆、楊百冰兄弟信任的一支部隊。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出身於第 24 集團軍，抗美援朝時期曾任該軍步兵第 72 師參謀長。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第 24 集團軍是最晚撤離北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該軍軍長周玉書升任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24 集團軍隸屬於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河北省承德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2831”。周玉書少將任軍長，尹文聲少將任軍政委，吳雙戰大校任副軍長，徐自強少將任軍副政委，張發大校任軍參謀長，李晉有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楊存仁大校任軍後勤部部長。

第 24 集團軍屬於乙類簡編集團軍，其前身是國共內戰時期的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 6 縱隊，由華中野戰軍第 6 縱隊、華中野戰軍第 6 師發展而來。

1938 年春，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北上長征後留在湘鄂贛、湘贛邊、粵贛邊、皖浙贛、湘南等地的紅軍遊擊隊，共 2300 多人，改編組成新四軍第 1 支隊，陳毅任司令員，下轄第 1 團、第 2 團。1945 年 11 月，改編為華中野戰軍第 6 縱隊，王必成任司令員，江渭清任政委，段煥競任副司令員，陳鐵君任參謀長，劉文學任政治部主任，下轄 5 個團，共有 11000 多名官兵。

1946 年 5 月，華中野戰軍第 6 縱隊與蘇中軍區獨立旅合編，組成華中野戰軍第 6 師，譚震林任師長兼政委，下轄第 16 旅、第 18 旅，共有 14000 多名官兵。7 月至 8 月，參加蘇中戰役。10 月，參加漣水保衛戰。12 月，參加第 2 次漣水保衛戰。1947 年 1 月上旬魯南戰役期間，在蘇北方向擔負阻援任務。

1947 年 2 月上旬，華中野戰軍第 6 師改編為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 6 縱隊，王必成任司令員，江渭清任政委，皮定鈞任副司令員，陳時夫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 16 旅、第 17 旅、第 18 旅依次改稱第 16 師、第 17 師、第 18 師，共有 35000 多

名官兵。2月，參加萊蕪戰役。4月，在泰蒙戰役中擔任阻援。5月上旬，挺進魯南作戰。5月中旬，回師北上參加孟良崗戰役，會同友鄰部隊搶佔垛莊，切斷國民黨軍隊整編第74師退路。7月，參加南麻、臨朐戰役。8月，進入魯西南作戰。9月初，南渡黃河，參加沙土集戰役。9月底，與友鄰部隊一起越過隴海路，進軍豫皖蘇邊區。1948年6月，參加豫東戰役，圍殲國民黨軍隊區壽年兵團。9月，參加濟南戰役，在魯南準備阻援。同年冬，參加淮海戰役，圍殲國民黨軍隊黃百韜兵團。

1949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華東野戰軍第6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4軍，隸屬於第3野戰軍第8兵團建制。王必成任軍長，廖海光任軍政委，皮定鈞任副軍長，趙俊任軍參謀長，藍榮玉任軍政治部主任。第16師改稱第70師，第17師改稱第71師，第18師改稱第72師。全軍共有36000多名官兵。

1949年4月，第24軍參加渡江戰役，在安徽境內姚溝至北埂段渡過長江，佔領順安、銅陵、大通等地。6月，第70師北上配合友鄰部隊攻佔了青島，第72師配合友鄰部隊攻佔了長山列島。第71師南下淮北，進剿大別山地區土匪。

1952年9月，第24軍改歸第9兵團指揮，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其時由皮定均任軍長兼軍政委，後由張震接任代軍長兼軍政委。

1955年10月，第24軍撤離朝鮮回國，隸屬於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河北省唐山市，部隊分佈在北京郊區至河北省唐山市一線，擔任拱衛首都北京的任務。

1966年6月15日，第70師改編為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第24軍北移至河北省承德市駐防。

1985年7月，第24軍改編為陸軍第24集團軍，下轄步兵第70師（當時部隊代號“52824”）、步兵第72師（當時部隊代號“52829”），共計兩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旅（當時部隊代號“51401”）、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403”）、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404”）、工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405”）、通信團（當時部隊代號“51406”）、偵察營、防化營、裝甲修理營、汽車營等部隊，並代管北京軍區守備第5

旅（當時部隊代號“51408”）、北京軍區守備第7旅（當時部隊代號“51330”）。

1986年9月至1987年12月，由第24集團軍、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所組成的第11偵察大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執行偵察作戰任務。第11偵察大隊共有838名官兵，其中，第1連有141名官兵（步兵第70師偵察連）；第2連有141名官兵（步兵第72師偵察連）；第3連有141名官兵（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偵察連）；第4連有141名官兵（天津警備區步兵第196師偵察連）；火力連有135名官兵（步兵第208團炮兵連）。

1996年，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調歸第24集團軍建制。1998年，步兵第72師與唐山預備役師合併，組成河北省預備役第72高射炮兵師。坦克第1師改編為裝甲師。同時，天津警備區摩托化步兵第196旅轉歸第24集團軍建制。2003年，第24集團軍撤銷建制。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24 集團軍進京部隊包括步兵第 70 師、步兵 72 師、守備第 7 旅，以及集團軍通信團、工兵團的部分部隊，由軍長周玉書、軍政委尹文聲指揮率領進京。

步兵第 70 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承德市豐寧縣，下轄步兵第 208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34”）、步兵第 209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20”）、步兵第 210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19”）、坦克團、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2823”）、高射炮兵團，以及工兵營、汽車營、通信連、偵察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 70 師屬於甲種摩托化步兵師，是第 24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所屬各團分別駐紮在鳳山、土城子、南關、懷柔、八道河、南辛營等地。

步兵第 72 師師部駐地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縣，下轄步兵第 214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25”）、步兵第 215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33”）、步兵第 216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30”）、炮兵團，以及工兵營、高炮營、通信連、偵察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 72 師屬於乙種步兵師，所屬各團分別駐紮在水泉、高寺台、張三營、韓麻營等地區。

守備第 7 旅旅部駐地在河北省承德市圍場縣，該旅由守備第 7 師於 1985 年縮編而成，下轄守備第 1 營、守備第 2 營、守備第 3 營、守備第 4 營和炮兵營。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守備第 7 旅表現突出，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三等功。1989 年 8 月，第 24 集團軍軍長周玉書在總結該集團軍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以來的工作情況時高度評價守備第 7 旅：“這個旅在這次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中執行命令堅決，部隊鬥志旺盛，完成任務出色，稱得起是我們集團軍的一個拳頭。”

集團軍工兵團駐地在河北省沙城縣，下轄道路橋樑營、建築炮兵營、74 式舟橋營。

集團軍通信團駐地在河北省承德市。

1989 年 5 月 19 日，第 24 集團軍接到北京軍區命令：部隊立即進京執行戒嚴任務。集團軍黨委會當即召開緊急會議，研

究方案，落實任務。緊急會議決定：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72 師、守備第 7 旅，以及集團軍通信團、工兵團的部分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守備第 7 旅作為第 1 梯隊，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72 師作為第 2 梯隊；由軍長周玉書、軍政委尹文聲組成集團軍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部隊。

5 月 19 日中午前，部隊開進的預先號令已經下達到團一級部隊，各部隊展開如火如荼的準備工作。

5 月 19 日下午 2 點 24 分，駐守在燕山深處的守備第 7 旅召開旅黨委緊急會議。旅長李守成以極其嚴肅的聲調宣佈了第 24 集團軍司令部發來的特急電報：令你部出動 6 百名官兵，于 5 月 20 日下午 1 點鐘前做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各項準備。

5 月 20 日下午 1 點鐘整，隨著旅長李守成“立即出發”的一聲令下，38 輛軍車載著該旅進京部隊的 620 官兵，沿著蜿蜒的山路向北京摩托化開進。李守成和旅政委安明乘坐指揮車行進在車隊的前列。車隊在北京市通縣受阻，無法進入北京市區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只好就地休整待命。

5 月 19 日晚上 7 點鐘前，步兵第 70 師、步兵 72 師、集團軍通信團、工兵團，分別接到了來自於第 24 集團軍司令部的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命令迅速向下轉達。

5 月 19 日晚上 7 點 20 分，塞外小鎮鳳山鎮（屬於河北省承德市豐寧縣）。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在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司令部值班室響起，部隊緊急進京命令來了。步兵第 208 團是聞名整個第 24 集團軍的“土匪團”。

晚上 7 點 30 分，步兵第 208 團黨委的五名常委全部聚集在團黨委會議室召開緊急會議，一個又一個行動方案產生、否決；又產生，又否決。最後，團政委常躍上校拍板決定，按第 1 號方案行動。第 3 營被選擇為尖刀營，作為該團向北京開進的第 1 梯隊，第 2 營、炮兵營作為第 2 梯隊，第 1 營作為第 3 梯隊。團長賈炳正、團政委常躍和團參謀長姚偉旋指揮率領進京部隊，團政治處主任沙樹禮負責留守分隊的工作。

在此後的三個小時內，團參謀長姚偉旋召集各級軍事主官對行動預案進行了詳細的部署；團政治處主任沙樹禮向全體政工幹部下達了政治工作指示；團後勤處處長李新忠組織後勤人

員做好了一切後勤保障工作。各營黨委做出部隊開進部署，保障隊、突擊隊、救護隊、收容隊相繼成立。

5月20日午飯後，步兵第208團進京部隊的兩千余名官兵在團部辦公樓前列隊集合完畢，逐一登上軍車。當天中午12點鐘整，團長賈炳正下達了出發號令，滿載著官兵的軍車，依照步兵第3營、步兵第2營、炮兵營、步兵第1營的序列，一輛緊接一輛駛出了營房大門。

第24集團軍進京部隊的預定集結地是北京市順義縣（現為北京市順義區），從5月21日清晨開始，該集團軍進京部隊陸續抵達預定的集結地。其中，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8團按照上級的指示，於5月21日上午8點鐘到達北京市順義縣牛欄山鎮駐紮待命，歷時11天，然後又按照上級的部署，於5月31日轉移到了北京市通縣集結待命。

第三節、提前進駐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

1989年6月2日，第24集團軍指揮部接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命令：部隊立即向北京城內開進，進駐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集結待命，準備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東邊，緊臨天安門廣場。其南門面臨正義路，門牌號是正義路7號，北門面臨東長安街。

當天，第24集團軍指揮部即將開進命令傳達下去，所屬各部隊立即開始行動。步兵第70師、步兵第72師和守備第7旅部隊，於當天深夜11點鐘乘車從北京市順義縣、通縣駐地出發，抵達北京近郊半壁店（屬於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辦事處），然後徒步向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開進。由於開進行動過早被民眾發現，受到了層層阻攔，整個開進過程並不順利。

步兵第72師部隊的開進情況：

6月2日下午，北京市順義縣臨時營房的一頂軍用帳篷裏，步兵第72師黨委會正召集15名團級以上軍官開會，研究、策劃如何完成進駐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的任務。軍用帳篷內溫度高達攝氏40度以上，黨委會持續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研究了幾乎所有的相關問題。

會議接近尾聲時，師參謀長賴豫福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打頭陣的活誰幹？”出乎意料，在座的各團團長、政委竟然沒有人予以回應。部隊這一次進駐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一是不能隨身攜帶武器，二是連鋼盔也不能戴。從半壁店到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要在北京城內徒步行軍17公里，而時間只限兩個小時。難度很大。5月中旬奉命進京途中，橫躺豎臥的人體路障，官兵們已經領教過了。在座的這些團級指揮官此前都曾化裝進入北京城偵察，對北京城內大街小巷中激情的人流，主要路口上的道道路障，至今歷歷在目。要想當“尖刀”打頭陣，為進城部隊破障開路，難度更大。

此刻，步兵第72師政委張鼎文大校佈滿血絲的雙眼緊緊盯住步兵第214團團長董澤平。董澤平像是意識到了什麼，立刻站起來說：“我帶9連上。”就這樣，步兵第214團第3營第9連被確定為該師的開路先鋒。第9連聞名於步兵第72師，也聞名於第24集團軍。在第9連的連隊榮譽室裏，保存著該連在各

個時期所獲得的幾十面錦旗和幾十張獎狀。由於這一次擔任開路先鋒，事後連隊的榮譽室裏又增加了一面錦旗，中央軍委授予該連“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

6月2日夜晚，步兵第72師部隊乘車出發，深夜12點前幾分鐘，車隊悄然抵達北京近郊半壁店，全體官兵下車集合。6月3日零點零分，官兵們開始向北京城徒步急行軍，隊伍中不時傳來短促的口令：“注意距離”、“保持隊形”、“跟上”。

部隊徒步開進快一個小時了，迎面就是廣渠門立交橋（位於北京市崇文門區），終於進入北京城內了，早就憋足了勁的官兵們十分興奮，紛紛相互搗鼓幾拳，但誰也沒敢大聲喧嘩，生怕驚動了睡夢中的市民，再次遭到阻攔。

作為開路先鋒的第9連剛剛下了廣渠門立交橋，一輛看不清車牌號的高級轎車從前面駛來，在隊伍旁邊兜了個圈子，然後揚長而去。走在隊伍最前面的第9連連長王連傑頓時警覺起來，正準備向上級報告情況，師參謀長賴豫福的指揮車已停在他身旁，命令也同時下達：“王連傑，加快速度，跑步前進！”

隊伍跑出不到一公里，前方路上由遠而近，傳來一陣摩托車的轟鳴聲，眨眼工夫，幾十輛摩托車飛馳而至，一邊在隊伍面前駛來駛去，一邊大聲叫喊著：“大兵進城了，市民們，快起床！”這些騎摩托車的年青人大都是個體戶，為了阻止軍隊進城，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自動自發地組織起來，承擔通風報信的任務，自稱“飛虎隊”。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他們大都被作為“暴徒”處理，判處重刑。

隨著喊叫聲，街道兩旁陸續出現了民眾，一開始，人群還比較稀疏。民眾高聲叫喊：“反對部隊進城！”“不許鎮壓學生！”第9連按既定方案由四路縱隊變為八路縱隊，由馬路一側拐上了路中央，佔據了整個路面，跑步前進。行進速度明顯加快了，官兵們個個汗流浹背，氣喘吁吁。

隊伍跑到了崇文門，街道兩旁的人群越來越密集。突然，有近百名民眾騎著自行車佔據整個路面，對著隊伍迎面而來。第9連官兵沒有減速，強力沖了過去。民眾紛紛跳下自行車，將自行車橫七豎八地拋在路面上。連長王連傑振臂一揮，帶領突擊隊越過自行車障礙，將人群驅散，負責排除路障的排長李景啓指揮士兵們把自行車一一拋到路邊。後續部隊蜂擁而上，

衝破了民眾的阻攔。

到了北京市東城區正義路南口，隨同第 9 連行動的團長董澤平下達了命令：“停止前進，等一等後面的部隊。”這時，前方喊聲如雷，黑壓壓一片人群猶如決堤的洪水，向第 9 連官兵這邊卷過來。原來，民眾以為這支部隊是要進入天安門廣場，所以準備在前門東大街（屬於北京市崇文區）的路口予以阻攔。如今看見部隊停留在正義路南口，便尾隨過來。

人群越湧越近，第 9 連是馬上進入近在咫尺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還是繼續在原地等待接應後續部隊，團長董澤平一時拿不定主意，一邊緊張地思索著，一邊用步話機呼叫師部指揮車。突如其來的情况，師政委張鼎文、師參謀長賴豫福看得清清楚楚，師部指揮車飛駛而至，兩人邊下車邊命令：“董澤平在路口指揮後續部隊拐上正義路，進公安部東門，不走南門了。王連傑帶 9 連向前佯動，把人群拖到前門東大街上，決不能讓大部隊被截斷。”

王連傑帶領第 9 連官兵迎著呼嘯而來的人群而去，硬是向前突進了二百多米。一群青年發現了已拐進正義路的後續部隊，一邊揮舞著一面旗幟呼喊：“大兵向北跑了，快堵住他們！”一邊帶領民眾向正義路南口跑去。眼看後續部隊進入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的道路就要被截斷，王連傑轉而帶領第 9 連官兵搶先趕回正義路南口，在路口西側手挽手拉起了一道人牆，擋住了蜂擁而至的民眾。後續部隊從他們的身後迅速通過，大約 3 分半鐘，全部進入了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6 月 3 日凌晨 1 點 45 分，從前鋒變後衛的第 9 連撤進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

守備第 7 旅部隊的開進情况：

守備第 7 旅進京部隊的 620 官兵乘軍車抵達北京近郊半壁店，然後徒步向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開進。6 月 3 日凌晨 1 點鐘，部隊在崇文門大街受阻。作為第 24 集團軍的左路先鋒，一路上已經四次受阻了，這一次受阻的情況最為嚴重。崇文門大街屬於北京老城區，居民人口十分密集，距離天安門廣場又近，圍堵的人數更多，圍堵的行動也更積極。

面對部隊受阻的情况，守備第 7 旅指揮官們臨時商量決定：“還是拿出我們的看家本領來吧。”調整部署，靠雄壯的軍威闖過眼前的險灘。他們清楚自己的部隊官兵，這些年來每年至

少要組織一次全旅性的閱兵，歌詠比賽更是集會、放映電影必搞的項目，不少連隊要在出早操前拔 5 分鐘的嗓子，關鍵的時刻拿得出，叫得響。

全旅迅速變換了隊形，由原來的四路縱隊變為八路縱隊，通過傳遞口令的方式下達了行進口號。620 名官兵臂挽臂，高呼著“排除萬難，保衛首都”的口號，以強大的氣勢突進，終於提前到達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620 名官兵無一人掉隊，38 輛軍車沒有損壞一輛，武器裝備、物資器材沒有丟失一件。

其實，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之前，北京民眾的圍堵行動非常有節制，主要是用身體組成人牆阻擋，輔之以拉扯，儘管民眾在人數上占絕大優勢，但由於體力和組織性都遠不如部隊官兵，因此，一般情況下很難阻擋部隊官兵的強行突擊。

步兵第 70 師的開進情況：

步兵第 70 師部隊乘車從北京市通縣駐地出發，抵達北京近郊半壁店，徒步向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開進。一路上多次遭遇民眾阻攔，距離中國公安部越近，阻攔的人群越密集，開進到東長安街上的北京飯店東側時，已經很難再往前推進一步。數以萬計的民眾將該師的兩千多名官兵圍困在大街中心。

處在包圍圈中的該師步兵第 208 團的 700 多名官兵，遭遇一批又一批湧上來試圖分割隊伍的民眾。前面其他團部隊在人群的強烈衝擊下潰退下來。步兵第 208 團事實上成了前衛，700 多名官兵多次排列成四路縱隊強行突擊，都沒有成功。隊伍幾次被分割成幾股，旋即又銜接在一起了。爲了避免無謂傷亡，該團團長賈炳正、政委常躍、參謀長姚偉旋不斷指揮部隊快速調整、變換隊形。官兵們一個拉著一個，避免遭民眾分割。

步兵第 208 團官兵堅不後退，將一些群眾激怒了，開始有汽水瓶向隊伍砸來。賈炳正和常躍感到再這樣持續下去，只會造成官兵的傷亡，於是決定兵分三路分頭衝擊突圍。賈炳正帶領一路從左翼突擊，尖刀營（第 3 營）營長彭元春帶領一路從右翼突擊，常躍帶領一路從正面突擊。

左、中、右三路突擊部隊先後被民眾頂了回來，強大的包圍圈越縮越緊，民眾想把步兵第 208 團隊伍擠垮，逼迫他們後撤。官兵們經過 8 華里的徒步急行軍，又與民眾僵持了一個多

小時，似乎再也無法抵擋不斷衝擊的人流，處在隊伍前列的士兵大口大口直喘粗氣，20 多個體弱的士兵有點支援不住。賈炳正和常躍覺得不能再僵持下去了，又做出新的決定，組織突擊隊從後側突圍，這樣可以造成後撤的假像，然後再迂回到達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

團長賈炳正下達了命令：“不分建制，3 營長迅速組成臨時突擊隊從後側突圍。”後撤當然比前沖容易，民眾圍堵的目的很單純，就是希望部隊不要到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不但不阻止部隊後撤，還會以鼓掌等方式表示歡迎。不少部隊就是利用這一點，騙過圍堵的民眾，迂回抵達目的地。

6 月 3 日凌晨，團長賈炳正、政委常躍、參謀長姚偉旋及 20 多名官兵首先進入了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立即開設了臨時指揮部，經簡短商量後做了分工：常躍留守，穩定軍心，賈炳正和姚偉旋換上便裝上街尋找、收攏失散的官兵。

東長安街和附近的街道上，到處是被民眾沖散的第 24 集團軍部隊官兵，僅步兵第 208 團官兵就散落在 30 多個地方，多的地方有 1 百多人，少的地方只有 1 人。該團第 3 營官兵在隊伍被沖散的情況下，先後救護了 1 名副軍長、1 名副師長，保護了 8 部軍用電臺。

經過了 19 個小時，到了 6 月 3 日下午 6 點鐘，步兵第 208 團已有 400 多名官兵到達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展開之前，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內已經集聚了大量的部隊官兵。中國軍方的記載聲稱：“進駐公安部院內數萬名戒嚴部隊，吃住十分困難。”【注釋 1】

【注釋 1】參見《魂系京都——記榮立集體一等功的某團》一文，作者：周斌、興利，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605 頁至 615 頁。

第四節、突入天安門廣場參加清場行動

1989年6月3日下午，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向第24集團軍指揮部下達了命令：“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已經做出了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進而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其實，當時的北京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就連暴力行為都極為罕見。中共當局顯然是以所謂的反革命暴亂，為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製造理由。

根據命令，第24集團軍部隊的任務是在天安門廣場東側擔任警戒，配合其他部隊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該集團軍指揮部迅速召開緊急作戰會議，師級以上軍官全部與會。各師、旅隨後也召開緊急作戰會議，傳達命令，落實任務。當天晚飯過後不久，命令已傳達到連一級，並逐級進行政治思想動員。

守備第7旅的相關記錄聲稱：各級動員會尚未結束，官兵們的激情已到了沸點。“鬥爭的性質變了。我們將要執行的是捍衛共和國的神聖戰鬥”，人人心裏似乎都在重複著這句話，人人都在為此做著各項準備。遺囑留下了，雖然多數是口頭的，但卻表明了大家鬥爭到底的決心；血書送到了指揮所，雖然只有“衝鋒在前”四個字和八位同志的姓名，但卻表明了尖刀連裏八名共產黨員以血肉之軀開闢通路的決心。全旅上下激蕩著一種情緒，一個聲音：為捍衛共和國獻身，在所不辭！

同樣的，步兵第72師官兵也都非常興奮，早就急於出去“懲治暴徒”，既可以洩憤，又可以建功立業，何樂而不為。步兵第214團第3營第9連的士兵們亟不可待，團團圍住連長王連傑發問：“連長，什麼時候發槍？”王連傑回答說：“全師只有25支衝鋒槍，師裏統一使用，不發給我們。”有士兵失望地說：“沒槍怎麼幹？”王連傑回答說：“師裏已經派人尋找木棍了。”有士兵小聲嘀咕：“棍子能行嗎？”王連傑瞪起了雙眼，大聲地說：“張政委（師政委張鼎文）、賴參謀長（師參謀長賴預福）、董團長（董澤平）提著棍子跟我們一塊上。”

聽完連長王連傑這一番話，第9連第1排的一名士兵說：“要知道是這陣勢，說啥也得帶著槍，跟他們拼了。”第1排排長李景啓不知為何顯得很煩躁，訓斥說：“都給我閉嘴！你

們不要亂議論，現在有些人對戒嚴不理解，再說，群眾和一小撮壞蛋混在一塊，你能一梭子掃過去？頭腦簡單。”

按照第 24 集團軍指揮部的部署，該集團軍部隊兵分兩路，向天安門廣場突進。一路是步兵第 70 師和守備第 7 旅，從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南門沖出去，突入天安門廣場；一路是步兵第 72 師，從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西北門沖出去，突入天安門廣場。

6 月 4 日凌晨 1 點鐘整，步兵第 70 師和守備第 7 旅部隊官兵或手持槍械，或手持棍棒，從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南門沖出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東南角突入天安門廣場，隨後集結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分佈在寬敞的各級臺階上，與天安門廣場僅隔著一條道路。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30 分，步兵第 72 師部隊開始行動，負責開門的官兵揮動鐵鍬、十字鎬，迅速扒開已封閉多年、緊臨東長安街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西北門。先鋒連第 9 連的官兵一馬當先，沖上東長安街，迅速在大街南側組成人牆。後續部隊源源不斷地湧出，在第 9 連官兵組成的人牆後快速通過，直插中國歷史博物館北門，穿過中國歷史博物館，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與步兵第 70 師、守備第 7 旅部隊會合。

這時，大批群眾向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西北門湧來，試圖阻擋官兵沖出來。第 9 連官兵緊握木棒，嚴陣以待。人潮越逼越近，只見步兵第 72 師指揮官一聲令下，十幾支衝鋒槍一齊發射，一道道火舌撕破夜空，發出駭人的呼嘯。人潮慌亂地四散，但仍有十幾個學生和青年人不顧生死地沖上來，他們已經被發生在西長安街等地的軍人開槍屠殺行為所激怒，一邊悲憤地拍著胸脯叫喊“有種的朝這兒打”，一邊繼續向前沖，一批民眾緊隨其後，高喊抗議口號。又是一陣槍響，這一次官兵們是沖著帶頭的學生和青年人射擊，不少人中槍倒下，跟隨的人群再次四散而逃。步兵第 72 師部隊終於全部沖出了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進入了中國歷史博物館。

隨後，第 24 集團軍部隊封閉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防止集聚在東長安街上的民眾經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步兵第 208 團等部隊分佈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東門前，設立了警戒線，積極配合其他的部隊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

守備第 7 旅等部隊分佈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開始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一帶參加了清場行動，驅逐並監護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醫務人員撤離，參加搜索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建築物和封閉天安門廣場。

第五節、驅趕救死扶傷的志願醫務人員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眾多的北京醫務人員秉持救死扶傷的職業道德，冒著生命危險，自動自發地前往屠殺地點搶救中彈受傷者，北京人民醫院婦產科實習女醫生王衛萍為此犧牲了生命，年僅 26 歲。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至 6 月 4 日清晨，一直有眾多的志願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搶救受傷者。起初，急救車在運送受傷者的同時連帶著將遇難者的遺體一起拉走，後來因為受傷者實在太多，便決定凡是證實死亡的遇難者，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車。因此，在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前、天安門廣場北端國旗杆一帶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前面，都有醫務人員無法帶走的遇難者遺體。一位志願醫務人員說，中國官方聲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只能欺騙當時不在場的中國老百姓和外國人。

6 月 4 日凌晨，解放軍戒嚴部隊陸續到達，嚴密封鎖了天安門廣場，將急救車攔住，不許志願醫務人員將受傷者運送出去搶救。當時的現場氣氛十分緊張，志願醫務人員反復向軍人宣傳、交涉，作為紅十字會組織的成員，有責任搶救任何身份的受傷者。而軍人堅持說受傷者都是暴徒，不能帶走，有的軍人甚至企圖向插著紅十字旗幟的急救車開槍。情勢極其緊張，眼看就要發生新的血案，幸虧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隨軍女醫生及時跑步趕來，厲聲制止住軍人，她高喊：“不能向紅十字會人員開槍！就是紅十字會人員在戰場上搶救敵方受傷者，也不能開槍！你們可以檢查救護車，只要裏面是受傷者，你們就應當放他們過去。”這才解除了志願醫務人員和受傷者的危險。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天安門廣場全部燈光突然熄滅，陷入一片黑暗，恐怖氣氛籠罩了整個廣場。四周數萬名解放軍蠢蠢欲動，伴隨者大量的坦克、裝甲車，武力清場行動在即。就在這種情勢下，依然有一大批志願醫務人員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急救站，搶救受傷的學生。

志願醫務人員們知道在西長安街上打得非常慘烈，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肆無忌憚地開槍，民眾死傷慘重，大家已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北京市紅十字會志願急救隊儘量把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志願醫務人員召集在一起，準備在最後的時刻發揮

作用，盡可能的救護受傷者。志願急救隊的一位負責人把侯德健、周舵等人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的情況告訴了在場的志願醫務人員，說學生隊伍很可能會撤離天安門廣場，讓大家自願選擇是跟著學生隊伍一起撤離，還是繼續冒著生命危險留下來搶救受傷者。

將近百名志願醫務人員自願選擇留下來，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打起了紅十字會的會旗，儘量穿上白大褂，戴上紅十字袖標，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天安門廣場臨時急救站還留有一些受傷者，也將跟隨志願醫務人員一起走。志願醫務人員提出的口號是：“人在受傷者在，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及救治受傷者。”

這些醫務人員主要來自於北京醫學院（現為北京大學醫學院）、協和醫院和北京市紅十字會，一是因為自從 1989 年 5 月 13 日北京各高校學生髮起絕食請願行動，北京醫學院、協和醫院和北京市紅十字會就在天安門廣場設立了臨時醫療站，一直沒有撤離。當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之後，這些醫務人員違抗上級指令，仍然堅持不撤離。

凌晨 4 點 30 分過後，這一批志願醫務人員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嚴密監控，失去了行動自由，不僅無法進入天安門廣場和紀念碑底座一帶搶救受傷的學生，而且不允許將已經收容的受傷者轉往醫院搶救。

此時，一批又一批端槍或揮舞棍棒的官兵湧進天安門廣場，加緊了對堅守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學生隊伍的強制驅離。有幾個不知因為什麼原因掉隊的學生在大批官兵的夾擊下無路可退，突然轉身向志願醫務人員集聚地點跑來。志願醫務人員爲了保護先前收容的受傷者，手挽著手形成了一個保護圈，這幾名無路可退的學生躲入了保護圈。

眼看幾個學生躲入志願醫務人員的保護圈，一些打紅了眼的士兵揮舞棍棒，兇狠地向志願醫務人員撲來。志願醫務人員一見情勢不好，大叫我們是紅十字會成員，應當受到國際慣例的保護，同時把手挽得更緊，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士兵。

看到志願醫務人員身穿的白大褂和紅十字會旗幟，追打學生的士兵們極不情願地停住了腳步，但堅持說那些躲進志願醫務人員保護圈的人是學生領袖，是鬧事的暴徒，必須將他們交

出來。而志願醫務人員們則堅決地表示，凡是進入了我們保護圈的人員，就受到我們的保護。我們絕不會交出任何人。

就這樣，志願醫務人員與士兵形成對峙，陷入了僵局。一些士兵早已打紅了眼，眼中充滿怒氣和殺機。只要上級一聲令下，他們手中的大棒就會毫不猶豫地向志願醫務人員揮去。

這些追打學生、並企圖對志願醫務人員動粗的士兵，從他們手持木棍，以及所處位置的情況判斷，隸屬於第 24 集團軍步兵第 72 師，是從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沖出來的。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基本結束，才有一名軍官過來處理這批志願醫務人員。這名軍官一開始提出來的條件是：醫務人員可以離開，但要把躲進保護圈的學生和所收容的受傷者留下來，理由是這些學生和受傷者都是暴徒。

志願醫務人員萬萬不會答應這個條件，他們表達了明確而堅定的立場：要抓，就把我們一起抓起來；要放，我們將帶著學生和受傷者一起走。同時正告這位軍官，我們是醫務工作者，屬於紅十字會人員，應當受到國際慣例的保護，希望慎重考慮如果對我們處理不當將會面臨的嚴重後果。

志願醫務人員向這位軍官提出了一個要求：你們的清場行動已經結束，我們紅十字會應該派人到天安門廣場各處巡查，看看有無需要救治的受傷者。

看樣子，怎樣處理這些志願醫務人員，對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來說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幾經商討，最後才不得不同意讓志願醫務人員帶著學生和受傷者集體撤離，但拒絕了志願醫務人員巡查天安門廣場的要求。解放軍戒嚴部隊當然不會讓志願醫務人員看到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結果。

這時已是清晨 7 點鐘左右，天已大亮。在撤離的過程中，爲了防止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不守承諾，乘機來搶奪受傷者和學生，志願醫務人員手挽著手形成了兩道人牆，讓抬著傷員的人和學生走在人牆中間，大家一起慢慢的沿著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的人行道往南撤離天安門廣場。

在志願醫務人員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整個過程中，持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一直在旁押解著，盡一切可能阻斷志願醫務人員觀察天安門廣場的視線。

當這些志願醫務人員走出天安門廣場，來到前門大街，集

聚在街道兩邊的市民和學生熱烈鼓掌歡迎，稱讚他們的英勇行爲。志願醫務人員們深受感動，其中許多人再也控制不住情緒而失聲痛哭。

第六節、天安門廣場清場後的動向

1989年6月4日清晨，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之後，第24集團軍部隊奉命駐紮在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負責在天安門廣場南側前門大街和前門東大街等地設置警戒線，執行戒嚴執勤任務。

一個星期以後，隨著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進行新的軍事部署，第24集團軍部隊才奉命陸續撤離天安門廣場區域，調防到北京其他地區，除了繼續執行戒嚴執勤任務之外，主要任務就是配合北京市公安機關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

以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8團為例，在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度過了7天7夜以後，先是奉命調防到北京展覽館（北京西城區西直門外大街135號），後來又奉命調防到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配合海澱區公安分局及屬下各公安派出所抓獲“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256名，繳獲一批槍支彈藥。該團的戒嚴執勤哨位多次被北京軍區評為紅旗哨位，解放軍總參謀部曾在該團召開部隊管理工作現場會。

6月6日凌晨，中共北京市委一名幹部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報告了一個“十萬火急”的情況：“在王府井大街（位於北京市東城區）附近某家公司大院裏，230餘名被圍困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正在遭受暴徒攻擊。”上級機關將組織營救這批官兵的任務交給了守備第7旅。該旅40名官兵組成精幹突擊隊，乘著夜色出發，一路上躲冷槍、避磚石，直撲營救地點，迅速佔領了有利地形，驅散人群，救出了被圍困的230余名部隊官兵。

據守備第7旅有關資料記載，從6月11日到7月底，該旅部隊9次下南長河（屬於北京市海澱區），31次出奇兵，收繳輕重武器3支、子彈48發，抓捕“暴徒”79名。

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在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過程中，普遍存在濫用暴力的情況，對被捕者不分青紅皂白用槍托、木棒予以毒打，導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傷殘。在海澱區公安分局，也就是第24集團軍部隊進駐的

機構，有 18 名被捕的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的學生被視為“暴徒”，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的毒打，渾身傷痕累累。這些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身強力壯，學生運動期間大多作為學生領袖的“貼身保鏢”。

在所有的進京解放軍戒嚴部隊中，第 24 集團軍是最晚撤離北京的一支部隊。1990 年 1 月 10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命令，從 1 月 11 日起解除對北京市部分地區的戒嚴。北京結束戒嚴狀態，第 24 集團軍部隊繼續留守北京，直到 1990 年 10 月 7 日在北京召開的第 11 屆亞洲運動會結束，才奉命撤離北京，返回原部隊駐地。

1990 年 1 月 10 日，正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開會的第 24 集團軍軍長周玉書接到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張工的電話：“中央辦公廳通知，明天 14 時中央領導同志找你談話，12 時到總政治部報到。”周玉書連夜冒著大雪趕到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天按時趕到北京。1 月 12 日下午，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代表中央找新任武警總部領導班子成員談話，宣佈中央的決定，任命周玉書和徐壽增分別擔任武警部隊司令員、政委。

周玉書在兩年的司令員任內，為武警部隊建設和今後工作開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此前，武警部隊組建之初，公安部賦予的任務是以執勤為中心，主要是“站崗放哨鳴警開道”。周玉書到武警工作後，提出要以執勤和處置突發事件為中心，原擔負執勤的任務不變，但要有“處理突發事件”的準備，新組建的武警機動部隊必須以“處理突發事件”為中心做好各項準備。這一想法雖然受到一些人的堅決反對，最終還是於 1992 年 9 月得到肯定，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明確了武警部隊的中心任務是“執勤處突”。同時主持擬訂了武警部隊的新編制，加強了軍事訓練，有效的提高了武警部隊的軍事素質和戰鬥能力。

這些都反映出第 24 集團軍深受中共當局和當時把持軍權的楊尚昆、楊白冰兄弟之信賴。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調動正規軍，使用包括坦克、裝甲車在內的武器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引起海內外廣泛的震驚和抗議。中共當局接受“教訓”，事後迅速擴展武裝警察部隊，逐漸讓武裝警察承擔起鎮壓群體事件的任務，大量解放軍部隊成建制地改編為武裝

警察部隊，武裝警察部隊人數多達 150 萬，並有 14 個由解放軍野戰師改編的武警機動師。

第七節、第 24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21 名官兵）

軍長周玉書少將

軍政委尹文聲少將

副軍長吳雙戰大校

軍副政委徐自強少將

軍參謀長張發大校軍參謀長（？）

軍政治部主任李晉有大校

軍後勤部部長楊存仁大校

守備第 7 旅旅長李守成

守備第 7 旅政委安明

守備第 7 旅副旅長溫樹凱

守備第 7 旅參謀長杜保立

守備第 7 旅政治部副主任傅存華

守備第 7 旅第 8 連連長翟福友（河南人）

守備第 7 旅指導員呂勇

守備第 7 旅臨時偵察隊隊長和建中

守備第 7 旅排長陳丙福少尉（河北省故城縣人）

守備第 7 旅專業軍士李化民（河北省任邱縣人）

守備第 7 旅班長鄭成果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團長賈炳正上校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政委常躍上校（四川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參謀長姚偉旋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後勤處處長李新忠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衛生隊隊長王丙午中校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後勤處軍需股股長王和平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3 營營長彭元春少校（山東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3 營第 9 連連長張寶生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 3 機連班長苗永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5 連士兵郝其玉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士兵劉兵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10 團第 1 營第 1 連第 3 排排長王景生（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病亡。）

步兵第 70 師士兵何玉

步兵第 70 師士兵劉小偉

步兵第 70 師上等兵關沖

步兵第 70 師上士班長劉文革

步兵第 70 師連長胡少軍

步兵第 70 師士兵于斌

步兵第 70 師士兵善軍

步兵第 72 師政委張鼎文大校

步兵第 72 師參謀長賴豫福

步兵第 72 師司令部作戰訓練科參謀任秋良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4 團團長董澤平上校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4 團第 3 營第 9 連連長王連傑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4 團第 3 營第 9 連排長李景啓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4 團第 3 營第 9 連第 4 班班長馬基洲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4 團第 3 營第 9 連軍械員兼文書程立新（內蒙古人，1989 年 7 月 25 日溺水死亡）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4 團第 3 營第 9 連士兵李占海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4 團第 3 營第 9 連士兵韓世新

步兵第 70 師指導員慕宏彪（河北省豐寧縣人。歷任步兵第 70 師副營職參謀、副團長、第 24 集團軍司令部炮兵指揮部副團職參謀、步兵第 70 師炮兵指揮部主任、團長。2003 年 9 月以來任河北省承德市水務局副局長。）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2 營連長黃德龍（天津市武清區河西務人。歷任步兵第 70 師教導隊中隊長、副隊長、教導員、步兵第 208 團副政委。2001 年 9 月起任天津市武清區文化局副處級調研員，2003 年 9 月以後任武清區文化局副局長。）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排長唐春輝(歷任步兵第 208 團連長、副營長等職。1998 年至 2007 年 7 月任安平鎮武裝部部長、副鎮長。2007 年 7 月以後任中共安平鎮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9 連指導員徐建平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9 連班長李真彪(東北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2 營第 4 連班長朱軍強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3 營機槍連連長劉天曾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2 營士兵聶榮亮(山西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第 2 營士兵聶榮亮(山西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連長申主學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8 團士兵盧金平(湖北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政委海朝友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連長王勝利(河北省武邑縣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士兵陳聯國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工兵連士兵范小強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工兵連士兵冉鵬祥(山東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工兵連士兵李桂花(河北省灤平縣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工兵連士兵許建強(北京市昌平縣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工兵連士兵余建(山西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工兵連士兵侯軍(山西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通信連連長李長利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第 2 營第 6 連連長唐廣順(山東省惠民縣人。歷任步兵第 209 團第 2 營營長、步兵第 208 團副團長。2000 年轉業到河北省承德市城市管理局工作。)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士兵陳聯國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炮兵營榴炮 2 連連長王勝利(河北省武邑縣人)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軍務股幹事趙建新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工兵連士兵范小強(有可能是步兵第 70 師坦克團)

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209 團工兵連士兵李桂花(河北省灤平縣人)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9團工兵連士兵許建強（北京市昌平人）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9團工兵連士兵冉鵬祥（山東人）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9團工兵連士兵侯軍（山西人）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9團工兵連士兵余建（山西人）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團長段維明（1993年）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第3營3機連副連長馬丙圖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第3營3機連副指導員宋江校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60分隊王耕雪（北京市崇文區人）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連長張友勝（天津市人。轉業後歷任天津市武清縣鄉鎮企業局幹部、中共天津市武清區委研究室科長。）
步兵第210團副連長李興林（江蘇省如皋縣人。歷任步兵第210團指導員、宣傳幹事、第24集團軍司機訓練大隊組織幹部股股長、教導員、政治處副主任、主任。2005年1月以來任天津市武清區文化局副處級調研員。）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司令部通信員吳敏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第3營第8連連長苗大水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第3營第8連指導員王華春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第3營3機連班長汪振（安徽省金寨縣人）
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第2營2炮連士兵陳習平（安徽省六安市人）
步兵第70師師醫院衛生員郭西平

步兵第70師炮兵團第8連士兵陳翔宇（安徽省阜陽市人）
步兵第70師汽車營連長孟雨（遼寧人）
步兵第70師汽車營士兵丁修軍（山東省滕州市人）
步兵第70師汽車營士兵賀偉（河北人）

步兵第72師政治部主任任之通（江蘇灌雲人。歷任步兵第72師政委、第24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第63集團軍政委、天津警備區

政委。1997年7月晉升為少將軍銜。）

步兵第 72 師通信營無線連指導員周國權

步兵第 72 師通信營指導員劉鳳有（後來任通信營營長）

步兵第72師通信連指導員翟廣平（河北人）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4 團排長裴成獻（歷任步兵第 214 團連長、副營長。1999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任河南省濮陽縣郵電局車隊隊長，2005 年 6 月以來任濮陽縣郵電局副局長。）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5 團副團長史季平（1994 年 8 月以後任江蘇省溧陽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5 團士兵孔祥學（1991 年退伍，歷任河北省磁縣城鄉建設環境保護局辦事員、股長。2000 年 4 月以來任磁縣建設局任黨委副書記、紀檢書記。）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6 團軍務股參謀尹玉鄧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6 團士兵趙振兵（山東省淄博市人。1994 年任通信連連長，1999 年轉業回山東省淄博市。）

步兵第 72 師步兵第 216 團班長孔令國（北京市房山縣人）

步兵第72師步兵第216團通信連士兵趙振兵（山東省淄博市人）

步兵第72師步兵第216團通信連班長孔令國（北京市房山縣人）

守備第7旅小車班駕駛員秦玉春（安徽省肖縣人，副旅長司機）

守備第7旅報務隊隊長張東泉

守備第7旅小車班駕駛員周雙林

集團軍炮兵旅第1營第3連士兵張國利

集團軍炮兵旅特務連代理排長李貴春（河北省承德市人）

集團軍炮兵旅衛生隊田靜（河北省承德市人）

集團軍炮兵旅衛生隊汪和華（河北省承德市人）

集團軍炮兵旅衛生隊鞠曉晗（河北省承德市人）

集團軍炮兵旅衛生隊劉峰（山西人）

集團軍通信團第 6 連排長王建甫

集團軍偵察連士兵石學軍

集團軍工兵團第 3 營第 9 連士兵張國林（河北省巨鹿縣人）

集團軍工兵團修理連志願兵張慶軍（河南省泌陽縣人）
集團軍防化營士兵張達

第十一章、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概況

坦克第 1 師和隸屬於第 38 集團軍的坦克第 6 師，是解放軍戒嚴部隊中僅有的兩支坦克部隊，但是，該師在六四血腥事件中的所作所爲一向不被人們重視。製造了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慘案的坦克車隊，就屬於坦克第 1 師。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坦克第 1 師隸屬於天津警備區，師部駐地在天津市薊縣，徐慶仁大校任師長，吳忠明大校任師政委。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2871”。下轄坦克第 1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72”）、坦克第 2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73”）、坦克第 3 團（當時部隊代號“52874”）、裝甲步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286”）、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2895”）、偵察營（當時部隊代號“52873”）、高射炮兵營、通信營、工兵營、修理營等部隊。

天津警備區是軍級建制單位，隸屬於北京軍區。當時由鄭國忠少將任司令員，蘭保景少將任政委，楊志華少將和謝昭義少將任副司令員，陳德毅少將和吳永昌少將任副政委，謝昭義少將任參謀長，張珍大校任政治部主任。天津警備區主力部隊除了坦克第 1 師，還有步兵第 196 師（當時部隊代號“52854”）。

坦克第 1 師是最早組建的解放軍裝甲部隊，其前身是 1945 年 12 月 1 日成立的東北人民自治軍坦克大隊。

1945 年 11 月，東北人民自治軍司令部人員高克外出偵察時發現原瀋陽日軍坦克修理廠裏有坦克，幾天後帶人把兩輛已修好的坦克開走了，後來被國民黨特務破壞了一輛。東北延安炮兵學校校長朱瑞得知情況，指令將僅剩的一輛坦克開到了瀋陽市郊區馬家灣子，解放軍從此有了第一輛坦克。這輛坦克型號老，多處有損傷，常出故障，人們稱之爲“老頭坦克”。

1945 年 12 月 1 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正式組建東北延安炮兵學校坦克大隊，共有 30 多人、坦克一輛。這就是解放軍最早的坦克部隊。

該坦克大隊逐步壯大，很快便參加了東甯和綏陽剿匪、夜戰靠山屯、強攻望河鋪等戰鬥。1947 年 10 月，坦克大隊在安東

擴編為戰車團，孫三任團長，毛鵬雲任政委，下轄 3 個戰車連。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朱瑞批准從各部隊抽調 500 多名有文化的青年骨幹，把三個戰車連擴編為三個戰車營，成為名實相符的戰車團。1948 年 4 月、五月，新組建了三個戰車連、兩個汽車連、兩個戰車營營部和汽車營營部。戰車團進駐瀋陽後，接受了國民黨軍隊的一個裝甲團、戰車第 3 團第 1 營的兩個連及汽車排，共計 1040 人、坦克 21 輛、裝甲車 103 輛、汽車 20 輛。另外，又從步兵部隊和大連汽車學校調來 1280 人。

1948 年 9 月，戰車團由團長丁鐵石、團參謀長李自群率領，參加了遼沈戰役的錦州包圍戰。10 月 14 日解放軍攻佔錦州後，戰車團調頭東去，參加了 11 月 2 日發動的瀋陽戰役，與友鄰部隊緊密配合作戰，前後接收了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坦克營、一個裝甲兵團和 100 多輛汽車。攻佔瀋陽後，解放軍東北軍區成立了特種兵司令部，戰車團擴編為戰車指揮所，下轄坦克團、裝甲車團和教導團，丁鐵石任坦克團團長，毛鵬雲任政委。

遼沈戰役結束後，坦克團跟隨解放軍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1948 年 12 月，丁鐵石和毛鵬雲率領一個坦克營、一個裝甲車營和汽車連、修理連參加攻打天津。1949 年 2 月，坦克團在天津擴編為戰車第 1 師，曾克林任師長，楊永松任政委，趙傑任副師長，孫三任師參謀長。

1949 年 2 月 3 日，坦克團團長丁鐵石率領坦克裝甲部隊參加了北平入城式。3 月 25 日，丁鐵石又率領坦克裝甲部隊在西苑機場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機關由西柏坡遷到北平，接受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檢閱。

1949 年 3 月 14 日，戰車第 1 師在北平接收了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坦克、裝甲車、汽車和技術人員。此時，戰車第 1 師共有 5500 名官兵、坦克 120 輛、裝甲車 143 輛、汽車 370 輛。

1949 年 7 月，戰車第 1 師第 5 團奔赴西北作戰，從天津出發，連續 83 天行軍作戰，占玉門，越祁連，過戈壁，進迪化（今烏魯木齊市），行程 4 千多公里，創造了解放軍裝甲兵歷史上最遠距離的征戰。第 1 野戰軍第 1 兵團司令員王震在慶功大會上授予該團“開路先鋒”錦旗一面，並給全體官兵記一大功。

1949 年 10 月 1 日，戰車第 1 師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

大典閱兵儀式，由戰車第 1 師的 83 輛坦克和華北軍區戰車第 7 團的 20 輛坦克組成坦克方隊，戰鬥英雄董來扶駕駛“老頭坦克”作為首車，率領坦克方隊從天安門城樓前通過，接受檢閱。從那時起，這一支坦克部隊總共 11 次參加了國慶閱兵儀式。

1950 年 8 月 31 日，根據中央軍委電令，戰車第 1 師在天津整編為坦克第 1 旅，下轄兩個戰車團、一個摩托化步兵團、一個炮兵團。原戰車團改稱戰車第 1 團；華北軍區戰車第 7 團調入該旅，改稱戰車第 2 團；河北省軍區警備第 1 團團部大部及四個連、步兵第 66 師第 196 團第 2 營調入該旅，改編為摩托化步兵團；炮兵團暫缺。原師屬教導團、裝甲團調出。

1950 年 9 月 1 日，中央軍委決定組建裝甲兵司令部，由許光達出任司令員。從此，裝甲兵作為一個獨立的兵種出現在解放軍的序列中。

1950 年 11 月，按照新頒發的解放軍坦克師編制表，坦克第 1 旅經過整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第 1 師，下轄坦克第 1 團、坦克第 2 團和摩托化步兵團。

1951 年 3 月 10 日，坦克第 1 師工兵營出國參加抗美援朝戰爭。4 月 11 日至 5 月 2 日，坦克第 1 團、高射炮兵營、運輸營第 3 連、通信連入朝參戰。5 月 7 日至 6 月 1 日，摩托化步兵團第 1 營、坦克團分別入朝參戰，坦克第 1 師部隊於 1952 年 7 月 15 日至 11 月 24 日陸續回國休整，然後於 1953 年 1 月 22 日第 2 次入朝參戰。1951 年 11 月，坦克第 1 師炮兵團入朝參戰，配屬第 50 軍擔負西海岸鐵山半島防禦任務，1952 年 10 月 4 日回國。從 1951 年 3 月至 1953 年 10 月，坦克第 1 師部隊先後參加了著名的馬良山、沐浴洞伏擊等 690 餘次戰鬥。

1979 年 2 月，坦克第 1 師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自行火箭炮營配屬第 42 軍步兵第 124 師向越南高平市穿插。

長期以來，解放軍裝甲兵的甲種坦克師只有三個，北京軍區坦克第 1 師、濟南軍區坦克第 2 師、瀋陽軍區坦克第 3 師。這三個甲種坦克師一直是解放軍裝甲兵建設的重點，其中坦克第 1 師的歷史最久，作戰次數最多，軍官素質最強，武器裝備最好，成為重中之重。最新、最好的兵器和器材均優先裝備坦克第 1 師，從而形成了一個慣例：坦克第 1 師換裝下來的武器

設備配給坦克第 2 師和坦克第 3 師，坦克第 2 師和坦克第 3 師換裝下來的武器設備再配給其他的坦克部隊；而坦克第 1 師的軍官則源源不斷地到其他的坦克部隊任職。

1982 年 9 月 16 日，中央軍委決定將五個大軍區屬下的裝甲兵縮編為軍區司令部裝甲兵部，各坦克師劃歸陸軍建制。北京軍區坦克第 6 師劃歸第 38 軍代管，由原來的乙種坦克師變為機械化集團軍所屬的試點坦克師，從而優先獲得最新、最好的裝備，待遇甚至超過了坦克第 1 師。

坦克第 1 師擔負三大主要任務：第一，作為中央軍委戰略預備隊；第二，抗擊敵軍在渤海灣登陸；第三，防範敵軍空降。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1989年5月20日，在中國國務院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第2天，坦克第1師接到了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此前，坦克第1師已經接到部隊進京的預先號令，早已做好出動的所有準備。

坦克第1師部隊幾乎是傾巢而出，進京部隊包括坦克第1團、坦克第2團、坦克第3團、裝甲步兵團，以及偵察營、通信營、工兵營、修理營等部分保障部隊。

坦克第3團一名軍人回憶當年的親身經歷時說：“89年的那一次，我師3個坦克團近300台坦克悉數出動，沿東長安街一線展開佈防。3團駐守天安門廣場，我隨所部10台坦克連續3個晚上出動掩護38軍的100輛汽車到通縣機場搶運物資，親眼看見1團、2團的坦克和我團的一樣，全是清一色的59-2（坦克型號）。這也是我服役期間唯一的有機會看齊了整師的坦克。”

當時坦克第1師的編制是，每一個坦克排編有3輛坦克，沒有編制排長車；每一個坦克連編有10輛坦克，包括連部的1輛坦克；每一個坦克營編有31輛坦克，包括屬於營部的1輛坦克；每一個坦克團編有93輛坦克，團部沒有編制坦克，但有1輛裝甲指揮車；整個坦克師編有290輛坦克，包括師部直屬偵察營的裝甲偵察連所擁有的11輛坦克。

坦克第1團、坦克第2團、坦克第3團和裝甲步兵團的駐地都在天津市薊縣，坦克第1團駐地在薊縣別山鎮，坦克第2團駐地在薊縣邦均鎮，高射炮兵營駐地在薊縣翠屏山鎮。

1989年5月20日下午，坦克第1師的坦克、裝甲車隊，在以師長徐慶仁、師政委吳忠明為首組成的師指揮部率領下，沿著京津公路（北京市---天津市）向北京快速開進。坦克、裝甲車隊的聲勢十分驚人，所到之處，塵土飛揚，地動山搖，一路上沒有遇到什麼阻攔。

當天傍晚時分，坦克第1師的坦克、裝甲車隊行駛到緊鄰北京市東郊的河北省三河縣（現為三河市）燕郊鎮。燕郊鎮位於潮白河畔，隔河與北京市通縣相望，距離天安門廣場30公

里。在這裏，坦克第 1 師的坦克、裝甲車隊受到大批學生和群眾的攔阻，最後奉命退至河北省三河縣李旗莊集結待命。

在所謂的休整待命階段，坦克第 1 師指揮部和所屬各團指揮機構紛紛研究制訂開進方案，各級指揮官和參謀人員奉命身穿便裝，進入北京市區實地勘察進軍路線，瞭解交通情況和沿途社情。

坦克第 1 師全體官兵都被封閉在臨時營房內，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反復學習討論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的有關講話，認清北京“動亂”的實質，要求人人表明政治態度，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制止“動亂”的命令。

1989 年 6 月 1 日，上級領導機關向坦克第 1 師下達了部隊開進的預先號令，要求坦克第 1 師對所有的車輛進行保養。這預示著解放軍戒嚴部隊即將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坦克第 1 師按照上級領導機關的命令，要求所屬各部做好部隊開進的所有準備工作，一旦接到部隊開進的命令，保證隨時可以出發執行任務。

第三節、坦克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1989年6月3日下午4點鐘，坦克第1師指揮部接到上級領導機關下達的緊急命令：部隊立即向北京城內開進，執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任務。目的地是天安門廣場，具體任務是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6月3日下午5點鐘左右，坦克第1師部隊的第1梯隊——裝甲步兵團，乘坐數10輛坦克、裝甲車，在以師閻參謀長為首的師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下，從河北省三河縣李旗莊出發，由東往西向北京市迅猛開進。

當天下午6點鐘左右，第1梯隊到達預定集結地點——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第13團位於北京市通縣楊閘的駐地營房。此刻，駐地營房空蕩蕩的，第13團官兵已于5月27日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只留下副團長鄧健康和少量官兵負責留守任務。第1梯隊在楊閘營房簡短休整，對車輛進行了重新編組。裝甲步兵團特務連李樹存駕駛的013號裝甲車和與他同一個連的011號裝甲車、012號裝甲車被指定組成先頭分隊，負責觀察開進道路，以及在關鍵時候破除障礙。

6月3日晚上10點鐘左右，第1梯隊接到迅速開赴天安門廣場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命令，隨即出發，由013號裝甲車開道。不久，坦克、裝甲車隊行駛到北京市通縣八里橋附近，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用公共汽車、大卡車組成路障，並手挽手組成人牆，擋住了道路。坦克、裝甲車隊被迫停止前進，轉眼之間，就被民眾圍得水泄不通，動彈不得。

僵持許久，坦克、裝甲車隊仍然無法脫身，圍堵的民眾實在太多了，不分男女老幼，個個奮不顧身。師前進指揮部決定改道迂回開進，坦克、裝甲車隊返回楊閘營房。師閻參謀長心情十分焦急，向第13團副團長鄧健康說明受阻情況，請求幫助。北京衛戍區部隊長期負責北京的警衛安全工作，許多官兵熟悉北京市的交通情況，閻參謀長希望第13團提供嚮導。

鄧健康經過反復思考，決定把擔任嚮導的任務交給該團後勤處服役多年的專業軍士（志願兵）趙德旺。他對趙德旺交待說：“能不能把坦克、裝甲車隊帶到天安門廣場，直接關係到

整個戒嚴部隊清場任務的成敗。無論如何，你也要幫助兄弟部隊完成好這個任務。”

6月4日凌晨零點20分，坦克第1師前進指揮部召開臨時作戰會議，確定改道迂回開進的具體方案。擔任嚮導的趙德旺破例參加臨時作戰會議，在會議上詳細介紹了北京的道路交通情況和沿途的社情，並一一回答了與會者提出的問題。

6月4日凌晨1點鐘整，第1梯隊坦克、裝甲車隊再次出發，改道繼續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嚮導王德旺與閻參謀長共同乘坐裝甲指揮車先頭開進，擔負著引路的任務。

坦克、裝甲車隊重新出發不久，剛剛行駛到楊閘路口，又被用公共汽車、卡車、水泥墩所築成的路障和男女老少組成的人牆堵住。趙德旺與官兵們一起下車向民眾宣傳解釋：“我們進城是爲了維護秩序，決不會把槍口對準人民。”民眾根本不相信他們的說辭，因爲當時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在北京城內開槍鎮壓，造成大批學生和民眾的傷亡。

這時，一些平時與王德旺有工作關係的人認出了他，勸他不要參加這樣的行動，有的則罵他是“走狗”，有的則揚言要扒他的皮。幾個憤怒的民眾揮舞棍棒毆打官兵，王德旺的腰上也挨了兩塊石頭。

就在此時，師前進指揮部接到上級機關發來的“採取一切措施強行開進”的命令（即部隊可以開槍的命令）。於是，趙德旺建議改變原定的開進計畫，避開人多、路窄的京唐（北京市——唐山市）公路，迂回到寬闊的京津（北京市——天津市）公路，發揮裝甲優勢，強行破除路障，爭取時間，沿著北京市朝陽區的雙橋、大北窯、北京市東城區的建國門這一路線進入北京城，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王德旺的建議被採納了。

有了“採取一切措施強行開進”的命令，師前進指揮部似乎有了尚方寶劍，少了很多顧忌。一聲令下，一輛輛坦克、裝甲車開足馬力，象一頭頭雄獅怒吼著、衝撞著，強大的衝擊力把擋路的幾輛卡車擠向路口，頃刻卷起一陣陣煙塵。坦克、裝甲車隊呼嘯而過，轉頭向京津公路前進。

6月4日凌晨3點鐘左右，坦克、裝甲車隊行駛到北京市朝陽區十里堡，被橫放在道路上的6輛公共汽車擋住了去路，公共汽車四周黑壓壓地擠滿了民眾，呼喊聲驚天動地。先頭開路

的李樹存急忙通過電臺報告：“前面發現路障和人群！”上級命令：“停止前進！”坦克、裝甲車隊剛一停住，就被民眾圍得水泄不通。李樹存事後回憶說，磚頭、石塊雨點般地向裝甲車投來，他曾經想開槍，掏出了手槍，子彈也上了膛。

這時，電臺裏傳來裝甲步兵團杜團長的命令：“破障前進！”李樹存猛踩油門，向路障猛烈撞去。不料，6輛公共汽車被用鐵鏈綁在了一起，衝撞任何一輛公共汽車，其他的公共汽車都跟著搖動，衝撞不開。李樹存招呼011號、012號裝甲車上來，三輛裝甲車開足馬力，並排向公共汽車的結合部猛烈衝撞。強烈的震動，導致李樹存頭部撞到裝甲車駕駛窗的前壁上，出發前在檢查車輛時因碰撞而造成的舊傷縫合線一下子崩斷了，鼻子也被撞掉了一塊肉，鮮血很快染紅了衣服前襟。李樹存顧不了這些，拉動操縱杆，使勁將公共汽車向左撥，011號、012號裝甲車同時使勁將公共汽車向右撥。經過一番努力，終於破除了路障，坦克、裝甲車隊繼續向前開進。

坦克、裝甲車隊行駛到北京市朝陽區八里莊，遇到了第2道路障，十幾輛公共汽車和滿載煤炭的大卡車死死地填塞在道路上，周圍數以千計的群眾不停地用磚頭、石塊向坦克、裝甲車隊猛砸。李樹存觀察到路障右側有一棵大柳樹，於是選擇這顆大柳樹作為突破口。裝甲車加大馬力，對準大柳樹強力衝撞過去，柳樹韌性較強，一撞之下，沒能斷折。據李樹存自述，正當他倒車再撞之際，一塊拳頭大的石頭擊中他的鼻樑骨，眼一黑便暈倒在駕駛椅上。一會兒，一陣“叮叮咣咣”的聲音使他清醒過來，只聽一個聲音叫道：“開車的被砸死了，只要弄斷履帶，這鐵傢伙誰也撞不動，就能堵死部隊。”李樹存心中一驚，猛地坐了起來，心想決不能讓民眾的企圖得逞，狠勁一踩油門，裝甲車突突吼叫著竄了出去，猛地撞向柳樹，“哐嚓”一聲，大柳樹終於被撞斷了，道路右側出現了一條通道，坦克、裝甲車隊再次突圍而去。

6月4日凌晨3點55分，坦克、裝甲車隊來到北京市通縣定福莊以東地域，有三個師部隊的龐大車隊被民眾阻攔在這裏，軍用卡車和軍用吉普車一輛挨著一輛，前不見頭，後不見尾。軍車車隊前面有一道堅固的路障，使用各種車輛組成，在路障後面和公路兩邊，則是無以計數的圍堵民眾。

這三個師部隊能否及時進入天安門廣場，就靠裝甲車開道了。閻參謀長乘坐裝甲指揮車快速超越所有的軍車，到前方觀察情況。爲了保證在受阻此處的部隊及時趕赴天安門廣場，他斷然下令：迅速破障前進。先頭分隊的三輛裝甲車將油門加到最高檔，合力猛烈撞擊路障，一次又一次地衝撞，終於撞開了路障。坦克、裝甲車一輛接一輛沖了過去，三個師受阻部隊的車隊跟隨著沖了過去。趙德旺事後說：“看到這麼多的部隊跟在後面，我感到自己肩負的責任重大。”

在北京市朝陽區大北窯立交橋，圍堵的民眾眼見坦克、裝甲車隊來勢兇猛，急忙縱火將數十輛用鋼絲繩連在一起的公共汽車點燃，現場濃煙滾滾，躡向夜空的火舌高達十多米。閻參謀長下令強行闖過去，一輛輛坦克、裝甲車加速向火海沖去。十幾分鐘後，坦克、裝甲車隊闖過了長達 50 米的火海。

坦克、裝甲車隊行駛到北京市朝陽區呼家樓，這裏已經屬於北京市區，遇到了民眾更爲頑強的阻攔。7 輛汽車圍成“曰”字形擋住道路，設置成堅固的路障。坦克第 1 師偵察營副營長張輝乘坐裝甲指揮車，連同先頭分隊的三輛裝甲車迅即前出，合力衝擊路障。猛烈的撞擊，導致四輛裝甲車的駕駛員個個頭破血流。

中國軍方的資料聲稱，此時，李樹存因爲多次負傷，失血過多，身體十分虛弱，渾身上下象散了架似的，腦袋昏沉沉的，手腳也不大聽使喚了。但他想到自己肩負的重任，咬緊牙關，拼盡全力，駕駛裝甲車猛烈衝撞路障，每撞一次，都使他的傷口受到震動，血便外滲。他忍著刀紮一般的疼痛，在先頭分隊其他兩輛裝甲車的協同下，陸續撞開了第 2 層、第 3 層車障。許多民眾急忙奮不顧身地湧上前來，手推肩頂，用幾輛汽車封住缺口，並將李樹存的裝甲車圍在了中間。磚頭、石塊、汽油瓶鋪天蓋地地砸向裝甲車。李樹存的面部、肩部、胸部、背部多處被砸傷（奇怪，坐在裝甲車中也會被砸傷？），軍衣上都是血。李樹存被惹紅了眼，象瘋了似的，將裝甲車油門加到最高檔，向路障拼命撞擊。民眾大多驚呼躲避，但仍有少數不怕死的民眾怒叫著將用作路障的汽車縱火點燃。頓時，濃煙滾滾，火光沖天，使裝甲車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李樹存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唯一的念頭就是：破除路障，開闢通路！經過先頭分

隊三輛裝甲車的持續衝撞，終於為坦克、裝甲車隊又破除了一道堅固的路障。

坦克、裝甲車隊行駛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門口，大批學生和市民正在用水泥管等物品設置路障。為了搶時間，官兵們毫不猶豫地發射了軍用瓦斯彈，迅速驅散了人群。軍用瓦斯彈不同於一般的警用瓦斯彈，對人身的傷害更大。嚮導王德旺既無防護器材，也無防護準備，軍用瓦斯彈氣體順著通氣管鑽進來，嗆得他睜不開眼、喘不上氣，難受得不得了。王德旺心裏明白，擔任開路任務的首車無論如何不能停，一隻手緊抓住潛望鏡，一隻手迅速脫下襯衣，吐上幾口唾液捂在鼻子上，一邊觀察，一邊引導，原來很熟悉的道路通過潛望鏡一看，顯得很陌生，只好憑藉路邊的高大建築物來判斷方位，引導裝甲車艱難地前進。

中國軍方的資料只提到官兵們施放了軍用瓦斯彈，其實，還對圍堵的學生和民眾開槍，有學生在此處中彈遇難。

6月4日凌晨4點鐘左右，坦克、裝甲車隊行駛到北京市朝陽區日壇路，只見建國門立交橋上濃煙滾滾，一片火海。圍堵的民眾把立交橋上當作路障的8、9輛汽車全部點燃了。裝甲指揮車沒有減速，強力撞開燃燒的汽車沖了過去。這時，裝甲指揮車被滾滾濃煙所包圍，什麼也看不清。王德旺心急如焚，急忙打開車蓋，探出身體判斷方位，引導坦克、裝甲車隊前進。王德旺剛一露頭，磚頭、石塊立刻雨點般地向他砸來，同車的閻參謀長聽到石塊撞擊裝甲車的聲音，大聲命令他下來。

坦克、裝甲車隊連續衝破5道路障，過了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來到東長安街上，只見東長安街上佈滿了垃圾桶、水泥墩、鐵柵欄。李樹存自稱怒火中燒，使出全身力氣猛踩油門，駕駛裝甲車闖過數百米障礙區，成為全師第一輛到達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

在東長安街上，民眾並沒有放棄阻攔坦克、裝甲車隊前往天安門廣場的努力，但是，凡人肉身實在無法抗拒鋼鐵龐然大物，加上部隊官兵執行鎮壓命令的意志堅定，坦克、裝甲車不管是逢人或逢物，都是照樣不減速，一律強力衝撞，在建國門立交橋，裝甲車居然將奉命佔領建國門立交橋的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5師步兵第343團的一輛軍車撞翻，造成多人傷亡，致

使第 39 集團軍部隊官兵差一點嘩變。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50 分，李樹存駕駛的 013 號裝甲車、閻參謀長乘坐的裝甲指揮車率先抵達天安門廣場，比上級命令規定的“6 月 4 日凌晨 5 點 40 分”提早了許多。凌晨 5 點 18 分，第 1 梯隊其他的裝甲車和坦克終於到達天安門廣場。緊隨其後的其他三個師部隊的軍車也順著裝甲車、坦克車隊所開闢的道路，陸續到達天安門廣場，並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向四周輻射，逐步進入預定的戒嚴執勤區。

坦克、裝甲車隊受到先期到達天安門城樓前的第 38 集團軍官兵的熱烈歡迎，閻參謀長也十分興奮，緊緊地拉著嚮導趙德旺的手說：“謝謝你，謝謝老虎團的支持和幫助，沒有你，我們決不可能這麼順利地完成任務。”趙德旺自稱當時是“激動得熱淚盈眶”。事實上，正是因為有了熟悉北京交通的趙德旺擔任嚮導，坦克、裝甲車隊才能夠提早抵達天安門廣場。也正因為坦克、裝甲車隊提早抵達天安門廣場，稍後才會發生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離隊伍的慘案。李樹存事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坦克第 1 師的主力部隊，也就是第 2 梯隊並沒有按時抵達天安門廣場。6 月 3 日，第 2 梯隊由師長徐慶仁、師政委吳忠明親自指揮率領，從河北省三河縣出發，向北京開進。開進途中一路受阻，6 月 4 日清晨 6 點 40 分，才開進到北京市朝陽區雙井地區，再次受阻。十幾輛卡車橫在道路中央，卡車上密密麻麻站滿了民眾。如果撞開路障，強行通過，就有誤傷群眾的可能。面對複雜的局面，師長徐慶仁、師政委吳忠明果斷決定：停止前進，原地待命。

第 2 梯隊坦克、裝甲車隊剛剛停下，群眾就潮水般地湧過來。頓時，每一輛坦克和裝甲車都被人群團團圍住。一些民眾在向官兵們宣講北京市區各處所發生的軍人開槍鎮壓情況，一些憤怒的民眾爬上坦克車和裝甲車，有的揪天線，有的拆機槍，有的砸車燈，有的卸履帶。據中國官方資料聲稱，許多官兵被打，數十人受傷。

第 2 梯隊官兵們一邊保護坦克和裝甲車，一邊向群眾做宣傳解釋工作。從 6 月 4 日清晨 6 點 40 分到傍晚 7 點 40 分，整

整 13 個小時，官兵們水未飲一滴，飯未進一粒。一些民眾主動爲官兵們送來了熱水熱飯，但是，民眾始終不肯讓開道路。爲了不誤傷群眾，同時又儘快到達天安門廣場，師長徐慶仁下達了迂回前進的命令。

遲至 6 月 5 日凌晨 1 點 40 分，坦克第 1 師第 2 梯隊的大部分坦克和裝甲車才終於到達天安門廣場。有的車輛和官兵直到 6 月 7 日才抵達天安門廣場。

同一支坦克部隊，同樣是師級指揮官，師長徐慶仁、師政委吳忠明就比師閻參謀長有人性，沒有爲了完成任務而枉顧民眾的生命。如果閻參謀長也是有人性的軍人，就不會有稍後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慘案的發生。

第四節、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

坦克第 1 師第 1 梯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已是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50 分，解放軍戒嚴部隊早已控制了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最後階段也已經開始 20 分鐘。坦克、裝甲車隊沒有直接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只是奉命在東長安街一線擔任警戒任務，阻止學生和民眾從東北角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

坦克第 1 師第 2 梯隊抵達天安門廣場的時間是 6 月 5 日凌晨 1 點 40 分，已經是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第 2 天，根本就沒有趕上清場行動。

但是，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不久，坦克第 1 師第 1 梯隊的坦克卻在西長安街上的六部口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追軋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的慘案，當場軋死 11 名學生，軋傷許多名學生。可悲的是，製造六部口慘案的指揮官、團長羅剛上校正是地道的北京人。

羅剛率領的坦克車隊歷時 4 個多小時的開進，一路上撞開十餘道路障，於 6 月 4 日凌晨 5 點 18 分，經由東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比上級機關所規定的時間提前了 20 多分鐘。

凌晨 5 點 20 分，團長羅剛接到師前進指揮部命令，火速率領部隊前往西長安街，驅散聚集在新華門附近的民眾，以保證中南海的絕對安全。團指揮部決定由 8 輛坦克組成坦克突擊隊，由團長羅剛、副團長賈振祿率領前往。出發前，羅剛向突擊隊官兵傳達了上級命令並作了簡要的政治動員。8 輛坦克分列成 4 排，每排 2 輛，並駕齊驅，以形成威懾力。

凌晨 6 點 05 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命令坦克第 1 師立即出動，驅散新華門前的“反革命暴徒”。

坦克突擊隊從天安門廣場出發，沿著西長安街由東往西剛剛行進約 2 華里，就遭到了阻攔，大街上橫躺了幾百名學生和群眾，用血肉之軀組成一道長約十幾米的“人體路障”。坦克突擊隊沒有減速，1 百米、50 米、30 米，距離“人體路障”越來越近，路面劇烈震動，坦克的轟鳴聲震耳欲聾，但躺在長安街上的學生和民眾堅持不動，坦克的速度不得不降下來。

這時，指揮車裏的羅剛頭上直冒汗，因為通訊電臺中不時

傳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新華門告急！”“中南海告急！”的呼叫。羅剛覺得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於是下達命令：迅速採取第 1 號、第 2 號、第 3 號方案。坦克突擊隊首先實施了第 1 號方案：用廣播器對學生和民眾進行勸說，3 分鐘過去了，無效。緊接著實施了第 2 號方案：鳴槍示警，又一個 3 分鐘過去了，仍然無效。緊接著又實施了第 3 號方案：施放軍用瓦斯彈。軍用瓦斯彈的毒性和效力遠勝於警用瓦斯彈，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 1988 級女學生龔紀芳就是因為過多地吸入了坦克第 1 師施放的軍用瓦斯彈氣體而死亡，年僅 19 歲。

軍用瓦斯彈接連不斷地在人群中炸開，現場煙霧瀰漫，令人無法忍受，一位當時在場的學生說，雖然早已下定死的決心，但還是無法忍受軍用瓦斯彈。多數躺在路面上的學生和民眾無法忍受軍用瓦斯彈，紛紛起身躲避。羅剛抓住時機命令坦克突擊隊繼續前進，向新華門推進。

據羅剛事後自述：坦克突擊隊慢慢地向前拱著人群，終於將新華門附近的人群驅散。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到驅散新華門前的人群，坦克突擊隊總共只花了 30 分鐘。

驅散了新華門附近的人群，坦克突擊隊並沒有停止前進，而是沿著西長安街繼續往西高速行駛，一路鳴槍，施放軍用瓦斯彈，將學生和市民全部驅逐到電報大樓以西，一部分坦克在六部口設卡鎮守，另有一部分坦克在新華門前一字排開，保護中南海的安全。此時是 6 月 4 日清晨 7 點 25 分。

坦克突擊隊經過新華門西側不遠處的六部口時，正遇上從天安門廣場撤離出來的學生隊伍。學生隊伍從天安門廣場東南角撤出，途徑前門西大街，從六部口東邊的新華北街拐上西長安街，數千名學生打著校旗，有秩序、和平地在自行車道上往西行進，返回位於北京市海澱區各自的校園。坦克突擊隊棄西長安街寬闊的快車道、慢車道而不走，沿著自行車道快速追軋學生隊伍。學生們萬萬想不到坦克會從背後追軋過來，不少人躲避不及，或死或傷。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慘案，發生在 6 月 4 日清晨 6 點 20 分。

坦克突擊隊慘絕人寰的暴行激起人們極大的憤怒，6 月 4 日上午 8 點鐘，仍有近萬名民眾不顧危險，聚集在六部口設卡

的坦克前抗議，有民眾高呼“燒了這些坦克，爲死難者報仇”，有民眾向坦克投擲磚頭、石塊、啤酒瓶。

6月4日上午8點40分，羅剛決定帶領幾個軍官下車，到六部口警戒線的最“前沿”與抗議群眾“舌戰”。羅剛對抗議民眾說：“我是這個梯隊的負責人，是剛從天安門廣場過來的，血洗天安門廣場純屬謠言，請大家不要上當受騙被人利用。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武器是我們第2生命，你們要燒坦克、搶武器，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我們只是奉命執行戒嚴任務，你們要冷靜、理智，千萬別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來。”

大概由於羅剛操一口純正的“京腔”，憤怒的民眾並沒有暴力相向。這時，幾個年青人抬來一具死難者遺體，人群的情緒又一次被激憤起來，紛紛湧向羅剛等軍人和坦克面前。副團長賈振祿大聲威脅道：“誰要想和軍人較量就站出來！我們是執行任務的，就是打死我們，部隊也不會因此而撤退，放棄戒嚴。再這樣對峙下去，你們當中的好人只能成爲壞人的犧牲品。”

就在軍民流血衝突一觸即發之際，部分學生和民眾站出來拉起一道糾察線，隔離軍民雙方，主動地維持秩序，爲坦克車隊站崗，不許燒毀坦克。

整整過了兩個多小時，到了6月4日上午11點鐘，六部口軍民對峙的緊張狀態才緩和下來。

第五節、六部口慘案的詳細經過和後果

六部口慘案發生時，筆者和中國政法大學大約 20 餘名師生正打著一面校旗跟著學生撤退隊伍，處在西長安街上郵電大樓附近。長安街是中國最寬的馬路，寬達 70、80 米，屬於雙行道，南北兩邊各分為快車道、慢車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約 120 釐米的綠色尖頭鐵欄杆。學生隊伍當時有秩序地由東往西走在北邊的自行車道上。

只見三輛坦克一邊發射軍用瓦斯彈，一邊沿著自行車道從背後快速地追軋學生隊伍。一時間，大街上彌漫著淡黃色的煙霧，許多學生吸入淡黃色的煙霧後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幹嘔不止，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經濟系青年女教師張麗英因過多吸入淡黃色的煙霧，當場暈倒在路旁，被學生送往醫院急救。

慌亂之際，學生們紛紛翻越綠色尖頭鐵欄杆而躲避，不少人被綠色尖頭鐵欄杆刺傷或跌下來摔傷。那些柔弱無力的女學生大多無法翻越高達 120 釐米的綠色尖頭鐵欄杆，只能緊貼在綠色尖頭鐵欄杆旁，驚恐之狀讓人心酸。

北京科技大學（原北京鋼鐵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寬寶，當時與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輛自行車走在自行車道上，當周圍的學生開始奔逃，他輾不相信如此行走也會有危險，就沒有跟著一起奔逃。沒想到一念之差，頃刻之間便倒在坦克的履帶之下一死一傷。林仁富當場死亡。王寬寶身負重傷，整個骨盆被軋成粉碎性骨折，數年中做了多次大手術，傷口多年後仍沒有癒合。因為輸血而染上“丙肝”病菌，無法再次做手術。受傷的部位可怕極了，整個臀部已無一處完好的地方。

六部口慘案造成 11 名學生遇難，另有許多學生受傷，其中多名學生傷重致殘。“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女士經過多年艱辛的查尋，已找到六部口慘案的死難者 5 人、受傷者 9 人。其中 13 人有姓名、年齡、所在單位和受傷部位、致死原因；有 10 人已確知籍貫、家庭地址；有 1 人不願公佈個人資料。

五位遇難的大學生是：

1)林仁富：福建省莆田市人，北京科技大學 1989 年應屆畢

業博士生，遇難時年僅 30 歲，已婚，無子女。

2)董曉軍：江蘇省鹽城縣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中央團校）青年工作系 1986 級學生，遇難時年僅 20 歲。

3)王培文：陝西省咸陽市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 1986 級學生，遇難時年僅 21 歲。

4)田道民：湖北省石首市人，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 1985 級學生，遇難時年僅 22 歲。

田道民先被軍用瓦斯彈熏倒在地，又被坦克軋掉了左邊的半個臉，其中一隻眼睛完全被軋掉。

5)龔紀芳：女，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 1988 級學生，遇難時年僅 19 歲。

受傷的 9 人是：

1)方正：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學生。

2)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

3)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權錫平在躲避坦克時被子彈擊中右大腿內側神經，腿部大動脈及坐骨神經分枝被打斷，現在右腿呈萎縮狀態。

4)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劉華與方政同時被坦克軋成重傷，後腦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後來截肢。

5)北京某大學的一名女學生。6 月 4 日凌晨，這名女學生參加了一支自發組成的臨時救護隊，在西長安街上搶救受傷者，發瘋的坦克竟然喪心病狂地將她的一條大腿軋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 4 名受傷者都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他們是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和單連軍，有的被軋成重傷，有的留下了終身殘疾。

團長羅剛上校事後在署名文章《紅牆外的較量》中公然撒謊說：“在整個驅逐過程中，我的部下沒有向人群開一槍，也沒有軋傷軋死一個人。”【注釋 1】

在六部口慘案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首當其衝，所受傷害最為嚴重，除了上述名單中的傷亡者，還有一些受傷的學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在整個撤退學生隊伍中所處的位置比較靠後，跟隨著河北大學的學生隊伍。

筆者在美國主辦《新聞自由導報》時，結識了一位中國青

年政治學院的學生（怨我尚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也是六部口慘案的受傷者，幸運的是，他個子小，坦克從他的頭頂開過去，身體正好處在兩條履帶之間，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之外，居然沒受到重大傷害。他後來寫了一篇題為《坦克追碾學生事件親歷記》的回憶文章，刊登于《新聞自由導報》。

他在文章中敘述了當時的情景：

“我們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隊伍由 30、40 名學生組成，處在整個學生撤離隊伍比較靠後的部分。我的同學王培文赤著腳（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由於匆促，加上人多擁擠，很多同學的鞋子都擠丟了），舉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們學校隊伍的最前頭。

大約在清晨 7 時左右，正當我們隊伍從新華北街轉向西長安街的時候，突然有人驚呼：‘坦克來了！坦克來了！’我扭頭一看，只見 3 輛重型坦克並排行駛，從學生隊伍後面快速地沖過來。隨即又聽到一陣‘砰砰’的響聲，散開一片片噏人的淡黃色煙霧，讓人感覺到呼吸困難。這是坦克在向學生隊伍發射毒氣彈……

同學們情急之下紛紛向路邊躲避，準備給坦克讓出一條通道。但是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逾一米的鐵欄杆，這道鐵欄杆又是尖頭的，一時無法翻越過去，同學們只好擠在鐵欄杆旁，無法退避到人行道上。說時遲那時快，正當同學們在鐵欄杆旁擠成一團時，其中一輛坦克已經直接沖進鐵欄杆旁的人群中，頓時響起一陣驚恐而淒厲的叫喊聲。

一剎那間，我被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種被軋死的感覺在腦中一閃而過，隨即失去了知覺。萬萬沒有想到，在坦克過去之後，蘇醒過來的我發現自己居然還活著。我環顧四周，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片人，或死或傷，場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豎立的鐵欄杆也已被坦克擠倒了。於是在倉惶之中爬出死傷者的人堆，爬過倒塌在地的鐵欄杆，隨後被民眾送到積水潭醫院救治。……

在上述遇難學生中，龔紀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於坦克碾軋或撞擊的遇難者。她先是左胳膊中彈倒地，後又吸入大量軍用瓦斯彈氣體造成昏迷，被民眾送入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經搶救無效身亡。死亡證明書上載明：死因主要是由於吸入毒

氣造成肺部糜爛。

龔紀芳左胳膊的傷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稱“炸子”的開花彈（達姆彈），其實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徑槍械（機槍或重機槍）發射的子彈，當時學生隊伍四周並沒有步行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彈應該是從坦克上發射出來的。

學生隊伍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何況手無寸鐵，又正處在返回校園的途中，解放軍戒嚴部隊竟然動用坦克車隊予以殘忍地追殺，是可忍孰不可忍。

製造六部口慘案的坦克部隊的指揮官是團長羅剛上校，那輛瘋狂軋人的坦克編號是“106”，讓歷史記住這一切。

六部口慘案太殘酷了！目睹者無不痛哭流涕，痛哭聲震天動地。從小就在書本上讀到“血腥”這兩個字，而只有站在肝腦塗地、鮮血四濺的六部口慘案現場，筆者才真正明白“血腥”這兩個字的含義，深受震撼。

六部口慘案的景象永遠銘刻在筆者的腦海中：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地橫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難者遺體距離人行道兩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一個大洞，像豆腐腦一樣的腦漿，摻雜著許多紅色的血絲向前噴射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具遇難者遺體倒在這具遺體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具遇難者遺體被軋到了自行車上，與自行車粘到了一起。

（當我從電報大樓門口重返六部口慘案現場的時候，部分受傷的學生和遇難者的遺體已經被民眾運走了。）

一些極度悲傷的學生留在現場，一邊哭一邊商量，是否應該將這些遇難者的遺體運走，免得被解放軍戒嚴部隊搶去消屍滅跡。其中幾個學生走進六部口郵電所西面一個胡同，向一家住戶要了一塊約一米多長、半米多寬的木板，在一些現場民眾的幫助下，雨源等幾位學生開始將遇難者遺體一一抬到了西長安街後面一個胡同裏。一位個體戶司機流著淚建議把五具遇難者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作為解放軍戒嚴部隊屠殺平民百姓的法律證據。學生們聽從了他的建議，把五具遇難者遺體（一遇難者遺體連著自行車）抬上了他的小卡車，送到中國政法大學。

準確地說，部分死難學生不是被坦克碾死的，而是被活活

擠死的。在三輛坦克到達之前，他們已經緊急躲避，有的已經越過綠色尖頭鐵欄杆，有的雖然來不及或無力越過綠色尖頭鐵欄杆，但已經讓開道路，緊貼在綠色尖頭鐵欄杆旁。可是，其中編號為 106 號的坦克並不照直前行，而是掉頭擠倒綠色尖頭鐵欄杆，沖上人行道，把這些學生活活擠死在綠色尖頭鐵欄杆處，然後又猛地掉轉頭，甩倒幾名學生。從遇難學生遺體的狀況來看，也可證明部分死難學生確實是被坦克活活擠死的。

【注釋 1】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第六節、坦克第 1 師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41 名官兵）

師長徐慶仁大校

師政委吳忠明大校

師閻參謀長

坦克團團長羅剛上校（北京人）

坦克團副團長賈振祿

師偵察營副營長張輝

裝甲步兵團杜團長

裝甲步兵團特務連班長、裝甲車駕駛員李樹存（山東省金鄉縣人，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1995 年升任指導員。）

特務連排長朱龍平

某團機要股參謀鄧煒中尉

某團機要股股長李聚剛

某團電臺台長劉虎林

某團電臺台長宋開銀

某團電臺報務員羅國元

某團電臺報務員熊立岩

某團電臺駕駛員朱金玉

幹事任立本少尉（河南人）

師政治部宣傳科副營職幹事呂占華（河北省大城縣人。歷任坦克第 1 師政治部宣傳科營職幹事、科長、坦克第 1 師炮兵團政委。2001 年 11 月轉業，歷任中共天津市和平區組織部副部長、中共天津市和平區紀委常委。2008 年 12 月以來任中共天津市和平區民政局黨委副書記、局長。）

坦克第 1 師股長衛保國（山西省晉城市城區鐘家莊茶園村人。後來任天津警備區第 7 幹休所所長、第 1 幹休所所長。）

師司令部參謀于瑞岩（山東省青島市人，1990 年轉業。）

師通信營接力連連長殷林

師通信營接力連指導員張冰
師警衛連連長梁銀常
師警衛連指導員王斌
師管理科班長秦蘭州
師偵察營營長崔建才
師偵察營副營長韓國
師偵察營教導員張玉國（現任河北省遵化市公安局副局長）
師偵察營第 1 連連長王鳳義
師偵察營第 1 連排長李亮
師偵察營士兵李連勝（1988 年兵）
師偵察營第 1 連第 1 排士兵肖小件（湖南人。1987 年兵）
師偵察營趙書彪（1995 年轉業）
師偵察營第 1 連士兵李文光（轉業到天津市薊縣農業局工作）
師工兵營營長邢改民
師工兵營地爆連連長黃宏
師工兵營第 2 連連長江金生
師工兵營第 2 連第 3 排排長陸兵
師工兵營第 1 連連長唐新華
師防化連第 2 排第 5 班班長府（傳）永元（1987 年兵）

裝甲步兵團司令部作戰訓練股參謀劉金泉（河北省保定市人）
裝甲步兵團炮兵營第 3 連連長石尙忠（後來任裝甲步兵團司令部作戰訓練股股長）
裝甲步兵團政治處幹事孔祥宜
裝甲步兵團政治處幹事范守箴
裝甲步兵團第 1 營副營長劉秋良
裝甲步兵團第 1 營第 2 連連長陳超群
裝甲步兵團第 1 營第 2 連士兵楊友良（湖南省衡陽市人，1988 年兵）
裝甲步兵團作訓股參謀劉金泉（河北省保定市人）
裝甲步兵團第 2 營第 5 連連長李憲平（1983 年兵）
裝甲步兵團第 2 營第 4 連排長衛志孝（山西人）
裝甲步兵團通信連第 1 班班長崔永旺（1987 年兵）
裝甲步兵團通信連士兵徐輝（湖南省湘鄉市人。1988 年兵）

裝甲步兵團第2營第5連士兵陳斌(四川省宜賓市人.1989年兵)
裝甲步兵團1營3連士兵侯清華(湖南省芷江縣人。1988年兵)
裝甲步兵團第2營士兵肖紅軍(四川省人.1989年兵)
裝甲步兵團第2營士兵彭定江(四川人.1989年兵)
裝甲步兵團第2營士兵劉德春(四川省人.1989年兵)
裝甲步兵團第2營士兵唐友全(四川省人.1989年兵)
裝甲步兵團士兵聶新宏

炮兵團團長吳書建

炮兵團政委徐敬田

炮兵團政治處主任賈長敏

炮兵團第3營營長陳虎傑

炮兵團第2營第6連指導員陳慶瑞

炮兵團連長鞏墨柱(山東人。歷任預備役第1師炮兵團營長、團參謀長、天津市塘沽區武裝部科長、副部長。2006年以來任天津市塘沽區解放路街道辦事處副主任。)

炮兵團第1營第3連排長張中文排長

炮兵團第2營第6連第2排排長張全記

炮兵團第2營第6連連長張作成

炮兵團第2營士兵羅忠民(四川人。1987年兵)

炮兵團第2營士兵侯冠球(1987年兵)

炮兵團第3營指揮連士兵張建議(1989年兵)

炮兵團政治處報導組楊曙東

炮兵團修理連士兵史雙傑(1987年兵)

坦克第1團偵察科科長焦同貞(河北省人。歷任坦克第2團團長、坦克第1師副參謀長。1996年轉業，歷任天津市和平區經濟協作辦公室副主任、和平區物價局副局長、局長。)

坦克第1團排長王興武

坦克第1團第1營第1連專業軍士呂光友(1984年兵，後翻車死亡。)

坦克第1團公務班士兵唐安民(湖南人)

坦克第1團第1連坦克特級駕駛員、專業軍士王遂寶(河南人。1985年兵)

坦克第 1 團第 1 營第 1 連士兵柳衛忠（1988 年兵）
坦克第 1 團第 3 營第 9 連第 5 班班長孔祥根（1987 年兵）
坦克第 1 團特務連士兵劉華（江蘇省蘇州市人）

坦克第 2 團股長衛保國（山西省晉城市人）
坦克第 2 團衛生隊張保安（1993 年轉業到山西省臨汾市）
坦克第 2 團修理連連長王順華
坦克第 2 團修理連士兵史建文（1989 年兵）
坦克第 2 團修理連士兵秦戰勝（1989 年兵）
坦克第 2 團第 3 營第 7 連士兵盧昌久（1987 年兵）
坦克第 2 團第 7 連士兵朱世平（河南省正陽縣人。1989 年兵）
坦克第 2 團後勤處管理股士兵楊民（湖南省芷江縣人。1988 年兵）
坦克第 2 團修理分隊士兵董慶兵（1987 年兵）
坦克第 2 團第 1 營第 1 連第 1 排 106 號坦克車 2 炮手吳彥輝（河南省衡水市人。1987 年兵。1991 年退伍，在衡水老白乾集團工作。）
坦克第 2 團第 1 營第 1 連連長梁東坡
坦克第 2 團第 1 營第 1 連指導員馬宏偉
坦克第 2 團副連長王水洲（河南省人。歷任坦克第 2 團參謀長、坦克第 1 師參謀長、山西省絳縣武裝部部長、山西省平陸縣武裝部部長。2005 年 12 月以來任天津市和平區市容委員會副主任。）
坦克第 2 團第 3 營第 8 連排長吉新明（河南溫縣人。歷任解放軍後勤學院院務部警衛連副連長、副指導員、解放軍 304 醫院院務部勤務隊隊長、軍務科副營職參謀兼勤務隊隊長。1998 年 6 月轉業，歷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保衛部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總務部主任科員、總務部資產管理處副處長。2005 年 5 月以來任吉林省通榆縣副縣長。）
坦克第 2 團 3 中隊 9 分隊連長劉才才
坦克第 2 團 3 中隊 9 分隊司務長趙文芝
坦克第 2 團 3 中隊 9 分隊士兵秦文功（江蘇人。1987 年兵）
坦克第 2 團 3 中隊 9 分隊士兵張文明（江蘇人。1987 年兵）
坦克第 2 團 3 中隊 9 分隊士兵許國良（江蘇人。1987 年兵）

坦克第2團3中隊9分隊士兵魏友峰（陝西人。1987年兵）
坦克第2團3中隊9分隊士兵康文生（河北保定人。1987年兵）
坦克第2團3中隊9分隊士兵盧德順（河北保定人。1987年兵）
坦克第2團3中隊9分隊士兵許雙進（河北保定人。1987年兵）
坦克第2團3中隊9分隊士兵楊剩貴（湖南人。1987年兵）
坦克第2團3中隊9分隊士兵唐光青（湖南人。1987年兵）
坦克第2團第5連士兵李強（河南省正陽縣人。1989年兵）
坦克第2團第1營第2連班長顧學軍（1987年兵）
坦克第2團第1營士兵曾波湧（湖南省芷江縣人。1988年兵）
坦克第2團第1營士兵于小軍（湖南省芷江縣人。1988年兵）
坦克第2團第1營士兵羅紅元（湖南省芷江縣人。1988年兵）
坦克第2團第1營士兵李輝（湖南省芷江縣人。1988年兵）
坦克第2團1營1連士兵柳衛忠（河北省石家莊市人。1988年兵）
坦克第2團1營1連士兵葉海山（河南省正陽縣人。1989年兵）
坦克第2團第1營第1連指導員潘學宗
坦克第2團第7連班長李三軍（河南省溫縣人）
坦克第2團第3營第8連第3排排長吉新明（河南省溫縣人）
坦克第2團裝甲步兵連士兵吳金文（湖南省新晃縣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指導員李枝貴（1992年轉業，歷任四川省邛崃市人事和勞動社會保障局監察中隊隊長、人事綜合科科長、副局長。2008年1月以來任四川省邛崃市醫保局局長。）

坦克第3團特務連士兵石東青（河南省新鄉市人。1987年兵）
坦克第3團特務連士兵俞金梁（江蘇省太倉市人。1987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彭超雄（1988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串寶軍（陝西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周永偉（河北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劉靜（河北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王喜軍（河北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孫宏（江蘇人。1987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徐金明（江蘇人。1987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方正兵（江蘇人。1987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金未文（江蘇人。1987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莊峰（江蘇人。1989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羅紅彥（江蘇人。1989年兵）
坦克第3團第9連士兵董紅亞（江蘇人。1989年兵）
坦克第3團修理連士兵曹明（江蘇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修理連士兵付振球（江蘇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通信連士兵羅東颯（湖南省攸縣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第3連士兵陳文新（湖南省攸縣人。1988年兵）
坦克第3團裝甲步兵連副連長徐貴純
坦克第3團第1營排長劉世政
坦克第3團第7連士兵孫延峰（河北省衡水市人。1987年兵）
坦克第3團特務連士兵俞金良（江蘇省太倉市人。1987年兵）
坦克第3團第1營第1連副連長楊順平（在團長任上轉業到河北省石家莊市）
坦克第3團第1營第1連副指導員孟東升（轉業到河北省唐山市）

連長崔振江（歷任團參謀長、副團職農場場長。2000年9月轉業，任河北省棧城市民政局副局長。）

坦克第1師士兵馬駿驛

第十二章、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概況

在北京軍區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原定計劃中，炮兵第 14 師被列為預備部隊，並不在第一批進京部隊的名單上，但由於北京軍區第一批進京部隊，包括第 38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大都遭到了學生和民眾的阻攔，未能抵達北京市區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在這種情況下，北京軍區才緊急調動炮兵第 14 師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炮兵 14 師隸屬於北京軍區，師部駐地在河北省懷來縣，陳明義少將任師長、徐福安大校任師政委，修先余任副師長，徐寶喜任師副政委，劉萬隆任師參謀長，羅中江任師政治部主任，鞏國志任師後勤部部長。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2973”。下轄炮兵第 37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53”）、炮兵第 10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71”）、炮兵第 9 團（當時部隊代號“51392”）、炮兵第 208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58”）、炮兵第 6 團（當時部隊代號“52960”），以及偵察營、通信營、工兵營、教導隊等部隊。

炮兵第 14 師組建於 1952 年 4 月 25 日，所屬部隊在戰爭年代曾獲得“無堅不摧”、“威震敵膽”兩面錦旗。當時下轄炮兵第 6 團、炮兵第 37 團、炮兵第 208 團、炮兵第 9 團、炮兵第 10 團，共計五個炮兵團。

炮兵第 6 團由解放軍第 2 野戰軍屬下的炮兵第 8 團、炮兵第 6 團的各四個連，以及炮兵第 5 團第 3 營的兩個連隊，於 1950 年 11 月在四川省巴縣永興場合編組成。

炮兵第 37 團由原炮兵第 3 訓練基地所屬的炮兵暫編第 9 團直屬部隊，調到西北軍區接收了一批地方武裝組成。1952 年 11 月調歸炮兵第 14 師建制。

炮兵第 208 團由步兵第 428 團、第 429 團於 1951 年 2 月在遼寧省阜新市整編組成。1953 年轉隸炮兵第 22 師建制，1955 年轉隸炮兵第 8 師建制，1957 年 1 月調歸炮兵第 14 師建制。

炮兵第 9 團的前身是第 41 軍炮兵團，原為東北民主聯軍東

滿司令部直屬炮兵團，1945 年 9 月在遼寧省鳳城縣組建。1953 年 11 月調歸炮兵第 2 師建制，1955 年 3 月調歸炮兵第 14 師建制。

炮兵第 10 團由原炮兵第 2 團於 1950 年 7 月在四川改編而成。

1951 年 3 月，炮兵第 9 團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歷時 2 年 7 個月，參加了第 5 次戰役、芝浦里阻擊戰、秋季戰術反擊戰、上甘嶺戰役、平金淮戰役和反登陸戰役準備。6 月，炮兵第 6 團入朝參戰，歷時 2 年 3 個月，先後配屬志願軍第 68 軍、第 12 軍、第 60 軍、第 67 軍、第 54 軍等部隊參加了反擊聯合國軍秋季攻勢、防禦作戰、戰術反擊、戰役反擊等。同樣是 6 月，炮兵第 10 團入朝參戰，歷時 2 年 4 個月，配屬第 47 軍，先後擔負了保衛開城和談、反擊聯合國軍秋季攻勢、臨津江兩岸防禦戰等任務。1953 年 2 月，炮兵第 208 團入朝參戰，歷時 4 年，參加了反聯合國軍登陸戰、金城川夏季反擊戰等。

1987 年，炮兵第 37 團、炮兵第 9 團、炮兵第 10 團抵達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參與對越作戰。一個連隊被中央軍委命名為“老山作戰神炮連”，一個連隊被成都軍區命名為“英雄炮兵連”。

1999 年，炮兵第 14 師組成 155 加榴炮方隊，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50 周年閱兵儀式。

2003 年 12 月，炮兵第 14 師撤銷建制，餘部整編為第 65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

第二節、乘專列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在 1989 年北京戒嚴行動中，炮兵第 14 師作為預備部隊，早已接到預先號令，做好了隨時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準備。1989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點鐘，該師師長陳明義在師黨委常委會議上即明確指示：“我師雖然是軍區預備隊，現在還沒有進京的消息，但是，沒有任務則已，一來就很緊急。全師應組織兩套班子，兩支隊伍。進京的全部返營待命，下午 4 點前調整完畢。”該師政委徐福安同時也表示：“我們不僅要在思想上旗幟鮮明，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動上作好隨時出動的準備，把維護首都安定作為全師壓倒一切的中心。”

5 月 20 日晚上 10 點 20 分，炮兵第 14 師作戰值班室裏響起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北京軍區司令部通過軍用保密電話下達緊急命令：“鑒於摩托化機動部隊進京受阻的嚴重局勢，軍區首長命令，你師立即組織兩千名官兵，改由鐵路輸運，全副武裝緊急進京，今晚 12 點鐘前在沙城（屬於河北省懷來縣）裝載站集結。”

從接獲緊急命令，到部隊集結完畢，其間只有一個半小時。炮兵第 14 師原定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官兵人數是 1500 人，按照緊急命令的要求，現在必須臨時增加 500 人。師長陳明義與師政委徐福安簡短商議後，下達命令：“部隊緊急集合，強行機動，克服一切困難，按時、全員到達沙城裝載站。”副師長修先余率領師臨時裝載指揮組，師後勤部部長鞏國志率領師給養籌措組相繼出發，各項工作同步展開。

炮兵第 14 師進京部隊包括炮兵第 9 團、炮兵第 10 團、炮兵第 37 團和炮兵第 208 團。炮兵第 37 團駐地在河北省懷來縣，炮兵第 10 團和炮兵第 9 團駐地都在河北省宣化縣洋河南，炮兵第 208 團駐地在河北省涿鹿縣。炮兵第 6 團駐地在北京市延慶縣，已經在北京境內。

炮兵第 9 團、炮兵第 10 團、炮兵第 37 團和炮兵第 208 團部隊散佈在東西 120 公里的 5 個點上，部隊機動所必經的道路京張（北京市——張家口市）公路正在翻修，道路狀況不好。

各炮兵團緊急收攏部隊，紛紛乘車趕赴河北省懷來縣沙城

裝載站。一時間，京張公路待修的路面上，一條條軍車長龍在夜色中遊動。“還有 40 分鐘，加速！”某炮兵團（應該是駐紮在涿鹿縣的炮兵第 208 團）秦團長通過無線電臺給各個梯隊傳令。北京牌吉普車的時速表上，紅色指針越過了“80”。“不好！路被堵了。”在距離沙城車站 3 點 5 公里處，上下車道排滿了各種車輛，走走停停。秦團長抬起手腕，夜光錶指向晚上 11 點 30 分。“通知部隊官兵下車，徒步急行軍，目標——沙城車站。”當秦團長率領部隊官兵越河溝，穿巷道，跑步趕到沙城裝載站時，深夜 12 點的鐘聲還沒有敲響。

駐北京鐵路分局軍隊代表處負責將炮兵第 14 師部隊運送進京。5 月 21 日凌晨零點 15 分，該代表處運輸值班室驟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正與同事緊張安排軍運計畫的工程師呂克相抓起電話，話筒中傳來了駐北京鐵路分局軍隊代表處主任李蘭芳的聲音：“因各路進京的戒嚴部隊普遍在北京郊區受阻，未能按預定時間到達指定目標。上級要求你們，千方百計採取措施，于凌晨 2 點鐘前做好鐵路輸送準備，迅速將炮兵第 14 師從鐵路輸送進北京城。”

呂克相馬上向北京鐵路分局副局長李寶林彙報情況，根據李寶林的意見，召集軍事調度主任翟秀峰、調度所主任葉志慶緊急磋商。根據任務要求，確定了兩個輸送方案：一是採用棚車運送部隊，二是採用敞車運送部隊。兩個方案各有利弊。採用棚車運送，乘車條件和安全條件較好，但準備車輛困難，運送途中容易被發現遭圍堵。採用敞車運送，車輛來源充足，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從未採用敞車運送過部隊，不容易被發現，但乘車條件和安全條件較差。爲了萬無一失，他們把兩個方案同時報給上級審定，上級同意採取第二個方案，破例採用敞車運送炮兵第 14 師部隊進京。

按照上級確定的方案，5 月 21 日凌晨 1 點 10 分，呂克相等人將開往山西省大同市的 1417 次空敞車扣在京包（北京市——包頭市）線沙城站，甩下 30 輛車廂，鐵路部門動員力量，進行緊急整備和技術檢查，並避開電氣化鐵路接觸網，把 30 輛車輛及時送到沙城裝載點，炮兵第 14 師進京部隊的兩千名官兵順利地乘上了車。

在裝載和運行過程中，爲了保證安全、迅速、保密地完成

任務，呂克相等人會同鐵路部門採取了非常運輸措施。爲了搶時間，列車不起貨票，不掛守車，不派運轉車長。爲了部隊官兵的人身安全，進行緊急安全教育，發放了電氣化鐵路安全乘車知識。爲了保密，不編軍運車次，控制知情範圍。

5月21日凌晨3點25分，代號“平24”次敞篷運煤車滿載著炮兵第14師的兩千名官兵，從河北省懷來縣沙城裝載站出發。途中，鐵路部門一路開放綠燈，風馳電掣般地向北京城賓士，經過官廳站（位於河北省懷來縣官廳鎮）、幽州站（位於河北省懷來縣舊莊窩鄉）、豐台站（位於北京市豐台區豐台鎮），於5月21日清晨6點13分抵達北京火車站。

第三節、受困北京火車站

1989年5月21日清晨6點13分，“平24”次敞篷列車剛剛在北京火車站停穩，炮兵第14師部隊就迅速沖出車廂，僅4分鐘，全副武裝的兩千名官兵跑離停靠月臺，突然從北京火車站第5月臺的出口處沖出，象一股旋風刮過北京火車站西南口，朝天安門廣場方向飛掠而去。

由於行動突然，炮兵第14師部隊成功地沖出了北京火車站，來到站前廣場，跑步前進4百米後，才有數不清的學生和市民迎面壓過來，擋住了去路。“不准去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回去！回去！”一陣陣喊叫聲淹沒了北京火車站鐘樓的鐘聲。

寬敞的北京火車站站前廣場上，人潮洶湧，聲浪震天。炮兵第14師的兩千名官兵裹在人群中，悶得透不過氣來，許多官兵虛脫過去。炮兵第10團第2營第5連沖在最前面，該連在中越邊境老山戰區作戰時曾被成都軍區授予“英雄炮兵連”榮譽稱號。在拉鋸似的對峙中，場面極其混亂，軍民雙方都有人被擠倒、踩傷。

“北京火車站告急！北京火車站告急！”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廣播站不斷地呼喊著，呼籲人們火速前往阻截炮兵第14師部隊。北京火車站距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炮兵第14師部隊的突然出現，讓學生組織感到震驚。越來越多的人回應學生廣播站的緊急呼籲，一批又一批湧向北京火車站，至少集聚了逾10萬人。炮兵第14師部隊陷入人海之中，寸步難行。北京軍區不得不命令炮兵第14師部隊停止挺進天安門廣場，撤回北京火車站，休整待命。

炮兵第14師部隊撤到了北京火車站第6月臺，該師參謀長劉萬隆傳令官兵們保持隊形，原地坐下休息。他自己卻憤憤不平，被眼前的圍堵景象惹火了。他是在首都長大的“老北京”，萬萬沒有想到，部隊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迎接部隊官兵的竟然是憤怒的責難、揮舞的拳頭和“不准鎮壓學生，回去！”

“解放軍滾回去”之類的口號。

官兵們一路奔波，又困又餓，疲勞已極。這些參加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輪戰，曾經被鮮花和掌聲簇擁著走過“迎

親門”、“凱旋門”的“新時代最可愛的人”，而今竟成了眾矢之的。在北京火車站內，無數的人群推擁著，騷動著，湧向部隊官兵。“一、二——回去！”的喊叫聲震耳欲聾。在北京火車站外，還有逾十萬的民眾呼應著。

炮兵第 14 師各級指揮官都站到了第一線，按照中國官方的宣傳口徑，向圍堵民眾解釋北京戒嚴的性質和意義，聲稱部隊進京不是要鎮壓學生，而是維護社會秩序，試圖緩解民眾的情緒，勸說民眾離去。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民眾接受他們的說法。師政委徐福安公然欺騙學生和民眾說：“大家靜一靜。我們是奉命警衛北京站，不是來鎮壓學生的。請大家積極配合，儘快散開。”一個青年當場揭穿他的謊言：“不要聽他胡說，剛才我還看見他們往天安門廣場沖。”

下雨了，毛毛細雨夾雜著初夏的涼意，徐徐襲來。炮兵第 14 師部隊此次是輕裝緊急進京，官兵們只有一件雨衣裹身，擁擠在站後街和露天的倉庫院內，饑困交加，疲憊的臉上充滿嚴肅而困惑的神情。圍堵的學生和市民連一件雨衣都沒有，但堅持不走，不少人身上的衣服都漸漸地濕透了。

5 月 22 日凌晨，當北京火車站的大鐘敲過午夜 1 點，天又開始下雨了，露宿的炮兵第 14 師官兵陸續入睡。集聚在月臺上的學生和民眾雖然也哈欠連連，十分疲倦，但始終沒有離去。

就這樣，一直到 6 月 3 日再次奉命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炮兵第 14 師進京部隊都被圍困在北京火車站內。

中國軍方的資料聲稱，在 5 月 24 日至 28 日的 5 天時間內，炮兵第 14 師進京部隊協助北京火車站勸說、疏導了 12 萬名外地學生離京返校，其中 3 千多名學生沒有出站就轉身乘車返回了學校。誰都知道，這個數字，對於首都北京當時的局勢，意味著什麼。

中共北京鐵路分局委員會在題為《發揮黨組織作用，保證“大動脈”暢通》的總結報告中寫道：

“5 月 21 日凌晨，滿載戒嚴部隊 2000 多名官兵的軍列開進北京站。在‘高自聯’策動下，十幾萬人把車站各進出站口圍得水泄不通，幾次強行衝擊。在車站面臨癱瘓，幾千名官兵、

幾萬名旅客、幾萬件行李包裹的安全受到威脅的緊急時刻，分局幾位負責同志帶著一百多名機關幹部火速趕到北京站，會同車站和公安段領導，採取各種措施，疏通車站各進出口通道，保證旅客上下。同時派出警力保護軍車，組織車站餐廳、列車段食堂，在採購條件困難、人員和設備都十分緊張的情況下，為官兵安排了食宿。經過 4 天 4 夜的努力，圍觀群眾才逐漸離去，在市中心保留了這支部隊，為 6 月 3 日快速進駐（天安門）廣場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節、挺進天安門廣場

1989年6月3日晚上，炮兵第14師指揮部成員一齊守候在直達北京軍區1號通訊台的軍隊保密電話機旁，等待部隊開進命令，臨時作戰值班室中的氣氛分外凝重。當天下午，北京軍區已經向炮兵第14師下達了部隊開進的預先號令。由師、團司令部軍官組成的三個便衣偵察組派出去了；由師政治部主任羅中江率領的先遣組派出去了；官兵們也已經緊急動員，集結待命，隨時可以出動。

晚上10點鐘整，北京軍區司令部用軍隊保密電話向炮兵第14師下達了命令：部隊立即行動，平息反革命暴亂，你們師的任務是佔領中國歷史博物館，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北京軍區將炮兵第14師配屬第24集團軍行動，在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的過程中，接受第24集團軍指揮。

炮兵第12師師長陳明義、師政委徐福安隨即向下傳令：部隊立即行動，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要不惜一切代價，到達天安門廣場，到達天安門廣場就是勝利。

北京火車站站前廣場大鐘指向晚上11點08分，炮兵第14師的兩千名官兵全副武裝，從北京火車站經東便門繞道出站，進入崇文門大街（屬於北京市崇文區），徒步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部隊出發時，子彈統一裝在子彈箱裏，由專人保管，尚未發給基層官兵。

晚上11點20分，炮兵第14師部隊剛剛接近崇文門路口，就被民眾堵住了，部隊的正面和兩側人山人海。群眾以公共汽車、拖斗卡車在崇文門路口築成路障，四處還有人群源源不斷地湧來。

炮兵第14師指揮部認為崇文門路口不允許部隊久留，也無退路可言，必須儘快離開。師長陳明義帶領幾名參謀人員來到隊伍最前面偵察，發現圍堵的群眾大都聚集在大街右側，交通隔離帶左側較為薄弱。回頭與師政委徐福安商量，決定調後續的兩個團部隊上來從左面穿插突圍。

事不宜遲。師參謀長劉萬隆隨即擠到隊伍中部，指揮後續部隊的一個團突然跨過交通隔離帶，從左側強力向前突進。民

眾見勢不好，立即擁向左側圍堵，後續部隊的另一個團從右側乘虛而入，強行突圍，形成兩個團部隊並進的強大攻勢，一舉突破，全速前進。

晚上 11 點 30 分，炮兵第 14 師部隊開進到崇文門西大街。這裏屬於北京傳統的鬧市區，居民人口十分密集，參與圍堵的民眾無以計數。又由於解放軍戒嚴部隊已經開槍鎮壓，民眾變得更加憤怒，更加激情，磚頭、石塊、玻璃瓶象冰雹似地紛紛飛向官兵。少數民眾手執棍棒，尾隨部隊一路追打。

中國軍方的資料聲稱：師長陳明義和師政委徐福安當時都受了傷，但沒有離開指揮位置一步。千余名官兵掛花了，其中 66 人重傷。但是，部隊官兵仍然奮勇向前，持續突破了 3 道封鎖線，40 多處路障。

晚上 11 點 50 分，炮兵第 14 師部隊開進到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東城區前門東大街 9 號）前面。兩千名官兵交替掩護，向西朝著天安門廣場方向衝擊。北京市公安局辦公樓上的門窗幾乎都打開了，公安人員看到這支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部隊，知道“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行動開始了，興奮不已，幾個月來的“委屈”和“不快”頓時煙消雲散，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和“解放軍萬歲”的歡呼聲。據說，炮兵第 14 師官兵受到極大的鼓舞，許多人禁不住熱淚盈眶。

晚上 12 點 20 分左右，炮兵第 14 師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路口。

6 月 4 日凌晨零點 10 分，炮兵第 14 師先頭部隊從東南角進入天安門廣場。民眾們前堵後追，官兵們全然不顧，一路吶喊，一路衝殺，左翼冲到天安門廣場北部“民主女神”塑像周圍，右翼冲到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掩護後續的四個團於 6 月 4 日凌晨零點 40 分佔領並封閉了中國歷史博物館。

炮兵第 14 師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外建立了臨時指揮部，兩千名官兵分佈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外的各級臺階上，休整待命，與千餘名群眾對峙著。

此時，炮兵第 14 師師與上級領導機關失去了通訊聯絡，正好遇上第 39 集團軍司令部炮兵參謀安衛平奉命身穿便裝前來聯繫第 39 集團軍部隊。師長陳明義對安衛平說：“安參謀，你出

去時順便幫我們找一下上級指揮部。我們都身穿軍裝，無法出去偵察。”“行。”安衛平痛快地答應下來。他憑著自己熟悉北京市內的道路，很快找到炮兵第 14 師的上級指揮部，隨後又返回給炮兵第 14 師傳達上級命令。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天安門廣場最後階段的清場行動開始了，炮兵第 14 師部隊奉命在天安門廣場東南方向的兩個路口設置警戒線，阻止週邊的學生和市民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周圍的數千名學生，配合其他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第五節、天安門廣場清場後的動向

1989年6月4日凌晨5點30分過後，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炮兵第14師的兩千名官兵奉命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外休整待命，官兵們一個挨一個地在臺階上排排坐著。該師指揮部設立在中国歷史博物館西門外南側的第一根門柱下，幾個廢紙箱堆在一起，成了簡易指揮台，師指揮部成員團團圍坐，研究設卡堵口的方案，他們已經兩天沒有合眼，沒有洗臉，沒有吃上一頓熱飯。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師後勤部趙助理員給師指揮部成員送來了饅頭和鹹菜，他說：“這是直升飛機剛剛運到的，請首長們快吃吧！”夜幕降臨，饑困交加的兩千名官兵仰臥在臺階上、走廊裏，進入了夢鄉。

從6月4日到6月6日，炮兵第14師部隊主要擔負警衛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任務，堵死經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入天安門廣場的通道。

6月5日晚上8點鐘，炮兵第14師部隊奉命在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西南路口、西交民巷設置警戒線和哨卡，執行執勤警戒任務。

6月6日至6月8日，炮兵第14師部隊負責警衛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

6月9日，炮兵第14師作為北京軍區的機動部隊，隨時準備執行保衛天安門城樓和中南海的任務。

6月10日下午，炮兵第14師師長陳明義、師政委徐福安奉命前往人民大會堂，接受北京軍區負責人的指示：立即率領部隊返回北京火車站，保衛北京火車站安全，隨時準備打擊“反革命暴徒”的破壞活動。

6月11日凌晨，炮兵第14師部隊重新出現在北京火車站的站前廣場。三天之後，北京市東城區政府予以大力協助，在北京火車站拆房待建的一片廢墟上搭建了一座蔚為壯觀的“帳篷城”，作為炮兵第14師部隊的臨時營房。此後，一直到奉命撤離北京，炮兵第14師部隊都駐紮在北京火車站。

炮兵第14師部隊進駐北京火車站，實際上是對北京火車站

實行了軍管，防止所謂的“動亂分子”、“暴亂分子”和“非法組織骨幹成員”乘火車外逃。很多 1989 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和骨幹，只得避開北京火車站，通過其他途徑逃離白色恐怖的北京。

炮兵第 14 師部隊在北京火車站擔任戒嚴執勤任務持續 53 天，擔負著東西從北京火車站到東大橋、南北從北京火車站的站前廣場到第六月臺，總共 55 個哨位的警戒執勤任務，先後派出 20 個小分隊沿著北京火車站站外 7 點 5 公里的鐵路線晝夜巡邏。每天晚上對北京火車站內的 7 個候車點實行封閉、清查。

此外，先後保障進京參加重要會議的 6 個省、市、自治區代表，以及部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平息反革命暴亂烈士”親屬進京和返回時的安全。其間，四次為中央領導人的專列擔任安全警戒任務，做到了萬無一失。

炮兵第 14 師部隊每天 6 班，每班 207 名官兵，在 18 個戒嚴執勤點上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員設卡盤查，9 次派出應急分隊端“黑窩”，共抓獲、收審非法組織骨幹、打砸搶分子 62 人；查獲攜帶反動宣傳品、軍用物資、兇器、子彈等非法分子 1106 人；收繳反革命傳單、錄影帶等 25000 餘份，軍用品、兇器、槍彈 358 件。

1989 年 8 月 3 日，炮兵第 14 師部隊結束北京戒嚴執勤任務，奉命撤離北京，返回原部隊駐地。

第六節、炮兵第 14 師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237 名官兵）

師長陳明義少將

師政委徐福安大校

副師長修先余

師副政委徐寶喜

師參謀長劉萬隆（北京人）

師副參謀長崔延賓

師政治部主任羅中江

師政治部副主任馬東才

師後勤部部長鞏國志（現在北京）

師後勤部副部長陸岩松

師政治部保衛科科长宋卯德

某團秦團長

某團少校股長徐玉璽

某團軍務股股長王中勝

營長陳書君

代理連長侯漢禮

炮兵第 37 團第 2 連連長譚樹強

第 3 班班長楊有明

班長魏明軒

士兵範文路

某部第 7 連志願兵李根長

中士杜宏斌

下士魏修林

副師長毛遠華（2001 年去世，時任衡水軍分區司令員）

師後勤部軍需科王永斌

師政治部秘書科科长王永生（河北省南宮市人。歷任炮兵第 14

師炮兵第 208 團政治處主任、政委、河北省藁城市武裝部政委、

中共河北省藁城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2007 年 4 月以來任藁

城市政協主席、黨組副書記。）

師司令部作戰訓練科參謀紀江峰
師司令部軍務科打字員朱朝漢（湖北省武漢市人）
師司令部後勤處軍需助理員張欽華
師司令部參謀張聖順（轉業後在山東省泰安市工作）
師軍務科保密員劉恒文（河北省衡水市人。曾任炮兵第 6 團政治處主任，轉業後在建設部工作。）
師通信連指導員李雲棟（歷任炮兵第 14 師司令部直工科副營職幹事、管理科協理員、炮兵第 14 師炮兵第 9 團副政委、炮兵第 14 師司令部管理科科长、師農場政委兼政治處主任。2003 年 8 月起任河北省唐山市檔案局副局長。）
師通信連士兵董峰（山西省永濟市人。1989 年兵，，退伍後在永濟電視臺工作。）
師通信連苗芳
師通信連炊事班班長汪建軍（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縣人）
師教導大隊大隊長李冰
師宣傳隊劉義（1988 年兵，退伍後在河北省秦皇島市工作。）
偵察連雷達站站長張樹文
偵察連士兵周建峰
師偵察連士兵范海民（1987 年兵）
師特務連連長彭愛軍
師特務連指導員段東紅
師特務連排長史占山（2001 年轉業到河南省開封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
師特務連士兵焦東方（山西省芮城縣人。1989 年兵，退伍後回芮城縣工作。）
師特務連司機班駕駛員何漢濤（河南人，1989 年兵）
師特務連通訊員荆永慶（山西省永濟市人，1989 年兵）

炮兵第 208 團司令部通信股股長張國文（1989 年底轉業，現在在山東省壽光市勞動局工作。）
炮兵第 208 團指揮連排長王家泉（已經去世）
炮兵第 208 團教導 2 營第 4 連指導員姜興國（河北省興隆縣人。歷任炮兵第 14 師炮兵第 6 團政治處組織股副營職幹事、炮兵

14 師政治部幹部科副營職幹事、正營職幹事、科長、第65集團軍裝備部直政處處長、第65集團軍步兵193師577團政委。2006年3月以來任北京市石景山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副調研員。)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士兵史永強(1988年兵)

炮兵第208團指揮連士兵孫躍光(山西省運城市人,1989年兵,1991年底退伍回運城市工作。)

炮兵第208團指揮連警衛排班長朱漢橋(湖北省武漢市人。1987年兵,1990年3月退伍,在武漢市蔡甸區工作。)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連長馮光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指導員田興泉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副連長曾德明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排長解貽友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排長張凱中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排長孫智才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士兵陸猛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士兵張智文(湖北省咸寧市人。1989年兵,1991年底退伍,在咸寧市建設銀行工作。)

炮兵第208團指揮連連長王加泉

炮兵第208團指揮連士兵朱偉(湖北省咸寧市人,2008年2月以前在沙城駐軍任營教導員。)

炮兵第208團指揮連士兵舒軍(湖北省咸寧市人)

炮兵第208團指揮連士兵姚偉

炮兵第208團指揮連士兵雲開峰

炮兵第208團指揮連士兵夏衛東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班長沈京湘(北京人,1987年兵)

炮兵第208團周平倫(河北省巨鹿縣人。1977年兵,1983年至1984年曾擔任第1營第3連副指導員。1994年調到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工作。)

炮兵第208團士兵龔小雷(1989年兵,退伍後在江蘇省儀征市公安局工作。)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3連士兵江運吉(山東濟寧市人,1988年兵)

炮兵第208團第1營第1連連長秦廣信

炮兵第 208 團第 1 營第 1 連指導員孫洪祥
炮兵第 208 團第 1 營第 1 連士兵楊志軍（1988 年兵）
炮兵第 37 團班長李明勝（江蘇省儀征市人，1987 年兵）
炮兵第 37 團通信連電臺報務員閻衛彬（1987 年兵）
炮兵第 37 團第 9 連士兵胡偉（1989 年兵）
炮兵第 37 團第 6 連士兵喻頌華（1989 年兵）
炮兵第 37 團第 6 連指揮排士兵朱昌學（1991 年底退伍，在河北省咸寧市工作。）
炮兵第 37 團第 2 營營部接力班士兵原曉東（山西省芮城縣人。1989 年兵，退伍後在山西芮城三門峽庫區管理局工作。）
炮兵第 37 團第 2 營營部接力班班長張向東（山東人）
炮兵第 37 團第 2 營營部接力班士兵蔣諍（河南省駐馬店市人）
炮兵第 37 團第 2 營營部接力班士兵施斌（河南省駐馬店市人）
炮兵第 37 團第 2 營營部接力班士兵谷未來（河南省駐馬店市人）
炮兵第 37 團第 2 營營部接力班士兵李海波（山西省永濟市人）
炮兵第 37 團第 2 營營部接力班士兵杜建華（山西省芮城縣人）
炮兵第 37 團第 5 連有線班班長劉海靖（山西省永濟市人，後來曾任炮兵第 37 團第 9 連連長。）
炮兵第 37 團第 6 連士兵馮興偉（湖北省武漢市人，1989 年兵）
炮兵第 37 團指揮連班長門榮河（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軍官王建善（曾任第 3 營營長）
炮兵第 37 團指揮連方輝（山東省冠縣人）
炮兵第 37 團第 6 連排長張萬彪（河北省懷來縣沙城鎮人）
炮兵第 37 團第 3 營營部無線電班班長黃敬東
炮兵第 37 團醫務所衛生兵蘭愛平（1987 年兵）
炮兵第 37 團醫務所衛生兵李麗（河南人，1987 年兵）
炮兵第 37 團醫務所衛生兵白濤（河北省石家莊市人，1987 年兵）
炮兵第 37 團醫務所衛生兵鄭微微（河北省宣化市人，1987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萬志強
炮兵第 37 團第 3 營第 8 連班長張玉良（河北省保定市人）
炮兵第 37 團第 5 連士兵殷朝波（湖北省嘉魚縣人）
炮兵第 37 團第 6 連士兵喻頌華（湖北省咸寧市人）

炮兵第 37 團第 1 營第 1 連連長周旺烘（江蘇人，1993 年）
炮兵第 37 團第 1 營第 1 連副連長缺姓名（河北人，1993 年）
炮兵第 37 團第 1 營第 1 連指導員王文鋒（河北人，1993 年）
炮兵第 37 團第 7 連指揮排排長趙國慶
炮兵第 37 團第 7 連偵察班班長朱昌學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岩（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趙戰凱（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武占利（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安耀軍（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大永（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趙永生（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徐建軍（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徐木生（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劉國年（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劉建明（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徐順國（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王銀生（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王志勇（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王建同（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劉振甫（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張運強（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邱四新（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王文巨（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青江（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保利（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劉順（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雙良（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霍立柱（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楊玉茗（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章樂（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安國英（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周樹國（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冉兵武（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春田（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郝自喜（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門榮河（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張洪海（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王長江（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霍沛（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劉玉樂（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張玉良（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任全軍（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尙紅（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蔣林納（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申虹運（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李歌（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王新來（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賈冷冰（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米立志（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劉新來（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張老六（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何匯全（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丁福金（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37 團士兵申運街（河北省清苑縣人，1986 年兵）

炮兵第 10 團團長王國章

炮兵第 10 團政委魏雙來

炮兵第 10 團第 3 營第 8 連班長倪新傑（退伍後在河南省南陽市建設銀行工作）

炮兵第 10 團第 7 連士兵劉剛（1989 年兵）

炮兵第 10 團王紹淳

炮兵第 10 團副連長魏兆忠

炮兵第 10 團第 1 營第 2 連胡新春

炮兵第 10 團楊成英（在河北省邢臺市工作）

炮兵第 10 團小車班司機李穎

炮兵第 10 團第 8 連司機班駕駛員許志剛（1987 年兵）
炮兵第 10 團第 8 連司機班駕駛員呂士武
炮兵第 10 團第 8 連司機班駕駛員金明旺
炮兵第 10 團打字員葉其（1989 年退伍，在河南省南陽市建設委員會工作）
炮兵第 10 團第 6 連連長李曉光
炮兵第 10 團排長修永芳（山東人，轉業後在山東省海陽市物價局工作。）
炮兵第 10 團第 9 連士兵王波（在山西省運城市工作）
炮兵第 10 團第 3 連班長王旭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7 年兵）
炮兵第 10 團第 7 連連長劉世保
炮兵第 10 團士兵李廣兵
炮兵第 10 團指揮連士兵張會軍
炮兵第 10 團第 9 連士兵宮文廣
炮兵第 10 團指揮連士兵張惠軍
炮兵第 10 團第 3 營第 7 連士兵李軍（安徽省蚌埠市人）
炮兵第 10 團衛生隊衛生員郭勇彪（現在山西省晉中市中國銀行）

炮兵第 6 團參謀長陳成義（轉業後在北京工作）
炮兵第 6 團教導員劉秀嶺（轉業後在北京公安部門工作）
炮兵第 6 團軍官楊占嶺（在河北省南和縣檢察院工作）
炮兵第 6 團軍官姜貴坡
炮兵第 6 團軍官邢有露
炮兵第 6 團軍官李保亭
炮兵第 6 團軍官陳景印
炮兵第 6 團軍官楊金平（曾任炮兵第 6 團後勤處處長，轉業後在北京市昌平區工作。）
炮兵第 6 團軍官呂勝軍
炮兵第 6 團軍官周路達（轉業到河北省安國市交警大隊工作）
炮兵第 6 團軍官方文生（1993 年轉業到山東省德州市工作）
炮兵第 6 團指揮連偵察排士兵張忠軍（1988 年兵）
炮兵第 6 團第 2 營營長馬金社（曾任炮兵第 6 團第 3 營營長、
炮兵第 6 團團長）

炮兵第 6 團衛生員蘇敏勝（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軍官張國斌（曾任營長）
炮兵第 6 團第 2 營周鳳錄（1999 年轉業到河北省唐縣。）
炮兵第 6 團汽車連士兵黃勇（1987 年兵）
炮兵第 6 團第 2 營第 6 連指揮排排長曹修立（河南省新鄉市人。
2003 年自主擇業離開軍隊，在新鄉市海員服務局工作。）
炮兵第 6 團第 9 連軍官方文生（1984 年兵，曾任第 9 連指導員，
轉業後在山東省德州市工作）
炮兵第 6 團第 2 營第 6 連指導員李建中（山東人）
炮兵第 6 團第 9 連士兵邱志勇（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司令部參謀李天印（調到軍事博物館、解放軍總政
治部宣傳處工作）
炮兵第 6 團連長許水利（現任河南省許昌市環保局局長）
炮兵第 6 團第 2 營第 4 連排長張志勇（2006 年轉業到安徽省省
直機關工作）
炮兵第 6 團排長王運喜（河南人）
炮兵第 6 團政治處幹事田青春（河南人）
炮兵第 6 團士兵張長青（河南省駐馬店市人，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衛生隊軍醫姚民修（轉業到北京民政局工作）
炮兵第 6 團士兵江大海（山東省濟寧市人，1988 年兵）
炮兵第 6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朱幫華（湖北武漢人，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司令部參謀賈山崗
炮兵第 6 團士兵景鵬（山西省芮城縣人，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士兵徐懷之（湖北人，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第 1 營第 1 連士兵劉武（北京人，1988 年兵）
炮兵第 6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張衛東（河南駐馬店市人，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士兵王濤（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士兵馬雲龍（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第 1 營第 3 連士兵江永紅（四川人）
炮兵第 6 團秦聯柱（曾任團長）
炮兵第 6 團田凡（曾任團長）
炮兵第 6 團第 1 營第 2 連第 5 班士兵楊東偉（河南駐馬店市人，

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士兵李鵬民 (山西省芮城縣人, 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士兵王飛 (山西省芮城縣人, 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士兵韓江坡 (山西省芮城縣人, 1989 年兵)

炮兵第 6 團指揮連士兵張永平

炮兵第 6 團汽車連王景文 (河北省大名縣人, 現在河北省魏縣電力局工作)

炮兵第 6 團汽車連範東起 (河南省新鄉市淇縣人)

炮兵第 6 團士兵陸猛 (江蘇人, 北京市西城區展覽路城管分隊)

炮兵第 6 團士兵葉建超 (江蘇人)

炮兵第 6 團士兵嚴鴻斌

炮兵第 9 團第 2 營第 5 連連長周書軍

炮兵第 9 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張豔生

炮兵第 9 團第 2 連士兵陳加森 (天津市人, 1989 年兵)

炮兵第 9 團第 2 連士兵劉純 (1989 年兵)

炮兵第 14 師士兵金學東 (湖北省紅安縣人, 1987 年兵)

某團士兵盛海忠 (1989 年兵)

某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禹輝

某團第 2 營士兵楊墨

第十三章、陸軍第 28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28 集團軍概況

第 28 集團軍是首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但是，中國官方有關“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宣傳資料，幾乎隻字不提第 28 集團軍。在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眼中，第 28 集團軍是解放軍戒嚴部隊中表現最差的一支部隊。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第 28 集團軍沒有一支所屬部隊被中央軍委授予榮譽稱號或記功，也沒有官兵成為“共和國衛士”。同樣的情況只出現於第 12 集團軍。第 12 集團軍於 6 月 4 日凌晨才奉命緊急空運進京充當預備隊，沒有參與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不具有建功立業的機會。第 28 集團軍有機會建功立業，可就是不好好把握，出工不出力。有人說，這也正是第 28 集團軍於 1998 年被撤銷番號的主要原因之一。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28 集團軍隸屬於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山西省大同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1361”。何燕然少將任軍長，張明春少將任軍政委，杜東海少將任副軍長，楊惠川大校任軍副政委，邱金凱大校任軍參謀長，蘇雲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28 集團軍的前身是國共內戰時期的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 10 縱隊，由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山東軍區屬下的渤海軍區部分部隊發展而來。

抗戰勝利後，八路軍渤海軍區主力部隊大部分奉中共中央之命挺進東北，搶佔地盤，剩餘部隊編成渤海軍區特務第 1 團、特務第 2 團、警備第 6 旅第 11 團、警備第 7 旅第 13 團和第 14 團、警備第 8 旅第 17 團。1946 年 6 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7 月，渤海軍區以特務第 1 團、特務第 2 團和警備第 7 旅第 13 團，組成山東解放軍第 7 師。10 月，華東軍區成立渤海軍區前線指揮部，11 月以警備第 6 旅第 11 團、警備第 7 旅第 14 團、警備第 8 旅第 17 團，組成山東解放軍第 11 師。

1947年1月下旬，山東野戰軍和解放軍華中野戰軍統一整編，成立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又稱第3野戰軍）。2月，渤海軍區第7師、第11師合編為華東野戰軍第10縱隊，宋時輪任司令員，景曉村任政委，劉培善任副政委，趙俊任參謀長，蕭望東任政治部主任。第7師、第11師依次改稱第28師、第29師，同時組成縱隊直屬特務團，共有116000多名官兵。

第10縱隊組建後即參加萊蕪戰役，在錦陽關及其以北區域阻援，保證主力部隊殲滅國民黨軍隊李仙洲兵團。1947年4月下旬，配合其他部隊發起泰安戰役。5月，參加孟良崮戰役，於萊蕪以北地區阻援，保證主力部隊全殲國民黨軍隊整編第74師。6月底後，奉命參加外線出擊，掩護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進軍大別山。9月至11月，參加沙土集戰役和隴海路破擊作戰。

1948年2月，第10縱隊改歸晉冀魯豫野戰軍指揮，越過隴海路，挺進豫皖蘇邊區作戰。3月，攻佔安徽省太和、渦陽等地。4月，進至平漢路南段作戰，攻佔河南省汝南、駐馬店、確山等城鎮。5月，參加宛西戰役、宛東戰役。6月，華東野戰軍發起開封戰役，第10縱隊調歸華東野戰軍建制，由平漢路東進至上蔡，參加阻擊增援開封的國民黨軍隊胡璉兵團。6月下旬起，參加睢杞戰役，在杞縣東南桃林崗頑強阻擊5晝夜，保證主力部隊殲滅國民黨軍區壽年兵團。9月，參加濟南戰役。同年冬，參加淮海戰役，先在徐州以東阻援，保證主力部隊圍殲國民黨軍隊黃百韜兵團，繼而又參加圍殲國民黨軍隊杜聿明集團。

1949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和部隊番號的命令，華東野戰軍第10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8軍，隸屬於華東野戰軍第10兵團，朱紹清任軍長，陳美藻任軍政委，蕭鋒任副軍長，吳肅任軍參謀長，吳嘉民任軍政治部主任。第28師改稱第82師，第29師改稱第83師，第30師改稱第84師。全軍共有34000多名官兵。

1949年4月，第28軍參加渡江戰役，于江陰以西登陸後，佔領戚墅堰，切斷京滬路，連克宜興、長興、吳興。5月，參加上海戰役，攻克太倉、嘉定、羅店等城鎮，協同其他部隊攻克吳淞。7月，進軍福建，10月，參加福州等戰役，攻克閩清、福州，以及平潭、大練島、大小嶠島等島嶼。

1949 年 10 月，第 28 軍發起金門戰役，以失利告終。登陸金門的 9000 多名官兵或戰死或被俘，無一倖免。

1949 年底，第 28 軍在福建執行剿匪等任務。1952 年 5 月，第 28 軍駐紮福建省莆田，隸屬於福建軍區。

1969 年 11 月 20 日，中蘇發生珍寶島衝突事件，爲了加強首都北京周邊地區的軍事防衛力量，第 28 軍於 1971 年從福建省莆田調防到山西省侯馬市，隸屬於北京軍區。1985 年，第 28 軍調防山西省大同市，第 84 師撤銷番號。

1985 年，第 28 軍改編爲陸軍第 28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82 師（當時部隊代號“51366”）、步兵第 83 師（當時部隊代號“51371”）、步兵第 205 師（第 69 軍撤銷番號後調歸第 28 集團軍建制，當時部隊代號“51082”），共計三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第 7 師（當時部隊代號“52875”）、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362”）、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1363”）、工兵團、通信團（當時部隊代號“51365”）、偵察營等部隊。

1998 年，第 28 集團軍撤銷建制，步兵第 82 師縮編爲摩托化步兵第 82 旅，改歸第 63 集團軍建制。坦克第 7 師改編爲裝甲第 7 旅，改歸第 65 集團軍建制。步兵第 83 師改編爲山西省陸軍預備役第 83 師。步兵第 205 師縮編爲旅，改歸內蒙古軍區建制，炮兵旅、高射炮兵旅撤銷番號。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28 集團軍由於在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眼中，是解放軍戒嚴部隊中表現最差的一支部隊，因此，在中國官方事後宣傳“平息反革命暴亂”成果的資料中，幾乎不見該集團軍的蹤影，搜集該集團軍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的有關資料非常困難。

第 28 集團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包括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83 師和部分集團軍保障分隊，由軍長何燕然少將、軍政委張明春少將、軍參謀長邱金凱等人組成集團軍前進指揮部，指揮率領進京部隊。

步兵第 82 師師部駐地在山西省大同市，該師屬於乙類編制步兵師，下轄步兵第 244 團（當時部隊代號“51367”）、步兵第 245 團（當時部隊代號“51368”）、步兵第 246 團（當時部隊代號“51369”）、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370”），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高射炮兵營、汽車營、工兵連、警衛連、偵察連等部隊。

步兵第 83 師師部駐地在山西省原平縣，該師也屬於乙類編制步兵師，下轄步兵第 247 團（當時部隊代號“51372”）、步兵第 248 團（當時部隊代號“51373”）、步兵 249 團（當時部隊代號“51374”）、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375”），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高射炮兵營、汽車營、工兵連、警衛連、偵察連等部隊。

1989 年 5 月 18 日，第 28 集團軍接到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預先號令，要求做好部隊緊急出動的準備。當天，軍長何燕然奉命緊急趕赴北京軍區司令部當面聽取指令，部署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事宜。時間緊，任務急，何燕然率領集團軍前進指揮部部分成員乘坐軍用直升機來回奔波。

軍長何燕然連夜從北京趕回軍部駐地山西省大同市，立即召開集團軍黨委緊急會議，傳達部隊進京命令，研究部隊開進方案。與會者包括集團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的負責人，以及各師師長、政委。黨委緊急會議結束後，該集團軍所屬各部紛紛緊急收攏部隊，對官兵們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籌備部隊

開進的各項工作。

5月19日，第28集團軍進京部隊官兵全副武裝，乘坐裝甲運兵車、軍用卡車、吉普車，分別從山西省大同市、原平縣駐地出發，沿著京原公路（北京市——太原市）向北京摩托化長途開進。

一路上，部隊車隊的開進還算順利，基本上沒有遇到民眾的阻攔。但是，部隊車隊一進入北京郊區，就遭遇到大批民眾的強力阻攔，無法按照預定的開進方案，進入北京城內的預定戒嚴執勤地點。後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命令第28集團軍進京部隊暫停向北京市內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開進，就地休整待命，臨時駐紮在北京市延慶縣。

在休整待命期間，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負責人，北京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的負責人，分別前往第28集團軍進京部隊的臨時駐地視察、探望。

遵照中央軍委和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統一部署，第28集團軍對進京部隊官兵實行全封閉管理，不許隨意出臨時駐地半步，不許與圍堵的學生和民眾接觸、交談，集中學習中央軍委和中共中央有關領導人的講話，認清北京“動亂”的實質，堅決服從中央軍委和中共中央的命令。

包括集團軍政委張明春在內的各級政工幹部，紛紛下部隊給官兵們做政治思想動員工作，要求官兵們人人明確表態，堅決執行北京戒嚴任務，不辜負中央軍委和中共中央的期望。有資料顯示，軍政委張明春一一走訪了所屬各師、團，與師、團幹部進行交談。

在對官兵們進行政治思想動員的同時，第28集團軍按照上級的要求，積極進行軍事方面的準備，為部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預備了多套方案，多條開進路線。軍、師、團級主要指揮官，以及司令部參謀人員，按照上級領導機關的規定要求，多次化裝進入北京市區和天安門廣場，實地勘察部隊開進路線、道路交通和沿途社情。

在6月2日以前，第28集團軍已經做好部隊開進，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一切準備工作。

第三節、奉命挺進天安門廣場受阻

1989年6月3日，第28集團軍接到解放軍戒嚴指揮部的命令：部隊立即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第28集團軍指揮部立刻召開緊急作戰會議，傳達部隊命令，部署部隊開進方案。

當天傍晚，第28集團軍部隊在軍長何燕然、軍政委張明春、軍參謀長邱金凱等人指揮率領下，全體官兵全副武裝，乘車從北京市延慶縣的臨時駐地出發，向北京城內摩托化開進。一路上不斷受到民眾的強力阻攔，部隊開進異常艱難，行動遲緩，沒能按照預定的時間進入北京城內。

一直到6月4日清晨，第28集團軍部隊車隊才進入北京城內，沿著西長安街由西往東向天安門廣場進發。這時，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已經結束。由於第38集團軍部隊於6月3日夜晚至6月4日凌晨在西長安街上大開殺戒，加上坦克第1師的坦克車隊剛剛在六部口製造了追軋學生撤離隊伍慘案，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被激怒了，聚集在西長安街上抗議，而且源源不斷地有民眾聞訊趕來聲援。

第28集團軍車隊抵達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時間大約是6月4日清晨7點鐘，正好遇上民眾的抗議高潮，男女老少悲憤不已，擠滿街道。部隊車隊陷於人海之中，停滯不前。

經歷了血腥鎮壓之夜，西長安街上的景象不能不令第28集團軍官兵感到震驚，似乎是經歷了一場激烈的戰爭：黑煙瀰漫，空氣中充滿刺鼻的氣味。處處可見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裝甲車軋扁，或被衝撞得東倒西歪；焚燒過後的公共汽車殘骸四處分佈，磚石碎塊遍地；道路兩邊的樓房牆上彈孔累累，地鐵站的玻璃上也有許多彈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28集團軍先頭團的車輛受阻於木樨地橋頭西側地段，起初曾經試圖突圍。營長周美清指揮019號裝甲車從車隊後側插上來，先後7次採取高速撞擊、低速推擠的方式，都沒能衝開路障。兩輛橫在路上的公共汽車死死抵住路邊臺階根部，019號裝甲車的駕駛員徐棒田雖是特級駕駛員，具有10年軍齡，也只能無奈地對營長周美清搖了搖頭。周美清轉動潛望鏡，看見

裝甲車的左側是兄弟部隊的車輛，右側是高壓電線杆，尾部又被 429 號裝甲車頂住了，前進無路，後退不得。

一看 019 號裝甲車停住不動了，街道右側路邊的民眾趁機蜂擁而上，頃刻之間，019 號裝甲車的潛望鏡被敲碎砸爛。“砰、砰、砰……”隨著十幾個土制燃燒瓶的破碎聲，019 號裝甲車著火燃燒了。營長周美清趕緊下達命令：“準備滅火。”駕駛員徐棒田迅速打開裝甲車天窗站起來，上身剛探出車外，半截磚頭就迎面打中他的額頭，當即血流滿面，倒在駕駛座上。

緊接著，三顆軍用瓦斯彈從駕駛窗滾進 019 號裝甲車，車內頓時煙霧瀰漫。不一會，官兵們就感到肺部象撕裂了一樣，呼吸急促，頭暈目眩。周美清距離軍用瓦斯彈最近，中毒最重，已經渾身無力。但他心裏明白，車內黃煙滾滾，人員中毒馬上就會昏迷；車上烈火熊熊，油箱隨時可能爆炸，不能坐以待斃。他一邊劇烈地咳嗽著，一邊上氣不接下氣地命令大家：“同志們，帶上輕……輕武器，保護好傷……傷患，我們徒步前進！”

清晨 7 點鐘過後，開始有憤怒的民眾焚燒裝甲車，很快就有幾輛裝甲車被點燃。一群民眾爬上一輛裝甲車，揭開蓋子，叫車內的官兵出來，但官兵不肯聽從，十幾個民眾將官兵一一拽出來，另有一些民眾擁上去毆打，嚇得官兵拼命逃跑，一些民眾緊追不放，繼續毆打。在場的學生們見狀，站出來阻攔，高喊：“不要打！不能打！”並與一些市民組成警戒線，形成一個“保護圈”，讓官兵們集中坐在其中。

這些學生和市民一面阻止人們毆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講述發生在西長安街的屠殺情景。驚魂甫定的官兵低頭默默傾聽學生和市民的悲憤敘述。聽著聽著，有的官兵終於忍不住插話說：“真想不到是這樣，真是太慘了！”

挨打的官兵來自于先頭開路的幾輛裝甲車，有十多人程度不同地受了傷，包括營長周美清、駕駛員徐棒田、通信員魏強、步兵營副營長王長柱、步兵第 2 連排長張拜、步兵第 3 連技術員呂金武，他們先被送到附近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機關大院（北京市海澱區復興路 4 號，位於木樨地立交橋西南側），然後轉送到解放軍 307 醫院。當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保衛處處長帶領十幾名人員在現場救護官兵。

其他裝甲車、軍用卡車上的官兵基本上沒有挨打，一些官

兵下車後很快進入了學生和市民自動形成的“保護圈”。很多槍支落到了民眾手裏，卸掉子彈夾後交給在場的學生，學生又還給“保護圈”中的官兵。有官兵說，在出發前接受了不准向群眾開槍的命令，子彈放在子彈箱裏，槍膛中沒有子彈。

圍堵的民眾數不勝數，第 28 集團軍的龐大車隊雖然延續好幾里地，但仍然陷入人海之中。民眾不分男女老少，將每一輛軍車團團圍住，紛紛敘述軍隊開槍屠殺情景，許多人說著說著，泣不成聲。

一開始，官兵們大多不相信民眾所說的軍隊開槍屠殺情景，他們強調“人民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眾開槍”。於是，一些年輕人跑到附近的復興醫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28 軍官兵不相信軍隊會向群眾開槍。”復興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 14 號，臨近西長安街，是收留死傷者最多的醫院之一，整座醫院從裏到外，血跡斑斑。

這些年輕人從復興醫院拿到血衣，飛快返回西長安街，展示給官兵們看。血的事實立刻震撼了整個第 28 集團軍，導致軍心渙散，當場就有許多士兵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甚至有士兵把槍支扔進護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橋有七、八十輛軍車，所有官兵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與民眾混在一起，傾聽民眾述說，整個部隊失去控制。

6 月 4 日上午 10 點鐘左右，憤怒的民眾又開始焚燒裝甲車和軍用卡車，官兵們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動傳授快速點燃裝甲車的方法。現場有學生揮舞旗子叫民眾後退，說軍車的汽箱要爆炸。被點燃的裝甲車、軍用卡車越來越多，一時間，從木樨地到軍事博物館的街路段上火光熊熊，濃煙沖天。

第 28 集團軍總共被燒毀了 74 輛軍車，其中包括 31 輛裝甲車和 2 輛通訊電臺車，是解放軍戒嚴部隊中軍車被燒最多的一支部隊。

到了中午 12 點 30 分左右，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總指揮劉華清指令空軍司令員王海派遣一架軍用直升機，飛到木樨地至軍事博物館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滯不前的第 28 集團軍部隊反復傳達中央軍委的命令：“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反擊！”這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的命令。一

時間，氣氛再度緊張起來。不少民眾對著軍用直升機怒罵，就連一些官兵也指著軍用直升機罵道：“你他媽的還飛什麼飛？”

軍用直升機盤旋不去，重複廣播中央軍委的命令。但是，第 28 集團軍部隊始終置之不理，沒有再前進一步，相反，有一個士兵（一說是退伍軍人）開著裝甲車，用高射機槍向軍用直升機掃射。槍聲一響，軍用直升機就跑了。

中國軍方的資料聲稱，第 38 集團軍步兵第 113 師炮兵團政治處保衛幹事王強少尉，第一個報告裝甲車隊在木樨地受阻被燒的情況，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於是才出動直升飛機，低空盤旋，通過高音喇叭指示受阻部隊如何對付“反革命暴徒”。直升飛機低空盤旋時，王強看到幾個“暴徒”在搜集高射機槍子彈，揚言要打下飛機。立即打電話報告情況。“暴徒”們後來果真開動一輛裝甲車對空射擊。當時的情景，軍用直升機上的攝像機錄得清清楚楚。每個“暴徒”的嘴臉及其說話聲都記錄在案。由於得到王強的報告，飛機不再低空盤旋，但攝像機卻因此更為忙碌地工作，從不同的角度盯住猖獗的“暴徒”及其幫兇。”【注釋 1】

圍堵的學生和民眾與停滯不前的第 28 集團軍官兵相處得越來越友好，相互交換了許多情況，一些官兵打開槍膛給民眾看，裏面沒有子彈。不少民眾主動給官兵們送來了食物和飲料。

一直到了 6 月 4 日下午 5 點鐘，第 28 集團軍部隊不但沒有往前推進一步，反而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軍事博物館。

在所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中，第 28 集團軍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沒有抵達上級所指定的戒嚴執勤位置的部隊。

【注釋 1】參見《太陽系裏一顆星——記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的某部幹事王強》一文，刊載于《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彙編》一書第 100 頁至 111 頁。

第四節、軍長何燕然軍政委張明春消極抗命

第 28 集團軍部隊為何行動遲緩？為何在西長安街停滯不前？其原因主要是軍長何燕然、軍政委張明春帶頭消極抗命。在 2004 年劉亞洲的一份內部演講稿外泄之前，外界對何燕然、張明春帶頭消極抗命一事始終一無所知。

劉亞洲身為前中國主席李先念的女婿，長年在解放軍中任職，現任解放軍空軍副政委，中將軍銜。他在擔任武漢軍區空軍政委期間，曾在雲南某空軍基地給營級以上軍官作過一次題為“信念與道德”的內部演講，其中提到：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第 28 集團軍部隊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遭到民眾攔阻，乘坐同一輛裝甲指揮車的軍長何燕然和軍政委張明春（劉亞洲沒有提到張明春的名字），不但不按照上級命令率領部隊強行開進，反而順勢停滯不前。兩個人神態輕鬆，有說有笑，何燕然作勢手搭涼棚往前一看，說了一句：“遍地青紗帳”。張明春緊接了一句：“十萬青年十萬軍”。

劉亞洲評論說“什麼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紗帳一樣。這不是把自己當鬼子了嗎？他那個政委也是夠操蛋的。政委還來了一句：十萬青年十萬軍。兩個人還在那裏做詩。”劉華清副主席（劉華清時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後來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叫空軍王海司令員派直升機向他們喊話：“前進前進！不顧一切前進！”軍長何燕然根本不聽，還對軍政委講，將來上軍事法庭，你去還是我去呀。後來劉華清副主席非常生氣，說了四個字：龜不出頭。

劉亞洲具有報告文學作家身份，演講時難免添加一點文學色彩，但所說的情況屬實。

當時，第 28 集團軍從上到下，特別是高級軍官，基本上都與何燕然、張明春持相同態度，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可以這麼說，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的抗命行動純屬個人行為，雖然第 38 集團軍內部也有不少人對部隊多次奉命進京執行鎮壓任務，但在徐勤先被撤職逮捕後，代軍長張美遠等人就改而採取積極執行鎮壓任務的態度，以免遭遇象徐勤先那樣的命運。而第 28 集團軍部隊的消極抗命行動，則屬於

高級指揮官的集體行爲，所以才導致整個部隊軍心渙散，沒能完成任務。

曾有消息說，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第 28 集團軍有許多師、團級的軍官被捕並判刑。這個消息未經證實，不可輕信。不過，有資料證明，中共高層事後對第 28 集團軍進行了歷時半年的清查整頓，處理結果是：1989 年 11 月，軍一級指揮官均被調離野戰軍部隊，受到降職使用的處分，整個軍部被一鍋子端掉了。何燕然降職調任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張明春降職調任吉林省軍區副政委。

相較於第 38 軍軍長徐勤先，對何燕然等人的處分顯然算是輕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執行命令”的罪名處罰，而何燕然等人則是以“執行命令不力”的理由處分；其二，徐勤先獨自承擔責任，第 38 集團軍無人與他分擔責任，而何燕然等人則是集體承擔責任，整個集團軍領導層扛起責任。事發之時，何燕然雖曾對張明春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過，事後不知道是該我還是該你上軍事法庭。事實上，事後不僅是何燕然、張明春沒有推卸責任，就連其他的集團軍負責人也沒有推卸責任。

一位原第 28 軍副軍長（曾任軍參謀長）的女兒（曾任第 28 集團軍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軍醫）透露說：“何燕然、張明春因 89 年六四動亂，指揮錯誤，雙雙降職。”

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頓過程中表現不佳的只有步兵第 82 師師長林尊龍（人稱“林胖子”），爲了個人前程，有“不良行爲”，後來升任第 27 集團軍參謀長。一些當年第 28 集團軍的營、團級軍官至今對林尊龍有微言，而對何燕然、張明春充滿尊敬。

與徐勤先一樣，何燕然、張明春本來屬於前途看好的解放軍少壯派將領，兩個人剛剛在 1988 年 9 月晉升少將軍銜，仕途正處於上升時期。何燕然於 1988 年 11 月由天津警備區副司令員升任第 28 集團軍軍長，張明春於 1988 年 2 月由第 2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升任第 28 集團軍政委，兩個人都升遷新職不久。

張明春出生於 1938 年 5 月，黑龍江省呼蘭縣人。1955 年 8 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任戰士、副排長、排長、作戰訓練

參謀、幹部科助理員、幹事、秘書、幹部處副處長、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第 2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

張明春瀟灑倜儻、口才極佳，深受部屬喜愛。非常不幸的是，張明春在降職調任吉林省軍區副政委一年後病逝。

何燕然的個人簡歷至今尚未搜尋到。筆者經多方打聽瞭解，得知他的現況尚可。據一位曾經探視過他的老部下透露，他在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任上退休後，定居在天津市的一個軍隊幹部休養所，1997 年曾回過第 28 集團軍看望老部屬。

在當年第 28 集團軍的領導人中，只有軍參謀長邱金凱還算幸運。邱金凱年輕有為，1984 年 1 月，不到 38 歲就升任第 69 軍參謀長，1985 年 7 月升任第 28 集團軍參謀長。邱金凱在調離野戰部隊，擔任貴州省軍區參謀長多年後，于 1993 年重新調回野戰部隊，升任第 27 集團軍副軍長，同年晉升少將軍銜。1994 年，升任第 27 集團軍軍長。在正軍職位置上一待便是 10 年，2004 年 12 月才由北京軍區裝備部部長升任北京軍區參謀長，一年後升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第五節、第 28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259 名官兵）

軍長何燕然少將

軍政委張明春少將

副軍長杜東海少將

軍副政委楊惠川大校

軍參謀長邱金凱大校

軍副參謀長賴世平（1989 年轉業）

軍政治部主任蘇雲大校

營長周美清少校

裝甲車特級駕駛員徐棒田

通信員魏強

步兵營副營長王長柱

步兵第 2 連排長張拜

步兵第 3 連技術員呂金武（以上官兵同屬一個團）

步兵第 82 師師長林尊龍大校

步兵第 82 師副師長張懷泗大校（後接任師長）

步兵第 82 師政委俞深盛

步兵第 82 師副政委張連仁

步兵第 82 師政治部主任尋文平

步兵第 82 師政治部副主任薛振蘭

步兵第 82 師後勤部部長劉寅傑

步兵第 82 師後勤部政委余瑞德

步兵第 82 師參謀長吳善才

步兵第 82 師副參謀長吳生體

步兵第 82 師炮兵指揮部主任陳芳福

步兵第 82 師政治部科長黃傳貞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于海祥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郭俊清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3 連副連長趙紫信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營長樊福生少校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教導員徐會少校（1989 年 10 月轉業）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副營長盧朝陽上尉（1989 年 10 月轉業）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長吳善雙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長余君秀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長王志紅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韓成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吳禮鎖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王進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張壽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馮善傑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成占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徐友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孫繼彪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袁世銀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軍士胡國存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1 連連長劉玉成上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1 連副連長郭虎生上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1 連指導員賈新建中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2 連指導員馮文林上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2 連連長趙甫仁中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2 連副連長錢小富少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3 連指導員王丙鎖上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3 連連長李遵祥上尉（轉業至山西省大同市勞動局鍋檢所工作）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3 連副連長楊俊清少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第 1 連排長薛漢平中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營直排長王文傑中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助理員董玉樹少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侯德林上尉（後升任副營長）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袁進學中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蔡永雲少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韓利先少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田海平少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王小勇少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李英明少尉
步兵第 82 師獨立高炮營營部通信員楊華維（河北省大廠縣人，
1989 年兵）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3 連士兵王立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 3 連士兵表衛東（河北石家莊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3 連士兵李忠（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3 連士兵劉文昌（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3 連士兵杜文斌（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3 連士兵成清河（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3 連班長王益富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士兵高懷國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3 連士兵陳濤（1988 年兵）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3 連士兵胡永文（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第 1 連連長張喜成（歷任步兵第 82 師通信
營副營長、營長、步兵第 82 師司令部直工科科長。1999 年轉業，
歷任河南省駐馬店市公安局控申科副科長、政治部組教科科
長、警令部主任。）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無線連士兵毛瑞亮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副營長雲志偉（內蒙古人）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無線連士兵李挺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無線連士兵王大好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總機班麻燕（山西省大同市人）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總機班陳遠臨（江西省贛州市人）

步兵第 82 師通信營總機班梁翠書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連長王國明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副連長王振海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呂東明（湖北省武漢市人）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馬力銳（湖北省武漢市人）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鄭漢穆（湖北省武漢市人）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何世偉（湖北省武漢市人）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宋展新（山西人）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崔海軍（山西人）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張建錄（山西人）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吳謹（甘肅人）
步兵第 82 師警衛連士兵李國亭（山東人）
步兵第 82 師警調連士兵趙丙雪
步兵第 82 師偵察連王中華（四川人）
步兵第 82 師偵察連指導員周湘
步兵第 82 師指揮連士兵武生新（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工兵營第 2 連士兵周亞飛（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工兵營第 2 連連長沈安民
步兵第 82 師後勤部汽車連連長張利軍（河北省圍場縣人，轉業到北京工作）
步兵第 82 師後勤部運輸科科長王祿俠（山西人，1989 年立二等功）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連長金春發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指導員王音奇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女兵排長李涵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士兵郝畔勇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士兵王亞東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士兵李涵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士兵李跚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士兵雷付明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士兵寥波
步兵第 82 師後通連士兵張志增（河北人）
步兵第 82 師文藝隊馬紅豔（山西省太原市人）
步兵第 82 師文藝隊張霞（山西省陽高縣人）
步兵第 82 師文藝隊瞿曼裏（湖南省安化縣人）
步兵第 82 師電影放映隊胡翠敏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團長任新剛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政治處主任王寶成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第 1 營第 3 連連長宋懷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第 1 營第 3 連指導員張俊興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衛生隊衛生員閻興德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特務連指導員王國松（歷任步兵第 244 團後勤處副營職政治協理員、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河北省任丘市武裝部政委、河北省滄州市環保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第 1 營第 3 連士兵任振武（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第 2 營機炮連指導員宋忠悌（轉業到山西省臨汾市人事局）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第 2 營機炮連班長康金貴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第 2 營機炮連班長公維生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第 2 營機炮連班長賈建軍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第 2 營機炮連排長萬寶康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5 團軍務股股長蔣銀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5 團營長王寶貴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5 團第 1 營連長梁世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5 團士兵李道進（1989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5 團副連職幹事舒宗永（江西省上猶縣人。1989 年 9 月轉業，歷任上猶縣稅務局辦公室文書、副主任、主任、稽查局局長、城區徵收分局局長、紀檢組長。2003 年 7 月以來任上猶縣國家稅務局副局長兼紀檢組組長。）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5 團第 1 營第 2 連石長青（山西省晉中市人。後來曾在山西省軍區太谷軍分區工作。）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5 團後勤處軍士雷寶林（陝西省寶雞市人）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團長周雷（1989 年轉業後在江西省南昌市工作）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政委唐軍（浙江省寧波市人。轉業後歷任中共慈溪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慈溪市教委主任、中共鄞縣縣委常委、紀委書記、中共寧波市鄞州區委常委、紀委書記、鄞州區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黨組書記、鄞州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鄞州區政協黨組副書記。）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副團長周國增（河南人，轉業後任河

南省駐馬店市衛生局局長)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參謀長李海章(河南人)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營長陸連成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教導員徐榮新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通信連士兵石俊文(河北省徐水縣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通信連連長曹士峰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通信連排長張玉剛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團長李海章(?)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連連長薛立志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0 連(運動通信連)班長金恩旭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0 連士兵李文林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0 連士兵張霞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0 連士兵宇文登旬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0 連士兵王玉翔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0 連士兵陳明電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0 連士兵李方浩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0 連士兵張建新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連班長黃永波(陝西省定邊縣人,1986 年兵,1990 年 3 月退伍的。)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第 1 連連長王寶同(山西省太原市人)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第 1 連副連長薛立志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第 1 連排長張秋生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第 1 連士兵黃永波(陝西省省定邊縣人,1987 年兵,現在定邊縣法庭工作。)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班長孫永喜(山東省海洋縣人)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班長劉英男(山東省海洋縣人。1989 年轉為專業軍士後出車禍死亡。)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第 1 連連長陳左中(河北省興隆縣人)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第 1 連指導員尹海義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第 1 連副指導員王春樹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警衛排班長韓子記(河北省邯鄲市人)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3 營第 9 連士兵趙一鳴（陝西定邊縣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3 營第 9 連士兵徐懷平（陝西定邊縣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3 營第 9 連連長李俊師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6 連士兵康勇（陝西省定邊縣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6 連士兵薛志剛（陝西省定邊縣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8 連士兵秦鵬程（陝西省定邊縣人，1987 年兵，現在定邊縣任法庭庭長。）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2 營營長石友俊（江蘇人，1992 年以步兵第 246 團後勤處處長職務轉業，1995 年左右病故。）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2 營第 5 連連長李平選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2 營第 5 連指導員周峰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2 營第 5 連班長董繼法（山東人，1987 年兵，後曾任步兵第 246 團警衛連連長。轉業至大同鐵路技校任教。）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通信連有線排排長楊錦俊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3 營營長鄭進祥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通信連排長王成文（山東省荷澤市人）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 3 炮連指導員朱曉雲（安徽省巢湖市人。歷任步兵第 246 團政治處副營職幹事、第 28 集團軍紀委副營職幹事、中共南京市秦淮區委組織部組織員、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綜合幹部處副處長、處長、幹部一處處長、中共南京市浦口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連班長吳少國（河北省大廠縣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連副班長李東升（河南唐河縣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第 1 連司務長賈叢生（山西省長治市人）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警衛排排長張傑（後來任步兵第 246 團第 1 營第 2 連連長、營長，轉業到山西省西安市工作。）

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6 團副營長周峰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團長丁江閩（祖籍江蘇，父母在福建。後任第 28 集團軍炮兵旅副旅長，轉業到福建省政府駐北京辦事處任副主任）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政委劉健（祖籍山東，出生上海。1990 年 9 月升任步兵第 82 師政治部主任。轉業後任中共上海市廣電局黨委副書記、上海市文化局局長。）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副團長張國順（北京市順義縣人。後來升任至步兵第 82 師副參謀長，轉業到北京，在一個養觀賞魚廠當廠長。）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參謀長張瑜林（四川人。後任至炮兵團團長，轉業在大同市公安局。）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政治處主任任宗剛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後勤處處長王留忠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後勤處協理員陳建軍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第 3 營教導員徐傑（江蘇人）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第 1 營營長賈樂華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士兵劉長文（河北省邯鄲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士兵袁玉成（河北省邯鄲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士兵宋海濤（河北省邯鄲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第 1 連連長張成利（山東人。轉業到山東省青島市公安局。）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第 1 營第 1 連排長李中海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第 1 營第 2 連指導員陳丘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第 1 營第 2 連連長宋永明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衛生隊刁蕾（宋永明之妻）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士兵王斌（陝西省神木縣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衛生隊隊長徐登勇（重慶市人）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衛生隊軍醫龔建民（四川省綿陽市人）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士兵熊志群（湖南省永州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士兵萬玉新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第 5 連士兵孫彩屏（山西臨汾市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指揮連士兵朱奉軍（湖南人）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指揮連士兵楊立新（湖南人）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第 1 營士兵鄧陸雲

步兵第 82 師炮兵團士兵楊忠東

步兵第 82 師班長馬勤樹（1991 年退伍，歷任北京市豐台區蘆溝橋街道辦事處交通安全辦公室主任、重慶世紀民生能源集團安裝工、技術員、設計員、生產主管、生產科長、副經理。2006 年 3 月起在山東淄博國能燃氣有限公司工程部經理。）

步兵第 82 師連長麻福斌（內蒙古烏盟察右中旗人。歷任步兵第 82 師司令部作訓科副營職、正營職參謀、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244 團參謀長、山西省懷仁縣武裝部副部長、山西省右玉縣武裝部部長。2004 年 3 月起任山西省應縣武裝部部長、中共應縣縣委常委。）

步兵第 83 師師長張曉劍（健）（福建省永定縣。1944 年出生。）

步兵第 83 師司令部機要科科長陳木生

步兵第 83 師政治部保衛科科長宋家龍（安徽省巢湖市人，在步兵第 248 團政委任上轉業到山西省陽泉市糧食局工作。）

步兵第 83 師後勤部科長李明亞（湖南省城步城步縣人。轉業後歷任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副縣長、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

步兵第 83 師步兵第 247 團團長丁明弟（福建省浦城縣臨江鎮黃源村人）

步兵第 83 師步兵第 247 團指導員張公義（山西省永濟市人。歷任步兵第 83 師、第 28 集團軍政治部保衛幹事、安全管理辦主任、山西省軍區軍事檢察院檢察員、副檢察長、軍事法院副院長。2001 年 4 月以來任山西省交城縣武裝部政委、2004 年 5 月任中共交城縣委常委、武裝部政委。）

步兵第 83 師步兵第 248 團政委唐軍（浙江省寧波市人。轉業後歷任中共浙江省慈溪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慈溪市教委主任、黨委書記、中共鄞縣縣委常委、紀委書記、中共鄞州區委常委、

紀委書記、區委常委、鄞州區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
黨組書記、鄞州區政協黨組副書記。)

步兵第 83 師步兵第 249 團 86 分隊副連長陳曉樂
步兵第 83 師步兵第 249 團 86 分隊副指導員黃立孝

步兵第 83 師炮兵團連長田強（現任山西省陽泉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

步兵第 83 師炮兵團軍醫蒲德榮（河北省獻縣人。1990 年 10 月轉業，歷任山東省聊城地區稅務局科員、地直企業徵收處會計科副科長、徵收分局計會科副科長、計會科副科長、副局長。2001 年 7 月起任聊城市市區國稅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集團軍通信團後通連連長金春法（江蘇省張家港市人）

集團軍通信團李繼紅（1989 年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時在第 28 集團軍前進指揮部）

集團軍通信團無線 2 連第 1 電臺台長周碧平

集團軍通信團第 2 連連長吳廷義

集團軍通信團第 1 連賀美來

集團軍通信團第 1 連安彥生

集團軍通信團郭琦

集團軍通信團高晉輝

集團軍通信團王興

集團軍通信團錢培智

集團軍通信團劉斌

集團軍通信團任賢平

集團軍通信團黃學玉

集團軍通信團任立國

集團軍通信團梁文剛

集團軍通信團楊樹起

集團軍通信團李樹忠

集團軍通信團原銀啓

集團軍通信團金利

集團軍通信團譚劍

集團軍通信團夏宗嶽

集團軍通信團杜建章

集團軍通信團汽車排士兵詹向宏（1987 年兵）

軍政治部幹部處正營職幹事譔訓兵（歷任第 28 集團軍政治部幹部處副團職幹事、第 28 集團軍炮兵旅副政委、第 28 集團軍教導大隊政委。2000 年 7 月轉業，歷任湖南省益陽市藥品监督管理局黨組成員、紀檢組長、黨組副書記。2004 年 6 月以來任益陽市食品藥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長。）

軍政治部幹部處處長張建軍（歷任第 28 集團高炮旅政委、山西省軍區長治軍分區政委、中共長治市委常委。2005 年 1 月以來任山西省文化廳副廳長。）

軍警衛連指導員葉樹臣（河北省故城縣人。歷任第 28 集團軍司令部直工處副營職、正營職、副團職幹事、偵察營教導員、中共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常委、武裝部政委。2006 年 4 月以來任堯都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第 28 集團軍副營職參謀申國鋒（河北省清苑縣人。1989 轉業，歷任河北省信訪局辦公室幹部、主任科員、中共河北省委辦公廳幹部處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助理巡視員。2005 年 6 月以來任河北省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

第 28 集團軍某部車管助理凌憲浩（轉業後歷任河北省景縣交通局人事股幹部、法制股副股長、股長。2006 年 7 月起任景縣交通局副局长。）

軍紀委常委、紀委辦公室副主任張福清（山西省孝義縣兌鎮鄉人。）

軍偵察營教導員袁振民（河北省曲周縣人。歷任第 28 集團軍政治部幹部處副團職幹事、北京軍區大同綜合倉庫政治處主任、政委兼政治處主任。1998 年 9 月轉業，歷任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助理、審判員、政治部副主任。2008 年 6 月起任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

某團第 4 連連長李和平

某團第 4 連連長指導員雲友武

第 28 集團軍炮兵旅旅長文際元

軍政治部副連職新聞幹事陳吉中（四川省儀隴縣人。歷任成都軍區司令部直工部正連職幹事、宣傳處副營職幹事、成都軍區司令部編研室正團職參謀。2005 年 3 月轉業，任四川省旺蒼縣武裝部部長。2006 年 4 月起任旺蒼縣武裝部政委。）

步兵第 205 師坦克團政治處正連級幹事魏殿高（現任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武裝部政委）

集團軍電子對抗營第 3 隊隊長沈亞

集團軍電子對抗營第 3 隊士兵安永強（1989 年兵）

第十四章、北京衛戍區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北京衛戍區概況

北京衛戍區由於本身的屬性和職責，就註定不會在 1989 年北京戒嚴行動中缺席，而且必定扮演重要角色。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位于正義路 2 號（清朝慶王府），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閻同茂中將兼任衛戍區司令員，李進民中將任衛戍區政委，何尚純少將任衛戍區副司令員，曹丁大校任衛戍區副政委，陳漢文大校任衛戍區參謀長，董道聖少將任衛戍區政治部主任，王衍成少將任衛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楊貴珍大校任衛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北京衛戍區是擔負首都北京警衛和守備勤務的、相當於省軍區級別的軍隊組織建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軍委於 1949 年 6 月成立了平津（北平市和天津市）衛戍司令部，後來改稱為京津衛戍區，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兼任京津衛戍區司令員，華北軍區政委薄一波兼任京津衛戍區政委。1959 年 1 月，撤銷京津衛戍區建制，分別設立了北京衛戍區和天津警備區。

北京衛戍區組建之初，下轄解放軍警衛師，其前身是延安時期的中央警備團。1949 年 9 月 5 日，中央警備團擴編為中國人民公安縱隊第 2 師，隸屬於中央軍委公安部。1950 年 11 月 25 日，公安縱隊第 2 師整編為公安警衛師，屬於公安部隊。1955 年 8 月 1 日，改稱公安軍警衛師。1957 年 9 月 1 日，改稱公安警衛師，隸屬於解放軍總參謀部警備部。1959 年 9 月 1 日，改稱解放軍警衛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1963 年 4 月，改稱首都警衛師，隸屬於北京軍區。1966 年 1 月，劃歸北京衛戍區建制，改稱警衛第 1 師。

著名的 8341 部隊的前身就是中央警備團進入北平擴編為公安縱隊第 2 師後的第 1 團第 1 營，一直在中南海執勤。1960 年代中期，以該營為基礎，抽調警衛第 1 師部分連隊進行補充，重組了中央警衛團。警衛第 1 師副師長張耀祠、師副政委古遠興分任團長和政委。

1966 年 6 月 3 日，首都工作組和北京軍區在京西賓館召開

北京衛戍區部隊營級以上幹部會議，宣佈中央軍委關於北京衛戍區擴編的命令。擴編後的北京衛戍區共有 4 個警衛師、每個師下轄 6 個團，加上直屬獨立團、軍樂團，共有近 7 萬名官兵，規模相當於兵團一級。

警衛第 3 師由第 24 軍步兵第 70 師改編而成，警衛第 4 師由第 69 軍步兵第 189 師改編而成。1983 年組建武警部隊時，警衛第 2 師改編為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1985 年，警衛第 4 師歸還第 63 軍建制，恢復步兵第 189 師番號。

1986 年 9 月至 1987 年 12 月，由北京衛戍區與第 24 集團軍、天津警備區所組成的第 11 偵察大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執行偵察作戰任務。第 11 偵察大隊共有 838 名官兵，其中第 1 連有 141 名官兵（步兵第 70 師偵察連）；第 2 連有 141 名官兵（步兵第 72 師偵察連）；第 3 連有 141 名官兵（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偵察連）；第 4 連有 141 名官兵（天津警備區步兵第 196 師偵察連）；火力連有 135 名官兵（步兵第 208 團炮兵連）。

中央警衛團、北京衛戍區和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負責位於北京市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家機關的重要人物和單位，以及軍事機關、政府機構、外國駐華機構、重要地點的警衛工作。一般的分工是，中共核心機關和核心人物的警衛工作由中央警衛團負責，軍事機關的警衛工作由北京衛戍區負責，政府機構、外國駐華機構、重要地點的警衛工作由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負責。

北京衛戍區部隊鮮少在公眾面前露臉，堪稱保衛首都北京的“貼身盔甲”，對中南海、中央軍事機關和領導人的安全保衛工作負有重要職責。

北京衛戍區隸屬於北京軍區，同時是中共北京市委的軍事工作部門和北京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機構，接受北京軍區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的雙重領導。過去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任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如今則由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擔任北京衛戍區黨委第一書記。

北京衛戍區領導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負責北京地區的軍事警衛、守備任務，開展民兵、兵役和動員工作，維護駐京部隊軍容風紀，協助地方維護治安等。

第二節、警衛中南海等重要目標

北京衛戍區部隊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表現突出”，警衛第 3 師第 13 團被中央軍委記集體一等功，警衛第 1 師幹部隊被中央軍委授予“衛國英雄幹部隊”榮譽稱號，警衛第 3 師第 13 團第 9 連、第 12 團第 3 連被中央軍委授予“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警衛第 3 師第 13 團第 9 連士兵劉加林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另有一大批官兵立功受獎。

北京衛戍區下轄警衛第 1 師和警衛第 3 師，以及後勤、訓練、保障機構，例如衛戍區醫院、通信站、教導大隊等。

警衛第 1 師屬於內務警備部隊，主要負責北京市重要軍事目標的警衛工作，包括中央軍委辦公廳、國防部、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解放軍各兵種總部、中央軍委領導人住處等。該師雖然也有炮兵部隊，但沒有配備坦克之類的重裝備，不具備野戰能力，類似於人們津津樂道的 8341 部隊（中央警衛團），屬於“近身保鏢”。

警衛第 1 師師部在復興路 23 號院（北京市海澱區），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1112”，下轄警衛第 3 團、警衛第 4 團（當時部隊代號“51121”）、警衛第 5 團（當時部隊代號“51128”）、警衛第 6 團、陸海空三軍儀仗大隊。原有的警衛第 1 團、警衛第 2 團在 1983 年組建武警部隊時，劃歸武警北京市總隊建制。

警衛第 1 師部隊警衛執勤的範圍非常廣，在 1970 年代末，僅警衛第 4 團就負責 69 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負責人的安全保衛工作，此外還負責保護釣魚臺國賓館、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等重要地點和機構。警衛第 5 團警衛的目標，包括中央軍委辦公廳、解放軍 301 醫院（解放軍總醫院）、軍事博物館、軍事醫學科學院、解放軍總後勤部 75 號院（位於北京市豐台區）、軍方的京西賓館（北京市海澱區羊坊店路 1 號），以及永定路、公主墳、萬壽路一帶的解放軍各重要機構。

從 1989 年 5 月 20 日到 6 月 4 日，也就是從北京實施戒嚴到天安門廣場清場期間，警衛第 1 師基本上沒有參與外界的軍事行動，只是照例承擔內務警備任務，奉命加強了對重要人物和重要機構的警衛工作，派出神秘的精英警衛部隊——幹部隊，

貼身保護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等人。

警衛第 3 師是北京衛戍區唯一依照野戰部隊編制裝備的部隊，名義上是警衛師，其實是貨真價實的野戰師，而且是最早的解放軍機械化部隊之一。該師不僅有地面炮兵團、高射炮兵團，而且還有坦克團，是裝備最好、訓練有素、戰鬥力極強的解放軍野戰師之一，戰鬥力超過一般的野戰軍部隊。該師平時一般不擔負內務警備任務，部隊集中駐紮，屬於應急機動部隊，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在危急時刻殺出一條血路，掩護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屬撤離北京。

警衛第 3 師師部在北京市通縣（現為北京市通州區），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1116”，下轄警衛第 11 團（當時部隊代號“51117”）、警衛第 12 團（當時部隊代號“51120”）、警衛第 13 團（當時部隊代號“51115”）、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125”）、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1110”）、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1105”），分別駐紮在北京市區以東的通縣、順義縣（現為北京市順義區）、懷柔縣（現為北京市懷柔區）。

警衛第 3 師才是中共真正的御林軍、保護神。1976 年 9、10 月間，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謀劃抓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曾經擔憂駐紮在北京市昌平縣南口的坦克第 6 師（隸屬於陸軍第 38 軍）會跟著“四人幫”走，因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在該師活動積極，特地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吳德詢問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萬一坦克第 6 師有變，是否可以應付。吳忠認為可以應付，因為北京衛戍區在南口駐紮著警衛第 3 師坦克團。

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警衛第 3 師作為北京衛戍區唯一的機動應急部隊，是最早投入，也是全力投入的一支部隊。與第 38 集團軍一樣，從 1989 年 4 月 15 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之時開始，已經多次緊急奉命進入北京市區執行任務。

警衛第 3 師深受中國當局所信任，5 月 19 日北京實施戒嚴以後，奉命進駐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的所在地中南海、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人民日報社、中國廣播電視部、中國彩電中心

(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重要部門和機構，承擔起警備保衛任務。進駐中南海的是該師炮兵團和警衛第 13 團的部分部隊，進駐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和人民日報社的是該師警衛第 13 團的部分部隊，進駐中國彩電中心的是該師高射炮兵團的部分部隊。進駐北京火車站的是該師坦克團部隊。

第三節、神秘幹部隊執行神秘任務

隸屬於警衛第 1 師的幹部隊非常神秘，神秘的程度甚至超過 8341 部隊（中央警衛團）。這是解放軍中一支鮮為人知的特殊編制的分隊。說它鮮為人知，是因為幾十年來一直默默無聞地擔負著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家領導人以及重要國賓隨身警衛等機密任務；說它編制特殊，是因為在解放軍序列中只有這麼一個幹部隊。

幹部隊駐地位於中南海附近的故宮護城河邊，一座被高樓大廈環抱的簡陋四合院。幹部隊屬於營級建制單位，秦新民任隊長，宋焱星任教導員，隊員都是從警衛部隊中精心挑選出來的“精英”，絕大多數是基層軍官。除了政治條件，還要求儀錶堂堂，談吐舉止也要文明高雅。

1989 年 5 月 19 日晚上，中國官方聲稱這是一個神聖的夜晚，“決定黨和國家國命運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將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禮堂召開。當時，北京全民“截”兵，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領導人能否順利出席大會面臨嚴峻的考驗。（北京軍區政委劉振華當晚就因為座車被堵，沒能出席會議。）然而，與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局一道隨身護衛中央軍委負責人的幹部隊卻胸有成竹，早已擬定了多套行動方案和多條行車路線。

當天晚上，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的車隊行至北京五棵松路口，正遇上解放軍戒嚴部隊車隊在此地受阻，圍堵的民眾成千上萬，交通中斷。楊尚昆乘坐的主車與開道車漸漸拉開距離，車速減慢，眼看就要遭到攔截。要是在平常，人們看到車上帶有天線的車隊通過，都會不由自主地閃開，當時卻不靈了，紅燈閃閃的警車開道也無濟於事。

擔負車隊後衛任務的幹部隊隊員李宏升覺得，此時此刻，隨衛人員的責任已與歷史性會議連在一起，與共和國的命運連在一起。於是按照既定行動方案命令司機：“沖過去！”兩輛後衛車迅速從主車的兩側沖上前去，驅散攔截的民眾，強行打開一條通路，掩護主車順利通過。

當晚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由幹部隊負責內衛任務，幹部隊隊長秦新民率領兩名中隊長，在隊員們到達之前就趕到

警衛現場，實地勘察，制定方案。執行任務的 30 名隊員提前三個小時到達現場。由於這次會議通知倉促，準備過程較短，再加上交通堵塞，許多人不能按時到會，給會議的警衛工作帶來了難度。爲了保證與會領導人和會議的安全，幹部隊既嚴格按照規定辦事，又設法保證每個應該到會的人員參加會議。

會議快開始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劉振英急匆匆走來，恰巧碰上了比較熟悉、正在執勤的幹部隊第 3 中隊中隊長馬海德，於是笑著往會場走，沒想到馬海德上前攔住他，請他出示證件。劉振英說：“什麼時候要過咱的證件，咱這模樣就是證件。”馬海德說：“劉記者，今天晚上是認證不認人啊！”這下劉振英著急了，說：“我如果進不去，就要影響會議的及時報導。”馬海德問明情況，進會場找到會務處人員，幫劉振英領到了證件，才將他帶進會場。

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長達六個多小時，執勤的幹部隊隊員雙腳站麻木了，衣服被汗水濕透了，但自始至終百倍警惕，情緒飽滿。

凌晨 1 點多鐘，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結束，幹部隊隊員護送楊尚昆返回中央軍委辦公廳。途中，楊尚昆的座車又被數百民眾攔截在北京市東城區安定門立交橋上，一部分自行車橫在路中央，民眾激情喊叫，呼喊“反動”口號，幹部隊員們覺得情況十分危急，有的緊握木棒，有的打開槍保險，準備鳴槍警告，掩護楊尚昆的座車通過。冷靜一想，擔憂鳴槍會造成緊張氣氛，也會給“動亂分子”提供口實。隨衛車上的幹部隊員們不顧自己被撞傷的危險，命令司機把車開上半尺多高的馬路牙子，掩護楊尚昆的座車從人行道上通過。

30 名幹部隊隊員從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會場撤回駐地，已是 5 月 20 日凌晨 3 點多鐘。有的剛剛躺下休息，有的還在吃飯和洗漱，隊長秦新民就接到緊急調動幹部隊進駐中央軍委辦公廳（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景山旁邊的三座門）執行任務的命令。秦新民知道，這個時辰來電話調兵，形勢嚴峻啊！而 30、40 名隊員全副武裝開進，途中很可能會出麻煩，但無論如何也要儘快趕到。隨著一聲哨音，部隊緊急集合，挑選精兵強將，組成精悍的執勤分隊，化裝開進，比規定時間提前 40 分鐘到達中央軍委辦公廳。

倉促進駐中央軍委辦公廳，隊員們連必要的生活用品都沒有帶。加之住房緊張，生活設施有限，許多隊員只能和衣躺在不足 30 公分寬的小條桌上。特別是擔負中央軍委負責人隨車任務的隊員，爲了保證隨叫隨到，整天槍不離身，人不離車，吃住在車上，有時連續幾天執行任務，吃不上一頓熱飯，睡不上一夜囫圇覺。但隊員們任勞任怨，始終保持高昂的鬥志。5 月 27 日上午，隊員們護送楊尚昆到中南海開會，返回中央軍委辦公廳待命，爲了不耽誤返回時的護衛任務，隊員們堅守崗位，車子就在飯廳門口停著，但沒有一個隊員下車吃午飯。

5 月 23 日凌晨，幹部隊戰士隊員王道喜隨車護衛一位中央軍委負責人，行駛到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立交橋南側時，被路障和人群堵住。近百名民眾擁上來，好幾個民眾爬上車頂，大聲叫罵。圍觀者越來越多。司機由於精神緊張，發動機突然熄火，中央軍委負責人處境危險。王道喜一面緊握手中槍支，一面借助路燈觀察地形，果斷指揮司機：“倒車！”“掉頭！”“前沖！”“煞車！”“左打方向！”“右打方向！”一連串的動作嚇得民眾紛紛躲避，一個個從車頂摔了下來。

民眾邊追邊喊：“攔住它，車上坐的是大官！”幾輛摩托車拼命追趕。王道喜不斷指揮司機加快速度，改道繞行，甩掉了追趕的摩托車。中央軍委負責人的座車一路上 8 次被堵，都被排除，安全到達目的地。

5 月 23 日清晨，幹部隊隊員姚文生奉命爲一位中央軍委負責人取文件，轎車行駛到北京市海澱區甘家口路口附近，只見人群黑壓壓一片，攔截車輛檢查。姚文生讓司機跟在一輛卡車後面，到了十字路口，卡車遭到盤查，姚文生命令司機趁機超車，剛超過卡車就被民眾發現了，有人高喊：“停車檢查！”並不顧一切地攔車。姚文生心想，這時如果停車，文件就會落入民眾手中。於是告訴司機減速不停車。車子剛減速，一個民眾已扒住車門，並伸手拉人。姚文生迎面一拳，將他打了個仰面朝天，其他人嚇得後退幾步。姚文生讓司機加大油門猛向前沖去，擺脫了攔截。

6 月 4 日凌晨 2 點鐘左右，中央軍委辦公廳門前人群湧動。進駐中央軍委辦公廳的幹部隊接到電話命令：“景山前街（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有兩個外國記者違反戒嚴令，正在從事間諜

活動。如果讓其溜掉，將會洩露黨和國家重要機密。命令你隊立即出動，將其抓獲。”

幹部隊副隊長孫恩堂率領 6 名隊員組成兩個行動小組，與機關隋參謀一起潛入北京市西城區南長街。不一會，發現一個外國人脖子上挎著報話機不時地喊話。第一行動小組的幹部隊隊員王建芳、黃東亮、機關隋參謀立即隱蔽靠前，由於人多，不易下手，便尾隨其後，見機行事。走到中央軍委辦公廳南門不遠處時，王建芳、隋參謀迅速插向大門東側一百米處準備堵截，黃東亮在大門西側 150 米處準備切斷後路。

外國記者發現有人跟蹤，便加快步伐，順路邊由西向東離去。王建芳、隋參謀突然從兩側向前，抓住其兩臂。外國記者憑藉身高一米九、力氣大的優勢，掙脫雙臂，飛快地朝西逃跑。等在大門西側的黃東亮是武術隊教頭，待外國記者靠近，縱身一跳，從背後將他攔腰抱住，順勢將他摔倒，死死抱住。外國記者邊掙扎邊用報話機講話。王建芳、隋參謀隨即趕到，一個按住外國記者的手，一個搶奪報話機，但怎麼也奪不下。王建芳點了外國記者兩側肩並穴，外國記者的雙臂立刻鬆軟，奪下了報話機。

此時，有民眾發現了外國記者被抓的情景，大聲叫喊：“老外是好人，快來打便衣！”頓時黑壓壓的人群從東西兩個方向擁來。王建芳、黃東亮、隋參謀迅速排開人群，將外國記者抬進了中央軍委辦公廳。

不一會，幹部隊隊員們又抓獲了另一名違反戒嚴令的外國記者。

在北京實施戒嚴期間，類似於上述這樣的鏡頭很多，神秘幹部隊的絕大部分神秘行動，至今仍然沒有曝光。

幹部隊隊長秦新民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曾接受中國官方記者專訪，他介紹說：在我們幹部隊，一有任務就特別重要。這就要求我們的隊員不僅具有純潔、崇高的思想，而且還要有全能的警衛技能。說到具體訓練項目那就太多了。我們要經常不斷地對新老隊員進行隨身警衛，現場警衛，專列、專車、專機、專船警衛，消防知識、外事常識和外事紀律，通訊器材的操作使用等 21 個方面的專業訓練。

你聽說過吃飯、睡覺和解手這樣的訓練科目嗎？在幹部隊

這些都是訓練項目。因為你要接待外賓、參加宴會，你要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就寢，你要以最短的時間處理個人問題，保證中央領導人和外賓的絕對安全，展示軍威國威，就必須樣樣通，樣樣精。

至於業務技能訓練，那就更不用說了。1982 年以來，先後把硬氣功、武術散打等項目引入警衛技能訓練中。每人每天要完成 5 公里越野跑和拳擊訓練，每人每天倒地 150 次，每 3 天進行一次手切磚（或石頭）、頭嗑磚、油錘擊頂訓練。原幹部隊氣功、武術散打訓練隊隊長郝振國成為警衛第 1 師“打不倒的擂臺主”，氣功、武術散打訓練隊受到楊尚昆的檢閱和表揚，八一電影製片廠、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分別以《中華奇功》、《神功絕技》等為題，拍攝了 4 部展示幹部隊隊員高超技藝的影片。

幹部隊恢復建制 10 多年來，給中共中央領導人派出隨身警衛 407 次，最長的達 4 年半；完成重要外賓來訪的駐地警衛、專列護送、活動隨衛 3351 次，其中國家元首級 80 多次；擔負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重要活動現場警衛 1280 次；擔負各種軍用物資列車押運任務 88 次，行程 80 多萬公里，做到萬無一失。

北京實施戒嚴後，中央軍委辦公廳周圍聚集的民眾很多，情緒激動，但沒有人敢靠近中央軍委辦公廳大門，幹部隊隊員們頭嗑酒瓶、手切磚塊的訓練場面，讓民眾看得目瞪口呆。難怪有人說：這裏駐上了特警隊。一位中央軍委負責人觀看了幹部隊的訓練，高興地說：“有你們在，我們就放心了。”

包括幹部隊隊長秦新民在內，沒有誰能準確地回憶幹部隊的最早前身，但從他們所擔負的任務，可以一直追溯到 1928 年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所成立的特務營。後來經過多次演變，警衛體制不斷擴大，幹部隊也應運而生。1928 年 4 月，擔負中國工農紅軍第 4 軍黨代表毛澤東、軍長朱德和中國工農紅軍第 4 軍前敵委員會的警衛任務；1934 年 10 月，護衛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負責人踏上長征之途；1935 年 1 月，擔負遵義會議會場和中共中央負責人駐地警衛任務；1937 年 4 月，護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到西安工作，途中在甘泉勞山遇到匪徒襲擊，保衛周恩來脫險；1945 年 8 月，隨衛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負責人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

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60 多年來，這支特殊而神秘的幹部隊確保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幹部隊所堅持的政治信仰是：“忠於黨，忠於領袖，忠於中華民族”，“熱愛黨，熱愛首長，熱愛警衛事業”。這個政治信仰支撐著幹部隊這個特殊的集體。秦新民有一句口頭禪：“只要用著幹部隊的時候，就沒有小事。”幹部隊執行的任務，突出的特點是緊急、危險、連續作戰，這也許是秦新民“無小事”論的主要根據。

中國軍方的資料聲稱，1989 年春夏之交，幹部隊隊員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從內心裏發出了“誓死保衛首長，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共和國”的誓言。響亮地提出：“就是重上井岡山，也要跟著黨中央，跟著鄧主席幹到底。”全隊官兵都做出了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保證“以身軀擋槍彈保首長”的思想準備。

第四節、警衛第 13 團五進五出北京城

警衛第13團是警衛第3師的主力部隊，屬於摩托化步兵團。其前身是新四軍第1支隊第2團。1938年1月組建之後就成為新四軍的主力團隊，被新四軍軍部授予“戰鬥模範團”稱號，在戰爭年代贏得了“老虎團”之譽。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該團被中央軍委授予集體一等功。

警衛第13團作為御林軍主力，屬於應急機動部隊，長年處在緊急準備狀態，全體官兵時刻必需繃緊戰備這根弦，特別是節假日、重要會議期間，停止休假，打好背包，嚴陣以待，不許喝酒，不許跨出營區半步。戰備期間，每天24小時保持箭在弦上的狀態。只要警衛第3師有重大任務，警衛第13團肯定打頭陣。

警衛第13團駐紮在北京市通縣楊閘，1989年春夏之交，五進五出北京城，擔負安全警衛任務。

第一次進城：1989年4月22日凌晨1點21分，警衛第13團司令部值班室響起急促的電話鈴聲，上級下達了部隊緊急開入北京城執行警戒任務的緊急命令。緊急集合號立刻劃破了駐地營房寂靜的夜空。

凌晨1點42分，該團全體官兵緊急集合完畢，登車準備出發。連級以上軍官齊聚辦公樓前，團長幸中原佈置任務說：“我只講5分鐘，大家看看表，上級命令我團于凌晨3點以前趕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外，擔負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的安全警衛任務，這是一次政治性很強的任務，只許做好，不能出一點問題。”

凌晨2點20分，滿載該團官兵的軍車駛入天安門廣場，官兵們快速下車，有組織地插進人群，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一字排列，將逾10萬人的北京各高校學生隊伍隔離在警戒線外。

4月22日上午9點鐘左右，部分學生隊伍湧上前來，要求派代表參加胡耀邦追悼會，將人民大會堂東門圍得水泄不通。中午12點45分，大隊學生隊伍湧向人民大會堂東門，與官兵們形成對峙。直到晚上10點多鐘，官兵們才陸續撤下來休息。

第二次進城：1989年4月27日，北京市勞動模範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該團奉命在人民大會堂執行安全警衛任務。

第三次進城：1989年5月4日，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該團奉命在人民大會堂執行安全警衛任務，獲得中央警衛局和國家安全部負責人的稱讚：“一看就是老執勤。”

1989年5月7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接見了警衛第13團的三名代表：團長幸中原、第6連指導員齊文廣、第9連士兵孫斌，表彰該團官兵三次進入北京城完滿地完成了安全警衛任務。

第四次進城：1989年5月13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華。該團奉命在人民大會堂執行安全警衛工作，持續了4天4夜。

第五次進城：1989年5月20日，各進京解放軍戒嚴部隊大都在北京郊區受阻，無法進入北京市區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5月26日下午5點鐘，剛剛撤回通縣駐地休整的警衛第13團再次接到進入北京市區執行安全警衛任務的命令。

與前四次進城不同的是，這一次爲了避開民眾的圍堵，採用分批化裝進城的方式。團長幸中原帶領指揮組押運全團的彈藥，借用地方的一輛汽車，提前從駐地後門出發，繞過一個個路卡，闖過一道道封鎖線，抵達目的地。團政委萬金華、團參謀長姚振懷乘坐吉普車打頭陣，在郎家園（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立交橋、北京火車站、東單、王府井先後五次遭到民眾阻擋，每次都假裝停車，等人群擁到跟前時，又突然加足馬力沖過圍堵。團政治處主任馬占業負責押運全團輕武器，乘坐精心偽裝的軍車，順利抵達目的地。

5月26日傍晚6點30分，該團官兵陸續從駐地出發。採取分期分批、小群多路、化裝潛入的方式，人自爲戰，班自爲戰。有的乘坐火車，有的乘坐公共汽車。有的頭系布條，身穿T恤衫、牛仔褲，哼著流行小曲，裝扮成地方小青年的模樣。有的頭戴草帽，騎著自行車，穿大街，走小巷，像是上下班的工人。

5月27日下午2點鐘，該團官兵全部抵達指定位置，出現在中南海、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人民日報社等重要目標。北京軍區負責人得知該消息後非常高興，一口氣說了五個“很”字：“組織很嚴密，方法很靈活，完成任務很好、很好”。

此後，一直到6月4日清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警衛第13團部隊都在中南海、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人民日報社等處承擔安全警衛任務。

第五節、高炮團進駐新聞傳播機構

中共當局歷來十分重視新聞傳播機構，對新聞傳播機構實行嚴密的控制。在 1989 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包括《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在內，新聞界普遍支持學生運動，不僅上街遊行，要求新聞自由，而且千方百計地在新聞報導中表露心聲。因此，中共當局對新聞傳播機構的“失控”局面坐立不安，在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之前，派兵進駐新聞傳播機構。

警衛第 3 師高射炮兵團駐地在北京市通縣北苑。5 月 20 日上午 10 點鐘，該團團長李旦生接到警衛第 3 師師長秦濤（前中國國防部部長秦基偉之子）下達的緊急命令：部隊立即進入北京城執行戒嚴執勤任務，部隊開進的目的地是人民日報社等新聞傳播機構。

李旦生身為解放軍將領子弟，1967 年 1 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就讀解放軍將領子弟雲集的八一學校，成為紅衛兵組織“聯動”的骨幹成員。“聯動”曾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公然宣導血統論，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打砸搶的始作俑者。【注釋 1】

高炮團作戰會議決定，團政委、團參謀長身穿便裝率先出發，到北京永定門火車站設立前進指揮部，團長李旦生、團副參謀長鄧國民率領部隊向北京城區摩托化開進。

5 月 20 日下午，高炮團車隊一出營房大門，就遭到民眾阻攔，民眾的人數不是很多，車隊旋即闖過去了。車隊接連又闖過兩道民眾封鎖線，進入了北京市朝陽區，眼看就要抵達目的地。不料，在大北窯，逾萬名市民和學生潮水般湧來，車隊動彈不得。團指揮部想方設法甩開圍堵民眾，未能成功。經請示上級並獲得同意，車隊返回駐地待命。

高炮團指揮官事先已有思想準備，知道北京民眾一面倒地支援學生、反對實施戒嚴，要完成部隊開進任務，必須選擇一條安全可靠的路線，避開民眾圍堵。團長李旦生返回駐地後，面對北京市地圖，與副團長、作戰訓練股股長苦苦尋找、思索，終於發現了一條遠離工廠、學校、居民稠密區的進城路線。

李旦生立即派遣團副參謀長鄧國民沿著新發現的進城路線

進行偵察。同時決定改變開進方式，命令官兵們進行化裝，並調來團辦化工廠的五台大轎車到團司令部前待命。

此時，師長秦濤給李旦生來電話指示：“你們要開動腦筋，多想點辦法，比如，乘火車開進，徒步開進，你們不是有大轎子車嗎？”秦濤把師前進指揮部開進途中受阻，改道 292 醫院，化裝開進的經過敘述了一遍。

292 醫院是北京衛戍區醫院，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麥子店棗營路。現已改為北京軍區總醫院分院。

秦濤的一番話啓發了李旦生的靈感，292 醫院處在部隊駐地與人民日報社之間，比較偏僻，居民少，是藏龍臥虎之地。如果把部隊開進行動分做兩步走，先到 292 醫院，建立一個“前進基地”，部隊開進就主動、靈活多了，可進可退。官兵們可以在“前進基地”集結休整，補充給養，即便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還可以步行進入預定警衛目標。

5 月 20 日晚上 8 點 30 分，情況突變，通縣八里莊橋上聚集了兩千多名市民和學生，都是響應學生組織的號召前來堵截進城軍車的。看趨勢，夜間前來圍堵的人數可能會更多。

晚上 11 點鐘，鄧國民回來報告偵察結果：新發現的開進路線也全線被堵，部隊不要說進北京城，就連通縣都很難。李旦生不禁焦灼萬分，一邊默默傾聽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想計策，一邊默默地思索、衡量、論證著。最後，李旦生宣佈部隊改走北京市順義縣李橋鄉，再插入官莊大道，進而向“前進基地”---292 醫院開進。

新的決定帶來了新的問題：地圖沒有準備好，嚮導也來不及找，路線沒有偵察過。困難確實不小，但李旦生相信，這是在目前情況下的最佳選擇。

晚上 11 點 30 分，預約借用的五副地方汽車牌照遲遲未送到，李旦生覺得兵貴神速，不能再等待了，沒有地方車牌也要衝出通縣，闖入北京城，命令部隊馬上出發。217 名官兵身穿花襯衣、牛仔褲、新潮服，攜帶武器彈藥、電臺等物資，魚貫登上五輛大轎車。李旦生乘坐第一輛大轎車開路，副團長乘坐最後一輛大轎車斷後。

車子啓動之際，李旦生驀地想起，五輛車同時走一條路線，一旦受阻，就會全盤皆輸。於是臨時改變主意，讓其中一輛車

單獨沿著八里橋至官莊路線向“前進基地”---- 292 醫院開進。

李旦生率領四輛大轎車駛向通縣北關橋。北關橋是個重要交通路口，集聚了不少堵截軍車的民眾，人聲鼎沸，已有武警部隊的車輛及約兩百名官兵遭到攔截，進退兩難。

說來也巧，接近北關橋時，高炮團四輛大轎車不知不覺間跟在了一輛運菜卡車後面。有點緊張的駕駛員試圖超車，李旦生馬上叫他沉住氣，跟著運菜卡車走。運菜卡車司機跟攔車的民眾交涉，很快獲得放行。李旦生趁機對官兵們說：“鎮靜，別慌，拿出點風格來。”官兵們領會了他的用意，突然活躍起來，伸手作出 V 字手勢，探出腦袋搖旗吶喊，嚷成一片，裝作支持學生的模樣，總算闖過了北關橋這一關。

不久，該團參謀長從預定警衛目標偵察歸來，在北京市朝陽區管莊西側追上來，向李旦生報告說：“團長，師前進指揮部命令我們停止行動。北京城內形勢嚴峻，各個交通路口都設置了路障，並有上千人把守盤查，部隊開進困難。”

怎麼辦？真是進退兩難。李旦生攤開地圖，目光集中在 292 醫院周圍，難道就沒有一條隱蔽的路線嗎？不可能！他和參謀們一起細心查找，與熟悉地形的團參謀長商討研究，明確了一條新的開進路線。

從管莊以北開始，四輛大轎車離開馬路，駛向農田區，在洞黑的田野、村莊中迂回前進，一路上除了驚起一串犬吠外，沒有任何動靜和攔阻。這條路線成了圍堵的學生和民眾意料不到的黃金運輸線，後來又被該團和其他部隊多次使用。

李旦生帶領四輛大轎車進入了 292 醫院，標誌著“前進基地”由設想變為現實，開始履行中轉人員、武器、物資的使命。官兵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歡呼雀躍。

5 月 20 日夜晚，高炮團政治處主任吳濟收率領專業軍士程志仕等人乘坐一輛救護車，向北京永定門火車站開進，在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遭到攔截。學生、市民分頭盤查，官兵們口徑不一，被識破真像。“他們是便衣探子！”人群呼啦一下圍上來。救護車被迫往回開，一個學生待在車上不下來，到了一個有 3、4 千人聚集的路口，突然大喊：“這是軍車，快來人哪！”民眾蜂擁過來，將救護車團團圍住，車子險些被掀翻。

吳濟出面解釋，嗓子都喊啞了，毫無效果，民眾越聚越

多。他悄悄命令程志仕：“你設法溜出去，給團前進指揮部報信！”程志仕隨身攜帶著團前進指揮部待用的 6 百元錢、8 百斤糧票，假裝要上廁所，征得學生的同意放行，隨即溜之大吉。程志仕一出現在團前進指揮部（位於永定門火車站），人們都高興壞了，笑罵道：“你小子可來了，我們的肚子餓得咕咕叫。你瞧，正在這兒湊錢準備買麵包呢。”程志仕身為老兵，受條件限制無法提幹而轉為專業軍士，竟然因此趟行程而立功，破格提拔為軍官，10 年之內，官至警衛第 3 師高炮團政治處保衛股股長。

高炮團官兵在 292 醫院這個“前進基地”作了短暫休整，5 月 21 日上午，開始以分批化裝的方式向人民日報社開進。

當晚 11 點鐘，指導員張付臣帶領 27 名士兵出了“前進基地”，沿著農業展覽館（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北路 16 號）西行，穿過恬靜優美的外國使館區，來到三里屯十字路口。這裏聚集了大約兩百多名騎自行車的民眾，寬闊的馬路變成了狹窄的小過道。張付臣身背裝有 160 發子彈的軍用挎包，泰然自若地通過了人群。“當兵的混過去羅！”一個老太太眼忒尖，發現一會兒過去一個穿軍褲或穿解放鞋的年青人，警覺地喊叫起來。頓時，民眾的情緒緊張起來，如臨大敵。一個 17 歲的小士兵慌張地朝張付臣跑來，猛地摟著他的胳膊，連聲直叫：“指導員……”“別害怕，”張付臣安慰他，“有我在呢。”

一個別著大學校徽的小夥子指著張付臣的軍用挎包說：“這裏面裝的是什麼？拿出來看看。”張付臣斷然拒絕。幾個小夥子沖上來搶奪軍用挎包，張付臣使出全身力氣，死死抓住軍用挎包不鬆手。人們擁過來圍住他，推推搡搡走了兩百多米，吸引了上千人圍觀。民眾猜出軍用挎包裏裝的是子彈，發起第 2 次衝擊，使勁地掰張付臣的手指，張付臣就是不鬆手。民眾不再搶奪軍用挎包，把張付臣緊圍在中間，團團坐下。

這時，又有四名士兵被推進圈內。頭纏紅布條的學生們大概覺得再拖延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決定把張付臣交給學生指揮車處理。後來用一輛大轎車載著張付臣和四名士兵送到亞運村工地，扔下就不管了。黎明時分，張付臣和四名士兵徒步回到了朝陽區三元立交橋附近，然後分頭向目的地進發。張付臣攜帶著 160 發子彈到達了戒嚴執勤點。

【注釋1】“聯動”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幹部子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人大常委會革命幹部子弟，中國人民解放軍帥、將、校革命幹部子弟，中國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16省、高委革命幹部部分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

第六節、六部口搶奪彈藥車

1989年6月3日，警衛第3師炮兵團在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13號集結待命，部分官兵正在進行操槍法訓練。文津街甲13號是解放軍305醫院，比鄰北大醫院。上午10點1分，警衛第3師參謀長李勝堂上校在值班室接到北京衛戍區負責人電話：

“在六部口，一輛裝有武器彈藥的軍用大轎車和車上10多名官兵，被一夥壞分子攔截圍困。上級命令你部與兄弟部隊、公安幹警、防暴警察一起到六部口附近的中南海待命搶救。”

這輛軍用大轎車屬於解放軍總後勤部汽車第5團，6月3日凌晨奉命為進駐人民大會堂的第27集團軍運送槍支彈藥，由步兵第79師步兵第235團第3營第8連押運，載有一百余支沖鋒槍、五挺輕機槍、二部電臺和上萬發彈藥。學生和民眾攔截彈藥車的唯一目的，就是不讓軍人拿著槍支彈藥實施鎮壓。中國官方宣稱學生和民眾“企圖搶奪車內的武器彈藥”，違背事實。彈藥車被學生和民眾控制了好幾個小時，集聚了數萬人，如果真要“搶奪武器彈藥”，不要說是一輛大轎車，就是一列火車的槍支彈藥，也早就蕩然無存。

李勝堂從北京衛戍區負責人略顯激動的話語中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下令部隊緊急集合。不到一分半鐘，炮兵團的530多名官兵頭戴鋼盔、腳穿皮鞋，不帶槍支，集合完畢。不到五分鐘，李勝堂帶領部隊跑步來到中南海，奉命就地集結待命。

中南海距離六部口只有一里多路。從大院外混雜的聲音裏，官兵們預感到出了大事，但誰也不知道具體情況，只是感到將要擔負的任務非同一般。然而，一個小時過去了，部隊並沒有接到出擊命令。又過了一個多小時，部隊仍未接到出擊命令。一直到了下午1點30分，上級才下達了出擊命令。

下午1點35分左右，800多名部隊官兵、公安幹警和防暴警察集合完畢。北京市公安局一位負責人扼要介紹了六部口事態，聲稱“情況十分火急”，又作了簡要動員，要求全體人員聽從指揮，遵守紀律，搶奪武器彈藥要勇敢果斷。

下午2點5分左右，這批部隊官兵、公安幹警和防暴警察從中南海出發，穿過府右街，僅用了10分鐘，就來到了六部口

北側。參與六部口搶奪槍支彈藥行動的，還有從人民大會堂出發的第 27 集團軍、第 63 集團軍的數千名官兵。

此時，寬闊的長安街上人山人海。六部口稍往東的十字路口中心，橫著一輛當作路障的公共汽車。往南，在北新華街路口就停著被圍困的彈藥車，四周萬頭攢動、水泄不通。再往南是北京音樂廳，那裏也擠滿了人群。彈藥車的輪胎已被紮破，幾個年輕人拿出一挺機槍架在車頂上展示，“同胞們，政府用來鎮壓屠殺我們的武器已經被我們截住了。請看，裏面裝滿了用人民血汗換來的槍支彈藥……”

眼見大批軍警到來，數萬名民眾組成一道道人牆，不讓接近彈藥車。李勝堂迅速將隊伍由 3 路縱隊調整為 6 路縱隊，緊接著大喊一聲“沖啊”，軍警發出一片喊聲向前沖，強力驅散人群。一時間，民眾散向道路兩邊，很快地又湧上前來，軍民雙方衝撞在一起。數萬民眾面對頭戴鋼盔、手握盾牌警棍的軍警，在衝突中並不占上風，四周有民眾開始向軍警投擲石塊、汽水瓶，企圖阻止他們搶走槍支彈藥。

四名學生堅守在彈藥車頂上，不斷呼籲民眾阻止軍警搶走槍支彈藥。其中一個學生扛著一挺機槍，一個學生舉著一支衝鋒槍，一個戴眼鏡的學生用一支步槍挑著鋼盔，都在叫喊著。另外一名穿褲衩背心的學生手拿電動喇叭不斷叫喊，聲音嘶啞。

警衛第 1 師副團長譚先誠兩眼冒火，帶領官兵沖在最前面，配合防暴員警驅散群眾，向彈藥車靠近，終於打開了一條 20 米左右的通道。李勝堂指揮部隊分成 3 路橫隊，分別向東、南、西三個方向，形成面對人群、背向彈藥車的包圍圈，阻止民眾接近彈藥車，以便警察及警車靠近大轎車搶運武器彈藥。

下午 2 點 20 分左右，警察開始轉移大轎車內的武器彈藥，又有數千人從集聚在六部口南側和西側的人潮中沖過來。30 米，20 米，當距離官兵組成的人牆 10 多米遠時，防暴警察向人群施放了催淚彈，一陣又一陣發射，現場煙霧瀰漫。這是北京戒嚴後首次使用催淚彈。軍警頭戴鋼盔，手握盾牌警棍，又有催淚彈助威，民眾節節後退。沒過多久，變得更憤怒的人群又一次沖了上來，防暴警察再次向西、南方向施放了催淚彈。

彈藥車頂上的四名學生仍不撤離，繼續鼓動民眾。“沖上去！”譚先誠和警衛第 3 師司令部作戰警衛科科长劉秀華幾乎

同時喊道。話音未落，炮兵團第 6 連士兵王偉春已從西側向車頂爬去。戴眼鏡的學生見狀，激動叫喊：“不許上來，上來就打死你！”王偉春與其他官兵一樣立功心切，哪管這些，縱身一躍，手摸到了車頂，眼看就要爬上去了。兩名學生猛踩他的手背，另一名學生踢他的頭部。王偉春手一松，從車頂摔了下去。

此時，炮兵團第 9 連士兵劉加林也快爬到車頂，王偉春砸在他的身上。劉加林一手抓住車窗邊沿，一手想托住王偉春，但沒能托住，王偉春摔下去了，右手腕嚴重挫傷。劉加林一邊惡狠狠地叫罵“王八蛋，你們的末日到了”，一邊繼續往上爬。一個學生急忙用右手推他，劉加林抓住這個學生的手，加上同連士兵李如華、陳幹在車下猛力一推，趁勢躍上了車頂，又順勢往下一拉，把這個學生甩下了車頂。

手持電動喇叭的學生還在激動地叫喊，劉加林跳過去抓住他。這位學生一邊掏出學生證一邊說：“我有權利喊話！”“下去，快下去！”劉加林怒從心中起，劈手奪過電動喇叭，狠狠地摔到車下，一掌把這個學生掀下車頂。

眼見兩名學生被野蠻地打下車頂，受了傷，被攔在週邊的群眾大聲怒罵。警察迅速鑽進彈藥車，把 10 多名官兵扶出來。一名身穿白襯衣的學生還待在車內，趴在裝有槍支的麻袋上死活不出來，兩名警察硬把他拖出車外，然後迅速把武器彈藥搬運到兩輛警用面包車上。

車頂上，剩下的兩個學生眼見同伴被摔下車去，受傷躺在地上，非常憤怒，一前一後向劉加林撲來。文弱書生哪是受過專門訓練、如狼似虎的警衛士兵的對手，何況劉加林還是擒拿格鬥訓練的尖子。劉加林拉開架式，左腿騰空而起，將一名學生踢下車頂，右手猛虎掏心，將另一名學生擊下車頂。

當劉加林把車頂上的槍支往下遞時，警察已把大轎車內的武器彈藥轉移到了兩輛警用面包車上，準備撤離。退到東、西、南側的數萬名群眾再次圍了上來。一些民眾從北新華街方向弄來汽水瓶、啤酒瓶，霎時間，瓶子滿天飛，向警察和兩輛警用面包車襲來。李勝堂大喊：“快！組成人牆，掩護武器彈藥轉移！”部隊官兵和防暴警察迅速上前，掩護警察帶著武器彈藥

撤離。

李勝堂的話音未落，警衛第 1 師陸海空三軍儀仗大隊（對外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三軍儀仗隊”或“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副大隊長程志強、師教導隊隊長張金明、師司令部科長劉秀華、袁成喻和譚先誠紛紛挺身而出，官兵們肩並肩，手挽手，組成一道道人牆。

下午 2 點 50 分左右，大轎車上的槍支彈藥和 10 多名官兵終於被轉移走了。

李勝堂在題為《六部口救軍火》的署名文章中聲稱：在六部口搶奪槍支彈藥事件中，“部隊官兵有 18 人輕傷、3 人重傷。”【注釋 1】就算李勝堂說的是實話，相比之下，學生和民眾的受傷人數要比這個數字多得多，受傷者陸續被送到了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由於受傷者眾多，讓醫務人員忙得人仰馬翻的，直到當天午夜時分才處理妥當。

事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委託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前往警衛師在中南海的駐地慰問官兵，讚揚他們在搶奪武器彈藥時組織嚴密，士氣高昂，動作迅速。解放軍戒嚴指揮部負責人也高度評價了警衛師官兵奮力搶奪武器彈藥的行動。

劉加林，這位 1986 年 10 月入伍的農村兵，終於在退伍回鄉前夕達成立功升官的心願，1989 年 7 月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 11 月被破格提拔為少尉排長。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劉加林目前任職江蘇省大豐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其妻子下崗，有一個女兒。

【注釋 1】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

第七節、爲戒嚴部隊開闢通訊線路

在軍隊的軍事行動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必須保障通訊聯絡。逾 20 萬解放軍戒嚴部隊湧進北京，如何保障通訊聯絡曾出現嚴重問題，後來全靠在地的北京衛戍區提供了重要而關鍵的協助。

1989 年 5 月 19 日，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處長王安瀾上校接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命令：“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已進入南苑地區，請你們立即開通與中央軍委的通信聯絡。”王安瀾剛回答說“好，我們保證完成任務。”尚未放下電話，桌上的另一部電話鈴聲又響了，北京軍區司令部來指示：“我是軍區，XX 集團軍已到達通縣，請你們務必開通他們與軍區的聯絡。”王安瀾立即回答說：“是，請首長放心。”

同時，通信參謀匆匆跑來報告：“處長，上級指示，讓我們幫助某師開通對上對下的通信聯絡。”一聽之下，王安瀾的腦袋都大了：天哪，眼下僅有的備用線路已大部分用於保障戒嚴部隊，就是把所剩的十幾條備用線路全拿出來，離上級的要求還差一大截子。怎麼辦？他沉思了一會兒，把煙頭往煙灰缸重重一按，毅然決然地說：“卡掉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也要保障友軍。”“那……”通信參謀剛一開口，便被王安瀾堵了回去：“用戶誰有意見，讓他們找我。”

就這樣，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卡掉了本單位對上對下的 28 條中繼線（電）路，保證了部分解放軍戒嚴部隊走到哪兒，電話跟到哪兒。某集團軍軍長深有感觸地說：“是你們衛戍區強有力的通信保障，才使我們及時瞭解上級的指示和下面的情況，我們的功勞簿上一定要給衛戍區的通信戰士們記上一筆。”

中央電視臺播放的所謂《反革命暴亂真相》紀錄片中有這樣一個鏡頭：6 月 3 日下午，一輛 212 吉普車在永定門外大街羅家園被誤認爲軍隊指揮車，一男一女把右前輪胎放了氣。其實，這輛車屬於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剛剛爲解放軍戒嚴部隊運送完通信器材，隨車的通信參謀張建新在幾位好心的轉業軍人掩護下，才連人帶車離開。

北京衛戍區除了在通信線路上全力保障解放軍戒嚴部隊的

需要，在通信器材上竭盡全力。只要解放軍戒嚴部隊所需的通信器材，凡是庫房裏有的，統統貢獻出來，即使庫房裏沒有的，也要想方設法幫助購買。

6月6日，有六個解放軍戒嚴部隊單位先後來電話讓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幫助解決無線電對講機通信裝備的各類電池，當時庫房裏沒有對講機，電池數量也遠遠不夠。通信處半數成員騎自行車外出尋找，叫開一家家商店的門，買齊後又一送送到了各單位。

北京戒嚴以來，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共為擔負戒嚴任務的52個單位調整電話線路1百多條，新安裝電話1百余部，支援其他部隊輕型被複綫50公里，單機110部，各種型號鐵線、磁鐵總機、電池等，並幫助購買各種日常必需設備3百多件。

1989年6月3日下午5點30分，王安瀾正在通信處值班室考慮派誰去天安門廣場開通總機，通信參謀孫強身穿便衣，手提兩個鼓囊囊的塑膠食品袋匆匆走了進來，身後跟著同樣打扮的四名士兵。王安瀾的火氣一下子冒了上來：“什麼時候啦，還想著吃！”“不，處長，我們是來請戰的。”孫強一邊說一邊從食品袋裏掏出用報紙包了一層又一層的電話機和工具。

“噢？好樣的，真有你的！”王安瀾一看，頓時樂了。

北京衛戍區通訊處的電話總機室設在天安門城樓東觀禮台下方。孫強帶領四名通信兵出發，機智地穿過東長安街上混亂的人群，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的廣場上響徹著請願學生和聲援群眾的口號聲、呼喊聲。天安門城樓東觀禮臺上的廣播線已被民眾剪斷，一些民眾在東觀禮台前來回走動。

“不行，防止尾巴，按第2方案進入。”孫強對四名通信兵耳語了幾句，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繞了兩個圈，悄悄地進入了總機室。經過2個多小時的調試，終於開通了直達北京軍區司令部的電話和2部自動電話。

深夜12點，孫強剛返回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辦公室的電話鈴聲又響了。北京軍區司令部要求通信處派人趕赴天安門廣場接應第38集團軍部隊，並保障有線電話的暢通。王安瀾考慮到孫強剛從天安門廣場回來，情況比較熟悉，便讓他帶領兩名通信兵去執行任務。

此時，通往天安門廣場的柏油路上橫起了一道道路障。天

安門城樓東觀禮台前有 003 號裝甲車被點燃，火光沖天，濃煙滾滾。爲了不暴露總機室所在，孫強帶著兩名通信兵繞道進入了總機室。他們一直堅守在總機室門口，6 月 4 日凌晨 1 點 30 分，終於迎來了抵達天安門城樓前的第 38 集團軍部隊。

就是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總機室的 4 部電話，及時保障了天安門廣場上的部隊與清場指揮部之間的有線電話通信聯絡。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緊握孫強的手說：“關鍵時刻你們可幫了大忙，感謝北京衛戍區的同志！”

6 月 4 日上午 8 點鐘，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又接到北京軍區指示，迅速派人到天安門廣場調 2 條電話線路給第 38 集團軍前進指揮部。通信處指派電話維修班副班長劉金山帶領士兵陳修強，身著便衣前去執行任務。他倆沿著牆根悄悄地向天安門廣場方向靠近，來到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西北門前，第 38 集團軍已在此處設了警戒區，警戒區外聚集大批因屠殺而紅了眼的群眾。

劉金山心想：怎麼辦？如果硬闖警戒區，不僅會被民眾發現，而且警戒線上的士兵發現我們是老百姓裝束，也會誤解。

“改道繞行怎麼樣？”士兵陳修強湊過來小聲說。“不行，已經沒有時間了。”“那——”“闖！我在前你在後。只要還剩一個人，也要按時完成任務。”劉金山把嘴貼在陳修強耳朵上說。

劉金山和陳修強剛剛跨進警戒區，執勤士兵就邊鳴槍邊叫喊：“退回去，快退回去！”劉金山邊跑邊喊：“我們是軍人，來執行任務的！”並掏出土兵證，一連經過值勤哨兵的 4 次檢查，終於按時到達指定地點，協助第 38 集團軍調好了通信線路。

從 6 月 3 日至 6 月 4 日，在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期間，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機房和報房的工作量陡然增加，許多在部隊受阻時失散的官兵紛紛來電，所有的維修員、話務員都在無聲而緊張地工作著。

“喂，北京衛戍區總機嗎？我是 XX 軍 X 師 X 團的連長，請接一下我們團。”

“您知道代號嗎？”

“不知道。”

“您知道所在的大概地點嗎？”

“不知道。”

這是 6 月 4 日，解放軍戒嚴部隊某部一位連長打給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總機話務員高瑞平的一通電話。這位連長在部隊被民眾沖散的時候，與自己的部隊失去了聯繫。

“什麼都不知道，這可怎麼辦呢？”高瑞平心裏急壞了。可不，這麼多解放軍戒嚴部隊，不僅都使用不熟悉的臨時部隊代號，而且所在的地點隨時都有變化。為幫助對方查到所在部隊的地點，高瑞平一連接了 6 個單位，終於找到了這位連長所在部隊的準確位置。

平時，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總機日話務量在三千個左右，這次最高峰近六千個。許多女話務員的胳膊紅腫了，嗓子喊啞了，但她們人人在決心書上寫下了：不管困難多大，一定要堅決完成任務。北京實施戒嚴以來，女話務員們接轉電話 23 萬多次，沒有出現一次差錯。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報房裏比平時更緊張，工作量成倍增加。

第八節、武裝部系統協助解放軍戒嚴部隊

外界至今尚未注意到，北京衛戍區還有一個系統在北京戒嚴期間起了相當作用，那就是北京市各區、縣的人民武裝部（人武部）。北京武裝部系統利用地緣、人緣優勢，為解放軍戒嚴部隊開進時擔任嚮導，提供指揮部地點，幫助收攏失散官兵等，例如第 27 集團軍部隊於 6 月 2 日便裝分批進駐人民大會堂，第 54 集團軍部隊於 6 月 3 日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都曾得到北京武裝部系統及時而有力的幫助。

1989 年 6 月 13 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發出一份通報，表彰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該通報指出：6 月 3 日，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在這場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鬥爭中，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在區、縣黨委、政府和上級軍事機關（指北京衛戍區）的領導下，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發揮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積極疏導群眾，清除路障，為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創造了有利條件；他們積極組織民兵配合戒嚴部隊和公安部門維護社會治安，護廠、護礦、護店、護村，保衛國家財產和人民群眾正常的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秩序；他們主動為戒嚴部隊服務，協同有關部門為部隊排憂解難；他們積極搶救傷患，收容失散的官兵，收集部隊散失的槍支彈藥，等等，為穩定首都的局勢起到了積極作用。

1989 年 6 月 15 日，北京市政府和北京衛戍區聯合召開了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系統幹部大會，總結“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工作，表彰先進模範單位和個人。中國官方媒體有關這一次大會的報導稱：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的鬥爭中，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充分發揮地方軍事部門人熟、地熟、社情熟的優勢，積極主動地配合解放軍戒嚴部隊行動，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解放軍總參謀部的通報表彰。

根據這一次會議所透露的資料，1989 年 6 月 3 日，當解放軍戒嚴部隊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武力清場行動之時，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奉命為部隊的開進充當嚮導，開闢通道等，

成爲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得力臂膀。

北京市崇文區人民武裝部爲了便於部隊開進，在本區範圍內的 7 個街道辦事處都派有 2 名人武幹部，在第一線坐鎮指揮，並爲解放軍戒嚴部隊準備了一百份北京市區交通圖。爲了使解放軍部隊官兵免遭“暴徒”圍攻、毒打，按時到達指定地點，不顧自身安危，5 次派人爲解放軍戒嚴部隊充當嚮導。

1989 年 6 月 3 日，北京市所有城區的人民武裝部部長和政委都親自帶領民兵到各主要路口，疏導群眾，爲解放軍戒嚴部隊開闢通道。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武裝部和預備役防化團的 27 名官兵，與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區委、區政府的成員一起帶領 5 百多人，從 6 月 3 日上午 9 點鐘到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在六部口、復興門立交橋等主要交通要道，巡邏執勤 19 個小時，配合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和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從“暴徒”手中搶救出一車軍用裝備，並冒著生命危險錄取了一些“暴徒”的反革命罪證。

此外，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的幹部職工，頂著“暴徒”的磚頭、石塊，積極搶救和收容受傷失散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

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在大力協助解放軍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同時，還積極組織民兵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工廠和商店的正常生產和營業。王府井大街是商業網點比較集中的繁華地區，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武裝部配合有關部門，組織了 6 百多名民兵和群眾，晝夜巡邏執勤，使這條擁有一百多個店鋪的商業大街沒有遭到破壞。

首都鋼鐵公司是國家的重點企業，也是“暴徒”們破壞的主要目標。首都鋼鐵公司人民武裝部按照公司黨委的部署，及時組織了有 7 千多名民兵參加的護廠隊，日夜巡邏，一夥“暴徒”幾次試圖衝擊首都鋼鐵公司，均被民兵護廠隊有效地驅散，保證了生產的正常進行。

北京市通縣人民武裝部和預備役團在 16 個千人以上的工廠抽調了 4 百名基幹民兵，組成了應急預備營，配合公安部門擔負全縣工廠、機關等重要目標的治安保衛任務。

據有關部門統計，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總共發動十余萬民兵護廠、護店、護校、護路等。

第九節、北京衛戍區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241 名官兵）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衛戍區司令員閻同茂中將

衛戍區政委李進民中將

衛戍區副司令員何尙純少將

衛戍區副政委曹丁大校

衛戍區參謀長陳漢文大校

衛戍區政治部主任董道聖少將

衛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衍成少將

衛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楊貴珍大校

警衛第 3 師師長秦濤大校

警衛第 3 師參謀長李勝堂上校

警衛第 3 師教導隊隊長張金明

警衛第 3 師司令部科長袁成喻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團長李旦生中校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副參謀長鄧國民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政治處主任吳濟收少校（現任河北省邢臺市橋東區國稅局局長）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指導員張付臣上尉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專業軍士程志仕（河北省邯鄲市人）

警衛第 3 師團政治處主任車光明少校

警衛第 3 師團郭副參謀長

警衛第 3 師營教導員張躍少校

警衛第 3 師班長陳貴水

警衛第 3 師士兵董振軍

警衛第 3 師副團長黃小平中校

警衛第 3 師團司令部炮兵股股長姚乃武

警衛第 3 師團司令部通信股股長遲洪勝

警衛第 3 師團司令部作戰訓練參謀賈文儒

警衛第 3 師團政治處保衛幹事乙體順
警衛第 3 師團司令部小車司機苑繼國
警衛第 3 師上尉股長田學東（駐守蘋果園派出所）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團長辛中原上校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政委萬金華上校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參謀長姚振懷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政治處主任馬占業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特務連連長張繼良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 3 炮連連長張玉興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5 連指導員李志革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6 連連長汪建新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6 連指導員齊文廣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8 連指導員岑建賢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後勤處志願兵趙德旺（山東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 1 炮連班長唐興耿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3 營營部班長劉風忠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 3 炮連班長左從元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 3 炮連副班長孔憲金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3 營營部書記李促農上等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3 連士兵楊立峰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9 連士兵周立新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9 連士兵趙建軍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第 9 連士兵孫斌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營長冷傑松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指導員李修喜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張玉生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劉立柱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張秀國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沈紅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張海東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解栓良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江文平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蘇濤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連長鄧爲榮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士兵廖雄偉（湖南省汨羅市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連班長鄒楚雄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第 9 連士兵劉加林（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江蘇省大豐縣人）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第 6 連士兵王偉春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第 9 連士兵李如華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第 9 連士兵陳幹

警衛第 1 師某團副團長譚先成（曾擔任鄧小平隨身警衛 3 年多）
警衛第 1 師陸海空儀仗大隊副大隊長程志強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隊長秦新民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教導員宋焱星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副隊長孫恩堂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隊員李宏升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戰士隊員王道喜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隊員王建芳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隊員黃東亮（武術隊教官）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隋參謀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隊員姚文生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武術散打訓練隊隊長郝振國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隊員劉武勤（陝西省鳳翔縣人）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志願兵句國旗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第 3 中隊中隊長馬海德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戰士隊員王傳波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隊員張樹同
警衛第 1 師幹部隊隊員梁啓義（1974 年入伍，正連級）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處長王安瀾上校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參謀張建新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通信參謀孫強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電話維修班副班長劉金山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電話維修班士兵陳修強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總機話務員高瑞平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報房專業軍士張紅軍

警衛第 1 師師長孫本勝（榮成市埠柳鎮東姚家山村人。1990 年 9 月調任北京衛戍區副參謀長，1994 年 12 月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1996 年晉升為少將軍銜。2002 年 2 月，升任北京衛戍區政委。）

警衛第 1 師作警科參謀賴雙平（湖北省廣水市平林鎮李橋村人。1998 年 3 月任警衛第 1 師第五團副參謀長，2001 年 2 月任警衛第 1 師第五團參謀長。）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政委葛忠君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指導員王建新（現任江蘇通州市信訪室主任）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第 3 連士兵常青（1989 年兵）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 5 連士兵韓海鵬（陝西渭南市人，1989 年兵）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第 5 連士兵蕭金光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第 9 連士兵黃孝軍（1989 年兵）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 5 連士兵高勝利（陝西渭南市人，1989 年兵）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 5 連士兵張帆（陝西省渭南市人，1989 年兵）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第 2 連士兵靳根紅（1988 年兵）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4 團第 1 連士兵張彥豐（1988 年兵）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5 團政治處宣傳股副股長李亞紅（江蘇人）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5 團警衛連士兵顧學謙（山東人，1989 年兵）

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5 團第 1 連士兵薛建雄（陝西人，2001 年從警衛第 1 師後勤部轉業）

警衛第 1 師步兵營營長李彥田（河北深澤人。歷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管理處政治協理員、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直工處副團職幹事、政治協理員、副處長、處長、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管理處處長、北京衛戍區後勤部副部長、北京市朝陽區武裝部部長、中共朝陽區常委。）

警衛第 1 師副團長于齊周（安徽人。後來任北京衛戍區 52609 部隊團長。1994 年 1 月轉業，歷任中國新興集團總公司秘書處秘書、新興經營開發公司副總經理、新興房地產開發公司資產保全部副部長、綜合業務部副部長、新興實業公司總經理助理兼辦公室主任、新興實業公司新興房地產公司副總經理。2006 年 11 月起任上海新興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警衛第 1 師某團司務長趙立正（陝西省富平縣留古鎮人。歷任警衛第 1 師某團後勤處處長、警衛第 1 師後勤部副部長。）

警衛第 1 師專業軍士雷應東（1987 年兵，2001 年轉業）

警衛第 1 師副營職幹事劉江平（歷任營教導員、北京市人事局幹部調配處幹部、主任科員、副處長、考試錄用處處長、流動調配處處長、北京市石景山區區長助理、中共石景山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警衛第 1 師士兵田中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1 師連長馬德獻

警衛第 1 師士兵田健（四川人，1988 年兵）

警衛第 1 師士兵任明輝（四川人，1988 年兵）

警衛第 1 師士兵牛小兵（1988 年兵）

警衛第 1 師士兵雷永青（1989 年兵）

警衛第 1 師士兵黃偉（1988 年兵）

警衛第 1 師團長何訓祥

警衛第 1 師高炮團士兵曲曉昭

警衛第 3 師副師長李潤和（後升任警衛第 3 師師長，因 1994 年 9 月 20 日田明建事件被撤職，現在京西賓館當經理。）

警衛第 3 師警衛連班長党健（1986 年兵，2000 年退伍）

警衛第 3 師機要科參謀史志剛（山西省沁源縣人。轉業後任北京市東城區體育局助理調研員。）

警衛第 3 師通信營營長張培忠（山東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1 團坦克 3 連士兵秦建軍（1988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1 團連長黃登平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劉慧（河北省無極縣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士兵馬躍（山東人，1989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邱志棟（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武京偉（河南省鄭州市）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張紅衛（河南省商丘市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陳文立（河南省商丘市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胡冠忠（山東省單縣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徐正倉（山東省巨野縣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王鳳海（河北省沧州市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牛子民（河北省邯鄲市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殷軍（江西省九江市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王學紅（山西省昔陽縣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宋可（山西省昔陽縣人）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曹鼎（山西省昔陽縣人）

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于洪（山西省昔陽縣人）警衛第 12 團 105 炮兵連士兵劉春林（山西省昔陽縣人）

警衛第 12 團高炮連士兵王斌（1988 年兵）

警衛第 12 團第 1 營第 2 連士兵楊文斌（山西省太原市人，1988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陳永紅（1989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梁潤華（1989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趙海珠（1989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蘇謙（1989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1 營第 3 連連長饒國清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1 營第 3 連指導員周迎林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2 營第 6 連連長鮑振華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後勤處運輸股股長李加增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張明田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張連元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蘇衍現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趙俊山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曲建業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簡宏民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王則賓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陳斌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駕駛員盧子豪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營第 8 連士兵孟立志（河北省石家
莊市無極縣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營第 8 連第 2 排排長張振勇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3 營第 8 連第 2 排班長曹孝國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高炮連士兵李永茂（1989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2 營第 3 連士兵李英平（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第 2 營第 6 連士兵魏東軍（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89 分隊士兵周中雪（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坦克 2 連士兵李忠凱（1988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坦克 2 連連長張永德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2 炮連士兵宋學鋒（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2 炮連士兵邢計身（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2 炮連士兵尹長印（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2 炮連士兵李高波（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2 炮連士兵晉趁興（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2 炮連班長馮玉鎖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2 團 2 炮連副班長張洪星

警衛第3師警衛第12團衛生隊隊長賀青海
警衛第3師警衛第12團衛生隊軍醫段戌昌
警衛第3師警衛第12團衛生隊軍醫孫英緒
警衛第3師警衛第12團衛生隊軍醫熊玉清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副團長鄧健康（安徽省宿縣人。歷任警衛第3師13團團長、第63集團軍189師參謀長、北京軍區聯勤部司令部後勤工作研究室副師職研究員、山西省軍區臨汾軍分區司令員。2006年8月起任臨汾軍分區司令員。）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機炮連士兵楊斌（1989年兵）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2營2炮連連長張昊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2營2炮連指導員龍天平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1營營長王清峰（1989年3月）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1營營長靳懷亭（後升任團副參謀長）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1營1炮連連長楊偉民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1營1炮連副連長蒲記星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1營1炮連指導員王偉（1989年3月）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1營1炮連指導員凡細夥（凡金元）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3營炮兵連士兵劉長青（1989年兵）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副政委康健民（後來曾任北京市海澱區人防局局長）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裝3連連長吳建新（轉業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某局）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裝3連指導員王坤生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裝3連排長郭運動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裝3連排長李虎山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裝3連排長王軍琪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特2連士兵王占軍（1989年兵）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1連連長李建興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1連裝甲車駕駛員向愛民（現在在深圳）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特3連班長陳博（河南省南陽市人）

警衛第3師警衛第13團第2營炮兵連士兵王烈（山西省太原市人，1988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榴彈炮 3 連士兵馬曉剛（山西省太原市人，1988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 3 營機槍連士兵谷志中（山西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士兵楊志剛（1987 年兵，1990 年 12 月退伍，歷任河北省磁縣經委職工、磁縣西固義鄉武裝幹事、武裝部副部長、武裝部部長、中共磁縣西固義鄉黨委副書記。2006 年 4 月起任中共磁縣路村營鄉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志願兵、炊事班班長張朝印（1992 年調任軍犬隊隊長）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特務連副連長胡繼珍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特務連排長張兮

警衛第 3 師警衛第 13 團裝甲 2 連排長白如果（後來升任連長）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7 分隊連長王貽波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士兵岳正中（山東省巨野縣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士兵呂先勝（山東省巨野縣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士兵蘭斌（山東省巨野縣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連長胡銀前（後來升任團參謀長，轉業到北京市順義某機關任職）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副連長宋犇（轉業到河南省南陽市檢察院）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指導員董念清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副指導員陸金榮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士兵王本彪（山東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士兵郭振華（河北省泊頭市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士兵史厚銘（安徽省和縣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 88 分隊士兵王斌（安徽省合肥市人，1987

年兵)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第 6 連指導員楊鎖勞 (陝西省商洛市人, 轉業回原籍)

警衛第 3 師炮兵團第 2 連副連長史文藝 (後來曾任第 9 連指導員)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4 連連長陳喜山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 2 中隊班長張曉東 (現在在山西)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3 連士兵曲小昭 (1988 年兵, 現居河南省洛陽市。)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3 連班長夏文濤 (安徽省舒城縣人)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3 連班長徐峰 (安徽省舒城縣人)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3 連士兵周瑚珊 (安徽省淮南市人)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3 連士兵周春喜 (安徽省淮南市人)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3 連士兵陳春林 (安徽省淮南市人)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3 連士兵原博 (陝西省西安市三原縣人)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政治處正連職幹事邵水準 (歷任高炮團政治處主任、政委、北京市朝陽區紀委副主任。2007 年 6 月起任北京市朝陽區建外街道辦事處副主任。)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第 4 連連長陳喜山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 2 中隊班長張曉東 (山西人)

警衛第 3 師高炮團班長左勇

警衛第 3 師營教導員李恩軍 (山東省鄆城縣人。歷任警衛第 3 師科長、北京軍區政治部編研室副團職幹事、正團職幹事、副師職幹事、北京市平谷區武裝部政委。2003 年 4 月起任中共北京市平谷區委常委、武裝部政委。)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軍務處正營職參謀張朝 (歷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部軍務處副處長、衛戍處處長、北京市石景山區武裝部部長。)

北京衛戍區紀委副書記楊貴珍大校 (湖北省隨州市何店人。1990 年 7 月晉升少將軍銜。後任武警北京市總隊副參謀長。)

北京衛戍區警衛某師後勤部財務科副營職審計員成田華 (江蘇

省灌南縣長茂鎮頭圖村人。歷任北京衛戍區警衛某師後勤部財務科正營職審計員、財務科副科長、財務科科長、北京衛戍區警衛某師後勤部副部長。1999 年 8 月轉業，歷任中國昊華化工集團總公司財務處處長、財務部副主任、審計部主任。2004 年 6 月起任中國昊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第十五章、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概況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屬於正師級建制單位，下轄 9 個支隊（支隊相當於團），隸屬於武警總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建制。總隊司令部位於北京市朝陽區，距離工人體育館不遠。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張文奇兼任總隊長，北京市副市長蘇仲祥兼任第一政委，張世瑗任政委，李崇岱任副政委，孟振德任副總隊長，劉紅軍任參謀長。

1982 年 6 月 19 日，根據《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黨組〈關於人民武裝警察管理體制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精神，中國人民解放軍擔負地方內衛任務及內衛值勤的部隊移交公安部門，與公安部門原來實行義務兵役制的邊防、消防等警種統一起來，重新組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後來將交通、水電、黃金三支基建部隊一併改編為武警系列。

1983 年 4 月，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部在北京成立，李剛任司令員，公安部部長趙蒼壁兼任政委。武警部隊屬於中國國務院編制序列，由中國國務院、中央軍委實施雙重領導，實行統一領導管理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武警部隊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條令、條例和有關規章制度，享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同等待遇。軍銜等級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銜等級，軍銜前冠以“武警”名稱。

1983 年 2 月，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2 師，以及警衛第 1 師兩個資歷最老的團隊——警衛第 1 團和警衛第 2 團，改編為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

1989 年 12 月 12 日，經中國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北京軍區守備第 4 師改編為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2 總隊，直屬武警部隊總部領導，所屬守備第 13 團、守備第 14 團、守備第 15 團、守備第 16 團、炮兵團分別改編為武警北京市第 2 總隊第 15 支隊、第 16 支隊、第 17 支隊、第 18 支隊、第 19 支隊，原營、連建制改為大隊、中隊建制，排、班名稱不變。

與此同時，北京軍區守備第 3 師一部分也改編為武警部隊，隸屬於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2 總隊。

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2 總隊下轄第 10 支隊至第 19 支隊。歷任總隊長馬自新、劉啓龍、衛新根，歷任第 1 政委蘇仲祥、張良基，歷任政委陳獻智、李漢文。依照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武警部隊總隊的第 1 政委由公安廳廳長或公安局局長擔任，並兼任黨委第一書記。

在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2 總隊組建的同時，原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改稱為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1 總隊。1993 年，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1 總隊升格為副軍級建制單位。

1999 年 2 月 3 日，根據中央軍委【1999 年】1 號文件《關於調整武警部隊體制編制有關問題的通知》精神和武警部隊的決定，武警北京市第 1 總隊、第 2 總隊合併，重新成立武警北京市總隊，原轄各支隊番號不變。以原武警北京市第 2 總隊為基礎組建武警北京市總隊第 3 師。

重組後的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屬於正軍級建制單位，下轄第 1 師、第 2 師及若干直屬支隊。後又增加了第 3 師和第 4 師。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武警部隊總隊中，只有北京市總隊屬於正軍級建制，這突出了首都北京的重要性。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擁有一些特殊的部隊：國賓護衛隊，護衛迎送訪華的外國元首，組建于 1984 年 6 月；警犬中隊，駐地在燕山腳下；中國武警散打隊，組建於 1985 年；禮炮支隊，前身為第 63 軍步兵第 188 師第 564 團第 3 營，1984 年在北京衛戍區獨立第 17 團的基礎上，改編組建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11 支隊，承擔鳴放禮炮的任務。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王芳兼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第一政委，李連秀武警中將任司令員，張秀夫武警少將任政委，范志倫武警少將任副司令員，張海天武警少將任副政委，王文理武警少將任參謀長，高文遠武警大校和安鯨駒武警大校任副參謀長，張海天武警少將任政治部主任，馮延齡武警大校和呼延振邦武警大校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節、奉命執行北京戒嚴任務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由於本身職責所在，從 1989 年學生運動爆發之初，就開始奉命執行警戒執勤任務。在 1989 年 5 月 20 日北京實施戒嚴，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進京之前，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是維護北京社會秩序的主力部隊。

1989 年 4 月 22 日，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奉命出動，擔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追悼會的警戒執勤任務，並在西長安街佈置警戒線，護送胡耀邦的靈車前往八寶山公墓。

1989 年 4 月 27 日，北京各高校逾十萬學生上街遊行，抗議中共當局將學生運動定性為“一場動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於 4 月 26 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學生第一次大規模地上街遊行。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奉命出動，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門，在大學校園集聚的海澱區，以及海澱區通往天安門廣場的各交通路口，尤其是在西長安街上，佈置重兵，組成一道道嚴密的攔截線。學生遊行隊伍沿途得到逾百萬北京各界民眾的強烈支持，在民眾的協助下，突破一道道武警和公安警察的人牆。但在整個過程中，警民雙方沒有發生任何流血衝突。“4.27 大遊行”的成功，不僅表明學生突破了恐懼，也證實北京各界民眾對學生運動的強烈支援，從而給中共當局造成了極大的震撼。

1989 年 5 月 4 日，北京各高校學生再次大規模上街遊行，紀念五四運動 70 周年。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奉命沿途警戒，但沒有組成人牆，封閉交通路口。

1989 年 5 月 20 日，北京進入戒嚴狀態，逾 20 萬解放軍戒嚴部隊湧入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雖然隸屬於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也承擔戒嚴任務，但在逾 20 萬的解放軍正規軍面前，不能不相形見绌，從第一線退居下來，不再引人注目。

此後，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主要是集中力量加強對原來由其負責的重點機構和主要目標的警戒執勤，並調動部分力量協助、配合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執行戒嚴任務。武警部隊北京

市總隊所出動的部分力量主要是機動部隊和特勤部隊，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防暴部隊。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5 支隊作為機動部隊，曾多次協助、配合解放軍戒嚴部隊行動，包括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參與六部口搶奪彈藥車的行動，其下屬的第 8 中隊（防暴機動中隊）於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為挺進天安門廣場的第 38 集團軍擔任開路先鋒。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的特警隊，在北京戒嚴期間曾奉命擔任中共領導人李鵬、喬石等人的貼身警衛，每天 24 小時嚴密保護，按照中國官方的事後評價是，“出色的做到了保護首長安全的工作”。特警隊主要成員趙向陽因此立功受獎。

趙向陽是特警隊作戰隊教練兼隊員，數次獲得世界軍警大賽手槍速射冠軍，在奧地利大賽中創造的 4 秒鐘轉身命中 7 個移動頭靶的記錄至今無人能破（即背身向靶從距靶 25 米處向 30 米線走動，從拔槍、子彈上堂到轉身擊中 7 個移動頭靶只用了 4 秒鐘的時間），其比賽的錄像資料現被多個國家的特種部隊用做教材使用。趙向陽在服役期間曾數十次執行國家級警衛任務，包括美國總統雷根訪華、英國女王訪華的警衛，西藏“平暴”期間作為首長的貼身警衛，十幾次完成公安部和中央警衛局交辦重大任務。趙向陽於 1990 年退役，奉調山西省太原市組建特警大隊，任大隊長兼總教練。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負責警衛的範圍非常廣，包括中南海以外的中央、北京市所屬的非軍事官方機構、外國駐京使館等。第 9 支隊擔負外國駐華使館區的警衛任務，該支隊的特勤中隊擔負使館區的防生化襲擊、防爆炸、防劫持人質、防沖闖使館等處突反恐任務。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負責警衛的機構和地點還包括釣魚臺國賓館、人民日報社、全國政協、中國廣播電視部、中國航天航空部、中央電視臺、中央電視發射台、中國財政部、中央檔案館、北京密雲水庫、北京機場、天安門、明代十三陵、故宮等，秦城監獄、北京第一監獄、第二監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等，以及首都鋼鐵公司等重要的工廠企業。

北京的警衛工作由中央警衛局、中國公安部警衛局、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和北京衛戍區多重警衛構成，中共核心機關由中央警衛團負責，軍事機關由北京衛戍區負責，政府機構、外

國駐華機構、重要地點由武警北京市總隊負責。中央警衛局也叫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九局，是中央軍委直接管轄的警衛部隊，負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和中央軍委領導人的安全警衛任務。

第三節、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

1989年6月3日下午5點50分，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5支隊司令部值班室響起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上級緊急命令：第5支隊機動中隊組成防暴隊，於當晚8點鐘趕到位於北京郊區西山的北京軍區司令部領受任務。

第5支隊機動中隊屬於執行特殊任務的防暴中隊，部隊番號是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5支隊第8中隊。

接獲緊急命令，第5支隊副政委李林中校和支隊參謀長迅速趕到機動中隊佈置任務，從全中隊官兵中挑選出身體棒、素質好、作風硬的50名隊員，按照上級要求，帶上了頭盔、盾牌、電警棍，又安裝攜帶了1千發催淚彈。武警防暴隊由武警北京市總隊司令部內衛處副處長王志強、第5支隊副政委李林、第8中隊中隊長姜超成等人率領指揮，王志強、薑超成事後被中央軍委、中國國務院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自北京出現學生運動以來，機動中隊雖然多次奉命執行任務，但攜帶這麼多的催淚彈還是第一次。一看這陣勢，機動中隊的隊員們悄悄議論：這回要動真格的了！大家飽飽地吃了一餐，乘車急速向北京軍區司令部開進。

當晚接近8點鐘的時候，在北京軍區司令部的作戰室，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政委劉振華等將領縝密地佈置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任務，寬大的軍用地圖上若干個三角形紅色箭頭，從東線、西線、南線、北線直插和平請願學生所集聚的天安門廣場。坐鎮指揮的周衣冰、劉振華時而踱步沉思，時而看看手錶，像是在等待什麼。

“報告！武警的防暴隊來了！”

“好！快讓他們來。”

50名武警防暴隊隊員走進了北京軍區司令部作戰室，直接面對眾多的將軍領受任務。

劉振華親自做政治動員：“同志們，目前，首都從學潮引起的動亂現在已經發展成暴亂。他們燒軍車，搶軍火，傷害解放軍戰士，性質已經變了。”“現在搞打、砸、搶、燒、殺的不是學生，也不是群眾，而是反革命暴徒。我們要開進天安門，清理天安門廣場，要保衛黨，保衛人民，保衛國家政權，保衛

首都北京！你們的任務就是要爲大部隊把路打開。”

“沒人阻攔要進，有人阻攔也要進！”周衣冰揮著手大聲地說，“軍區前進指揮部首長直接指揮你們，今天一定要開進天安門廣場！”

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由北京軍區的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副政委陳培民中將、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少將、訓練部王部長等人組成，隨同第 38 集團軍一起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據中國軍方資料透露：劉振華、周衣冰當時面色凝重冷峻，話語落地有聲，武警防暴隊隊員們頓覺肩上擔子很沉重。深深感到：能不能把路打開到天安門廣場，絕不是小小的 50 個防暴隊隊員的問題，而關係到大部隊能否按時到位，關係到整個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全局。他們握緊拳頭，互相注目，意思是說：這一次，豁出去了！

武警防暴隊所承擔的第一個任務，是將周衣冰、劉振華和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成員護送到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解放軍戒嚴部隊前進指揮部設在軍事博物館，周衣冰身爲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劉振華也是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成員，他們後來在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坐鎮指揮。

當晚 9 點 10 分，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車隊從北京軍區司令部機關大院出發。武警防暴隊的三輛軍車行駛在車隊最前頭，其後就是周衣冰、劉振華等人乘坐的指揮車。

不料，剛出北京軍區司令部機關大院，武警防暴隊的一輛軍車就熄火了，再也發動不著。

兵貴神速，北京軍區負責人立刻命令武警防暴隊把這輛熄火的軍車推到路邊，由剩餘的兩輛軍車繼續開路。這樣一來，武警防暴隊 50 名隊員只剩下 27 個人。換句話說，50 個人的擔子壓在了 27 名武警防暴隊官兵的肩頭上。

車子時而閉燈緩行，時而亮燈急駛，27 名武警防暴隊隊員低著身子，俯在車中，掩蔽前進。一連闖過了十幾個路口。

當晚 9 點 55 分，車隊行駛到北京市石景山區五棵松路口，遇到了第一道障礙。民眾將幾十輛卡車、公共汽車、麵包車橫在馬路上，築成一道路障。其中只有一輛麵包車比較好排除，幾十名部隊士兵下車欲將麵包車向路北推開，而一大群民眾在另一頭死死頂住麵包車。雙方哎呀哎呀叫喊著僵持不下，麵包

車的後面還有黑壓壓的逾萬名群眾，激情地叫喊聲援。

見此情景，機動中隊中隊長姜超成帶領 6 名武警防暴隊隊員急速上前，準備將民眾驅散。誰知，姜超成和 6 名隊員剛一下車，石頭、磚塊、啤酒瓶就雨點般地向車子飛來，劈哩啪啦，把武警防暴隊的指揮車、大轎車上的玻璃頓時砸得粉碎。司機王永剛、防暴隊隊員咸國坤被砸得滿面流血。

中國官方資料聲稱：武警防暴隊隊員都有超群的絕技，倘若有人襲擊阻攔，不要說使用槍支武器，就是憑他們的一雙鐵拳，也可以將人揍扁。然而面對著黑壓壓的人群，其中雖然也有“暴徒”，但絕大多數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一時難以區別，爲了儘量避免誤傷群眾，27 名武警防暴隊員跳下車，一手握盾牌，一手握警棍，雄赳赳氣昂昂地向攔路的人群逼近。

磚頭、石塊象冰雹一樣迎面砸來，但 27 名武警防暴隊員在盾牌的掩護下，沒有一人倒下，更沒有一人後退。

望著這群打不倒的武警防暴隊隊員，一些群眾嚇懵了，手裏舉著磚頭不敢往下砸。就在這一瞬間，27 名武警防暴隊隊員抖動盾牌，從胸腔裏發出一個共同的聲音：“沖啊----”這一喊，把前面一群頂著麵包車的民眾嚇壞了，大叫：“快跑呀！防暴隊來了！”直往後跑，後面的人群一聽這喊聲也不知道來了多少防暴隊員，也四逃而散。

中國官方資料吹噓說，就憑這一聲怒喝，武警防暴隊闖過了第一道難關。北京軍區負責人事後說：“過去，我說你們這些小夥子有三鐵：鐵頭、鐵臂、鐵腿，現在看來這三鐵還得加一鐵：鐵嗓子！”

當晚 10 鐘過後不久，武警防暴隊終於將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政委劉振華護送到軍事博物館。

6 月 4 日凌晨 1 點鐘左右，周衣冰、劉振華趕赴人民大會堂，設立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直接指揮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從軍事博物館到人民大會堂有地下戰備通道，周衣冰、劉振華應當是利用地下戰備通道抵達人民大會堂的。

第四節、爲第 38 軍挺進天安門廣場開道

武警防暴隊的 27 名防暴隊隊員將周衣冰、劉振華和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護送到軍事博物館以後，開始執行第二項任務，爲沿著西長安街挺進天安門廣場的第 38 集團軍開道。當時，第 38 集團軍部隊已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集結待命。

1989 年 6 月 4 日晚上 9 點 30 分，第 38 集團軍部隊從軍事博物館前出發，比預定的出發時間提前了半小時，由西往東浩浩蕩蕩地向天安門廣場挺進。急速趕到的武警防暴隊，被部署在隊伍前列，使用警棍、催淚彈，爲第 38 集團軍開路。

晚上 10 點 55 分，部隊到達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路口，一場激烈的拉鋸戰已經在這裏持續了半個多小時。

拉鋸戰的中心地帶，是兩大排公共汽車，前後交錯，象荏磚縫一樣堵在路當中。公共汽車的西面是第 38 集團軍先頭部隊，東面則集聚著上千名群眾。官兵們試圖繞過公共汽車驅趕民眾，剛一露頭，民眾們劈頭就是一陣悶棍。

當時，第 38 集團軍先頭部隊尚未開槍，抵擋不住圍堵人潮的衝擊，只好暫時退回到公共汽車的西面。民眾的情緒更爲高漲，在公共汽車的東面砸碎交通隔離墩，運來成車的啤酒瓶、帶釘子的大木棒作爲武器，以公共汽車爲屏障，阻止部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正在民眾得意之時，突然，從公共汽車上跳下了數十條黑影。這些黑影落地後幾乎聽不到聲音，20 多個警用盾牌唰唰唰很快組成一個半圓形，看不到人體的任何部分。在昏暗的路燈照射下，只看見頂部有 20 個渾圓的物體在微微晃動，發出一束束幽幽的綠光。

騷動的人群炸鍋了，喊叫著跳著跑著退出 10 多米開外，隨後又收住腳步，回頭屏氣觀望。他們雖然從電影上看見過坦克、裝甲車，可從來沒見過這半圓形發光體。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進口的秘密武器，不過是武警防暴機動中隊平時自編自練的警棍盾牌術的一種隊形。早在兩年前，爲了應付突發性暴力事件的發生，經中國公安部批准組建了第 8 防暴機動中隊，開展警棍盾牌術專業訓練，把警棍和盾牌與訓

練有素的士兵結合在一起，閃、站、騰、挪；撲、打、戳、撇，發揮群體的合力，其威力的確奇特無窮。

就在人群還在發愣的當口，這個半圓形的隊形，一瞬間化為三個三角形，猶如三把尖刀插入人群中。頓時，陣陣催淚瓦斯的煙霧沖天而起，阻止部隊開進的民眾又驚恐地後退十幾米。轉眼之間，三把尖刀又收在一起，變換為奇特的半圓隊形，第 38 集團軍部隊乘勢跟進，推開公共汽車，大踏步前進。

部隊越向前開進，道路越加艱險。大批民眾把住各個路口，攔截軍車。有的爬到路旁的樹上扔燃燒瓶，有的從高樓上端起花盆往下砸，有的爬上尚未竣工的建築物，舉起水泥塊劈頭蓋臉砸下來。一輛送牛奶的卡車停在路上，民眾蜂擁而上，數千瓶牛奶成了襲擊官兵的武器。

武警防暴隊每前進一步，都遇到民眾頑強阻攔，每沖一道路口，都會有一場爭鬥。中國官方的宣傳資料聲稱：武警防暴隊過處，碎磚頭、碎石塊、碎玻璃，在地上鋪了一層，西長安街竟象戈壁灘。武警防暴隊員的 27 面盾牌上 9 厘米多寬的有機玻璃觀察鏡竟全打沒了，27 頂綠色的頭盔打得成了白色，27 名隊員人人血跡斑斑。

武警防暴隊依然鬥志旺盛，士氣高昂。司機王永剛頭部負傷，但他仍然一手握著盾牌，抵擋著磚塊、石塊的襲擊，一手緊握方向盤開車前進。防暴隊隊員咸國坤臉上挨了一磚頭，左眼腫成一條縫，半邊臉腫得象發麵饅頭一樣。同伴們幾次勸他上車坐下休息，但他仍然靠著另一隻眼的微弱視力，跑前跑後，為大夥運送催淚彈。

中國官方資料說，此時此刻，武警防暴隊早已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不到天安門廣場，決不甘休！

經過數十場殊死的搏鬥，武警防暴隊闖過了 18 個大路口，16 個小路口，到達復興門立交橋附近，眼前又是一片火海。

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馬路上的隔離墩、鐵欄杆被民眾弄得七扭八歪，當作路障。搭在上面的棉被，倒上汽油點燃，成了一道火氣牆。有的路段上撒了煤面，又在煤面上澆上油點燃，紅紅的大火連成一片。復興門立交橋橋頭，12 輛點燃的公共汽車排列在馬路當中，濃濃的黑煙直透天際，熊熊的火光燒紅了夜空，還不時傳來汽車油箱沉悶的爆炸聲。

如何排除橫在眼前燃燒的公共汽車，爲大部隊開進天安門廣場打開通道？武警防暴隊原先打算推開公共汽車。但公共汽車已經被燒得滾紅發亮，熱辣辣的火浪，烤得人難以近身。

就在這時，從武警防暴隊指揮車傳出一個令人心焦的消息：在復興門立交橋另一端的民族文化宮門前，有 5 百名卡口的武警北京市總隊第 1 支隊官兵，已被民眾圍攻了數小時，包括支隊長楊德安在內不少官兵受了傷，生命危在旦夕！

武警防暴隊隊員聽到這個消息，全都急了！面對橫在馬路中間熊熊燃燒的公共汽車，全然不顧自身安全。迎著火浪，有的幾個箭步從兩輛燃燒的公共汽車中間越過，有的從公共汽車燃燒的窗戶魚躍而過，有的一個就地十八滾，從公共汽車底下過去，隨後一個鯉魚打挺，撲向民眾。緊接著，第 38 集團軍部隊急速開過來，裝甲車掀翻了燃燒的公共汽車，官兵們蜂擁而上，搶救被圍困在民族文化宮門前的武警部隊官兵。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30 分，武警防暴隊穿過西單、六部口到達新華門，在新華門前受了 50 多天悶氣的警衛部隊官兵激動得流淚，有的振臂高呼：“向武警戰士學習，致敬！”有的對空鳴槍致意。武警防暴隊隊員一聽，更來勁了，新華門前被民眾燃燒的火障成了他們軍事表演的跨欄，一個個手握盾牌、警棍，嗖嗖魚躍而過。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45 分，武警防暴隊抵達天安門城樓前，隊員們興奮不已，有的在金水橋前翻起了空心筋斗。看著這些奮戰五個小時，仍然生龍活虎、鬥志昂揚的小夥子，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誇獎他們是：一支過硬的隊伍，英雄的隊伍，應該記頭功。

武警防暴隊的 27 名官兵能夠爲第 38 集團軍逾萬名官兵打開一條通往天安門廣場的通道嗎？能夠驅散西長安街上數以萬計的圍堵民眾嗎？能夠排除一道道用卡車、公共汽車所組成的堅固路障嗎？當然不能。事實上，是第 38 集團軍部隊奉命開槍殺人，才驅散了民眾，是步兵第 112 師的裝甲車隊撞開了一道道車障、路障。

第五節、配合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至 6 月 4 日清晨，在中共當局下令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的過程中，解放軍戒嚴部隊承擔主要的任務，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奉命配合解放軍戒嚴部隊行動，派遣一些部隊在北京市一些交通要道和天安門廣場負責警戒，並驅散民眾。

6 月 3 日，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接到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之後，立即調動機動部隊，分派任務。機動部隊除了駐紮北京城區的第一支隊、第五支隊以外，大都來自於駐紮北京郊區的部隊，因為駐紮北京市區的部隊平時所負責警戒執勤的機構，本來就屬於重點保護目標，在這個非常的時刻，更需要加強警戒，根本無兵可調。

6 月 3 日晚上，進入北京城的各個交通要道佈滿了攔截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民眾，不要說僅僅攜帶警棍、盾牌、催淚彈的武警，就是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都遭到逾百萬北京民眾的攔截，或停滯不前，或改道迂回開進。從北京郊區奉命向北京市區開進的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部隊，基本上被民眾所攔截，沒能抵達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北京市通縣的北關橋，是進入北京市區的一個重要交通路口，集聚了不少堵截軍車的民眾，人聲鼎沸，奉命向北京市區開進的武警部隊約兩百名官兵及其軍車在此地遭到攔截，進退兩難。

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一支隊於 6 月 3 日下午接到命令，部隊於當天晚上開進到西長安街，接應向天安門廣場挺進的第 38 集團軍部隊。當晚，第一支隊部隊在支隊長楊德安的親自率領下，經西單大街、西單大街南面路口，抵達西長安街。在西單路口，第一支隊部隊即遭到成千上萬民眾的強烈圍堵，部隊被分割成多塊，部分部隊始終未能脫困，只有五百多名官兵隨同支隊長楊德安沖上西長安街。

當晚，西長安街上集聚的民眾最多，從軍事博物館到西單路口，又是民眾攔截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重點地段，數以萬計的民眾形成一股又一股人潮，第一支隊的五百多名官兵不僅不能驅散人群，為解放軍戒嚴部隊疏通前進道路，自身反而淹沒在

人海之中。

人潮一波波湧向第一支隊的五百多名官兵，即使使用警棍、盾牌和催淚彈也抵擋不住，被迫一步步後退，從西單路口一直退到復興門立交橋另一端的民族文化宮門前，背靠民族文化宮，抵抗民眾的衝擊。支隊長楊德安率領武警官兵用警棍反擊圍堵的民眾，並一次次施放催淚彈，就是無法擺脫民眾的圍困，被壓迫到民族文化宮前小小的區域內，處境十分艱難，包括支隊長楊德安在內不少官兵都受了傷。一直到第 38 集團軍一路開槍過來，才解除了第一支隊五百官兵的危機。

此後，武警開始在西長安街上發揮威力，揮動警棍，驅散殘留的民眾。大學生鍾羅白在天安門廣場西邊遇到手持大棒的武裝警察，被截住了退路，挨了兩大棒，一棒打在相機上，將閃光燈打掉，另一棒打在腿上。北京大學學生麻子在新華門前被掄著棍子的武警追打。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1 點 30 分，在第 38 集團軍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從天安門城樓東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內湧出一批又一批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軍人和武警，列隊通過金水橋，直逼長安街，民眾漸漸地被軍警逼退。當時，英國《泰晤士報》的東亞編輯梅兆贊（Jonathan Mirsky）正站在金水橋上觀望情況，突然間，站在他身旁的一個年輕人突然彎身倒向金水橋欄杆。梅兆贊連忙拉他起來，見到他的白襯衣上有迅速擴散的深紅色血跡，胸膛上中了一槍。梅兆贊準備動身離開之際，十多名武警從紫禁城的闕門沖了出來，不消數分鐘便到了他跟前，開始毆打金水橋上的民眾，兇狠地把民眾打倒在地，然後使用手槍近距離射擊。

梅兆贊開始加快步伐，試圖繞過這些武警，快速逃離現場。一位武警快步過來，梅兆贊一看情況不妙，連忙高舉雙手，用普通話（中文）表明身份說：“我是外國記者。”這位武警破口大罵：“外國記者？去你媽的！”然後就用長長的警棍使勁毆打他。梅兆贊以為武警會把他打倒在地，然後再近距離開槍射殺，就象對待其他的在場民眾一樣。還好，梅兆贊畢竟是高鼻梁、藍眼睛、金頭髮的外國人，武警在打掉了他的一顆牙齒和打斷了他的左臂後，揚長而去，並沒有對他開槍射擊。

當時有另一家外國報社的一位記者和一位義大利駐中國大

使館的副領事在場，都曾經挺身而出，喝止武警，救援梅兆贊，將負傷的梅兆贊帶離現場。

在 6 月 4 日凌晨的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武警北京市總隊部分官兵奉命在天安門廣場配合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這些武警官兵主要是防暴警察，頭戴鋼盔，手持警棍、盾牌和催淚彈發射器。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正當最後階段的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展開之際，從天安門廣場東南角方向開過來武警部隊的四輛軍用卡車，經過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的警戒區，停在毛主席紀念堂南門東側，緊靠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身後，從車上下來二、三百名防暴警察，人人頭戴防護面具，左手持透明玻璃鋼盾牌，右手拿電警棍，整隊從毛主席紀念堂西側向紀念碑一帶跑去，配合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自南往北向紀念碑底座推進，在預定地點----紀念碑底座的東南角設置了警戒線。

從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到 5 點 30 分左右，爲了驅趕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防暴警察揮舞警棍毆打學生，並多次施放了催淚彈，迫使數千名學生加快了撤離速度，從東南角撤離天安門廣場，向前門東大街、前門大街湧去。

第六節、武警北京市總隊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80 名官兵）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兼總隊長張文奇（山西省孟縣人）

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總隊第一政委蘇仲祥（遼寧省遼陽市人）

總隊政委張世瓊（湖北省隨縣人。後來升任武警部隊副參謀長兼武警部隊北京市第 1 總隊政委。1995 年晉升少將警銜。1996 年因“李沛瑤事件”被免職。後任武警部隊學院副政委、政委、院長。2006 年退役後任中國警察協會維和警察專業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中國警察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禁毒基金會副理事長。）

總隊副政委李崇岱

總隊副總隊長孟振德

總隊參謀長劉紅軍（山東省平邑縣人。歷任武警北京市第 1 總隊總隊長、武警北京市總隊副總隊長、總隊長、武警部隊副參謀長。2005 年 7 月起任武警部隊副司令員。1997 年晉升少將警銜，2006 年 7 月晉升中將警銜。）

總隊司令部內衛處副處長王志強（事後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總隊內衛處副處長胡廣才

總隊內衛處參謀何躍

總隊共青團工作指導委員會書記高連興

總隊共青團工作指導委員會副書記王維城

第 1 支隊支隊長楊德安（河南省臨潁縣人，立一等功）

第 1 支隊第 9 中隊班長王九洲

第 1 支隊第 9 中隊士兵邊全鎖

第 1 支隊士兵田曉泉

第 1 支隊士兵李富強

第 1 支隊士兵齊一凡

第 1 支隊衛生隊軍醫張樹喜

第 1 支隊衛生隊司機李擁政

第 1 支隊衛生隊化驗員王玉文（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第 1 支隊衛生隊衛生員張啓軍
第 1 支隊衛生隊衛生員萬平
第 1 支隊衛生隊隊長汪克應

第 5 支隊副政委李林中校
第 5 支隊第 8 中隊中隊長姜超成（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第 5 支隊第 8 中隊隊員咸國坤
第 5 支隊第 8 中隊司機王永剛

總隊政治部幹部處副處長姚立功（山凱撒州縣高都鎮南街村人。歷任武警部隊司令員秘書、武警總部政治部幹部處處長、幹部部副部長、部長。2005 年任武警福建總隊政委。2007 年 7 月晉升少將警銜。）

第 2 支隊排長嚴冰（1962 年 10 月出生於湖北省廣水市應山辦事處，畢業於湖北省廣水市應山 1 中。）
第 2 支隊士兵李常滿
第 2 支隊第 5 中隊排長許德華（河南省虞城人）

第 3 支隊士兵紀文平
第 3 支隊士兵吳振利

第 4 支隊政委殷德江
第 4 支隊參謀長徐清理
第 4 支隊政治處宣傳股股長朱玉年（歷任第 4 支隊政治處副主任、第 9 支隊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武警部隊北京第 1 總隊醫院政委、武警部隊北京總隊後勤部直屬政治處主任、武警部隊北京總隊第 8 支隊政委。2006 年 1 月起任北京市東城區建外街道辦事處副處級調研員。）
第 4 支隊排長王景東
第 4 支隊士兵李迎三
第 4 支隊第 12 中隊中隊長李鳳進（山東省諸城縣昌城公社人，現任北京市宣武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助理調研員）

第 5 支隊支隊長李同秀

第 5 中隊指導員吉旭初（陝西省華縣人。歷任武警北京總隊政治部幹部處正連職幹事、副營職幹事、第 9 支隊第 4 大隊教導員、政治部副主任、第 5 支隊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政委、第 9 支隊副政委。2005 年 3 月轉業，任中共北京市朝陽區委辦公室幹部。2005 年 12 月任中共北京市朝陽區委辦公室副調研員。）

第 5 支隊第 1 大隊第 3 中隊隊員傅士忠

第 5 支隊第 1 大隊第 3 中隊隊員丁懷國

第 5 支隊排長席栓柱（河南省上蔡縣人，現任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5 支隊副支隊長）

第 6 支隊第 6 中隊中隊長張德廷（河南省濮陽市人。歷任第 6 支隊軍械股股長、教導隊大隊長、支隊黨委常委、後勤處處長、副支隊長、北京市東城區東華門街道辦事處助理調研員、工會主席、中共東城區委東華門街道工委委員。）

第 6 支隊士兵劉海述

第 6 支隊士兵袁文會

第 6 支隊第 11 中隊士兵何宏偉

第 6 支隊士兵解志傑

第 6 支隊士兵李金山

第 7 支隊警務股股長展希龍（歷任第 13 支隊第 4 大隊大隊長、第 13 支隊副參謀長、第 8 支隊副支隊長。2000 年 9 月轉業，歷任北京市朝陽區潘家園街道辦事處副處級調研員、朝陽區垡頭街道辦事處武裝部部長、中共朝陽區垡頭街道工委副書記。2005 年 3 月起任朝陽區垡頭街道辦事處副主任。）

第 7 支隊士兵趙廣東（北京市平谷區馬坊鎮河北村人。1987 年兵。2000 年以來任北京市平谷區馬坊鎮河北村治保主任。）

第 7 支隊第 2 中隊士兵孫世偉（1988 年兵）

第 8 支隊參謀賈英廷（河北省井陘縣人。2003 年 7 月起任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第 8 支隊第 12 中隊士兵劉斌（1987 年兵）
第 8 支隊第 1 中隊士兵劉青義（1988 年兵）

第 9 支隊士兵宋正平
第 9 支隊士兵高峰
第 9 支隊士兵宋建國
第 9 支隊第 1 中隊班長皇甫尙勇
第 9 支隊第 14 中隊副指導員余建軍（江蘇省興化市人）
第 9 支隊第 14 中隊指導員吳培銀
第 9 支隊第 14 中隊中隊長蘇運宗
第 9 支隊第 14 中隊班長金勝謨（1986 年兵）
第 9 支隊第 2 大隊第 5 中隊中隊長李明良
第 9 支隊第 2 大隊第 5 中隊士兵肖鍵（1988 年兵）
第 9 支隊士兵侯俊山（河北省邯鄲市人，1989 年兵）
第 9 支隊班長唐曉強（1987 年兵）

第 10 支隊第 7 中隊士兵孔令傑
第 10 支隊第 2 中隊士兵劉曉平
第 10 支隊第 13 中隊士兵李軍

某支隊副支隊長李樹仁
某支隊士兵樂明之
某支隊士兵李洪生
某支隊班長趙國棟
某支隊士兵李東華
某支隊士兵牟華敏

排長姜彬（後來歷任指導員、教導員、政治處副主任、主任、副政委。2007 年 3 月轉業，歷任北京市東城區司法局助理調研員、副調研員。）

第 17 支隊張春（1974 年入伍，1991 年轉業，現任職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區政法委。）

某支隊士兵琚安全（現任河南省安陽市檢察官培訓中心副主任）
某支隊士兵梁學偉（河北省定州市人，1990 年復員後到內蒙古

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某大型國營企業工作）
天安門大隊國旗隊隊員齊磊（湖北省襄樊市人）

第十六章、陸軍第 12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節、陸軍第 12 集團軍概況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12 集團軍隸屬於南京軍區，軍部駐地在江蘇省徐州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83226”，郭錫章少將任軍長，溫宗仁少將任軍政委，陳炳德少將和徐文義少將任副軍長，胡道仁大校任軍副政委，季崇武大校任軍參謀長，徐盤榮任軍副參謀長，張玉江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李昌林任軍政治部副主任，狄玉增任軍後勤部部長，史水洲少將任軍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副書記。

第 12 集團軍是乙類簡編集團軍，前身是解放軍中原野戰軍第 6 縱隊，由晉冀魯豫軍區第 6 縱隊發展而來。1945 年 11 月 5 日，八路軍太行軍區 6 分區機關及其直屬隊、韋傑支隊、石志本支隊、秦基偉和向守志支隊在河北省磁縣馬頭鎮組建成晉冀魯豫軍區第 6 縱隊，王宏坤任司令員，段君毅任政委，王近山和韋傑任副司令員，張廷發任參謀長，鮑先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轄第 16 旅、第 17 旅和第 18 旅，共有 13000 多名官兵。

第 6 縱隊組建後即在峭河、白晉、安北等地區作戰。1946 年 7 月，晉冀魯豫軍區野戰指揮部組成後，第 6 縱隊隸屬晉冀魯豫野戰軍建制。8 月，出擊隴海線，首戰蘭封告捷，繼而攻克杞縣。接著參加定陶戰役，主攻大楊湖。10 月，參加巨野、鄆南戰役。在這次戰役中，該縱隊第 52 團第 1 連班長王克勤成為全軍聞名的戰鬥英雄。11 月，參加滑縣戰役，接著又回師魯西南，參加巨（野）金（鄉）魚（台）戰役。

1947 年 3 月，第 6 縱隊由王近山任司令員，杜義德任政委，鮑先志任政治部主任。3 月下旬，參加豫北反攻，攻克湯陰城。6 月 30 日，第 6 縱隊作為解放軍第 2 野戰軍的主力之一，突破國民黨軍隊黃河防線，參與揭開解放軍戰略進攻序幕的魯西南戰役。之後，又相繼參加了六營集、羊山集戰鬥。魯西南戰役結束後，第 6 縱隊隨同第 2 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先後攻佔 10 餘座縣城。10 月下旬，參加高山鋪戰役。

1948年5月9日，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改稱解放軍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隨即參加宛東戰役。7月，與解放軍桐柏、陝南軍區部隊一道攻克襄陽、樊城。第17旅第49團因戰功卓著，被解放軍中原軍區授予“襄陽特功團”榮譽稱號。11月6日，參加淮海戰役。12月6日，在友鄰部隊協同下從西面直取雙堆集國民黨軍隊核心陣地，搗毀國民黨軍隊黃維兵團指揮中樞，殲敵近萬人。

1949年2月9日，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和部隊番號的命令，中原野戰軍第6縱隊在安徽省蒙城地區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軍，隸屬於解放軍第2野戰軍第3兵團。第3兵團副司令員王近山兼任軍長和軍政委，肖永銀任副軍長兼軍參謀長，李震任軍副政委，李開湘任軍政治部主任，王耀顯任軍後勤部部長。第16旅改稱第34師，第17旅改稱第35師，第18旅改稱第36師。全軍共有25000多名官兵。

隨後，第12軍參加渡江戰役。1949年4月8日，攻佔了安徽樅陽縣鐵板洲。4月21日，強渡長江，隨即展開千里追擊，挺進浙贛線，攻佔縣城18座。10月，向大西南進軍。在友鄰部隊協同下，攻佔了重慶及川東地區。12月，參加成都戰役。

1951年3月，第12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入朝參戰。時任軍長為曾紹山。4月17日，第12軍參加第5次戰役，在第1階段打垮土耳其旅，突破“三八線”，進逼漢江；在第2階段突破加里山，截斷洪陽公路，激戰自隱裏，直抵兄弟峰。11月，參加金城防禦作戰。1952年11月底，第12軍作為戰役預備隊，參加上甘嶺戰役。入朝參戰期間，第12軍湧現了一大批英雄模範人物，其中，楊春增、伍先華、胡修道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

1954年4月，第12軍撤離朝鮮回國，先後駐防安徽省合肥市和江蘇省徐州市，隸屬於華東軍區。

1960年代，第12軍第34師出現著名的“郭興福教學法”（郭興福時任步兵第34師第100團第2連副連長），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積極宣導下推廣全軍，掀起了著名的“大比武”運動。

1984年7月13日，奉中央軍委命令，第1軍軍部率領步兵

第 1 師，第 12 軍步兵第 36 師，南京軍區炮兵第 9 師師部及炮兵第 3 團、炮兵第 14 團，工兵第 2 團，福州軍區炮兵第 3 師，開赴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參加防禦作戰，總兵力 26624 人，是第一支參加老山輪戰的部隊。1985 年 5 月 31 日，老山戰區防務由第 67 軍接替，第 1 軍於 6 月 5 日撤出前線。殲敵 5007 人，自身陣亡 404 人（其中第 1 軍陣亡 359 人，第 12 軍陣亡 38 人，炮兵第 9 師陣亡 7 人）。

1985 年，第 12 軍改編為陸軍第 12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34 師（當時部隊代號“83651”）、步兵第 36 師（當時部隊代號“83235”）、原隸屬於第 60 軍的步兵第 179 師（即著名的“臨汾旅”，自 1971 年開始擔任迎外賓表演任務，當時部隊代號“83123”），共計三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第 2 師（當時部隊代號“83567”）、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83230”）、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83422”）、工兵團、通信團、偵察營等部隊。

1998 年後，步兵第 34 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旅，坦克第 2 師改編為裝甲師。

第二節、六月四日緊急空運進京

在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中，第 12 集團軍是最晚接到進京命令的一支部隊，也是最晚進京的一支部隊。

第 12 集團軍進京部隊包括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34 師的步兵第 101 團、集團軍直屬炮兵旅、高射炮兵旅、坦克第 2 師的偵察營，以及部分保障部隊，總共近萬名官兵。其中，步兵第 36 師出動了 6726 名官兵、447 台車輛。第 12 集團軍組成以軍長郭錫章少將、軍政委溫宗仁少將爲首的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部隊。

在 1989 年北京戒嚴行動中，第 12 集團軍是南京軍區首支、也是唯一一支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南京軍區對此非常重視，特地組成以軍區副司令員郭濤中將、副政委史玉孝中將爲首的戒嚴指揮部（組），隨同第 12 集團軍部隊進京。

以往的研究者和相關資料都沒有提及坦克第 2 師部隊曾經進京執行戒嚴任務，但是，筆者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有關坦克第 2 師師史的這麼一段記錄：“1989 年 6 月 4 日，該師偵察營奉命空降赴北京參加北京戒嚴。”

步兵第 36 師師部駐地在江蘇省徐州市新沂縣，下轄步兵第 106 團（當時部隊代號“83236”）、步兵第 107 團（當時部隊代號“83237”）、步兵第 108 團（當時部隊代號“83238”）、坦克團、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3239”）、高射炮兵團，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偵察連、工兵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 36 師屬於甲類編制步兵師，是第 12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也是解放軍的王牌師之一。1989 年 4 月，該師被中央軍委確定爲首批應急機動作戰部隊，是解放軍 6 個快速應急反應師之一。該師的步兵第 106 團是解放軍中唯一的“百將團”，包括王近山、杜義德、韋傑、尤太忠、李德生、李震、曾紹山、肖永銀、趙蘭田、馬寧在內的約 110 名將軍出身于該團。

步兵第 36 師久經戰火考驗，國共內戰時期作爲解放軍第 2 野戰軍最資深的王牌部隊，歷經定陶戰役、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中生俘國民黨軍隊第 12 兵團司令官黃維中將。1951 年 3 月至

1954年4月，該師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84年7月，該師臨時調歸第1軍指揮，開赴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成為首批投入老山戰區輪戰的部隊，該師炮兵團100反坦克滑膛炮連被中央軍委授予“神炮連”榮譽稱號，步兵第107團第7連連長溥永先被中央軍委授予“勇於獻身好連長”榮譽稱號。

步兵第34師師部駐地在江蘇省徐州市，下轄步兵第100團（紅軍團）、步兵第101團，步兵第102團、坦克團、炮兵團、高射炮兵團，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偵察連、工兵連、警衛連等部隊。

坦克第2師師部駐地在江蘇省徐州市，下轄坦克第5團、坦克第6團、坦克第7團、裝甲步兵團、炮兵團，以及師直屬的偵察營、通信營、工兵連、警衛連等部隊。

集團軍炮兵旅旅部駐地在江蘇省徐州市。

集團軍高射炮兵旅旅部駐地在江蘇省鎮江市。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央軍委向南京軍區下達緊急調兵命令：第12集團軍部隊火速空運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在此之前，第12集團軍已經接獲部隊開動的預先號令，提前做好了部隊開進的所有準備，包括部隊的緊急收攏，官兵的政治思想動員，後勤保障，等等。

南京軍區緊急調集軍用飛機，並大量徵用中國民航的大型客機、運輸機，從徐州的大郭莊軍用機場、九里山軍用機場等機場，將第12集團軍進京部隊的近萬名官兵及其武器裝備空運進京。大郭莊軍用機場位於徐州市雲龍區東苑，在徐州市南部。九里山軍用機場位於徐州市九里區，在徐州市北部九里山南面，如今已成為空軍後勤學院的校園。

6月4日清晨，第12集團軍軍長郭錫章少將、軍政委溫宗仁少將所率領的前進指揮部以及先頭部隊，已經飛抵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當天，第12集團軍進京部隊的近萬名官兵以及武器裝備全部空運抵達南苑機場。空運的速度之快，規模之大，超過了先前空運進京的空降兵第15軍，在解放軍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可見情況之緊急。

有消息說，中央軍委在6月4日之前已決定調動第12集團軍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本來計畫通過鐵路系統，使用軍用

專列將第 12 集團軍部隊輸送進京，但考慮到當時學生運動已經蔓延全國各地，並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援，對通過鐵路系統長途輸送第 12 集團軍部隊進京沒有把握，擔憂途中會受到學生和民眾攔截。調兵計畫一延再延。6 月 3 日晚上，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北京開槍鎮壓以後，全國各地出現學生和民眾的抗議浪潮，包括南京長江大橋在內，多處鐵路交通被阻斷，第 12 集團軍部隊最終只得使用空運的方式進京。

第三節、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督戰隊

緊急空運進京的第 12 集團軍部隊，一直待在北京南苑機場集結待命，沒有開進北京城內執行戒嚴執勤任務。第 12 集團軍名義上是擔任由中央軍委直接掌握指揮的預備隊，其實是扮演督戰隊的角色，主要任務是對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實行監督，起著威懾作用，如果哪一支部隊執行戒嚴任務不力，或出了狀況，就隨時開上去解決問題。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解放軍戒嚴部隊雖然完成了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但狀況不是很穩定，包括第 28 集團軍、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許多部隊的表現讓中共當政者感到不滿和憂慮。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曾經十分擔憂地表示：如果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有一個班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出問題，就會引起連鎖反應，後果不堪設想。

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的當天，解放軍戒嚴部隊僅僅控制了天安門廣場區域，逾十萬解放軍戒嚴部隊擠在小小的區域內，後勤供應緊張，就連天安門廣場附近的東、西長安街都不在控制範圍之內，更何況整個北京市區。包括西長安街街在內，北京城內仍然到處聚集著憤怒的抗議人潮。解放軍戒嚴部隊的狀況也不是很穩定，第 28 集團軍和其他一些部隊，都沒有按照命令抵達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因此，當時的中共當政者對控制北京局勢並沒有信心，覺得有必要繼續調動可靠的解放軍部隊進京“勤王護駕”。

將第 12 集團軍作為“勤王護駕”的部隊緊急空運進京，不是沒有原因的，該集團軍在國共內戰時期是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的解放軍第 2 野戰軍的老部隊，也是主力部隊，在“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中的表現均十分搶眼，深受鄧小平信任。該集團軍又一直是南京軍區的主力部隊之一，一向擔負著“解放臺灣”的任務，裝備精良，戰鬥力強，確實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威懾力量。

第 12 集團軍進京部隊由於身負督戰隊的重任，緊急空運進京之時，攜帶重裝備武器，其中包括 447 輛坦克和裝甲車。而

同樣也是空運進京的空降兵第 15 軍、第 26 集團軍，在 5 月中旬空運進京時只是攜帶隨身的武器裝備，也就是輕武器，並不包括坦克和裝甲車。這個情況表明，緊急空運進京的第 12 集團軍，作為中央軍委和鄧小平、楊尚昆所信任的督戰隊，所承擔的任務的確與眾不同。

一位曾經參加過北京戒嚴行動的第 12 集團軍軍人透露：在第 12 集團軍部隊緊急空運進京之前，許多其他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只有軍官配發足夠的子彈，正、副班長每人配發 5 發子彈，士兵們根本就沒有配發子彈。在第 12 集團軍部隊緊急空運抵達北京南苑機場之後，其他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士兵才每人配發 10 發子彈，而第 12 集團軍部隊的士兵卻每人配發 130 發子彈。第 12 集團軍並接獲明確的命令，在執勤過程中可以開槍掃除一切有礙於完成任務的人，不象其他解放軍戒嚴部隊沒有命令不准開槍。【注釋 1】

1989 年 6 月 4 日以後，北京局勢的發展還算是在中共執政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的控制之中，緊急空運進京，作為預備隊（督戰隊）的第 12 集團軍並沒有派上用場，一直駐紮在在南苑機場集結待命。儘管如此，中央軍委和解放軍總參謀部還是對第 12 集團軍完成戒嚴任務的表現予以好評，該集團軍步兵第 36 師直屬偵察連於 1989 年 6 月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989 年 7 月，解放軍戒嚴部隊完全控制了北京，北京的局勢趨於平穩，第 12 集團軍接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所下達的命令：結束預備隊（督戰隊）的任務，撤離北京，返回江蘇省部隊駐地。7 月 15 日，步兵第 36 師部隊率先乘坐軍用火車專列離開北京，返回江蘇省部隊駐地。該集團軍其餘的部隊於 7 月 18 日乘坐軍用火車專列離開北京，返回江蘇省部隊駐地。

【注釋 1】參見《一封戒嚴部隊士兵的信》，刊載于美國中文網路刊物《華夏文摘》。

第四節、第 12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47 名官兵）

軍長郭錫章少將

軍政委溫宗仁少將軍

軍參謀長季崇武大校

軍政治部主任張玉江大校

軍副參謀長徐盤榮

軍政治部副主任李昌林

軍後勤部部長狄玉增

副軍長陳炳德少將（江蘇省南通市人。歷任南昌陸軍學院院長、陸軍指揮學院院長、集團軍軍長、南京軍區參謀長、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1988 年 9 月晉升少將軍銜，1995 年 7 月晉升為中將軍銜，2002 年 6 月晉升為上將軍銜。）

軍政治部保衛處處長袁俊健（江蘇省建湖縣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政治部宣傳處處長、秘書處處長、步兵第 34 旅政委，大校軍銜。2006 年任上海市嘉定區武裝部政委。）

軍司令部炮兵指揮部正營職參謀盧興全（安徽省六安市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第 179 師司令部炮兵科科长、炮兵團副團長、團長、第 12 集團軍第 179 旅副旅長、第 36 師副師長、第 12 集團軍炮兵指揮部主任、安徽省軍區淮北軍分區司令員，大校軍銜。）

軍司令部參謀張文根（浙江省常山縣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營長、副團長、溫州市甌海區武裝部部長。2006 年 11 月起任溫州市甌江口開發建設總指揮部工委書記。）

軍政治部幹部處副處長劉新寶（山東省高唐縣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炮兵旅政治部主任、政委，大校軍銜。2006 年任上海市徐匯區武裝部政委。）

軍政治部組織處幹事晁玉奎（江蘇省新沂縣人。曾任第 12 集團軍軍長郭錫章秘書。2006 年任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副主任。）

步兵第 36 師師長蔣文郁

步兵第 36 師政委潘瑞吉大校（1945 年 10 月出生，浙江省溫州

市人永嘉縣渠口鄉泰石村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軍區司令部直工部政委、南昌陸軍學院政治部主任、政委、第 12 集團軍政委、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1993 年 7 月晉升少將軍銜，2002 年 7 月晉升中將軍銜。）步兵第 36 師直屬防化連第 1 排排長王永健（1990 年 9 月轉業，在山東省煙臺市煙草部門工作。）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6 團 63 分隊班長董國恩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6 團 63 分隊嶽毅（四川巴中縣人，1989 年兵）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6 團司令部文書王國銀（四川省開江縣長嶺鎮人，1987 年兵。1992 年退伍，歷任開江縣翰田壩煤礦企業管理科科长、黨委辦公室主任兼行政辦公室主任、調度室主任、副礦長、開江縣公路運輸總公司幹部、達運集團汽車 166 隊副隊長。2003 年 3 月起任達運集團開江車站站長。）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6 團專業軍士宦浩然（江蘇省金壇市人。1992 年 9 月轉業至金壇市國土資源局工作。2007 年 5 月起任中共金壇市國土資源局黨委委員。）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7 團副連長李玉清（安徽省碭山縣人。歷任步兵第 107 團指導員、安徽省軍區宿州軍分區司令部武器庫主任、教導隊副隊長、參謀、宿州軍分區幹休所所長、司令部作訓科科长。2006 年 3 月起任安徽省靈璧縣武裝部部長。）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7 團第 5 連副連長駱啓華（歷任連長、副營長、營長、師教導大隊副大隊長、步兵第 108 團參謀長。）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8 團團長甄邢兵（河北省新樂市人，其父甄申曾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歷任步兵第 36 師副師長、江蘇省軍區宿遷軍分區司令員、鎮江軍分區司令員，大校軍銜。）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8 團第 1 營營長司久水（歷任步兵第 108 團副參謀長、參謀長、步兵第 34 師步兵第 103 團團長、第 34 旅副旅長、安徽省軍區淮南軍分區參謀長、合肥警備區參謀長、淮南軍分區司令員。2007 年 1 月起任合肥警備區司令員。）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8 團汽車連士兵楊健偉（1989 年兵）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8 團第 7 連班長唐家寶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8 團第 7 連連長齊應華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8 團班長李學堆（浙江省蒼南縣人。1991 年 10 月退伍，在蒼南縣靈溪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工作。1998 年創辦蒼南縣正昌淡水養殖有限公司，任董事長。）
步兵第 108 團士兵牛磊（四川省金堂縣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108 團指導員蘇西群（安徽省淮南市人。歷任步兵第 108 團政治處主任、步兵第 106 團政委、第 12 集團軍摩托化第 36 旅政委，頒授大校軍銜。）

步兵第 36 師高炮團團長王甯（山東省榮城市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高炮旅旅長、第 31 集團軍高炮旅旅長、第 31 集團軍步兵第 91 師師長、上海警備區參謀長、江西省軍區司令員、第 31 集團軍軍長，頒授少將軍銜。）

步兵第 36 師高炮團政治處組織股股長胡偉民（山東省滕州市人。歷任高炮團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江蘇省軍區沭陽縣武裝部政委。2005 年 12 月起任江蘇省宿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

步兵第 36 師坦克團政委周西敏（安徽省濉溪縣人。1991 年 7 月轉業，歷任中共安徽省淮北市糧食局黨委副書記、淮北市糧油工貿總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黨委書記、淮北市建委主任、黨委書記。2003 年 1 月起任淮北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步兵第 36 師排長曹玉波（山東省臨淄市臨淄區稷下街道東安次村人。歷任副連長、指導員、政治協理員、教導員、政治處副主任。2003 年 4 月調任江西省軍區九江軍分區瑞昌市武裝部軍事科科長。）

步兵第 36 師排長王磊（江蘇人。1992 年 7 月至 2005 年 10 月任交通銀行徐州分行分理處主任。2005 年 10 月起任南通保利貿易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經理。）

步兵第 34 師師長徐承雲大校（安徽省肥東縣人。歷任第 12 集

團軍副軍長、南京軍區副參謀長、第 12 集團軍長、南京軍區裝備部部長、參謀長、副司令員。1992 年晉升少將軍銜。）

步兵第 34 師政委李長才（歷任第 12 集團軍副政委、第 31 集團軍政委、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2006 年 12 月任南京軍區副政委，晉升中將軍銜。）

坦克第 2 師政委陸鳳彬少將

坦克第 2 師師長朱文泉大校（江蘇省濱海縣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參謀長、副軍長、第 1 集團軍軍長、南京軍區參謀長，2002 年 10 月起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中共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高炮旅參謀長謝德志（安徽省鳳陽縣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高炮旅副旅長、旅長、第 12 集團軍裝備部部長，大校軍銜。2006 年任上海陸軍預備役師師長。）

高炮旅後勤部政工科幹事金躍民（浙江省東陽市人。歷任第 12 集團軍高炮旅後勤部政工科科長、戰勤科科長、副部長、部長、高炮旅農場政治處主任、政委、浙江省永康市武裝部政委。2005 年 9 月起任浙江省永康市市長助理。）

高炮旅政治部組織科副營職幹事湯浩（安徽省穎上縣人。歷任安徽省嶽西縣武裝部政委、安徽省淮北市政府駐上海辦事處副主任。）

高炮旅第 1 營排長錢葉秋（浙江省平湖市人。歷任高炮旅政治部組織科幹事、副科長、代理科長、科長、集團軍政治部組織處幹事、浙江省嘉興市秀城區武裝部副部長、浙江省軍區嘉興市軍分區組織部幹部科科長、浙江省嘉善縣武裝部政委。）

炮兵旅政委戴長友（江蘇省丹徒縣人。歷任步兵第 36 師政委、第 12 集團軍副政委、安徽省軍區副政委、政委。）

炮兵旅正連職參謀錢雪峰（江蘇省海安縣人。歷任炮兵旅正營職科長、步兵第 36 師副團職科長、炮兵旅副參謀長、副旅長、浙江省上虞市武裝部部長。2005 年 9 月起任中共上虞市委常委、武裝部部長。）

第十七章、陸軍第 20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陸軍第 20 集團軍概況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20 集團軍隸屬於濟南軍區，軍部駐地在河南省開封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4631”。梁光烈少將任軍長，楊興隆少將任軍政委，余魯生大校和丁壽岳大校任副軍長，曹學德少將任副軍政委，張祥林大校任軍參謀長，黃學祿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20 集團軍的前身是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 1 縱隊。1945 年 11 月 10 日，新四軍蘇浙軍區第 2 縱隊、第 4 縱隊和新四軍蘇中軍區教導旅在江蘇省漣水組成新四軍第 1 縱隊，葉飛任司令員，賴傳珠任政委，譚啓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賀敏學任參謀長，下轄第 1 旅（原新四軍蘇浙軍區第 4 縱隊）、第 2 旅（原新四軍蘇中軍區教導旅）、第 3 旅（原新四軍蘇浙軍區第 2 縱隊），共有 22000 多名官兵。

新四軍第 1 縱隊組建後，開赴山東作戰，參加津浦路阻擊戰，在兗州、泰安、大汶口等地，殲滅拒降的日偽軍和國民黨軍隊各一部。

1946 年 1 月 7 日，新四軍第 1 縱隊改稱山東野戰軍第 1 縱隊。6 月，收復泰安、大汶口。7 月，與魯中軍區部隊一起，在膠濟路反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後移師魯南、淮北，2 月，參加宿北戰役，協同友鄰部隊殲滅國民黨軍第 69 師。1947 年 1 月，參加魯南戰役，協同友鄰部隊全殲國民黨軍隊兩個整編師和一個快速縱隊。

1947 年 2 月，山東野戰軍第 1 縱隊改編為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 1 縱隊，葉飛任司令員兼政委，何克希任副司令員，譚啓龍任副政委，張翼翔任參謀長，湯光恢任政治部主任，第 1 旅、第 2 旅、第 3 旅依次改稱第 1 師、第 2 師、第 3 師，同時調入由中原軍區第 1 縱隊第 1 旅改編的獨立師，全縱隊共有 23000 多名官兵。2 月，在萊蕪戰役中協同友鄰部隊殲滅國民黨軍隊李仙洲集團。5 月，參加孟良崮戰役，擔任穿插分割任務，配合主力部隊殲滅國民黨軍隊整編第 74 師。6 月底後，出擊魯南，連

克費縣、峰縣、棗莊，後轉戰魯西南。9月下旬，進軍豫皖蘇邊區，攻克尉氏、鄢陵、逍遙鎮等城鎮。11月，參加隴海路破擊戰，破擊碭山至黃口段鐵路。12月，揮師西向，攻佔永城、渦陽、亳縣、柘城等地。

1948年6月，第1縱隊參加豫東戰役，先擔任阻援，後加入突擊集團，與友鄰部隊一起全殲國民黨軍隊區壽年兵團。9月，參加濟南戰役，和友鄰部隊一起在魯西南地區擔負阻擊任務，保證了濟南戰役的勝利進行。同年冬，參加淮海戰役，保障友鄰部隊圍殲國民黨軍隊黃維兵團，後又參加圍殲國民黨軍隊杜聿明集團的作戰。

1949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華東野戰軍第1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軍，隸屬於第3野戰軍第9兵團建制。劉飛任軍長，陳時夫任軍政委，張翼翔任副軍長，湯光恢任軍副政委兼軍政治部主任，廖政國任軍參謀長。第1師改稱第58師，第2師改稱第59師，第3師改稱第60師。全軍共有32000多名官兵。

1949年4月，第20軍渡江南下，進佔丹陽，截斷寧滬鐵路，後沿金壇、溧陽向廣德追殲國民黨軍隊，一部參加郎（溪）廣（德）圍殲戰。5月，參加上海戰役，攻佔平湖、金山衛，從龍華攻入上海市區，爾後擔任上海警衛任務。

1950年10月，第20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隸屬於第9兵團，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在第2次戰役中，第20軍對長津湖地區敵軍實行分割包圍，重創美軍陸軍第11師。在第5次戰役中，殲滅南朝鮮軍隊第5師和第7師的五個營；繼而又在華川地區進行防禦作戰。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第20軍湧現出志願軍特級戰鬥英雄楊根思、車樹琴（女）等英雄模範個人及“楊根思連”等英雄模範單位。

1952年10月，第20軍撤離朝鮮回國，回歸華東軍區，在山東停留一段日子後，駐防浙江。

1955年1月，第20軍參加了解放軍歷史上的首次陸海空三軍聯合渡海登陸作戰。該軍第60師作為突擊登陸部隊，在三軍協同攻克一江山島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率先攻佔守敵司令部所在的203高地，把軍旗插上一江山島主峰。

1984年7月下旬至1985年5月下旬，第20軍部隊所組成的第1偵察大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執行偵察作戰任務。第1偵察大隊共有703名官兵，其中，第1連有97名官兵（軍偵察連）；第2連有141名官兵（步兵第58師偵察連）；第3連有112名官兵（步兵第59師偵察連）；第4連有116名官兵（步兵第60師偵察連）；第5連有237名官兵（步兵第58師各團屬偵察排）。

1985年，第20軍改編為陸軍第20集團軍，下轄步兵第58師（當時部隊代號“54642”）、步兵第60師（當時部隊代號“54650”）和原第43軍步兵第128師（當時部隊代號“54663”），共計三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第11師（當時部隊代號“54676”）、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4633”）、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4635”）、工兵團、通信團、偵察營等部隊。

1996年，步兵第128師改編為武警部隊機動師。1998年後，第20集團軍全軍旅團化。步兵第58師是解放軍師改旅的試點單位，完成機械化改裝，成為解放軍中第1個機械化步兵旅。步兵第60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旅。坦克第11師改編為裝甲師後，與第54集團軍裝甲旅對調建制。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20 集團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包括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28 師，由軍長梁光烈少將、軍政委楊興隆少將爲首組成集團軍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部隊，分別從河南省的許昌市、登封市（隸屬鄭州市）向北京開進。

有未經證實的資料稱，第 20 集團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是步兵第 58 師和步兵第 60 師，而沒有步兵第 128 師。筆者經過多方查證，目前認定第 20 集團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是步兵第 58 師和步兵第 128 師。

步兵第 58 師師部駐地在河南省許昌市，下轄步兵第 172 團（當時部隊代號“54643”）、步兵第 173 團（當時部隊代號“54645”）、步兵第 174 團（當時部隊代號“54649”）、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4647”）、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646”）、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648”），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工兵營、偵察連、警衛連等部隊。

步兵第 58 師屬於甲類編制步兵師，是第 20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其前身是葉飛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閩東獨立師，戰功在解放軍中極爲突出。該師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產生了解放軍歷史上的第一個特級戰鬥英雄楊思根。在 1979 年的對越自衛反擊作戰中，該師由軍長張福鈺少將親自率領，配屬第 54 軍作戰，在東線戰場（廣西方向，西線戰場爲雲南方向）發揮了重要作用，表現不俗。

步兵第 128 師師部駐地在河南省鞏義市（隸屬鄭州市），下轄步兵第 382 團、步兵第 383 團、步兵第 384 團、坦克團、炮兵團、高射炮兵團，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工兵營、偵察連、警衛連等部隊。

該師屬於甲類編制步兵師，在國共內戰時期的番號是解放軍第 43 軍第 128 師，隸屬於解放軍第 4 野戰軍，參加了第 4 野戰軍的歷次大規模城市攻堅戰役，有“攻堅老虎”的美名。在四戰四平、錦州攻堅戰、天津攻堅戰中，第 4 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曾 3 次專門調派該師參加攻堅作戰。該師戰鬥力超強，是第 4 野戰軍的頭等主力師。

1989年5月18日夜晩，第20集團軍接到濟南軍區司令部轉達的中央軍委緊急調兵命令：第20集團軍部隊火速進京執行戒嚴任務。一接到部隊進京命令，第20集團軍黨委當即召開緊急黨委會議，快速商議了部隊進京事宜。

5月19日凌晨，步兵第58師和步兵第128師的師長、政委，集團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的負責人，以及各科科長，緊急奉召趕赴集團軍軍部，參加緊急作戰會議。首先由軍長梁光烈傳達了部隊進京命令，然後又由軍政委楊興隆作了政治動員。緊急作戰會議決定，由軍長梁光烈、軍政委楊興隆、副軍長丁壽岳、軍參謀長張祥林等人組成集團軍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部隊。

緊急作戰會議一結束，第20集團軍各進京部隊就開始緊急收攏部隊，對官兵們進行政治思想動員，做好後勤保障工作。10多個小時之後，所有的部隊開進工作準備完畢。

從5月19日下午開始，第20集團軍進京部隊陸續乘車出發，沿著京開（北京市---開封市）公路向北京摩托化開進。步兵第58師部隊從河南省許昌市出發，步兵第128師部隊從河南省鞏義市（隸屬鄭州市）出發。一路上，第20集團軍進京部隊車隊行進順利，沒有受到大的阻攔。

5月20日凌晨，第20集團軍進京部隊歷經十幾個小時摩托化開進，走完近七百公里的路程，抵達北京郊區。由於北京軍區的各集團軍部隊在進入北京市區時嚴重受阻，無法抵達預定的戒嚴執勤目標，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命令第20集團軍進京部隊暫停向北京市區預定的戒嚴執勤區域開進，臨時駐紮在北京市大興縣，休整待命。

1989年6月2日，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正式啟動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臨時駐紮北京郊區的各解放軍部隊奉命以各種方式悄悄向北京市區開進。第20集團軍進京部隊也奉命向北京市區移動，步兵第58師從北京市大興縣前移到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南苑機場。

第三節、向天安門廣場艱難挺進

1989年6月2日，第20集團軍接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部隊準備向天安門廣場進軍的預先號令。當時嚴格規定，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屬於絕密，僅傳達到軍、師一級指揮官，絕對不允許外泄。軍、師指揮官爲了保證部隊隨時可以開動，只好以各種理由督促所屬部隊官兵時刻保持良好狀態。

6月3日中午，第20集團軍接到開動命令，部隊立即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當天下午，在軍長梁光烈、軍政委楊興隆、軍參謀長張祥林等人的指揮率領下，步兵第128師部隊從北京市大興縣臨時駐地乘車出發，步兵第58師部隊從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南苑機場出發，由南向北，沿著豐台區的大紅門、凉水河橋、崇文區的永定門，向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開進。

步兵第128師部隊的龐大車隊一出臨時駐地，就引來了圍堵的民眾，但大興縣屬於北京郊區，圍堵的人數不是很多，最終未能攔住部隊車隊。

步兵第128師部隊車隊進入北京市豐台區境內，與步兵第58師部隊車隊會合，已是傍晚時分，太陽西下，天空殘雲慘紅，街道上人潮如湧，人聲鼎沸。部隊摩托化開進已經毫無可能，官兵們奉命下車徒步開進。官兵們剛一下車，就陷入了人海之中，圍堵的民眾不計其數。

第20集團軍部隊在北京市豐台區大紅門街區嚴重受阻，許多官兵一輩子都忘不了大紅門這個地名。無數的民眾蜂擁而至，把第20集團軍部隊圍得水泄不通。民眾不分男女老少，拉的拉，扯的扯，強力阻止部隊官兵前進。軍民肢體衝突時有發生。步兵第58師某團第3營營長李興平抬手看了看手錶，晚上八點整。望著近乎瘋狂的圍堵人群，李興平覺得不可思議，不禁喃喃自語：“吃錯了藥，真是吃錯了藥。”

包圍圈越擠越緊，部隊官兵漸漸被逼到了路邊，腳下是深約兩米寬約四米的大溝，如果隊伍被擠到溝下，不僅會造成傷亡，更要緊的是隊伍就此更難擺脫困境，無法到達預定的戒嚴執勤位置。士兵們手挽手拼力抵抗人潮的推搡衝擊，一個個大

汗淋淋，濕透了軍衣，有人虛脫了，腦袋軟軟地耷拉下來，雙臂卻始終纏繞著同伴。情況越來越危急。

“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向首都人民學習！堅決制止動亂！”有指揮官帶頭喊起了口號，士兵們跟著呼喊起來，恨不得使盡全身力氣，直至把嗓子喊啞。口號聲激昂而悲壯，更仿佛在表示一種懇求，懇求人們理解自己。一時間，圍堵的人群怔住了。第3營教導員李仁府又指揮隊伍唱起歌來，《人民是靠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一首接一首地唱。這支部隊唱歌素有“喊歌”之說，一個團的齊唱能震裂部隊大禮堂的玻璃。人群鬆動了，劍拔弩張的氣氛緩和了。一看部隊停止前進，有人送來了水，有人送來了粥，有人送來了啤酒香煙。

部隊重整旗鼓又奮力開進了。前面的一個營勉強沖出了包圍圈，而第3營卻受到四面圍攻。“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前進——”營長李興平大喊一聲，沖到最前面，一鼓作氣，從圍堵的人牆中擠出了一道缺口。部隊一開始前進，人群又激情起來，磚塊石頭酒瓶沒頭沒腦地砸向隊伍。第3營官兵不顧一切地向前推進，漸漸地趕上了團本隊。

一直到6月4日上午，仍有第20集團軍的一些部隊被民眾圍堵在大紅門一帶。

第20集團軍有三個團的部隊受阻於涼水河橋南側，並與上級中斷了通信聯絡，正處於一籌莫展的境地，遇上了也在此處受阻的空降兵第15軍第二梯隊部隊，於是臨時接受空降兵第15軍副軍長左印生的統一指揮，一同突圍。兩支部隊的指揮官們召開臨時協調會決定，由空降兵15軍部隊在前開路，第20集團軍的三個團梯次跟進，並確定了部隊突圍的時間和路線。

當時，涼水河橋上被大卡車和不計其數的民眾堵得死死的，部隊就是徒步開進也很難通過。根據空降兵第15軍偵察連代理排長邵玉和的偵察報告，部隊即使通過這座橋，也無法繼續開進，前方的木樨園、永定門路口已有幾支其他部隊遭到數萬名群眾的圍堵，進退不得。左印生等人決定，改道迂回開進，選擇路障少、圍堵群眾不多的路線，沿著涼水河向西走北京市豐台區馬家堡東路，突圍時間選在6月4日凌晨1點以後。

此時，上級機關派往空降兵第15軍的工作組組長趙曉強中校傳達了開槍命令，官兵們開始開槍，前進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第 20 集團軍的三個團跟隨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推進到崇文區的永定門。

永定門屬於居民密集區，圍堵的民眾數以萬計。雖然官兵們不斷開槍，仍有民眾不顧生死地加以攔截，第 20 集團軍部隊又有許多官兵被沖散了。

這時已是 6 月 4 日凌晨，很多失散官兵在昏黃的路燈下躲閃著民眾的追擊。李興平所帶領的第 3 營沿途不斷收容失散的官兵。某團的一支小分隊與部隊失散後，被一大群民眾圍困在公路環島中，見到第 3 營隊伍到來，便大聲呼救。第 3 營第 9 連指導員杜軍超急中生智，命令士兵們拉著空槍栓沖了上去，人群不知他們槍中根本沒有子彈，嚇得四散而逃。

就這樣，第 3 營一路上營救收攏了幾十名失散掉隊的官兵，衝破民眾設置的 23 道路障和人群的層層圍堵，保證了全團不丟一人一槍一彈。隊伍越走越大，幾乎又增加了一個連。

6 月 4 日凌晨 2 點鐘左右，歷經十多個小時的艱難開進，第 20 集團軍的部分官兵終於按時到達了指定位置----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

第四節、步兵第 173 團鳴槍示警突圍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 5 點 20 分，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3 團的 880 名官兵從臨時駐地北京豐台區的南苑機場出發，急行軍 25 公里，該團自稱一路上 16 次遭到群眾圍攻攔阻，有 511 名官兵受傷。

6 月 4 日凌晨 2 點鐘，步兵第 173 團部隊行進到北京市崇文區天壇公園東門外，全團部隊被民眾分割成三截。其中 300 名官兵被 6 萬多名群眾擠壓在道路旁的鐵欄杆和天壇公園圍牆上，動彈不得。官兵們饑餓，乾渴，疲憊不堪。

步兵第 173 團官兵向圍堵的民眾宣傳、解釋，說什麼民眾都不在意，可就是死死堵住部隊，不讓前往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隊伍滯留不到一個小時，11 個重傷患中有的已經昏迷。只見團長陳榮富眉頭緊鎖，苦苦地思索著。良久，才拿起半導體喇叭：“市民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子弟，我們的戰士也是父母所生，也是血肉之軀，現在我們不少戰士身負重傷，請大家救救他們！”

陳榮富話音剛落，便有人送來了汽水，還有人送來點心。一家姓劉的個體戶父子倆，送來了一筐蘋果和香蕉。一位中年婦女為腿部負傷的團參謀長張秋林清理創口，殺菌消毒。兩位老大娘蹲在旁邊，一個勁兒囑咐：“輕點，輕點，這兒也有傷……”北京市第四醫院的一位女醫生悄悄走到團長陳榮富身邊，要求把 11 名重傷患送到她們醫院治療……

當時北京的普遍情況就是這樣，只要部隊停止前進，不去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民眾就以友善的態度和行動待之。

圍堵的民眾後退了一步，官兵們這才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原地坐下休息。先前“走狗”、“幫兇”之類的責罵聲沒有了，轉而開始“政治攻勢”，對官兵們進行開導：“解放軍弟兄們，不要為腐敗政府賣命，脫下軍裝，回家去吧！”“我國國債已達 XX 億美元，你說政府腐敗不腐敗？！”

官兵們閉口不言，有的沉默，有的打盹。只有團長陳榮富抬起手腕看了看表，臉上佈滿了陰雲——時間已是 6 月 4 日凌晨 3 點 20 分，離部隊到達預定集結地正義路南口只有一個多小時了，他怎麼能不著急呢？

陳榮富已經兩天兩夜沒合眼。這位時年 36 歲、作戰訓練參謀出身的中校“團座”，儘管 1979 年、1985 年兩次參加對越自衛作戰，經歷過槍林彈雨，在長期的軍旅生活中練就了一副健壯的體魄，機警的頭腦，素以幹練著稱，然而，面對眼前這場特殊的“戰鬥”，卻也顯得有些莫可奈何。一路上，手臂、腰部七處受傷，兩塊石頭同時砸在他的脖子上，現在還紅腫著。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遠處，兄弟部隊開進時被推翻的軍車橫在街道中，熊熊燃燒著，不時響起油箱爆炸的聲響。

這時，陳榮富蹲到團政委李成星身旁，耳語了一陣，然後挨近上士朱雙喜等人，示意朱雙喜和十幾名士兵圍成一圈，並派出 6 名士兵在週邊警戒，不讓民眾靠近。朱雙喜與十幾名士兵正納悶，一個用被子包裹的木箱放到了他們面前，迅速被啓開了，露出一粒粒晶亮的子彈！陳榮富把子彈分發給 17 名射擊過硬的軍官，輕聲作了交代。這些軍官迅速各自散開。

在部隊開進前的動員會上，團長陳榮富曾經親口說過，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槍口也不對準群眾。此時他將子彈分發下去，讓一些士兵感到困惑。

陳榮富分析認為：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圍堵的人群經過一天一夜的折騰，已經疲憊，一部分人將會回家休息；而 6 月 4 日是星期天，天亮後將會有更多的民眾湧向街頭。因此，眼前正是民眾來去交替的空隙，也是部隊行動的最好時機，機不可失！可是，用什麼辦法帶出部隊？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5 分，6 萬多名圍堵的民眾果然散去了將近一半。只見陳榮富猛地掐滅手中的煙頭，站起身來，喊道：“部隊集合！立正----！----向右看----齊！”

一聽到命令，官兵們頓時忘記了疲勞、饑餓和傷痛，一躍而起，面向天安門方向挺立。圍堵人群也“噙”地躁動起來，齊聲喊道：“把頭掉過去！”“不准鎮壓學生！”陳榮富沒有答理，只向 17 位子彈上膛的軍官作了一個暗示，軍官們便按預定方案迅速分為四組，分別站到隊伍的前後左右。陳榮富站在隊前，高聲說道：“同志們，先整理著裝，一路上要走好。我們是人民子弟兵，要給首都人民留個好印象！”接著下達口令：“向後---轉！齊步---走！”“嘩----”圍堵的民眾以為部隊要後撤，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有的高喊“解放軍萬歲”，

有的打著 V 字型手勢表示勝利。

然而，部隊後撤大約 30 米，陳榮富突然下令“立定！向後轉！”人群再次一陣騷動，接著一擁而上，圍住了部隊。陳榮富沉思片刻，只得重令部隊後撤。

10 米，20 米，30 米，正行進間，只聽一聲“立定”、“向後轉”，隊伍又一次剎住腳步，猛地轉過身來。隊伍兩側幾個“陪行”的年輕人仿佛明白了什麼，喊道：“攔住他們……”就在這時，“噠噠噠噠……”第一組的四名軍官一齊舉槍對空射擊，清脆的槍聲劃破了黎明前的夜空。

“嘩！”人群趴下一大片。不少人拔腿就跑，逃離了大街。幾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學生嚇得哭了。部隊前方亮出大片空地，已無一人阻攔。

“齊步---走！”陳榮富隨著下達的口令，部隊排成六路縱隊，浩浩蕩蕩地從天壇公園東門北側出發，沿著崇文門外大街，一路高歌戰歌，高喊口號，向正義路南口開進。一路上，凡有民眾攔阻，立時鳴槍示警。

東方天際剛剛露出魚肚白，步兵第 173 團部隊官兵順利到達預定集結地---正義路南口。

第五節、配合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鐘，天安門廣場全部燈光一齊熄滅，預示著天安門廣場最後階段的清場行動即將展開。正在天安門廣場南側正陽門附近休整待命的第20集團軍接受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所下達的命令，在清場過程中擔任警戒任務，配合第38集團軍、空降兵第15軍、第27集團軍、第63集團軍等部隊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當時，第20集團軍還有相當一部分部隊在開進途中或受阻，或失散，尚未到達天安門廣場。

6月4日凌晨4點30分，天安門廣場重新亮燈，天安門廣場最後階段的清場行動開始。第20集團軍部隊已經在天安門廣場南側的正陽門前設置了警戒線，把守住前門南大街，只許出不許進，阻止集聚在前門一帶的大批民眾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

儘管第20集團軍佈置重兵守衛警戒線，並不時地鳴槍示警，但仍有成千上萬被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所激怒的學生和民眾集聚在警戒線外，悲憤地高呼抗議口號，每隔一段時間就衝擊一次警戒線，試圖進入天安門廣場聲援堅守在紀念碑底座四周的數千名學生。

與第38集團軍、空降兵第15軍部隊相比，第20集團軍部隊還算有良知，沒有直接對準衝擊警戒線的民眾開槍。而在天安門廣場東北側南池子街南口設置警戒線的第38集團軍，不斷隨意地開槍射殺衝擊警戒線的民眾，造成大量的民眾傷亡。第20集團軍部隊官兵主要是手挽手、肩並肩地組成人牆，用身軀阻擋衝擊警戒線的人潮，有時動用木棍、軍用皮帶驅散人群，實在頂不住了，才對空鳴槍示警，嚇退人群。至今沒有找到第20集團軍部隊官兵在正陽門一帶對準人群開槍的記錄。

6月4日一整天，在天安門廣場南側的前門南大街一帶，始終有憤怒抗議軍隊開槍屠殺的大批民眾衝擊警戒線。第20集團軍部隊官兵在此處警戒執勤整整七個小時，士兵們疲勞過度，接二連三地暈倒，官兵們組成的人牆時而曲彎，時而繃直，始終沒有被衝垮，頂住了民眾的十三次衝擊。

一直到6月4日下午3點40分，在前門南大街一帶警戒執

勤的第 20 集團軍部隊才被其他部隊替換下來，進入天安門廣場休整。第 20 集團軍部隊的休整地在“毛主席紀念堂”南側，官兵們一張張蠟黃的面孔，表明都已經精疲力盡，困乏到了極點，屁股一挨地，便一個個昏睡過去。他們已經連續開進和執勤了 23 個小時，27 個小時沒有吃一口飯了。倒地就睡的官兵們一個個都睡得很死，當晚開始下雨，但雨水並沒有驚醒露宿的官兵們。

第 20 集團軍的一部分部隊，包括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73 團，在天安門廣場東南方的正義路南口設置警戒線，阻止民眾湧向天安門廣場。正義路南口一帶雖然也集聚了抗議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屠殺的人群，但人數遠遠不如前門南大街一帶，警戒執勤的壓力也就相對地要小很多。

第 20 集團軍部隊在天安門廣場駐守了好幾天，然後奉命轉往北京市崇文區執行戒嚴執勤任務，其中，步兵第 173 團進駐國務院參事室（北京市前門東大街 11 號），歷時 73 天。在此期間，第 20 集團軍一方面在崇文區交通要道定點設置哨卡執勤，定時武裝巡邏，一方面配合崇文區公安部門抓捕“動亂分子”、“反革命暴亂分子”和“非法組織骨幹成員”。

第六節、出天安門廣場收攏失散部隊

1989年6月4日下午3點40分，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第20集團軍副軍長丁壽岳大校親自向步兵第58師某團第3營營長李興平交代任務，帶領第3營官兵出天安門廣場接應受阻失散部隊。第20集團軍有兩個團失去聯絡，下落不明。當時，大街上到處都是抗議民眾，丁壽岳知道這個任務十分艱巨，交代完任務後，久久地握著李興平的手。

“3營的注意啦，集合！”李興平一聲高喊，全營官兵“呼啦”一下從四周聚攏，瞬間排成了並列縱隊。官兵們意識到一場新的任務來了。“當時，在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們的眼中，只有天安門廣場才是安全依託，才是生命綠洲。而第3營官兵們剛到天安門廣場不久又要離開，又得走向那些陌生的街巷，那是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民眾圍堵的道路。

在崇文門，第20集團軍某團三百多名官兵已被民眾圍困了整整一天。一天來，他們左沖右闖，8次突圍總共只移動了不到50米的距離，每一次突圍都招來一陣圍攻，最後被擠壓到一棟大樓底下。

夜色漸濃。這時，圍堵的人群紛紛轉身朝前門方向望去，那邊開過來一支部隊，排列齊整威嚴。前頭是4支步槍排成錐形，猶如一把張開的鐵傘，後面由青一色的衝鋒槍手排成一個“日”字形方隊，身背手槍的軍官們分別處於日字的橫豎交接點上，中間一橫由4名大個子和4名衛生員組成，“日”字的頭頂上是這支隊伍的指揮官李興平。李興平把隊伍擺成一個“太陽傘”形的方隊，自有一番講究：先頭以鐵傘開路，本隊如日東升勢不可擋。“太陽傘”方隊如閱兵分列式一般威風凜凜地開來，他們一個個頭戴鋼盔，緊握鋼槍，翻毛皮鞋在地面踏出“鏘、鏘、鏘”的聲響。山東大漢、上等兵禹欽走在“傘尖”位置。“太陽傘”方隊總共有158名官兵。

“太陽傘”開始行動了。人群呆呆地望著這支奇特的隊伍，默默地向後退。有的民眾已把石頭磚塊高高揚起，卻停在了半空，要襲擊這樣的一支殺氣騰騰的隊伍，的確需要膽子。被圍困的某團三百多名官兵趁機開始突圍，第2營官兵奮力衝

開人群，迎上去接應，兩軍匯合。“太陽傘”掉轉頭來，拉開間距，圍護著某團三百多名官兵，一直將他們護送到了天安門廣場。

在崇文區花市大街路口，第 20 集團軍某團團長和 280 名官兵一起遭到民眾圍困。“太陽傘”闖進重圍，李興平大步上前，一個敬禮：“團長同志，我們奉集團軍首長命令，接應你們到北京市公安局待命。”團長一把拉住李興平的手，眼淚奪眶而出，語滯聲塞：“謝謝，謝謝……我們的通信已中斷 20 多個小時了，我們還有三個營和團機關下落不明……”“請團首長放心，我們一定找到他們。”

緊接著，“太陽傘”從前門東大街到崇文門外大街，又到天壇公園東側。“過來了，他們又過來了，瞧‘太陽傘’……”街道兩旁樓房上塞滿窗戶的人頭，都吃驚地盯著這支隊伍。

6 月 4 日深夜 11 點鐘左右，第 3 營爲了尋找接應某團本部，組織了第 3 次出擊。他們已經連續行動了整整 30 個小時。過了半小時，又過了半小時，四處不見某團的蹤影。李興平看見天壇公園東大門擠滿了群眾，尋思某團很可能在天壇公園內，便帶領隊伍沖了進去。人群趁機也往裏湧。“堵住大門！”李興平命令機槍連連長吉訓強率領部分官兵鎮守天壇公園東大門，自己帶了兩名士兵進去尋找。

突然，一團火光騰起，撕裂了夜空，隨即傳來一陣陣吼叫聲，體育館路上的一輛軍車被民眾點燃了。“好，又點燃了一輛，這個車隊要完蛋了！”有人興奮地叫道。第 3 營的 58 名官兵沖出天壇公園東大門，朝火區奔去。這時，第一輛軍車已被大火吞沒，第二輛軍車的車廂板和篷布也被引燃了。火撲滅了，車隊保住了，可是車隊的官兵到底去哪兒了？

連長吉訓強帶領四名士兵去尋找車隊官兵。在崇文區幸福大街一個胡同口，吉訓強用槍頂住一位男人的胸口，逼他帶路。在這個胡同深處的一個院子，某部隊的 11 名看車人員正面牆而立。第 3 營第 7 連指導員宋樹棠下令鳴槍警告，子彈呼嘯著射向天空，民眾逃散了。他們帶著營救出來的 11 名官兵，剛走到體育館路，便被民眾包圍了，包括趕來接應的 54 名官兵。此時，李興平在天壇公園內找到了某團部隊，帶著他們正好趕到天壇公園東大門，民眾無可奈何地散開了。

第 3 營重新擺出“太陽傘”方隊，只是這“太陽傘”此時撐得特別大，裏面走著某團本部和另一個團的 11 名官兵。

第七節、第 20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141 名官兵)

軍長梁光烈少將

軍政委楊興隆少將

副軍長丁壽岳大校

軍參謀長張祥林大校

步兵第 58 師師長冉龍泉大校

步兵第 58 師政委朱阿龍大校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3 團團長陳榮富中校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3 團政委李成星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3 團參謀長張秋林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3 團上士朱雙喜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營長李興平(江西人)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教導員李仁府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8 連指導員趙彥明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7 連士兵王紹國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第 9 連班長張庭建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炮兵連衛生員何偉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通信兵翟明生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炊事班班長閻新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炮兵連士兵李金現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第 9 連指導員杜軍超

步兵第 58 師某團司令部協理員張玉國

步兵第 58 師某團政治處組織股股長彭開洪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第 9 連士兵馬現周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第 9 連衛生員祝軍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第 9 連副班長張以俊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士兵禹欽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機槍連連長吉訓強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第 7 連指導員宋樹棠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第 9 連士兵陳斌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副班長辛樹民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第 9 連副連長肖許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炮兵連連長彭國防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文書張勤儉
步兵第 58 師某團第 3 營班長鄧貴成
步兵第 58 師某團炮兵營營部衛生員樂立成（獲“共和國衛士”
榮譽稱號）
步兵第 58 師某團炮兵營 105 無後座力炮連士兵劉曉東

軍後勤部部長顧任達
軍後勤部副部長曹建新（1993 年後接任後勤部部長）
軍後勤部戰勤處處長曹憲營（1993 年後升任後勤部副部長）
軍後勤部戰勤參謀高新建上尉
軍後勤部政治處幹事辛菩（1993 年）
軍後勤部勤務排排長麻雲田
軍後勤部大灶炊事班班長馮元恩
軍後勤部通信連連長姜光榮
軍司令部參謀張立新（歷任集團軍通信團參謀長、團長、
河南省軍區開封縣武裝部部長。2004 年 10 月起任河南省
鄭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紀委書記。）
軍後勤部政治處幹事謝守忠（歷任後勤部政治處處長、步兵第
60 師步兵 178 團政委、步兵第 60 旅副政委、政委、山東省軍區
濱州軍分區政委。2006 年 5 月起任中共濱州市委常委、濱州軍
分區政委。）
軍後勤部戰勤處參謀呂憲坤（河南省許昌市人。歷任步兵第 60
師後勤部戰勤科科长、副部長、第 20 集團軍後勤部戰勤處處長、
濟南軍區後勤部 33 分部副參謀長。2004 年 11 月起任中共鄭州
市衛生局紀委書記。）
軍電子對抗營連長周新華
軍警調連班長侯戰軍（1987 年兵）
軍防化洗消連連長戴志成
軍通信團汽車排第 1 班士兵李維鋒

軍通信團汽車排第 1 班士兵王少鵬

軍通信團汽車排第 1 班士兵尹雄國（1989 年兵）

軍通信團第 4 連指導員姚振球

軍通信團第 4 連士兵李德峰

步兵第 58 師政治部保衛科幹事劉駿（歷任步兵第 172 團第 1 營機槍連和第 2 營機槍連指導員, 1996 年轉業。）

步兵第 58 師通信營士兵劉周水（1989 年兵，歷任通信營班長、電臺台長、軍校學員、排長、代理連長，1998 年 10 月轉業，現任福建省廈門市愛洋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2 團參謀長姚仕龍（歷任步兵第 172 團團長、步兵第 58 師參謀長、副師長、江蘇省軍區無錫軍分區副司令員。2003 年 9 月起任江蘇省無錫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2 團通信連連長黃宏亮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2 團通信連第 1 排士兵宋福利（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2 團炮兵營榴彈 3 連士兵張良卿（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2 團 2 機連士兵賈來勝（山東省青島市嶗山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2 團工兵連士兵孟維才（山東人，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2 團財務股副連職助理員王陸平（河南省濟源市思禮人。歷任第 172 團財務股正連職助理員、第 20 集團軍後勤部財務處副營職助理員、審計員、審計處副營職審計員、正營職審計員、副團職審計員、財務處副處長，1999 年 6 月任濟源市審計局副局長。）

步兵第 58 師步兵 173 團連長龔建平（江西省豐城市泉港鎮城坑村人。歷任教導員、團政治處副主任、主任、團副政委。1997 年 9 月轉業，任豐城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特務連連長樊天喜（轉業在漯河中級

法院工作)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特務連司務長姚忠民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 64 分隊士兵張桂山 (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通信連陳偉 (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通信連王建 (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通信連無線排李安波 (山東省濰坊市人, 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特務連士兵蔣平 (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汽車連志願兵王興和 (1997 年轉業)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炮兵營高炮連連長劉春明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炮兵營高炮連班長劉新年 (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第 1 營炮兵連指導員黃文傑 (河南省郊縣人。歷任河南省軍區漯河軍分區後勤部副營職助理員、正營職助理員、供應科科長、河南省舞陽縣武裝部部長。2006 年 8 月起任河南省漯河市農業局副局長。)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後勤處副處長郭德社 (安徽省碭山縣人。歷任步兵第 174 團後勤處處長、步兵第 58 師後勤部副部長、部長、河南省鹿邑縣武裝部部長。2001 年 10 月起任碭山縣副縣長、常委副縣長。)

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74 團排長王培雲 (湖北人)

步兵第 58 師炮兵團第 4 連班長韓其兵

步兵第 58 師炮兵團後勤處正連職助理員張旭東 (河南省宜陽縣人。歷任炮兵團後勤處營房股股長、第 20 集團軍後勤部營房處副營職助理員、正營職助理員、副團職助理員、副處長、處長。2007 年 12 月起任河南省鄭州市糧食局副局長。)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團長畢全政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政委趙更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副政委趙和國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營長孫運科 (後來升任副團長)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3 營營長李文闖 (2008 年 10 月任河南省焦作市城管局副局長)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坦克 2 連連長程保中(2008 年 9 月在河南省安陽市龍安區武裝部部長任上轉業，任安陽市安全生產局副局長。)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參謀孟慶偉(山東省單縣人，已經去世)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 5 連士兵林超(山東省荷澤市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特務連指導員陳森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通信連電臺兵竇磊(河南省商丘市人，1989 年兵，現任河南省商丘市安監局支隊支隊長。)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修理連士兵劉景新(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裝甲步兵連連長張新華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裝甲步兵連指導員樊金華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修理連排長高廣進(河北省保定市人)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修理連排長趙記忠(河北省保定市人)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修理連士兵石武(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裝甲步兵連副連長潘祥仁(湖北省襄樊市牛首人)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裝甲步兵連第 3 排排長李貴紅(河南省平頂山市人)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王磊(河南扶溝縣人，1986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盧海鳴(河南省周口市人，1986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李冠軍(河南省太康縣人，1986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班長杜文傑(河南省洛陽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李元慶(河南省開封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閻俊傑(河南省新安縣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閻承明(江蘇省江都市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肖勇軍(江蘇省揚州市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張樹強（河南省魯山縣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杜實銀（河南省洛陽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王發展（安徽省湯山縣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張德彪（河南省寶豐縣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黃紅星（河南省洛陽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專業軍士李紅偉（河南省新安縣人，1987 年兵，1998 年退伍，現在河南省義馬市）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李付奇（河南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9 連連長彭發春（湖北人）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7 連士兵鄭建民（山東省荷澤市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特務連士兵侯先凱（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3 營第 7 連第 3 排士兵李新紅（山東省荷澤市人，1988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4 連士兵王玉平（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2 營第 4 連士兵白軍（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7 連連長王培亮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5 連連長閔順喜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5 連指導員梁廣榮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5 連士兵邢雲生（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7 連士兵丁峰（山東省單縣人，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3 連士兵郜于奇（山東省荷澤市人，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3 連排長高堇浦（山東省濟寧市人）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工兵連文書王義亭（山東省曹縣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高炮連士兵王清軍（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裝甲步兵連士兵劉松傑（1989 年兵）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工兵連指導員賈文洲（現在在河南省平頂山市工作）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汽車連士兵劉名東（1987 年兵，現在浙江省紹興市做汽車運輸生意。）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第 6 連指導員蔡孝發

步兵第 58 師坦克團後勤部士兵李濤（1987 年兵）

步兵第 58 師高炮團參謀盧馬扣（後來曾任步兵 58 師高炮團團長，現任中共上海市浦東新區陸家嘴社區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步兵第 58 師高炮團第 4 連排長钟儒林

步兵第 58 師炮兵團政治處主任韓岳才（現任浙江省新昌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步兵第 58 師士兵閻雲峰（河南省長垣縣人，1989 年兵）

步兵第 128 師政委張慶德

步兵第 128 師步兵第 382 團司令部作訓股股長王國佔（河南省新鄭市人。歷任河南省軍區教導大隊訓練處副營職教員、副處長、處長、河南省正阳县武裝部部長、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區武裝部部長。2005 年 12 月起任河南省鄭州市煤炭管理局副局長。）

步兵第 128 師副政委姜盛雲（山東省萊州市人。歷任 20 集團軍坦克第 11 師政委、山東省軍區淄博軍分區政委。）

步兵第 128 師步兵第 384 團高炮教導營第 4 連連長張家德（河南省固始縣人。歷任步兵第 384 團司令部軍務參謀、第 1 營副營長、代理營長、第 1 營營長、副團長、武警 128 師 708 團團長、師副參謀長。2005 年 12 月起任中共河南省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紀委書記。）

步兵第 384 團營長張新興（河南省鄭州市人。歷任步兵第 383 團參謀長、副團長、第 128 師後勤部副部長、步兵第 383 團團長、武警 128 師副參謀長。2003 年 9 月起任河南省鄭州市城管局副局長。）

第十八章、陸軍第 26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陸軍第 26 集團軍概況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26 集團軍隸屬於濟南軍區，軍部駐地在山東省萊陽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4685”。佟寶存少將任軍長，劉書田少將任軍政委，高中興大校任副軍長，高愛讀少將任軍副政委，張齊紅任軍參謀長。

第 26 集團軍的前身是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 8 縱隊，由八路軍山東軍區屬下的魯中軍區部分部隊發展而來。

1940 年 9 月，魯中地區部隊編為山東縱隊第 1 旅、第 4 旅。1942 年 8 月，山東軍區成立魯中軍區，王建安任司令員，羅舜初任政委，下轄第 1 軍分區（兼第 4 旅）、第 2 軍分區、第 3 軍分區、第 4 軍分區（兼第 1 旅）。

1945 年 8 月，山東八路軍部隊進行整編，第 1 旅、第 4 旅整編為第 3 師、第 4 師；魯中各軍分區及縣、區武裝整編為警備第 1 旅、警備第 2 旅、警備第 3 旅、警備第 4 旅。11 月，第 3 師、警備第 1 旅一部、警備第 3 旅大部調往東北；魯中軍區以警備第 2 旅、警備第 3 旅一部組成第 9 師；其他部隊編為警備旅和獨立第 1 旅、獨立第 2 旅。魯中軍區部隊先是參加津浦路戰役，協同友鄰部隊打破國民黨軍隊自徐州北進華北、東北的計畫，繼而攻佔了魯中要地淄川、博山，以及膠濟線西段重要據點張店、周村，使魯中、渤海兩個解放軍佔領區聯成一片。

1947 年 2 月，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統一整編為解放軍華東野戰軍，魯中軍區主力部隊整編為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 8 縱隊，王建安任司令員，向明任政委，孫繼先任副司令員，張仁初任參謀長，王一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三個師和一個炮兵團，魯中軍區的第 4 師改稱第 22 師，第 9 師改稱第 23 師，警備旅改稱第 24 師。全縱隊共有 33000 名官兵。第 8 縱隊組成後即投入萊蕪戰役，協同友鄰部隊圍殲國民黨軍隊李仙洲集團。4 月，參加泰（安）蒙（陰）戰役，在山東費縣蒙山地區阻援。5 月，在孟良崮戰役中擔任左翼迂回任務，攻佔桃花山、磊石山要點，協同友鄰部隊全殲國民黨軍隊整編第 74 師。6 月，在沂

源阻擊戰中殲滅國民黨軍隊 3 千餘人。

1947 年 7 月，國民黨軍隊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第 8 縱隊由內線轉入外線作戰，西出津浦線，轉戰魯西南地區。9 月，進軍豫皖蘇邊區。11 月，參加隴海鐵路破擊戰，攻克野雞崗、典黃車站，控制開封至徐州段。1948 年 3 月，參加洛陽戰役，在洛陽以東一線阻擊鄭州國民黨軍隊東援，保障了洛陽戰役的勝利進行。5 月，配合中原野戰軍進行宛西戰役，先在方城、泌陽地區阻援，後奔襲許昌。6 月，在宛東戰役中于西平、洪河、遂平地區阻援，後又參加豫東戰役，與友鄰部隊一起攻克開封。9 月，在濟南戰役中于魯西南地區打援，保障了濟南戰役的勝利。11 月至 1949 年 1 月，參加淮海戰役，圍殲國民黨軍隊黃百韜兵團，擔負徐州以南阻援，總攻國民黨軍隊杜聿明集團。

1949 年 2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及部隊番號的命令，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 8 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26 軍，隸屬於第 3 野戰軍第 8 兵團，張仁初任軍長，王一平任軍政委，鐘國楚任副軍長，陳宏任軍參謀長，李耀文任軍政治部主任，周羽一任軍後勤部部長。第 22 師改稱第 76 師，第 23 師改稱第 77 師，第 24 師歸建，以所屬第 71 團、第 72 團一部為基礎，與第 69 團、軍部特務團組成第 78 師。全軍共有 32000 余名官兵。

1949 年 4 月，第 26 軍參加渡江戰役，分別由揚州、邗江的駟馬、王圩等地渡江。5 月，參加上海戰役，攻克昆山、嘉定，攻佔江灣機場，從蘇州河北側攻入上海市區，隨後擔任上海警備任務。

在國共內戰時期，第 26 軍轉戰在華東、中原的遼闊戰場上，戰績顯著。

1950 年 11 月，第 26 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入朝參戰。從長津湖到漢江邊，從三八線南北到平（康）金（化）前線，歷經第 2 次、第 4 次和第 5 次戰役。

1952 年 6 月，第 26 軍撤離朝鮮回國，擔負膠東半島以及渤海長山列島的守備任務。

1985 年 5 月至 1986 年 7 月，由第 26 軍和第 46 軍部隊所組成的第 6 偵察大隊在雲南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含八裏河東山），

執行偵察作戰任務。第 6 偵察大隊共有 402 名官兵（後增至 446 名官兵），其中第 1 連有 88 名官兵（第 26 軍偵察連）；第 2 連有 89 名官兵（第 46 軍偵察連）；第 3 連有 105 名官兵（第 26 軍步兵第 76 師偵察連）。

1985 年，第 26 軍改編為陸軍第 26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76 師（當時部隊代號“54751”）、步兵第 77 師（當時部隊代號“54762”）、步兵第 138 師（原屬第 46 軍，當時部隊代號“54691”），共計三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第 8 師（當時部隊代號“54681”）、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4682”）、高炮旅（當時部隊代號“54683”）、工兵團、通信團、偵察營等部隊。

1998 年後，步兵第 77 師改編為摩托化步兵旅，坦克第 8 師改編為裝甲師。第 67 集團軍撤銷番號後，步兵第 199 師轉歸第 26 集團軍建制。步兵第 76 師改編為山東省陸軍預備役師，步兵第 136 師改編為河南省軍區陸軍預備役師。

第二節、空運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26 集團軍是第二批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中央軍委、解放軍戒嚴指揮部考慮到第一批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不管是乘坐軍車摩托化開進，還是乘坐火車軍用專列，都無一例外地受到各地學生和民眾的強力攔截，於是決定第 26 集團軍部隊採用空運的方式進京。

第 26 集團軍進京部隊是步兵第 138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保障部隊，由軍長佟寶存少將、軍政委劉書田少將為首組成集團軍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的部隊。

有資料稱，第 26 集團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是步兵第 137 師。這是錯誤的。在當時的第 26 集團軍編制中，並沒有步兵第 137 師。在 1985 年的解放軍大裁軍行動中，步兵第 137 師隨著陸軍第 46 軍被撤銷番號，師部改編為第 26 集團軍炮兵旅旅部。

步兵第 138 師師部駐地在山東省濰坊市，下轄步兵第 412 團（當時部隊代號“54692”）、步兵第 413 團（當時部隊代號“54693”）、步兵第 414 團（當時部隊代號“54694”）、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4697”）、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695”）、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698”），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工兵營、汽車營、偵察連、警衛調整連、防化連、炮兵指揮連等部隊，全師共有 12394 名官兵。

步兵第 412 團駐地在山東省諸誠縣，步兵第 413 團駐地在山東省安丘縣景芝鎮，步兵第 414 團駐地在山東省濰坊市安丘縣，炮兵團駐地在山東省沂水縣馬站鎮。

步兵第 138 師屬於甲類編制摩托化步兵師，是第 26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該師歷經戰火，戰鬥力強，在國共內戰時期轉戰 14 個省市，1952 年 9 月 21 日至 1955 年 10 月 18 日，在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62 年 6 月，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部戰備值班師任務。

1969 年 1 月，步兵第 138 師在珍寶島對蘇聯作戰中一戰成名（當時的部隊番號是步兵第 133 師），中央軍委授予該師政治部直工科幹事杜永春、步兵第 398 團偵察排第 3 班班長周登國、

師偵察連副連長陳紹光、步兵第 397 團偵察排士兵于慶陽等四位官兵“戰鬥英雄”榮譽稱號，給步兵第 397 團、步兵第 398 團偵察排記集體一等功。

1979 年 2 月，上級抽調步兵第 138 師 2314 名士兵參加對越反擊作戰。

1985 年 1 月 20 日至 1986 年 5 月 31 日，步兵第 138 師奉中央軍委命令，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執行輪戰任務。中央軍委授予步兵第 414 團第 7 連“攻堅英雄連”榮譽稱號，授予步兵第 414 團第 7 連戰士童培友“戰鬥英雄”榮譽稱號；成都軍區授予步兵第 412 團第 6 連、步兵 414 團第 3 連“堅守英雄連”榮譽稱號，授予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副班長宗建良、步兵第 412 團第 6 連士兵盛其順“戰鬥英雄”榮譽稱號，步兵第 414 團第 3 營副班長王剛“英雄通信兵”榮譽稱號，給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記集體一等功。

1989 年 5 月 21 日，步兵第 138 師接到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緊急命令。師黨委隨即召開緊急會議，宣佈上級命令，確定部隊開動方案，組成師前進指揮部率領五千名官兵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濟南軍區空軍司令部屬下沒有航空運輸師，爲了將步兵第 138 師部隊空運進京，緊急調集各類型號的軍用飛機，包括徵調民用的大型客機和運輸機，集中到山東省濰坊軍用機場待命。（1995 年 6 月濰坊軍用機場改建爲軍民合用機場）

1989 年 5 月 22 日上午 7 點鐘，第一架滿載步兵第 138 師進京部隊官兵的飛機從濰坊軍用機場起飛，目的地是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南苑機場。此後，一架又一架滿載步兵第 138 師部隊官兵的飛機頻繁起飛。緊急空運行動持續了整整兩天，截至 5 月 24 日上午 9 點 30 分，最後一架搭乘步兵第 138 師部隊官兵的飛機抵達南苑機場。

整個緊急空運行動總共動用了各類型號的飛機 69 架次，在上級機關所規定的時間內將步兵第 138 師的 5000 名官兵和武器彈藥，空運抵達南苑機場。

步兵第 138 師進京部隊抵達南苑機場後，奉命在南苑機場就地露營駐紮。一直到 6 月 3 日接到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步

兵第 138 師進京部隊才離開南苑機場，全副武裝向北京城內指定的戒嚴執勤地點開進。

1989 年 7 月 22 日，步兵第 138 師接到解放軍戒嚴指揮部的命令，部隊結束北京戒嚴執勤任務，返回山東省濰坊市駐地。該師的三個兵種團（炮兵團、高炮團、坦克團）先期乘坐火車軍用專列返回山東駐地。8 月 16 日至 20 日，該師的三個步兵團也乘坐火車軍用專列返回山東駐地。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中央軍委和濟南軍區分別授予步兵第 138 師的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和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中央軍委授予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連長袁華榮“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共同授予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榮譽稱號。

第三節、控制永定門等交通要道失敗

1989年6月2日，解放軍戒嚴指揮部啓動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向第26集團軍指揮部下達了挺進北京市區，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命令，這個命令在當天僅下達到軍、師一級指揮官。

第26集團軍部隊的任務是，在永定門（位於北京市崇文區）、木樨園立交橋（位於北京市豐台區）、大紅門（位於北京市豐台區）地區實施戒嚴，控制北京西南區域的交通，阻止學生和民眾西南方向湧向天安門廣場，聲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的學生。

第26集團軍當即在南苑機場臨時駐地召開緊急作戰會議，所有進京部隊的團級以上軍官出席會議。在緊急作戰會議上，軍長佟寶存少將傳達了部隊開進命令，部署了部隊開進方案。軍政委劉書田少將做政治思想動員，強調在目前艱難而複雜的政治局勢下，每一個官兵必須忠於黨，服從黨的指揮，保衛黨中央，保衛共和國，保衛鄧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堅決服從上級命令，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不折不扣地執行戒嚴任務。

緊急作戰會議一結束，部隊開進的預先號令就下達到屬下各部隊，官兵們短時間內做好了所有準備。各部隊以連為單位，各自舉行誓師儀式，官兵們群情激憤，全都被政治思想動員和“軍人受辱”的宣傳鼓動起來了。加上官兵們在南苑機場的臨時駐地已經封閉了十多天，心情及其鬱悶，此刻大都恨不得馬上向北京城內開進，一則可以出一口悶氣、怨氣，二則借機建功立業。

6月3日下午5點鐘，步兵第138師進京部隊的五千名官兵，全副武裝，乘坐各類軍車，分成幾個梯隊，依次從南苑機場出發，沿著預先勘察好的部隊開進路線，向永定門、木樨園立交橋、大紅門等地點摩托化開進。

軍長佟寶存率領幾名軍部參謀人員和警衛人員，身穿便裝，乘坐213吉普車先於部隊車隊出發，進入北京市區預定的地點建立了集團軍前進指揮部。

步兵第 138 師部隊龐大的車隊一出南苑機場，就引起了民眾的注意，人群快速聚集起來。有的民眾呼喊“人民軍隊愛人民！”“不要去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等口號，有的民眾奔走高呼“軍隊出動了！車隊出動了！”招呼人們快來攔阻。部隊車隊趁大批民眾尚未抵達，加快出發速度，一輛接一輛，陸續駛出了南苑機場。

在南苑鎮的南苑路，部隊車隊首次受到民眾的攔阻，當時參與攔截的民眾不是很多，沒有築成路障、車障，也沒有手挽手形成人牆截斷通道。加上解放軍戒嚴部隊尚未開槍鎮壓，民眾的情緒並不憤怒，所謂的攔住行動，也僅僅是勸阻而已。部分官兵奉命下車，在車隊兩旁阻止民眾靠近，護衛車隊通過了南苑路。

一路上，部隊車隊不斷受到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強烈的攔阻，部隊車隊被分成幾截，許多部隊多次突圍失敗，最終未能抵達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當天傍晚，只有部分部隊車隊改變開進路線，繞道馬家堡東路，向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木樨園立交橋開進。

這些部隊車隊抵達木樨園立交橋附近，途經馬家堡東路時，曾遭到大批民眾的強力圍堵。由連長袁榮華帶領的步兵第 412 團第 2 營第 5 連，被群眾團團圍住，前進不得，軍民發生肢體衝突。一些士兵對袁榮華說“連長，不能再忍了！”要求進行反擊。中國軍方的資料稱，袁榮華沒有同意進行反擊。

事後，中央軍委授予該連“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授予袁華榮“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木樨園立交橋距離天安門廣場僅 6 公里路程，又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在這裏參與攔截的民眾成千上萬，抗議聲、責罵聲驚天動地。第一次走出全封閉管理的臨時駐地的官兵們，從未見過規模如此之大的民眾抗議場面，不禁心情緊張。官兵們陷入人海之中，一直到 6 月 4 日清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始終未能突破民眾的圍堵，有效地控制木樨園立交橋。

步兵第 138 師負責佔領、控制永定門的部隊，同樣陷入了圍堵民眾的人海之中，不但沒有完成佔領、控制永定門的任務，部隊反而遭到民眾分割包圍，動彈不得，上下級之間失去了聯繫，許多官兵失蹤、流散。

在大紅門地區，圍堵的民眾也是人山人海的，將步兵第 138 師部隊官兵團團包圍，致使步兵第 138 師部隊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佔領、控制大紅門地區。

第四節、第 26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69 名官兵）

軍長佟寶存少將

軍政委劉書田少將

副軍長高中興大校

軍副政委高愛讀少將

軍參謀長張齊紅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連長袁華榮（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指導員彭海元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士兵李步民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班長王建軍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排長王仲達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士兵安獻東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3 營副營長韓振華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連長景元亮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炊事班班長李寶枝（山東人，濟南軍區授予“首都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班長劉榮功（1986 年 6 月）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指導員姚尙海（河南人）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炊事班士兵孫其田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第 2 班士兵趙金生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炊事班士兵段永超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炊事班士兵譚長春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士兵姜克彬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衛生員田子彬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士兵劉振旭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士兵杜萬平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第 8 連士兵劉向前

步兵第 138 師師長副胡樹安（湖北人）

步兵第 138 師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王天瑞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3 營步談機班長尹高生（1987 年兵）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榴炮 1 連士兵孔祥忠（1989 年兵）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後勤處士兵林國忠（1987 兵，後提幹，2000 年轉業。）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3 營 3 機連士兵顏世傑（後提幹，轉業回到山東省曲阜市。）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2 營第 5 連士兵王傳東（1989 年兵）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2 營第 5 連連長袁化榮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2 營第 5 連排長党向前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1 營營長崔士軍（遼寧省燈塔市人。歷任濟南軍區濰北鹽場管理處處長、濟南軍區後勤部鹽務局運銷處處長、山東省軍區濰坊軍分區副參謀長、遼寧省遼陽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遼陽市弓長嶺區委副書記、紀檢委書記、遼陽市弓長嶺區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現任遼陽市弓長嶺區政協黨組書記、主席。）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龐團長（因消極待命，被轉業回老家了。）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1 連連長孟憲寶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1 連指導員姜見進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專業軍士徐良兵（湖北省京山縣人，1983 年 10 月入伍，農村兵，1997 年以專業軍士身份轉業，沒有得到安置，現為自由職業者。）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連長王昆侖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第 5 連指導員許金祿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炮兵營第 3 連司務長李付坤（山東省臨沂市人）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2 團後勤處軍需股股長馬有貞（江蘇省沛縣人）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政委張以明（遼寧省義縣人。歷任第 26 集團軍步兵第 76 師副政委、山東省軍區東營軍分區政委。）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營職軍官李良田（又名朝暉，山東省利津縣汀羅鎮光前村人。1993 年 8 月轉業，歷任山東省濰坊市工商局商廣科科員、市場科副科長、市消費者協會秘書長。）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軍械股助理員冷全義（山東省海陽市人。後任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4 團軍械修理所所長。1999 年轉業，任山東省安丘市建築工程品質監督站檢測員。）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工兵連連長趙勇欣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3 團工兵連指導員高洪喜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4 團團長王春林（歷任步兵第 138 師參謀長、副師長。1996 年 7 月轉業，歷任湖南省地方稅務局政工處處長、人教處處長、助理巡視員。2003 年 5 月起任湖南省地方稅務局黨組成員、紀檢組組長。）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4 團政治處宣傳幹事童培友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4 團司令部副營職政治協理員李國為（湖南省常寧人。後來任步兵第 414 團第 3 營教導員。1990 年 12 月轉業，任湖南省常寧縣檢察院股長、辦公室主任。1996 年 4 月起任常寧市公安局副局長。）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4 團營級軍官萬德昌

步兵第 138 師步兵第 414 團第 7 連連長張榮先

步兵第 138 師炮兵團 43 中隊士兵尉興會（山東省萊蕪籍市人，1987 年兵，後任炮兵團軍務股股長。）

步兵第 138 師炮兵團第 3 營指揮連士兵郭占亭（1987 年兵）

步兵第 138 師炮兵團第 2 營第 6 連文書張翔（1989 年兵）

步兵第 138 師炮兵團火箭炮連連長高榮基

步兵第 138 師坦克團第 3 營第 7 連士兵孫沛中（1987 年兵）

步兵第 138 師坦克團營長李美峰（山東省平原縣人。1992 年轉業，任平原縣民政局辦公室職員、主任、軍隊休養所所長，2007 年 6 月病逝。）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第 2 營第 1 連連長謝術良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第 2 營第 1 連排長梁敬峰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後勤處幹事王功良（山東省煙臺市芝罘人。
2005 年 9 月起任山東省煙臺市芝罘國稅局副局長。）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軍官尹起富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軍官張佰利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軍官李日明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軍官紀樹光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軍官紀仁強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軍官林濤
步兵第 138 師高炮團軍官胡夕貴

第二十章、陸軍第 64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陸軍第 64 集團軍概況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64 集團軍隸屬於瀋陽軍區，軍部駐地在遼寧省大連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81065”。向經源少將任軍長，譚乃達少將任軍政委，汪一新少將和劉書明大校任副軍長，張傳苗大校任軍副政委，葛振峰大校任軍參謀長，于景常大校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64 集團軍的前身是解放軍華北軍區第 4 縱隊，由八路軍冀晉軍區的陳正湘縱隊和趙爾陸縱隊發展而來。

1945 年 8 月，晉察軍區第 3 軍分區、第 4 軍分區、第 5 軍分區各抽調一部分部隊組建了冀晉縱隊（陳正湘縱隊）；11 月，又組建了另一個冀晉縱隊（趙爾陸縱隊）。1945 年 11 月，晉察冀軍區部隊進行整編，陳正湘縱隊和趙爾陸縱隊分別編入解放軍第 1 野戰軍、第 2 野戰軍。1946 年 6 月，晉察冀軍區部隊精簡整編，陳正湘縱隊與趙爾陸縱隊一部合編組成晉察冀野戰軍第 4 縱隊，陳正湘任司令員，胡耀邦任政委，唐子安任參謀長，李昌任政治部主任。原陳正湘縱隊改編為第 10 旅，原趙爾陸縱隊改編為第 11 旅。

1947 年 2 月至 6 月間，第 4 縱隊先後參加了保北、正太、青滄戰役。10 月至 1948 年 3 月，參加清風店、石家莊、大清河、察南戰役。5 月，解放軍華北軍區成立後，第 4 縱隊改稱華北野戰軍第 4 縱隊，劃歸第 2 兵團建制。12 月，第 4 縱隊參加平津戰役。

1949 年 2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和部隊番號的命令，第 4 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64 軍，隸屬於第 19 兵團，曾思玉任軍長，王昭任軍政委，唐子安任副軍長兼參謀長，傅崇碧任軍副政委，袁佩爵任軍政治部主任，范鐵民任軍後勤部部長。第 10 旅改稱第 190 師，第 11 旅改稱第 191 師，第 12 旅改稱第 192 師。

1949 年 4 月，第 64 軍參加太原戰役。6 月，隨第 19 兵團調歸解放軍第 1 野戰軍建制，執行解放西北的作戰任務。7 月至

8 月，參加扶眉、蘭州戰役。9 月，參加寧夏戰役。

第 64 軍是晉察冀有紅軍基礎的老部隊，也是八路軍堅持晉察冀抗戰的核心力量，部隊作風頑強，攻防兼備，是解放軍華北部隊中戰鬥力最強的主力軍之一。

1951 年 2 月，第 64 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1953 年 8 月，撤離朝鮮回國。

1985 年，第 64 軍改編為陸軍第 64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190 師（當時部隊代號“81233”）、步兵第 191 師（當時部隊代號“81244”）、步兵第 192 師（當時部隊代號“81255”），共計三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旅（當時部隊代號“81378”）、炮兵旅、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81069”）、工兵團、通信團、舟橋團、偵察營等部隊。

1987 年 12 月至 1989 年 1 月，由第 64 集團軍部隊所組成的第 15 偵察大隊，在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執行偵察作戰任務。第 15 偵察大隊共有 839 名官兵，其中，第 1 連有 132 名官兵（集團軍偵察連）；第 2 連有 132 名官兵（步兵第 190 師偵察連）；第 3 連有 132 名官兵（步兵第 191 師偵察連）；第 4 連有 132 名官兵（步兵第 192 師偵察連）；炮兵連有 139 名官兵（步兵第 568 團第 2 營炮兵連）。

1998 年，第 64 軍被撤銷建制。步兵第 190 師改歸第 39 集團軍建制，步兵第 191 師縮編為旅，改歸遼寧省軍區建制，步兵第 192 師改編為遼寧省陸軍預備役第 192 師。

第二節、乘火車專列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64 集團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有步兵第 190 師和集團軍司令部機關的部分人員，由副軍長劉書明大校、軍副政委張傳苗大校、軍參謀長葛振峰大校為首組成集團軍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部隊。

步兵第 190 師師部駐地在遼寧省本溪市，下轄步兵第 568 團（當時部隊代號“81235”）、步兵第 569 團（當時部隊代號“81237”）、步兵第 570 團（當時部隊代號“81239”）、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81245”）、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1241”）、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81243”），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工兵營、汽車營、偵察連、警衛調整連、防化連、炮兵指揮連等部隊。

步兵 190 師屬於甲類編制機械化步兵師，是第 64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在國共內戰時期，該師就是華北解放軍部隊的主力師，官兵素質好，長於進攻，戰鬥力強。1955 年，步兵第 190 師接受原駐遼寧省大連市的蘇聯軍隊摩托化步兵第 7 師的全部裝備，改稱陸軍第 1 機械化師，成為解放軍部隊中第一個機械化步兵師，號稱“暴風雨師”。該師多年被解放軍總參謀部、瀋陽軍區評為裝備管理先進單位。

1989 年 5 月 19 日凌晨，瀋陽軍區司令部向第 64 集團軍轉達了中央軍委緊急調兵命令：步兵第 190 師火速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當天凌晨，第 64 集團軍黨委召開緊急會議，迅速落實了部隊進京方案，並進行了具體部署。奉命進京的步兵第 190 師也在當天上午召開緊急作戰會議，部署部隊進京事宜。

5 月 20 日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重要新聞：中國國務院決定自當天 10 時起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步兵第 190 師步兵 568 團團部機關大樓樓頂的喇叭裏，廣播體操樂曲驟然停止，傳出了警報聲。該團 46 部通訊電臺馬上全部啓動，所有官兵進入戰鬥狀態。

按照上級機關部署，駐遼寧鐵路分局的軍隊代表處緊急調動軍用火車專列，將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官兵通過鐵路線輸送

進京。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分爲兩個梯隊向北京開進，也就是分乘兩個軍用火車專列。副軍長劉書明、軍副政委張傳苗、軍參謀長葛振峰大校率領集團軍前進指揮部成員，以及集團軍司令部機關部分人員，隨同第一梯隊進京。

按照慣例，鐵路部門一路爲軍用火車專列開放綠燈，民用的客貨車一律讓道。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第一梯隊的軍用火車專列，一路順風，幾乎沒有受到什麼阻攔。1989 年 5 月 19 日晚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時候，學生和民眾將攔截進京解放軍部隊的關注點放在北京市周邊地區的公路，以及進入北京市區的交通要道，尚未注意到鐵路和機場。

5 月 21 日上午 8 點鐘，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第一梯隊的軍用火車專列抵達位於北京市昌平縣（現爲北京市昌平區）沙河鎮的沙河火車站。部隊官兵下車後，進駐預定的部隊集結地——位於沙河鎮東北的沙河機場。

沙河機場屬於軍用機場，當時與北京區域的其他軍用機場一樣，包括南苑機場、西苑機場、三間房機場等，都成爲了臨時大軍營，進駐了大量的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

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第二梯隊的軍用火車專列，進京行程並不順利，主要原因是出發時間較晚，各地學生和民眾均已加強對鐵路的監視，防止解放軍部隊乘坐火車專列進京。

5 月 22 日凌晨 1 點鐘，第二梯隊的軍用火車專列在河北省唐山市遷安縣（現爲遷安市）的遷安車站受阻。部分學生臥軌攔阻，大批學生和民眾圍困軍用火車專列。

第 64 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向解放軍戒嚴指揮部彙報軍用火車專列受阻情況，請求指示。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經研究，指示受阻部隊在軍用火車專列上原地待命。結果一待命就是兩天，連後勤供應也無法保障，數千名受阻部隊官兵沒有飯吃，沒有水喝。遷安車站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車站，月臺附近連個售貨亭也沒有。

直到兩天後的中午，遷安縣縣長徐合民奉上級指令，帶人來到遷安車站，給受阻部隊官兵送來了兩輛汽車的飯菜、飲料和水果，才讓受阻部隊官兵吃上了第一頓熱飯。

整整兩天過後，5 月 23 日晚上，在河北省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門的努力下，第二梯隊的軍用火車專列才離開遷安車站，繼續向北京行駛。四個小時後，抵達沙河火車站，官兵們步行進駐沙河機場。

6 月 4 日清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進駐北京市朝陽區，執行戒嚴執勤任務。

1989 年 8 月 11 日，第 64 集團軍前進指揮部奉命將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值勤點和駐勤點，交由第 27 集團軍步兵第 79 師接替，然後率領步兵第 190 師返回遼寧省駐地。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中共中央軍委授予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授予步兵第 568 團司令部通信股股長種振慶“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第三節、佔領德勝門等交通要道

1989年6月3日下午，第64集團軍指揮部接到部隊向北京市區開進的命令，任務是佔領德勝門、馬甸立交橋、雙北立交橋、安貞立交橋、和平街北口，配合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下午5點鐘，副軍長劉書明、軍副政委張傳苗指揮步兵第190師先頭部隊乘車從沙河機場出發，後續部隊陸續出發。步兵第568團官兵乘坐56輛軍車，出發的時間是5點30分。

部隊車隊沿著京昌（北京市——北京市昌平縣）公路向北京城內挺進，排成三路縱隊，齊頭並進，形成勢不可擋的氣勢。部隊車隊出發不久，就在北京市昌平縣清河鎮一帶受阻。清水河的公路橋上擁來了許多民眾，潮水般地擠滿了道路。大批來自昌平大學校區的學生揮舞校旗，會同民眾，阻攔部隊車隊向北京市區開進。

步兵第568團的兩輛解放牌軍車陷入人潮，車上的13名士兵驚恐不安，這些做夢都盼望來北京的年輕士兵，怎麼也想不到北京人民會是這樣子對待“人民子弟兵”。

當時，學生和民眾雖然強烈反對軍隊去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但僅僅使用阻擋道路的方式。步兵第190師官兵在事後的回顧中也承認，圍堵軍車的民眾還比較“友好”，“友好”的標誌就是沒有投擲磚頭、石塊、酒瓶。

步兵第568團車隊在清水河公路橋受阻，後續兩個團的車隊也同時被堵住了。直至6月4日凌晨2點40分，被圍堵了7個小時的部隊車隊，接到上級命令，迅速採取迂回前進的方法，搶佔預定的戒嚴控制點。

圍堵的學生和民眾人數眾多，京昌公路這條大動脈實實在在地堵塞了。從清河鎮到馬甸立交橋，交通隔離墩、公共汽車和卡車橫置在路上，人群熙熙攘攘，黑壓壓一片，一輛輛軍車就象大海中飄搖的小舟。

馬甸立交橋是北京市的海澱區、西城區及朝陽區的分界點，位於德勝門外元大都北城牆遺址土城北側。

一看勢頭不對，副軍長劉書明、軍副政委張傳苗臨時決定，率領集團軍前進指揮部車隊脫離受阻的部隊車隊，後退20華

里，拐上一條偏僻小路，迂回向北京城內預定的集團軍指揮部地點前進。

劉書明、張傳苗帶領數名參謀人員和警衛人員，分乘兩輛北京 212 吉普車出發了。天黑，路不平，環境也不熟，有一次竟順路闖進一家工廠裏去了。最難的是沿途村鎮人很多，幾乎每條路口都有人站崗，拿著對講機，一發現軍車就立即呼叫堵截。劉書明、張傳苗摘下鋼盔，脫下軍裝，換下軍用車牌，兩輛吉普車拉開距離，加大速度，閉燈駕駛，單車分別突進。待圍堵的民眾發覺不對頭時，兩輛車子已經呼嘯而去。

劉書明乘坐的車子在前，張傳苗乘坐的車子隨後，兩輛北京 212 吉普車遠離後面的大部隊車隊，在夜色蒼茫的京郊大地上顛簸著，突進著。

劉書明和張傳苗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到位！趕快在預定地點建立指揮部，群龍不能無首，部隊不能失去指揮。6 月 4 日凌晨零點 5 分，他們乘車到達了預定的集團軍前進指揮部位置。

從沙河機場到馬甸立交橋、雙北立交橋、安貞立交橋、和平街北口，途中需經過數公里長的學院路，學院路兩旁分佈著北京鋼鐵學院、北京語言學院、北京地質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北京航空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等學校，許多學生湧上學院路，勸阻部隊官兵停止前進，不要去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

在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以前，也就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之前，學生和市民攔截部隊車隊的行動，算是溫和、理性的。在學院路一帶，並不能真正攔住部隊的軍車，除非有的軍人借機停止前進。

6 月 4 日天亮前後，步兵第 190 師有幾個團的部隊乘車突破從清河鎮到學院路的路障和人群，陸續到達馬甸立交橋、雙北立交橋、安貞立交橋、和平街北口等上級機關所指定的戒嚴執勤地域。雙北立交橋、安貞立交橋、和平街北口都位於北京市朝陽區。

副軍長劉書明、軍副政委張傳苗得知部分部隊抵達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的消息，剛剛松了一口氣，就接到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新下達的命令：德勝門必須到位！德勝門不到位，其他地點全部到位也不算你到位！

德勝門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自古以來就是控制北京北部地

方的重要道口。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將德勝門視為重要的戒嚴執勤目標。中國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北京有個天安門，但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知道北京有個德勝門。劉書明、張傳苗事後在兩個人合寫的署名文章《走向德勝門》中表示：“德勝門”三個字是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後才儲進他倆的大腦皮層的。

劉書明和張傳苗作為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的最高指揮官，兩個人的軍齡加起來有 61 年，秉持“千條萬條，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信念，並堅定地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們在接到佔領德勝門的命令後表示：千難萬難，也要堅決完成任務，佔領德勝門！

此時，第 64 集團軍指揮部接到上級指示：可以鳴槍示警。劉書明和張傳苗簡短商議後立即下令：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分別突進。步兵第 190 師部隊開始一邊鳴槍，一邊開進，兩個團的部隊終於在 6 月 4 日上午 9 點 24 分抵達德勝門。

直至 6 月 4 日上午，在學院路至馬甸立交橋一帶，還有一些步兵第 190 師的官兵和車輛遭到攔截。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以後，解放軍戒嚴部隊開始在北京城開槍殺人，一些憤怒的民眾開始毆打受阻的步兵第 190 師官兵，並焚燒軍車。在馬甸立交橋附近，就有 27 輛軍車被燒毀。

從 6 月 4 日清晨開始，許多血跡斑斑的學生和民眾從北京市中心的屠殺現場來到學院路一帶，向同學、民眾和受阻官兵敘述親身經歷的屠殺情景。一群年輕的民眾擁著一輛小貨車，沿路展示在復興門中彈身亡的 9 歲小學生呂鵬的遺體。另有一名個體戶司機將六部口慘案的五具遇難學生遺體運送到學院路的中國政法大學校園。這一切，都激起了民眾的極大憤怒，甚至連一些女學生都忍不住一邊痛哭，一邊捶打受阻官兵。有官兵受傷流血。一些在場的學生和民眾上前勸阻，拉起糾察線保護軍人，並將受傷軍人送往醫院治療。

6 月 4 日上午，在學院路一帶，數千名學生、民眾簇擁著 9 歲小學生呂鵬的遺體，阻攔步兵第 190 師的一長列軍車，軍車被攔下來了。呂鵬的遺體帶隊指揮官（一位目擊者估計是師長）的面前，指揮官（師長）一言不發，只是拿右手不停地摸鋼盔下沿，低著頭，也許是不敢正視這慘痛的現實吧。

這位指揮官（師長）面對一些憤怒得近乎瘋狂的群眾的譴

責與謾罵，一個勁兒的喝令他的士兵“不要開槍！”最後的結果是軍車並沒有再朝北京城裏開進一步，一部分軍車的輪胎先是被學生們放了氣，到下午被就被燒毀，另一部分軍車轉移到馬甸立交橋之後，也被攔截的群眾一舉焚毀。

也許是 9 歲小學生呂鵬死後有靈，以他小小的遺體說服了數百名荷槍實彈的殺人工具終於沒有釀出更大的殺人事件。

步兵 190 師步兵 568 團司令部通信股股長種振慶就是在學院路南端受傷，事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在學院路一帶受阻的步兵第 190 師官兵始終沒有開槍射殺民眾，他們純屬“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是受累於開槍殺人的第 38 集團軍、空降兵第 15 軍等部隊。

第四節、第 64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45 名官兵）

副軍長劉書明大校

軍副政委張傳苗大校

軍參謀長葛振峰大校

軍政治部主任于景常大校

步兵第 190 師師長宗同昌少將

步兵第 190 師參謀長王國生（吉林省大安市人。歷任步兵第 190 師副師長、師長、第 64 集團軍參謀長、第 40 集團軍副軍長、軍長、蘭州軍區參謀長、司令員。2005 年 7 月晉升中將軍銜。中共第 17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8 團司令部通信股股長種振慶（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8 團報務員郭崢嶸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8 團軍士長崔榮勇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連長王啓富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第 2 排排長田煥成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第 3 班班長許德永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排長鄭彥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排長高乃興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士兵生可軍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士兵李曉東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第 1 排士兵趙海華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第 2 班班長龐永強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士兵舒啓忠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第 1 班班長肖新利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第 3 連軍士長高志奎

步兵第 190 師後勤部政委裴家瑞（江蘇省建湖縣岡西鎮人。歷任大連陸軍學院院務部部长、副院長。）

步兵第 190 師防化連副連長陳俊海（黑龍江省海林市人。歷任步兵第 190 師防化連指導員、師政治部組織科幹事、工兵營教導員、集團軍政治部保衛科科长。現任黑龍江省伊春市帶嶺區武裝部政委，上校軍銜。）

步兵第 190 師偵察連第 5 班士兵閻衛國

步兵第 190 師通信營士兵魏生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8 團 76 分隊連長魏竹峰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8 團 76 分隊排長佟德富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8 團衛生隊衛生員楊清勝（1987 年兵）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8 團第 3 營第 7 連士兵王志傑（1989 年兵）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9 團第 1 營第 2 連連長常勝剛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9 團第 2 連指導員董春波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9 團第 1 營營長徐春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69 團第 1 營教導員楊振山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連長林英利（遼寧省鐵嶺縣人。1993 年轉業到鐵嶺市銀州區土地局工作，2000 年起任鐵嶺市國土資源局銀州分局副局長。）

步兵第 190 師步兵第 570 團通信連士兵劉軍（1989 年兵）

步兵第 190 師炮兵團團長王振平

步兵第 190 師炮兵團政委馮遠程

步兵第 190 師炮兵團政治處主任白金誠

步兵第 190 師炮兵團第 10 連連長馬立村（山東省壽光市人。歷任山東省軍區東營市軍分區助理員、副營職參謀、正營職參謀、副團職參謀、軍務裝備科科长、作訓科科长、東營區武裝部部长。2005 年 9 月起任東營市林業局紀檢組長、黨組成員。）

步兵第 190 師高炮團第 1 營第 1 連連長李志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

步兵第 190 師高炮團軍械員兼文書孟昭義（1987 年兵。後來任

黑龍江省海林市武裝部政工科幹事、軍事科參謀、海林市海林鎮武裝部部長。2006 年 4 月起任海林鎮副鎮長。）

步兵第 190 師坦克團排長田金治（曾任瀋陽軍區政治部軍事監獄教導員）

步兵第 190 師連長劉國輝（1991 年 9 月轉業到遼寧省本溪市經濟律師事務所工作，2001 年 5 月作為合夥人任遼寧國峰律師事務所主任。）

步兵第 190 師後勤部財務科科長李勇（安徽人。1990 年 6 月轉業，任遼寧省本溪市財政局預算外資金管理處副處長。）

軍政治部副主任符廷貴（遼寧省盤山縣人。歷任吉林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第 64 集團軍政委、第 39 集團軍政委、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政委。中共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94 年 7 月晉升少將軍銜，2002 年 7 月晉升中將軍銜。2006 年 6 月晉升上將軍銜。）

軍炮兵指揮部正營職參謀姜華（山東省乳山縣人，現任中共四川省宜賓市委常委、宜賓市委組織部部長）

軍政治部宣傳幹事張正隆（遼寧省本溪縣草河口鎮人。後來任瀋陽軍區文化部創作室專業作家。1989 年出版長篇報告文學《雪白血紅》，1992 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有 10 余部長、中、短篇報告文學獲軍內外省軍級以上報刊優秀作品獎。現居住遼寧省大連市第 64 軍家屬區。）

軍政治部宣傳處正營職幹事徐貴軍（現任遼寧省本溪市地方稅務局副局長）

第二十一章、陸軍第 67 集團軍與六四事件

第一节、陸軍第 67 集團軍概況

第 67 集團軍是首批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之一，但是，在中國官方和軍方的宣传资料中，基本上见不到第 67 集團軍的身形，显然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期间没有太多的表现。

1989 年北京戒嚴之時，第 67 集團軍隸屬於濟南軍區，軍部駐地在山東省淄博市，當時的部隊代號是“54862”。吳玉謙少將任軍長，杜鐵環少將任軍政委，鄧守業少將任副軍長，何法祥少將任軍副政委，粟戎生少將任軍參謀長，劉政少將任軍政治部主任。

第 67 集團軍的前身是解放軍華北軍區第 2 縱隊，由八路軍第 115 師部分主力部隊，與晉察冀軍區屬下的冀察軍區部隊為基礎發展而來。

1937 年 9 月，八路軍第 115 師主力部隊南下，副師長聶榮臻率領獨立團、騎兵營、教導隊等部，以山西五臺山為中心，在晉察冀三省邊界地區開展遊擊戰，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1944 年 9 月，八路軍冀察軍區成立，下轄第 1 軍分區、第 11 軍分區、第 12 軍分區、第 13 軍分區和第 19 軍分區。隸屬於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轄區在北平（今北京）、保定、陽高、商都、沽源之間。

1945 年 10 月，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部隊擴編，由冀察軍區第 1 軍分區、第 12 軍分區、第 13 軍分區各一部組成冀察軍區劉道生縱隊，下轄第 8 旅、第 10 旅；由冀察軍區第 1 軍分區、第 12 軍分區、第 13 軍分區、第 19 軍分區組成冀察軍區郭天民縱隊，下轄第 6 旅、第 7 旅、第 9 旅和騎兵旅。劉道生、郭天民縱隊合稱冀察縱隊，郭天民任司令員，李天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易耀彩任參謀長，下轄第 6 旅、第 7 旅、第 8 旅、第 9 旅、第 10 旅和騎兵旅，共有 25000 多名官兵。

1946 年 3 月，冀察縱隊進行整編，下轄第 6 旅、第 7 旅、第 8 旅。6 月，晉察冀野戰軍成立。7 月，冀察縱隊改稱晉察冀野戰軍第 2 縱隊，郭天民任司令員兼政委，韓偉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向仲華任政治部主任，原第 6 旅、第 7 旅、第 8 旅改

編爲第 4 旅、第 5 旅，共有 27000 多名官兵。

1947 年 1 月，楊得志、李志民分別接任第 2 縱隊司令員、政委，冀中軍區獨立第 8 旅調歸該縱隊建制，改稱第 6 旅。6 月，陳正湘接任第 2 縱隊司令員。

1948 年 5 月，華北野戰軍第 2 兵團成立，第 2 縱隊隸屬於第 2 兵團。8 月，華北野戰軍第 3 兵團成立，第 2 縱隊轉歸第 3 兵團建制。

1949 年 1 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部隊編制序列和番號的決定，第 2 縱隊在北平市沙河鎮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67 軍，隸屬於第 20 兵團，韓偉任軍長，曠伏兆任軍政委，馬龍、劉儒林任副軍長，趙冠英任軍參謀長，劉國梁任軍政治部主任，曾傳俘任軍後勤部部長。第 5 旅改稱第 199 師，第 6 旅改稱第 200 師。

1949 年 4 月，第 67 軍參加太原戰役，攻克臥虎山。5 月，進駐塘沽、山海關地區擔負海防任務。7 月，解放軍華北軍區獨立第 210 師調歸第 67 軍建制，改稱第 201 師。同時，由原國民黨軍隊第 92 軍第 21 師改編的獨立第 53 師分散編入該軍。

1949 年 10 月 1 日，第 67 軍第 199 師作爲中國人民解放軍受閱部隊，在北京天安門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951 年 6 月，第 67 軍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序列，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從 1951 年 6 月至 1953 年 7 月，先後參加了 1951 年秋季防禦作戰、1952 年秋季反擊作戰和 1953 年夏季反擊作戰。

1954 年 9 月，第 67 軍撤離朝鮮回國，調歸華東軍區建制。

1985 年 3 月，第 67 軍第 199 師在軍長張志堅、軍政委姜福堂率領下開赴雲南省中越邊境文山、硯山兩縣集結駐訓，1985 年 5 月 25 日進入老山戰區接替第 1 軍防務，1986 年 6 月撤離老山戰區歸建。

1985 年，第 67 軍改編爲陸軍第 67 集團軍，下轄步兵第 136 師（當時部隊代號“54898”）、步兵第 199 師（當時部隊代號“54871”）、步兵第 200 師（當時部隊代號“54886”），共計三個步兵師，並編入坦克第 8 師（當時部隊代號“54960”）、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4772”）、高射炮兵旅（當時部隊代號“54773”）、工兵團、通信團、偵察營等部隊。

第二節、奉命進京執行戒嚴任務

第 67 集團軍進京的部隊是步兵第 199 師，以及部分集團軍機關人員和集團軍保障分隊，由軍長吳玉謙、軍政委杜鐵環等人組成集團軍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部隊。

步兵第 199 師師部駐地在山東省鄒平縣，下轄步兵第 595 團(當時部隊代號“54872”)、步兵第 596 團(當時部隊代號“54874”)、步兵第 597 團(當時部隊代號“54875”)、坦克團(當時部隊代號“54878”)、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876”)、高射炮兵團(當時部隊代號“54879”)，以及師直屬的通信營、工兵營、汽車營、修理營、偵察連、警衛調整連、防化連、炮兵指揮連等部隊。

步兵第 199 師屬於甲類摩托化編制步兵師，是第 67 集團軍的主力部隊。其前身是中國工農紅軍第 1 方面軍第 1 軍團第 1 師，1937 年 8 月 20 日改編為八路軍第 115 師獨立團，歷經多次變化，1949 年 2 月改編為第 67 軍第 199 師。1986 年 8 月，解放軍部隊精簡整編，該師成為摩托化步兵師。

1985 年 5 月 25 日至 1986 年 6 月，步兵第 199 師在第 67 集團軍軍長張志堅、軍政委姜福堂率領下，開赴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參加輪戰。1986 年 5 月 16 日，中央軍委授予步該師某部第 6 連“老山堅守英雄連”榮譽稱號，某部炮兵第 1 連“英雄神炮連”榮譽稱號，某部第 7 連“攻堅英雄連”榮譽稱號。

1989 年 5 月 19 日晚上，第 67 集團軍接到通過濟南軍區轉達的中央軍委緊急調兵命令，要求部隊于 5 月 20 日自駐地出發，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5 月 20 日凌晨，第 67 集團軍召開緊急黨委會議，傳達部隊緊急進京命令，落實部隊開進方案。緊急黨委會議決定，由軍長吳玉謙少將、軍政委杜鐵環少將等人組成集團軍前進指揮部，率領指揮進京部隊。

當天清晨，奉命進京的步兵第 199 師召開緊急會議，所屬六個團的團長、政委、參謀長，以及師部各科科长全體與會。先由師長李鳳龍大校傳達部隊進京命令，又由師政委楊玉文大校作了政治思想動員。經過與會者研究、討論，緊急會議快速

擬定了部隊進京方案。

5月20日清晨，步兵第199師所屬各部駐地響起驚人的警報聲，官兵們停止一起活動，緊急集合，聆聽部隊進京命令。隨後，官兵們馬不停蹄地進行部隊進京的各項準備工作，在十多個小時內，一切準備工作完畢。

當天傍晚，步兵第199師進京部隊官兵乘坐數百輛各式軍車，陸續從山東省鄒平縣的駐地出發，由東往西，向北京摩托化開進。

一路上，步兵第199師進京部隊車隊沒有受到大的阻礙，相較於其他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開進過程算是相當順利的。

在步兵第199師部隊抵達北京之前，北京軍區所屬的第24集團軍、第27集團軍、第28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第65集團軍在奉命進入北京市區時，均遭到大批北京學生和民眾的強力阻攔，未能抵達預定的戒嚴執勤地點。因此，步兵第199師奉命暫停向北京市區開進，駐紮在北京市通縣（現為北京市通州區）集結待命。

第三節、向天安門廣場挺進

1989年6月3日下午4點鐘，步兵第199師接到瀋陽軍區前進指揮部下達的命令：部隊立即全副武裝向北京城內開進，執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任務。目的地是天安門廣場，具體任務是參加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

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步兵第199師的先頭部隊乘坐軍車從北京市通縣臨時駐地出發，由南往北向北京市區迅猛開進。緊接著，主力部隊也乘坐軍車陸續出發。

步兵第199師部隊的車隊一出臨時駐地，就開始遇到民眾的阻攔，越往前開，阻攔的民眾越多。當天傍晚，部隊車隊在京津（北京市——天津市）公路的北京市通縣定福莊以東地域受阻。大批民眾使用各種車輛組成一道堅固的路障，路障後面和公路兩邊，則是無以計數的圍堵人潮。步兵第199師的龐大車隊終於被堵死，再也無法前進。

與步兵第199師部隊一起在通縣定福莊以東地域受阻的，還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另外兩個師。三個師部隊的軍用卡車和軍用吉普車一輛挨著一輛，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全都陷入了人潮之中。參與圍堵的民眾人數之多，不能不令受阻部隊官兵感到吃驚。

不知道是因為沒有接到開槍命令，還是指揮官不願執行開槍命令，步兵第199師以及其它兩個師的部隊，始終沒有採取強制措施驅散民眾，奪路突圍。官兵們緊緊抱著槍，待在軍車上，安靜地聆聽民眾們的勸說，大多沒有什麼反應。

第199師部隊以及其它兩個師部隊的車隊原地不動，在通縣定福莊以東地域受阻超過7個小時。當天晚上10點鐘，第38集團軍部隊率先在北京城內開槍鎮壓，造成民眾大量傷亡。陸續有民眾傷亡的消息傳來，在定福莊以東地域參與圍堵的民眾開始群情激憤起來，好在軍民雙方都還算自製，沒有造成大的流血衝突。

6月4日凌晨3點55分，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第一梯隊的坦克、裝甲車隊來到北京市通縣定福莊以東地域，遇上步兵第199師以及其它兩個師部隊的受阻車隊。坦克第一師閻參謀

長乘坐裝甲指揮車快速超越所有的受阻軍車，到前方觀察情況。爲了保證部隊按時趕赴天安門廣場，閻參謀長斷然下令：迅速破障前進。

坦克第 1 師第一梯隊先頭分隊的三輛裝甲車——011 號、012 號、013 號裝甲車，將油門加到最高檔，合力猛烈撞擊路障，一次又一次，終於撞開了路障。坦克、裝甲車一輛接一輛沖了過去，步兵第 199 師和其它兩個師受阻部隊的車隊跟隨著沖了過去。

步兵第 199 師部隊車隊一路尾隨坦克第 1 師第一梯隊的坦克、裝甲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坦克第 1 師第一梯隊已經接獲開槍命令，而且執行命令的態度明確、堅決，因此，一路強行撞開路障，開槍或發射軍用瓦斯彈驅散民眾。

在北京市朝陽區大北窯立交橋，成千上萬的民眾將數十輛車輛用鋼絲繩連在一起，並縱火點燃，現場濃煙滾滾，火舌高達十多米，但未能擋住坦克、裝甲車隊。

在北京市朝陽區呼家樓，這裏已經屬於北京市區，遇到了民眾更爲頑強的阻攔。7 輛汽車圍成“口”字形擋住道路，設置成堅固的路障，但同樣未能擋住坦克、裝甲車隊。

在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門前，大批學生和市民正在忙於設置路障，攔截部隊車隊。坦克第 1 師官兵毫不猶豫開槍或發射軍用瓦斯彈，迅速驅散了人群。已知有學生在此處遇難。

6 月 4 日凌晨 4 點鐘左右，步兵第 199 師部隊車隊跟隨坦克第 1 師第一梯隊的坦克、裝甲車隊行駛到北京市朝陽區日壇路。不遠處的建國門立交橋上濃煙滾滾，一片火海，民眾把立交橋上當作路障的 8、9 輛汽車全部點燃了。坦克、裝甲車隊沒有減速，強力撞開燃燒的汽車沖了過去。

步兵第 199 師部隊車隊跟隨坦克、裝甲車隊經過建國門立交橋，來到東長安街上，只見東長安街上佈滿了垃圾桶、水泥墩、鐵柵欄，民眾並沒有放棄阻攔部隊車隊前往天安門廣場的努力，但是，凡人肉身實在無法抗拒鋼鐵龐然大物，加上坦克第 1 師第一梯隊官兵執行鎮壓命令的意志堅定，坦克、裝甲車不管是逢人或逢物，都是照樣不減速，一律強力衝撞。

6月4日凌晨4點50分，坦克第1師第一梯隊先頭分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凌晨5點18分，坦克第1師第一梯隊其它的裝甲車和坦克抵達天安門廣場。緊隨其後的步兵第199師和其他兩個師部隊的軍車稍後也陸續到達天安門廣場。

步兵第199師抵達天安門廣場時，清場行動已經基本結束，也就是說，該師部隊沒有在規定的時間內趕到天安門廣場，也沒能按計劃參與清場行動。在事後中央軍委頒佈的立功受獎部隊名單和“共和國衛士”名單中，都不見步兵第199師的蹤跡。在中國官方和軍方有關“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英雄模範事蹟的宣傳資料中，也找不到步兵第199師。

第四節、第 67 集團軍參加北京戒嚴官兵名錄

（目前總共搜集到 72 名官兵）

軍長吳玉謙少將

軍政委杜鐵環少將

副軍長鄧守業少將

軍副政委何法祥少將

軍參謀長粟戎生少將（？）

軍政治部主任劉政少將

集團軍司令部作訓處處長譚世田

集團軍司令部作訓處參謀楊清連（安徽人）

集團軍司令部作訓處參謀陳東軍

集團軍司令部作訓處參謀賈月貞（轉業到山東省泰安市工作）

集團軍司令部作訓處參謀崔達山

集團軍司令部軍務處幹事李岩（安徽省阜陽市某區法院副院長）

集團軍司令部參謀麻恩年（1980 年任連長）

步兵第 199 師師長李鳳龍少將

步兵第 199 師政委楊玉文大校

步兵第 199 師參謀長王興輝（山東省臨朐縣人。歷任步兵第 199 師副師長、師長、第 67 集團軍副參謀長、善後辦副主任、山東省軍區淄博軍分區司令員。）

步兵第 199 師政治部主任王洪堯（山東省濟寧市人。歷任步兵第 162 師政委、第 54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2002 年晉升少將軍銜。）

步兵第 199 師司令部軍務科副營職參謀王太松（山東省莒南縣人。歷任步兵第 199 師司令部軍務科正營職參謀、副科長、科長、師副參謀長、師裝備部部長。2004 年 1 月起任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武裝部部長。）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政治處副主任李勝慶（江蘇省江陰市人。歷任步兵第 595 團政治處主任、濟南軍區政治部紀檢部調研處幹事、紀檢處副處長、紀檢處正團職幹事、調研處處長、

紀檢部副部長、山東省軍區聊城軍分區政委。)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3 連連長張紹春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1 營第 1 連連長王瑞華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1 營第 1 連指導員黃振華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1 營第 1 連專業軍士曹雪東 (安徽省肖縣人)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政治處宣傳股幹事王立友 (後來曾任濟南軍區《解放軍健康》雜誌社主編)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2 連連長李秀明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通信連副連長乙志傑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通信連王瑞星 (山東省夏津縣人)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通信連連長李占登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通信股技師李繼紅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1 連指導員劉運良 (轉業山東省濟寧市某縣工商局)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通信連士兵胡海濱 (1989 年兵)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通信連總機班班長李聯合 (1988 年兵)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3 營第 9 連連長王玉連 (轉業後任蚌埠汽車管理學院院長)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3 營第 9 連指導員劉緒才 (轉業後在南京市工作)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班長宮恒勇 (安徽省鳳陽縣人, 1987 年兵, 後來曾任步兵第 595 團第 1 營營長, 轉業在鳳陽縣法院工作。)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3 營第 8 連連長馬洪濤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3 營第 8 連排長張軍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2 營第 4 連連長尉文獻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2 營第 4 連指導員強軍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 2 營 4 連士兵蘆毅 (山東省濟陽縣人, 1987 年兵)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連長吳正玉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2 營第 4 連文書李全義 (1988 年

兵)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2 營第 4 連班長攀樹亭(山東膠州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2 營第 4 連班長張軍(山東省膠州市人,1987 年兵)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2 營第 4 連文書吳紅輝(1987 年兵)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3 營第 7 連連長劉海洋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3 營副營長陳光輝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1 營副營長王朝棟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副團長黃金生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副參謀長朱憲寬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政治處宣傳股副連職幹事張文亨(山東省沾化縣人。歷任步兵第 595 團政治處宣傳股正連職幹事、組織股代股長、股長、炮兵營教導員、第 3 營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步兵第 199 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山東省墾利縣武裝部副部長、山東省東營市東營區武裝部副部長。2005 年 2 月起任利津縣武裝部政委。)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5 團第 2 營第 4 連連長高建忠(江蘇人,1991 年)

步兵第 596 團第 1 營第 2 連連長李才喜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第 1 營第 2 連指導員郭旅懷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第 1 營第 2 連副連長孫秀民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第 1 營第 2 連第 2 排排長李戈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第 1 營第 2 連第 3 排排長張勇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炮兵營第 2 連第 1 排排長曾憲祥(山東省臨朐縣人)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第 3 營第 7 連副連長孫兆群(1995 年任步兵第 596 團副團長)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第 3 營第 7 連第 2 排排長管恩棟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第 3 營第 7 連第 3 排排長李樂寶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政委朱志仁(升任師副政委)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6 團班長王文深（歷任步兵第 596 團排長、司令部參謀、指導員、政治協理員、教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團副政委。2007 年 1 月起任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民政局副局長。）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7 團副團長徐守福（山東省臨朐縣人。歷任步兵第 199 師副參謀長、步兵第 596 團團長、山東省軍區棗莊軍分區參謀長、司令員。）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7 團團長陳維揚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7 團司令部管理股協理員江勤志（山東省即墨市人。轉業後歷任中共山東省青島市四方區政法委副書記、四方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7 團司令部管理股股長李成貴（江蘇人）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7 團第 2 營第 4 連副連長都昌林（安徽省安慶市人。歷任步兵第 597 團第 2 營第 4 連指導員、團政治處幹事、股長、副主任、營教導員、團副政委、步兵第 199 師政治部副主任、高炮團政委、第 26 集團軍防空旅副政委。2006 年 2 月起任山東省章丘市武裝部政委。）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7 團政治處副連職幹事閻濤（安徽省阜南縣人。歷任步兵第 597 團政治處正連職幹事、幹部股副股長、股長、營教導員、第 67 集團軍教導大隊政治處主任、步兵第 199 師高炮團副政委。2002 年 9 月轉業，任中共安徽省阜陽市紀委正科級紀檢員、阜陽市紀委黨風廉政室副主任。2006 年 7 月起任中共安徽省潁上縣紀委書記。）

步兵第 199 師步兵第 597 團政治處宣傳股股長宮金衛（湖北省隨州市人。歷任步兵第 597 團政治處組織股長、師組織科幹事、副科長、步兵第 596 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河南省軍區孟州市武裝部政委、河南省高唐縣武裝部政委。2001 年 1 月起任高唐縣武裝部政委。）

步兵第 199 師專業軍士趙同江（1982 年入伍，1989 年在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時立三等功。1996 年退伍，在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濱城分局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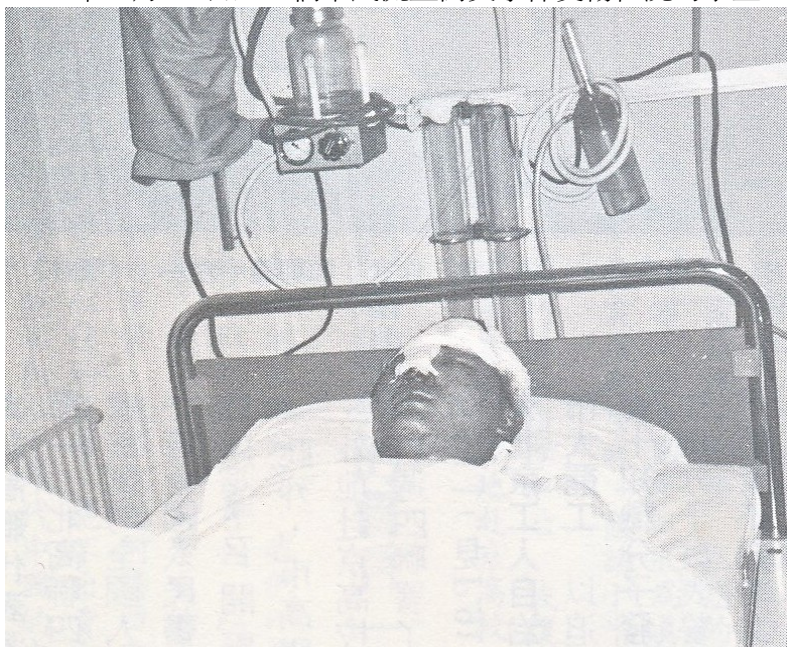
第 28 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左 1）、军政委张明春（右 1）



1989 年北京戒严期间，第 28 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前排右二）与步兵第 244 团部分领导合影。



1989年5月22日六里橋軍民流血衝突事件受傷住院的學生



1989年5月22日六里橋軍民流血衝突事件受傷住院的軍人



1989年6月3日，六部口，被民眾截獲的“軍火車”。



1989年6月3日，六部口，武警用電棒、催淚瓦斯等驅散人群。
（路透社照片）



1989年6月3日下午，北京測繪出版社職員鄭魯濱在人民大會堂西門前被陸軍第65集團軍的軍人打得頭破血流。



1989年6月3日下午，一名男子在人民大會堂西門被眾多的第65集團軍軍人包圍，打得渾身是血。



同上



1989年6月3日，長安街上，載滿軍人的軍車正開往天安門廣場。圖片集是兩位美國記者兄弟拍攝（兄：David Turnley 弟：Peter Turnley）。



1989年6月4日凌晨，坦克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坦克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坦克碾過路障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北端與軍隊對峙。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陸軍第 38 集團軍裝甲車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攝影：今枝弘一



1989年6月4日凌晨，民眾在長安街上用石塊反擊武裝軍人。



1989年6月4日凌晨，受阻軍人撤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鐘，第27集團軍特遣分隊軍人端槍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前沖向集結在紀念碑底座的學生隊伍。照片中可見一名軍人的槍口閃著火光。軍人背後的建築物是人民大會堂。攝影：今枝弘一



1989年6月4日凌晨，第27集團軍特遣分隊軍人端槍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前出發。



1989年6月4日清晨，坦克向天安門廣場開進。



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30分，紀念碑底座北側的學生對端槍抵達的軍人揮動V字形手勢，高喊口號：“團結起來，不怕犧牲！團結起來，不怕流血！……”



1989年6月4日凌晨，第27集團軍特遣分隊沖上紀念碑底座。



1989年6月4日清晨，軍人在天安門廣場放火焚燒。



1989年6月4日清晨，紀念碑底座北側的軍人。



1989年6月4日凌晨5點30分許，學生含淚撤離天安門廣場。
攝影：大塚敦子



1989年6月4日凌晨，兩位學生架著受傷的女同學撤離天安門廣場。路透社照片



1989年6月4日凌晨，003號裝甲指揮車在金水橋前遭燒毀。



1989年6月4日凌晨，339號裝甲車在新華門附近遭燒毀。



天安門廣場，民主女神塑像。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天安門廣場，被推倒的民主女神塑像。



1989年6月4日凌晨，被裝甲車撞死的遇難者。美聯社照片，
圖片來自1989年6月12日出刊的《時代雜誌》。



6月4日凌晨天安門廣場上抬受傷同學去醫院。K&W 圖片社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民眾搶運受傷者。



1989年6月3日深夜，北京民眾搶救中彈者。



北京市民救護死傷者



1989年6月4日，北京民眾搶運受傷者。

攝影者：美聯社駐京記者劉香成



1989年6月4日，民眾在醫院認領死難者。圖片來自《血洗京華實錄---香港文匯報記者組直擊報導》，香港文匯出版社出版。



1989年6月5日，郵電醫院外，北大死難學生的親人哀痛欲絕。



最後的告別



1989年6月4日上午，陸軍第28集團軍車隊在西長安街上的木樨地一帶受到民眾阻攔。



1989年6月4日上午，陸軍第28集團軍的74輛軍車，其中包括31輛裝甲車、2輛通訊車燒毀。



1989年6月4日清晨，天安門城樓東側南池子大街北口附近，第38集團軍部隊時不時向抗議的民眾開槍射擊，每一次都造成一些死傷民眾倒臥在東長安街上。



1989 年 6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群（2 百多輛）。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現場景象之一。



1989年6月4日清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現場景象之一。



6月4日清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現場景象之一。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西長安街六部口，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坦克車隊一邊投擲軍用瓦斯彈，一邊追軋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學生們緊急躲避，現場瀰漫軍用瓦斯彈煙霧。圖片來自時代雜誌(Time), 89/6/19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現場景象之一圖片來自時代雜誌 (Time), 89/6/19



Il a les jambes
broyées par un
tank

64memo.com

**1. 4 JUIN
6 H 15 : LE PIÈGE**
Un cortège
d'étudiants a quitté
Tian Anmen par le sud
et tente de rejoindre
l'avenue Chang An.
Arrivé au carrefour
Liu Bu Kou, à
50 mètres du siège du
gouvernement et du
Parti, il tombe sur
trois chars qui sortent
de la place. Un tir très
nourri de gaz
lacrymogènes enfume
l'air. Des étudiants
tentent d'éviter les
chars qui foncent
dans le tas en
escaladant les
barrières.

117

**2. 6 H 20 :
L'HORREUR**
Les trois chars sont
partis, les gaz se
dissipent. Des
témoins se précipitent
sur un blessé qui
s'accroche à la
barrière. Sur la
chaussée, il y a onze
morts.

**3. 6 H 20-25 :
LES MARTYRS DE
LIU BU KOU**
Deux hommes tentent
de poser des garrots
sur les jambes
arrachées d'un des
étudiants piégés
à Liu Bu Kou.

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正被壓斷雙腿，掛靠在路邊的欄杆上。兩位民眾正在為他包紮。



失去雙腿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正



遭坦克碾軋的遇難者遺體



一位遇難者被坦克碾軋成肉醬

圖片來自“驚天動地的一百天”，亞洲週刊 1989 年出版



1989 年 6 月 4 日，醫院中的死難者遺體。



被開花子彈奪去生命的遇難者



1989年6月4日清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剛剛結束，一些不願離去的學生在廣場上遭到拘捕。



1989年6月4日，軍人用槍托、棍棒圍毆被捕學生。一位北京市民拍到這張相片，送給美國記者，請求美國記者帶到國外發表。



1989年6月4日上午，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坦克車隊在六部口設置了警戒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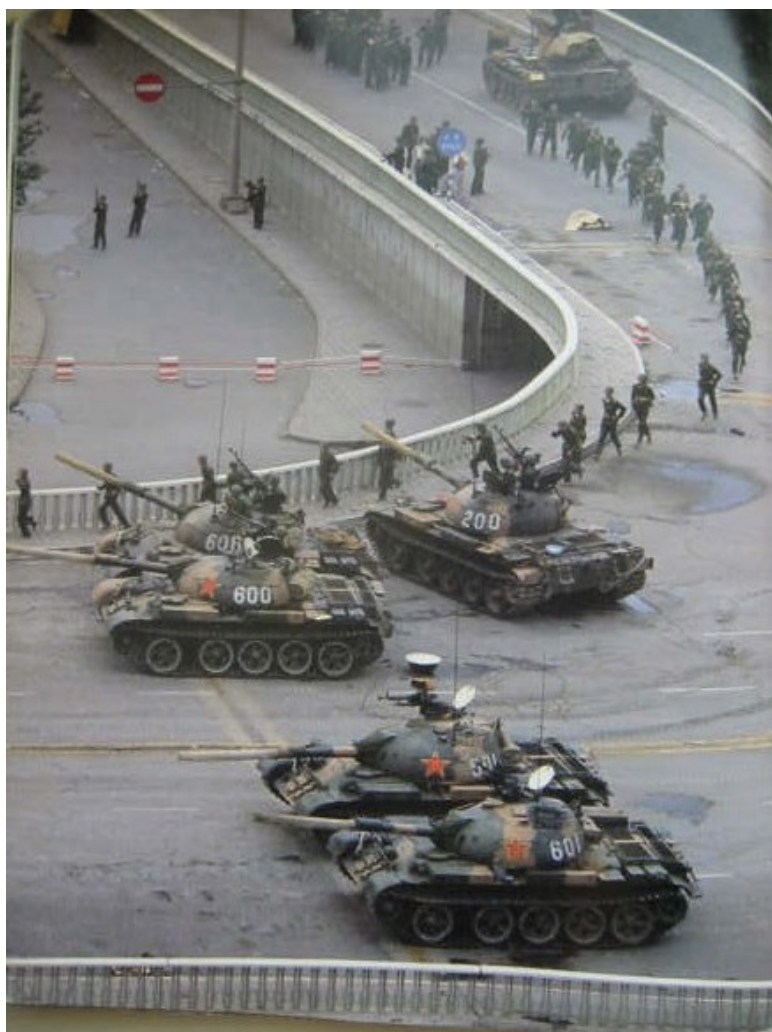
1989年6月7日，天安門廣場重兵駐守，一些市民在遠處觀看。



1989 年 6 月 4 日上午，在西長安街中南海新華門設防的坦克。



在天安門城樓前設防的坦克



建國門立交橋上。相片的左面是東。在立交橋的牆壁上還有墨寫的“粉碎軍管，保衛北京”的大字。



1989年6月4日，北京市民展示撿到的子彈殼和彈頭。
攝影：今枝弘一



1989年6月7日，西長安街上燕京飯店的房子彈痕累累。



1989年6月4日上午，一位受傷者在北京建國門外交公寓前講述被軍人用刺刀刺傷的經過。



1989年6月7日，戒嚴部隊軍人駐守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底座，紀念碑底座臺階上坦克碾過的損毀痕跡依然歷歷在目。這裏是數千名學生最後堅守的地方。



1990 年 5 月，作者在香港。



1991 年 5 月，作者在加拿大。

書名：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
----1989 天安門事件真實記錄

作者：吳仁華

出版：真相出版社

通訊地址：P. O. BOX 6159

Alhambra, CA 91801

U.S.A

電子郵件：yenhua2000@yahoo.com

電話：(626)3278855(美國)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0-9823203-8-9

定價：HK\$128

版次：2009 年 5 月第一版